

黃道炫 著

鐵水流

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

1937-1945

新華書店

黃道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和民國史。著有《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2011）、《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2012）、《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一卷）》（2019）等。

1937至1945年，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奇跡般的發展道路」：由剛剛結束長征、在夾縫中求取生存的貧弱力量，迅速成長為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勢力之一。不唯如此，這一時期由特定歷史現實所鍛造的黨的特性，在戰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持續對這個政黨、乃至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產生深刻的影響。

本書將對抗戰時期黨組織的分析和對黨員個體的觀察結合起來，為中共政治文化的形成和革命體系的締造提供了「最詳密的近距離特寫」和「具有突破性的總體理解」，展示幹部規訓、政策執行、生存和抵抗等系統的運作與演進，如何為中國共產黨帶來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和凝聚力，將之打造成一支「鋼鐵般的政治力量」。

鐵水流

鐵水流

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1937-1945

黃道炫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鐵水流：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1937-1945》
黃道炫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24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88-237-316-7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cup.cuhk.edu.hk

*Flowing Steel: Operating Syste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Wartime, 1937-1945* (in Chinese)
By Huang Daoxua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24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237-316-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cup.cuhk.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引言 vii

- I 戰時中共的規訓系統 1
 - 一、幹部養成的路徑 5
 - 二、婚姻限制下的掙扎與皈依 71
 - 三、整風運動的心靈史 105

- II 戰時中共的政策和貫徹系統 153
 - 四、權力的垂直下探 157
 - 五、群眾組織及群眾路線 191
 - 六、政策落實 217
 - 七、統一戰線的地方形態 263

III 戰時中共的生存和抵抗	297
八、出師華北	301
九、持久戰的「三駕馬車」	339
十、弱平衡下的根據地生存	383
十一、抵抗系統的隱喻：地道和地道鬥爭	425
結語	453
主要參考資料	457

引言

一

本書的「戰時」，主要指抗戰時期，然而如果讀者想要從這本書瞭解中國抗戰，肯定會大失所望。因為這並不是一本講述抗戰的專著。這本書真正要面對的是中國共產黨，一個在抗戰的艱難困苦中成長起來的政治力量。抗戰是背景，真正的主角是中共，當然，抗戰的背景也絕非可有可無。

從抗戰之初局處西北一隅接受改編，到抗戰結束時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大黨，和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平起平坐，中共在八年內走過了奇跡般的發展道路。抗戰初期，蔣介石曾經提出抗戰建國的口號，然而真正實現了這一口號的不是國民黨，卻是他們的對手和夥伴——中國共產黨。

經常聽到一句老話：失敗是成功之母，套用到中共抗戰前後的歷史，似乎如此貼切，因為此前的中共剛剛經歷了一次慘痛的失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此時的成功是糾正此前錯誤的結果。不過，歷史學的邏輯常常未必就是歷史本身的邏輯，政策改變很多時候只是時也、勢也，不一定就是經驗的升華，起碼不純粹是這樣。回顧這一段歷史時，毋寧說更多想到的還是另一句老話：禍福相依。

1934年，中共離開江西，經一年長途跋涉到達陝北，並在此暫時找到棲身之地。如果放遠眼光，或可發現，中共這是從一個夾縫來到了

另一個夾縫。1930年前後，由於國民黨內部的爭戰，南京政府控制力軟弱，贛南、閩西地區成為國民黨中央和地方控制之間的夾縫，中共在這裏找到了良好的發展空間，同樣的地區還有鄂豫皖、湘鄂西等等。1932年後，隨著國民政府控制力的加強，勢力範圍開始以放射狀向四外推展，中共原先尚可依以生存的夾縫在南京中央的強力面前被逐漸弭平，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先後失去，最終中央蘇區也難以抵擋上升中的國軍的進攻。很明顯，膨脹中的國民政府已經不太可能給中共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留下生存空間。

相比東南地區，此時南京中央對西北仍然鞭長莫及，地方實力派基本各據一方。陝北作為貧瘠之地，統治力量尤為薄弱，中共在這裏意外而又勢所當然地進入了另外一個夾縫。由於中共最主要的對手還是南京中央，所以，南京力量在這裏的相對薄弱讓經過長征已經奄奄一息的中共爭得了寶貴的喘息之機。從這個角度說，中共在西北仍然是夾縫裏的生存。

大概國共雙方都不會想到的是，在國民黨中央力所難及的陝甘地區，中共完成了和張學良、楊虎城的接觸，從而繃緊了西安事變的利矢；更重要的是，身處西北這一地域，為抗戰爆發後中共挺近華北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開啟了中共在抗戰時期建立敵後根據地的大門。處身西北、華北這樣國民黨中央無法直接控制的區域，又背靠蘇聯，恰處日蘇潛在對抗的掎角前沿，這種非人力的偶合豈非天造地設。

一個新生的力量由於其弱小，不得不利用縫隙求取生存，事實上，華北地區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已經成為日本侵略下中日兩國力量對壘的夾縫。

日本佔領東北後，不斷蠶食華北，壓迫國民黨中央力量出河北甚至河南，所以，和國民黨中央在南方滾桶式推進，戰前即基本完成東南、華南乃至西南地區的統一不同，華北地區國民黨中央的力量始終踟躕不前。相比陳濟棠、李宗仁及劉湘等地方實力派多米諾骨牌般的歸順態勢，應該說，華北像韓復榘、宋哲元、商震包括閻錫山這樣的地方實力派並不具有超過陳濟棠、李宗仁的實力，他們能夠與南京中央博弈，保

持相對獨立的姿態，日本人在背後起著關鍵作用。南京中央統一的大旗受到日本人抵制，在華北無法發揮威力。南京中央在華北始終無法建立有效控制，這樣的態勢，在戰爭爆發後，隨著中國軍隊的迅速退卻及日軍的迅速南進，導致華北平原出現短暫的統治真空。由於中共的積極主動和獨立進取，他們抓住了這一時機，在抗戰初期獲得了奇跡般的發展，這一發展相當程度上奠定了日後中共根據地的基礎，並對此後中國歷史的進程意外地發生了巨大的戰略性影響。由於此，本書觀察的地域也主要限定在華北地區。

歷史不能過於強調命運，強者總是能扼住命運的咽喉。如果不是毛澤東堅持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把建立根據地作為戰爭初期的基本方針，中共也不可能抓住華北的機會，所以，機會終究還是屬於那些能夠抓住的人。中共是極具能動性的政黨，這是共產主義政黨的共性，革命從南到北，在不同時段、不同地區，不同地理、社會、人文、經濟環境下展開，循著的卻是基本相同的路徑。在中共革命中，人們通常看到的是革命改變現實，而不是革命被現實捆綁，血緣、學緣、地緣乃至社會、經濟、地理這些因素，常常被革命的能動性拋在後面。改造而不是適應世界，是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法則。

不過，能動性終究也有其限界。試想一下，如果不是1934年的失敗，導致中共不得不轉移到陝甘地區，從而在抗戰中出兵華北，抗戰初期華北形成的短暫統治真空時期如何有可能利用，這樣看，歷史的機緣又真是神奇地存在於歷史的深處。再回頭看，當南京中央鞏固自身，全力以赴對付中共時，中共好像很難有繼續在東南地區立足的機會，西走幾乎又是唯一選擇，畢竟，夾縫中生存仍然是中共此時的首選，何況西北地區還有背靠蘇聯這一戰略優勢。所以，看似偶然的一切，又隱含著趨勢性的理路。說起來，對手的機會往往來自自身的缺陷，南京中央在內憂外患形勢下控制力的薄弱，才是真正造成這一切的致命傷，而日本人又在這樣的傷口上重重捅了一刀。

歷史就是生活的寫作版，一串串的偶然連接著，必然似乎順勢就掉下來了。

二

順勢掉下來的可能是必然，也可能是刺猥或者狐狸。要讓自己希望的果實掉下來，需要精心的澆灌、培養和維護，不是只坐在樹下乾等就可以的。

抗戰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的迅速上升期。中共是一個具有強烈理念型傾向的政黨，這樣的政黨通常有強烈的原則立場，自我期許高、進取心強、效率優先，呈現剛性政黨的特質。抗戰時期，這一點毫未變化。同時，戰爭中的生存要求，以及戰時統一戰線給這個黨注入的柔性成分，使之靈活性和策略性一面可以不受既有理論的限制得以展現。權力運作呈現彈性，政權機器中貫注溫情，無論政治、軍事還是社會政策，都以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為目標。中共之所以為中共，抗戰是一個特別重要的階段，正是在此時期，中共初步完成其歷史與現實中的自我定位和確認。踏踏實實，不務虛名，堅持持久戰方針，不斷堅強自己的隊伍，強化根據地，造就了一種韌性的生存。

韌性的生存不是那麼耀眼，卻是理解那個時代、理解中共敵後戰場的鑰匙。以游擊戰、根據地為主要戰爭形式的敵後戰場，最重要的關鍵詞就是生存，無論山地還是平原，中共都堅持持久戰的目標，以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為基礎，通過黨政軍民的總體戰，利用日軍兵力不足及異民族作戰的弱點，打破其完全佔領的夢想，使之始終處於敵後根據地的抵抗和威脅之下，而中共則在戰略和政略結合指導下的持久堅持中，不斷壯大發展。

生存的要求看似不那麼積極，實際則是當時中共乃至整個中國抵禦侵略的現實道路。中共抗戰中的成長是一個系統工程，持久是系統工程，抵抗也是系統工程，生存更是系統工程。游擊戰是為了生存，根據地也是為了生存；大而言之，整個的抵抗就是為了生存。中共要用我之生存，壓縮對手之生存，生存需要通過抵抗獲得，生存本身就在抵抗，生存和抵抗聯為一體，此即所謂生存中的抵抗、抵抗中的生存。應該強調的是，中共的生存是在全國抗戰的背景下實現的，某種程度上，還是

在世界反侵略戰爭的大背景下展開的，因此，這樣的生存本身是正面和敵後聯合抵抗的一部分。中共的敵後生存以陝甘寧邊區為後方，陝甘寧又以全國的大後方為後方，正面戰場的堅持抵抗和牽制，是敵後生存得以成立的重要條件，敵後的生存又有力支持了正面的持久。

敵後的生存是達成持久的重要一環，要堅持敵後生存，強固自身必不可少。中共承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組織和信仰，造就了一個黨性鮮明、執行力和組織力強大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一門強調實踐的理論，精準的社會肌理解剖使之在政治社會運動中如魚得水。儘管中共初期的理論水準不高，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還是通過各種方式深入黨心，由此逐漸形成中共的政治文化。¹

中共政治文化生發的力量很難以量化方式展現，卻在中共崛起與發展進程中不可忽略。中共幹部普遍具有實踐、聯繫、辯證的觀點，不僅使之掌握瞭解世界的認識論，也獲得處理紛繁複雜問題的行動利器。1942年6月，太行一分區負責人秦基偉等向上級遞交如何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的經驗報告，總結多條經驗，包括靈活的鬥爭方式、適度的武裝鬥爭火候、善於迷惑敵人、組織合法與非法鬥爭之配合、軍政結合等，²這

-
- 1 政治文化最初是西方學者在比較政治學視野下提出的概念，旨在從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現代化的不同命運中，探討是什麼推進和阻礙著現代制度的推進及其有效性。基於此，最初這個概念特別重視歷史及心理兩個維度。隨著這一概念被廣泛使用，概念內涵已有變化，有學者說：「一般認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認識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政治價值性成份和政治理想性成份，由它們聚成一個整體。」（王滙寧：〈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目前，國內學界較多將政治文化理解為：「受國家歷史傳統和現實社會政治生活影響形成的，對人們的政治行為產生持久影響的包括政治態度、政治情感、政治認知政治動機等因素在內的政治心理和政治價值觀、政治思想的總稱。」（倪明勝、喬貴平：《新政治學之維》，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9頁）
 - 2 〈一年來對敵鬥爭的三個具體經驗的初步整理〉，《郭峰工作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頁。該文由郭峰執筆，署名秦基偉、高揚、胡震、郭峰。

其中既包括具體的接敵技術，又有各種技術的相互配合，還有對敵鬥爭的策略分析。這種將一時一事放在更廣大的背景及知識系統中予以解剖的思路，在中共黨內可謂常態，將之與同時期國軍將領的經驗總結對照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黃埔一期生、國軍名將夏楚中於1941年發表文章總結了六點抗戰經驗，即「加強近接戰鬥的訓練」、「注重射擊運用」、「演習據點攻擊」、「確立據點戰術信心」、「側重重點教育」、「加強精神教育」。³與秦基偉相比，夏楚中基本只是講了接敵技術，而沒有像秦基偉那樣把問題拉到鬥爭方式、鬥爭火候、敵我形勢、軍政結合的高度。儘管兩個文本面對的問題不盡相同，但國共兩軍將領思考方式的差異，確有顯現。正因此，抗戰時期，中共展開新兵教育時強調：「新戰士中，有一部由於參加過友軍或受保衛團等集體訓練的，使他們受過呆板的教育，他們要改變成為靈活運用和在我們規定的動作上統一起來。」⁴內部總結中出現的國共兩軍呆板和靈活判斷，既體現中共對靈活性的特別在意，也是當時真實狀態的顯現。

中共政治文化的形成，當然非一朝一夕所致，需綿綿用力，久久為功。中共是一個高度強調信仰、理念的政黨。世界上大概很少有哪個政黨像共產黨這樣重視理論，學習理論。中共黨人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大量理論學習的記載，而這在同時期國民黨人留下的日記中幾乎難覓蹤影。同樣是中高層幹部，國民黨人陳克文抗戰時期的日記觸目可見喝酒、宴請、牢騷以及周圍人各種各樣的花邊新聞，共產黨人王恩茂、陳伯鈞等的日記則不斷出現學習、讀書、討論、培訓的記載。這樣的比較絕不僅僅是個案，幾乎是兩黨幹部各自呈現的共性。中共黨人受到的持久的灌輸、不斷的檢查、考核、批評與自我批評乃至思想鬥爭，儘管不可能使之完全脫離普遍的人性，但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仍在一點一

3 夏楚中：〈部隊訓練之血的教訓——我的作戰經驗〉，重慶《黃埔》第6卷第5-6期，1941年4月13日。

4 〈1938年第120師抗戰一年來軍事報告〉，楊弘、盧雲山編：《周士第將軍陣中日記》，石家莊機械化步兵學院2005年版，第348頁。

滴、潛移默化地塑造著一個不一樣的黨和軍隊。新聞人趙超構抗戰後期去延安後發現，中共生產了一套自己的價值觀，與外界幾乎處於兩個邏輯系統中：

凡是依我們標準認為缺點的地方，在他們自己看來都是優點。我們認為這種教育限制了個性，他們倒覺得唯有如此，才能為群眾服務。我們認為它太功利化，他們卻以為這是「學用一致」。我們認為理論水準太低，他們的答覆則是「實事求是」。

……

這種標準化的精神生活，依我們想像，是乏味的。但在另一方面，也給予他們的工作人員以精神上之安定，而發生了意志集中行動統一的力量。⁵

姑且不論趙超構談到的這些問題的是是非非，價值觀重新塑造凝聚的向心力卻是不言而喻的，這樣的黨和軍隊不一定像曾經宣傳的那樣全知全能，卻足以擁有超乎其他政治力量的威力。1939年，聶榮臻談到八路軍為什麼能在敵後堅持游擊戰時，不無自豪地說道：「所謂由整化零等游擊戰術實並不易（由零可化為無），如甚易，則八路已不值錢了。敵人把我游擊戰術作研究而謀殲滅我之對策，但是機械的。游擊戰術實不易把握。」⁶這是深得中共武裝精髓的經驗之談。

1945年7月，由美國戰爭信息局撰寫的長篇報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始部分就明確指出：「幾乎所有不帶偏見的觀察者都一致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組織系統與最強的紀律性、最有建設性的隊伍。」⁷這樣的話，雖然出自美國人之口，卻不失為當年

5 趙超構：《延安一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75頁。

6 聶榮臻：〈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39年1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1冊·文獻選編（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頁。

7 Lyman P. Van Sly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8.

中共陣營的真實寫照。要達到報告中所說的政治品質，紀律固然重要，保證紀律得以落實與貫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同樣重要，這樣一個如報告中所說的運作系統，缺了任何一環，效力都可能大打折扣。後世的人們常常會在意自己的自由意志能不能得到伸張，卻先定地認為歷史中的人是只求溫飽的動物，從而忽略當年美國人已經看到的事實。作為觀察者，美國人沒有因為意識形態不同而刻意扭曲他們的觀感，因為他們深知，只有切實瞭解這支政治力量，才有可能拿出有效的應對辦法。這是現實主義的態度。不管出於什麼目的，這種面對事實的態度都值得肯定，低估對方是人類普遍而又愚蠢的行為。

三

美國人的報告顯示，當年他們已經注意到中共政治、組織運作的系統性。系統性的確是中共思想和行為十分重要的特徵。

系統一詞意為「由部分組成的整體」。一般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朗菲認為：「一般系統論是關於『整體』的一般科學，在此之前整體被人們看作是一個不明確的、模糊的和半形而上學的概念。」⁸ 系統源於人們整體認知世界的要求，是個古老的概念，二十世紀前後，被越來越普遍地使用，現代系統理論一般被認為「萌發於20世紀初，形成於20世紀30-40年代，發展於20世紀50-60年代」。⁹ 通常說的系統，是指由一些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若干組成部分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一個系統至少要有兩個或更多的要素或子系統組成。系統的整體不是各組成要素功能的簡單疊加或拼湊，而是有機地組成一個整體，

8 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

9 轉見吳今培、李學偉：《系統科學發展概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頁。

組成要素及其聯繫必須服從系統的整體目標，要以整體最優為原則。系統具有強烈的目的性，系統整體的功能通常超出各個部分的疊加，所謂「整體大於部分之和」。中共革命中常常可以看到的溢出效應，就來源於系統的這一特徵。

系統追求整體的把握和瞭解，但系統並不是封閉自足的概念，貝塔朗菲強調開放系統：「每一個生命有機體本質上是一個開放系統。它在連續不斷的流入與流出之中，在其組分的不斷的構成與破壞之中維持自己，只要它是有生命的，它就永遠不會處於化學的和熱力學的平衡狀態，而是維持在與平衡狀態不同的所謂穩態上。這是通常所說的新陳代謝這個基本生命現象的真正本質。」¹⁰ 德內拉·梅多斯則認為，系統運作呈現三個重要的特徵：適應力、自組織和層次性。所謂適應力，是指系統內部存在很多相互影響的反饋回路，這些反饋回路傳達信息，做出反饋，使系統迅速調整，保持穩態結構。所謂層次性，是指任何一個大的系統都包含很多子系統，系統和子系統間形成包含和生成關係。一個良好運轉的系統，層次結構可以平衡整體系統和子系統的福利、自由和責任。所謂自組織，是指系統不是靜態的，系統具有學習、運動、多元化、複雜化和進化的能力，在沒有特定外部作用參與時，系統通過信息反饋，可以不斷調整自己的目標和功能，甚至演變出新的結構，發展出全新的行為模式。¹¹ 由此可以看出，現代意義上的系統，既具有很強的規定性，構成行為和思維模式；又具備足夠的彈性，在辯證地生成、進化。所以貝塔朗菲明確表示：「雖然起源不同，但一般系統論的原理和辯證唯物主義相類似則是顯而易見的。」¹² 也就是說，在貝塔朗菲看來，一般系統論具有強烈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特性。

10 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第36頁。

11 參見德內拉·梅多斯著，丘昭良譯：《系統之美——決策者的系統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118頁。

12 龐元正、李建華編：《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經典文獻選編》，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頁。

中國傳統思維也有明顯的系統特徵。李澤厚指出：「正如古代有辯證法的觀念一樣。它們都來自素樸的生活經驗。在中國特定條件下，系統論觀念如同辯證法觀念一樣，它們發展得特別充分。」¹³ 不過，李澤厚同時強調，這種系統論由於早熟，也有很多缺陷：「在這種系統論裏，似乎把所有經驗都安排妥貼了，似乎一切問題都可以在這系統中求得解決，從而不要求思維離開當下經驗去作超越的反思或思辨的抽象以更深地探求事物的本質。……同時，也是由於注重系統整體，便自覺不自覺地相對輕視、忽略對眾多事物和經驗作各別的單獨的深入觀察和考查，具體事物的分析、剖解、實驗被忽視了。」¹⁴ 相對於傳統未經分疏、混沌、包羅萬象的系統認知，經過現代科學洗禮的系統既是整體的，又是有限的、競爭的、¹⁵ 開放的，如貝塔朗菲所說：「現代科學的思想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沒有一個唯一的包羅萬象的『世界系統』。一切科學構思都只反映了實在的某些方面或某些透視圖。……各種各樣的『系統理論』同樣也是反映了不同側面的模型。它們不是互斥的，常常可以組合起來應用。」¹⁶

本書也是在上述規定性和彈性兼備的意義上使用「系統」這一概念，並從規訓系統、貫徹系統、抵抗系統三方面，觀察中共革命系統的具體運作，這三者自成系統，其實又相互影響。規訓系統培養幹部，有助於

1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頁。

14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172頁。

15 關於系統內部的競爭關係，貝塔朗菲認為：「對於一個整體來說，引入組成部分之間競爭的概念，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事實上這兩個明顯矛盾的陳述都是系統的本質。任何整體都是以它的要素之間的競爭為基礎的，而且以『部分之間的鬥爭』（羅克斯Roux）為先決條件。部分之間的競爭，是簡單的物理—化學系統以及生命有機體和社會體中的一般組織原理，歸根到底，是實在所呈現的對立物的一致這個命題的一種表達方式。」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第61頁。

16 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第87—88頁。

貫徹系統的運行，幹部系統和貫徹系統的有效推進，是抵抗系統得以成立的基礎，而抵抗系統的運作，又要求幹部系統和貫徹系統的提升。共產主義革命的整體性特徵，加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很容易把中國革命引向全方位的、系統的革命，系統的革命又造就著強大的革命系統，兩者迴環運動，相互促進。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強調中共革命具有系統性運作的特徵，做的只是實然判斷，也就是說，這是作者觀察到的一種特徵，至於一個政治力量乃至一個社會是不是應該如此，那是應然判斷。的確，系統的高度條理化、模式化，很容易放大對錯，形成不可逆的慣性，有其值得警惕的一面，不過，如果把系統視為一個動態運作的彈性概念，那麼對系統過分條理化、規範化、固化的擔心，或許可以減少很多。進一步看，中共的革命系統有很多面相，橫看成嶺側成峰，從結構言，意識形態(辯證法)和組織可以說是中共革命系統的核心要素，兩者分別構成中共系統思維和系統運作的基礎，組織將無聯繫的人和事建立特定聯繫，其實就是系統運作的過程；從功能言，中共的革命系統又可以分成權力系統、貫徹系統、動員系統、培養系統等等，這些系統間又是相互影響、相互聯繫的，並沒有截然分野。事實上，中共革命既在系統之中運作，又在不斷造就、生成系統。系統運作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抗戰時期，對中共革命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毛澤東，在系統思維和系統運作問題上多有闡發。¹⁷ 早在1926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使用過「系統」一詞：「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

17 關於毛澤東的系統思維，1980年代，系統論興盛時，國內學界已有注意，較早的論文包括：陳軍〈略論毛澤東同志的系統觀〉，《學術論壇》1983年第5期；范幼元〈毛澤東的系統觀〉，《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1985年第7期等。近年還有羅緒春等的〈毛澤東系統論思想初探〉(一)、(二)，《系統科學學報》2015年第2期、2016年第2期。

至土地的陰間系統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¹⁸ 這裏，毛澤東是在同類事物組成的整體這一最基礎的意義上使用「系統」這一概念。

1938年，毛澤東寫作〈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已經開始在方法論意義上使用「系統」：「我們要系統來講辯證法，就要講講唯物辯證法的許多問題。」毛澤東進一步強調：「實際上具有唯物的與辯證的頭腦之革命者，他們雖從實際中學得了許多辯證法，但是沒有系統化，沒有同已經成就的唯物辯證法那樣的完備性與深刻性，因此必不能洞察運動的遠大前途，不能分析複雜的發展過程，不能抓重要的政治關節，不能處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因此仍有學習辯證法的必要。」¹⁹ 在毛澤東看來，是不是系統化地理解辯證法，掌握馬克思主義系統思考的方法論，關涉革命者能否洞察政治發展趨勢、掌握革命運動的方向。正因此，毛澤東說：「如果中國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那將是等於打倒一百個日本帝國主義。」²⁰

不過，對當時中共的現實狀況，毛澤東判斷並不樂觀，他認為，中共的「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績，經驗之豐富，新創設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蘇聯就要算我們了，其中若干特殊的經驗連蘇聯也沒有，但缺點也在於綜合性與系統性之不足」。²¹ 或許正是要解決系統性不足的問題，延平整風期間，毛澤東非常重視系統性的訓練，指出：

18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續)，湖南戰士編輯社：《戰士》第39期，1927年4月3日。

19 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6卷，第299-302頁。鑒於考察概念流變時文本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本書在這一部分使用蒼蒼社出版的《毛澤東集》，其他地方均使用《毛澤東選集》。

20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6卷，第260頁。

21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黨的政策選集》，晉察冀日報社1946年版，第60頁。

「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於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著重研究的系統的周密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²² 他將不系統做調查研究的做法稱為主觀主義：「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著嗎？」²³ 基於此，「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²⁴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於主觀主義的批評，對於缺乏調查研究的批評，都受到了當時乃至後世的充分重視，但他在調查研究前面加的「系統的」定語卻往往被忽略，事實上，這一整風期間反復出現的定語，在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中並非可有可無。

在〈反對黨八股〉中，毛澤東進一步倡導要改變文風。文字關係信息傳輸，改變文風，實際就是要改變系統中的信息反饋狀態，提高信息反饋的有效性。所以他說：

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幟，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繫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或一個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遊戲，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與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著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裏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

22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7卷，第311-312頁。

23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7卷，第314頁。

24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7卷，第319頁。

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繫，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²⁵

這裏反復出現「系統」兩字，當非偶然，顯示毛澤東以系統思維取代片面、直線式思維的雄心。從毛澤東的要求可以看得出來，他講的系統，是辯證的、開放的、分疏的、競爭的，和現代一般系統論講的系統具有相通性。事實上，如〈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所顯示的，毛澤東的系統觀，直接源於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這是他提出系統方法的起點；同時，中國傳統樸素的系統論，相信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起碼讓他對系統論的思維方法不會陌生。抗戰時期毛澤東關於系統思維、系統方法的闡述和呼籲，奠定了中共系統認知的基礎，促進著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提升。抗戰行將結束時，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做口頭報告，談笑風生中，再一次將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和系統放在一起予以概括：「革命要求我們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說明它的內部聯繫，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繫，並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什麼是理論？就是有系統的知識。馬列主義的理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有系統的知識。」²⁶在毛澤東這裏，系統成為有效聯結革命實踐和革命理論的鏈條。

捕捉這樣的鏈條，可能是當年的歷史創造者和事後的歷史研究者的共謀。

25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8卷，第100頁。

26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頁。

四

蘇聯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寫過一本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描寫一個鋼鐵般的共產黨人是如何成長起來的。

本書面對的是一個鋼鐵般的政治力量的成長史。抗戰時期，一股巨大的洪流，像鐵水般，流出西北，流向華北，進而流向全中國。²⁷

鐵水流，是的，鐵水流！

27 本書主要面對的是抗戰時期八路軍佔領區域的中共，考察對象包括華北和西北地區的敵後根據地。需要說明的是，如拙作《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不是一個區域史研究一樣，本書也不是。選擇八路軍區域純粹出於考察的完整和方便，並無其他。

I

戰時中共的規訓系統

斯大林有句名言：「人才、幹部是世界上所有的寶貴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幹部決定一切」。¹ 這句話出自強調能動性的革命政黨領袖，鑄有深刻的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烙印，又嵌入此後共產主義革命的實踐。斯大林這一論斷，抗戰時期即為毛澤東引用並深切體會，仔細觀察中共的歷史，可以發現「幹部決定一切」不是一句空談，而是落到共產黨革命歷史的實處。

幹部決定一切，字面上說的是幹部的重要性，其實更在說培養幹部的重要性，這是一個塑造革命者的過程。中共為此投入了極大的精力，打造了一個環環相扣的訓練系統。革命者，尤其是一批面向基層的中低層幹部的塑造，事實上構成為革命成敗的決定性因素。正因為有一批瞭解中共宗旨、願意為黨奉獻的幹部的存在，中共的革命系統運轉才那麼游刃有餘。中共是個剛性、高效的政黨，革命巨輪滾滾行進時，摧枯拉朽，一往無前。革命運動中那些具體的人——幹部，就是革命巨輪前的清道夫，或者糾錯機制中的緩壓閥和承重器。中共體制的特殊之處在於培養了一批能夠、也願意為黨付出的幹部，這些幹部所擁有的特殊的素質，在中共話語中被稱為黨性。關於黨性，劉少奇的表述，基本代表中共黨人的認知：

每個黨員的思想和行動中，都要使自己的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完全一致。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能夠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為了黨的、無產階

1 〈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上的講話〉（1935年5月4日），《斯大林文選》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頁。

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事業，能夠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的一種表現。²

講黨性，簡單說，就是理性上要衷心信服黨，情感上也要完全皈依黨，身心系統都要交給黨。這是中共對自己黨員的基本要求，對局外人來說則是極高的標準。把一個個有著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塑造成具有黨性的黨員，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不斷地教育、灌輸、改造、清洗，需要形成制度保障和文化氛圍，需要情感的喚醒、動員和激發，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系統工程。當年中共為達致這樣的目標做了極大的努力，所獲得的結果，就是一批常被敵對方驚呼「可怕」的幹部群體的出現。

2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131頁。羅瑞卿列舉「黨性」的十條標準：「①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黨員個人的利益服從黨的利益。②共產黨員要做到對黨沒有絲毫隱瞞。③共產黨員要善於把黨的政策徹底實現。④共產黨員要善於團結群眾，不要孤高、宗派主義而脫離群眾。⑤共產黨員要從政治原則上團結人而不是感情用事和私人拉攏。⑥共產黨員要能顧全大局，不是本位主義。⑦共產黨員要絕對信任黨，相信黨的力量。⑧共產黨員要力求進步，不驕傲自大，不輕視群眾。⑨共產黨員要有高度的自我批評的精神。⑩共產黨員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一點一滴的工作作風，理論與實際聯繫，思想與行動統一。」（羅瑞卿：〈在連隊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41年8月26日），《羅瑞卿軍事文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311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恩格斯最早提到黨性這一概念，列寧則做了具體闡發，中共基本是在列寧的框架之內使用黨性。

一、幹部養成的路徑

1949年前的中共幹部，形成幾個比較明顯的代際群體，即通常說的長征幹部、三八幹部、南下幹部，分別對應中共革命歷史的幾個重要階段。其中三八幹部群體出現於抗日統一戰線時期，知識水準最高。這一代中共幹部，面對相同的時代背景，擁有相似的出身和思想進路，受進化論熏陶，相信美好，相信未來，相信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韋君宜的回憶大致說出了那一代革命者的心聲：

我在學校本來是很不錯的學生，在中學屢次得獎，入大學讀哲學，也覺得金岳霖的邏輯、馮友蘭的哲學史什麼的很有味道，實在。而休謨的人性論，使人深思，得一種思辨的快樂。但在決心入黨之後，我把讀書所得的一切都放棄了。我情願做一個學識膚淺的戰鬥者，堅信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說的一切，因為那是我所宣佈崇拜的主義。我並沒有放棄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認為，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裏面了，包括自由與民主。我由此成了共產主義真理的信徒。

這些「單純到透明」¹的青年人，是後來歷經思想風暴的人們無法比擬和理解的。需要信仰的中共，能夠擁有這樣一批願意相信的年輕人，不能不說是莫大的幸運。

儘管信仰是凝聚革命者的有效思想資源，但信仰畢竟不是一天兩天可以練成，革命的群體仍然由一個個個體構成，而且，由於知識分子²比例較高，他們又是相對具有獨立思考意識的一群。面對這樣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群體，中共如何一步步把他們導入黨的軌道？革命理念如何進入內心世界，並外化為具體行動？如何在建構向心力、營造鐵的紀律同時保持內部的生機和活力？在思想教化、組織規訓、信仰歸一的養成過程中，幹部的主體意識是否存在，如何可能，和黨的意志有怎樣的互動？這些普通人的思想意識和經歷，在通常的檔案文獻中並不容易見到，所幸，當年一批親歷者的日記可以讓我們體觸到鮮活心靈的搏動，而整風中大量的思想彙報由於「靈魂深處革命」的要求，也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第一手資料。儘管這些記憶有著強烈的個人色彩，內中也不乏特殊政治環境下的刻意造作，仍然不妨礙由此探蹟索隱，窺察中共幹部大規模養成的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個體、群體及政黨機器的多方互動。

-
- 1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頁。值得注意的是，韋君宜這段話說到她把自由民主融入共產主義信仰，應該不是個案，而是中國許多共產主義者的共同經歷，中國的共產主義傳統中，其實還存在自由主義的基因，這一點值得重視，也是理解改革開放思想資源的一個重要線索。
 - 2 知識分子是個不斷變化中的概念，不同學科有不同的定義方式。本書主要從社會功能角度著眼，以其承擔的社會角色作為定義知識分子的標準。從這樣的標準看，1930、1940年代，高小以上文化水準者，事實上就在鄉村被視為文化人，承擔著傳播社會文化的功能。張聞天主持的「延安農村調查團」在興縣所做調查，即把高小以上水準者歸入知識分子。（岳謙厚、張璋輯注：《「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64頁）這樣的社會角色又促使他們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文化修養，社會角色和個人素質及定位之間，本來就是動態循環的過程。

抗戰時期大批幹部的養成，既是中共大發展的結果，又是中共實現大發展的基礎。由於民族戰爭的環境，抗戰時期中共幹部的養成，既包含了一貫堅持的階級立場，又有相當的特殊性。大量使用、提拔工農幹部，當然還是中共的基本立場，在戰爭中繼續造就軍隊幹部，更是戰時的題中應有之義。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幹部得到大規模擴展，「三八幹部」群體這一特色，對中共幹部隊伍氣質的變化及整體提升發揮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本書接下來講述的，就是以「三八幹部」為主體的整個中共幹部體系的養成過程。

1. 「三八幹部」：為有源頭活水來

以學生身份來到延安，進入革命陣營，可謂抗戰時期中共新幹部即所謂「三八幹部」的典型來源，這是中共獲得的一股新鮮血液。此時，在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共階級關係判斷做出調整，知識分子被納入民族革命陣營，緩解了蘇維埃時期幹部選拔中習見的無米之炊的尷尬。毛澤東說：「我們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幹部，他們是有革命理論的，他們是富於犧牲精神的，他們是革命的先鋒隊。只有依靠成千成萬的好幹部，革命的方針與辦法才能執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戰爭才能出現於中國，才能最後戰勝敵人。」³「民族革命」幹部的定義大大擴充了幹部來源，使一直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強調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中共有了更多解釋和操作上的彈性，對於堅持理論和話語神聖的共產黨人而言，這樣的空間並不總能輕易獲得。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共自建黨以後即仿效蘇聯，構建一套自身行為的意識形態解釋體系，這樣的解釋體系極大有助於政黨的自我認同和身份塑造，是共產黨人的重要特質之一。正因此，中共的革命實踐常

3 毛澤東：〈目前的時局和方針〉（1937年11月1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64頁。

常呈現理論先行的特徵，民族革命的路線轉變也不例外。1935年後，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從蘇維埃革命的立場逐漸轉型，向民族統一戰線的方向發展。統一戰線的解釋邏輯是：民族危機的刺激，導致國內階級關係變化，民族資產階級乃至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了投身抗戰的可能，從最廣泛團結各種抗戰力量出發，可以也應該與他們結成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階級基礎，劉少奇說得很明白：「統一戰線教育，只是階級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對勞動階級的教育，應是全盤的階級教育，只強調統一戰線是不對的。」⁴ 統一戰線新形勢下階級及社會關係判斷的調整，也導致對知識分子認知的調整，儘管在當時，這一調整不是那麼引人注目，卻對中共革命的未來影響深遠。

1927年蘇維埃革命開始後，國民革命時期的階級聯合局面終止，知識分子作為小資產階級陣營被視為革命的動搖分子，清洗知識分子的言行不斷。1930年代初、中期，蘇聯對知識分子的判斷逐漸變化，波及中共微調內部政策，知識分子處境有所緩和。1936年，蘇聯通過新憲法，提出蘇聯社會已經不存在彼此對抗的階級，社會由工人和農民這兩個互相友愛的階級組成，知識分子不再由於階級屬性成為異類。1939年召開的蘇共十八大總結報告提出：「在社會主義已經勝利的條件下，知識分子已經成為真正人民的知識分子，他們同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有緊密的聯繫，他們是蘇維埃社會中、蘇維埃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中的巨大力量」；要求：「徹底消除當時還存在的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的心理，消除革命前流行的對知識分子的看法的殘餘。」⁵

蘇聯對知識分子態度的變化清楚體現於蘇共兩個黨章之中，蘇共十七大制定的黨章規定：「黨領導無產階級、勞動農民和全體勞動群眾為

4 〈劉少奇同志關於群眾運動及其他問題的報告〉（1942年12月9日-10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8卷，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史編寫辦公室1994年版，第189頁。

5 波諾馬廖夫主編（譯者不詳）：《蘇聯共產黨歷史》，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545頁。

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⁶ 十八大通過的黨章相關表述修改為：「黨領導全體蘇聯人民——工人階級、農民、知識分子，為鞏固工人階級專政、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爭取共產主義勝利而鬥爭。」⁷ 兩相比較，十八大特別將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並列，這是蘇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邏輯結果。由於當時中共幾乎全盤接受蘇共的理論指導，蘇共的態度轉變，和建立民族統一戰線要求結合，引領著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

從1936年開始，中共中央北方局著意在平津和北方地區開展青年學生工作，吸引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左傾化。此時，急迫的民族危機強烈刺激青年知識分子的民族情懷，中共以民族救亡相號召，異議者的身份和抵抗者的姿態極易引起不滿現實的青年人的共鳴，奠定在青年中發生影響的基礎。抗戰爆發後，學生的民族主義情緒、北方的地緣關係及中共此前在都市打下的基礎相結合，使一批知識分子選擇前往中共控制區域。以延安論，當時很多青年知識分子湧向延安，中共也加意吸納。抗日軍政大學第1期學員基本是紅軍幹部，從第2期開始，吸收知識青年學員609人。1938年4月開學的第4期，5,562個學員中，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青年學員共4,655人，佔學員總數的83%，遠超部隊和地下黨幹部的907人。第5、6期學員則以根據地內的知識分子或出身「小知識分子」的基層幹部為主。抗大成為消化青年知識分子的熔爐。

同樣吸納、培養大批知識分子的還有陝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等。如果說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起初的培養對象主要是軍政幹部，陝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一開始就定位為知識分子人才的培養。陝北公學創辦於抗戰初期，面向全國招生，一般要求新生「有中等文化水平」。⁸ 校長成仿吾回憶：「七七事變後最初幾個月，由於國共合作，國民黨在一定程度

6 〈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章〉(1934年1月)，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室編：《蘇聯共產黨章程彙編》，求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頁。

7 〈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章〉(1939年2月)，《蘇聯共產黨章程彙編》，第82頁。

8 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頁。

上開放黨禁，實行一些民主，國統區青年到延安來比過去順利些，幾乎每天都有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湧到陝北公學來，幾天就可以編起一個隊。」⁹成仿吾所說國統區青年湧向延安，除國共合作的大環境提供了可能外，與延安學制靈活也有關係，隨時招生、招滿編隊，滿足了一批流亡大後方、求學無門的失學青年要求，這使中共在國共的人才競爭中佔得先機。相比國民政府堅持戰時教育的正規化，中共教育強調速成，尤其是政治思想上的速成，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我們不在乎像其他學校那樣照著書本一章一章地來上課，而在乎學習一種作風，一種方向。……你們在陝公裏可以學習到一個方向——政治方向，同時又可以學習到一種作風——工作作風。」¹⁰

中共這一階段吸收知識分子的成績，毛澤東1939年有一個總結：

幹部教育兩年來，在中央直接指導下建立了抗大、陝公、黨校、馬列學院、魯藝、青訓班、女大、工人學校、衛生學校、通訊學校、組織部訓練班、行政人員訓練班、邊區黨校、魯迅師範、邊區中學、魯迅小學、兒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學校，學生多的萬餘人，少的幾百人幾十人，幾千個幹部從事教育工作，教育出來的及尚未出來的學生三萬以上。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十八年來未有過的現象。這些學生現在還不能看出他們大的工作成績，但數年以後就可以看見了。¹¹

數年後中共越來越堅強的幹部體系的出現，印證了毛澤東的這一說法。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不是搭上中共在大城市招收青年學生的便車，當年一般人投奔延安並不容易，需要相當的先期投入。戰爭初期投奔延安的何方回憶：

9 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第42頁。

10 毛澤東：〈對陝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臨別贈言〉（1939年3月3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08頁。

11 毛澤東：〈反投降提綱〉（1939年6月），《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23頁。

那個時候參加革命是要花錢的，一路上吃的、用的、住的，一切都是自己拿錢。路費和行李要自理。到延安以後，只管吃飯，不管穿、不發被子，第二年起才逐漸地發內外衣服和酌情補發被褥。因此走的時候一切行李都得帶上。……後來和曾彥修聊起來此事，他說，你這算便宜得多了，我和田家英參加革命得六十塊錢，我們好不容易才湊夠。所以那個時候去延安參加革命的窮人不多。一是大多不知道延安是怎麼回事；二是即使聽說過，一時也不容易籌到路費和準備好行李。從國民黨地區去延安，太窮的人還真參加不起這個革命呢！

第一次去延安，何方中途被國民黨方面攔截，逃出來後找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辦事處的同志說，他們不管路費，要去，你們自己回去籌備路費，為了保險，這次可以搭乘辦事處的卡車，車費是十四塊大洋」。¹² 何方回老家千方百計籌上路費，再到西安，坐上八路軍的軍車，終於抵達延安。看來，革命的大門也不是想進就進得去的。

受地下黨影響，從湖南投奔延安的劉贊平回憶，他們到西安後，立即和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聯繫，但辦事處的人說：「現在去延安的人太多，吃住都有困難，勸我們改去閻錫山辦的『民族革命大學』」，¹³ 後來是帶隊的老師見到老戰友，經老戰友推薦，才被八路軍一一五師軍政幹部學校接收。這部分知識青年之所以歷盡曲折，花費不菲，也要投奔延安，關鍵在於懷有對中共代表的新秩序的嚮往，可以說是自覺抉擇的結果。

當然，不是所有人目的都這麼明確。謝雪萍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的夫人，她回憶去延安上學的經過：戰爭爆發後，她在鄒韜奮辦的一本雜誌《激流》上看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招生廣告，當時沒太在意。

12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何方自述》，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7頁。

13 劉贊平：《九十自述——劉贊平回憶錄》，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頁。

1938年日軍轟炸廣州，謝雪萍所在的廣東紡織廠被炸停工。無奈之下，謝雪萍想到了這個廣告：

我沒地方去，到哪去生活呢？就想起《激流》上面的這個廣告了。

一看，他是到哪報名呢？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這時候國共已經合作了。

我說這個地方挺好的，去看看，就拿著這本雜誌去一問呢，你只要有路費，自己到那以後，又管吃又管住，又管學習。哎喲，我一聽高興死了。去延安就是這麼回事，奔生活嘛，這是1938年的事。¹⁴

抗戰時期，中共敞開懷抱歡迎青年知識分子。抗日戰爭民族戰爭的性質和統一戰線的構建，為中共政策制訂釋放更多彈性空間，毛澤東予知識分子以空前正面的論述：「數十年來，中國已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知識分子群和青年學生群。……他們或多或少地有了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富於政治感覺，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¹⁵「先鋒和橋樑」成為這一時期關於知識分子定位的經典論述。中共甚至提出：「發展黨員要特別注意吸收工人、僱農，……對於願意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教員、職員、學生，也應盡量吸收。這些人雖然也有他們一般的缺點，但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來說，他們常常不比農民壞。」¹⁶具體操作中，讀過書更成為發展黨員的先決條件之一，負責組織工作的陳雲談道：「(1)我們在群眾中首先發展之黨員，應該是

14 《從延安出發——開國少將張學思夫人謝雪萍口述歷史》，北方聯合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4頁。

15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頁。

16 〈劉少奇給朱瑞並冀豫晉省委的指示信〉（1938年8月18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343頁。

品行端正、平常有信仰者。(2)一般是讀過幾年書的。」¹⁷這樣的認知造就了知識分子投入中共陣營的熱潮：「絕大多數(幾乎百分之百)的幹部是因為民族矛盾隨著根據地的建設而參加抗戰的。大體上有兩個時期湧現最多，一是一九三七到三九年，二是一九四三到四四年」。¹⁸具體看，1938年前後這批幹部多是在民族戰爭激發下投身中共陣營，1944年前後則更多因為根據地的發展而捲入中共隊伍，兩者均為抗戰環境下成長，均有著較高的知識文化水準，1938年這批幹部尤具代表性，所謂「三八幹部」的稱謂，即源於此。

知識分子本屬社會中堅，抗戰時期中共的重用更使之脫穎而出，成為新政權的棟樑。當時各地調查材料均顯示，知識分子在中高級機關中佔據絕對優勢。河南1940年的報告提到：「就其階級成分講，省委一級全部系知識分子，地委一級只一個是工人，其他亦皆為知識分子，區分委一級農民10%到20%。……在知識分子中，中學以上程度的，就一定是中農以上的家庭，否則就沒可能。」¹⁹漳北「全區行政幹部(區以上)在文化程度上，中學水準佔百分之四十八，粗通文字者佔百分之七點七，證明百分之九十二點三為知識分子。」²⁰1941年12月晉西區黨委的統計，縣長具備大學學歷者22.7%、中學學歷者63.7%、小學學歷者13.6%；縣級秘書科長(含科員幹事)具有大學學歷者4.8%、中學學歷者40.6%、小學學歷者54.6%；區長具有中學學歷者24.1%、小學學歷者

17 陳雲：〈保德鄉村調查〉，《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頁。

18 〈幹部政策和幹部工作——山東省第二次行政會議總結的幹部部分〉，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3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0頁。

19 〈劉子久關於河南工作報告〉(1940年5月28日)，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劉子久紀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頁。

20 〈一九四二年政權建設工作總結〉(1943年1月8日)，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纂委員會編：《太行抗日根據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頁。

73.3%、文盲2.6%。²¹ 1944年山東省第二次行政會議專門報告了幹部問題，其中有幹部文化程度的統計材料：

甲、全省分區助理員以上幹部的統計：不識字0.97%，粗通文字1.8%；私塾15.85%；初小23.75%；高小31.13%；初中18.11%；高中4.67%；師範2.2%；專科大學1.52%。乙、縣科長以上幹部的統計（全省行政會議幹部）：初小8%；高小14.7%；初中42%；高中3.4%；師範25%；專科大學6.6%。²²

縣級以上幹部中，知識分子佔比更高，達到近80%，遠遠高於知識分子在人群中的比例，體現知識分子群體在中共中層以上幹部中無可撼動的地位。一直到抗戰行將結束時，冀魯豫報告仍寫道：「政權幹部幾乎完全是知識分子。在這些知識分子裏面，有外來的學生，農村出身的學生，當過教員的，在舊政權當過職員的，開明士紳等。這些幹部多數革命熱情很高，有為抗日民主而奮鬥的信念，他們仍是建立政權不可少的力量。」²³

即便是村幹部，文化程度也不像想像的那樣低。張聞天主持的「延安農村調查團」在山西興縣留下村幹部文化程度的資料。趙家川口村11個村幹部中，師範畢業1人，小學和高小畢業高小4人、初小3人，文盲3人。文盲中兩個是婦女，一個是招待員。²⁴ 有沒有文化決定著是否

21 中共晉西區黨委編：《政權建設材料彙集——政權組織機構》，1941年12月；轉見張璋、李俊寶：《閱讀革命——中共在晉西北鄉村社會的經歷》，山西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版，第250頁。

22 〈幹部政策和幹部工作——山東省第二次行政會議總結的幹部部分〉（1944年12月），《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3輯，第418—419頁。

23 徐達本：〈在冀魯豫行署專員聯席會上的總結報告〉（1945年7月9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編：《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頁。

24 《「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第449頁。

勝任負責工作，文化低者不可避免受到影響，調查報告評價一個幹部：「不識字，說話『困難』（指不流利），但工作一貫的積極、踏實，……是最良好的一個村幹部。但『莫文化』（指不識字）使他辦事困難。」²⁵

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幹部的高比例，頗具意味。按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主義革命應該由無產階級領導，這一判斷建立在大工業高度發展、無產階級具有高度知識文化水準基礎之上，但事實上革命的發生比經典理論大大提前，而且在東方這樣的農業大國展開，革命的基礎、路徑、領導階層不可避免要發生變化。在中國，革命更多在觀念層面首先展開，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的理念傳入，和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求新求變、變革圖強的願望結合，革命才逐漸由理念轉化為現實。革命由這部分知識文化的載體接受、推動、發展，知識群體順理成章成為革命的領導者。這就是王林²⁶所說的：「知識分子常常被他的某種幻想、嚮往、衝動、對現社會罪惡的不滿、和對理想世界的憧憬而走上革命。也可以說是自覺地走上光明鬥爭之路！所謂工農分子完全是由於現實生活的壓擠，由於追逐現實生活的物的滿足而走入革命。」²⁷

革命的無產階級性質和革命領導者的知識分子身份，不可避免生出一定的緊張關係，中共很長時期內一直緊繃的階級鬥爭之弦，多少和這樣的現實不無關係，王稼祥說得很明白：

在中國革命過去與現在的具體環境中，中國小資產階級分子尤其是知識分子在加入共產黨後，由原來的小資產的革命者轉變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的革命者，一般的是經過一定的過程，有些是經過曲折的犯錯誤與改正錯誤、動搖與克服動搖的過程；極少數是

25 《「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第369頁。

26 王林(1909-1984)，1931年加入中共，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7年到冀中參加抗戰。

27 王林：《抗戰日記》，1940年1月17日，《王林文集》第5卷，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頁。

被革命鬥爭所淘汰而變成離開革命的分子了；大多數是變成了或將會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者。這就要求一方面黨應對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進行耐心的長期的必要的教育，另一方面要求知識分子自己應當有必要的自覺，逐步改造自己。²⁸

出於這樣的判斷，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當然不會有絲毫放鬆。毛澤東說：「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國民黨和我們力爭青年，軍隊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識分子。要說服工農幹部，吃得下，不怕他們。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²⁹ 這段話有三個關鍵詞，一是提高，一是不怕，一是幫忙。提高是指中共要發展，要實現自己的治國理想，離不開知識分子；不怕是指中共有信心、有辦法吃得下這些知識分子；幫忙則定位了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位置。三個關鍵詞後面，埋下了改造以知識分子為主，當然也包括工農、軍人在內的幹部群體的線索。

2. 學習、訓練

在新幹部來源主要是知識分子，或者說非無產階級成分時，毛澤東之所以自信能夠「吃得下」、化得掉，首先當然是由於民族戰爭的任務，讓中共和這批知識分子有了目標交集。方志敏的回憶真切傳達了五四一代知識青年的民族情懷：

我想在高小畢業後，即去投考陸軍學校，以後一級一級的升上去，帶幾千兵或幾萬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島！我又想，在高

28 王稼祥：〈給毛澤東的信〉（1945年4月17日），《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總，第75頁。

29 毛澤東：〈反投降提綱〉（1939年6月），《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33頁。

小畢業後，就去從事實業，苦做苦積，那怕不會積到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私，一齊拿出來，練海陸軍，去打東洋。讀西洋史，一心想做拿破侖；讀中國史，一心又想做岳武穆。這些混雜不清的思想，現在講出來，是會惹人笑痛肚皮！但在當時我卻認為這些思想是了不起的真理，愈想愈覺得津津有味，有時竟想到幾夜失眠。

一個青年學生的愛國，真有如一個青年姑娘初戀時那樣的真純入迷。³⁰

其次，當時中共的組織、訓練能力及意識形態魅力，都讓中共有這樣的自信，或者說，抗戰時期的發展需求，也使得中共必須擁有這樣的自信。

學習、訓練是養成幹部的必要途徑，這樣的方法一般政治力量培養幹部時均會採用。比如，抗戰時期國民黨方面也注意幹部訓練：「頑固分子現在已經注意到鄉教問題，視察呀，集訓呀，強迫加入國民黨呀。」不過，國民黨方面的訓練常常只是走走形式，中共河南黨組織發現：

去年夏天，各縣都集訓小學教員。在新安的小教訓練班裏聘縣中教務主任高延柳為國際問題教員，聘職業校長鄒次九講教學法，他們兩個的材料都是我們給他找的。給高延柳一本七十四期的《解放》，是聯共十八次大會斯大林同志的報告；給鄒次九找了一些軍政雜誌和《中國青年》等；他兩個就這樣講了一個月，成績滿好，學生不但不頑固，反而進步。³¹

30 方志敏：〈可愛的中國〉，《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16頁。

31 〈邵文杰關於洛寧地委工作的綜合報告〉（1940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8-389頁。

戰時偽政權的訓練效果，和國民黨也差相彷彿：「偽青年訓練班畢業時，教練問自衛團是幹什麼的，一青年答曰：『打土匪打漢奸的』」。³²這樣的訓練，等於在給自己製造掘墓人。相比之下，中共以信念為核心，不斷教育、培訓幹部，提升幹部水準，融合幹部情感，重構評價機制、權力關係及思維系統。

重視訓練、學習源自中共這樣一個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政黨的內在需求，「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³³抗戰剛一開始，毛澤東就雄心勃勃地提出：「加強對幹部的教育、培養與提拔……使我們的幹部不但能治黨，而且能治國，要懂得向全中國與全世界人民講話，並為他們做事，要有遠大的政治眼光與政治家的風度。」³⁴眼光與風度，特別能顯示系統思維下共產黨人對自身的期許，既體現毛及中共黨人的雄心壯志，也成為中共塑造幹部的標準。

蘇聯及共產國際對學習、訓練也很重視。1938年6月，共產國際主席團致電中共中央強調：「刻不容緩的任務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來加強對黨的幹部和黨員的教育工作，重新教育老的幹部和培養從群眾革命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新的積極分子和領導人。」³⁵共產國際這一要求迅速得到貫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在全黨開展學習運動，毛澤東號召：「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毛進一步講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

32 〈昆張支隊活動初步總結〉（1943年2月），《昆張支隊資料專輯》，中共梁山縣委黨史委1988年版，第142頁。

33 列寧：〈怎麼辦？〉，《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頁。

34 〈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1937年10月），《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60頁。

35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就中共中央代表的報告通過的決議〉（1938年6月11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8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頁。

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³⁶

1938年9月，斯大林主持編撰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開始在《真理報》連載，10月正式出版並立即譯成中文。隨後共產國際專門寄給中共1萬冊中文版。7月，身在共產國際的任弼時電詢中共中央：「為學習該書你們採取了哪些措施？」他強調：「發行和學習此書是提高黨的思想水平的一個轉折點和強大杠杆，是保證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深入最廣大群眾的一個最有力的手段。」³⁷ 8月，中共中央回電：「我們黨中級幹部學習小組，一般縣委以上幹部都已經開始學習《聯共(布)黨史》，它成為教學的必修科目。該書是延安所有學校的教科書。」³⁸ 1939年，共產國際專門成立中共中央文獻資料研究小組，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共學習《聯共(布)黨史》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共產國際這麼做，既在強化中國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也在強化斯大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權威。可以看出，延安的學習運動直接源於共產國際的倡導、推動。

1939年2月，中共中央設立幹部教育部，專門負責組織幹部教育培訓，次年與中央宣傳部合併，要求黨員幹部「每天平均實行二小時的學

36 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50-652頁。

37 〈任弼時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9年7月1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8卷，第237頁。

38 〈中共中央給任弼時的電報〉（1939年8月1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8卷，第248頁。

習制度，每一週按學習小組討論問題，必須保持經常性與持久性」。³⁹ 1940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全黨幹部都應當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運用。」擬定初級黨校、中級黨校、高級黨校的一般標準課程：

甲，初級課程：中國近代革命史。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游擊戰爭。社會科學常識。乙，中級課程：聯共黨史，馬列主義。丙，高級課程：政治經濟學。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近代世界革命史。丁，時事政治課程分為中國、日本、國際三個方面經常研究。戊，軍隊中應有軍事學習課。

為保證幹部教育能夠得到有力貫徹，規定：「各級黨委和政治部的宣傳部下應設立幹部教育科，負責管理幹部教育的工作。」⁴⁰

相比檔案文獻資料的靜態描述，當年中共幹部留下的日記或可更加動態顯示學習、訓練的實況。以作家高魯⁴¹為例，1939年9月，他和魯藝學員一起，從延安出發前往晉察冀，途中先後讀了《中國啟蒙運動史》、《民族問題》、《社會科學概論》、《列寧主義概論》等理論著作，野外聽何干之、沙可夫課各兩次。月初還參加一次軍政測驗，題目包括民主集中制在軍隊中的作用等。時事學習是行軍途中的重點，大致分為聽報告和討論兩種形式，討論內容包括歐戰前途及其影響、與中國抗戰的關係等。中共的學習總是和鬥爭聯繫在一起，所謂有破有立，一個月當中，高魯經歷了兩次鬥爭會，一次是反對自由主義傾向的討論會，另一

39 〈晉察冀邊區黨委關於目前各地幹部教育的決定〉（1940年1月21日），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河北省檔案館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191頁。

40 〈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1940年1月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第1-2頁。

41 高魯（1921-1989），生於武漢。1938年到延安，入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後到戰鬥劇社、戰鬥報社等任演員、編輯。

次是針對不服從組織分配的批判大會。⁴²緊張的行軍途中，思想的訓練和鬥爭如此密集，無怪乎高魯感嘆：「這確實是在戰鬥中學習，停下了就上課，這是中國共產黨能成為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主力的原因。」⁴³

持續的灌輸以及批判、鬥爭所包含的強制性指向，讓學習漸成融入內心的慣性，高魯寫道：「因為背糧，今天沒聽〈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總結報告〉，是最大的損失。只能看同志們的筆記，也記得很簡略，比起聽報告來，效果差多了。」⁴⁴把沒有聽到報告視為最大的損失，學習自覺的確已經不是一句空話。或有人認為高魯所在的魯藝群體知識文化水準較高，這樣的表現只是環境所致，但他離開學校到部隊後，仍記下不少親身體驗的學習場景：

每天出發時，教育幹事便發佈兩個講過的題目，行軍中再討論複習。行軍時把戰士分為若干學習小組，每組二三人，學習討論十分方便，形式也很靈活。部隊多在清晨出發，天氣涼爽，戰士們精力旺盛，討論得很激烈，邊走邊談。學文化主要是識字。每班發一個字條，上面寫著兩個生字，相互傳閱，或利用休息時間識字。每到宿營地，教育幹事就到各班檢查，這樣在行軍中，教育工作就展開了。⁴⁵

時任三五九旅政工幹部王恩茂的日記中，有關自身學習及組織幹部、士兵學習的記載不勝枚舉。1939年1月，他記有該部一般幹部討論會討論的問題：「(1) 共產黨是如何產生的？特別說到中共的產生。(2) 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3) 第二國際的錯誤和缺點。(4) 社會民主黨的名稱為什麼是不科學的？(5) 共產黨的發展，特別是中共的發

42 《高魯日記》，1939年9月1日至30日，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5頁。

43 《高魯日記》，1939年12月6日，第54頁。

44 《高魯日記》，1939年10月14日，第38頁。

45 《高魯日記》，1940年9月14日，第138-139頁。

展。(6) 中國黨的特點。」⁴⁶從中約略可以見出學習蔚為風氣後，政治教育有可能推進到的深度。劉榮⁴⁷記載八路軍戰士渴望學習卻無法如願的案例：

高炳占到班上找到我，天真地、活潑地、熱情地緊緊拉著我的手，親熱極了。他到軍區衛生部路過這裏來看看我，別的什麼也沒有講，甚至於我問他的問題都顧不及回答，急著要把他的滿肚子冤枉說說，受冤枉的中心就是為了要學習而碰了無數次釘子：這次到四分區來，又幹了三天半回去。這樣天真、純潔、可愛、勇敢有為的青年，三年來就是在鬧學習，當然頑皮是有些，然而就要學習又有何妨？環境工作都是許可的，並且上級幾次答覆了的。結果由於每次「調皮」而否決他的學習。⁴⁸

當學習已經成為一種應當爭取的權利時，學習的自覺、學習的要求、學習的動力，得到極大的激發。學習不僅僅是追求個體的進步，還是組織權力落實的一種方式；參與各種各樣的學習，既可能意味組織的信任，也可能意味組織的懲戒，學習不僅僅是思想和教育問題，還和組織的信任緊密相關。後來中共話語中，「學習」常被視為名詞，意味著「學習」這一活動由於意義疊加已成為抽象概念。動詞名詞化，名詞動詞化，在中共話語中常常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意識形態型政黨不斷出入於理論與實踐間的邏輯結果。

當然，僅僅依靠學習並不足以保證成為中共要求的合格黨員，整風中有人談到自己去黨校學習，目的在於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好黨員，這樣「就會做好工作，工作做好了就有了名」，這樣的想法當然不會只是

46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1939年1月9日，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頁。

47 劉榮(1919-1978)，河南陝縣人。1937年參加紅軍，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曾任大隊指導員、連指導員等職。

48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年5月26日，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49-50頁。

個別。不過同樣是這個人，接下來又談到：「對馬列主義應付的時間長了，也給了我一些啟發。所以在四〇年有勇氣把自己在歷史上的一些想法、錯誤、家庭成分、出身向黨說出來。」⁴⁹ 持續的灌輸、耐心的引導、情感的激發、無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圍、集體主義的環境，可以形成強勁的風氣，予人以潛移默化的影響。儘管每個個體變化未必盡如期望，但由這些變化著的個體組合成的群體，卻有可能發生變化的疊加效應，群體釀成的疊加效應又會反作用於個體，形成變化的加速度循環。

教育要因時因人而變，不同時段、不同對象，教育開展各有側重。河南1938年報告，主要開設「黨員基本知識，什麼是馬列主義及統一戰線三門功課」，⁵⁰ 這是抗戰初期黨員培訓的代表性內容。隨著時間推移，黨員基本知識和馬列主義教育繼續居於中心，統一戰線則漸漸退居次要地位。1941年，魯西區黨委制定的教育計劃中，規定了各級機關的課程：「分區委級是著重中國革命基礎知識及支部工作的教育。課程有：《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前途》、《階級與階級鬥爭》、《支部工作》，縣級是：《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問題》；地委級是：《聯共黨史》兩個策略部分。」此外，特別重視階級鬥爭的實際教育：「各地編印了《民主民生讀本》，教育民主民生的鬥爭；從黨報黨刊上鼓動階級鬥爭，從事階級鬥爭教育。」⁵¹ 河北贊皇培訓普通農民時，開設的課程包括：農民的痛苦，大革命時代的中國農民，農民與抗日問題，未來的農民。這樣的課程設計不是隨意為之，內中包含著循序漸進教育農民的思路：「從很多實際問題而談到抗日問題、世界問題，容易使他們接受，使他們瞭解，農民的眼光是非常狹小的，我們要一點一點

49 亨洲：〈我的過去和現在〉，《晉綏學訊》第7期，1943年9月15日，第23頁。

50 朱理治：〈一年來的河南工作〉（1938年），《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7頁。

51 〈魯西區黨委關於從思想上政治上鞏固黨的系統教育的初步總結〉（1941年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3頁。

的放大他們的眼光。」⁵²「放大眼光」四個字，毛澤東用過，這裏又再一次用到，這個新興政黨真有一種開闊自己的內在衝動。

相對農民，知識分子教育更加重視的是立場問題，學習、實踐、反省，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三部曲，高魯寫道：「我們都是缺點滿身的人。我想診治的方法：一多講馬列主義，二在工作中築造自己，三在討論會中檢討我們的生活、行為等。」⁵³高魯說到的討論會是中共特別重視的一個學習環節，中共一直強調學習不是單純的灌輸，而要聯繫實際展開討論，甚至針鋒相對的爭論：「有一個小組共七個人，爭論抗戰、團結、進步，哪個重要？……爭論得無法解決，按多數表決，表決的結果，除主席外，六個人三個意見，兩個人共同一個意見。主席無論參加哪一方面都可得到多數，但主席又不同意以上的三個意見。」⁵⁴整風期間，這樣的爭論雖由於內容顯得瑣碎而被批評為教條，但通過碰撞激起思想火花的討論方式一直為中共沿用，1944年中共幹部的日記中仍然有「討論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性問題有與無，爭論得一塌糊塗」⁵⁵的記載。

日常教育之外，輪訓制度可進一步強化學習效能。蘇維埃時期，中共即開辦訓練班輪訓幹部。抗戰時期，毛澤東要求前方「辦各級軍事政治短期訓練班，輪流訓練幹部」，⁵⁶輪訓制度進一步健全。區以上的各級組織都要建立訓練班，所有黨員、幹部均需輪流接受培訓，時間一般在半個月到一個月左右。冀中報告：

1938、1939兩年間，有數字可統計的，共訓練小學教師6354人，內女的佔10%，縣級行政幹部444人，內女的23人，稅務人員135

52 〈紅五月的贊皇工作〉（1938年7月），《太行黨史料輯存》第1編，第6頁，山西省武鄉縣檔案館藏。

53 《高魯日記》，1939年12月6日，第54頁。

54 昆：〈我怎樣學成了教條主義〉，《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39頁。

55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8月30日，第203頁。

56 〈克服困難創建冀熱察根據地〉（1938年9月26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頁。

人，合作社幹部1094人，內女的6人，送河北抗戰學院學習的3000人，送抗戰幹部學校學習者472人，送邊區華北聯大或抗大或抗戰建國學院學習的800人。總計20894人。

這是相當龐大的一個數字。具體訓練內容為：「一般的是論持久戰、統一戰線、各種基本政策，社會科學常識，游擊戰術及部分的專業課。在生活上則著重於集體生活與軍事化的鍛煉。」⁵⁷

129師是執行輪訓制度的模範，到1940年，「連以上幹部都經過輪流的訓練」，⁵⁸排以上幹部達到94.11%。⁵⁹該師司令部機要科幹部楊國宇曾到師輪訓隊訓練，「是從參加軍隊以來的第一次開葷」。楊國宇在輪訓班的學習主要可分四部分：一是聽報告，劉伯承數次到訓練班做報告，講政治、軍事、黨政、紀律等問題，給學員高屋建瓴的指導。二是聽講馬克思主義哲學，陸定一講《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又聽講生產關係的五種基本形式，建立對馬克思主義分析事物、社會的基本思路的瞭解。三是聽講戰鬥技術，包括敵我優缺點的檢討、游擊戰術、特種戰鬥、後勤保障、戰鬥指揮等，27天授課，涉及戰鬥的課程為12天，佔到將近一半。四是聽講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革命史，從太平天國講起，經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大革命直到蘇維埃運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戰鬥課程相當，同為12天。除此外，還有中間和期末兩次測驗。⁶⁰

57 冀中區行署：〈冀中區五年來民眾工作總結〉（1943年2月22日），《冀中抗日政權工作七項五年總結（1937.7-1942.5）》，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頁。文中分類數據和總計不能對應，應為有些訓練人員未能分類。

58 〈羅瑞卿同志在北方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的政治工作報告〉，《前線月刊》第6期，1940年12月。

59 周桓：〈目前建軍中的幹部問題〉，《前線月刊》第4期，1940年10月，第25頁。

60 楊國宇：《劉鄧麾下十三年》，1939年4月6日，重慶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9頁。

輪訓班的課程安排，清晰體現中共理論和實際結合的特點，軍事理論和實戰的講授是部隊幹部的必修課，佔到近一半比重容易理解，革命史的講述和前者等量齊觀，則突出顯示中共強烈意識形態政黨的特質，即以歷史記憶的構建，強化民族和國家記憶中的革命元素，勾勒中共在時間長河中的歷史際遇、任務和作用，以此提升幹部的歷史使命感、團體認同和現實關懷。從太平天國講起，重心放在中共建黨以來的歷史講述，既點出了中共產生的時代背景，即中共話語中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又突出了中共革命黨的特質。對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強調，是抗戰時期中共一個十分鮮明的特徵，這和1938年底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的「必須熟習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但必須嚴格的估計到中國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習慣的各種特點」⁶¹一脈相承。至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講授，看起來不免深奧，但方法、觀點的灌輸，對中共黨人的思想水準和境界的提升不無潛移默化的作用。1939年，年少失學的八路軍幹部秦基偉剛剛記日記時，錯字連篇，表達不順，但幾年堅持下來，他的日記已經「由原來的單純記錄，發展到寫對事物的思考、見解，後來又發展到總結經驗教訓，……我比較注意對細節事物的思考，尤其注重把握事物的本質特徵。」⁶²

馬克思主義承繼了西方哲學的辯證和分析傳統，又有著自身獨有的踐行特質，這是中國混沌的整體論思想傳統難以比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突出特點是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不是一個簡單的觀察世界的技術方法，而是一個面對世界的開放的認識論。恩格斯把辯證法規定為「關於普遍聯繫的科學」，⁶³「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頭腦中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繫、它們的連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

61 洛甫：〈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黨的組織問題〉，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頁。

62 秦基偉：《秦基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頁；另可參閱《本色——秦基偉戰爭日記》上下冊，新華出版社2013年版。

63 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頁。

消失方面去考察的。」⁶⁴ 這種經由聯繫的觀點建立的整體性和系統性思維，是馬克思主義在認識論上的突破，大大拓展了思想的空間，特別是進入社會政治領域時，系統性的思維可以迅速攫住複雜社會現象的內在脈絡，表現出高出一籌的認知和引領社會政治潮流的能量。

中共通過馬克思主義把近代世界的思維方式和理論視野灌輸進革命陣營，造就並提升了黨員幹部的素質和能力。其中，辯證法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環。戰前的山西武鄉，中共黨組織就已經在講授辯證法：「1933年夏，開了一個暑期講習班，聽講者是一些小學教員，講教育問題及辯證法問題。結束後，並組織現代思潮研究會，以傳達進步思想。」⁶⁵

抗戰初期，毛澤東專門到抗日軍政大學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講稿在雜誌連載並製成單行本出版發行。毛澤東督促全黨都要認真學習辯證法，強調：

唯物辯證法本身就是一種科學（一種哲理的科學），它是一切科學的出發點，又是方法論。我們的革命本身也是一種科學，叫作社會科學或政治科學，如果不懂得辯證法，則我們的事情是辦不好的，革命中間的錯誤無一不是違反辯證法的。但如懂得了它，那就生出強大的效果。一切作對了的事，研究起來，都是合辯證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們，首先是幹部，都應用心地研究辯證法。⁶⁶

此時，蘇聯理論界越來越強調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的地位，蘇聯的態度以及毛澤東的呼籲，激起中共陣營對辯證法的強烈興趣。陳伯鈞1937年10月的日記，就有閱讀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的

64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頁。

65 〈武鄉黨的簡史〉，《太行黨史料輯存》第2編，第4頁，山西省武鄉縣檔案館藏。

66 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6卷，第302頁。

記載。⁶⁷ 按照黃敬的說法，中共幹部「在個人問題上，愈老實愈好。對策略的運用上愈複雜愈好，簡單到唯物論，複雜到辯證法，把二者結合起來，才是最好的。」⁶⁸ 辯證法成為中共幹部常常需要面對的話題。當然，普通幹部要真正掌握辯證法，不是件容易的事，張稼夫⁶⁹ 的親身體會很有代表性。他學過辯證法後，苦於不會運用，「只好回家去同老婆吹吹，她聽了說『你的那辯證法大概是圓的吧？』」辯證法講對立統一的過程，張妻所謂「圓的」辯證法，比較符合中國人的傳統思維習慣，其中或許還有對張盲目套用辯證法的諷刺。後來，張稼夫在實際工作中繼續捕捉辯證法的思路，「這裏看到一點，那裏又看到一點，漸漸也可以把它聯繫一下」。⁷⁰

張稼夫的經歷，是大多數中共幹部建立理論認知的路徑：經由黨的灌輸，理論和實際生活相互激蕩，在實踐中一點一滴地積累、豐富和提高。出身河北贊皇的老黨員傅貫一講述自己的體會：

我在政治上的進步，第一階段是在北平住看守所時，是設法保我出來的張歷生同志時常給我談些革命理論，唯物辯證法與革命力量的分析，運用革命力量後備軍的問題，我才開始對革命理論有了初步的概念上的認識。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我曾研究了一個時期唯物論的辯證法，但仍然是不會運用。……我自己感到，也是許多同志向我提到的是社會經驗，工作經驗都有一些，只是不會整理。因此在區委機關這一時期才注意到這方面的學習，但

67 《陳伯鈞日記·文選》上，1938年10月4日至21日，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381頁。

68 〈黃敬同志在濮縣范縣工作大會上的發言〉（1943年4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584頁。

69 張稼夫（1903—1991），山西文水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曾任山西省委秘書長、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敵工部部長、分局副書記。

70 張稼夫：〈區黨委機關擴大的整風座談會總結報告〉（1943年4月22日），《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11頁。

是對下層的不瞭解，因此又感到空洞。這次回冀西也是我過去經驗的運用與實際工作中來提高自己的很好的機會，黨中央提出糾正三風恰好也撓著我的癢處，說是愉快，不對；說是痛些，又不對；我真有說不出來的味道。⁷¹

理論領會常常於潛移默化中形成，接受者被刺激，觀念形成震蕩，卻無法具體界定震蕩的範圍和方向，這是觀念變化的常態。傅貫一體會到的說不出來的味道，恰恰是當年中共黨人觀念轉變的常態。康德說：「知性在模糊不清的情況下起作用最大……模糊觀念要比明晰觀念更富有表現力……知性的一切活動都能在模糊中發生。」⁷² 指的應該就是這樣的現象。戰時中共幹部大部分具有一定知識水準，但又不是很高，對這些受體而言，觀念的轉換不一定需要條分縷析的解析，打動人心的幾句話或者幾個概念，很可能就會產生強大的向心力。托克維爾早就觀察到：「在有些時代，人類差異如此之大，一條普遍性的法則如果要適用於所有人，卻往往不被理解。然而有時把某條法律的模糊觀點傳授給大家，便會立刻引起人們的共鳴和效仿。」⁷³ 瞭解這一點，對於理解當年中共幹部觀念轉換及信仰的確立，十分重要。張稼夫整風期間曾經說：「當洋八股極盛時代，假如你想實事求是地教點有用的東西，馬上就會要被學生趕掉的；當時學生所要求的不是什麼有用的東西，而是『越不懂就越好』的東西。」⁷⁴ 其實，這未必和所謂洋八股有什麼關係，毋寧說就是人類觀念傳播的常態。正因此，理論學習過程中，盲目套用的很常見，羅瑞卿說到：「某工廠有一個幹部（曾畢業於黨校），當上級檢查工

71 《傅貫一自傳》，《贊皇黨史資料》，中共贊皇縣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1988年版，第164頁。

72 轉見古雷加著，沈真等譯：《德國古典哲學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頁。

73 托克維爾著，邢曉宇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4頁。

74 張稼夫：〈區黨委機關擴大的整風座談會總結報告〉（1943年4月22日），《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10頁。

作時問他：『你們在山上所埋藏的東西，與家裏所登記的數目恐怕不符吧？』他回答說：『那有什麼關係，這是矛盾的統一。』⁷⁵ 這種貌似荒唐的解讀，也是觀念傳播的常態，很多時候，觀念的位移恰恰證明著觀念傳播的廣度。

歷史書寫總是充滿挑戰。迄今為止，人們留下的關於過往歷史的記錄，以不尋常的材料為多，常態很難引起記錄者的興趣。這就給歷史研究者留下不小的陷阱：從材料中看到的歷史未必是常態的歷史。比如就學習言，留下學習記錄的這些人，通常也是積極參加學習的人。歷史研究者根據這些記錄，對比國民黨方面留下的材料，可認為中共幹部較之國民黨幹部學習欲望更加強烈，卻不能簡單引申出：這樣的學習欲望就是中共幹部的全部樣貌。歷史書寫最大的難題是如何面對歷史中的那些靜默者，他們不發聲，卻並不一定就是少數。

讓靜默者發聲，利用調查材料或許不失為途徑之一，尤其是不追求典型、力圖呈現多種樣貌的調查，有助於讓靜默者浮出水面，當時就受到廣泛稱讚的《固臨調查》，或許可以承擔這樣的任務。該調查由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部長的李卓然主持，呈現當年固臨縣（現已撤銷，今延安市延長縣、寶塔區的一部分）政治、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其中也包括幹部學習。調查列舉了縣級幹部學習小組的檢查記錄，從中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態度和反應：

王志臣：今年下鄉3次，共40天。聽中國問題課3次，參加討論會1次。聽時事報告1次。8月份討論施政綱領13次，每天1次，每次1條，當時能背15條，現在完全不記了（問他關於財政政策一條，答不出）。快4個月不看報，完全沒工夫。大清早部隊就追著要糧來了（問他有幾天是這樣，也答不出來）。所以沒有學習，兩小時學習不可能保證。

75 羅瑞卿：〈在宣教會議上的總結〉（1942年4月9日），《羅瑞卿軍事文選》，第341-342頁。

黑翰章：下鄉100天。帶了一冊《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去，一頁都未看。聽課4次，沒有討論過，也沒有筆記。講課太深，記不下。施政綱領學過18條，一條也記不起，報紙兩月不看了，目前國內外發生了什麼事，完全不明白。

……

馮：今年才下鄉半月，中國問題課9次全聽了，討論會每次都參加，每次都作了筆記。今年縣上的學習比往年進步得多，能夠經常進行。時事報告聽過5次。施政綱領幾月以前差不多21條全部背下，現在忘了一些。每天兩小時學習是作了的，《群眾報》、《婦女通訊》、《組織通訊》、《黨的工作》、《中國婦女》、《共產黨人》每期都可以看完，今年還學會了新文字。

黎：今年把新文字學會了。又學會了150個漢字生字，都是施政綱領上檢下來的，施政綱領可以認完。中國問題課聽不懂。⁷⁶

調查中提到的這些幹部，均為縣裏的科長、科員、幹事、秘書，屬中低層幹部，他們的狀態應能代表縣裏幹部的多數。從調查中可以看出，努力學習與被動應付的幹部大約各佔一半，有效和效果不彰也同此數。考慮到人性的好逸惡勞，一半的努力學習者已經體現著中共陣營灌輸、督促和組織的明顯效果，而另外一半的存在，既體現促人進步的難度，也凸顯了歷史書寫中通常會被忽略的那些有意無意的靜默者。即便革命來了，改變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也不是簡單的線性推進的過程，這才更接近歷史的常態。

76 李卓然：〈固臨調查〉，《李卓然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181頁。

3. 考核、淘汰、提高

1938年10月15日，張聞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談道：「敵後方——應大量的發展黨、創立黨。速度要快。量要多」；「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需要一段時間的清理，整頓與鞏固（消化），然後再發展。」⁷⁷這是一個大發展的思路。面對歷史機遇時，中共通常反應幾乎都是先量後質，即先以量的膨脹滿足現實需要，以人員的擴張造成規模。擴張告一段落後，再求鞏固、提高。這種先求量的做大、再求質的提高了的發展模式，如中共自己總結的：

在幹部政策上，要運用一切可以利用來抗日的幹部和工作人員——黨的，非黨的，可靠的，投機的，階級異己的，都可以利用他們來發動抗日運動。但在選擇各種群眾團體和政權機關的真正負責幹部與發展黨員的時候，又必須是「精雕細刻」的。如果只有後者的精雕細刻，而無前者的大刀闊斧那就會一籌莫展或發展很慢，不能跳出地下黨的狹小的圈子。如果只有大刀闊斧而不同時有後者的精雕細刻，就會在弄起一個很大場面之後，自己不能掌握。⁷⁸

作為一個講求實際卻又理論先行的政黨，中共發出的相關指示通常會強調量和質的平衡，即便中共中央1938年3月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的文件中，也沒有單純強調發展，而是要求新黨員入黨「必須經過支部一定黨員的介紹與一定黨部的審查」，並且照例會談到：「對新黨員應注意給他們以初步的馬列主義與黨的建設的教育，使

77 洛甫：〈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黨的組織問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718頁。

78 彭真：〈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1941年9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頁。

他們瞭解共產主義與其他黨派的理論思想的基本區別。」⁷⁹不過，基於強烈的效率優先原則，中共政策的傾向性常常十分鮮明，實際操作者亦學會從面面俱到的表述中領會核心內容，從而跟上政策的指揮棒。和歷史上政治力量普遍依賴精英不盡相同，中共特別強調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量的膨脹無論從理論認知還是實際操作言，都是中共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儘管這種高度追求效能的機制，不可避免也會帶來一些問題。

以山東為例，1939年7月山東分局的報告提到，現有黨員大約5萬餘人，計劃以8、9兩月為衝鋒月，迅速發展黨員，「一區委擴大3萬人，三區委25000人，二、五兩區各2萬人，四區委15000人，六區委1000人，共11萬多」。⁸⁰1939年，山東根據地地域還很有限，這麼小的控制地區，兩個月就要發展11萬黨員，相當驚人。熱衷數字追求，勢必導致楊尚昆談到的問題：「華北黨在大量發展中，一般的現象，都是追逐數目字，只重量，不重質，因此，不合中央所指示的『黨內要嚴』的原則，大開門，拉夫，無例外的如此，有一夜發展四十個黨員的，有三分鐘發展五個黨員的，有騎著驢子『跑』黨員的，有打鑼號召入黨的，什麼奇形怪狀都有。」⁸¹黨的發展質量無法保證，又影響到幹部的素質，太岳區總結：「幹部的缺乏以及現有幹部能力的不夠，特別對政權、武裝工作的領導毫無經驗。」⁸²尤其是中低層幹部問題更為嚴重：

79 〈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467頁。

80 〈山東分局關於政權、黨務等工作情況向北方局的報告〉（1939年7月12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66頁。

81 楊尚昆：〈黨的建設〉（1941年2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19頁。

82 〈太岳全區工作的總結與計劃〉（1939年1月28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2卷，第55頁。

「有的區幹(大部分可說是1/3的)不會開支部會，甚至自己怎樣發展共產黨員都不知道。」⁸³

其實，對大發展必然導致的問題，中共並不是沒有預估，但中共更看重的是大發展形成的規模效應及由此造成的發展事實，即當時報告總結的：「猛烈開展黨與群運(如模範村)是開始創造根據地工作中必要的，對後來其他區域的轉變也給了極大的影響，這種方式與作風應更加提倡。」⁸⁴ 因此，儘管發展帶來的錯誤與缺點相當嚴重，但為中共後續發展「打下了基礎」，⁸⁵ 仍得大於失。而且，大發展中湧進了這樣一批黨員，如王林日記所寫：「對主義政策大概是一點也不很清楚，只是忠實，一上名，就好像上了梁山泊燒了香拜了把子般的。」⁸⁶ 這種看起來不一定符合主義要求的黨員，當時卻未必不是政治力量追求發展的現實助力，忠實是當年中共對黨員極其重要的期待。

1939年開始，隨著初期大發展告一段落，整黨在中共自我改造的目標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起初是對之前大發展的調整，後來則成為不斷淨化、提升自己的手段。整黨有兩個標準，一是階級成分，一是工作能力，即所謂「政治上堅定，工作刻苦，有發展前途，能力不低」。⁸⁷ 不合要求的黨員幹部，予以淘汰。整黨的基本要求在太行發佈的整黨文件中可以看出大略：

一、首先審查各級幹部，特別分委，支部的幹部，要使黨的領導機關掌握在經過考驗、忠實可靠的同志手裏，並注意提拔積極勇

83 〈五個月的工作報告〉(1940年3月1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177頁。

84 顧卓新：〈爭取全區工作平衡發展問題〉(1938年12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535頁。

85 〈魯西區黨委關於黨的工作報告〉(1939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116頁。

86 王林：《抗戰日記》，1938年4月12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53頁。

87 〈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邊區黨的任務〉(1940年4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281頁。

敢的工人、僱工及貧農同志，樹立領導機關中的無產階級骨幹。二、對那些已經加入黨，而實際上只是同情分子，不能艱苦工作和遵守黨的鐵的紀律的，則勸他們退出黨，保持政治上的同情，並指定專人與之發生關係。三、要慎重的洗刷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投機分子、敵探、托派、奸細等出黨，並將其錯誤事實向黨員解釋，以教育全黨同志。⁸⁸

具體的程序，太岳關於區村整黨的文件有詳細的提示，首先由區委召集支委會或小組長聯席會，「研究本支部的環境、發展歷史、工作情形，黨員人數、成分、履歷、社會關係、鬥爭經歷、工作表現及如何發展的等等」；然後開小組會，小組成員互相鑒定；接著區委選擇個別黨員談話，瞭解黨員成分、歷史、社會關係，徵詢對支部工作和其他人有何意見；同時區委還須以群眾面目同群眾談話，考查支部和黨員個人的工作及群眾關係；這些都完成後，再召開支委會，做最後鑒定。⁸⁹這是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的結合，既有上級機關的組織、發動和把握，也有黨員本身及普通群眾一定程度的參與。

如果說一般黨員的良否影響著黨的形象，幹部則直接決定著組織的效率和力量，整黨更關鍵的還是對中低層幹部的考察、整頓。幹部審查標準主要包括「政治觀點、工作能力、黨的觀念意識、日常生活、經濟觀點及是否能吃苦耐勞等」，⁹⁰具體從如下一些方面展開：「每個幹部的家庭背景，社會關係，過去參加過反對革命（入黨前）和反黨派別（入黨後）活動沒有，脫離過黨的關係否，脫離原因以及如何恢復或重新入黨。如曾被捕或被俘過的幹部，則須仔細地審查被捕或被俘過程中的政

88 〈中共晉冀豫區委關於鞏固組織的指示信〉（1939年11月2日），《太行抗日根據地》一，第88頁。

89 林鐵：〈論北岳區關於整黨建黨中支部工作上的幾個問題〉（1941年6月16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70頁。

90 〈冀魯豫鞏固黨參考資料〉（1941年12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184頁。

治上的表現，以及出獄及釋放經過（自首叛變分子不應恢復黨籍）。」⁹¹ 審查辦法在實踐中不斷嚴密，冀魯豫報告：「首次幹部審查工作，除填表之外，並未作出多大成績。」為提高審查效果，實行逐級負責制：「二次審查幹部決定，區黨委審查到縣，地委審查到支書，縣委審查到模範支部之小組長及一般支部之支委。區委以上則填表，經常瞭解，個別談話，三方面結合起來審查。」⁹² 1940年，中共中央直接規定：

審查每個幹部時，必須由被審查的幹部自己填寫表格，並寫詳細的履歷，由幹部科工作人員與之作詳細的談話，對其重要關節（如被捕、被俘、出獄、釋放及犯重大錯誤……的經過），必須找到旁證人寫出證明書，根據上述材料精細的審查，並由幹部科會議討論作出結論。⁹³

逐級審查後，被認為不合格的黨員、幹部遭到清洗。1941年3月運東地委報告，6個月共審查地級幹部15人，縣級373人，區級768人，支部一級303人，審查結果，「不合入黨手續的156人，失掉關係或脫離過黨的18人，參加其他團體（三青、復興、會門）80人」。最終的處理：縮短黨齡18人，警告14人，留黨察看115人，停止黨籍6人，勸告出黨1人，開除39人。⁹⁴ 處理人員佔到百分之十幾。幹部處理更為嚴格，1940年晉冀豫區贊皇等9縣133個分委中，開除16人，定期開除14人，撤銷工作26人，警告6人，共計處分62人，佔總數的54.1%。⁹⁵

91 〈中央關於審查幹部問題的指示〉（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444頁。

92 〈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略〉（1944年），《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407頁。

93 〈中央關於審查幹部問題的指示〉（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444—446頁。

94 〈冀魯豫鞏固黨參考資料〉（1941年12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186頁。

95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組織部給北方局的工作報告〉（1940年8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頁。

清洗、淘汰具有雙重意義，既剔除不合標準者，淨化自身，對留下來的幹部也是警示和鼓勵：「興奮了每個同志，使他們認識了共產黨不是馬馬虎虎的」，⁹⁶有助於提高幹部對組織的認同和體制的忠心。清洗、淘汰是減法，留用、提拔則是加法，一減一加，組織的內部凝聚力油然而生，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初期大發展可預期的後續效應。

除整黨中的鑒別考察外，幹部還要接受常規性的考察、考核，這關乎對幹部立場、觀念、能力的把握，是幹部評判和升遷的標準。日常考察由於涉及幹部的使用，不容疏忽，考察的具體方面包括：「看他的工作效果，效率，工作方式及方法，及其直屬上級和同級以及他所直接領導的關係的批評意見，並應注意他是發展進步，還是不長進甚至退步，優點缺點是如何程度，能作哪一級的幹部。」⁹⁷下面一則報告大致可看出幹部考察中關注的問題：

整個中心縣中最強的要屬翼城：書記吳，能掌(握)全局工作，有計劃，努力，吃苦耐勞，政治相當堅強，組織觀念強；組織閻，是地方公開的共產黨員，能團結各階層群眾，有號召力，堅強努力，只是工作缺乏計劃；宣傳趙，積極努力，三人能團結，所以工作能開展而鞏固。最弱的一個是豫北：書記王，缺乏政治遠見，握不住中心，嚴重的犯著事務主義，但還能吃苦努力。⁹⁸

政治觀念和能力是考察中的兩個核心要素，對這兩者的鑒定常常影響著幹部的命運。日常操作中，政治觀念因為很難量化，常常似有若無，但一旦政治上被認為有問題，就意味著一票否決，失去博弈的機會。即周恩來講的：「挑選幹部的標準，政治標準與工作能力，二者是

96 〈1939年底晉東巡視報告〉，《太行黨史料輯存》第1編，第98頁，山西省武鄉縣檔案館藏。

97 〈中共晉冀豫區委會議記錄〉(1938年8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316頁。

98 〈晉豫特委組織報告〉(1938年)，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太岳抗日根據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頁。

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決問題。」⁹⁹ 中共革命體制內，這樣若隱若現卻又往往起決定作用的規則，並非個例，切切不可因之沉在水面之下即予以忽略。

儘管自上而下的考核和任命機制被賦予高度的原則性和嚴肅性，具體操作時，幹部的來源、成分及相互間的人際關係等因素仍不可避免會滲入其中，畢竟中共也是由具體的個體組成。而且，幹部的使用常常不得受制於現實條件，當時文件提到幹部任用的捉襟見肘：「幹部貪污腐化，已成為普遍的風氣，蒙上欺下，領導者又多表現閉塞，因此紀律廢弛，使幹部日益更加油膩。及至現在有許多幹部明知道他壞，但又無法換他，因為還沒有發現比他較好的人。」¹⁰⁰

為加強幹部管理及審查，1940年8月，中共仿效蘇聯專門設立幹部處管理幹部，在縣委以上機關設立幹部科，隸屬組織部或政治部。幹部科以瞭解幹部為目標，西北局組織部幹部科1942年的工作計劃包括研究瞭解綏德警備區、延安非黨、邊區非黨、延安各縣幹部，力爭「每個幹部配制在適當的崗位上」。¹⁰¹ 幹部科另一日常任務是建立和完善幹部檔案：「地方上區級以上幹部的文件(表格、履歷、證明書等等)，須送區黨委保存。軍隊中團級以上幹部的文件，須送師或軍政治部保存。」¹⁰² 這是中共中央加強幹部檔案管理的一個重要標誌。以地委為例，各地委組織部要求建立如下檔案、名冊：

1. 縣委名冊，每縣一頁，凡有調動即加以注明，新任縣委即添上去。
2. 預備縣委名冊，把所有預備縣委，分批分職(書記或委員)

99 周恩來：〈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周恩來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頁。

100 〈1939年底晉東巡視報告〉，《太行黨史料輯存》第1編，第87頁，山西省武鄉縣檔案館藏。

101 〈西北局組織部幹部科一九四二年工作計劃(草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42年，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1993年版，第60頁。

102 〈中央關於審查幹部問題的指示〉(1940年8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第435頁。

注冊。3·機關幹部名冊，包括地委機關及縣委機關幹部。4·幹部犧牲，死亡、被俘、損壞、開除，叛變的登記名冊，每個人都要注明略歷及事件的詳細過程。

同時建立的還有卡片小傳制度，「每人都有一張卡片一份小傳。卡片和小傳的號碼，要與名冊的號碼一致，以便查考。各種名冊，卡片和小傳的管理應該統一，由一定的人員負責。」¹⁰³ 隨著整風的開展，檔案材料不斷豐富，保存檔案成為各級組織至關重要的任務。後來成為革命史專家的李新，回憶他在反「掃蕩」時保存人事檔案的經歷：「把全華北地方幹部（地委以上）的履歷表（每人一張薄紙），分成兩口袋，由我們兩人各背一袋，非到最必要的時候絕不埋藏，而且要保證不得有一份遺失，一定要與這套最寶貴的資料共存亡。」¹⁰⁴ 像中共這樣組織嚴密的政黨，黨員的履歷也就是黨員的歷史，關係到組織的信任、掌握和運用，某些時候，個人檔案既是參考材料，也是組織掌握的證據。

除建立制度外，中共更重視通過點對點的溝通掌握幹部，畢竟人是活的。中共要求建立兩級瞭解制度，即上級幹部起碼要瞭解兩個層級的下屬，比如地委要瞭解縣、區兩級幹部，縣委要瞭解區和中心支委。瞭解的內容除了姓名、籍貫、年齡、黨齡、工作情緒外，還包括「工作中的幹部本身優缺點」，「發展前途、進步快慢、適於做哪類工作」及「社會地位、出身、社會關係」等。¹⁰⁵ 這樣的溝通有助於上下級建立緊密的聯繫，當然也不可避免形成上下一條線的私人紐帶，制度設計總是有利有弊。中共有自信的是，嚴密的組織和原則性的強調，可以讓幹部之間的鏈條既私人在場，又不至過分泛濫。

103 〈中共太行區黨委關於幹部工作的決定〉（1944年11月），《太行抗日根據地》一，第374頁。

104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頁。

105 〈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邊區黨的任務——信錫華在冀魯豫邊區黨委成立大會上的報告〉（1940年4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280頁。

瞭解幹部，才能培養和提高幹部。中共很注意提升黨員幹部的領導藝術，看趨勢、尋規律，找實質，用聯繫的觀點把上下、左右、前後打通，建立系統思維。八路軍一二〇師幹部陳漫遠對此有結合自身實際的具體解釋，包括：(1) 比較的觀點——「各分區有各分區的環境與特點，司令部各科的情形也不相同；每個科長參謀的出身進步，也各不同。要分別看，又要聯繫著看，這樣可以得出其共同的地方和它特殊的情形，才能看出工作好壞的原因及提出具體不同地點改進方法」；(2) 時間的觀點——「看一九四三年的工作，要想到四二年是怎樣工作的，看自己的工作也要從過去看到現在，看問題，看部隊，同樣要從歷史發展上去看。……系統深刻的反省自己的歷史」；(3) 聯繫的觀點——「從看一個到幾個，從一地到各地，從一個戰鬥推到許多戰鬥，從一個人一個科推到另一個人另一科，從開始看到末尾，從佈置工作，看到完成任務，從這內部的聯繫去找出規律，找根源。」¹⁰⁶ 比較、發展、聯繫，時間上縱深、空間上連貫，如此有意識地開闊視野、系統思維，在當年中國的政治力量中，實非尋常。

幹部不僅要有系統思維，還要懂得掌握下屬心理，對症下藥。劉榮只是一個連級指揮員，卻留下了對戰士心理的詳盡分析：

四連戰士反省坦白中，全連一百七十二人，就有八十幾人有離隊想法。他們主要原因都是想家，或是家裏想讓回。八路軍是好的，把兒子送來當八路軍，說是義務兵只當三年，為什麼到期滿還不回來呢？希望兒子早點回來。另外，一面當了八路軍，又想到自己的美滿家庭，不肯遠離。但沒有離隊的原因由於：一、路遠(300里)；二、怕狼吃；三、怕槍斃。所以一個沒有離隊。從這些現象認為帶領農民出身的戰士，掌握其保守性是中心關節，根本在於啟發教育與團結——從感情到理智、私人到政治，有隸屬

106 陳漫遠：〈在整風座談會上的發言〉，《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24頁。

關係、同志關係，然後再關注以平時的思想與培養其艱苦精神，就沒有帶不了的兵。¹⁰⁷

從陳漫遠和劉榮這兩位分屬中共陣營中高和中低級幹部的總結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共幹部的視野、分析力、領導藝術及向下伸展的程度。

4. 向黨交心：批評與自我批評

無論學習、培訓，還是考核、清洗，目的都是為了造就一個紀律嚴明、有信仰、有目標、方向一致的政黨。按照列寧主義的理論框架，共產黨需要充當革命的催生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路人。基於這樣的定位，共產黨人被要求具有鋼鐵般的意志和嚴格的紀律，保持對黨的絕對真誠，這種忠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道德選擇，而是基於終極信仰的排他性要求。抗戰時期，中共正是按這樣的要求打造自己的黨和幹部。

保持黨原則上的一致性，不是共產黨人的創造，而是近代以來世界各類政黨的普遍要求，¹⁰⁸ 只是包括蘇共在內的共產黨人為達成這樣的目標建立了鐵的紀律，並通過理論和組織體系保證其落到實處。其中，抗戰時期被列為中共三大優良作風之一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即為中共改造幹部，確立內部思想、行動一致的關鍵舉措。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批評與自我批評有不短的歷史。列寧曾經談到布爾什維克黨的自我批評問題：「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經久經戰鬥，決不會為這種刺激所驚擾，他們將不理會這些，而繼續進行自我批評，無情地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會、必然會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

107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5年1月15日，第250頁。

108 比如2013年，轉型後的中國國民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仍然有這樣的要求：「實行黨的決議，服從黨的領導，遵守黨的紀律。」

而被克服的。」¹⁰⁹ 他強調：「自我批評對於任何一個富有朝氣、生氣勃勃的政黨都是絕對必要的。再沒有比沾沾自喜的樂觀主義更庸俗的了。」¹¹⁰ 受到蘇聯共產黨的影響，中共成立不久，就注意在黨內展開批評，中共北方區委的報告彙報黨內開展批評的情況：「批評之後能切實改正的成績不十分佳，至於不受批評的而好感情用事的到可以說是極少數分子。」¹¹¹

1927年蘇共十五大決議著重強調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性，隨後，斯大林提出關於自我批評的著名論斷：「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就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我認為：沒有它，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露我們的膿瘡，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而我們的缺點還很多，這是必須公開和誠實地承認的。」¹¹² 共產主義運動以克服私有制為目標，這種克服不僅包括財產私有，也包括被認為與物質世界存在反映關係的觀念意識，因此，在同志間亮出自己的觀念並展開觀念的碰撞，在共產黨人言，可謂天經地義。

蘇聯及斯大林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強調進一步影響到中共。1929年，賀昌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我們應當積極的發展黨的民主討論與自我批評的精神，要虛心的尋找黨與每個同志的錯誤，指出錯誤的原因，教育自己，教育群眾，是現實的布爾什維克化！」¹¹³ 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提到：「切實檢查黨的工作，實行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¹¹⁴ 1933年，張聞天撰文具體解釋自我批評：

109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列寧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00頁。

110 列寧：〈論政治同教育學的混淆〉，《列寧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頁。

111 〈劉人壯、鄧鶴皋給鄭容的報告〉（1925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區委時期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頁。

112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1928年4月15日），人民出版社編輯部：《論批評與自我批評》，人民出版社1950年增訂版，第2頁。

113 〈黨內組織上的危險傾向〉（1929年2月9日），《賀昌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頁。

114 〈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1930年9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第476頁。

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應該成為我們黨改善我們對於群眾的領導方式的有力的武器。這種自我批評應該具體分析我們在領導群眾中的經驗，指出我們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使我們以後能夠更好的領導群眾。這種自我批評有它的時間性，特殊性，與連續性。它一層深一層的向著取得領導群眾的藝術的方向前進。自我批評的價值也就是在這裏。¹¹⁵

1937年開始，蘇共將批評與自我批評提到新的高度。1937年2月至3月召開的聯共(布)中央全會要求進一步貫徹黨章所規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加強黨內民主，「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始更廣泛地開展起來了」。¹¹⁶ 1939年，蘇共十七大首次將自我批評寫進黨章：「在各個組織內或在全黨內自由而切實地討論黨的政策問題，是每個黨員根據黨內民主制所享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只有在黨內民主制的基礎上才能夠開展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鞏固黨的紀律。」¹¹⁷ 此後，批評和自我批評逐漸成為蘇共和蘇聯社會的一項重要準則，正如當時論著中強調的：「必須經常地利用自我批評來總結自己每天的工作，檢查自己，大膽地批判自己的錯誤和缺點，注意考察自己活動的結果，並考慮怎樣才能得到更好的成績。自我批評應該成為每個蘇聯人不可缺少的品質。」¹¹⁸

受到蘇聯影響，抗戰初期，中共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強調明顯增多。1937年底，彭真在報告中提到：「最近許多負責同志在進行自我批評一點上，是十分注意不夠，甚至完全忽略的，必須立即糾正。自我批

115 張聞天：〈學習領導群眾的藝術〉(1933年7月、9月)，《張聞天文集》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修訂版，第268頁。

116 波諾馬遼夫主編：《蘇聯共產黨歷史》，第540頁。

117 〈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章〉(1934年1月)，《蘇聯共產黨章程彙編》，第79頁。

118 沙里可夫著，俊莊譯：《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蘇維埃社會發展的動力》，時代出版社1955年版，第78-79頁。余敏玲〈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8期，2022年12月，第89-139頁)對中共自我批評和蘇共的關係論之甚詳，可參閱。

評是推動黨進步的重要武器，同時也是推動幹部學習進步並加強黨的觀念的武器，是最重要的日常訓練方法之一，必須經常地進行。」¹¹⁹ 地方黨委把自我批評作為黨內生活的重要內容，並將自我批評和思想鬥爭相聯繫，要求：「反傾向鬥爭及自我批評應成為充實小組會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¹²⁰ 批評和自我批評逐漸成為黨內的常態，陳賡注意到：「一般幹部自我批評精神很好，並不因批評而垂頭喪氣，即受嚴厲批評者亦喜笑顏開，足見這些幹部在布爾什維克意識上又前進了一步。」¹²¹ 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開展思想鬥爭、進行自我改造的工具。

延安整風前後，批評與自我批評被進一步強調。1942年的整風動員報告中，毛澤東號召：「批評是批評別人，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但作為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¹²² 1943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繼續推升自我批評的高度：「自我批評是馬列主義政黨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馬列主義方法論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氣的組成部分，是馬列主義政黨進行兩條戰線鬥爭的最適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則是反對錯誤思想建立正確作風的最好方法。」¹²³ 中共既希望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保持黨的活力，達到固化而不僵化的目的，又在實際運作中不斷強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糾錯、鬥爭成分，儘管其間不無曲折，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重視通過自我反省及人際互動激發思想鬥爭，達到思想統一的效能。

119 彭真：〈抗戰中的新危機與華北黨的新任務〉（1937年12月9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78頁。

120 〈中共冀豫晉省委關於新形勢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務的決定〉（1938年6月），《太行抗日根據地》一，第16頁。

121 《陳賡日記》，1941年1月7日，戰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頁。

122 毛澤東：〈關於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19頁。

123 〈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194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修訂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3頁。

批評與自我批評通過各種方式貫徹到中共政治生活中。包括高魯在內的當年中共黨員幹部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大量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場景。1938年4月，王恩茂日記中記有，團幹部會議上，「在幹部中發展自我批評」¹²⁴ 被列為主要議事日程之一。高魯日記記載行軍途中一次生活檢討會的內容別具意味，會上圍繞行軍時有人偷吃自帶乾糧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有發言分析：「某個同志私自吃了乾糧，今天一勺，明天吃一口，緊急情況乾糧不夠時怎麼辦？吃不飽走不動路，這不是給大家拖了後腿。大家也不忍心你掉隊，得大家分給你吃。這時你是吃的大夥的。」¹²⁵ 乾糧雖分配給個人，但私吃乾糧仍然可能影響到集體，這樣的分析邏輯在局外人看來也許不好理解，卻在中共內部言之成理。時在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凌子風自述也說：「我們行軍一年四季每人必須都有一個乾糧袋，細長的口袋背在身上，這個口袋裏的糧食沒飯吃時才准許吃，誰要是之前吃了，就是犯紀律，不得了！」¹²⁶

集體主義是馬克思主義重構社會的原點，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

個人力量(關係)由於分工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從頭腦裏拋開關於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並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集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¹²⁷

集體是革命的原動力，集體主義是共產黨人改造和自我改造的基礎，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進入共產黨後，洗心革面逐漸被擰成一股繩，集體主義的邏輯至關重要。批評和自我批評正是建立在集體主義的原則

124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1938年4月2日，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頁。

125 《高魯日記》，1939年8月27日，第25頁。

126 《風——凌子風自述》，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頁。

127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18-119頁。

上，每個個體的觀念和行為都是集體的一部分，集體有必要為之負責，個體也有義務向集體袒露自己。這種面對面的交鋒，對參與者的觸動可從高魯日記中窺見一斑：「晚上開生活檢討會。每人都把自己的優缺點談一遍，……為什麼現在的缺點不馬上改掉呢？熄燈哨子吹了，我睡在炕上久不能寐，想著自己的弱點應該怎樣克服。」¹²⁸

整風運動中，批評和自我批評常常以反省的方式出現：「各級幹部，每半年要做一次反省，反省筆記集中到一定的管理機關。……反省辦法，一般採取集中的會議形式，把幹部分批集中到一起進行反省。」¹²⁹ 茅盾的女兒沈霞¹³⁰可謂這種反省式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見證者之一。初到延安不久，沈霞在日記中寫道：

我現在必須俄文第一，政治理論等等是要的，但是不想弄到竟佔了俄文應有的時間。說我政治落後，不關心政治，我完全不在乎。反正，我就是這樣，自己知道就是了。況且到底是不是落後，而落後，不關心，是不是就從他看不看政治書，是不是滿口政治上去觀察？這些觀點還是應該打問號的。……一定要把人弄成一個類型，說好，又覺得不滿意，說壞，又指不出什麼大缺點來，以這種人為典型的要求法，我是不大贊成的。¹³¹

她甚至抱怨：「在延安這種地方，人這麼不瞭解人。一個青年，熱血些的，都要變成冷血才會適合。」¹³²

沈霞的批評是初到延安的外人對一個陌生而又獨特的政治團體的本能判斷，無足為怪。接下來，她的日記提供了一個知識青年如何被中共

128 《高魯日記》，1939年12月24日，第58頁。

129 〈中共太行區黨委關於幹部工作的決定〉（1944年11月），《太行抗日根據地》一，第374頁。

130 沈霞（1921–1945），茅盾之女。1940年到延安，1942年加入中共。1944年與蕭逸結婚，1945年因人流導致感染而死。

131 沈霞：《延安四年》，1942年1月13日，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

132 沈霞：《延安四年》，1942年4月6日，第19頁。

政治文化同化的活標本。1942年底，經過不斷的學習、批評和整風教育，沈霞的想法開始明顯變化，日記中反思先前「不是從集體出發，從革命需要出發，而是從個人情緒出發，從個人愛好出發。因為這樣，就作出了錯誤的結論，認為延安同志間的愛是沒有的，是缺少營養的。」沈霞意識到的這種集體和個人的對立正是此時政治文化的核心，她自省：「強調個性愛好是我到延安後的一個中心缺點」，¹³³ 作為進步的體現，則是「個人種種生活上的要求也不再出現在我腦子中」。¹³⁴ 個人的不斷放低，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實踐相互促動，曾經那麼敏感自尊的沈霞，亦逐漸適應了在集體場合敞開自己：「我很喜歡看見現在所有的同志都能毫不顧忌地對我說出他心中的話，甚至也不避諱言詞上的用法。不再怕我不接受，或者是怕過火，我吃不消。這些我覺得正好說明，現在我已經能心平氣和地聽別人的意見，而且盡自己所想到的提出材料，供大家思考。」¹³⁵

批判和自我批評，當和思想統一的要求結合，警示意義特別深厚。高魯寫道：

讀二十幾日的《解放日報》。上有陳伯達的文章〈關於王實味〉。讀後有一種害怕的感覺。以前曾讀過《中國文化》上刊載王實味的文章〈民族形式的新偏向〉，雖只讀過一遍，但頗有同感。但王實味是個披著美麗外衣的托洛斯基派，我卻同意他的觀點，多可怕。……我為此苦悶，躺在床上睡不著，心情像在小組會上作檢討一樣。¹³⁶

這樣的心路歷程恐怕是抗戰時期中共黨員、幹部的普遍經歷。自我批評不僅關涉是否進步，更關鍵的，還在於藉此防止滑向錯誤的深

133 沈霞：《延安四年》，1942年12月28日，第49-50頁。

134 沈霞：《延安四年》，1942年12月18日，第34頁。

135 沈霞：《延安四年》，1942年12月29日，第54頁。

136 《高魯日記》，1942年7月9日，第279頁。

淵。在政治具有壓倒性意義的環境下，慵懶者或許可以曲諒自己的不進步，卻難以承受被推向對立面的風險。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使中共黨內逐漸造就了「先進、落後」這樣判然分明的評價體系，集體主義的氛圍，更放大了這一評判的嚴重性。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僅是通向進步的階梯，某種程度更是自保的底線，爭先恐後、追求進步成為大多數人的自覺選擇。高魯寫道：「羅世光同志給我提了意見。認為我很少對別人提意見。有些發言沒抓住問題的中心。楊林說不給別人提意見是不負責任。方遷說以不成熟為藉口不提意見，是自尊心太強的緣故。」¹³⁷ 反省的氛圍中，不提意見也是錯誤，暴露自己成為必需。經過這樣嚴格的檢討、改造、批判過程，輔之以政治、組織上的清洗和肅反運動，在控制和動員雙管齊下的規訓中，自覺不自覺成為黨機器的螺絲釘變得順理成章，外在權威內化為自覺自願亦水到渠成。一年前還在抱怨延安缺乏愛的沈霞，1943年初，已經在日記中感嘆：「當失眠之夜，想到自己是在做一個有用的螺絲釘時（即使是很小很小的），白天少見真心的笑不自覺地掛在嘴邊了。」¹³⁸

5. 黨校：回爐再造

理論聯繫實際是抗戰時期中共著重強調的思想路線，也是幹部養成的一條重要原則。像高魯這樣的知識分子幹部，抗戰時期的經歷就是一個實踐和學習動態結合的過程。1940年初，高魯離開華北聯合大學，先到120師戰鬥劇社，後到山西河曲縣抗聯，在此期間，被抽調參加張聞天主持的晉西北考察，實地調查農村社會經濟和階級狀況。

1944年，隨著抗戰進入後期階段，為戰後中國準備幹部提上議題，高魯適逢其會，進入晉綏邊區黨校，回爐學習理論。此時，正如晉

137 《高魯日記》，1944年8月20日，第547頁。

138 沈霞：《延安四年》，1943年1月27日，第71頁。

綏分局黨校校長龔逢春告訴學員的：「我們有治國平天下的責任，要反對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組織起來。」¹³⁹ 組織、思想問題的背後，是培養一批擔負天下責任的幹部。黨校作為幹部的教育基地，自然要承擔起這一責任。當年黨校在黨員心目中的地位，從一些黨員的反應中可見一斑：1941年，楊國宇要求去北方局黨校學習，從4月起，就一直為能否去黨校學習而焦慮。1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去北局黨校學習，本來已批准，可是李達參謀長不要我去，不惜再往政委部去請求，又碰了壁，回來又向參長提仍無效，後又向鄧政治提，他說他們商討後答覆！真急人，聽說黨校不久就開訓了。」¹⁴⁰ 半個多月後，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談到共產黨員不瞭解聯共黨史是恥辱，楊國宇聽後「臉一直發燒」，暗下決心：「還得堅持要求到黨校去。」¹⁴¹ 整整一個月後，5月13日，楊終於實現了去黨校學習的願望，內心的興奮在日記中用了四個字表達：「太高興了。」¹⁴² 和楊同期進入北方局黨校的秦基偉，獲悉去黨校的要求被批准後，反應和楊一模一樣：「萬分的高興和痛快」。¹⁴³

由於共產黨人對理論的重視，共產主義運動中，黨校是理論教育的重要場所。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即通過決議：「建立中央委員會直屬高級黨校」。¹⁴⁴ 7月，俄共(布)創辦黨的第一所中央黨校——斯維爾德洛夫工農共產主義大學。隨後，又要求各地創辦中低級黨校。1933年，蘇聯已有256所蘇維埃黨校，學員有5萬人。¹⁴⁵ 俄共的黨校經驗被共產國際推廣到各國共產主義運動中。1922年共產國際四大通過

139 《高魯日記》，1944年7月27日，第532頁。

140 楊國宇：《劉鄧麾下十三年》，1941年4月13日，第188頁。

141 楊國宇：《劉鄧麾下十三年》，1941年5月5日，第190頁。

142 楊國宇：《劉鄧麾下十三年》，1941年5月13日，第190頁。

143 秦基偉：《本色——秦基偉戰爭日記》上冊，1941年5月26日，第142頁。

144 〈關於組織問題〉，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1分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8頁。

145 轉見林丙申〈蘇聯黨校的歷史沿革〉，《國際觀察》1981年第3期，第49頁。

決議，要求各國共產黨「應該在可能範圍內，根據現有的情況，開辦中央黨校和地方黨校、日校和夜校等類學校」。¹⁴⁶ 得到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支持，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中共即創辦多所各級各類黨校。

抗戰時期，中共對黨校的重視有增無減。和蘇聯黨校有固定的學制、基本知識的系統講授、黨校實際類於黨辦大學不同，也和中共開辦的各類短期訓練班不一樣，抗戰時期中共黨校可以說是黨員幹部中期集中訓練的場所。冀豫晉省委談到，1938年的會上，很多來自縣委、區委的幹部提出應集中訓練幹部，省委據此決定：「用最大的力量來開辦黨校。」¹⁴⁷ 訓練時間一般為3週到6週。1940年2月，中共中央規定：各地黨的領導機關均應辦理黨校以加強對黨的幹部的馬列主義教育，具體開辦辦法是：

甲、訓練中級幹部（縣級及區書）的黨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辦理。乙、訓練區級幹部的黨校；大致由各省委、區黨委、地委辦理。丙、訓練初級幹部（支部幹事）的訓練班；大致由各地委、縣委辦理；中級黨校訓練期間由半年至一年，區級黨校三個月至六個月，初級幹部訓練班二星期至二個月，可根據當地情形來決定。¹⁴⁸

根據這一要求，各地普遍建立黨校，冀魯豫報告：「1941年1月以後至現在，訓練班在區黨委正式改為黨校，只確定訓練縣區級幹部，以後訓練了135個，期限為3個月，政策與黨建為主要課程。」¹⁴⁹

146 〈各國共產黨的教育工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第35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590頁。

147 〈冀豫晉黨校一個月工作報告〉（1938年6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253頁。

148 〈中央關於辦理黨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305頁。

149 〈冀魯豫區黨委的工作總結〉（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155頁。

通過思想訓練達到思想統一，是共產黨人灌輸自己理念的直接目標，也是保證組織凝聚力和效率的關鍵一環。黨校和輪訓班一樣，既是幹部回爐再造的思想和組織平台，又提供了集體生活、密切幹部間關係網絡的訓練場所，中共理論學習和生活實踐交相遞進的教育思路，在黨校可以得到集中的體現。

體現學習和生活實踐結合的要求，黨校的理論學習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時事作為理論與實際結合的良好載體，成為黨校教育的重中之重。早在1939年，毛澤東就強調：

除了這些學問之外，還有時事問題與黨的政策。這兩項，過去的計劃中沒有包括進去，但這是十分需要的，因為這是實際的學問，也就是「今」的學問。

全黨的同志，研究學問，大家都要學到底，都要進這個無期大學。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學校的領導者，就是中央。各地方黨部，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都是這個大學的分校。全黨同志以及非黨的戰士們，都須進這個學校。¹⁵⁰

同年，八路軍總部發出指示，要求在部隊中加強時事教育：「一、所有營以下幹部，分小組組織起來，指定識字的人讀報、書，必須讀完並將社論、專論加以討論。二、所有連排幹部以連為單位，由指導員、文化教員朗讀社論、專論，加以討論，編成教材上課。三、所有連隊戰士以排為單位朗讀社、專論及重要消息。四、責成政治機關定出讀報時間，每天一小時。」¹⁵¹

150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第323-324頁。

151 〈第十八集團軍總部關於加強時事教育的訓令〉（1939年6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由於領導者的倡議，1940年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開辦黨校時，時事政治列入學習的重要內容。時事分析貫通理論和現實，既體現思維方式、理論積澱、判斷水準，又直接面對現實，可以培養分析具體問題的能力。在時事上下功夫，強化黨的理論水準和行動力，開闊黨員視野，常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魯西北根據地幹部宋洪勛1941年記有對時事的熱情和看法：

一鼓氣看了四期新報，真有滋味，國際上變化極大。……看兩集團間的形勢，主要的德、美是敵對主將。英美方面，主要的是先對德，故將來發展，戰場在大西洋，而不在太平洋。美國雖已參戰，但公開宣戰，目前尚有所期待，所以美對日本不願先開戰，英對日更是被動的，而日本亦不願孤注一擲與美火拼，其目的仍在牽制美之援英計劃，以響應自己的南進，不放棄對中國的進攻。美雖與日對峙，但並不馬上開火，所以對中國的援助，亦是不與日決裂為原則的。¹⁵²

宋此時只是身處基層的區委書記，在敵後的環境中，可以獲得的學習機會不多，但他通過閱讀報紙，已能很到位地分析國際間的折衝，顯示不斷教育下中共黨員的時事認知，有可能達到的水準。

時事學習的分量越到後期，越是加重。1941年，中共中央強調：「要提倡幹部與學生看報，指導看報方法，指導他們分析時局的每一變動。」¹⁵³次年北岳區提出的支部教育內容首推「時事教育」。¹⁵⁴從高魯1944年在晉綏黨校學習的記載看，時事政治的學習和討論已經居於歷

152 〈工作日記(1941年3月-12月)〉，《昔墨今史——宋洪勛同志工作手記(1941-1948)》，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6-17頁。

153 〈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年8月1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63頁。

154 〈北岳區黨委關於全面鞏固組織工作的決定〉(1942年12月1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257頁。

倒性地位，這雖和黨校此時承擔的審查幹部功能有關，大體還是反映了抗戰後期黨校教育內容的變化趨勢。

時事學習強調討論，要求學員有思想的碰撞。討論話題多樣，晉綏黨校關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討論涉及：「美英現在是否有反動性？第二戰場進展緩慢，是軍事原因還是政治原因？美對倫敦、波蘭、法國流亡政府的態度如何？為何蘇未參加開羅會議？美英能轉變為民主國家嗎？美英蘇在戰後能長期合作嗎？」¹⁵⁵ 儘管話題廣泛、氣氛熱烈，但大部分人講的還是中共報章上一直宣傳的標準話語，這既緣於學員的知識來源、表達能力及表達環境，也和黨校本身的統一思想要求相關，時事教育的實用性也不一定就能真正強化幹部的知識背景，使之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不過，眾口一詞中，總能看到一抹抹亮色，1977年後曾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的安平生發言談道：

今後世界性的戰爭是不會有了，小的局部的戰爭還會有。所以和平是全世界的問題。美國的道路是德黑蘭式的，就是解決生產力與購買力的矛盾。美國的剝削是相對的，全世界都需要購買力，國內也需要購買力。所以提高工資，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能生活、參加社會活動了，但工作時間縮短，這不是小問題。美國今天走這條路是經過痛苦的，只能決心走下去。¹⁵⁶

這樣的思考即便在多年後看，也具深度，和當年中共的經典表述更是存在距離。安平生的發言理所當然遭到眾人反駁，但並沒有影響他的政治生涯，這體現了在具體問題上，中共願意學員深入思考的初衷及管控上的彈性，時事政治的確又是個比較好的載體。

時事政治運用很廣，抗戰後期，甚至直接使用「時事講習所」的名義訓練幹部。1944年7月，只有18歲的張寅生正在山西陵高縣（屬太行區，今陵川、高平兩縣析置）任中心學區聯合校長，被調去時事講習所學習。在時事講習所，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學習時事政治和政策：

155 《高魯日記》，1944年8月21日，第548頁。

156 《高魯日記》，1944年9月19日，第560頁。

講課人有專員杜毓源，地委組織部長劉毅，宣傳部長劉剛等地委負責人，地委書記江明也去作過幾次形勢報告。一般一兩個禮拜講一次大課，其餘時間都是自學和討論。學校提倡理論聯繫實際，自由思想，自由發言，不同認識可以展開爭論與辯論。通過學習討論，學員們消除了怕變「天」思想及各種糊塗認識，解除了對參加革命工作的種種顧慮。……記得在講習所時期，曾開展過一次全校大辯論，原因是一位學員在勞動中摘吃了群眾一個桃子。當時有的同學說這是違犯群眾紀律，有的說是小事一樁，無所謂。經過兩個多禮拜的大討論，最後形成一致認識：事情雖然不大，但屬於違犯群眾紀律，這件小事大討論，大大增強了同學們的群眾觀念和紀律觀念。¹⁵⁷

作為一個意識形態政黨，統一思想是深入骨髓的內在要求，無論黨校還是時事講習所，討論都不可能是純粹學理的探求，而是達到思想一致的途徑；討論既有深入瞭解問題的一面，更重要的，則在於提供一個思想碰撞和轉變的場所。錯誤思想暴露、輿論引導、集中說服、會場壓力，許多不一樣的聲音在討論中可以像爆米花一樣膨脹、炸出，然後慢慢消弭、轉換於無形。正因此，討論前、討論後學校高層都會提示、總結，把關思考方向和原則立場。1944年晉察冀黨校關於國民黨性質討論的總結中，可以看到其中的巧妙佈置：

主席團五人分工集體負責掌握著論戰的進行，有人專門掌握每時每刻爭辯的焦點，有人專門掌握發言先後秩序，即當時當面提示給值星主席參考，有人專門掌握解剖該種典型思想有關的一些文件，在論戰雙方相持不下時朗讀。……雙方思窮力竭的時候，主席團只得幾度宣佈「交頭接耳五分鐘」，甚至休會一刻鐘，使雙方在三三兩兩的交談中重新組織力量，以便擊敗思想上的論敵。¹⁵⁸

157 張寅生：《自述》，河南新鄉嗣紅印刷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印行，第11-14頁。

158 〈中共晉察冀一分區地委第一期整風訓練班總結報告節錄〉，《整風通訊》第3期，1944年7月20日，第9頁。

討論轟轟烈烈，實質走向則盡在掌握之中，晉綏黨校有人認為「國民黨的成分是小資產階級，國民黨不一定是特務」，¹⁵⁹ 立即遭到校方的嚴肅批評。林楓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談到整個晉綏根據地的討論情況：「開始主張蔣介石有革命性的佔39.3%，主張蔣客觀上起了革命作用的佔28.9%……有的共產黨員竟主張站在第三者的立場評論國共兩黨的問題。」對此，「學委會到思想暴露差不多了，就開始培植正確意見的發展，並嚴格提出駁斥教條主義，一方面供給積極分子實際的材料，以反駁反動言論，於是反動的理論就逐漸佔了下風，擺脫錯誤意見一天比一天多，最後到完全沒有了。」¹⁶⁰ 很明顯，此時展開這一討論，包含著對戰後中國走向的考慮，國民黨作為潛在的對手，定位必須符合政治需要。後來成為林伯渠夫人的朱明回顧自己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思想變化，大致可以見出討論期望達到的結果：

大家都說蔣介石抗日是為了消滅異己，不是為了中華民族。在這種氣氛中，我口裏也不得不跟著大家一樣說，可是心裏卻想蔣介石抗日雖然是要消滅異己，但也是為了中華民族。記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時候，親眼看見中國飛機和日本飛機戰鬥。晚上也聽到中國飛機去轟炸日本軍艦。……過去我一聽到說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哪裏代表什麼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蔣介石，他要復興民族。讀了「七·一」社論以後，我更加明確地知道工農不僅是代表民族的，而且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真正代表民族的只有共產黨。¹⁶¹

159 《高魯日記》，1944年8月14日，第542頁。

160 〈林楓同志向中央並西北局的整風報告〉（1944年7月1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8卷，第307-308頁。

161 朱明：〈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1944年3月7日在三部大會上的發言〉，《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264頁。

討論最後歸結起來就是：「必須使他們瞭解在中國革命中我們的路線和我們共產主義的理想，使他們瞭解三民主義共產主義之一致性與矛盾性，站在自己的階級立場上來認識民族抗日戰爭及其與階級鬥爭的相互關係。」¹⁶²

這裏面，提綱挈領的是階級立場，背後又包含著人格上忠誠的要求，晉綏黨校校長龔逢春談到學習態度時指出：「誠懇虛心是從階級立場出發的，誠懇不單純是老實。虛心才能進步，才能以自己作為模範改造別人，才能以我們的思想改造經濟、文化、思想。」¹⁶³ 階級立場和虛心老實這樣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奇妙地結合在一起，背後蘊含的正是中共期求的信仰和忠誠的統一，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幹部對信仰理解程度不一，卻能忠於黨的事業的一個重要基礎。

奇詭的是，國民黨性質問題討論和當時正逐步發動的「坦白運動」同步進行。熱烈討論的空氣後面，是每一個人都必須直面的過關問題。如此嚴峻的形勢下，仍然可以聽到一些不一樣的聲音，足見意識形態支持下的黨的生命力；討論必須在中共主導的框架裏運行，提出不同意見的安平生能否過關卻又並不完全為發言所影響，這些衝突的情境中呈現的張力，高明的戲劇家也難描摹於萬一。當年，大概也只有像黨校這樣，集中一批優秀幹部，提供討論的平台，擁有相對寬鬆的風氣和一定的理論儲備，才可能上演如此跌宕起伏的改造大戲。

6. 「土包子」?

中共常被對手方攻擊為「土包子」，本身似乎也很樂意接受「土」的標籤，這可能和中共的無產階級政黨屬性相關，承認「土」即意味著和普通的工人、農民站在一起。不過，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中共予幹部

162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對冀中工作的指示信〉（1939年8月11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165頁。

163 《高魯日記》，1944年7月27日，第532頁。

以持之以恆的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訓練，事實上造就了一支知識和專業水準不低的幹部群體，「土」更多只是一種態度，而不一定是事實。即便長征中的軍隊，也不一定像普遍認為的那麼「土」，陳雲寫道：

有一次，紅軍來到貴州某城。戰士們穿著紅軍制服，雄赳赳地直奔城下。這個縣的縣長從瞭望孔裏探出頭來，十分驚訝地看著我們。他想，既然這支軍隊著裝如此整齊肯定不會是紅軍。在他們的心目中，紅軍是「盜匪」，行裝必破爛不堪。他們把我們當成了中央軍，因為滇軍和川軍的著裝比起中央軍來要差多了。

……

縣長見來者不是土匪，馬上打開城門……城裏的頭面人物都來拜訪我們。我們便逐一詢問他們的身份，他們也一一作答，誰是民團指揮，誰是警察局長，誰是縣長等。我們待他們自我介紹完畢後，便把他們統統抓了起來。¹⁶⁴

抗戰時期，由於大批知識分子的加入，中共整體知識水準又有大的提高，時人記載：「八路軍中有三多，即鋼筆多，女同志多，與小冊子多。」¹⁶⁵ 根據地成為文化人的高比例聚集區。同時，中共努力打造一支現代政黨隊伍，各級幹部訓練都很強調領導藝術、工作作風，周恩來曾經概括列寧和毛澤東的工作作風：

(一)列寧的工作作風是：俄國人的革命膽略；美國人的求實精神。

(二)毛澤東同志的工作作風是：中華民族的謙遜實際；中國農民的樸素勤勉；知識分子的好學深思；革命軍人的機動沉著；布爾什維克的堅韌頑強。¹⁶⁶

164 陳雲：〈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1935年10月15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358-359頁。

165 《杜深如烈士日記》，1939年8月5日，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頁。

166 周恩來：〈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周恩來選集》上，第132頁。

這裏談到的列寧和毛澤東的工作作風，背後既有革命的現實動能，也有深厚的文化傳統資源。革命領袖能夠擁有這樣的素質，或可用天才與革命實踐的交互作用解釋，推廣到全黨，則更多依靠培養和訓練。空泛地講中共幹部的水準，不太具有說服力。從當年第一手的中共幹部的會議記錄中，或更能具體看到幹部提出、面對、處理問題的能力。

首先看一份〈冀魯豫區黨委關於湖西工作的討論記錄〉。湖西指中共在微山湖西，以山東單縣、江蘇沛縣、豐縣等為中心開闢的根據地。湖西和山東其他根據地相距較遠，且處於徐州、商丘、荷澤、濟寧幾個城市之間，日軍和國民黨在此均有較強的力量，中共生存發展困難。冀魯豫區黨委會的議題針對的就是這樣的現實。時任冀魯豫區黨委書記的黃敬首先發言，他批評：「最近湖西發的工作指示，一般化一些，不具體，任務提得太多，也高了些。」為會議立下基調，目的就是幫助湖西制訂切實可行的工作方針。

接下來黃敬的發言在在顯示中共已然成形的分析和思維模式。黃敬首先從國際國內的大形勢講起，歐洲局勢逐漸明朗，德國戰敗趨勢明顯，日本不得不有所應對，有可能影響到湖西的是日軍預估中國即將反攻，從而加強對徐州的控制，確保隴海線暢通，這勢必影響距徐州不遠的湖西根據地生存。對此，黃敬提出幾點具體應對意見，包括今後的鬥爭形式應為小部隊分散活動，同時加強一元化領導。如果不熟悉中共的政治文化，看到黃敬把不無對立的分散和一元化領導捏在一起，多少有些不好理解。然而在中共幹部的思維裏，這已成常態。一元化是延安中央提出的概念，黃敬當然必須執行，部隊分散是實際需要，也勢在必行。也就是說，這兩點，黃敬都必須說到。更有意思的是，在黃敬的思維中，這兩個看起來衝突的做法，完全可以巧妙結合：部隊分散，恰恰更需要加強黨的中心領導，強化領導力，抵消部隊分散可能帶來的渙散風險；而黨的一元化領導也正是分散部隊，使之散而不亂的可靠保證。這種系統思維下對辯證法對立統一的具體運用，正是恩格斯談到的：

辯證法不知道什麼絕對分明的界限，不知道什麼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異互相過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並且把對立的東西調和起來；辯證法是唯一適合於自然科學現在這個發展階段的更高級的思維方法。¹⁶⁷

在中共的文本中，「既要……又要……」是屢見不鮮的表達方式，出現頻率之高，使之打上鮮明的中共烙印。這裏面既有這個效率優先政黨的求全資備，也有辯證系統的統籌兼顧，而這兩者又互為促動。儘管實際運作中，「既要……又要……」的面面俱到只能是理想，取捨不可避免，但中共表現出的不放過任何機會和可能的細密，還是讓取捨之間更具張力。

同樣顯示這一點的還有黨的工作。由於根據地生存困難，有些地區的黨需要轉入秘密，但黃敬又強調，湖西地委提出的「一切黨委機關轉入地下」是不妥當的，這將放鬆或減弱對公開的抗日工作的領導，甚至放棄了武裝鬥爭。正確的做法是：「一方面要建設秘密的黨，另一方面必須堅持公開的抗日鬥爭。」

和黃敬的大開大合相比，其他與會者更多在具體問題和策略上著手。蘇振華提到群眾工作問題，「已發動過群眾的地區，現在撥了點錢，應該給有氣的地主消消火，但群眾已得的地位應盡力保持」。這是出於艱苦環境下統一戰線需要提出的策略。張霖之則分析了對敵、對國民黨及中共自身建設等問題，對敵：「保存力量，容易發生不敢打敵人的偏向，少打擊敵人又麻痹敵人，必須運用得適當，有分寸。對偽軍打，是為了爭取其停止向我進攻。」對國民黨：「頑軍多是土著的，帶地方性，不是能打走的，對頑鬥爭必須是長期的。他們不願走，如敵我對其壓力均大，他們可以投敵。故對他們應要求其和我們分擔鬥爭任務。」對自身：「只有上級正確的決議，下面如沒有貫徹決議的幹部，決

167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5頁。

議總是要落空的。故地委除留必要的幹部外，需把幹部拿下去加強縣、區。辦事處可不要，多一級工作更難下達。」¹⁶⁸ 這些討論有大的原則，也有具體的指導，能看到特別明顯的相反相成思維，思想資源當然是辯證法。注意到問題兩個相互對立的層面，並力圖將其融為一爐，這裏面帶來的層次感和複雜性，比之單純的辯證法的領悟和接受，或許在實際工作中更具意義。

接下來，再看一份討論貨幣問題的會議記錄。抗戰時期，敵後根據地一度出現多種貨幣混用的局面，主要包括原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偽政權發行的法幣、根據地發行的貨幣、國民政府新發行的法幣等，這些貨幣激烈競逐。根據地貨幣由於剛剛面世、信用不足，處於劣勢地位。〈冀魯豫區黨委關於財經工作討論記錄〉就是為解決這一問題留下的會議記錄。當時其他根據地多已採取驅逐法幣、只允許根據地貨幣流通的措施，冀魯豫的討論大體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

仍然是區黨委書記黃敬率先發言。黃敬分析了根據地貨幣的三個特點：質量劣勢、數量劣勢、通貨膨脹。冀魯豫根據地發行的魯鈔無論和日偽還是國民黨發行的法幣比，都處於劣勢，並導致嚴重通貨膨脹。當時的形勢，按照黃敬的說法：「法幣有60多種，各有不同的來源（背景，地區）、不同的市場（與不同的商品聯繫著）與出路（不同的法幣來抓不同的東西走）。解決的辦法必據此想出，必須再繼續研究，具體對付，不能一般處理。」此前，根據地已採取抓住主要物資——糧食的措施，試圖通過控制糧食及其買賣穩住價格，提升魯鈔信用、擠走法幣。但根據黃敬的說法，這一辦法效果有限，主要問題是：

(1) 基本區出現與發展了黑市（由集市轉入鄉村），市場由中心區向邊境轉移，中心區市場相對的衰弱，邊境集市相對的繁榮。

(2) 法幣打不下去，而且有某些提高。

168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湖西工作的討論記錄〉（1943年2月26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517-522頁。

(3) 物價極不穩定，魯鈔信用更低(在這一點意義上說，削弱了魯鈔)。

(4) 中心區糧食外流。

(5) 貿易局從上到下的官辦現象(動不動就行政命令解決問題)，單純貿易觀點，資金不周轉，壓了2/3的資金在糧食上。

僅僅統制糧食，還不能解決問題，需要根據地政權進一步組織力量，引導和干預市場。下面一段話就是黃敬提出的具體措施，這些措施綿密細緻，充分顯示他的分析和把控能力：

邊區集市雖多，但主要(支配地位的)集市不多，控制還不難，應派堅強的幹部到那裏開設糧店，任務是向東販，向西南賣(倒糧食很簡單，但做則不易)，必須與兌換發行配合好，有一種行即設一銀行。任務在我分區吸收法幣，兌換魯鈔，到敵區去的商人拋出法幣收回魯鈔。……在我基本區買糧食一定要用魯鈔，使法幣在明暗市上完全絕跡，(用最嚴厲的辦法)使魯鈔成為市場上唯一的貨幣。

……

登記壯年災民，並將老弱災民帶了，一起去運糧，這樣貿易局就有了組織的力量，去逼迫無組織的商人就範，一一掌握物價(有計劃地壓低物價，甚至對少數個別壞的小販可以打擊——自由競爭，使賠本，然後與[其]訂合同，使就範)。可以不用行政手段(除當其違法外)，而用自由競爭的辦法。在敵佔區以黑市(秘密鬥爭)掌握物價。如提價則高價賣買，如要壓低則低賣拋售。到敵區去運糧，必取得[我]敵偽工作的配合，但不妨礙敵偽工作秘密或用收買辦法(力求隱蔽，不公佈，做什麼說什麼，或只做不說，不讓敵知)，並可爭取花生、棗子的出口。主要鬥爭方式是拋出法幣(以法幣打偽鈔)，而以偽鈔打偽鈔在目前則不是主要辦法，但不放棄以偽鈔打偽鈔的可能。¹⁶⁹

169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財經工作討論記錄〉(1942年12月22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336-340頁。

基本思路是充分利用根據地的組織能力，通過有計劃的糧食流動和倒買倒賣，實現對物價的控制，再運用市場工具擠出法幣、改用魯鈔。這中間有行政和組織的力量，堪稱中共的拿手好戲，但是行政的力量又要有個度，這就是山東根據地領導人黎玉曾講到的：「經濟鬥爭主要運用經濟力量，只有萬不得已才採用行政力量。行政力量採用過多，人民的營業自由貿易自由受到不必要的干涉，是會引起人民的不滿的。」¹⁷⁰ 正確的做法是以行政組織和市場買賣相互配合，讓老百姓自願選擇魯鈔，並通過在根據地和敵佔區一吸一放，輸出法幣，回收魯鈔，最後達到魯鈔獨佔的效果。

黃敬講得比較抽象，為方便理解，不妨對具體的操作手法試釋如下：冀魯豫根據地的東邊和西邊的敵佔區糧價有差異，東低西高。此時，由於受旱災影響，根據地出現眾多災民。根據地貿易局可組織這些災民運糧，從東邊用法幣購買運入後，到根據地平銷甚至壓價銷售，使根據地內囤積糧食的商人無利可圖，乃至虧損，被迫與貿易局簽訂合同，服從貿易局管理。用市場手段掌握了根據地內的商人，在根據地推行魯鈔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同時，規定根據地內購買糧食需要使用魯鈔，這樣魯鈔的需求必然大增，法幣的市場地位自然下降，這又會進一步促進魯鈔的需求，形成良性循環。還有就是組織災民將東邊購進的糧食運到價格較高的西邊敵佔區銷售，銷售時規定只收魯鈔。這樣幾次倒弄，經由糧食這樣的大宗商品和生活必需品，魯鈔走上控制地位就順理成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黃敬強調根據地銀行要保證法幣和魯鈔的自由兌換，「兌換率需不斷變的，天天掛牌」，這和多數根據地強制兌換、用嚴厲的行政命令禁用法幣截然不同。

仔細分析，黃敬雖然主張用市場方式驅逐法幣，但這種市場方式後面，又有強大的政權組織，是用「組織的力量」，「逼迫無組織的商人就範」。強大的政治組織和政權資本，構成根據地市場的後盾，這樣的市

¹⁷⁰ 黎玉：〈山東過去對敵經濟鬥爭的認識與今後鬥爭的新階段〉，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編：《鬥爭生活》第28期，1945年7月，第19頁。

場和根據地外自發的市場的碰撞，效能自不可同日而語。多年後，黃敬說的這些場景已成現實，國家資本的力量在當今世界不斷顯現。當年黃敬就能如此熟稔地運用政權資本和市場，達到驅逐法幣的目的，多少讓人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戰時中共領導者的素質和能力，著實不能低估。

事後看，儘管1942、1943年根據地形勢十分不利，冀魯豫努力的結果，還是比較樂觀，1943年12月冀魯豫根據地「魯鈔已佔到優勢了」。不過，有意味的是，黃敬設計的這一套看似絲絲入扣的做法，真正運用到實際中，也不無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壟斷。比如貿易局出面倒買倒賣，不可避免導致囤積行為，並和資本進入市場一樣，表現出逐利衝動，結果是：「群眾要啥我們無啥，群眾有啥我也有啥，我囤積之出發點，有濃厚的營利觀點，未去扶植小生產。」正因此，冀魯豫關於財政工作的報告寫道：「我以小生產做〔作〕為基礎，即表現為生產的渙散性及經營力量小，發展小生產、小農業、小工業必須予以自主，以啟發其經營的積極性。無自由自主就不可能。商業相爭必須予以自由，無此，亦不能啟發其積極性。自由競爭才能利於生產的發展。」¹⁷¹ 看起來，如何處理政府干預和自由競爭的關係，當年，在根據地就已經遇到並有過嘗試和思考了，而他們的問題和現實世界也高度相似。

1943年，景曉村聽過中共山東分局書記朱瑞的報告後感嘆：「全篇總結的系統性、連貫性非常緊湊，尤其是朱瑞同志這個總結，即是問題的前後現象，本質與根源，甚至根源的根源，一層深一層的指出來，而不是各個問題分割的，也不是只是許多問題的現象的排列，這說明了對這些問題認識的系統性與透徹性。」¹⁷² 系統、聯繫、深入，正是中共一直追求的方向。無論是黃敬的發言，還是朱瑞的報告，乃至景曉村對報告的解讀，都可以見出這套政治思維已經在中共黨內深入人心。當年這

171 徐達本：〈財經工作報告〉（1943年12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132-136頁。

172 《景曉村日記》，1943年5月22日，北京八路軍山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渤海分會2012年版，第48-49頁。

些幹部面對問題的細緻設計和敢於探索的勇氣，讓人印象深刻，而這背後，是這個體系不容低估的政治和專業素質。

1949年，曾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記下陳毅的話：「陳毅市長講一小時，述理論對於革命之重要。謂共產黨之成功，由於知識高於國民黨。」¹⁷³ 從知識角度總結國共勝敗，陳毅的確獨具慧眼。這裏的「知識」，應該指的是思維方式、思想資源、理論高度。在這方面，由於馬克思主義提供的精神資源，中共較之國民黨更為系統全面地實現了和西方思想、科學精神、世界性的聯結，明顯高出一籌。老電影人于敏曾經談到他對三民主義的感受：「那時學校的必修課中有《黨義》，即三民主義。但是我很少的社會科學知識已經超過孫文學說的哲學體系。」¹⁷⁴ 這恐怕也是當時許多人的感受。當然，中共的理論高度和系統性思維可以帶來解決問題的強大動能，也因其條理化、合目的性而易於形成模式化的問題，系統性可能是高屋建瓴，也可能是空中樓閣，系統思維的長處和風險本來就是並存的。陳毅講這番話的時候，中共更多享受到的還是系統運作的紅利。

7. 內外結合

即便用嚴苛的標準，也很難否認，抗戰時期中共幹部養成取得的成效。抗戰即將結束時，中共回顧幹部養成工作時曾不無自信地說道：

首先看幹部成分，絕大部分是知識分子，是來自各方面的，過去如此，到現在還是如此。那麼幹部路線是否錯了呢？基本上是對的。在群眾發動之前，提拔大批工農幹部又不可能，這些幹部這幾年來

173 《竺可楨全集》第11卷，1949年6月9日日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頁。

174 于敏：〈重要的是認識自己〉，《于敏文集》第7卷《報告文學·散文》，中國電影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頁。

絕大部分是好的，是有很大大功績的，我們已經歷了極殘酷的環境，這些幹部堅持了工作；許多幹部犧牲了，應該很好地表揚他們的功績，應永遠追慕他們的精神，並循著他們的道路前進。¹⁷⁵

這樣的成效在中下層幹部中體現得尤其突出。當時材料談道：「一個縣委書記可把支部中小組的情形報告出來（不是普遍現象）。如基點村、實驗縣區的建立，這些都是不能忽視的進步。」¹⁷⁶ 抗戰時期縣級乃至專區一級幹部知識分子比例極高，「縣以上知識分子和半知識分子的幹部仍佔百分之九十以上」。¹⁷⁷ 無論對主義、信仰的理解，還是在此基礎上滋生的效忠度，及中共不斷規訓下養成的理論和實踐能力，這些中下層幹部都相當突出，相比國民黨黨員「百分之九十是無所謂的中間分子」¹⁷⁸ 尤其如此。正是他們承擔著上傳下達的重要使命，凝結起更廣大的基層社會，將中共的政策和力量落到實處，使中共的垂直控制體系得以確立。到抗戰結束，可以說，抗戰時期成長起來的這批幹部基本具備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所要求的素質：「領導者必須具備最低限度的一般技術培訓，如果不能獨自『創造出』正確的方案，那麼至少也能知道如何判定由專家所提出的方案，從而以政治技術的『綜合』視角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¹⁷⁹ 「三八幹部」後來在中共幹部體系中以技術官僚特徵著稱，成為共和國最艱困的少年階段事實上的領導基石，和這樣的訓練當然是分不開的。

175 〈徐達本在專員聯席會上的總結報告〉（1945年7月9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601-602頁。

176 〈冀魯豫區黨委的工作總結〉（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160頁。

177 〈五年來工作總結及今後任務〉（1943年8月19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0輯，第41頁。

178 〈紀西關於密縣地委工作的綜合報告〉（1940年），《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449頁。

179 安東尼奧·葛蘭西著，曹雷雨等譯：《獄中札記》，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頁。

養成這樣一批幹部，蘇聯經驗的借鑒不應忽略，這是探討中共革命時時必須面對的問題。更重要的，當然還是中共自己付出的大量心血。灌輸、訓導以及思想的啟發和鬥爭，有共產主義陣營的共性，其中的耐心、細緻和深入內心，又不無中共乃至中國思想的特色。應該指出的是，除了有種種訓練、提升的措施外，中共也不會忽略予幹部以物質上的保障和關懷，強調：「耐心地團結幹部，特別在物質困難時更加重要。」普遍建立幹部保健制度，「根據地收入的千分之三作為保健費用」，¹⁸⁰營以上幹部可以享受醫療保健。晉察冀創立了幹部關懷制度，晉冀豫也要求各級部門「仿冀察晉建立逐級關懷制」。¹⁸¹對幹部家屬有補助措施，王恩茂日記記載：「總政對於參加八路軍三年連以上的幹部家屬困難的，由公家經郵政匯一點款優待解決。」¹⁸²整黨期間，對經濟上有問題的幹部也有內部掌握的處理辦法：「從寬處理是原則，不要預先宣佈。」¹⁸³

所有這些努力，最好的回報當然就是幹部的衷心服膺和習慣追隨，中共基本達到了這樣的目標。沈霞在搶救運動結束後的日記中寫道：

兩星期左右的緊張生活一下子鬆了，今天開始走上正軌的學習時間。但我卻像缺少了什麼一樣。我留戀於過去兩個星期的生活，因為在那樣的生活裏，我遺忘了自己，我為一件中心事業所吸引著，全心全力用在那上面。私人的一切想頭均遠遠地離開了我，我也很少想到生活。日子過得快而輕鬆，有意義。有內容，這是我追求的。¹⁸⁴

180 〈關於部隊組織工作的幾個問題〉（1941年8月），《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7卷，第174頁。

181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一九四一年工作計劃〉（1941年2月23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4卷，第160頁。

182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1939年2月22日，第419頁。

183 〈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關於建政問題結論〉（1940年4月24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四——政權建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頁。

184 沈霞：《延安四年》，1943年7月29日，第113頁。

這樣的心態不僅僅屬沈霞個人，而是一代人的共同經驗。理念上他們接受了中共的宣導，生活方式上甚至也習慣了高度緊張的「運動」，這是日後無論領導者還是普通幹部某種程度都存在運動依賴的心理背景。中共思想統一不僅僅在於壓倒了外面世界的話語，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邏輯，這樣的邏輯如流動的鐵水，軟軟卻不由分說地漫過，水過處，凝結的即為堅硬的意志。

當然，歷史並不總是這樣簡單，當沈霞為自己成為一顆革命運動中的螺絲釘而欣喜時，她又在感嘆：「人是很複雜的，感情更複雜。在自己稍一疏忽的時候，什麼問題都會發生。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在我說來，的確不像過去那樣自然，是處處留心著的。精神都是提高到最緊張點。因為唯有這樣，才能糾正自己。……整風整得大家都嚴肅了，彼此看著，想不出什麼適當的話來說。」¹⁸⁵ 作家王林應程子華要求提意見時，說出的內心感受也堪稱震撼，這些意見包括：

全黨一元化後，缺乏「法治」精神，黨領袖的話即是法律，給群眾影響很壞。

黨內的身分制，做黨工作者反映問題即一百一，做群眾工作者則不值錢。

政權對黨不是研究如何正確執行黨的政策，而是向黨問問題，黨是命令，執行黨的路線，如果黨不贊成，仍是違反黨的紀律。

「朕即國家，我即上帝」味太濃。

……

民主作風，越下級則越微乎其微，所以在村中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士紳和群眾則認為「天下老鴿一般黑」。¹⁸⁶

185 沈霞：《延安四年》，1943年1月4日，第60頁。

186 王林：《抗戰日記》，1944年5月5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69頁。

王林還形象記錄了一些官僚的做派：「當眾喚他光人不高興，非叫個主任才樂，誰會當場恭維即是組織觀念強。他做報告和總結，別人若增添點比他高明的意見即覺得不快，悻悻然之色形於外。來到路東，開慰勞安國送公糧民兵時，也要講講話——建立威信。」¹⁸⁷ 王林所說的並非個案：

× 縣縣長弄得科員們輕易不敢見他的面，萬一因事非見不可，那就90度鞠躬立正姿勢顛顛顛顛，唯唯諾諾。陽城科長們下鄉檢查合理負擔，工作回來的彙報都是「下達沒有問題」。五區助理員下鄉檢查屯糧工作，村幹部問他該怎樣作，他的答覆是「照指示信辦好了」。在重劃行政村時，某村群眾因貪污到區請願時，區長說「你們都是搗亂，惹的我生了氣，槍斃你們三兩個，我看什麼事就都沒有了。」

這些揭示了政治服從和思想一律氛圍下的另一面，權威的建立在實際運作中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具體的人，說一不二的權威，很容易造成權威濫用，成為官僚的活標本，這是效率優先追求難以避免的代價。效率優先帶來的另一可能後果是疲於應付的形式主義，太岳的文件提到一個縣長的抱怨：「一個月開會20天，每天批閱公事多半天，筆記本記得滿又滿，誰有工夫在會後去翻看。加上零碎事都得管，伙夫每頓作飯下米，弄得人頭暈眼花、身體發酸。」¹⁸⁸ 張聞天批評幹部高高在上的幾種表現：

- (一) 只提主觀要求，不調查實際情況。要調查，就叫人家調查，自己不調查，於是把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庸俗化。……
- (二) 只知道開會發言，不聽群眾意見。會議是無休止的，而群眾的話是聽得很少的。

187 《王林文集》第5卷《抗戰日記》，1940年11月5日，第203頁。

188 〈豫晉區工作檢查總結〉（1943年），《太岳抗日根據地》，第165-166頁。

(三) 領導一窩蜂式的下來，再加上走馬看花。

(四) 總是要群眾提出問題，但實際上又不解決問題，於是群眾再也懶得提問題，認為不頂事。

(五) 只知道佈置工作，催幹部辦事，但具體檢查是沒有的，有也是形式的。¹⁸⁹

效率優先背後的形式主義，很令領導者頭疼。形式主義是一種冗餘行為，導致大量的資源閒置和浪費，常常見物不見人，讓社會政治生活變得機械、冷漠，因而不為任何政治力量所樂見，張聞天的批評針對的就是這一點。不過，如美國政治學家安東尼·唐斯論述的，閒置資源也有其存在的理由：「閒置資源的優點，除了減少內部摩擦之外，本質上還能對付不確定性。因此，那些在高度不確定環境中運作的官僚組織，擁有大量的組織性閒置資源可能根本就不是浪費行為，而是適應性需要的一種理性反應。」¹⁹⁰ 人們追求的效率或許正是以大量閒置資源的後備為代價，效率優先帶來形式主義，造成巨大的浪費；但吊詭的是，千千萬萬的形式主義，卻又可能意外地湊成高效。因為一個系統往往存在多個的傳導和調節機制，其中某個機制如果突然失效，之前看似無用的閒置資源就可以迅速補位。比如2020至2022年內地的新冠疫情管控，的確存在大量的形式主義，但又達成了相對其他政治實體更有力的防範力度，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形式主義造成的大量閒置資源，常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又發揮作用，儘管這種閒置資源的巨大消耗，是任何政治力量都不能不掂量的成本。理想主義者可能會追求既有控制力度又能夠防範形式主義的結果，但身在其境的人多能感覺到，這兩者就是一對雙生子，實際運作中幾乎無法分開。最初的選擇往往已經決定著遙遠的結果。

189 張聞天：〈基層是檢查領導工作的一面鏡子〉（1942年8月20日），《張聞天文集》第3卷，第124頁。

190 安東尼·唐斯著，郭小聰等譯：《官僚制的內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頁。

總體看，抗戰期間，中共通過一系列的組合拳把知識分子為主的「三八幹部」導入自己的軌道，新知識分子的加入，提高了黨的整體素質，卻未減損黨的紀律，反而通過訓導思想者完成思想的一律，進一步強化黨的機器，提升信仰的堅固度。在革命理論的感召及黨的強大組織、宣傳、訓導下，這些最初多是懷著救亡情懷投身革命的幹部已經自覺服從黨的意志，這正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標。在此過程中，中共努力保持彈性，統一思想需要政治控制作為前提，展開的方式希望通過說服而不是壓服達到，明確的目標輔之靈活的手段，內的自覺是基礎，外的規訓是手段，可以說，這是中共能夠持續獲得活力的關鍵所在。中共這樣的規訓方式，可以在許多具體問題上找到例證，戰時對幹部婚姻的管控即為一例。

二、婚姻限制下的掙扎與皈依

1944年秋，八路軍幹部劉榮奉命奔赴前方。行至拒馬河畔，順坡而下時，「猛一拐彎，突然與一位青年姑娘碰頭。她細高個兒，妙秀動人，問了道，彼此看了幾眼相背而馳，走了很遠她還是深刻地在我腦子裏印著。」¹

這是劉榮日記中記述的一個場景，相逢中一點心意的激蕩，最能撥動青年人的心弦。戰爭年代，朝花夕逝，生死無常，這一點點美好尤足珍貴。抗戰時期，中共政治管理空前嚴密，政治權威深入內心世界，也滲入個人情感等私領域，加之戰爭的緊張形勢，普通幹部的婚姻已處於約束之下。有意味的是，這樣一個牽涉極廣、難免不讓血氣方剛的青年幹部在愛和性方面倍感苦悶的措施，在中共的控制體系內，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就順利落地，甚至中共中央都無須出面做出正式規定。儘管對軍人的婚姻管控在中國不自中共始，但中共婚姻管控達到的程度，卻是其他政治力量無法想像的。

戰時婚姻限制的規定主要影響的是抗戰期間加入中共陣營的「三八幹部」群體，這一結果亦饒有意趣。「三八幹部」普遍具有較高的知識程度，相應地亦具有充沛的個人情感，恰恰是這樣一批人，卻需要面對嚴厲的婚戀限制，可以想像，這中間將會呈現怎樣的複雜關係。當婚姻限

1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10月22日，第223頁。

制風起青萍之末時，正值整風運動浪成微瀾之間，整風運動將共產主義運動獨特的思想鬥爭特質推到一個新的高度，思想彙報、交心、學習討論、批評與自我批評，通過系統的思想改造，形成集體主義不可移易的邏輯，而革命陣營向黨的傾心靠攏，又是整風得以順利推進的基礎。就整風本身言，或許並沒有針對婚姻限制的意圖，但正如時人所言：「整風就是整的我們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應該貫串到一切問題上，即使是夫妻間的關係問題上也應該如此。」² 整風為在婚戀限制中陷入困惱的年輕幹部群體提供了一定的化解苦悶的思想資源。當人們批評中共歷史研究中過於簡單化的「政策—效果」模式時，卻又可以在這裏看到另一番景象，即政策的溢出效應，政策推行過程中邊界不斷拓展，達到事先甚至未慮及的範圍。系統運作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特性，讓這樣的案例頻頻出現。

當然，即便有紀律懲戒和思想教化雙管齊下的舉措，即便有革命陣營傾心向黨的自覺，婚姻限制對於幹部群體產生的衝擊仍然不是那麼容易完全消解，心靈的震蕩還是在當事者內心不斷上演。從這種震蕩及其化解中，可以深刻體驗到中共政治文化的成形及影響，也可以發現黨組織的雙重面貌，黨的力量和黨員形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樹立的。

1. 「二八五團」

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兩性關係融入世界主流的認知，一直在穩步推進。這其中，中共作為一個具有國際主義背景的政黨，一個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力量，對兩性平等、愛情和婚姻自由尤為堅持。一直生活在大後方的馬千里到延安後在日記中寫道：「到延河洗浴，有一青年男子赤身露體洗浴，旁邊的女同志一點也不在乎。封建殘餘在延安解放

2 略：〈對於一個具體問題的檢討〉，《晉綏學訊》第1期，1943年3月15日，第43頁。

了的男女身上被掃除得淨光，可喜。」³兩性的禁忌通常以神秘化的方式表現出來，要打破兩性間的禁忌，破除性的神秘自然是一條重要途徑；在這方面，中共以一個雷厲風行的革命黨的決絕，走得比其他政治社會力量更快、更遠。

愛和婚姻自由是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取向之一，然而，當婚姻自由遇上民族戰爭，向來走在婚姻自由前列的中共，也不得不選擇了現實的道路。和之前倡導婚姻革命相比，中共抗戰時期的婚姻政策明顯有了變化，下面一段話大致是戰時中共婚姻政策的體現：「①經常進行關於包辦婚姻及早婚之害的宣傳，並強調政府婚姻法之正確及莊嚴。②對一般人不要強調自由戀愛，對身感痛苦之婦女，揭露舊社會制度之罪惡，使積極參加解放事業。③對一般的婚姻糾紛，應採取息事寧人、促進家庭團結的態度。」⁴從法律、穩定的角度而不是從激烈革命的角度對待婚姻、家庭，「不要強調自由結婚，不要去幫助他們離婚」，⁵成為這一時期中共家庭、婚姻政策的主流，這也是抗戰時期中共社會政治政策總體趨向緩和的一部分。

戰時中共婚姻政策的最重要變化，就是後來被稱為「二八五團」的婚姻限制性規定。所謂「二八五團」，即各根據地對幹部和軍人結婚條件做的限制的簡稱，這些限制包括：28歲、5年黨齡、團級幹部等。因為中共中央沒有做出統一規定，具體條件各地不完全一樣，也有規定25歲、8年工作歷史、團級幹部的，在後方的陝甘寧邊區，級別可以放寬到營連級。因此，各地簡稱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地區稱為「二五八團」、「二五八七團」等等。不過，無論具體條件如何，結婚需要滿足年

3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1年5月6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頁。

4 〈魯西婦救總會關於今後婦女工作的決議〉（1941年6月16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640頁。

5 鄧子恢：〈在淮北第一次婦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41年9月7日），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淮北分會等編：《鄧子恢淮北文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頁。

齡、工作歷史或黨齡、級別三方面的條件則是一致的。之所以如此，當然是出於鞏固自己隊伍的考慮，按黃克誠的說法就是：「因處在敵後環境中，結婚幹部過多影響鬥爭和工作，故必須作一定的限制。」⁶

和中國眾多規制都出現於國家權力逐漸伸展的近代一樣，對婚姻的限制也和國家近代化的趨勢相應。傳統中國軍隊沒有形成關於婚姻的規制性條款，1920年代，當有人注目於此時，幾成笑柄。當時雜誌寫道：「馮玉祥前於開封發表訓話，對所部之婚姻，嚴加取締，一時傳為趣談。」⁷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軍人管理逐漸向近代化方向靠攏。1931年2月，軍政部發佈〈陸軍軍人婚姻規則〉，規定軍人訂婚時須「報告呈候所屬長官審查核准」，「一、在戰時或在防務吃緊時，二、結婚後其應得收入尚不足以維持軍人相當生活時」，可停止訂婚人結婚。配偶有下列情況禁止訂婚：「一、非中國國籍者，二、反革命確有證據者。」⁸ 1934年12月，在規定實行義務兵役制的《兵役法》公佈一年後，國民政府公佈〈陸海空軍軍人婚姻規則〉，大體沿襲了陸軍的規定，增加條款為：「陸海空軍學生暨一年以內短期訓練之學員，在肄業期間，及現役初年兵二年兵，均不准結婚。」⁹ 這是中國以中央政府名義限制軍人婚姻的首個條款，與義務兵役制差不多前後腳出台，當非偶然，是國家權力下沉、國家管控要求逐漸增強的結果。

不過，國民政府公佈的婚姻規則只是限制了新兵結婚，老兵和軍官不受約束。1930年，陶孟和調查山西一個警衛旅，925人中，已婚者

-
- 6 黃克誠：〈目前軍事建設中的部隊政治工作〉（1942年2月10日），《黃克誠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頁。
- 7 〈又有一個取締軍官婚姻者〉，《坦途》第6期，1928年1月16日，第24頁。歷史上，太平天國實施男營、女營制度，嚴格管控男女性關係，近於禁欲，這和近代以來實施的婚姻資格限制相去甚遠。
- 8 〈陸軍軍人婚姻規則〉，軍政部公報編輯處：《軍政公報》第103號，1931年6月10日，第20-21頁。
- 9 〈陸海空軍軍人婚姻規則〉，國民政府文官處：《國民政府公報》第1628號，1934年12月29日，第1-2頁。

249人，未婚者676人，已婚比例達到26.9%。¹⁰ 國軍官長結婚比例更高，2005年的一個訪談中，抗戰時期住在浙江桐廬的吳淑芳回憶：「國民黨軍隊裏好像還有隨軍的家眷。記得我家住進過一支國民黨部隊，帶頭的是一個團長，廣東人，他把他的父親以及妻子都帶在了身邊。」¹¹ 國軍官兵戰時攜帶家眷鬧出許多荒唐事：「一連太太二十多，宿營二日不能辦公，馬弁皆忙著為太太老爺找房子。」打起仗來，姨太太成為掣肘，「一連長指揮隊伍作戰，一手舉著手槍，高呼：『打啊打啊！』兩個姨太太拉著皮帶嚷：『走，走，我怕我怕！』」¹² 國軍戰鬥力不彰固然受多種因素影響，家屬隨軍不能不說也是原因之一，中共在這方面嚴加限制，和這種近在眼前的教訓或不無關係。對此，即連國民黨本身也有反省，陳誠曾設想：「戰場不許住家眷，以軍為單位，分配地區駐紮。」¹³ 1948年底，國民黨在大陸統治行將崩潰時，蔣介石也意識到軍人婚姻的重要性，計劃：「一、嚴禁軍人在戰區結婚；二、軍人結婚必先在國防部登記批准。」¹⁴

相比國民政府控制力的有限推進，中共的權力伸展要遠為寬泛，體現在婚姻問題上也是如此。中共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意識形態政黨，嚴密的組織意味著嚴格的紀律。儘管大多數時候，紀律不應抹煞個人的私生活，但作為一個強調無條件獻身的政黨，尤其是一個高度重視內部組織純淨的政黨，對黨員實行全方位的管控幾難避免，戰爭環境更予這種管控以更大的邊界。在1937年黃克功案後，毛澤東到抗大作「革命與戀愛問題」講演時，就提出共產黨人的婚戀三原則，包括：「革命的原則，

10 陶孟和：〈一個軍隊兵士的調查〉，北平社會調查所編：《社會科學雜誌》第1卷第2期，1930年6月，第105頁。

11 《烽火歲月中的記憶：浙江抗日戰爭口述訪談》，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頁。

12 王林：《抗戰日記》，1940年5月8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76-177頁。

13 《胡宗南日記》上，1944年9月2日，國史館2015年版，第374頁。

14 蔣介石日記，1948年12月18日。

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和自願的原則。」¹⁵毛澤東提出的這三個原則，成為戰時中共黨人處理婚戀問題的指針。1940年，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做報告，根據毛澤東的三原則對黨員的婚姻問題做出更明確界定：「第一，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礎（同是黨員或是同情者）；第二，要工作上能互助；第三，要相互有愛情。」¹⁶以此，政治上的共同基礎成為先決條件。結婚不僅是個人問題，更是組織行為，應該報告組織並得到組織批准。在長期有父母包辦婚姻傳統的中國，這樣的措施實施起來的確也不是那麼突兀。按照聶榮臻的說法：「我們目前正處在最艱苦的鬥爭環境中，就是討老婆也是絕對不應該的。我們的幹部在這些地方必須以身作則。如果每一個人討一個太太式的老婆，弄到一個特務員，背個駁殼槍，那就等於把八路軍的傳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¹⁷

從現有材料看，抗戰時期，中共各地黨組織對幹部和軍人結婚已有限制。黃克誠1942年談到的條件比較有代表性：「對幹部婚姻問題，除毛澤東同志所指示三個條件外，必須團級或科長以上幹部，男年齡在二十八歲，鬥爭歷史五年以上者，女子二十一歲以上者才准結婚。」¹⁸淮北區黨委規定：「在戰爭時期外來地方工作幹部之結婚條件與部隊工作幹部一樣，即在抗戰時期縣以上的幹部、年齡滿二十八歲、參加革命鬥

15 毛澤東講話原文似尚未公佈，轉見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三，《中共黨史資料》第11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頁。黃克功案，1937年10月5日，抗日軍政大學教官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槍殺陝北公學女學員劉茜。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決定處以死刑。12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決死刑，立即執行。

16 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擴大幹部會議上的結論〉，《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1冊（文獻選編），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頁。

17 聶榮臻：〈幾個月來支持華北抗戰的總結與我們今後的任務〉，《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1冊（文獻選編），第119頁。

18 黃克誠：〈目前軍事建設中的部隊政治工作〉（1942年2月10日），《黃克誠軍事文選》，第179頁。

爭五年以上者，始具結婚條件，並越級批准後始得結婚。」¹⁹不過，此時各地政策不一，晉察冀等地要求比較嚴格，有些地區則比較寬鬆，1943年，129師的報告說：「對於幹部婚姻問題上，只要對方政治背景不複雜，而又在男女雙方自願原則下，按政府婚姻法令，一般是可以的，不能以一些條件來限制。不能規定以哪一級幹部及年齡為標準。」當然，該報告也強調幹部結婚需得到批准，提出「抗戰勝利以後再結婚較好」。²⁰

抗戰結束的勝利聲中，結婚限制出現鬆動，以致發生「亂找對象，欺騙組織和隱瞞年齡，不經批准就結婚等」²¹現象。1945年12月，冀南軍區三分區發出〈關於幹部婚姻問題的補充指示〉，予以嚴厲制止。條例規定：「在今後六個月，緊張工作時期對營以下幹部婚姻一般的不批准，……幹部人員要求結婚找對象，必須先報分區組織科及黨委會考慮批准才能進行。」²²和各地普遍限制到團級幹部不一樣，這個規定只限制到營級，這既有可能和抗戰結束整體氛圍比較寬鬆有關，也和婚姻限制沒有統一標準，更像是中共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共謀相關。大規模限制幹部婚姻和中共秉持的婚姻自由理念相悖，以中央名義制定正式的婚姻限制條款多有不便。在此中共的機動靈活和上下通暢的運轉發揮了作用，各地自行出台的婚姻規定自覺承擔起為中央把關的責任，而共產黨人的紀律及自覺又能保證這種沒有得到中央公開授權的規定可以順利實

19 〈中共淮北區黨委關於外來的地方工作幹部結婚的通知〉（1944年8月10日），G004-001-081-015，安徽省檔案館藏。該檔案由張藍天提供，特此致謝。

20 〈蔡樹藩同志在一二九師組織工作、地方部隊政治工作會議上的結論〉（1943年4月），《一二九師晉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戰史編輯室1962年版，第619頁。

21 〈關於幹部婚姻問題的補充指示〉（1945年12月20日），《冀南黨史資料》第3輯，冀南革命根據地史編審委員會1988年版，第317頁。

22 〈關於幹部婚姻問題的補充指示〉（1945年12月20日），《冀南黨史資料》第3輯，第317頁。

施。有意思的是，後來取消這個規定時，卻用了中央的名義。1949年底，中共中央組織部發佈指示，提出：「黨員幹部婚姻問題，過去規定要有6年黨齡、8年工作歷史、縣團級幹部等條件方准結婚，已不適合於今天情況，這種限制應予取消。」²³一立一廢間的微妙區別，頗堪玩味。

三年內戰爆發後，戰爭形勢緊迫，各地出台了更為明確的相關規定。1946年9月，東北局發出通知，闡明限制幹部結婚的理由：「為鼓勵全軍鬥志，以便集中全力打擊敵人，為保障我黨我軍組織上、政治上、思想上之鞏固與純潔，嚴防腐化墮落現象之發生和不使一個奸細分子混入或利用男女問題作鬼，因此，對於幹部結婚要求不能不有所限制，結婚條件亦須略微從嚴。」具體條件包括：

(一) 從本決定發佈之日起，八個月之內禁止結婚。(二) 八個月期滿後要求結婚者，需具下列條件：甲、軍隊為現任團級或相等於團級之幹部，地方現任縣級之幹部，黨齡七年以上，年齡二十八歲以上者。乙、結婚對象最好是共產黨員，至少是政治純潔，來歷清白，且有可靠證明者。未成年(年滿十八歲為成年)之女子禁止與男子結婚。

滿足條件者結婚也需經相應機關批准：「男女雙方均需經縣委以上黨部，團以上政治機關作政治審查，經批准後方可結婚。批准之權，屬地方黨政人員者經地委批准，屬軍隊人員者，在地方部隊屬分區政治部，在主力部隊屬師、旅政治部，在軍區縱隊各直屬機關屬軍區縱隊政

23 〈中央組織部關於黨員幹部婚姻問題的指示〉，1949年12月28日，河北省檔案館藏245-1-50；轉見張志永：〈建國初期幹部婚姻問題辨析：以1950-1956年河北省幹部群體為例〉，《政黨與近現代中國社會研究——「中國政黨與近現代社會的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頁。

治部，總部直屬隊人員由總政治部依情形臨時酌定之。」²⁴ 東北局的文件發出後，影響重大，各地多參照東北局的條文對本地區結婚條例做出規定，比如冀熱察區的規定中明確說是「根據東北局分局總政治部指示」制定本地區規定。內容大體沿襲東北局，稍有變動，延長了禁止結婚的時間，「在一年內一般幹部禁止結婚與訂婚」。同時規定：「絕對禁止與當地地主富農之女兒結婚（已是共產黨員而參加工作者例外）。」²⁵ 也有地區乾脆規定：「戰爭期間，各機關部隊學校及各企業部門全體脫離生產人員，一律停止結婚，以減少拖累，提高工作效率。」²⁶

戰爭狀態下，直接和士兵發生緊密聯繫的中下層軍官能不能和士兵同甘共苦，勢必影響部隊的凝聚力；限制中下層軍官的婚姻，既可以排除家庭的雜念，又可以讓普通士兵感受到官兵平等的氛圍，不能不說是一個容易想到的辦法。而中共的集體主義邏輯及管控能力既予這樣的規定以精神支撐，也保證規定能夠得到有效執行。正因此，即便符合結婚條件的帶兵官，結婚後也特別注意夫妻相聚有可能帶來的影響，太岳縱隊明令：「各級首長、各同志的女人，如因事到部隊住宿，按情允許，但時日不應過多，以免妨害工作。」²⁷ 新四軍金蕭支隊的楊思一²⁸ 妻子來聚時，「宿至半夜，怕老百姓有反映，又找到老百姓家去睡了」。²⁹ 按照

24 〈中共遼東省委轉發東北局關於幹部結婚的規定〉（194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遼東省委檔案文件彙集（1946-1947年）》，遼寧省檔案館1986年版，第235-236頁。

25 〈冀熱察區黨委組織部，軍區政治部關於幹部婚姻問題的決定〉（1947年10月25日），《河北婦女運動史資料選輯》，河北省婦聯1983年版，第278頁。

26 〈隴東專員公署命令〉（1947年9月12日），甘肅省慶陽市檔案館24-98。該檔案由盛差偲先生提供，特此致謝。

27 〈關於部隊女同志參加社會婦女工作的指示〉（1942年6月11日），《陳賡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頁。

28 楊思一（1901-1957），浙江諸暨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曾任諸暨縣委書記、寧紹特委書記、會稽地委書記，組建新四軍金蕭支隊。

29 《楊思一日記》上冊，1945年8月6日，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金蕭分會1997年版，第188頁。

中共追求的軍地一體原則，限制中下層軍官，不限制地方，難免造成地方和軍隊間的不公，予前線將士以不良觀感。何況，中共一直強調軍隊和地方融合，軍地之間本來就經常相互轉換，地方開了婚姻限制的口子，勢必給軍地轉換造成困難，因此，在中共的系統運作邏輯下，幹部婚姻實施全體的一刀切限制，勢成必然。

2. 性苦悶

儘管中共實施婚姻限制有其充足的邏輯，但具體到每個個體，在當年的社會，28歲(或25歲)、5年黨齡、團級幹部的確是一個不低的門檻，大量適齡幹部因此被擋在了婚姻門外，為此焦灼、苦惱。劉榮日記中寫道：「在下級幹部中關於婚姻問題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痛感，有時充滿胸懷。」³⁰ 這種不滿情緒甚至會以一種講怪話的方式反映出來，張南生³¹的日記中記載，精兵簡政期間，面對可能被精簡的威脅，有幹部在發言中提出：「建議首長艱苦奮鬥，也不要結婚，渡過兩年苦難，因結婚是一種浪費。」³²

從中共幹部的日記中不難看到因為愛和性無法得到滿足的苦惱，這是活生生的人的苦惱：

這幾天，總是想理想中的對象，有時想得厲害時，同樣也反映到夢中，往往在夢中是那樣美滿，醒來時令人多麼失望難過。推想在革命隊伍中的青年，戀愛問題是頭等大問題，這個問題適當解決，對於精神上的安慰、工作的積極心及進取心都有很大幫助，這個問題又不能適當解決，確實是常常心神不安。

30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8月1日，第190頁。

31 張南生(1905-1989)，福建連城人。1930年參加紅軍和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曾任一二九師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等職。

32 《張南生日記》，1942年1月29日，出版者不詳，2007年，第281頁。

性的問題不能解決，往往會手淫，或遺精，但仍然解決不了問題，形成精神上苦悶。我自己生長在不幸的社會裏，今天雖已擺脫，但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主要因戰爭關係）。³³

性的衝動難以抑制，劉榮日記中有不少性衝動的記載：「不知怎麼一回事，性欲衝動，手淫了一次，本來這在決心禁絕之內，然又犯了。」³⁴ 中共幹部中，像劉榮這樣坦率留下性要求的記載不多，但也不是絕無僅有，晉察冀8分區20團團長竇尚初到延安後反省自己找老婆的標準：「『我的條件有三：一、人，二、活人，三、女人。』雖然是玩笑，但可以代表我很著急的思想。」這種著急的心情導致整風學習時也常常走神：「心想蘇杭二地的美女，假若到了新四軍，豈不早就解決了嗎？家鄉（安徽）婦女也多呀！」³⁵ 作家王林情感更為充沛：「性的問題，有時衝動得非常厲害，渾身好似觸了電般的麻木許久，這一時期恨不抱著個女人把她抱酥了，並且急得胡思亂想，尋找任何發洩的可能。」³⁶

對愛和異性的渴望，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見到女同志總要看幾眼，不由得精神所驅使，青年人想對象差不多，哪一天都不能例外，自己差不多十天就有九天都是在想。」³⁷ 時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的張子珍³⁸ 在日記中自省，劇組排演《沁源圍困》，他積極提意見，目的則是「想多

33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4月18日，第143-144頁。

34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年12月15日，第88頁。

35 竇尚初：〈學風學習初步總結——1944年8月17日在二部大會的發言〉，《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234頁。

36 王林：《抗戰日記》，1939年9月24日，《王林文集》第5卷，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114頁。

37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5月27日，第157頁。

38 張子珍（1918-1967），山西應縣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曾任山西決死第一縱隊連指導員，第五十七團總支書記等職。

接近些人，特別是女同志」。³⁹ 日常生活中，年輕未婚男子嚮往異性的明顯表現就是湊在一起談論異性和性的話題，劉榮日記中有不少相關的記載：「昨晚同室幾個人扯了很久關於女人問題（包括心理方面、南方女人是浪漫情形、男女間性交問題等），大家都很有興趣談和聽。走馬，終日頭暈。」⁴⁰

長期缺乏異性的環境，還可能影響到性取向。王林日記提到：「亞六放哨的一排戰士，多山西人，入伍大約一年多。他們有點性的變態表現，例如摸年幼而漂亮的小同志的臉蛋，摟抱打鬧，胡罵。他們表示親愛就用這法。」⁴¹ 如果說這還只是稍顯曖昧，晉察冀一分區地委整風訓練班上幹部的坦白更為直接，91人中，坦白「曾發生過雞姦的僅部隊中共9人」。⁴² 晉察冀軍區的王紫峰⁴³ 日記中記有一個悲劇性的案例：「二營第八連連長黃士昌今天上午服毒自殺。原因是政治上不進步，與通訊員發生不正確的舉動，上級首長發覺後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本人感覺不好意思，因而服了毒。我們想盡各種辦法替他解毒無效，因而死去。」⁴⁴

不僅僅是男性，戰時根據地的女性也在承受著愛和性的煎熬。王林的日記記載了一些婦女幹部特殊的愛戀狀態：「抗戰中產生了這種女性，政治上相當進步，但是歲數大了，生理上要求戀愛，平日克服著，內心總在鬥爭著。突然有一天生理戰勝了政治自持心，立刻饑不擇食地

39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年7月24日，中共雁北地委黨史辦公室、應縣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1984年版，第75頁。

40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5月28日，第157-158頁。

41 王林：《抗戰日記》，1939年8月8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82頁。

42 〈中共晉察冀一分區地委第一期整風訓練班總結報告節錄〉，中共晉察冀分局整風委員會編：《整風通訊》第3期，1944年7月20日，第10頁。

43 王紫峰（1905-1994），湖南耒陽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曾任冀中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晉察冀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等職。

44 王紫峰：《戰爭年代的日記》，1940年6月7日，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頁。

抓一個男性。弄一個時期，政治自持心又起了作用，同時再發覺了對方有弱點，於是又冷淡了。」他進一步發現：

今天我到老黃居處，見房東數婦女，其表情態度完全近於性的狂放。她們歌唱，她們放聲嘻笑說話，用一種色情的眼神看人——真是像吃了男子般的。據說有抗屬。

抗戰中，一部分男子得不到老婆的交合，同時又有大部分女人老守空房。同時這光棍男子又與守空房的婦女日夜見面，這中間必然弄成反常的表情和反應。⁴⁵

房東婦女的反常表現，更多代表的是下層婦女的反應，緣於後方男女比例的失調，女性遠遠多於男性。作家陸地⁴⁶在山西文水遇到這樣的場景：「我們一大幫子男人光著膀子在抹身擦澡，可是好幾個中年婦女卻滿不在乎地來到我們身邊，和我們一道洗頭、洗衣服什麼的。叫你更為大吃一驚的還在於她們上身居然光著膀子，讓兩隻木瓜似的大奶頭搖搖晃晃，花布的短褲，吊在膝蓋上面，露出半節大腿，羞得我們不敢抬頭正視，趕緊抱起衣服跑開。她們卻在後嘻嘻取笑。……戰爭的怒濤把男人都捲走了，你能怪她們女人變態？」⁴⁷

相對而言，幹部陣營的男女比例則恰恰相反，女性比例遠低於男性。正因此，女性幹部結婚條件只有一定的年齡限制（各地規定不一，多從18歲到21歲），以及要求結婚對象為黨員。當許多男性幹部為結婚限制而苦惱時，女性幹部更多表現的是對結婚的恐懼。中共革命倡導的男女平等予女性以強烈的自我實現要求，革命陣營中特別強調的「進步」觀念又讓人們生出爭先恐後的強烈追求。問題是，由於歷史、現實及女

45 王林：《抗戰日記》，1940年11月21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05-206頁。

46 陸地（1918-2010），原名陳克惠，廣西扶綏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工作。

47 陳南南、陳田田整理：《陸地文集》第6卷《日記》（一），1945年7月5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99頁。

性生理本身的特點，女性仍然面對許多或明或暗的束縛，特別是需要在生育上承擔更多的責任，因此面對婚姻，女性多會生出一種「怕」的情緒，這種「怕」不完全是針對婚姻生活本身，更多是緣於婚後有可能的不進步。後來成為王林夫人的劉燕瑾⁴⁸在與王林談婚論嫁時，不期然就產生了「一種無形的恐怖」：「結婚的日期是一天天的迫近了。沒有半點的成就，結了婚以後又怎麼辦呢？不久再懷上孩子又怎麼辦呢？」⁴⁹李銳的夫人范元甄⁵⁰婚後感嘆：「生孩子，對於女人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關頭。……帶孩子，妨害自己。」⁵¹沈霞到延安後和青年文藝工作者蕭逸相愛，她在面對婚姻時，寫出了內心的曲折和掙扎：「我不能肯定說我自己有把握結婚後仍可以飛快地進步，……我對於我們將來的生活看不到光明，相反地，我時常想到爭吵、發膩、無止境的感情的要求。而這些我害怕，閉著眼睛看到這些影像我就戰慄，心都收縮起來了。」⁵²

女性面對婚姻的困惑還有另外一方面。由於革命陣營男女性比例的失調，以及女性在權力結構中的弱勢地位，女性常常會有意無意中成為資源分配的籌碼，年齡和資歷限制，造成這樣的結果：「許多女同志不得不勉強解決婚姻問題，客觀條件又明擺著，夠條件的大都是土地革命時期的老幹部，年齡又大，文化又低，進步較慢，不善於鍾愛，……勉強結婚終是悶悶不樂。」⁵³王林日記中記載了一個嫁給老幹部的女性的表現：「她舊曆年節剛同何明結了婚，我問她何政委什麼地方人，她

48 劉燕瑾(1925–2012)，北京人。1938年到冀中根據地，進入冀中軍區火線劇社，1946年與王林結婚。

49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6年7月25日，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50頁。

50 范元甄(1921–2008)，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1939年與李銳結婚，後兩次離婚。

51 〈范元甄信，1940年4月20日〉，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1938–1949)——李銳、范元甄通信集》1，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頁。

52 沈霞：《延安四年》，1944年6月28日，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66頁。

53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1月3日，第93–94頁。

說是陝西的，山西的？鬧不甚清。我問她說『我』字是念什麼音時，她一苦笑似的直白地說：誰知道呢，我對他也沒有什麼印象！」⁵⁴《小兵張嘎》作者徐光耀⁵⁵聽到有些地區為遷就幹部，勉強批准其結婚後想到：「以照顧某些幹部為名，馬虎地批准其結婚，這不但是對幹部落後思想的遷就，而且是一種對女人的不尊重。很顯然地是把他們當作了玩物的，而沒有看見，或忽視了其政治地位。」⁵⁶這是來自知識分子一方面的反應。不過，老幹部也有老幹部的想法：「老婆問題，根據這期黨校營級以上老幹部中迫切要求解決這一問題的人佔百分之四十六，營級以下幹部問題則更為嚴重，他們覺得新幹部知識分子都有老婆了，就是自己沒有。南征北戰的結果是寡人一名，家庭被國民黨殺光了，革命一輩子將要斷種。為革命已流了血，還有一滴要保留著。」⁵⁷女性、新幹部、老幹部，面對婚姻限制，可謂各有一本難念的經。

嚴格的婚姻限制措施不可能不激起一些反彈：「有的幹部填表時說自己『為無產階級奮鬥』，但到他涉及老婆問題時，他對和他談話的秘書長和處長說：『我的老婆問題不解決，我安不了心。』」⁵⁸劉榮日記中也吐露了幹部的一些心聲：「軍區規定那種所謂『團級以上幹部才准結婚』，因此一般青年在未達到團級幹部而進行戀愛則認為是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不良的，被批評，縱或兩人情投意合也不能解決。這樣引起許多同志，差不多普遍的不滿，影響到情緒的不安、工作的消極，甚至發

54 王林：《抗戰日記》，1941年1月26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50-251頁。

55 徐光耀（1926-），河北雄縣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曾任冀中軍區警備旅政治部除奸科幹事，1947年畢業於華北聯合大學文學系。

56 《徐光耀日記》第2卷，1948年1月21日，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

57 〈從整風來看幹部思想與今後的幹部教育問題——太行區黨委宣傳部長磐石同志在1944年8月會議上的報告〉，《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1943-1945），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戰史編輯室1962年版，第708頁。

58 〈改變我們事務工作的作風——龔子榮同志在秘書會議上的講話〉，《晉綏學訊》第7期，1943年9月15日，第29頁。

展到動搖地步。」⁵⁹有人甚至會提出這樣的質疑：「某浪漫女星也曾在上海被捕，不過二三月即出，所表現得能很好？上海那段生活能光榮？但能夠滿足某要人之特欲即成珍品。」⁶⁰

整風之後，儘管黨內政治空氣日益嚴肅，但內部的討論仍然得到鼓勵，關於婚姻問題的限制由於涉及眾多幹部的利益，經常成為討論的話題：「小組會討論黨的婚姻政策問題，大家一致的想法，黨的婚姻政策即：一、政治奮鬥目標相同。二、不妨阻工作。三、雙方自願原則下可以自由結婚。……但晉察冀軍區特以規定團級以上才准結婚。我始終反對這個團級規定，因為它會產生下列弊端，促成階級地位觀點、造成對工作上不滿不安、婚姻問題形成不正常。」⁶¹當然，這些看法也會遭到激烈反駁，紅軍老幹部王紫峰記下他在幹部會上就婚姻問題的發言，很可以代表無條件維護黨的利益的聲音：

昨天開分直機關幹部論戰會，爭論過去的婚姻政策。有些同志對黨限制軍隊幹部結婚年齡憤憤不平，提出了許多不成理由的理由來反對。什麼違背了政府的法令呀，是提倡復古呀，經黨審查批准是封建包辦呀，什麼歐戰死亡率太大需要繁殖人口呀，損失了多少人的青春呀等等。

我認為這些人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個黨員，忘記了我們是處在戰爭的環境，特別是敵後這樣的環境。換句話說，就是要黨的利益服從他個人的利益。為此，我昨天連午睡都無法入睡，吃飯也不如平日有味，直到今天痛痛快快給以駁斥後，才睡得比較舒服些。⁶²

其實，質疑結婚限制，並不就要否定集體利益，像劉榮所說：「許多男女青年，客主觀條件夠相當，不僅與毛主席之原則相符合，而且雙

59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3月27日，第133頁。

60 王林：《抗戰日記》，1940年1月17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53頁。

61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8月24日，第199頁。

62 王紫峰：《戰爭年代的日記》，1945年6月2日，第162頁。

方經在長期鬥爭中有了深刻瞭解，由戰友感情發展到永久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坦途中伴侶，把政治結合和自然結合融化為一體。唯有一條組織上不允許，甚至於理由就是資格不夠，沒有到團級幹部。」⁶³ 一些幹部抱怨的只是這樣的規定。不過，當王紫峰以集體主義的原則對這樣的抱怨予以批駁時，另一方很難有繼續質疑的空間，王的發言最終以大家哄笑而大獲全勝。隨著整風的深入展開，組織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很多人在個人和組織之間會做出更加符合組織利益的選擇性表態；微妙的是，這中間當然不無被動的政治正確站隊，但是，確實也有黨的利益和個人利益遭遇衝突時，自覺犧牲個人利益以維護黨的利益和黨的利益，組織在許多中共黨人心中，有著無上的地位。

3. 組織的兩重面貌

愛欲是人之常情，共產黨人當然承認人的感情和欲望，但是更要求感情和欲望的升華，愛是有階級性的，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婚姻戀愛問題最重要的一個定位。愛戀不僅僅是個人情感問題，尤其形之於家庭組織的婚姻，更不是私領域所能範圍。朱瑞曾專門撰文討論過革命和戀愛的問題，結論是：「在過渡的階段下，我們的戀愛要服從政治，政治指導著戀愛，政治的愛與兩性的愛，這是密切不可分離的一個事物的兩個因素或兩面。對於前進的男女，沒有政治的愛，不能形成兩性的愛；不但不能，而且是不應該。」正因此，「戀愛之最高的政治原則，就是革命者應與革命者結婚。它的最低限度的條件，是革命者不與反革命者結婚，這是絕對的條件。」⁶⁴

強調愛的階級性出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抗戰時期的中共黨人，在愛的階級性前提下，特別強調婚戀必須符合集體利益，婚姻要有

63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1月3日，第94頁。

64 朱瑞：《論婦女解放與婦女幹部的修養》，膠東新華書店1946年版，第96頁。

利於事業，這是共產黨人集體主義邏輯在戰爭年代的放大。坦白運動中，甚至「要求每個人必須審查自己的愛人」。⁶⁵ 彭雪楓給新婚妻子林穎的信中寫道：「今天開了一個會，剛才散，費了八個鐘頭，解決一個同志的黨性問題。一個女同志——他的愛人，在會上對他的錯誤是蔭蔽的，是不去盡情暴露的，因為他們是『夫婦』。她，這樣態度的她，不是我的愛人！我所祈望著穎，是熱愛著你的愛人而同時又更熱愛著黨！」⁶⁶ 黨和夫妻之間，黨應該無條件放在前面，這可以視作彭雪楓對新婚妻子的期許。新婚三天後，林穎離開彭雪楓繼續獨立工作，而彭雪楓予以支持，此後到彭雪楓犧牲的三年多時間裏，兩人聚少離多，相處時間只有半年。共產黨人集體主義的邏輯，當年浸潤於中共政治文化中的幹部、尤其是知識分子幹部多能心領神會，無論愛情或婚姻，他們都非常重視集體利益，非常重視自身情感是否符合革命陣營的期待。范元甄在給李銳的信中尖銳提出：「假如我的愛人有一天轉向了，我該如何來戰勝自己。」⁶⁷ 當李銳被錯捕後，她又很堅決地寫道：「政治鬥爭竟是這樣可怕，以至於對什麼人都不能信任了。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問題的！我是有足夠決心的。如果在他身上真是革命一反革命的區別問題，我是站得穩的。」⁶⁸

日常生活中，集體主義精神的具體落腳點常常就是組織。當年的結婚申請報告和批覆中，可以清楚看到黨組織的身影。1943年，新四軍一旅幹部萬海峰和趙政提出結婚申請：「我倆意相合，要求結婚，絕不妨礙工作，希首長批准。」新四軍一旅黨委批覆：「黨為了愛護久經戰鬥的老同志，批准你們結婚。希望在黨的領導之下，更加強黨的觀念，

65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下），1943年10月5日，第387頁。

66 《彭雪楓書信日記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頁。

67 〈范元甄信，1940年7月22日〉，《父母昨日書（1938-1949）——李銳、范元甄通信集》1，第250頁。

68 〈范元甄信，1942年12月21日〉，《父母昨日書（1938-1949）——李銳、范元甄通信集》1，第391頁。

一切服從黨的利益為要。」⁶⁹ 組織的影響力在這一來一往中展現無遺。從時人的日記中可以看到組織決定著幹部戀愛的命運。1939年，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寫道：「到曾科長那裏玩，看了他與一個女青年談戀愛經過的日記。他愛這個女青年，這個女青年也愛他，可惜這個女青年政治上來歷不清，黨不允許結婚，以致沒有成功。」⁷⁰ 陳伯鈞也記載了他觀察到的婚戀失敗的案例：「今天使我不好過的，就是有兩對夫婦離婚，一係感情不合，一係來歷不清，而其共同原因，都是事前未審慎考慮所致，可見戀愛之事絕對不能輕易處之。」⁷¹

從小在茅盾影響下成長的沈霞，進入革命陣營後內心還不無浪漫的想像，在日記中寫道：「有些時候，想起自己曾赤心地愛過一個人，而且不管他的出發點是什麼，終究還是愛著我的時候；我就很難受。我為我曾那麼追求過的幸福，為我曾享受過幾分之幾的幸福難過。」⁷² 但是，當戀人蕭逸提出結婚要求時，她還是毫不猶豫地把政治生命的考量放到重要位置：「我不能訂婚或結婚，因為我對你不瞭解，歷史上不清楚。當訂婚是表示著一個人的真實生命與政治生命要永遠地和另外一個人聯繫起來時，我不能不考慮。……作為一個黨員，自己的注意力與感情首先應該放在自己的事業上，自己的發展上。」⁷³ 沈霞日記中記載的夢境尤其別具意味：「我想起組織上對我說的話：他有問題，因此你不能和他來往。我離開了他的懷抱，站起來，恐慌的情緒佔著我的心，筋肉都緊張起來了。」⁷⁴ 沈霞之所以在夢境中會有如此巨大的恐懼，緣於內心的感情與現實有可能產生的落差，當時蕭逸正在接受組織的審查，前途未卜。沈霞既愛惜自己的感情，又要忠實於組織，

69 郭本敏、袁玉峰主編：《回望硝煙》，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173頁。

70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下），1939年11月1日，第35-36頁。

71 《陳伯鈞日記·文選》中，1940年9月3日，第578頁。

72 沈霞：《延安四年》，1944年1月24日，第145頁。

73 沈霞：《延安四年》，1943年4月12日，第91頁。

74 沈霞：《延安四年》，1943年12月14日，第139頁。

當年，兩者間的衝突有可能在人們內心中掀起的風暴，是後人難以想像的。

在一個本質上屬私領域的婚姻問題上，讓長期征戰的軍隊和地方幹部接受限制性條件，需有森嚴的紀律作支撐。中共對戰時男女關係問題高度警惕，高魯日記記載：「夜晚4團的一個同志想強姦老百姓的女人。他影響了群眾關係，被扣押起來。」⁷⁵ 即便是普通幹部和女性約會也受到嚴密監督，違規者將付出犧牲政治生命的代價：

幾天前，吉星與房東的女兒約會，被房東發現。這事被柳林部長知道了，吉星說是因到文藝科看畫報而回來晚了。深夜，吉星逃跑了。房東的女兒因此在全村婦女大會上被鬥爭了。……吉星之所以逃跑是面子上下不來，他是幹部而不是戰士。他的政治生命算是完結了。⁷⁶

防範男女之間越軌接觸甚至到了如此地步，有個幹部「到了綏德後單獨住一個房子，他生病了，一個女同志去看他，接了一個吻，這樣他在支部會上挨了鬥爭」。⁷⁷ 中共如此戒備森嚴的防範讓人想到福柯關於規訓系統的論述：「在一切規訓系統的核心都有一個小型處罰機制。它享有某種司法特權，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規定的罪行、特殊的審判形式。紀律確立了一種『內部處罰』。紀律分割了法律所不染指的領域。它們規定和壓制著重大懲罰制度不那麼關心因而抬手放過的許多行為。」⁷⁸

不過，和一般政黨的組織懲戒措施通常只是組織及於個體不一樣，中共的組織既是懲戒者，也是責任者，組織懲戒個體時，通常會把自身置於責任者的位置。組織既具有超越性的權威，又構成大家庭的氛圍，既是嚴父，也是慈母，具有恩威並舉的兩重面貌。個體的成長需要組織

75 《高魯日記》，1939年8月27日，第25頁。

76 《高魯日記》，1942年10月5日，第337頁。

77 《高魯日記》，1942年4月29日，第221頁。

78 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修訂譯本），2012年第4版，第201頁。

大家庭的幫助，組織大家庭也對每個個體成長負有責任：「生活中的一切全等待著公家，冷著餓著，反正組織上你得給我想辦法，我自己就是把這樣一個人交給你了。」⁷⁹ 組織不再是個體的對立物，而是內化進每一個個體，組織作為一個系統，讓個體生命融入其中。因此，小組會、支部大會等集體會議的形式，成為幫助、批評犯錯誤者的重要場所。馬千里的日記記下了小組討論中的批評：「小會討論黃××同志的戀愛觀。他的戀愛觀充滿資產階級的觀念，外加流氓習氣。他反省了：看到順眼的女人便去追逐等。」⁸⁰ 劉燕瑾參加支部鬥爭會後在日記中寫道：

支部大會上，又解決著一個犯紀律的問題——鬥爭丁·I，並且給了嚴重處分，並經大家討論，主要是男女關係不正確。這裏面也聯繫著我自己，由於她的錯誤實際上即教育了我，使我更應警惕了。我很怕，我看見了她，我就很怕我自己是不是將來也可能走她同樣的道路，如果現在不從思想上整頓割尾巴，從新認識、瞭解、處理這些問題，也就會有脫離、違反黨的可能，也就會產生把握不住立場、不服從組織紀律的現象，所以我很怕。⁸¹

正因此，當導演凌風⁸² 向劉燕瑾表達愛意時，實際已經愛上凌風的劉燕瑾首先聽取的是組織的意見：「組織告訴我還應該慎重的考慮考慮……一個黨員和一個群眾，這是組織原則問題，我們又是一個黨軍的劇社，而不同一個群眾團體，這樣的事情是絕對的不可分辯的。」劉燕瑾內心未棄所愛，卻只能接受組織上分開兩人的處理，她說，如果「不是個黨員，我會毫無顧忌了，但是現在我有更多的顧慮」。⁸³ 劉燕瑾的顧慮既源自紀律，也出自對黨的感情，她隨後反省：「要贖回自己的罪過，要

79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4年8月26日，第116頁。

80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4年3月16日，第727頁。

81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3年6月18日，第78-79頁。

82 凌風(1917-1999)，即凌子風，生於北京，1938年到延安，曾任火線劇社副社長。

83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4年3月13日，第96頁。

彌補黨的損失，要在工作中來慢慢的好起來，強起來。」⁸⁴ 當組織成員自覺把自身得失與組織利益掛鉤，進而把自身的不進步視為對組織的傷害時，組織的向心力自是不言而喻。

嚴格的限制下，也不是沒有波瀾，冀魯豫水東獨立團1943年統計，連以上幹部私自結婚的有5人。⁸⁵ 還有人悲觀絕望：「有過因戀愛不能解決而自殺的，有一個指導員（平遙的，係高中學生），估計自己不能升到團級幹部，而永無結婚的可能，因而提出退黨。」⁸⁶ 歷史之樹總會有著無數的枝枝杈杈，對這種感情領域的問題，規訓的力量終究有其限度，正如劉燕瑾所言：「誰能強迫著我和一個我不喜歡的人做愛人呢？當然別人沒有這種權力。」⁸⁷ 中共是一個強調平等的政黨，組織可以規定不能和什麼人結婚，卻不能規定必須和什麼人結婚，個體在允許的範圍內選擇婚戀對象的權力還是得到尊重。另外，由於兩性關係的隱秘性，還有另外一重難以管控的區間，徐光耀曾在日記中寫下一段經歷：「剛才房東女人向我吊膀子！過去有人說：『大丈夫坐懷不亂。』我常拿這句話來衡量自己，我能否坐懷不亂呢？每次這樣自問的結果是『不能』！現在我心裏就有些微的沉不住氣，坐懷不亂是很不容易的，那真是大丈夫。」由此引發他的下一段議論：「我常想投機取巧，找個女人搞一下子。我知道是不對的，是上級不允許的，是腐化行為。我也覺得這是可恥思想和行為，做了是要受處罰的。可是我又常想，如果找個機會，極為秘密地，不讓另外一個人知道，搞一下子，事後不向別人說，這樣隱瞞下去，不是不會受到懲罰嗎？」⁸⁸ 徐光耀這段話說出了一個問題：組織措施可以限制幹部的婚姻，卻並不一定能完全管束住男女關係上的越軌行為。戰爭狀態下，人員流動，充滿各種不確定性，不僅

84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4年9月16-20日，第124頁。

85 〈水東獨立團1943年工作報告〉，睢杞太黨史編寫組編：《睢杞太地區史料選》（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頁。

86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3月27日，第133頁。

87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5年9月14日，第198頁。

88 《徐光耀日記》第1卷，1944年5月1日，第24頁。

對流動中的群體產生生理和心理上的衝擊，也增加了邂逅的機會以及愛的期待；一次邂逅，甚至一個笑顏，都可能激起綿綿不斷的想像。劉榮記下他和一個鄉村姑娘邂逅並互有好感的經過：

我也以眼光遇她時，雖然好像沒有話講，但是也要以滿臉笑容回答。她利用一切機會接近我。她知道我是指導員，那麼也就知道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了。以後從他父親談話裏和她的談話裏，從她和家人對部隊的熱愛、擁護、幫助，特別是說話，可以斷定她也是一個共產黨員。

她在家裏很當家，一切事情除父親掌握辦理外，差不多要算她了。她在待人接物上、處事上很自然很大方，她家的作風、她的作風在山溝裏與眾不同，真有類似冀中平原的那種作風。⁸⁹

同樣，王林的日記中也記有他路經一個村莊，見到一個少女的場景：「忽從場上發現一少女，穿著本地織的花布，花巾線兒中帶著紅線紋的褂褲，臉兒紅潤得放光彩，真是絢燦奪目，令人想一直看，又怕影響不好，脖子便發起僵硬來了。心想若有機會結識此美好少女，真乃一生中幸運也。」⁹⁰

然而，無論劉榮還是王林，這樣的邂逅都僅僅只是邂逅而已，劉榮進一步寫下了和少女的離別：「她利用一切說話機會打聽我動向，瞅了一個機會問我：『你今天走嗎？』回答：『走。』她面孔上立刻呈現無限難過，好像有千言萬語要和我談，但是並未再談一句話。……我走出了門，幾位同志送著，她獨立預先站在院內，問了聲：『你走啦？』然後說她沒有權利送我，就這樣內心很難過地別了。」⁹¹

邂逅如流水而去，原因複雜。無論劉榮還是王林，都算得上知識分子幹部，對未來的愛人有理想的期盼，劉榮坦承：「鄉下姑娘特別具

89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2月24日，第111頁。

90 王林：《抗戰日記》，1945年9月2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339頁。

91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2月25日，第111-112頁。

有樸實、苦幹、活潑的風度，也是可愛，不過文化太低。」⁹²內心中，他們還是期望找到一個更能相互理解的知識女性。橫亘在劉榮面前的還有現實的阻礙，那就是他和姑娘臨別時想到的：「平淡中每逢我開口她總是眼不倒眼地看，像是在發問：『你聽懂我的話嗎？』『懂！當然懂！』——可哪裏有這樣的條件呢？」⁹³儘管內心中不無愛的企求，組織的原則卻會讓他們止步，這也就是劉榮和王林都說到的：

理想中對象雖然不是那麼絕對，但應該有一定條件和一定原則，絕不能輕舉妄動，雖然自己從未輕舉妄動，喪失自己共產黨員的道德精神，但是卻常常輕易地在腦筋裏起那種愛的思想。這種愛往往是一點的或者現象的，過後經理智地思索才棄之九霄雲外。⁹⁴

事一到眼前，一切顧忌便都來到了，於是一切衝動又受到了打擊，臨時動搖，裹足不前，於是別人說我是「好人」了。⁹⁵

這種理智的力量，每每在關鍵時刻產生無形的約束力，形成中國傳統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的制約力量，自然，這中間有紀律約束下的自覺，但幹部群體長期養成的對黨的意志衷心的服膺和遵循，不能不說亦是能夠自控的重要因素。

4. 誘導和皈依

規則的實施既需要懲戒，也需要誘導，「二八五團」亦不例外。中共實施懲戒同時，更高度注意思想上的誘導，中共幹部總結：「沒有整風的覺悟與積極熱情，沒有正確的學習態度，再好的領導者，對之也

92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年12月26日，第91頁。

93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2月25日，第111-112頁。

94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12月9日，第241頁。

95 王林：《抗戰日記》，1939年9月24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13-114頁。

會事倍功半的。」⁹⁶ 經由長期的督促、灌輸及紀律熏陶，中共幹部普遍具有自覺遵守紀律的學習意識，高魯日記寫道：「一是組織問題，二是學習，三是戀愛。這三個問題我想是一般青年的問題。」⁹⁷ 組織的渴望、學習的掛念，為青年人念茲在茲，一定程度可以遏制愛戀的影響，所謂：「拋棄一些阻撓自己進步的思想（如找愛人問題，這的確給我很大的影響），適當地處理這些問題，一心一意地抓緊時機進行學習。」⁹⁸

戰時幹部婚姻的限制，主要涉及的是「三八幹部」群體。「三八幹部」多懷著強烈的民族救亡情懷投身中共革命，在他們的回憶和自述中，「九一八」、「一二九」是出現得最頻繁的關鍵詞。劉榮在思想自傳中說：「『一二九』偉大的學生愛國運動，我也參加了。多年不敢喊的口號今天大喊而特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響亮的口號震撼大城市，廣大的行列就在那中山大馬路上遊行，對我的刺激深刻極了。」⁹⁹ 這應該是那一代知識青年的普遍心聲。在民族危機中集聚在中共旗幟下的這批知識青年，衷心服膺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的號召，也願意改造自己以適應黨的要求：「真正是受壓迫的青年或知識分子，當他已經覺悟——舉起反抗黑暗社會的鐵拳來，下決心為革命事業而奮鬥到底的時候，他唯一的要求是進步，是嚴整活潑生動的政治生活，這是一般青年知識分子的共同心理吧。」¹⁰⁰ 這樣的心理狀態，是婚姻限制措施可以順利落實的基礎。某種程度上，中共的誘導和「三八幹部」群體的靠攏，是一種良性互動的正相關關係。

就普遍的人類言，欲望和苦悶之間是一個永恒的問題，欲求不得實現，苦悶；可是欲望又永無止境，單靠實現欲望消解苦悶，毋寧說是抽

96 斌：〈加強思想領導的經驗〉，《晉綏學訊》第1期，1943年3月15日，第12頁。

97 《高魯日記》，1942年3月5日，第192頁。

98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年6月7日，第49頁。

99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年思想自傳，第122頁。

100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1年12月19日，第22頁。

刀斷水水更流。中共黨人以組織和集體主義的力量化解個人欲求，儘管不一定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終極方案，起碼在當年，的確收到了想要的效果。劉榮曾經寫下自己心理的變化：「自己過去有自私打算，和黨不是完全一條心，若克服了為自己那半條心，完全與黨同呼吸、同黨保持一致時，自己就會感到無上愉快，今天自己就不像前兩年內心痛苦，此故。」¹⁰¹ 沈霞的說法和劉榮相互印證：「只有當我能一心一德向著黨時，我最快樂，在我想到私人問題時，我就煩惱。」¹⁰²

自我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卻也是人類痛苦的根源，「無我」畢竟只是理想的境界。1944年，參加坦白反省大會後，受到觸動的劉榮在日記中說：「今天開始真正理解到只有在黨的發展前提下，才能有人發展的精神與實質，這是思想上同認識上質的變化。黨將成為我的腦子了。」¹⁰³ 第二天，他又在日記中寫道：

最近幾年來，腦子裏差不多三天兩頭都在想的兩件事情：樂於到戰鬥部隊中去和想愛人，往往白天想，晚上也想，自個靜靜時候想，甚至於會議或別的集體場合下自己也靜靜地想起來。從進步上說也能講得通，從自私方面講也能連得上。不論怎樣，在人的性格與本性上講的話，是個實際問題。¹⁰⁴

應該相信劉榮前一天表態的真誠，也可以理解他第二天的個人要求，在認同黨的利益前提下，並不需要完全泯滅個體，儘管體制運行的慣性的確會不斷強化組織和紀律的約束力。同樣的現象也可以在劉燕瑾的日記中看到。1943年6月，她參加劇社批評戀愛至上主義會議後寫道：「違反原則的、沒有條件的熱愛，是不是戀愛至上主義？是不是反黨反革命的？是不是影響工作、生活？……是的，我的良心已經無條件的默認

101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7月29日，第188–189頁。

102 沈霞：《延安四年》，1943年11月27日，第137頁。

103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7月31日，第189–190頁。

104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8月1日，第190頁。

了。」¹⁰⁵ 儘管反黨反革命的判斷不無誇張之嫌，但劉的自我警示是可信的，她美麗、熱情，願意給周圍的人以愛的熱誠，但也易於招致誤會、困擾，所以她在日記中反復強調良心，把因自己熱誠造成的誤會當成了自己的「罪惡」。¹⁰⁶ 然而，當愛情真正到來時，劉燕瑾仍然脫不出愛的纏繞，她和凌風的戀情被組織否決後，癡情地等著凌風：

她追求著一個人，很願意為對方做一些小事情，哪怕是最細微的一點點，只要對方高興。時間是無情的過去了很多，差不多已經有三個年頭，任何一個人全不知道，甚至連對方自己也不曾覺曉……可憐，別人全替她可憐。但是她卻很愉快，因為她有這樣的決心，她一直追求他到墳墓裏。¹⁰⁷

愛的情感默默縮進角落，卻意外地堅韌、頑強，集體主義凱歌行進的鼓點，亦無法遮蔽那一點點不時冒出的執拗的低音。

無我難，唯其難才要無我。正處上升期的中共，似乎不相信有什麼不可以克服的困難。八路軍幹部張子珍的日記提供了以黨的事業設法消解個人欲求的案例。他記下了求愛、被婉拒、自我說服的過程：「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嘗試——寫信給一女同志徵愛。這件事使我的情緒隨之轉移，高興為此，消沉為此，甚至為此兩夜輾轉失眠。」¹⁰⁸ 一段時間後，回信來了：「一個軟釘子，碰到了頭上。就這自己還不死心，還抱有許多幻想。我想，無論如何不能影響自己的工作、學習，因為這是黨予自己的任務，而那一問題僅是自己私生活中的問題，不能因此而妨害黨的利益。」¹⁰⁹ 黨的任務，成為張子珍說服自己接受被婉拒的重要理由。然而，個人感情畢竟不可能完全由理性駕馭，情感波動不可避免牽

105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3年6月14日，第74頁。

106 劉榮和劉燕瑾的反省都產生於參加會議之後，應該不是偶然，中共集體會議的形式，有助於造成個體心靈上的震撼。

107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4年8月28日，第117頁。

108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年1月31日，第27頁。

109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年2月15日，第29頁。

絆工作和學習，張不得不在日記中警醒：「這樣下去，黨的工作受到障礙，學習大受影響，那真是特大的錯誤。從今天起，把這一問題索性拋開，努力工作和學習，老婆問題是很容易得到解決的。」¹¹⁰

需要注意的是，中共集體主義環境下，日記和郵件都無法做到完全保密。山東北掖縣委社會部的總結報告說：「在檢查郵局信件上感覺到沒辦法去檢查，同時也因沒幹部去作而影響了。……機關來往信件，凡屬私人的都要經過檢查，但有時因環境關係，不住一起，有的未曾檢查。後指定專人負責檢查，如有問題的信，即交社會部。」¹¹¹ 這時的郵件檢查尚屬秘密。整風之後，郵件檢查進一步公開化，1943年4月，在延安軍事學院學習的馬千里寫道：「今日的朝會上宣佈：『個人槍支交公家保存，遵守學習制度，邊區以外的來信要經行政檢查。』」¹¹² 延安整風期間，幹部的日記常被調閱乃至互看，1943年6月，馬千里記有：「下午會上決議：為了忠於黨、忠於革命，將每人手邊存的有關思想改造的東西（包括文件、日記等等）向黨和群眾公開。」¹¹³ 這種環境下的日記寫作多少會受到影響，很容易有意識地向規範化靠攏，日記中的自我暴露和自我反省或許不無向黨交心的成分。相比之下，劉榮因深處平西敵後，軍事緊張，像延安這樣的調閱日記尚未普及，日記中呈現的狀態更為坦率一些，但盡力依靠組織擺脫個人情感則是一致的：

到政治部這幾個月內，只有三次想法完全是革命，十次想法為革命同時聯繫著為個人，其次完全為個人打算。為革命打算在良心發現與感動之下，共產黨員應該毫無條件與顧慮勇敢地為黨工作，站在黨與革命立場之上才是。若都為個人打算，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之上，那麼和小資產階級以及反動的資產階級有何區

110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年5月7日，第38頁。

111 〈北掖縣委社會部1941年全年工作總結報告〉（1941年），山東省檔案館 G010-01-0005-002。

112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3年4月19日，第637頁。

113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3年6月3日，第655頁。

別呢？革命哪裏還能幹得成功呢？那十次是覺得為革命好好幹自己可以出名，這時和那種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和地位觀念密切聯繫著，並非純粹出於為革命和黨而想，是非常壞的思想。為個人所打算的，第一是老婆問題。¹¹⁴

上面這則日記談到了內心想法的三個層次：完全為革命的，為革命同時聯繫著個人的，為個人的。劉榮非常期望自己能夠做一個純粹的革命者，因此，他對自己不能時時刻刻想著革命很不滿意，尤其對經常把革命和個人利益攪在一起感到痛心，批評這是「非常壞的思想」。不過，劉榮同時又很坦然地面對著自己為個人打算的想法，這些想法中就包括「老婆問題」，潛意識中，或許認為想老婆天經地義，但當他說：「若都為個人打算，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之上，那麼和小資產階級以及反動的資產階級有何區別呢？」事實上又在否定著這種個人打算。劉榮衷心期望自己能完全符合黨的要求，自覺按照黨的標準要求自己，可是內心世界的自我又常常於不經意中顯山露水，尤其是老婆問題，更難釋懷。黨性中的組織皈依和個性中的自我滿足，既糾結又交融，前者不斷在克服後者，後者在不斷倒向前者的過程還不時會冒出頭角，這似乎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

一個不斷要求自我進境的環境，的確可以造就一個不一樣的群體，劉榮曾經自問自答：「我軍中戰士為什麼不嫖、賭呢？並非不會，而是環境關係。」¹¹⁵ 正因此，在性愛問題上，除了可以看到和常人相似的欲求和苦惱，更處處可以發現中共革命道德的烙印。比如，劉榮一段日記前面是普通的性問題的談論：「天已黑了，我們幾個不知不覺扯到男女關係問題上，細雨濛濛中，蔡也走來了，參加了這個問題的扯淡。他就成了主談者，大家就靜聽。他談了許多經驗，第一點關於兩性的愛情問題，進行性的生活，兩方應該互相照顧遷就，……」接下來，劉榮的表態可以明顯看到中共政治文化的痕跡，由上述性經驗的談論中，生發的

114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5月27日，第157頁。

115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年6月26日，第57頁。

感想是：「外面那種窩區玩弄女的流氓思想，感到這種思想對青年毒害很大。到此我很痛恨舊社會那種反動黑暗情形，若在前幾年知道這些的話，那不會去手淫。」¹¹⁶ 日記中這兩段話初看似嫌跳躍，仔細追索，卻不無潛在的理路，大致邏輯是：性應該是男女雙方共同的責任，像舊社會那樣玩弄女性不可取，手淫也不可取，新社會的性愛應該建立在男女相互體諒的基礎上，這樣的性生活才是有益的。這其中，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對女性的尊重。視女性為夥伴而不是玩物，在有著長期男權傳統的中國，並不容易。當然，劉榮的書寫或許也不無刻意拔高的成分，即以政治正確的話語沖淡濃厚的性興趣的痕跡，賦予興致盎然的性談論以道德意義。然而，在性的話語中注入政治的成分並且最終使之落腳於政治和道德，本身就是中共政治文化全面覆蓋的體現，這種選擇性的講述本能和需要背後，顯現的正是政治力不斷楔入人的內心世界的努力。

在劉榮心目中，作為一個革命者，理想的愛情應該是這樣的：「大家的團結和愛是建築在有才有德上面的（無限地忠實於黨和人民解放事業和在工作上對敵鬥爭上有辦法）。什麼錢呀、官呀則為大家所不齒。在男女戀愛上，有才有德則成為擇選對象的最高原則了。就在鄉村，一般婦女結婚時首先瞭解對方階級成分、抗日堅決程度、工作積極性等。」¹¹⁷ 可是，這樣的愛情無法輕易得到，甚至一開始就被規定封上了大門，愛的渴望以及欲的本能，時時敲打著他的內心，日記中記下一段經歷：「昨天晚上起鋪，這時靜靜地，萬籟無聲，遙望一家小窗戶，明晃晃的燈光反射在街口，好奇心下就跑到窗前去窺視，正是一對中年夫婦在進行他們的愛，兩個人赤裸裸地抱在一起，急促呼吸下發出微微話聲也在戰慄著，旁邊還有一個小孩兒卻在很甜蜜地睡覺。引起回去後好久睡不著，也跑了馬。馬上蘇醒，感到既無愛又損身的難過。」

可以想像，此情此景對劉榮造成的衝擊，接下來，他的一大篇議論，就是消解這種衝擊的思想路徑。他首先談到的是宗教：「信佛教之

116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4月8日，第139頁。

117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3月12日，第119頁。

和尚與信天主之神父，他們把終生的幸福、精力思想用於迷信上帝、神！能夠不結婚（雖然有些是假的），違背自然法則，一心一意致力於他的理想——死後到天堂。」在劉榮看來，如果說宗教徒都能做到這一點，共產主義者就更應該可以做到：

我們共產主義者是為科學的共產主義事業，為人類為社會進步、文明、自由同幸福、平等去奮鬥，為什麼不可去堅持去實現這種理想？這理想和主義又是人類唯一的最正確的道路，為什麼不能耿耿在心、時時在念，一心一意去實現它呢？有時還做複雜混亂想法？說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自己，今天思想上還有混亂之處，不夠澄清——今後在革命中，努力於思想上的澄清當是首要任務。¹¹⁸

共產主義當然不能和宗教簡單類比，但追求理想、強調獻身和犧牲有某種形式上的相似性，李立三提到：

或者會有人說：共產黨人是主張無神論者，因此，自然是一切宗教的反對者。自然，共產黨人是辯證的唯物主義者，不承認神的存在，可是他並不因此就排斥一切宗教的高尚的理想和偉大的精神；相反的，因為他有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工具，因此他能找著正確的道路使這種偉大精神為著實現的人生解放而鬥爭，把這種高尚的理想從宗教上的來世與天國實現於現實的人類社會中來。¹¹⁹

正因此，整風期間劉燕瑾的感覺是：「有一種看不見、摸不住的力量在促使著每一個人，比一個最純真的教徒還要誠摯的向黨坦白著他的一切。他們的誠摯感動著一切的人，有誰能對這樣的運動不嚴肅呢！誰也

118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5年7月9日，第283頁。

119 李立三：〈共產黨與宗教〉，《李立三百年誕辰紀念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頁。

知道只有這樣黨才會給他以力量，他才能得救！」¹²⁰ 劉燕瑾講到的這種看不見、摸不住的力量，實際就是思想、信仰、意識形態的力量，安格魯·帕尼比昂科將此解釋為：「意識形態起到的重要作用（在眾多功能中）是，把個人成功的志向合理化、『神聖化』。一個人的地位的不斷提高與『事業』的『崇高需要』以及政黨的『更高需要』有關。」¹²¹ 日常生活中，政治權力的運作更多是一種不平衡的互惠關係，即領導者掌握資源的分配，追隨者則以資源的滿足程度決定其忠誠。而意識形態則通過目標激勵把這種互惠關係盡可能導向單一關係，這可望大大減輕資源的消耗，增加組織的效率和控制力。通過個體和黨的事業的聯結，個體融入集體，從集體汲取力量並承擔責任，生發這樣的感嘆就順理成章：「共產黨員不是平常人，他擔負著領導全中華民族以至全人類解放的任務，應該時刻檢查反省自己夠不夠資格。」¹²² 這樣的集體榮譽感和使命感在遇到重大事件時會油然激起，比如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在正面戰場遭到慘敗，劉榮立即「熱血沸騰起來，馬上認識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更重大了，在黨的正確政策指引之下，不僅要誓死同日寇周旋到底，把它趕出國土，而且要同國內法西斯反動派周旋到最後勝利。」¹²³ 從國民黨對日作戰的失敗中，立即看到中共勝利的曙光，一個普通幹部擁有本應屬高層領袖的思路，非同尋常。正所謂：「我們都是些小人物，但對國家大事都很關心。」¹²⁴ 「二八五團」壓縮了個人的欲望，卻不意味著對欲望的棄絕，畢竟欲望乃人類前行的動力。因此，以政黨和集體的大欲相號召，既替代私欲，又賦予前行的動力，順理成章。中共放大幹部的視野，建立幹部的格局，既是在強化領導藝術，其實也在營造宏大敘事，而共產主義的理想，正是這樣的宏大敘事的標配。

120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4年3月22日，第99頁。

121 安格魯·帕尼比昂科著，周建勇譯：《政黨：組織與權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頁。

122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年5月3日，第43頁。

123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11月28日，第236頁。

124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4年11月29日，第698頁。

歷史和現實中，兩性關係可謂永恒的話題。戰爭年代，中共對幹部婚姻的限制簡易直截，不無對個人情感的抑制，卻讓整個軍隊和幹部群體相對穩定，普通人及與他們發生密切聯繫的中下級幹部在婚姻問題上處於同一狀態，讓整個隊伍形成同甘共苦的感覺。應該說，管控軍人婚姻，和近代以來國家權力伸展的方向相應，只是共產黨人把這一方向推向了其他政治力量無法想像的深度。之所以如此，和共產黨人的集體主義、效率優先、官兵平等的思路及強大的執行力無法分開。婚姻限制的實施，基本可歸類為「三八幹部」的一批新幹部需要做出犧牲，而這正是中共黨人中最意識形態化的一群人。他們多懷抱著理想進入革命陣營，隨著中共的不斷教化，已自覺進入中共的解釋體系中，在宣導、感化、懲戒多管齊下的情境下，儘管內心不無本能的欲望和要求，卻努力以維護黨的利益的自覺予以相當程度的釋放和消解。後來很長時間內，處於高層和基層中間的這批幹部，常常扮演的都是自我克制的角色，中共平等的理念及在民眾中形成的觀感，正是由這批人予以落實。他們的確可以說是中共革命中負重前行的中堅，婚姻問題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浪花而已。

然而，問題也有另外一面，從中共建政後即迅速改變婚姻政策可以看出，戰時的臨時措施終究不是他們的目標，人類的基本情感需要得到尊重，共產黨人並不會忽視這一點，這也就是劉少奇講到的：「黨允許黨員在不違背黨的利益的範圍內，去建立他個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¹²⁵ 作為一個一般的討論，或許可以爭辯說，戰時允許普通幹部結婚未必就會損害黨的利益，但是共產黨人紀律性的要求，就決定了是否有利於黨的利益會由黨組織而不是個體決定，而黨往往傾向於組織利益最大化的選擇。頗具意味的是，儘管中共在建政後很快改變了戰時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在戰時產生的效果仍然留下深刻印象。1949年後，戰時政策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斷重現，比如禁欲的宣傳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後一度重新上演；吊詭的是，在新的環境下，這些政策產生的效應實

125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選集》上，第135頁。

際卻呈現遞減趨勢，這提示了一種趨向，即通過管控個人情感獲得的效能終究有其限界。中共幹部曾經總結道：「只要革命不革命與如何革命的問題解決了，生活問題自然會解決的，若干地方的經驗證明，單獨在吃苦與享樂主義的問題打圈子是想不通的，至多是得出了禁欲主義的結論來。」¹²⁶這裏面的革命、生活、享樂、禁欲，隱隱然提示後幾十年歷史不斷形成緊張關係的幾對關鍵詞，這種本不一定必然出現的緊張，和整個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走向，又密不可分。

從戰時婚姻管控的這段歷史中，或許很難得到一個十分明確的答案。從中既可看到中共的效率和宣導能力，卻也可體察其下隱藏的個人情感不得而出的奔湧暗流和潛存於人類靈魂深處、時時要露出頭角的感性力量。中共在婚姻限制中幾乎可說是創造了一個奇跡，即在達到限制幹部婚姻、保持革命陣營戰鬥力目標的同時，還讓整個群體保持嚴明的紀律，侵犯婦女少發。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幹部群體對黨的意志的自覺認同和接受大大減少了規制性措施落實的障礙，而經過灌輸和教化不斷刻印在頭腦裏的思想資源，也可能發揮了超乎想像的作用。如果說，中國傳統的慎獨也具有自我克制和修行的意義，那中共的道德教化則將之連接到了崇高的革命事業，並有人類未來的光明前景相伴，形成完整的大我替代小我的解說路徑。這樣的路徑，在整風運動中尤其突出。

126 〈從整風來看幹部思想與今後的幹部教育問題——太行區黨委宣傳部長磐石同志在1944年8月會議上的報告〉，《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1943-1945），第703頁。

三、整風運動的心靈史

1942年開始的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大事件。此後，整風運動又數次推出。多年來，整風運動人們已經耳熟能詳，關於運動的討論也不乏專著、論文問世，不一樣的著作勾勒出關於這一運動不同層面的圖景。¹這裏不擬再增加一幅整風運動的全景照，也不擬多從高層政治層面去探究整風運動的複雜考量，而是希望通過對運動中反省報告及個人日記的剖析，將這樣一場曾經在當事者心中掀起巨大的思想風暴、觸及個體靈魂的運動，從心靈史的角度嘗試予以記錄。畢竟，這可以說是中共幹部養成中最具影響的事件。很少有哪種力量像中共這樣對革命陣營的內心世界投入如此多的關注，付出如此多的努力，又獲得如此豐厚的其所期望的成果。對這樣一種歷史過程的考察，無論對瞭解這個黨、這支政治力量，還是人類思想的傳輸，以及心靈的扭轉、改變及其間的張力，都有著無可置疑的意義。人的內心世界複雜多變，中共黨人當然也知道這一點，但整風還是知難而上，力

1 談到整風運動，人們常常提到的論著包括：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8年版）、楊奎松〈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等。陳永發的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較早注意從基層角度觀察整風的落實。

圖把複雜導向純一，不僅在組織上打造一支具有高度紀律性的政黨，更要求實現黨員內心深處與黨的一致。打開並改造人的內心的工作是如此艱難，可以與之比擬的大概就是對這種努力予以歷史的復原了。當年，中共在這條路上接近了自己的目標，但這絕不意味著今人無論在現實和歷史中，可以再一次窺到成功的門徑。

1. 透明人的追求

無論怎樣評判整風運動，有一點可以確認：整風運動是一場以人的觀念作為直接改造和整頓對象的運動。整風激起巨大的思想震蕩，陳伯達說：「整風運動對全黨，對每個一定的同志，在一定時候，都必將在思想上、生活上、活動上得到一定的結果，而在我們黨的思想歷史上，黨的生活歷史上，黨的工作歷史上，都將開闢一個嶄新的時期，對這一點，那是完完全全無可懷疑的。」² 回顧整風的歷史，的確，這一點無可懷疑。

對於為什麼要整風，現有論著多有揭示，除開高層政治層面的考量，就整個的中共言，研究者均認為運動的目標是要加強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領導，加強整個隊伍的組織與紀律，這樣的結論自然有充分的依據。令人稍感困惑的是，中共一直是個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強調組織紀律性、意識形態化，在這樣的基礎上，整風固然可以說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讓組織更加細密，紀律更加嚴明，思想更加統一，但整風到底是否、或者說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這個黨的特質，並非不言自明。

如果說整風對這個黨的形塑發揮了關鍵作用，更大的可能是，整風造就了這樣的一代人和這樣的風氣，他們不僅在組織和思想原則上聽從黨的指導，而且在個體選擇、個人生活、個人情感上自覺按黨的期望和

2 陳伯達：〈回答于炳然同志〉，《解放日報》，1942年7月23日。

標準要求自己，把自己打造成對黨完全忠誠的透明人。作為強調意識形態的政黨，前者是基本要求，後者則是提倡和期望達到的目標，大多數共產主義政黨都沒有盡力將後者從政治和組織上予以落實，更沒有為此訴諸大規模的政治思想運動。整風運動以政治、思想、組織全面推進的形式，直接把這一要求付諸實施，希望予黨員思想和情感上脫胎換骨的變化，這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罕有先例。1943年，胡公冕應胡宗南之約赴延安考察回來後向胡彙報：「近年以來各地男女青年皆來陝北，毛澤東利用這個機會，選擇最優秀青年，作一般最精彩之訓練，反對宗派主義、教條主義、黨八股主義、小資產階級思想、個人英雄思想等等，訓練成一個完全無私，無個人，只有黨，只有主義的核心幹部。」³ 訓練這樣的幹部，或許，正是整風運動更持久、內在的要求。

整風運動的目標，運動領導者也不是一成不變，也有因勢利導的成分。大多數研究者都注意到整風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經驗主義、黨八股的批評，注意到整風對黨風、文風、學風的糾正，也注意到整風對高層政治變動的巨大影響，毫無疑問，這的確是整風的重要內容，也體現於中共中央下發的各類整風文件及整風具體操作中。不過，這樣一場貫注到全黨的政治思想運動，在各個層級上的要求不盡相同。就眾多的普通黨員言，整風更多的是審查歷史，解決思想問題，反對個人主義，強化黨性觀念，牢固忠誠情感，建立集體主義的政治文化。⁴

1942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指示，強調：「最近毛澤東同志關於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及反黨八股的報告，是黨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幹部及黨員思想、轉變工作作風的銳利武器」，⁵ 要求在全黨展開大規模的學習、討論運動。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分別對應的是學

3 《胡宗南日記》上，1943年5月12日，第207-208頁。

4 應該說明的是，所謂前後期的劃分也只是相對的，即便在延安，前後期的時間和任務也有重合，如果放到各根據地考察，由於其滯後性，前後期更難截然劃分。

5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1942年4月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9冊，第193頁。

風、黨風、文風問題，雖然，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直強調整風針對的是全黨，但客觀而言，上述三者更有可能出現在中高層幹部之中。正因此，毛澤東7月份給聶榮臻的電報中說得很明白，整風「主要與首先的對象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只要把他們教育好了，下級幹部的進步就快了」，「在一個根據地內，主要應著重教育邊區與地委兩級，其次是縣一級，只要他們有了正確方向，區、村幹部的毛病就易糾正」。⁶ 1943年初，毛澤東把整風的順序說得更清楚：

整風，主要是整高級幹部（犯思想病最頑固的也是這些幹部中的人），將他們的思想打通，一個根據地大約有一百至二百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員在內）；其次是中級幹部，每一根據地有數百至數千人；再次才是下級幹部。有些根據地把這個方向弄顛倒了。⁷

不過，初期整風對象主要對準高中級幹部，主攻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時，也有一根線索始終或明或暗存在，這就是對自由主義亦即個人主義的批判。整頓三風的報告中，毛澤東批判宗派主義，已經涉及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只是這時反對自由主義還沒有成為強調的重心。1942年4月10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1937年9月寫成的〈反對自由主義〉，實際道出了毛澤東心目中的整風對普通幹部的基本要求。毛在文章中定義他所認為的自由主義的實質：「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由此可以看出，毛所說的自由主義和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不盡相同，實際指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毛澤東強調：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

6 《毛澤東年譜》中（修訂本），1942年7月4日，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391頁。

7 毛澤東：〈爭取在抗戰勝利後與國民黨建立和平局面〉（1943年1月25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頁。

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의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群眾的聯繫；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

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的傾向，使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面來。這是思想戰線的任務之一。⁸

由於整風初期的主要對象是中高層幹部，主要目標是確立毛澤東的主導地位，主要針對普通幹部的反對自由主義的任務，暫時沒有成為運動的中心。隨著初期目標的基本達成，將運動推向更廣泛的普通幹部群體，實現黨的意志更廣泛深入的覆蓋，成為進一步的要求。⁹整風不斷推向深入，意味著整風的進一步落實，正是後者，形成大批普通黨員和幹部更深刻的整風記憶。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決定明確：「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種是革命隊伍中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後一種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¹⁰ 13日，中共中央制定整風運動指示的草案第二號、第三號，其中第三號專門講克服自由主義問題，指出：「自

8 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61頁。

9 于光遠認為：「一個整風運動，其實是兩個整風運動同時進行。一個目的是反對王明路線、肅清王明路線影響的整風運動；一個是針對黨內參加革命不久的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教育的整風運動。」(于光遠：《我的編年故事(1939-1945)》，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何方也提出：「當時以至後來很長時間，都不知道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上層整風是進行路線鬥爭，反對兩個宗派；普遍整風是改造思想，反奸審幹。」(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何方自述》，第76頁)

10 〈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1943年4月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第275頁。

由主義是目前黨內鬥爭中的主要不良傾向，在整風中必須克服此種傾向，才能達到徹底整風之目的」；「整風是一個偉大的黨的思想鬥爭，實行此種鬥爭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評。有自由主義偏向的人則不願拿起這個武器，尤其是許多中級與高級幹部害怕自我批評，這種現象必須在此次整風中著重地糾正過來。」¹¹ 體現毛澤東審慎的態度，致信中宣部代部長凱豐時，他有保留地表示：「小資產自由主義問題，今年五五來說，還不相宜，就全黨來說，目前還是讓自由主義暴露的時候，還不宜於就作總論。」¹² 不過，反對自由主義的立場已經非常明確。6月，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明確剖析道：「整風前一階段注重學風是正確的，但後一階段便應注重黨風。因學風是思想方法問題，黨風是實踐問題。只有在後一時期(今年下半年)注重黨風，才能將思想方法應用於黨性的實踐，克服黨性不純現象。」強調：在黨風學習中，應著重反對自由主義錯誤，從思想上糾正黨內自由主義。毛澤東期待：「如能在今年一年真正做好整風，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審查幹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績，我黨百年大計即已奠定。」¹³

從毛澤東的佈置可以看出，隨著整風的深入推展，強化黨性，反對自由主義越來越成為整風的主要目標。1943年底，隴東地委整風訓練班列出六種學習文件，包括搶救失足者、評中國之命運、論共產黨員修養、反對自由主義、調查研究決定、領導方法的決定，其中搶救失足者等四個文件都針對著時事和具體問題，基礎性文件只有論共產黨員修養和反對自由主義。¹⁴ 所謂自由主義，整風的語境中，實際就是朱德讀毛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修訂本)，1943年4月13日，第433頁。

12 毛澤東：〈給何凱豐的信〉(1943年4月22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5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修訂本)，1943年6月6日，第444頁。

14 〈地委關於整風訓練班報告草稿及坦白人名單〉(1943年11月10日)，中共隴東地委1943-1944，甘肅省慶陽市檔案館藏。

澤東〈反對自由主義〉做眉批時定義的「自私自利」。¹⁵ 中共黨員的自我反省文本中直接出現這樣的表述：「個人主義的思想（自由主義）」。¹⁶ 當中共要求確立統一的思想權威、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純潔的黨性時，任何個人主義都有可能被視為前進路上的絆腳石。對黨的無限忠誠不僅體現於政治、組織上，而且應體現於生活中，內化進思想深處；某種程度上，政治和生活合為一體，理性和情感互為交融，黨員應該成為革命機器的螺絲釘。當事人回憶：

經過和風細雨的整風運動和急風暴雨的「搶救運動」，總算把知識分子從頭到尾，從思想到習慣，從祖宗三代到親朋好友，以至所有社會關係，做了一次又一次反復的解剖和沖洗，洗掉了靈魂與全身的灰塵，連每個人的隱私也暴露無遺。用現在的語言說，就是達到了很高的透明度。不僅看自己透明，看別人也是透明的。¹⁷

造就黨一眼可以看透、對黨沒有任何隱瞞的透明人，初看上去平淡無奇，細細品味，其實意味深長。人類認識自己難，認識他人更難，整風運動卻追求使革命群體變得透明。儘管這樣的透明只是理想狀態，現實中大概永遠無法達至，內中也不無與永恒人性的齟齬。但一支政治力量表現出這樣的渴望，已足以顯現非同一般的控制要求和駕馭能力。人類的力量常常因相互間的誤會而耗損，透明人的狀態可以期望減少許多在黨看來是無謂的衝突，讓革命群體的力量在相互理解中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對於一個效率優先導向的政黨，這樣的目標的確足夠誘人。

當然，即便是中共，要造就透明人亦非輕而易舉。要讓人變得透明，政治、思想、組織上的清洗都不可或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政治清洗運動不是個案，清洗固然清除了反對力量，卻也常常因強

15 羅淑蓉、林品強：〈朱德與延安整風學習——從一本朱德藏書說起〉，《百年潮》2016年第12期。

16 亨洲：〈我的過去和現在〉，《晉綏學訊》第7期，1943年9月15日，第21頁。

17 王仲方：〈民族學院的精神洗禮〉，任文主編：《我所親歷的延安整風》下冊，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4年版，第135頁。

大的殺傷力反噬自身，蘇維埃時期中共即有過相關的經驗教訓。正是基於這樣的經驗，整風運動多數時候更多強調的是思想改造，是在基本肯定現有革命群體基礎上，進一步增強凝聚力的思想和生活統一運動，強調自覺而不是簡單壓服。毛澤東後來談到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時說：「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黨內也好，黨外也好，有他的動搖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動搖性是他們壞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說來，能夠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從黨內來說，延安整風就是一個證明。……我們黨給他們指出方針，向他們進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義，而是逐漸使他們自覺，這就很有成效。」¹⁸可見毛對整風的思想自覺路徑頗有自信。當然這種思想和生活改造不是和風細雨的自我勘磨，而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形成外在的衝擊力，輔以革命群體不斷被激發的內部自覺，達成思想價值觀的重塑，由此讓所有人衷心服膺，傾心向黨。

整風的方法，如毛澤東總結的，以發動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始，不論前後期、延安或者敵後根據地，大致都是如此：

必須極大地提倡民主，公開號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互相批評，提倡各學習單位出牆報寫文章，批評領導，批評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況例外)絕不加以抑制。在此階段內，對於四三決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強調，而對於該決定上要求注意領導方面，則暫時不予強調。這樣做的目的，第一，在於使下情獲得上達的機會，表露各種正確的意見，發揚正氣糾正缺點。第二，在於讓有錯誤思想的同志，盡量表現其錯誤觀點，以便根據其表現而給予具體的與明確的糾正，……第三，在於使內奸分子利用我們的民主政策，認為有機可乘，盡量暴露其反黨面目，使領導機關與廣大幹部逐漸識別他們。¹⁹

18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21頁。

19 〈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1943年4月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0冊，第276頁。

完成思想暴露、批評、整頓、改造的第一步後，再趁熱打鐵發展到審幹、肅反，審幹、肅反和整風相輔相成，思想自覺和外在壓力相互激蕩，這是整風能夠給參與者留下深刻刺激，導致發生中共期望的突變的催化劑。如果觀察中共歷史，可以發現，無論話語體系和實際操作，誘導和控制總是互為補充、缺一不可的。

2. 自我反省

中共革命開展的社會環境，和馬克思主義描繪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大工業背景迥然相異。儘管現在的人們大多知道個體革命觀念的生成並不一定和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畫等號，社會基礎和環境只是造就革命的因素之一，既不是絕對因素，也不是唯一因素。但是，這樣的認知本身就是長期革命歷史形成的經驗，或者說也是這場革命的成果之一。當年，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經典作家的表述有著決定性影響，這既體現在對革命者出身、家庭成分及經歷的重視上，也體現於中共黨人對自身生長環境的極度敏感中。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大工業原則，建立集體主義的邏輯，成為中共黨人對抗自身小農環境的武器，這樣的追求，和共產黨人強調紀律的原則又恰相對應。中共黨員多出身於知識分子，來自有產家庭，他們從對外界的瞭解中選擇了共產主義，但這種知識背景後面的有產者身份卻又成為加入革命後的原罪，不斷克服自身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成為中國黨給自己提出的一個持久艱巨的任務。

整風運動之前，中共黨人加強自身思想建設的主要途徑是展開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教育。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相信思想立國的時代，無論三民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都被信奉者視為救國救民的良方。新文化的興起及狂飆突進，起碼指示了當時時代的方向和選擇，即在文化上再造中國。國家的改造被認為首先繫於思想文化的改造，當然，這樣的思路的確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個和古代中國迥然不同的新中國，正是在新文化的大旗下催生的。

如果說思想文化的改造在世紀初的中國幾乎已成共識，那麼共產主義者的思想改造之路又遠遠把其他政治力量拋在身後。共產主義革命本身即蘊含著思想革命的取向，共產主義從書齋走向實際，固然不脫時代的需要，卻也顯示著思想引領革命的現實，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²⁰ 理論在共產主義革命中具有先導的意義。中共在理論學習上全力以赴，革命陣營形成濃厚的政治學習氛圍，為中國其他政黨無法比擬。整風期間中共幹部描述：「三七年到達延安，一種濃厚的政治氣氛刺激著我。『自己太落後了；一個共產黨員竟不懂得馬列主義。』當時周圍的人談起問題來都在爭相引用馬恩列斯的成語，更有不少人在以此作為測量一個人革命修養高深的尺度。」²¹ 這個描述產生於整風運動期間，不是為了讚揚抗戰初期延安的學習風氣，而是諷刺整風前研讀馬恩原著為死背教條；恰恰如此，它說出的延安學習氛圍濃厚的事實，應更為可信。

整風運動前的思想教育重在研讀馬恩經典，整風之後，馬恩原著當然還是意識形態教育的內容，但明顯強調中國化，也就是結合中國實際產生的馬克思主義。更重要的，思想改造從外在的思想灌輸進到內在的心靈覺悟，王陽明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整風就是要破心中賊。如果說之前的意識形態教育是希望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擠走中共黨人心中的非無產階級觀念，整風則要用內擠外壓的大規模運動形式，清空心中的私心雜念。一個是循序漸進的思想滲透，一個則是不由分說的徹底清洗，後者的目標和難度當然要遠遠大於前者，付出的努力和激烈程度也非前者可比。

20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

21 郁文：〈我與理論學習〉，《晉綏學訊》第3期，1943年4月15日，第8頁。

整風的徹底清洗，離不開規訓的手段——審幹、肅反等，卻又不是簡單的灌輸或強制，更多是希望經由思想的教化達到內心的統一。中共整風文件說：

必須當作一個啟蒙運動，即主要是啟發他自己內心運動，引起其自覺。外力有時候也是必要的，但單純的外力是無濟於事的，不是壓不進去，就是完全把他壓垮了。所以外力必須經過他內心的運動，最好是在他內心已有運動的條件時才可用。實際上只有這樣的外力對他是一種援助，是對症下藥，他很樂於接受，否則是徒然增加其反感，或使其更陷於迷惘。²²

整風當然不能不藉助外力，外在壓力是個體自覺不可或缺的催迫力量，但整風更主要的還在於自我改造，外在壓力必須內化於自覺自願，這是中共黨人政治文化的關鍵，也是整風運動的關鍵。具體觀察，整風的過程，即為亮出自我、清空小我、樹立大我的過程。

整風要求亮出自我，即自我反省。彭雪楓談道：「根據陝北邊區的經驗，個人思想檢查到工作總反省分三個步驟：1、先從個人寫反省自傳或口頭反省，經小組會和支部大會的討論，而後進行總結。2、從目前的嚴重現象來著手檢查，從對嚴重現象的檢查來進行個人的反省。3、首先在黨內發動坦白運動，造成對黨坦白的熱潮，而後進行思想檢查。」²³ 彭雪楓談到的這三個步驟，各地順序不盡一致，從音樂家馬可²⁴

22 〈從整風來看幹部思想與今後的幹部教育問題——太行區黨委宣傳部長磐石同志在1944年8月會議上的報告〉，《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1943-1945)，第702頁。

23 彭雪楓：〈關於中央整風新指示及華中局補充指示的傳達〉(1943年6月20日)，《淮北抗日根據地史料選輯》第4輯，豫皖蘇魯邊區黨史辦公室、安徽省檔案館1985年版，第148頁。

24 馬可(1918-1976)，江蘇徐州人，作曲家。1939年到延安魯藝音樂系，代表作品有《游擊戰歌》、《七月裏在邊區》、《南泥灣》等。

的日記看，他先是參與集體討論，再撰寫思想自傳，然後集體討論、反省、坦白。²⁵

中共黨人的反省，和中國傳統思想中講求的自省有著相似的思想進路，不過實際操作有巨大的差別。傳統中國的自省多少受到佛家的影響，趨於內省、冥思、禪靜一路，中共的反省則不是「獨善其身的修身運動」，而是「思想革命的群眾運動」。²⁶ 自我反省不是簡單的個體行為，而要經過個體與集體、下級與上級的不斷互動，深入解剖自己的歷史、思想、行為，反省不能僅僅是口頭上的，只要可能，都應形成文字。中國歷史上，大概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整風這樣，予書寫以如此高的重視。毛澤東在整風動員報告中反復強調：

中宣部那個決定上說要寫筆記，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寫筆記。你說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幹部也好，老幹部也好，學校也好，機關也好，都要寫筆記。首長首先要寫，班長、小組長都要寫，一定要寫，還要檢查筆記。……現在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在寫筆記，這是很好的現象，犯了錯誤還要裝老太爺那就不行。²⁷

參加過整風的人，回憶中都會不約而同地說到寫個人自傳，夜以繼日，一稿接一稿，這是一個充滿壓力和省思的過程：

整風把我全部的思維全牽連著了，我再也不會想其他無關緊要的事情，我每天每夜的思想活動全是坦白反省，甚至於為了婦幹會的演出節目，有一個角色我全不願意管它了。我的詞還沒有抄，有時如沒人提醒就像忘死了一樣。真的，每天都在不停的寫，

25 《馬可選集》七《日記卷》上，人民音樂出版社2017年版，第681-748頁。

26 廖井丹：〈怎樣克服反省的困難〉，《晉綏學訊》第2期，1943年3月31日，第51頁。

27 毛澤東：〈關於整頓三風〉，《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16-418頁。

每一分鐘全在想，像寫不完想不完的一樣，越寫越多，越想越複雜。²⁸

這裏所說的寫不完想不完的就是思想自傳、反省筆記。動手寫比單純的冥思當然會形成更強的刺激，反省的文字記錄對於組織跟蹤每個個體，瞭解思想變化，評判材料真實程度，也是很好的依據。山東根據地專門規定：「可發揚同志記學習筆記，每人都做。但在第一階段內不一定強調檢查，以免限制民主，因怕檢查妨害其真實的反省，或故弄文墨，自欺欺人。但獎勵同志自動送筆記給同志或領導人看。」²⁹ 129師要求反省筆記「寫好後要傳觀、批評、批改，擇其好的、壞的發表與批評」。³⁰ 為推動反省的展開，可充分發揮輿論的力量，利用報紙登載反省報告，交流經驗，發現問題，引導反省的進行：「各區黨委可發刊思想反省選集，亦略去姓名供大家參考，並作學習的補充材料。」³¹

中共向來注意通過發現積極分子，建立示範效應提高貫徹效能，反省運動中也在發現、總結有益的經驗。中共中央黨校秘書張子珍奉命整理一個叫秦振的人的反省心得和經驗，他把經驗提交上去後，上級回饋強調了幾點：「貫徹讀、想、寫、做於學習之中」；「就文件來反省的，很自然的是為了搞通文件而反省的」；「經過反復思考之後發現問題並提出問題與人漫談討論的——自學為善，但還求助於人」；「不是形式的為筆記而筆記」。³² 這樣認真、深入、帶著問題思考的反省，就是中共

28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4年3月24日，第99頁。

29 〈五年來工作總結及今後任務〉（1943年8月19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0輯，第97頁。

30 〈一二九師政治部關於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第三號指示〉（1942年8月23日），《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1943-1945），第593頁。

31 〈五年來工作總結及今後任務〉（1943年8月19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0輯，第97頁。

32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3年12月6日，第8頁。

期望的模式。通過不斷的自我批判和耳提面命，中共黨人逐漸在向著黨倡導的「脫褲子、割尾巴」靠攏，中央黨校二部的總結中寫道：

一個同志，在假期中即考慮如何總結，反復的想，普遍的和別人交換意見。……想來想去，總是拿不定主意，於是拿起毛主席的〈《農村調查》序言〉來研究，覺得還是由典型著手。由近及遠，較為合適，但怎樣子算典型？自己的典型住在哪裏？就又考慮起來。首先考慮到他和別人爭論問題時好發脾氣，為什麼發脾氣？發脾氣是一種什麼思想？一連串的「為什麼」追問下去，……他的總結曾修改了8次才完成。由於用腦過度，晚間失眠，午睡遺精。³³

總結寫了8次不是偶然現象，寫思想自傳、反省筆記成為整風中一段既具高度儀式感，又對當事者內心形成巨大衝擊力的難忘經歷。劉白羽記下他寫思想自傳，一遍一遍寫，又一遍一遍被否定的過程：

我從我剛剛記事寫起，我想起有一次我坐在院子裏，把正在洗衣服的女傭人的髮髻一下打得散落開來，我把這都作為剝削階級的惡行寫下來，可是張如心還是不通過。這時，我的思想鬥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正因為我是認真的，因此也是痛苦的，我克制了憐憫自己的心情，毫不隱藏地挖掘自己靈魂中的痛疽與腐朽……這是鮮血淋漓的生死較量。我為了洗去我的罪惡，連骨頭縫都掏挖淨盡了，可是還不行，這怎麼辦呢？……我在黑漆漆的夜空下，走過那彎彎曲曲的壁陡的山徑，當我來到山巔之上，一種冷酷的感情緩緩升上心頭，我的眼前一下發焦發黑，絕望之感猛然襲來，這樣活下去實在沒有什麼意思，我不如死了好，我忽然想從高高的懸崖跳下去……³⁴

33 〈中央黨校二部學風學習總結〉（1944年9月17日），《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第278頁。

34 劉白羽：〈平地風雷〉，《我所親歷的延安整風》下冊，第80頁。

幸運的是，劉白羽沒有跳下去，他的思想自傳第五稿也通過了。

正像劉白羽自己在回憶中說到的，張如心並不是存心跟他過不去，甚至劉起初的稿子也並不一定就不能達到標準。關鍵是，思想自傳、個人筆記的寫作作為運動的關鍵一環，必須以之作為思想的擠榨器，讓每個人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無保留地袒露內心世界，而人的自衛本能總會或明或暗地抵制著這樣的要求，因此，一遍遍地不予通過，就成為強迫性的外在壓力。這一點，從運動中規定的上級批閱筆記要求中，可見一斑：「將筆記中有關思想問題的話，以色筆標出，或明指，或暗示，或正面提，或反面側面提，以簡短的話批注在字裏行間，然後在筆記之末，寫出總批語，如同國文教員批卷子。這對於只會寫現象的同志，可以幫助他逐漸抓住自己思想的中心，並使其反省與文件精神密切聯繫，形影不離。」³⁵ 就整風的目標言，思想彙報的生產過程，需要的不是判斷，不是表態，而是活思想。所以，當時一些看起來中規中矩的思想反省，因為缺乏個人活生生內心世界的呈現，常常被作為形式主義的活標本。中共很清楚，政治正確的話語傳遞很容易完成，而內心世界永遠比理論表述複雜，只有瞬間反應都能符合黨的要求，不僅僅是思想和黨一致，情感上也完全靠攏黨時，這個黨員才可以說達到了整風的期待。這就是社會學家涂爾幹觀察到的：「僅僅根據我們對某一物體的喜愛和尋求並不能使我們獲得更多的力量；而要想實現這一點，這物體本身必須能釋放出一種超人的力量，並且要求我們本身能夠通過某種方法使這些力量進入我們體內並且和我們內心生活混合在一起。我們只靠思維不能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必須置身於這種力量的活動範圍之中，並更好地感受到它的影響。」³⁶

思想彙報形成的壓力超乎想像，不是所有人都能從這樣的思想風暴中挺過來，不止一個人提到：「初期整風，發現自己一無所長，周身是

35 蕭揚：〈第三組的學習方法〉，《晉綏學訊》第2期，1943年3月31日，第18頁。

36 涂爾幹著，杜守錦、彭守義譯：《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頁。

病，一變過去自滿自足的樣子，悲觀起來，不可終日，曾感到自己沒有存在的必要。」³⁷山東根據地魯南區整風反省中，費縣第二分區區委書記江林在全縣活動分子大會上，因反省內容被否定並受到同組黨員批評，開槍自殺。他在「絕命書」中寫道：

同志們整風是整自己的思想，我是整我的生命……黨同志已是不相信我了，我已失去信心了。不管正確否，必須應接受，這是難證實我的心，這是次要問題，尤為主要的對黨的損壞我無法來償還。我是來革命，誰想到我又成為革命的敵人，難道還能叫革命人來殺我嗎？³⁸

一般而言，自殺都緣於極度的絕望，江林的死當然也是絕望的產物，但他的絕望是不被理解、接受，選擇自殺某種程度是寧願自己了斷，而不願被處死。應該說，江林誤會了整風的真實含義，整風固然有組織上的處理措施，也有搶救運動這樣的嚴厲打擊，但是，整風並不意味著對打擊對象的完全拋棄。即便是搶救運動，造成的人身傷害仍然無法和蘇維埃時期的肅反相比；和1949年後的政治運動比，整風整體上也顯得較為溫和。看起來來勢兇猛的運動，卻包含著中共對幹部群體整體上的愛護和期待，所謂「對幹部要保存他教育他」，³⁹保存、教育還是主基調。當然，這一點，正在歷史現場翻滾的人們確實很難把捉。正因為有著如上所說的基調，整風中既有江林的自殺及大批幹部的被「搶救」，也有像楊國宇這樣，有驚無險，出身冷汗後過關。

37 非垢：〈關於「理論、文藝、工作」的反省——在整風座談會的反省〉，《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70頁。

38 魯南區黨委：〈區委關於江林在整風中自殺問題處理的決定〉（1944年9月），山東省檔案G028-01-0009-003。轉見李里峰：《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7-218頁。

39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的要點〉（1943年3月16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0頁。

楊國宇17歲參加紅軍，經歷單純，應該說並不存在嚴重問題，但正如他在日記中寫到的：「支部通知我寫好自傳，我已寫好了的交支部，還沒看內容，就說太簡單了。現在起要審查我的歷史（前方來的七大代表統統要審查），我自己本來就很單純，清白，可自己也不自覺地心跳起來。」⁴⁰

楊國宇的審查意外地遇到問題。談到家庭狀況時，楊國宇說自己家有隻三條腿的水牛，遭到嚴重質疑：「尤其那個陝西同學，他是小組長。你說說一個牛能活多少年，你爺爺起，就是水牛，到你手裏還是那條水牛。再說，牛都是四條腿，你家的牛為何只有三條腿。」楊國宇很早就離開家，所謂三條腿的水牛只是聽父母說，自己也講不清楚。

有意思的是，一個只聽父母說過、並不能真正理解含義的說法，楊國宇卻寫進自己的歷史交代，或有人會認為這是多事，但在當年，這並不是那麼簡單。楊國宇的做法，毋寧說是大多數人在當時處境下會做出的選擇。

整風期間，個人歷史的書寫有嚴格要求：「從個人歷史上追究根源。追究的辦法，是從祖宗三代，家庭經濟狀況，親朋關係，家鄉生活，學校生活，社會活動，一直到思想轉變，入黨動機，黨內工作，團結幹部等等。以批判的態度，敘述自己全面的歷史，別人聽了提問題。」⁴¹ 其中，個人家庭情況的交代十分重要。按照階級分析的理論，家庭出身會烙下深刻的階級觀念，這是黨需要認真應對的問題，每個個體有義務給黨組織提供真實的材料，便於黨組織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造。隱瞞自己的家庭出身，意味著對黨不忠誠，會受到嚴肅的質疑和問責。為防止個人對黨隱瞞，黨組織還會有選擇地展開調查，掌握幹部的第一手材料，「有時用幾十個人，從各方面——如同志、同學、親戚、

40 楊國宇：《劉鄧麾下十三年》，1944年1月5日，第232頁。

41 蕭揚：〈第三組的學習方法〉，《晉綏學訊》第2期，1943年3月31日，第21頁。

朋友、老鄉各方面——去調查愈詳愈好」。⁴²這樣的措施，常常發生巨大的震懾力，馬千里的日記提到：「下午的大會上，郭教育長、黃主任提出××在南通、南京等處活動的旁證材料，××大為驚恐。」⁴³正因此，儘管楊國宇不知道三條腿的水牛是怎麼回事，還是如實向組織報告，畢竟，水牛是農村重要的生產物資，也是判斷家庭經濟狀況的重要參考。

楊國宇三條腿水牛的爭議，成為思想彙報通過的障礙，因為無法說清怎麼會有三條腿的水牛，他的交代受到質疑，而這又會引起對他整個歷史敘述是否真實的懷疑。整風期間的經驗是，掌握材料之後，「若在這些材料之中，發現有矛盾之處，即開小組會審查，大家提出對可疑處的質問。直至最後，使其吐露實情（有的對自己的歷史，做五次以上的假造者）。對這樣的分子，重者可以逮捕。」⁴⁴無奈之下，楊國宇找到劉伯承，劉建議找老同志伍雲甫說說情況，伍雲甫聽後分析：

我們南方有這種情況，一條水牛，為什麼活那麼長，比如說水牛用老了，到市場花少幾塊錢，即可換條小水牛，從祖爺到你手裏當然還是水牛。我連說：是，是的，我們四川跟你那一樣。接著他又說：為何一條牛只有三條腿，兩條腿的。你家田多出三條腿的錢，他家錢少、田地少出一條腿的錢，兩家合買一條水牛，你家佔四分之三，當然是三條腿。

三條腿的水牛終於說清楚了，楊國宇「高興得不知怎麼感謝這位文質彬彬的老同志」。⁴⁵只有瞭解整風的歷史情境，才明白整風中個人自傳如何影響著一個人的命運，也才能理解楊國宇此時的心情以及當事者對此的極端審慎：「我挖空心思，考慮個人自傳中是否還有補充的情

42 《景曉村日記》，1943年7月13日，第145頁。

43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3年1月27日，第589頁。

44 《景曉村日記》，1943年7月13日，第145頁。

45 《劉鄧麾下十三年》，1944年2月，第232-233頁。

節。我將家兄歷史尚未寫清楚的部分進行了補充。對黨必須一絲一毫不隱瞞。我把補充材料寫好後，便覺得輕鬆愉快。」⁴⁶

3. 集體鬥爭

亮出自我只是第一步。對個人主義的自我改造，清空自我是不可忽視的關鍵環節。

我是什麼？我是一個人。是什麼樣的人？是好人。怎樣證明我自己是好人？如果世上只有我一人，自然不會提出這問題。如果另外還有一人，我說自己是好人就必須向他證明。用什麼？用語言還是用行動？如果我對這人有所助益，即使我不說，他心裏也會認為我是好人！再進一步，我對他的助益是根據他的意願，還是根據我自己的意願，很清楚，要根據他的意願和需要，這不是廢話麼？不！這是最初級的主體與客體之關係的說明，判定我是否好人的不能由我自己。⁴⁷

自己不能判定自己是不是好人，自己也不能確定自己走的路是不是對，個體只有在對應他人時才有可能予自己以定位。這就是整風期間中共高層往復研究人性、是非、善惡問題時講到的：「人首先是社會的動物，資產階級總是強調人的理性（精神），我們不應如此。」⁴⁸基於這樣的認知，針對普通幹部的整風指向的主要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個人主義被認為是影響黨的力量發揮的障礙。康生說得很明白：

46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3年1月9日，第582頁。

47 于敏：〈重要的是認識自己〉，《于敏文集》第7卷《報告文學·散文》，中國電影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頁。

48 毛澤東：〈關於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1943年12月17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82頁。

黨的組織原則與鐵的紀律，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確是一種「緊箍咒」，不僅是「箍」，而且這箍還是鋼鐵製成的，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緊箍咒」，則幾十萬共產黨員，都會變為天天鬧個人主義，鬧獨立性的「齊天大聖」，每一個地方黨都會變為「自由王國」的「花果山」，這樣共產黨便會立刻死亡，故「緊箍咒」之所以必要，而且上至每個中央委員，下至支部每個黨員，還必須緊緊的戴著，其道理就在這裏。⁴⁹

清理個人主義，首先要讓大家發現及直面自己的個人主義，此即亮出自我。亮出自我的任務完成後，接下來，就是清除附著於自我的個人主義。清除個人主義的武器是與之相對的集體主義，清除的辦法，也多採取集體的形式。

自傳、反省筆記書寫完成，進入自傳和反省筆記「互相傳閱，提出意見」⁵⁰ 階段。寫思想彙報，痛挖靈魂深處只是思想鍛煉的一部分，面對面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才能將思想碰撞推向白熱化，集體力量充分發揮，不是個人苦思冥想和領導文字提點所可比擬的。在集體的熱烈氣氛中，參與者聆聽、陳說、自我批評、相互批評，付出感情，帶動思想，將反省推到新的高度：「實現反省的方法有多種，但主要的還是依靠用集體的反省方式，每週至少開三四次反省小組會，在會議中以個人為單位，逐個討論，一般的方式都是先由反省者本人做一個報告，然後再由大家發問，辯答，爭論，一直到把問題弄清楚了。」⁵¹ 當事人回憶參加整風會議的思想變化：「在開會之始，只是聽一聽，對自己總有好處，還沒有整自己的意識，所以第一天還馬馬虎虎聽。在準備發言與發言之後，態度不同了，同時會議上的發言，對自己有了啟發。……參加這

49 康生：〈怎樣研究中宣部四月三號決定〉，《整風學習資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6頁。

50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3年5月3日，第644頁。

51 龔子榮：〈區黨委機關學習方法的一些經驗教訓〉，《晉綏學訊》第2期，1943年3月31日，第14頁。

次會議，我覺得對我比其他同志教育特別多，好像是入黨以來最好的一次教育。」⁵² 整風要洗心革面，讓黨員幹部通過書寫挖掘自己，通過言說面對自己，再通過會上的互動相互暴露揭發，進而達到自我反省的效果，這是全方位的自我清洗：

反省就是意識地幫助共產主義的「我」擠出非共產主義的「我」，要經過這個思想鬥爭，才能使自己與文件結合。也可以說，文件是供給共產主義的「我」以武器，而反省就是用這個武器去驅逐另一個非共產主義的「我」，最後使自己變成一個健全的真正的共產黨員。⁵³

中共革命運動中，會議向來備受重視，嚴密的組織和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中共會議形式的兩個基石。會議具有喚醒和激發情感的功能：「在以一種共同的感情使之振奮的集會中，我們變得能夠接受在僅剩下我們自己的力量時所不能接受的感情和行為。」⁵⁴ 整風似乎深諳這一道理。整風期間，亮出自我、清空小我的過程，很大程度就是以會議的形式展開、完成。這些會議多是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由朝夕相處的同伴的相互批評、揭發，達成對自我的批評、糾正、克服。處身中共革命陣營，相互之間的批評既是權力，也是義務，是幫助進步、防範錯誤的途徑。在自己追求進步和幫助他人進步的前提下，加之黨組織的要求、紀律的約束，整風會議往往開成每個人的過關會，日常熟悉的夥伴成為最銳利的批評和監督者，面對眾目睽睽的壓力，大多數人會選擇跟隨眾議，盡可能挖掘自己的錯誤，以安全過關。參加完整風會議的劉燕瑾寫道：

大會上別人對我的發言提出了尖銳意見，覺著反省不全面不深刻。哎呀！這一個迎頭痛擊，使我痛得發抖了。我再也不敢正視

52 〈軍區第×小組意見〉，《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89頁。

53 廖井丹：〈怎樣克服反省的困難〉，《晉綏學訊》第2期，1943年3月31日，第51頁。

54 涂爾幹著，杜守錦、彭守義譯：《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第229頁。

我周圍的人，我慚愧得面紅耳赤著。我後悔。我為什麼檢討的不深刻而遭到這場攻擊呢？太傻！太傻！實在的太傻了。在這樣的會議上還企圖隱瞞嗎？群眾的眼皮薄，群眾的眼睛亮，再痛苦的挖一挖吧！反省是要經過痛苦過程的，沒有深刻的內心鬥爭，你的反省哪能深刻呢！唉，我失策了！也好，讓大家這樣幫我挖一挖吧！⁵⁵

整風的會議循序漸進，基本按照小組會、支部會、大會由小到大逐漸推展。中共剛成立時，最基層的組織稱為小組，二大制定的黨章規定：「凡有黨員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組，每組公推一人為組長，隸屬地方支部。」⁵⁶ 中共四大修正黨章規定：「各農村各工廠各鐵路各礦山各兵營各學校等機關及其附近，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⁵⁷ 支部取代黨小組真正成為最基層組織。按照陳雲的說法：「支部是黨的最下層組織，也是黨的最基本的組織。黨的一切口號、主張、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體深入到群眾中去。」⁵⁸

中共實際運作中，常常會根據工作需要，分出小組，這樣的小組不是正式的一級組織，只是臨時性的工作或生活組合，這樣高度機動性的組合方式，保證組織隨時可以落地。整風中的小組常常指的就是這種組合。比如太岳縱隊在整風中，「各級首長與各部科股長成立中心小組，其他有自習能力的幹部編為乙組，無有自修能力者編為丙組，又以行政工作為單位編學習小組。」⁵⁹ 小組和支部，屬最基礎的組織原子，通常

55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5年3月29日，第224頁。

56 〈中國共產黨章程〉（1922年7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164頁。

57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1925年1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263頁。

58 陳雲：〈黨的支部〉，《陳雲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頁。

59 〈太岳縱隊一九四二年政治工作總結報告〉（1942年12月），《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2卷（1941-1942），第659頁。

都是熟人圈子，相互之間秘密最少，又最多。所謂最少，就是相互熟悉、瞭解，相互暴露最多；所謂最多，就是相互間常常機緣巧合掌握一些對方的隱私，成為不公開的秘密。在這樣的熟人圈子中展開反省、暴露，極具針對性。小組會「一個一個過，追問」，⁶⁰ 無論對自身還是對他人，都以批評為主，「一針一線都搬出來」，⁶¹ 主要作用是自我暴露和相互暴露：

要善於啟發大家把內心的一切都傾掘出來。方法上可以採取小組自由漫談，互助、牆報、大會典型啟發之外，還可以舉行幾個組座談（因大會發言機會太少）。當然暴露也不能是單純的尾巴展覽，其中也可以夾雜一些批判，以便於引起爭論。但只有在暴露階段過去，才能從思想上解決問題。⁶²

為了讓同志們更徹底的暴露思想，不應馬上碰回去，讓其說完，搞一點批評。既暴露了，那就要批評，最後，取得意見的一致。暴露也是為了改造大家的思想，不是陰謀。……什麼叫做思想領導，即不是以組織、指示去解決問題，而且在思想上解決問題。⁶³

每一個人的一切都通過自我批評和批評暴露出來，徹底放在太陽底下。

為造成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空氣，支部會特別是小組會應有周密的準備，要善於調動積極分子，推動會議深入：「有計劃的調動積極分子首先進行自我批判（但注意不要刺傷其他人），以引起大家的自我批判，形成群眾性的批判運動，進行充分討論，使之辨清是非，以群眾的正氣

60 〈野戰醫院小組意見〉，《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82頁。

61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2年8月25日，第525頁。

62 張磐石：〈關於幹部教育工作——如何繼續完成整風與今後新的幹部教育計劃（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地組聯席會議上的報告）〉，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編：《黨的建設》，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6頁。

63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3年12月15日，第13頁。

克服其邪氣。」⁶⁴ 小組長和支部書記負有領導會議的責任，小組長起碼需要做到如下幾點：「1、會前應幫助當天的發言同志準備（引導不是替他準備）。2、在開會中注意引導，如優點沒說出來就發問（學習的態度），缺點應如是，隨時注意掌握會場情緒。3、會後除發動大家漫談外，可調查補充材料（具體數字等），供給記錄同志。」⁶⁵ 好的支部書記組織會議時，可以做到：

對每一個人的思想研究的很細緻，他想出了解決問題（幫助同志）的辦法，如多叫人去和典型人物漫談，提他在大會上發言，有英雄主義的人但不願在大會上發言，適當的鼓動一番，……解決問題是本著治病救人的態度的，如他對王央剛的錯誤思想佔有許多材料，但為了幫助他解決問題不一下轉出來，而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解決，這樣不僅使他不受打擊，而且別人看起來也毫沒有打擊的成分在內。⁶⁶

晉綏的整風報告列舉利用小組會幫助幹部一步步深挖內心的案例：有一位幹部一貫忠實為黨工作，很少犯錯誤，整風初期找不到反省的著力點。經過小組會的啟發，這位幹部「反省到因為低不下去頭，曾在黨的原則之前，固執自己錯誤意見，事後又痛哭流涕的去承認錯誤，而此承認錯誤之精神，主要還是屈服於黨的紀律，怕黨不信任，或開除黨籍」。由此，啟發他思考積極工作的出發點究竟是什麼？得出的結論是：「對任何艱難危險的工作，都做敢為，其推動的力量是怕人看不起，怕開除黨籍，而開除黨籍實在有負介紹人的恩義。」這種恩義觀自然不符合黨的要求，抓住這一點，進而引導思考應該如何對待同志關係：

64 張磐石：〈關於幹部教育工作——如何繼續完成整風與今後新的幹部教育計劃（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地組聯席會議上的報告）〉，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編：《黨的建設》，第406頁。

65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年10月6日，第79-80頁。

66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年6月30日，第62-63頁。

他才反省到他所認為的好的同志，則崇拜盲從依附之，對自己義氣相投的人，可剝心露骨，非常熱情，在這一點上，動機雖好，立場卻不穩定。那麼究竟為何如此，至此才找到他幼年對俠義生活的愛慕，和地主家庭生活中養成的驕逸任性，都是悠久的歷史根源。

固然，這樣順藤摸瓜的尋找，並不一定完全符合黨的要求，深挖思想根源時，可能又忽略了思想的影響是多重的，攻其一點，難免不及其餘。不過，就整風言，深挖思想根源不完全是為了得出具體結論，更重要的，還是這種行為本身對被幫助者內心造成的震撼。深挖的目的是暴露，一層層剝開個體藏在內心深處不願為外人道的隱私，讓自我暴露於眾目睽睽之下，這種對自我形式上的棄絕，或多或少總會衝擊內心深處自我的位置，所謂：「整風中思想上的啟發，要做到衝破其狹隘思想，使之有動於中，恍然大悟，造成思想的展開，提高其政治覺悟，這是要因人而宜的。因之必須接觸每一人思想的深處，才能做到。」⁶⁷

中共是一個高度組織化政黨，無論感化還是催迫，組織的力量都有著特殊的作用，徐光耀從親身體會中感受到：「沒有嚴格的組織生活，人就要落後下來，至少是很難進步。」⁶⁸ 很多幹部都把自己付託給組織，所謂：「只要跟著黨走，個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問題就可以解決。自己有缺點，也只要把自己委託給黨：『請你改造我吧！』」⁶⁹ 整風中的小組會和支部會，就是以組織的力量，來重塑一個個個體。習慣了組織生活的黨員，置身於集體批判中時，常常會產生奇妙的效果，時人寫道：「我覺得在同志們面前宣佈錯誤，則錯誤成了群眾的敵人，自己成

67 斌：〈加強思想領導的經驗〉，《晉綏學訊》第1期，1943年3月15日，第13-14頁。

68 《徐光耀日記》第2卷，1948年1月26日，第10頁。

69 陳學昭：〈一個個人主義者怎樣認識了共產黨〉，王巨才主編：《延安文藝檔案·延安文學》第33冊，太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頁。

為群眾的一員，克服的決心與勇氣，就陡然增加起來。}]⁷⁰ 自己成為自己錯誤的敵人，這樣的描述看起來有些詭異，但如放到集體批判的情境，放到中共黨員迫切追求進步這一環境，就不會顯得那麼突兀。個體本來就有融入群體的本能需求，同志式的親密關係，更讓這種需求變得迫切，劉燕瑾特別真切地傳達出這樣的要求：

我的內心中有著一種隱痛，我雖然將身心完全投入工作、學習，但是在我的靈魂深處是多麼的空曠與虛渺啊！我不得不承認我孤獨的苦痛是怎樣威脅著我啊！……過去越到了這樣時候，我會越和大家隔離，甚至我會很自恃的來自豪。可是今天我忽的發現了這是我最大的痛苦，是我在人事關係上走錯了道路，是我友愛思想的錯誤。

……

在這個集體裏，你要從事於革命英雄主義的創造。假若你得不到友愛的外援，你自己孤立，那麼你就不會完成你的事業，你的前途都是可怕的。我真是越想越怕，越想越苦痛，苦痛的是我沒有知心的人，苦痛的是我太孤獨。

我決心了，我決心以後要做到能把我一切的心窩子話全可以掏給別人。⁷¹

小組和支部會做了充分的準備和鋪墊後，大會進一步將整風中的思想動員和鬥爭推向高潮。大會有論戰會，這是為了啟發思想，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需要有精密的技術掌握。晉察冀分局黨校召開論戰會時精心安排：「大會發言採取自動報名方式，但在次序上又是有組織的，使持有相同意見同志，連續發言，激起持有反對意見的再連續答辯，這樣自由交鋒，短兵相接的論戰形勢便構成了。大會之外，還有小組會、漫

70 〈石同志來信〉，《晉綏學訊》第3期，1943年4月15日，第32頁。

71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4年7月4日，第180-181頁。

談會，及三三兩兩交換意見，各種討論形式相結合，互相補充。所以廣大群眾性的思想論戰到處展開了，到處醞釀著思想鬥爭。」⁷² 論戰會總的原則是：「領導決不是管人家，叫人家照自己指點的路上走，而應該是領導即指出走哪條路好，讓群眾自覺地走好走的路，因為路是要群眾走的。」⁷³

更多時候，整風大會具有鬥爭會的功能。劉白羽回憶：

所有的人黑壓壓地擠在屋裏，前面是一個土台，這時，中央研究院已改為中央黨校三部。三部領導人主持了這場人與人之間的挑戰，看誰先坦白交代。一位廣東哲學家在台前不斷聲嘶力竭地奮臂高呼口號，這裏的氣氛突然熾熱得變為一場騷亂。我站在人群的後面，眼看一個一個走上台去，還不斷有人向台上遞紙條。愈是親近的人，愈要表明態度，於是夫婦之間、朋友之間喊得愈加聲嘶力竭，以表示自己的忠誠。……這種會經常開到夜深，台口點著兩盞明亮的瓦斯燈，照亮「坦白交代」的人，他聲嘶力竭，捶胸頓足，聲淚俱下。每當這時，有人便帶頭喊起口號，有如大海洪濤，迴環激蕩。⁷⁴

鬥爭大會的緊張氣氛，對被批判者、參與者乃至批判者本身都形成巨大的衝擊力，造成不由自主的從眾心理，許多人心中存有的抵觸和異端情緒在這樣的氛圍中消失、遁去、化為無形。劉燕瑾參加整風大會後寫道：

兩天的會議把人們全開出了眼淚，大家全赤誠的談出了許多問題。一年、兩年、三年以前的事全盤端出來了。兩個山頭全進行了徹底的坦白反省，掏心窩子，互相也提供了意見。……別人在

72 〈分局黨校及直屬機關四十天反法西斯論戰的幾點經驗〉，《整風通訊》第3期，1944年7月20日，第3-4頁。

73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年6月11日，第49-50頁。

74 劉白羽：〈平地風雷〉，《我所親歷的延安整風》下冊，第73-75頁。

講桌前坦白反省時，話句與眼淚一同的流了出來，我在牆根底下也滴下了淚，我再看別人，有的也全低下了頭。……我真被這樣的會給深深的刺激了。我要坦白，我要檢討，我應該比別人反省的更深刻。⁷⁵

這樣的場景，很多人終身難忘，所帶來的心理壓力也可想見。抗戰末期，同為作家的陸地見到高魯，發現三年不見、年僅二十來歲的高魯頭髮已現斑白，高魯告訴陸地：「這是整風運動的成果，伍子胥過關，一夜之間……」。⁷⁶

的確，思想的同化路徑很複雜，有時很難說得清是自覺自願還是外在壓力，更多時候二者兼而有之。何方的回憶寫道，王實味〈野百合花〉發表後組織討論，「一開始，我們這些學員們，幾乎眾口一詞地同意王實味的觀點。因為我們並不瞭解，中央是把〈野百合花〉當作反面教材發給大家看的。我們一個班發一份，給大家念，念完讓大家討論。討論時，大家說，對呀！寫得挺好的呀！寫的都是真的呀！而且普遍認為，革命隊伍裏確實有缺點，提出來是有好處的。」⁷⁷ 何的說法不是信口開河，溫濟澤回憶，展開對王實味文章的批評後，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全院研究人員中作了一個調查，發現對王實味錯誤思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佔95%」。⁷⁸ 而一當領導動員批判，形勢即迅速扭轉，〈野百合花〉成為眾矢之的。何方慨嘆：「那時的批判，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假的，是為了表示劃清界限，還有半真半假的。隨著運動的深入，往往是弄假成真，大家的思想還真轉變過來了。」⁷⁹ 這最後一句話，最堪玩味，即便開始時不無距離，在運動的氛圍下，出於對

75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5年3月23日，第221頁。

76 《陸地文集》第6卷《日記》（一），1945年6月19日，第488頁。

77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何方自述》，第79頁。

78 溫濟澤：〈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任文主編：《延安時期的大事件》，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4年版，第161頁。

79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何方自述》，第80頁。

組織、權威的信任和順服，也會弄假成真，許多人的轉變就是在這種半真半假的思想狀態中完成的。整風剛結束，馬可就講到了自己被迫「坦白」時的心理：

我想我就把自己合理化為一個特務吧，我可以想像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加入什麼組織，填過什麼表，什麼人盟誓，牆上掛的什麼像，桌上擺的什麼東西，什麼房間，幾個窗戶，外面有幾棵樹……我用全部的想像和記憶來努力地這樣合理，若干年後也許這個印象在我腦子裏定型了，連自己也模模糊糊覺得從前自己真的經過這麼回事，就好像現在回想起小時有許多事情真情與夢境常常分不開了一樣。那時全世界上甚至連我自己也不懷疑了。如果黨需要的話，我就以一個坦白了的失足分子的資格向被國民黨教育的大後方青年講話，用我親身的沉痛的經驗教育他們。⁸⁰

二十多年後，文革風暴中，馬可在被隔離的環境下，再次想到這一段經歷。這時，他的回憶已經開始脫出整風的語境：

我被「規勸小組」連續突擊了三週，幾乎是夜以繼日的搞。肉體上的疲憊不說，精神上，有這麼兩個問題卻是我當時的政治修養和思想水平認識不清的。一個是：「你是否相信黨？」（回答當然是肯定的）「既然相信黨，現在黨說你是特務為什麼不坦白？」（其實黨並沒有給予發言者代表黨的權力，但為了要獲得戰果硬是這樣說，這也算逼供信的一種形式吧。）另一個問題是：「既然河南、二戰區、四川這些地方的黨都是假黨是為國民黨特務機關服務的，從這些地方來的沒有一個好人，你能是好人？」「你已經幹了特務的事，為特務機關做了工作但也可能沒有正式參加組織，這是一種不自覺的特務……」等奇談怪論，但當時是出自某些積極分子之

80 《馬可選集》七《日記卷》上，1943年7月7日夾頁，第747-748頁。馬可日記到7月7日中斷了一年多，這段引文應該是1945年恢復記日記後對整風期間經歷的反思。

口，而他也是很認真很嚴肅地這樣說，這樣認識的。總之，在精神肉體極度疲勞和極度混亂的情況下，我做了假招認。

在這期間，我的日記一直是不間斷的。

1943年6月底，在我假招認以後，馬上就「解放」了，還參加對別人的「規勸小組」。但這時，精神上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而更加沉重了。在我記日記時，我就想：究竟真理是非有沒有一個客觀標準呢？我自己還相信我自己不呢？我在日記中對自己說話時，是說老實話呢還是扯謊呢？一個對自己都不相信的人他的精神生活多可怕！在這種極端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我終止了我從1930年開始未曾間斷的日記。⁸¹

當年運動中，多的是1943年的馬可，而不是1968年的馬可，因此，馬可說到的整風中的轉變路徑不乏其例。比如整風期間常常集中辦訓練班，形成一個小的封閉環境，不斷學習、灌輸，進行自我的內心鬥爭，由此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共一個地方機關黨委在整風的總結報告中寫道：

過去尚沒有深刻體驗到「學習就是思想鬥爭」這一真理，學習了但只強調了外力的思想鬥爭，沒有強調內心鬥爭。這次，我們接受了艾思奇同志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風總結中的經驗教訓，強調了這一點，無論在學習文化交談反省、坦白、論戰、鑒定中，都不斷的反復的強調了自我的內心鬥爭。有一個涑源同志說：「開始我瞧不起這個訓練班，一天到晚黏黏糊糊的，真想不到它黏黏糊糊就真把人心都變了。」⁸²

81 馬可：〈日記的故事〉（1968年12月31日），《馬可選集》八《日記卷》下，第772-773頁。

82 〈中共晉察冀一分區地委第一期整風訓練班總結報告節錄〉，《整風通訊》第3期，1944年7月20日，第14頁。

4. 樹立大我

表態批判他人容易，甚至表態批判自己也容易，真正按黨的要求克服自我則困難得多。自我意識是如此頑固，常常讓這些追求進步、渴望具有完滿黨性的中共黨人為之苦惱。中央黨校的報告中提到：「四支一個窯洞住著4個同學，在總結學風期間，不斷地思考，經常地漫談。一天晚上，大家睡下談了很久，後來都不談了，每個人都以為別人睡著了，自己腦子裏又想起來，過了很長時間，一個同學起來小便，其他3個人都問他，才發覺大家都沒有睡著，於是又漫談起來。」⁸³老紅軍竇尚初在大會發言中坦承：「歪風和正風在腦子裏晝夜打架，你叫它滾蛋，它叫你滾蛋。這樣鬥來鬥去，使自己非常苦悶，吃飯不知味道，睡覺睡不著，語言行動都不自然了。」⁸⁴人性中的私太難清除了，幾乎就是一個不自覺的安樂窩，所謂：

在生活上並不想特殊的舒適，但能夠舒適時，也會舒適起來的。……在工作態度方面，並不想出風頭，但如人家貪污我的功績，我還是要感覺不快活的。在自我批判上，並不想掩蓋自己的缺點與錯誤，特別是原則上的，但如人家向我惡意的攻擊與片面的責備，我還是要感覺不快活的。⁸⁵

客觀而言，中共黨人的困惑，不是因為境界不夠，而是黨樹立了一個普通人難以達到的理想化高度，讓這些竭力向黨靠攏的革命者在這樣的高度中無法不看到自己的小。新四軍幹部楊思一記錄了他和同事談話的經過和感想，由此可以體察當年黨員對自身、對他人有著什麼樣的要求。楊記錄周姓同事的談話：「黨內有兩種同志：一種是刻苦自勵，實

83 〈中央黨校二部學風學習總結〉（1944年9月17日），《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第278頁。

84 竇尚初：〈學風學習初步總結——1944年8月17日在二部大會的發言〉，《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第224-225頁。

85 《楊思一日記》上，1944年10月7日，第124-125頁。

實際上很苦，但能嚴守黨的經濟制度，不貪污舞弊，不向黨要求經濟上幫助的同志；另一種是貪圖安逸，實際上並不苦，而常向黨要求經濟上幫助的同志。而黨往往給後一種同志以經濟上的幫助，前一種同志往往是得不到幫助的。」周這番話，楊大不以為然，日記裏評判道：

這裏包含著兩種不正確的庸俗的想法：第一，他認為黨處理問題常常不公平不客觀的，好同志常被冤屈埋沒，壞同志反能多得到黨的幫助；第二，他認為能騙取黨的幫助，就是一種得益，反之，就是吃虧。這是非無產階級意識的具體表現，也是違反共產主義道德的與精神的想法。⁸⁶

愛哭的孩子有奶吃，任何一種政治力量大概都無法避免，周姓同事只是道出了這樣的事實。楊思一卻將此提到共產主義道德和精神的高度，這種日常談話中的高度思想警覺，背後即為黨性要求的支撐。同樣，跟另一位同事談話後，他判斷這位同事：「野心勃勃地企圖創造一個黨（人民黨）一個主義（人道主義），竟然敢不承認階級存在與階級鬥爭，主張所謂『人本位』。」由此，楊生發感想：「我黨小資產階級出身佔大多數，若不進行思想上徹底的改造，黨的一致性和團結性、純潔性就不能徹底實現。」⁸⁷ 人民黨、人道主義、人本位，楊提到的這位同事的看法，多年之後，聽起來還是那麼熟悉，整風就是要清除這樣的認識，而從楊思一的日記中，可以看到整風的要求已經在黨員幹部中落實、生根、發芽。

對於普通黨員而言，整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克服小我、樹立大我，以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馬克思主義從大工業引申出的集體主義取向，運用於中國革命時，恰和革命的紀律需要及中國的人倫傳統相吻合，成為思想改造的重要資源。「我」被認為是通向純粹黨性的大敵，樹立集體主義的大我成為合格黨員的標誌。

86 《楊思一日記》上，1943年11月15日，第42—43頁。

87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6月1日，第159頁。

留法歸來的作家陳學昭曾經深受個人主義熏陶，她描述自己進入革命陣營，尤其經歷整風後的心路歷程：「以前我對於黨一直有著很大的距離，而且自己願意堅持這個距離的。黨所給予的教育，集體教育與集體鍛煉，我認為要磨損一個人優良的個性，限制個性的發展，我怕這樣的教育。在整風中，我發現過去這種想法是非常可笑的。」⁸⁸正是陳學昭，整風後期每天要花幾個小時紡紗，她回憶：「在紡線的時候，我什麼都不想了，一手搖著車，一手拉出又細又勻的線。感到滿意和幸福。夜裏睡在鋪上仔細想想，確實有些懊悔自己成了個知識分子，要是年輕時從事農業勞動，我的大哥也許已經把我送給他的知己同事家做童養媳了。」⁸⁹儘管陳學昭的內心世界或許比她呈現的要複雜得多，但她在紡線時感到的滿意和幸福應屬事實，這種感受在彭柏山給妻子的信中有更高的升華：

人生的任務，不是完全服役於自己，也不是完全服役於他人，而是服役於整個階級，從階級的解放中求得自己的解放。因此一個人的利益與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那麼，追求集體的幸福，同時也就是追求自己的幸福。望你深體此意。⁹⁰

個人利益和階級利益一致，集體的幸福也就是個人的幸福，要達到這樣的認識，當然不可能輕而易舉，需要經過艱苦的努力。太行區黨委的總結寫下了整風中一步步建立中共希望看到的個人與黨的關係的過程：以「心肝對黨，靈魂對人」為口號，討論對黨的認識，「在爭論到最高潮時即引起他進一步的反省，要他考慮黨為誰？你從何而來？黨何負於你？你如何對黨，這樣引起他的歷史自覺和對黨的主人翁之感。」這可以說是情感的喚醒和激發階段。這個階段「要在運動中調動感情。沒

88 陳學昭：〈一個個人主義者怎樣認識了共產黨〉，王巨才主編：《延安文藝檔案·延安文學》第33冊，第343頁。

89 陳學昭：《天涯歸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178頁。

90 彭柏山：《戰火中的書簡》，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頁。

有這個，坦白便不可能，也不能促進其暴露與激發其積極思想」。⁹¹ 情感的促動，在整風中得到高度重視和自覺運用。情感動員後，接下來需進一步予以理路上的鞏固：「回過頭去讀文件，除『反對不良傾向』外，《論共產黨員修養》第二章第三節『怎樣做一個好黨員，怎樣建設一個好黨』及列寧《論建黨》（聯共黨史×頁）等，經過學這些文件武器，最後的解決個人與黨的關係。」⁹²

太行的總結講述的是一個普遍的過程，這樣的過程在個體的經歷中不斷重現，但又各具特點。劉燕瑾日記呈現了個體的的心理狀態：

白天唱舊戲，晚上演話劇，一天忙的不可開交。我個人也就在這裏忙亂著。過去要是看到這樣一些情形，不用說再參加工作了，就是看著有這樣許多人我就厭煩了。我會獨自找到一個角落去看書。可是現在也許不同了，難道這是進步嗎？我還不能肯定，但是我的心理上，每當煩得不行的時候，要發洩或企圖逃跑的時候，我就主動的自語著：「這是為工農兵服務啊！」於是也就心平氣和了，或走了幾步再轉回來。⁹³

值得注意的是，整風對個人主義的強烈批判態度，固然要造成黨員無私的境界，同時還有對晚清以降中國讀書人精神世界發展趨勢的警惕。傳統中國通過科舉制度實現讀書人和國家權力的結合，形成讀書人的升遷路徑。晚清新政後，科舉廢除，讀書仕進道路斷絕，而讀書人以讀書求取政治出路、治國平天下的慣性思維卻沒有改變。讀書人經天下的心理，帝制時代被導入王朝效忠，共和之後，王朝不再，讀書人失去

91 張磐石：〈關於幹部教育工作——如何繼續完成整風與今後新的幹部教育計劃（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地組聯席會議上的報告）〉，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編：《黨的建設》，第407頁。

92 〈從整風來看幹部思想與今後的幹部教育問題——太行區黨委宣傳部長磐石同志在1944年8月會議上的報告〉，《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1943-1945），第703頁。

93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5年3月14日，第162頁。

效忠對象，卻又豪情滿懷，在民族危機面前，更以救國救民為己任。讀書人的這種自我期許在權威失序的時代，很容易得到放大，並形成對權力體系的摧解效應。

整風時期，許多知識分子回顧自己的精神史時，都不約而同提到任性、自負的性格，陳修良自述：「從小沒有進過小學，在家延師教讀，頗受了一些中國清高的名士派作風影響，養成一種任情放縱、狹隘固執、清高自負的性格。……個人主義思想濃厚地存在。」⁹⁴的確，科舉制度下，成功和文學連接在一起，造成中國讀書人的浪漫氣質，這恰和中共定義的個人主義相通。科舉—文人—浪漫氣質—個人主義，可以看到其間一脈相承的關係，這就是當時人講到的：「父親在家中教自己古詩，自己又開始接觸了浪漫小說，這些東西，造成自己追求幻想、愛好山水、不拘小節的超然思想，而把自己變成一個孤高自賞的『風流才子』，為眾人所景仰的『文學家』。」⁹⁵

知識階層處於社會頂層，孤傲的性格、自負的認知加上權威失序的現實，順理成章便會走向權威的對立面。世紀初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廣泛流行，和這樣的思想基因及社會背景大有關聯，某種程度這也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左傾化的基石。不能不說，中國革命的開展，相當程度上得益於這樣的思想背景，但是，當中共革命的重心從反抗權威走向重塑權威時，這樣的思想背景卻已構成為革命的絆腳石，展開清理，有歷史的邏輯在。

從這一思想背景看整風，就容易理解為什麼反對個人英雄主義會成為整風向普通黨員伸展後的另一重要命題。一般關於整風運動的研究，很少關注反對個人英雄主義這個環節，實際上，整風當時，反對個人英雄主義一度成為熱詞，而且主要指向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按照景曉村的說法：

94 《陳修良工作筆記 1945-1951年》，東方出版中心 2015 年版，第 2-3 頁。

95 效農：〈從我的出身和社會根源談起〉，《晉綏學訊》第 4、5 期合刊，1943 年 5 月 15 日，第 32 頁。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參加革命不是直接的、生活的壓迫而開始，是抱為工農而革命的思想，這是主觀主義、英雄主義的根源。而工農參加革命則正相反，其沒有信心做偉大的領袖及實現共產主義，而是為了即刻改善其生活。所以工農即不易產生英雄主義。⁹⁶

抱著信仰投身革命反而引出了英雄主義的風險，這大概是這些知識分子始料未及的，有意味的是，景曉村本人恰恰也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關於幹部的英雄主義，中共晉察冀一分區地委對第一期整風訓練班的學員有個統計：91個學員中，以個人英雄主義為中心錯誤思想的42人，以自由主義為中心錯誤思想的35人，以享樂主義為中心錯誤思想的12人，以軍閥主義為中心錯誤思想的2人。⁹⁷個人英雄主義、自由主義成為整風需要面對的兩個主要問題。

自然，上面說到的數據不無調查者主觀意圖的貫注，當調查者把個人英雄主義作為選項時，已經包含著很明顯的傾向性，由此得出的調查結果不免於結論先行的意味。不過，如前所說，中共針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批判，確也其來有自。個人英雄主義的外延極廣，投身革命的這批人，內心中多有強烈的捨我其誰情懷，其中當然不無個人英雄主義的成分。陳漫遠回憶，他在廣西第二中學參加省學聯工作時，內心中就有這樣的想法：「自己想做個偉大的革命領袖，羨慕大人物，學擺大人物的架子。」⁹⁸個人英雄主義的確是一大批革命者投身革命運動的激勵因素之一，他們談到自己參加革命的思想源頭時說：「最大最有利的是我好讀書，清高，有節操，羨慕英雄志士的事業。這一種英雄志士的思想，在我未參加革命前，曾是鼓動自己向前進步和在黑暗、腐敗、落後的環

96 《景曉村日記》，1943年8月2日，第167頁。

97 〈中共晉察冀一分區地委第一期整風訓練班總結報告節錄〉，《整風通訊》第3期，1944年7月20日，第10頁。

98 陳漫遠：〈在整風座談會上的發言〉，《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21頁。

境裏，抵抗貪污、腐化、頹廢、苟安的一種很大的力量。」⁹⁹ 當年，革命者心目中的革命畫面常常是：「我在前面走，手裏拿一本革命理論書，後面跟著一群無產階級，我在前面照著書本念念有辭，這樣後面的人就跟著我走向社會主義的樂園了。」¹⁰⁰

就後人的眼光看，個人英雄主義當然並不一定完全負面，本身也是向前的動力。但是，對於當年正在追求集中統一、思想一律的政黨而言，英雄主義不免帶有過於強烈的個人色彩，需要予以掃除。劉榮在日記中反省道：「只有黨、無產階級才能推動社會的前進，個人主義、唯心論、英雄觀點，已經是掉在時代後面的沒落的小資產階級思想。」¹⁰¹ 個人英雄主義被認為爭名爭利，更關鍵的是自命不凡，這是通過整風進一步強調集中、紀律、統一權威的中共特別警惕的。

整風語境下的自由主義是私，個人英雄主義是驕；去私去驕，關鍵是把自己交給黨、交給組織：「腦筋裏只應存在獨一無二的東西就是『黨』，黨變作腦、腦變作黨，融化在一起，除此以外任何東西都不能在腦海中佔統治地位。」¹⁰² 事實上，向著黨成為唯一頭腦的目標邁進時，當年的中共黨人並不一定像後人想像的那樣充滿痛苦和掙扎。身在延安的畫家胡一川¹⁰³ 聽到周揚傳達毛澤東整頓三風的報告時，由衷地表示歡迎：

我希望這種強有力的浪潮襲擊到魯藝每一個角落去。敢於把自己的褲子脫下來揭露自己的尾巴的勇氣固然重要，但我認為更重要的還是要有忍痛割掉這條尾巴的勇氣。我們要堅決地打破只看到

99 琪：〈個人英雄主義的克服過程〉，《晉綏學訊》第6期，1943年5月31日，第13頁。

100 孝：〈我的「英雄」思想和學理論的態度〉，《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36頁。

101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7月31日，第189-190頁。

102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8月25日，第200頁。

103 胡一川(1910-2000)，福建永定人。畫家。1933年加入共產黨。抗戰後到延安，曾任魯藝木刻工作團團長。

人家有缺少〔點〕，而看不到自己也有尾巴的揭露方式。

只顧自己不管旁人是目前魯藝最普遍和惡劣的作風。對於這些整個〔頓〕三風，如果只是檢查性質，而沒有具體地解決和具體地去執行克服弱點是沒有多大用的。這次的整頓三風應該成為魯藝的生死存亡的關鍵。¹⁰⁴

後人多會先定地認為整風中的中共黨人經歷了抵抗到馴服的過程，現實中更大的可能則是他們如何說服自己，從有條件信任到無條件獻身，當這個過程趨向於實現時，甚至常常會生出鳳凰涅槃的感覺。整風運動中許多人都提到全身心交給黨後的愉悅感，一位黨員寫道：「為個人打算，痛苦煩惱，就會油然而產生，只有站在黨的立場上來處理問題，才能享受恬靜、快樂、坦然的幸福。」¹⁰⁵ 彭柏山在給妻子的信中說：「整風學習以來，我的靈魂已受了一番洗禮，我的工作、學習、生活，已經踏上康莊大道，這是我內心的喜悅，真實的喜悅，但願你也有這麼一天。」¹⁰⁶ 為黨的利益付出自己，不僅僅是紀律要求下的自我犧牲，更有著把自身融入偉大事業後的無上幸福，這就是徐光耀日記中所寫的：

只有共產黨領導的組織和隊伍，才能有這樣深刻的檢查，才能這樣使人飛快的進步，我們這一代遇見了共產黨真是幸福。除了共產黨，誰肯這樣熱心地幫助你認識自己的缺點，促你改進呢？除了共產黨，誰能這樣隨時隨地注意到我們錯誤的認識、行為、思想、做法的糾正呢？想起來，我真是一陣的興奮，感到能夠及早投到黨的懷抱，真是十分幸運。¹⁰⁷

104 《紅色藝術現場——胡一川日記(1937-1949)》，1942年4月3-4日，湖南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頁。

105 宗：〈我在座談會上加入了黨〉，《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81頁。

106 彭柏山：《戰火中的書簡》，第50-51頁。

107 《徐光耀日記》第2卷，1948年1月24日，第8頁。

或許上述材料會被質疑為政治正確的刻意表態，這樣的質疑亦屬歷史研究題中應有之義。不過，仔細追索，不難發現，中共革命陣營能夠放下自我，自覺接受黨的宣導，除了整風的促動外，中共黨員的心路歷程乃至近代中國的思想路徑亦是重要基礎。中國社會思想中長期沒有獨立存在的個體，新文化的啟蒙伴隨的也是組織化權力的狂飆突進，急迫的生存危機尤其讓民族自覺日漸強烈的國人需要可以凝聚的力量。服從組織、嚴守紀律、團結救國，被認為是啟蒙一代天然的使命。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上，在那個時代多數人看來，實乃天經地義。於國家言，是希望；於個人言，是進步。翻開當年中共幹部的報告、日記、文章，「進步」一詞頻頻出現，成為中共黨人的共同要求。進步代表著向上、前進、超越，是近代進化論影響下的主流思維，中共黨人強調的能動性、效率優先更強化了這樣的心理。1941年12月，八路軍幹部劉榮在日記中寫道：「真正是受壓迫的青年或知識分子，當他已經覺悟——舉起反抗黑暗社會的鐵拳來，下決心為革命事業而奮鬥到底的時候，他唯一的要求是進步，是嚴整活潑生動的政治生活，這是一般青年知識分子的共同心理吧。」¹⁰⁸

在這樣的思維背景下，追求大我、放逐小我不僅僅是共產主義者的要求，幾乎也是那個時代多數人的心聲，毋寧說，組織的凸顯倒給了憂患時代的人們安頓自己身心的處所。當整風以運動的形式半強制性地落實這一點時，很多人反而因為免去了選擇而感到放鬆，並從內心深處願意服膺。整風中有人寫道：「倘若黨沒有了，我自己有什麼意思呢？我怎樣生活下去呢？還是好好為黨工作吧！每件事來，我都要為黨的利益著想，決不要想自己，一想自己，工作就會受到損失，問題也就發生了。這樣一來，我覺得自己很快樂，無憂無慮，心境恬然。」¹⁰⁹ 由此出發，理想的境界就是生活和革命、理智和情感圓融結合，不再分為兩

108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1年12月19日，第22頁。

109 宗：〈我在座談會上加入了黨〉，《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80-81頁。

截：「當革命事業成為一種家務似的出現在自己的生活中，就很難辨別哪是個人利益，哪是集體利益了。因為事實上，個人與集體，已融為一體了。」¹¹⁰ 這樣的境界，放長眼光看，又豈只是中共的追求？福柯曾經寫道：「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¹¹¹ 整風背後包含的，原來還有人類長久的精神史。

5. 整風效應及其邊界

延安時期，共產黨人的集體主義邏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當年革命陣營的風尚，都支持著整風任務的落實。在整風的旗幟下，中共黨人積極向著黨的意志靠攏，造就了整風的一代，而整風的結果，也深刻影響著此後中共的精神和氣質。整風的歷史，可以說就是中共黨人普遍的精神和情感蛻變史，整風生長了中共革命歷史中特殊的一代，對中共此後的氣質影響深遠，正是整風，拉開了中共和其他國際共產主義政黨的距離。整風運動的許多過來人，遭受巨大衝擊後，仍然普遍對這場運動抱著感恩的態度，除卻刻意講述的成分，的確能感受到他們的思想理路。老電影人于敏後來在回憶中說：

寫思想自傳，聽取同志們的意見和批評。所有的批評都可以接受，心裏通不過的只有兩點：說我「有些自以為是和自高自大」。說「有些」，人家顯然是留有分寸的，我一向以為自己頗有「自知之明」，怎麼，我是這樣？這兩個「自」多麼叫人臉紅和出汗。當時是口服心

110 彭柏山：《戰火中的書簡》，第97-98頁。

111 米歇爾·福柯著，汪民安譯：〈自我技術〉，《福柯文選》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頁。

卻不服，口服心也服是經歷了許多曲折以後的事。……當時獲益的是在大家(群眾)面前照了鏡子，初步認識了自己的面貌。¹¹²

劉白羽寫下他驚心動魄的那段經歷時，不忘申明：

無產階級革命，從來不是純而又純的。正如魯迅說過：革命是痛苦的，還必然混有污穢和血……誰不認識到這一點就不能經受革命的考驗，通過革命的險關。另一方面，一個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要改造成為有無產階級思想、感情的人，必然會經受一次衝擊，這是一堂必須上的課，必須經過的磨煉。¹¹³

整風的結果，除開中共黨人本身的作為外，如前所說，還源於一個相對封閉的大小環境，又有人類一直延續的理想主義精神做支撐，加上近代以來中國國家民族的迫切救亡要求，這些都給整風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底色。馬可在坦白運動中被迫承認種種罪名後寫道：

我還不記得有生以來有過這樣的磨難，有過這樣思想上的波動，有過這樣的需用如此巨大的幾令人難以支持的力量來支持我整個的沉重心靈。但是我必須支持，而且——我是支持下來了。誰給我這力量？正如一個宗教信徒的虔心信仰一樣，在這一點上說我由對黨的信仰，毫無條件的信仰上獲取一種無可匹敵的力量，這種力量支持了我，這種力量引著我的生活的欲念(生活是多麼美好啊！)工作的欲念(工作是一種如何神聖的義務啊！)，傾向群、傾向集體的欲念(這又是一種應該是多麼自然，多麼原始的欲念啊！——群是如此健康，自己是如此蒼白，群是如此巨大，自己是如此渺小，群創造了歷史，自己難道只做一個歷史的渣滓？！)……這種信仰，這種力量支持著我，支持著我清算過去，認清現在，瞻望未來。¹¹⁴

112 于敏：〈重要的是認識自己〉，《于敏文集》第7卷《報告文學·散文》，第195頁。

113 劉白羽：〈平地風雷〉，《我所親歷的延安整風》下冊，第76頁。

114 《馬可選集》七《日記卷》上，1943年6月20日，第736頁。

無條件的有如宗教般的信仰、傾向集體的欲念，的確是這一代中共黨人能夠說服自己接受整風的重要精神資源。

不過，不可不看到的另外一面是，整風當中，各種各樣人性的掙扎還是不可避免存在。調查顯示，經過整風，尚未樹立無條件服從黨的觀念的幹部仍然佔到80%，在所有被認為不正確的觀念中佔比最高。¹¹⁵樹立了無條件服從觀念，能不能真正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做到，又是一個更大的問號；自稱樹立了無條件服從觀念者，是不是真的心口如一，也不無疑問。何況，還有一批被整風拋下的掉隊者，他們甚至可能會被遺忘在人們的視線之外。整風期間，的確有很多幹部心服口服地接受黨的意志，卻也不是沒有刻意順從的表態，中共總結：

不少同志投機取巧，看風使舵，他們並沒有在思想上搞通，隨便遷就別人意見，遷就多數與優勢，遷就自己所信仰的人。例如分局黨校開始有八十八人(佔總數35.2%強)認為大資產階級有革命性，最後減少到三個人(1.2%)。但是當論戰結束，在結論中發現內有與自己曾經放棄了的意見，似乎有某些一致之點的，他們又來「倒後賬」，說我原來就是正確的。還有些同志，故意以「左」自居，表示自己是「忠實」於黨的，有意誇大黨的力量，奉承黨的一切。¹¹⁶

這樣的態度，徐光耀也有觀察：「有的人整風確實是整好了，思想上真的有所轉變，工作上、作風上都好了許多。但有的人從山裏整風整滑了。他們並沒有進步，只是更虛偽了一些。」¹¹⁷虛偽或許可以理解為巨大的壓力下，人性對道德高標的抵抗。

115 〈從整風來看幹部思想與今後的幹部教育問題——太行區黨委宣傳部長磐石同志在1944年8月會議上的報告〉，《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1943-1945)，第705頁。

116 〈分局黨校直屬各機關四十天反法西斯論戰的幾點經驗〉，《整風通訊》第3期，1944年7月20日，第4頁。

117 《徐光耀日記》第1卷，1944年11月26日，第35頁。

運動中受到的觸動，能否持久，也是問題。范元甄不無疑惑地說：「越發掘自己意識裏的壞東西，就愈像自己不曾有過好東西似的。如果整風是要鞏固已有的好處，以之為基礎發展起來，克服壞的，那麼我像是失了基礎似的。」¹¹⁸更令人震驚的還有搶救運動，一大批幹部被搶救成「特務」、「內奸」，製造一場鬧劇：

一個129師宣傳隊的負責人假「坦白」說和日軍駐長治的36師團有直接電報聯繫，而且把電台埋藏在赤崖附近的田地裏，組裏就組織四五個人去翻地搜查了大半天也沒有找到，氣急敗壞地問他到底藏哪裏了，他才承認是編了假話，結果又是一陣暴打。更可笑的是有位同志竟假「坦白」說為了發洩不滿情緒，把給領導預備的糧食和臘肉裏投了毒，搞得領導們都不敢吃了，結果讓我們拿來洗了洗，著實美餐了好幾天。¹¹⁹

丁玲在搶救運動中的日記寫道：「我已經向黨承認我是復興的特務了，……我說了我的反黨的罪行，歷數了，把我的什麼都說成是有意反黨的陰謀，我把我認識的人都供了，把我同這些人都說成了特務工作的聯繫。」她慨嘆：「兩個月過去了！多可怕的兩個月，然而這噩夢似的時日還未過去呵！」¹²⁰

整風強調反對教條主義，很多人都提到理論和實際脫節：「有時我想到實際中去工作，在延安感覺不實際，跑到前方仍感覺不實際，在這村感覺那村實際，在那村又感覺這村實際；總之真正的實際好像不是在眼前，是在渺茫的遠方。」¹²¹這樣的感覺可有多重解讀，既有知識人和

118 〈范元甄信，1943年1月5日〉，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1938-1949）——李銳、范元甄通信集》1，第392頁。

119 劉贊平：《九十自述——劉贊平回憶錄》，第67頁。

120 丁玲：〈在中央黨校一部的日記〉，1943年9月14日，《新文學史料》2007年第2期。

121 昆：〈我怎樣學成了教條主義——在整風座談會的反省〉，《晉綏學訊》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43頁。

中國現實的隔膜，也未始沒有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環境的差異，正因此，中共要求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可是當這種差異觸及中國的階級關係、農村現實等等時，又可能超越了整風本身可以允許的範圍。何況，反對教條主義口號下，反掉的也不一定是教條。何方回憶，抗戰之初，延安「無論是開討論會，還是平時談話，經常會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人們把那些空話、套話、重複來重複去的老話和教訓人的話，通統斥之為『洋政治』。有時就聽到有人說：『別給我來這套洋政治！』而且一些批評和爭論在報刊上也可以經常看到，更不用說街頭的和各單位的壁報了。……一到延安就有一種得到解放的感覺，為了革命，對什麼問題都可以想，都可以說了。」¹²² 看看蘇維埃時期的《紅色中華》，就可以知道何方所言不虛，這毋寧說是整風前黨內的常態，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應有的氣質。在反對空談、反對教條主義的口號下，這樣的風氣反而消隱了。

整風統一人們精神世界的努力逼近了目標，卻也會遇到難啃的骨頭。胡一川雖然在整風中一再表示遵循向大眾靠攏的原則，但又堅持認為藝術價值不可替代，要求得到更多的創作時間，他在整風後期寫道：

你是宇宙間的一粒，你是現世界的一分子，因此，你應該經常地不倦地去關心它、認識它、愛護它。你應為全人類去作〔著〕想而不要老是想到你個人的利害。只有在大多數人的利益上所發生的熱烈的愛與憎，才是偉大的崇高的情感。把你那熱烈的感情寄託在藝術裏，是人類最崇高的精神生活之一。正是因為那民族產生了偉大的藝術作品，所以它是值得誇耀的。¹²³

經過整風，胡一川思考的出發點仍然是整個人類的精神生活。總有一些靈魂，可以穿透現實政治的層層網絡。

122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何方自述》，第52頁。

123 《紅色藝術現場——胡一川日記(1937-1949)》，1944年11月28日，第380-381頁。

時過境遷，回望這一段歷史，可以看到整風推進黨的意志和權威的內化，的確可以在一段時間內達到提高效能的目標，但這種效能的提高不會也不可能是線性的，整風不是翻天覆地，也不可能一勞永逸。更深一層看，人畢竟不只是工具，社會和人類的發展既需要集體，也不應抹煞個人，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當個人在集體面前、自由在紀律面前望而卻步時，自由的表達、體制的彈性也在不斷流失，最終同樣需要付出代價。

儘管存在這些點點滴滴，還是不能不說，整風集體主義的邏輯，開啟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這是一個邏輯上圓滿自足的世界。雖然內心深處的天人交戰還會不斷上演，但是，整風已經形成一個穩態的政治文化系統，並在集體的互動中不斷強化。整風的一代高度依賴黨、依賴組織，把身心交給黨。這樣的群體的形成，應該正是中共追求的結果。

從整風的過程可以看出，整風不單單從某一方面開展，也不簡單就是一場思想改造運動。整風實際上是中共政治文化在思想領域內的一次具體展開過程，而整風的結果，又促進著中共政治文化的形成和豐富。同時，整風能夠順利推展，還和中共的組織原則和組織結構不能分開，整風又進一步加固著已經堪稱嚴密的組織體系。意識形態、組織規則、政治運動交互作用，整風可以說是中共系統性運作的一個典型案例。整風期間，最常被人提及的當然還有毛澤東形象的不斷提升，從黨的領袖之一到黨的最高領袖，中國共產黨完成了領袖地位和形象的構建。

中共革命就像一個齒輪咬合的巨大機器，環環相扣，一旦運行，全力以赴，效力驚人。大多數時候，觀察者會把這種驚人的效率歸結為組織上的嚴密，這的確是中共革命的關鍵，也是國際共產主義政黨的共性。組織架構的嚴密和馬克思主義賦予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屬性相關，既然承擔著先鋒隊的任務，保證這支隊伍的先進性就十分重要，而要讓一個組織合乎自己的意願，不可避免需要淘汰、清洗，需要建立保證淘汰、清洗能夠展開的規則，不斷強化這樣的規則成為組織的內在要求。組織的嚴密性就是這樣慢慢形成的。

另外，共產主義運動所處的環境也提出嚴密組織的要求。共產主義運動以完成馬克思主義提出的階級革命目標為使命，這是對現有的統治秩序乃至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秩序的全面顛覆；這樣的任務，不可能在一團和氣中完成，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幾乎都在腥風血雨中開展，當非偶然。這樣的成長環境，注定了承擔這一任務的力量會努力嚴密自己的組織，保證這支力量的高度凝聚力。

強大的組織力並不是單純依靠組織架構的設計即可實現，1924年改組後的國民黨，組織架構大量引進蘇共模式，組織層級幾乎和中共沒什麼兩樣。然而，瞭解國共實際運作的人大概都知道，大致相似的組織體系發揮的效能大相徑庭，蔣介石和國民黨人自己也認為國民黨很大程度是敗在組織上。實際上，較之大多數政治力量，國民黨的組織已經堪稱嚴密，只是較之中共黨人瞠乎其後而已。1938年，蔣介石曾通令部下，提示：「每星期必須限令各排班長，分別組設小組會議，公開討論本組本星期經過之缺點與優處，以及各人技能學術勤務成績之優劣，由連長或排長嚴加指導……並准各兵士自我批評」；「軍隊精神，須注重民主化，官長尤要士兵化」。¹²⁴ 這些措施和中共何其相似，但論到落實，則相距不可以道里計。國共兩黨的比較可以證明，嚴密的組織體系是通向嚴密組織的一部分，但要真正讓嚴密的組織落到實處，中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組織要運轉，還是需要人，不同的人群對組織力的落實會有相當不同的影響。中共嚴格的紀律是保證組織嚴密不可或缺的環節，但要真正建立嚴格的紀律，不是容易的事。嚴格的紀律下，政治力量的維繫需要依靠資源分配、核心理念、團體的向心力、懲戒制度等。中共奪取政權前，可供分配的資源實在有限，保持紀律依靠的主要是後面三者，其中核心理念對於中共這樣的意識形態政黨發揮的作用尤其重大。像中共這樣一個長期處於在野地位、生存艱難的革命黨，如果沒有理念的支撐，

124 〈蔣中正電示陳誠令中央直轄各師長加緊培訓下級幹部並注重精神教育〉，1938年3月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10300-00010-002，台北國史館藏。

組織的嚴密、紀律的落實都成無源之水。正因此，幹部教育和政治宣傳長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中之重。這裏面，有這一政黨內在的邏輯在。

共產主義是中共革命的願景，批評者常常指稱這個願景的虛幻，從而質疑這個願景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際意義。其實，願景對於一個政治力量的意義，與其說是可落實性，不如說是可想像性。人們經常說，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共產主義擁有巨大的想像空間，對於歷史中的人，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宏大的願景，需要足夠的格局，中共對格局的追求，應該就和這樣的願景相關，而大格局的建立，又讓這樣的願景看起來更加可信。很多時候，理念本來就是循環論證，在這樣的循環論證中，理念一步步強化，組織一步步堅固，格局也一步步開闊。共產主義運動超越具體時間和空間的力量，或許就是這樣累積的。任何對中共執一而論的評判，無論讚譽或者批評，都難免隔靴搔癢。

中共的組織、紀律、理念是一個相互作用、互為促進的統一體，歷史的具體進程中，常常很難辨別何者為主、何者為從，更無法截然分開，這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運作系統。條件成熟後，這套系統就可以朝著效率優先的目標，形成類似自組織狀態的運行，各種因素互為因果，相須並進，驚人的效率就是這樣達成的。所有低估這個系統力量的人，過去、現在、將來，都可能會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

II

戰時中共的政策和貫徹系統

抗戰時期，經由不斷的權力下探，中共在基層社會逐漸扎根，¹ 同時通過扁平化的政治文化構造，構建了一套同心圓式的政治解釋邏輯。垂直的組織下探和水平的觀念擴展，讓中共在民眾中扎下腳跟，黨本身趨於成熟，政策制訂及其貫徹不斷系統化。有意思的是，這一時期，又是中共充分運用統一戰線，追求政治邊界最大化伸展的時期。在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共高度強調策略運用，善用各種政治力量和政治方式，包括選舉制度等，剛性革命政黨內注入柔性成分，政治彈性大大增加。仔細觀察，中共抗戰期間形成的氣質，可謂變通的產物，這一時期的許多政策都是面對時勢的調協，對一個紀律森嚴、效率優先的剛性政黨而言，這種調協的成分不無中和的作用，有著意料之外的效果。由於抗戰時期的空前發展，加之此時又值毛澤東領導地位確立及中共意識形態闡釋逐步成形，抗戰的經驗在日後得到高度重視。特殊時期的政策養成的氣質，事實上融入血液，成為中共政治和歷史資源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比如統一戰線就是在抗戰中上升到中共三大法寶的地位，使之無論在歷史和現實中，都構成為中共理論和實踐的重要一環。所謂黨的成長，就是這樣一個經驗不斷累積、氣質逐漸豐富的過程。而中共的政治系統因緣際會，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熟，也於此獲得相較於一般共產主義政黨更具彈性的運作機制，擁有更大的靈敏度。

1 關於這一問題，張鳴的《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里峰的《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李秉奎的《太行抗日根據地中共農村黨組織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等著作均有過頗具啟發性的討論。

作為一個階級政黨，抗戰時期統一戰線的推展也不是一帆風順，統一戰線和階級判斷間始終存在一定的緊張關係。中共的特點是，儘管這種緊張不可避免會帶來一些困惑和問題，但還是在相當程度上以靈活性化解了這種緊張。抗戰時期也存在「左」的問題，但這種左由於有統一戰線的羈勒，或者說本身只有在統一戰線背景下才會被視為左，因而倒是體現出原則和效率間的相互激蕩和互動。這又是抗戰時期政治運作的一個意外收穫。

任何一支政治力量，歷史解釋和經驗累積都是一個不斷豐富和變化的開放體系，具體的經驗難免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失去光彩，由此沉澱的氣質卻往往影響深遠。抗戰就是中共氣質大大豐富和變化的時期，對中共的成長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相對於聞名遐邇的政治實踐如三三制政權等，關於抗戰時期中共形成的政治氣質的討論尚不多見，而這樣的討論可能更有助於逼近中共的內核，加深對中共政治運作的認知。

四、權力的垂直下探

戰時中共政治直觀的趨勢是權力下探。通過權力下探，中共實現了對基層社會的強力介入，政治經濟社會一體化統合管理逐步成形。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具有高度的效能和嚴格的秩序，改變了中國基層社會長期缺乏效率的運作模式，也扭轉了清末以來權力下探造成的地方社會權力失序的趨向，根據地的行政效率、社會管控及汲取資源能力大為加強。中共在統一戰線背景下展開的這一趨向，以緩和漸進的權力滲透方式，讓民眾空前靠近並開始熟悉權力，根據地的黨、政權與民眾構成事實上的利益聯合體。通過中共的努力，根據地民眾在承受高效機制下並不輕鬆的負擔同時，感受到管理和秩序帶來的效率與公平，這是一個迥異於同時期其他政治力量的運作模式。後來的中共話語中，1949年後建立的新的政治社會形態被稱為「新社會」，可以說，抗戰時期中共通過嚴密的自上而下的組織，以群眾權利攜帶組織權力，將政治力大力楔入社會，初步在根據地搭建了中共希望創建的「新社會」的雛形。

1. 從輕徭薄賦到富國強兵

和蘇維埃時期一樣，權力下探是抗戰時期中共政治最主要的特徵之一。之所以說下探，而不是下沉，旨在強調這是一個正在展開的過程，

是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十八世紀以來的革命都以人權、人本位為宗旨，權力從精英向普羅大眾擴散是其外在表現，天賦人權本身就含有權力由更多人分享的理念。馬克思主義號召無產階級要奪取和掌握權力：「無產者本身必須成為權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權力。」¹ 權力分享演化為無產者本身成為權力，權力下探全方位體現於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層面，這是權力向下趨勢的一個革命性推進。

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對世界範圍以權力分享為宗旨的權力下探趨勢並無多少瞭解，卻從另外一個層面亦開始著權力下探的嘗試，這就是加強政權控制的密度和廣度。晚清以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呈現相異的兩個趨向：就高層權力運行言，自上而下的控制體系漸趨式微，地方力量坐大，袁世凱稱帝敗亡後，更直接演變成地方割據的局面；而就普遍的政治認知及基層權力運作言，面對西方世界表現出的強大力量，富國強兵成為中國人孜孜以求的目標，行之千年的儒家傳統輕徭薄賦理念動搖，國家的組織機器功能凸顯。晚清新政後，政府越來越強勢介入社會經濟的直接管理，強大國家和強勢政府成為社會普遍的期待，而現實政治的潰爛與人們的希望背道而馳，益發強化了對富國強兵的追求。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晚清以來相異的這兩個趨勢似乎納入了同一條軌道。中央層面，儘管國家統一建立在多方力量妥協的基礎之上，仍然相當程度上遏止了社會政治的失序狀態，使得國人期盼的強大政府似乎有了實現的可能；同時，在政府主導下，權力向基層社會下探的趨勢進一步強化，政府控制能力趨於嚴密。

當然，這一時期的國家和政府權力的下探，是相對傳統中國政治結構而言。費孝通指出：「我們以往的政治一方面在精神上牢籠了政權，另一方面又在行政機構的範圍上加以極嚴重的限制，那是把集權的中央懸空起來，不使它進入人民日常有關的地方公益範圍之中。中央所派遣的官員到知縣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向下的單軌只築到縣

1 卡爾·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1頁。

衙門就停了，並不到每家人家大門前或大門之內的。」² 因此，官府在地方更多是無上權威的象徵，地方主要依賴代理人形成政府和代理人共治的局面，³ 這樣的格局節省了治理成本，是輕徭薄賦的邏輯結果，同時也不能不承受治理薄弱的現實及由此帶來的鄉村社會事實上的自治狀態。中共對鄉村的這種自治狀態早就有認識，1929年中共中央發出的通告中判斷：「農民根本是要求組織喜歡組織的群眾，有的說農民要求鬥爭、要求暴動而不要求組織，這完全是錯誤的觀察，農村中原始的組織和農民自動的小組織不知幾千百種。」⁴ 眾多的自治組織是傳統中國縣官常常頻繁更替，而縣政尚能正常運行的原因所在，縣官作為權力的象徵，更多擔負著安定社會心理的作用。李懷印甚至認為：「縣官的角色，通常是省府與地方精英之間的調停人，而非國家的代表。」⁵

傳統中國治理體系的薄弱，造成王朝的危機應對乏力，張研關於清代縣長的研究顯示，縣級政權很難有效對付轄區出現的匪亂，而不得不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⁶ 傳統王朝講輕徭薄賦，希望通過政權自身的收縮和克制減輕民眾負擔，防範社會經濟危機，小政府、低成本是這樣一

2 費孝通：《鄉土重建》，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4頁。

3 對中國皇權官僚體制的考察，代表作主要有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譯：《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蕭公權著，張皓、張升譯：《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黃宗智：《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中國歷史的回顧與前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瞿同祖專門考察了士紳與地方行政，談到「非正式權力」；蕭公權研究了士紳對王朝的穩定和破壞作用；黃宗智則強調中國傳統王朝是「集權的簡約治理」。

4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號——農民運動的策略〉（1929年2月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24頁。

5 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士皓譯：《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6頁。

6 張研：《清代縣級政權控制鄉村的具體考察——以同治年間廣寧知縣杜鳳治日記為中心》，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種治理理念的邏輯結果。這種消極的治理固然可以通過減輕負擔緩解危機，卻無法阻止地方社會的崩壞，地方領袖權力的膨脹常常成為瓦解王朝體系的另一力量，而脆弱的政權既無法有效抑制地方領袖的逐利衝動，也無法在動蕩到來時做出有力反應，王朝的不斷更迭與社會治理機制上的這一特徵不無關聯。

晚清以降，社會治理思路開始變化，富國強兵取代輕徭薄賦，資源汲取成為政府關心的首要問題。政府對基層社會不再像之前那樣取放任態度，政權下探漸成趨勢。⁷孫中山痛詆國人一盤散沙，他的指責得到廣泛呼應，背後潛藏的正是對之前統治思路的擯棄。晚清權力下探造成的意外後果是：隨著地方功能的逐漸強化，地方權力也在壯大，中央政府為加強控制，某種程度鼓勵了地方權力的擴張，最終卻又不得不吞下地方坐大的後果，清王朝的崩潰和這一點當不無關係。北京政府時期，權力下探的趨勢繼續，縣以下開始出現制度化的區級政權，村也逐漸從地理概念向行政概念演化。但是，無論北京政府嘗試展開的鄉村政權建設，還是南京國民政府為配合「剿共」軍事，重建並逐漸使之制度化的保甲體系，對鄉村的實際控制力仍非常有限。

相比北京政府對基層的控制基本停留於紙面之上，南京國民政府與基層社會的關係更為複雜。國民革命期間，打倒土豪劣紳一度是最響亮的口號，其中包含著對鄉村既有秩序的強烈否定，這既是革命倫理的需要，也體現時人特別是革命黨人，對中國社會尤其是鄉村社會基本問題的判斷。南京政府建立後，國民黨迅速調整革命黨的立場，以尋求秩序的穩定而不是社會變革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思路。蔣介石在二次北伐完成後說得很明確：

我們工作最重要的所在便是要使革命的本身減少障礙，增加力量，並且要使民眾積極不斷的來參加。……我們要求黨治下的政

7 近代史領域內，羅志田較早注意到這種趨向，參見羅志田：〈國進民退：清季興起的一個持續傾向〉，《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治安定，和經濟社會一切秩序的安定。這並不是要一勞永逸，就此不要革命，正是為以後進一步的準備。這彷彿是在劇戰以後新得到一塊佔領地時，我們要做搜索殘敵和鞏固陣地的工作，不能一切不顧的急遽進行。⁸

因此，在鄉村與地方領袖合作展開社會治理，仍然是南京政府的首要選項。國民黨地方自治的原則，政府對鄉村社會的遷就、控制力的不足，使鄉村治理秩序沒有大的改變，彭真談道：「舊政府的組織機構，是頭大腳小的，國民政府有極複雜完備和龐大的分工與組織機構，而村級卻只有一個村長，區則只有區長和少數助理員，因此國民政府一切政令一到縣級或區級即往往『壽終正寢』變成了廢紙。」⁹ 當年的實地調查也證實了彭真的說法，調查人員到北平郊區的昌平七區盧村後發現，這裏1931年設立鄉公所，「職員當然還是以前公會中人」，幾年之後，「昌平七區第廿四鄉鄉公所」的藍地白字木牌就「早已扔在一邊了」。¹⁰

較之皇權時代，民國政府地方控制強化效果有限，面臨的挑戰則遠非之前可比。富國強兵要求改變了國人思想的底色，大大拉高了對政府的期待，政府強化的結果又不可避免導致需索的加重。由於中國當時還是農業社會，這種需索主要加之於鄉村，使鄉村負擔空前沉重，民國時期的不斷戰亂尤其使之雪上加霜。事後看，這些對鄉村社會既有生態的打擊可以說是致命的。清末之前的鄉村，社會基本處於自治狀態，政權控制軟弱，地方負擔相對較低，民眾從政權層面感受到的傷害有限。晚清新政後，隨著國家榨取的日益增長，民眾的負擔不斷加重，地方社會亂象日益滋長。

8 蔣介石：〈革命和不革命〉，《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367頁。

9 彭真：〈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1941年9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頁。

10 蔣旨昂：〈盧家村〉，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鄉村社會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頁。

眾多研究者認為，清末科舉的廢除造成地方社會既有領導層的結構性變動，擁有功名且具備較高素質的地方自治領袖逐漸失去鄉村中的發言權，鄉村領袖的惡質化是導致社會亂象的淵源。然而，經由科舉進入官僚體系然後再告老還鄉成為地方士紳有很長的路要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當中國農村社會普遍被認為已經惡化的時候，停止科舉考試有可能造成的效應遠遠沒有在鄉村真正發酵。如果考察科舉前後鄉村自治領袖的成分，可以看出，是否擁有功名並不是成為鄉村領袖的必要條件，清代明確規定：「至充保長甲長並輪值支更看柵等役，紳衿免派。」¹¹ 擁有功名者在帝制時期反而不一定進入鄉村管理者體系當中。

鄉村領袖的形成，和威望、能力、知識、財富、年齡、親和力乃至宗族力量等諸多因素相關，有地位和財富者比較容易在領袖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充當鄉村領袖，地位和財富也不是成為鄉村領袖的唯一因素。鄉村領袖能不能處理和解決問題是鄉民是否信賴他們最重要的因素，知識和見識在其成長過程中也至關重要。¹² 因此，在許多地區可以看到，走州過府的所謂能人在鄉村領袖中佔有很大比重，這些能人可能是曾經的官員，也可能是教師、小販和退役的士兵。冀魯豫的報告說：「游民分子佔村政權幹部的絕大部分」，指的就是這樣的事實。

抗戰時期，中共根據地留下了大量的幹部統計資料，緣於階級分析觀念，這些材料多以階級出身統計幹部成分，如果只是看這樣的統計，一些關鍵環節可能無法呈現。比如1942年中共對冀魯豫觀城縣一區各村的統計，從階級出身看，63個村長中，有34個中農、17個貧農、10

11 徐棟輯：《保甲書》卷1《定例·刑部條例》，一凡藏書館文獻編委會編：《古代鄉約及鄉治法律文獻十種》第2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頁。

12 渠桂萍認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村公職『差役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時，在村莊正式權力架構上卻活躍著聲望型能人階層群體。」渠桂萍：《華北鄉村民眾視野中的社會分層及其變動(1901-194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9頁。

個富農，商人和無地者各一。和大部分根據地一樣，材料顯現了中農在當時鄉村政權中的重要地位，並無特別之處。難得的是，這份材料同時統計了其中59個村長的社會出身，詳情如下：

觀城一區村幹部社會出身統計表

一生 主要職業 人數	舊政權 人員	做莊 稼活	經紀	小商販	苦工	舊軍人	木匠	小學 教員	總計
	7	18	1	14	11	4	2	2	59

資料來源：〈冀魯豫邊區環境形勢及村政建設現況報告〉（1942年8月），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261頁。

上表顯示，出身於舊政權、舊軍隊及小商人者達28人，幾乎佔到一半。餘下的31人中，包括11名苦工，他們雖然生活窮苦，卻流動於各村間，常常也會被村民視為見過世面者。真正在家務農的只有18人，佔30.5%。¹³這份材料比較清晰顯示鄉村社會領袖對應於鄉村各業的社會身份。

觀城一區的數據可以得到更大範圍材料的印證。1944年山東根據地對全省分區助理員以上幹部社會出身做的統計顯示：工人佔3.27%；農民佔33.06%；商人佔14.26%，學生佔38.69%，自由職業者佔6.44%，其他佔4.28%。濱海區全區區長副區長的統計：工農佔25.89%；學生教員佔58.04%；商人佔11.61%；其他佔4.46%。¹⁴從這兩個數據中都可以看到，具有社會經驗和知識文化的鄉村能人在政權中居於優勢地位，遠超過其在人口中的比重。魯西1941年的統計，區級幹部312人，社會成分

13 〈冀魯豫邊區環境形勢及村政建設現況報告〉（1942年8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260-261頁。

14 〈幹部政策和幹部工作——山東省第二次行政會議總結的幹部部分〉（1944年12月），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1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14-715頁。

分別為：工6%，農43.9%，學47.1%，商3.5%，其他4.8%，¹⁵學、商的比重也超過50%。

民國年間，攫取鄉村資源任務不斷加重，負責資源輸送的村長之類政權代理人承受越來越重的壓力，很多人不再願意出頭充當鄉村領袖。不少材料都提到：「由於村長、村副是最苦的差事，『貼錢費力不討好』，有時候還得挨打，窮人幹不了，只好自願地讓給富人或流氓來幹。……在冀西，為了平均挨打起見，有些地方村長是輪流擔任的。」¹⁶所以，真正的問題或許是：壓力加大導致基層自治領袖出走，而不是科舉廢除變換了鄉紳的地位。惡幣淘汰良幣的結果，便是鄉村治理體系的惡化趨勢：

二十四年冬，河南各行政區各有鄉村師資訓練所之設立。其目的在實行保教合一。招收青年施以六個月的軍事政治訓練，畢業後委充兒〔幾〕聯保主任兼小學校長。其用意不為不善，但結果完全不然，因待遇太薄（薪金二十元，公費三元），而主持非人。故一般優秀青年與愛國之士均不願作此無聊事情，投考者多為豪紳子弟或地痞流氓，此等無聊之輩一旦當權，則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了。¹⁷

這樣的材料在民國鄉村的描述中常常可以見到，雖然這種惡化的勢頭或許被大大誇大了。更大的可能是，民國年間，鄉村領袖承擔了更大的責任，社會在鄉村領袖上投注了更多目光，鄉村領袖本身問題愈益嚴重，這些被共同放大於社會和政治的輿論場中，造就了鄉村領袖惡質化的判斷。

15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鞏固黨的工作報告〉（1941年），《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上，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頁。

16 彭濤：〈論行政組織的改革〉（1940年3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112-113頁。

17 張守初：〈論河南政治現狀（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八）〉，《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549頁。

應該說，南京國民政府在加強地方控制方面並非毫無作為，孫中山提出的地方自治理念亦可視為當時世界性權力分享趨勢的產物，然而，無論在控制還是分享兩方面，國民政府的權力下探都沒有獲得良好的成果。地方自治缺乏有效、公平的民眾表達渠道，民權無由伸展；村莊組織結構鬆散，控制系統多系自發在各地普遍存在，造成諸多困境：「士紳都勾通土匪，因之縣府職權無法行使，有名無實。縣裏不敢下鄉，老百姓不繳糧的多（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繳），紳士更不繳（有十幾年不繳的）。」¹⁸

隨著保甲制等鄉村控制體制的推行，國民政府對地方的控制的確有所強化，但地方控制的目標在於提供資源輸送的管道，民眾在這種管制中不但無法得到公平，鄉村的實際控制者還以此為招牌擴大權力，攫取資源、中飽私囊。當時資料寫道：「聯保主任都是師資訓練所畢業，其同學會則附設於中央軍校通訊處內，故彼等曾以委員長的學生自居，為所欲為，毫無顧忌。鄉民無知信以為真。……保甲制度把老紳士淘汰了而代之以新紳士。此輩新紳士的作惡方法與程度較老紳士大有進步。」¹⁹ 權力的下探擴大了地方行政的權威，卻沒有改變既有的運作方式，提供普通民眾分享權力的機會，如時人所說：「區長們並不在那裏辦自治，主要的職務是派款，村長亦然。」²⁰ 官員成了汲取資源、收稅徵糧的工具，毛澤東後來談諧地說：「西安有一次開大會，三青團的人當主席，當時到了很多農民，散會的時候台上喊口號『蔣委員長萬歲！』農民就喊『趕快完糧納稅！』什麼原因呢？因為國民黨要農民開會沒有

18 〈王國華關於豫南特委工作的談話記錄〉（1940年4月），《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226頁。

19 張守初：〈論河南政治現狀（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八）〉，《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549頁。

20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河南省農村調查——調查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87頁。

別的，就是要農民完糧納稅，他們腦子裏裝的就是完糧納稅，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們也就喊出來了。」²¹

抗戰初期，中共進入鄉村時，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鄉村重建已成共識卻重建無門的局面。戰爭的破壞及戰爭帶來的需索，又不斷加劇著鄉村的困難。河南報告：

由於今年嚴重的災荒，三分之二以上的災區民眾，大多數都沒有飯吃。單就我們所知道的汜縣與西華二地，民眾百分之九十就沒有飯吃。但是國民黨非但沒有救濟，而且田賦捐稅還是照常的派，並且因為抗戰的關係，國民黨需索的自然要多，而豪紳地主又要從中克扣中飽。因而民眾的負擔自然是更重。²²

由此約略可以看出，近代中國呈現的鄉村危機，由於大規模戰爭的爆發及地方社會的進一步失序，可謂走到了頂點。吊詭的是，這是一個富國強兵口號下的危機。

2. 根據地初創時期的權力下探：軍隊、黨、政權

代表著中共權力分享的理念，蘇維埃時期，中共即開始構建權力下探的鄉村管理體系。然而，戰爭環境以及蘇維埃模式面對鄉村落後環境的局限，使得蘇維埃時期農村革命的權力下探路徑更多依賴控制，即通過土地革命，在鄉村社會展開大規模階級鬥爭，循「武裝進入—建立政權—階級鬥爭—土地革命」的模式。這一革命路徑依靠武力震懾和政治清洗迅速控制鄉村社會，雖然簡易直接，卻也有忽視鄉

21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14頁。

22 〈王崗關於河南政治形勢、黨的工作及組織問題給長江局的報告〉（1938年1月3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36頁。

村社會複雜的實際狀況，過多製造敵人、流失政治資源之嫌。蘇維埃革命遇挫，原因很多，政治上沒有獲得持久的實際助力，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因素。

抗戰開始後，中共進入地方之初，武裝仍然起著決定作用，彭德懷說：「中國沒有民主的歷史傳統，軍隊常是決定政治力量的主要因素。」²³ 是為的論。毛澤東說得更直接：「軍隊中的黨是最先進的，它應創造地方的黨和政府。」²⁴ 正因此，八路軍甫一出動，總政治部即下發〈關於地方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隊在地方動員工作中，應「協助地方黨部發展與加強黨的組織和領導，無黨的地方部隊應負起建立的責任」。²⁵ 毛澤東具體佈置115師和120師「派遣必要之地方工作人員，有計劃地散開工作，於一定地區完成一定任務」。²⁶ 已出動到前方的各個部隊，「各團每營抽出一個連，到指定地區，同地方黨組織游擊隊一起活動」。²⁷ 軍隊進入地方後的發展，可從八路軍幹部日記中窺見一二，王紫峰記載：「十月二十三日，帶連、排幹部二十一名從阜平出發，二十六日到達完縣寨子村。經過一段工作，建立了完、滿、唐、易抗日政權，鎮壓了漢奸活動，消滅了土匪武裝，組織了抗日武裝第十團，人數二千餘名，外編一個營給了十二團，打了幾個不大的仗。」²⁸ 21個幹部，帶來的即為幾千人的發展。

23 彭德懷：〈在北方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提綱（節選）〉（1940年9月25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08頁。

24 毛澤東：〈切實執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70頁。

25 〈總政關於地方工作的指示〉（1937年10月29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8卷，第2頁。

26 〈關於各師在山西的作戰部署〉（1937年10月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72頁。

27 楊國宇：《劉鄧麾下十三年》，1937年11月13、14日，第28頁。

28 王紫峰：《戰爭年代的日記》，1940年1月1日，第43頁。

作為八路軍政工幹部，王恩茂提供了軍隊介入地方的更多細節。1937年9月底，王寫道：「參加政治部的部務會議，討論目前政治機關的工作，主要的是：(1)前線上的政治工作；(2)地方動員組織武裝群眾。政治部分一部分同志到前線，即組織部、敵軍工作部，其餘的移崞嵐進行地方工作。」²⁹王隨部隊到達山西崞嵐，並迅速行動：「參加了討論地方工作的會議，到會的是民運部、宣傳部的同志和參加紅軍的一批學生，佈置了崞嵐縣一、二、三區工作和城市的工作。」隨後，「老的同志都下鄉去做群眾工作了」。³⁰

中共武裝下鄉的通常辦法是：「由武工隊帶一個村長，一個中隊長，到這村工作，解決群眾問題，建立威信。經過一兩個月，群眾瞭解了，同時發現了新的本地積極分子，由群眾選出，於是帶來的幹部就培養出代替自己的本地幹部，掌握了政權，自己就再與武工隊配合，向前推進一步，開闢其他村的工作。」³¹日本人對這一行動路徑有很仔細的觀察，他們以山西和順為例，記載如下：

利用麥、穀收割的大好時機，動員八路軍駐紮部隊、政治工作人員和犧盟會幹部義務幫助農民割麥。這種作法，是學習中共早先進行秋收暴動時的成功經驗。這種平凡手段在收攬民心上取得了極大效果。以此為第一步，以後按照工作指導大綱，進行了減租減息的宣傳(收割、收穫後暫時停止農民納稅、交租)。此外進一步引用國共合作公認的口號「為民族救亡抗戰，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在青年階層中結合抗戰政策的觀念宣傳減租減息，使貧農大眾領會經濟利益的觀念及救國抗戰的義務，以獲得他們的支持。

29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1937年9月29日，第59頁。

30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1937年10月5、22日，第62、73頁。

31 梁樹棠：〈收復區的工作經驗〉，中共晉綏總學委編委會編：《晉綏學訊》第8期，第35頁。

做出這些鋪墊後，接下來再「全力以赴加強政治工作及武裝民眾工作。以各新編村長、秘書、副村長為中心，進行政治訓練。對於民眾，則由所屬村常設文化聯絡員（直屬縣長領導）進行訓練。為了加強各村自衛隊的訓練，由共軍派出正規士兵擔任指導。」³²這是日本人記錄的中共在鄉村系統運作、發展根據地的實態。

軍隊的介入，保證了黨和政權可以快速在地方就位，所謂「把架子盡量的支開」，「自上而下大刀闊斧地開闢工作」，³³這是講求效率的中共充分發揮軍政工作優勢的關鍵一著。120師「到晉西北後，在部隊中，抽出中下級幹部約三百人組織十三個工作團分發晉西北各縣工作，協助地方黨進行政權改造、組織地方武裝擴兵等工作。……從行署專員、縣長、區長，最大多數是黨員，中心區村長亦多系黨員。」³⁴1938年，王恩茂率部到廣靈、渾源開闢根據地，任務中有一條就是「發展黨的組織，建立各群眾團體（犧盟、農會），恢復政權，成立區公所」，要求半個月內「每個主村建立一個支部」。³⁵可以說，抗戰初期，軍隊在中共發展中起著絕對的核心作用：「以部隊為主配合以少數政權工作人員，對外以政權名義出現，對內以工作組方式統一組織所有力量，部隊同志負責軍事佈置，政權同志負責工作佈置，但這裏一般情況軍事佈置服從於工作需要，情況稍有變化，即工作佈置服從於軍事的需要。」³⁶

軍隊建黨、建政聲勢浩大，許多地區呼啦啦就成立了一大片地方組織：「由地方黨或部隊的民運工作同志公開的在各鄉村召集群眾大會，

32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華北治安戰》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97頁。

33 〈邊區的形勢與任務——黃敬同志在區黨委高幹會上的報告〉（1942年12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375頁。

34 〈協助地方黨改造政權工作〉，《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6卷，第234頁。

35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1938年7月5日、6日，第202、204頁。

36 〈淄河前後龍山峪對敵鬥爭工作是怎樣開展的〉（1943年），山東省檔案館G027-01-0001-002。

號召參加。……有些地方建立了一二百村的組織，還未建立區的領導機關，致使各村群眾組織各自為政(如清豐中心區)，這當然是一個偏向，不過真的是把一個村一個村組織起來了。」³⁷

武裝帶動的發展出現特殊的局面——幹部培養跟不上地域發展：「地方工作要軍隊派幹部，政權工作也要軍隊派幹部，開展敵佔區工作要軍隊派幹部，地方武裝(游擊隊、民兵)也要軍隊派幹部，做生產工作，做生意，也有軍隊派幹部。尤其是須要的是連排幹部，這些幹部派出去的最多，也消耗的最大。」³⁸ 以此，發展黨員、培養幹部成為急需。邢台縣的報告講到培養幹部的各種辦法，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路羅區多從鬥爭中發現積極分子，確定和考查對象，或分配以任務，最後由熟關係談話發展之。宋莊區亦採取在改善貧農生活中，成立僱工小組中，選擇對象，進行談話，啟發其階級意識……漿水區曾讓中心支部同志幫助動員他村鬥爭時，利用自己社會關係進行發展。還有一種比較「機械化」的方法，是召開農會積極分子訓練班，由農會在各村挑選好的成份積極分子受訓。³⁹

抗戰時期，中共進入鄉村社會還有一個獨特的路徑，即盡力利用、改造原有鄉村運作體系，維持控制區域的運轉，戰時統一戰線的邏輯和環境則提供了靈活運用鄉村舊有力量的空間。彭真說得很明白：「以當時的主觀力量，要在短期間迅速打開局面，必須運用同時也應該運用行政方式，自上而下的去發動群眾。……每到一村即先找村長，分配他以某種動員工作，限令他召集全村人民開會，而由我們的幹部去講

37 〈直南豫北工作報告〉(1941年1月23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480頁。

38 〈百團大戰後晉西北區的分割與縮小情形〉(1942年9月)，《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8卷，第169頁。

39 〈邢台工作簡史〉，《太行黨史料輯存》第2編，第70頁，山西省武鄉縣檔案館藏。

話。」⁴⁰ 對此，黃敬後來有一個評判：「這種方式對不對呢？對的，先定下，放個定錢先把合法地位佔下。這時地主把持群眾團體，先給他把持去，可是你是我的部下，我取得了合法地位。你有了接近群眾的形式，才有可能改造他。」⁴¹ 由於是事後的總結，彭真和黃敬的說法或許突出了對鄉村原有體系刻意利用的一面，實際上更大的可能是，中共既有利用原有體系迅速進入鄉村的想法，也有聯合各階層民眾共同對付外敵的初心，而且，在民族危機面前，中共和鄉村社會包括上層社會達成共識也不是那麼困難。

在抗日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共通常不以鮮明的革命者姿態出現，表現得更為慎重，更加小心翼翼，展現出積極調適者的特徵。戰爭給社會各階層都帶來巨大災難、混亂的狀況，有產階級遭受打擊特別嚴重，渴望秩序盡早恢復。中共分析戰時一般地主的心理說：「土匪擾亂使他們不僅在財產上受到重大的消耗，有時在生命上也感受威脅，加之敵人搜刮掠奪，他們經歷了無數的酸甜苦辣，十分需要社會秩序之安定。恰巧我們開創時期作的就是戡平匪亂，安定秩序，因此他們對我甚表贊同，願意和我們一塊抗日，建設根據地。」⁴² 所以，「士紳名流、教育界、基督教徒如團結得宜可以成為農村抗戰工作之中堅決領導者」。⁴³

鄉村的統一戰線，讓中共和士紳的關係大為緩和，士紳成為中共游擊隊主要的給養來源，「各縣有許多財主盡量供給他們」。⁴⁴ 武鄉反「掃蕩」時，「許多地主慷慨的捐款，群眾說：『慰勞咱的軍隊，人家三家出的比

40 彭真：〈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1941年9月），第134-135頁。

41 黃敬：〈在冀南地委書記聯席會群眾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1943年12月），《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宣教工作資料選編》增訂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頁。

42 〈豫晉區工作檢查總結〉（1943年），《太岳抗日根據地》，第153-154頁。

43 楊秀峰：〈冀南行政擴大會議總結〉（1939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南歷史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頁。

44 侯東明編：《第二期抗戰中的華北游擊戰》，新光出版社1938年版，第78頁。

全村的還多。』⁴⁵ 國共衝突激烈地區，為應付國軍，「躲避支應軍隊麻煩及挨打」，乾脆「成立了『招待所』，專選富戶當主任。這個嫁禍於人辦法雖然不好，但對打擊與爭取其下層國民黨員，建立反頑軍統一戰線上曾起了很大作用。」⁴⁶ 當時中共幹部的日記中不乏請士紳吃飯的記載，張南生1939年記有：「中午一時請吃飯，弄了十六個。到會者有鄧縣長、士紳十八人，縣政府二十餘人，國民黨黨部幹部也參加。」⁴⁷ 新四軍金鵬支隊深入敵後，處境艱難，更為重視與地方的關係，支隊長楊思一1944年的日記仍然記有宴請士紳：「晚餐我們也準備了兩桌菜，請鄉保長及當地士紳。」⁴⁸ 山東濱海則以開大會的方式請士紳聚談，聯絡感情：

生活住宿，投其所好，聽其自主、自然，莫過強求秩序一致。負責同志會後到各處走走談談，不要板著面孔談問題。如能談舊學問更好，不能談舊學問，請士紳談談傾聽也好。士紳覺得我們和藹可親，一片虛心，生活上不覺得約束，如同一家一樣（有嗜好者，亦給以方便）。⁴⁹

儘管由於形勢變化，抗戰中後期，中共和士紳關係逐漸趨於緊張，總體看，抗戰階段的確還是雙方關係最好的時期。

利用既有鄉村體系，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迅速在鄉村中扎下行政根基。中共是個效率優先政黨，推崇「雷厲風行的作風，說做就做並且要做到底，問題來就解決，並且要解決到底」。⁵⁰ 充分發揮既有體系作用，

45 〈武鄉黨的簡史〉，《太行黨史料輯存》第2編，中共太行區黨委1945年版，第26頁。

46 〈邢台工作簡史〉，《太行黨史料輯存》第2編，第81頁。

47 《張南生日記》，1939年7月21日，第143頁。

48 《楊思一日記》上，1944年10月1日，第121頁。

49 〈關於濱海士紳及工農各界座談會情形的報告〉（1943年），山東省檔案館G001-01-0079-004。文中的「嗜好」，意為鴉片。

50 趙振聲：〈抗戰兩年中邊區黨的發展與鞏固〉（1939年6月20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142頁。

盡快製造規模效應，組織民眾，是最能導向效率優先的選擇。比如抗戰初期有些群眾團體打鑼召集，寫上名字就算，雖然組織很不嚴密，但在中共看來，這是開展工作的必經階段，形成規模才可能有進一步的集約，「用行政方式自上而下的發動，一打鑼都來了，你可在裏邊選擇活動分子分配工作，免除許多可能遭遇的工作上的阻撓，免碰許多釘子」。有了一定規模後，再精耕細作、宣傳教育，讓群眾體會到群眾團體的好處，「這時即召集會員群眾大會，再重新詳細說明成立團體的意義和工作綱領、計劃、簡章、繳納會費等，宣佈重新登記，願意者參加，不願意者可以自由退出」。⁵¹先規模發展，再淘汰、提高，以軍隊為基礎，黨政群各方面迅速推進，利用現有體系滲入鄉村，於最短的時間內，全方位迅速鋪開，達到了這個目標，才有之後深耕細作的基礎。這就是當時報告講到的：「地區的發展不一定要靠軍隊打，一定要以黨、政、軍、民深入工作與敵偽軍工作配合，沒有主力時，亦要能依靠地方黨、政權、群眾工作。」⁵²

上面所講的路徑只是就各根據地的大略發展方向而言，具體到各個地區還會千差萬別。像山西武鄉，這裏戰前中共就有比較健全的組織，被山西省當局視為「四大赤縣之一」，一直到抗戰前夕，「組織基礎未遭破壞」。因此，這裏在戰爭爆發後，黨組織迅速展開活動，走了一條主要依賴地方黨快速發展的道路。到1939年，黨組織從200餘人發展到2,500人，「成為武鄉政治生活上決定的力量」。⁵³一般來說，這樣的地區比之依靠軍隊或利用既有鄉村控制體系發展的地區，更加牢固，為中共所樂見。只是這樣的地區在當年的歷史現場，屬鳳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

51 彭真：〈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1941年9月），第150-151頁。

52 〈冀魯豫軍區第三次軍政黨委員會決議〉（1941年7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57頁。

53 〈武鄉黨的簡史〉，《太行黨史料輯存》第2編，第5-9頁。

3. 村基層

中共在鄉村的努力，做大規模是手段，發動群眾是關鍵，落實控制是目標。大規模進入鄉村後，進一步全面建立政權包括村政權是落實控制的關鍵一步。把權力基礎落到最基層的村社，蘇聯已有先例。俄國十月革命後，即建立從中央到縣再到村的各級蘇維埃，村蘇維埃成為最基礎的地方政權。1925年發出的〈全聯邦蘇維埃建立會議的指示〉中要求：「村蘇維埃必須為鄉村的指導政權機構，在它的周圍，聯合起在村境內活動的一切國家機關，以及鄉村會社。」⁵⁴此後，蘇聯通過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把農民納入集體農莊的軌道。1929年召開的蘇共十六大決議強調：「如果說剝奪地主的土地是十月革命在農村中的第一個步驟，那末向集體農莊過渡就是第二個步驟，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步驟，是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基礎的最重要的階段。」⁵⁵集體農莊集體生產、集體管理，最高權力屬集體農莊莊員大會，由莊員大會選出管理委員會和集體農莊主席領導、管理集體農莊的日常活動。村社建立蘇維埃源自共產主義運動的權力下探理念，這樣的權力下探包含著向群眾讓渡權利，即通過保證民眾獲得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取得民眾擁護，再經由民眾的自覺自願實現國家權力的毛細血管滲透。此即列寧所說的：「如果不提出經濟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勞動群眾狀況，勞動群眾是永遠不會同意去考慮什麼全國的共同進步的。只有在改善勞動者的經濟狀況的條件下，群眾才會投入運動，積極參加運動，高度重視運動，發揚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堅定不移的精神，並對偉大事業忠心耿耿。」⁵⁶權利攜帶權力，權力滲入權利，權利釋放和權力滲透在這裏形成雙向奔赴。

54 維辛斯基編著，張子美譯：《蘇聯地方機構》，商務印書館1950年版，第40頁。

55 〈關於集體農莊運動和農業的發展〉，《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4分冊，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2頁。

56 列寧：〈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列寧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頁。

蘇聯基層權力的行使體系，在中共開展蘇維埃革命並建立根據地後被引進。共產主義運動立足底層民眾的特徵是中共權力下探的重要助力，「面向下層，鞏固下層，打到底」⁵⁷本來就是中共權力運作的重要取向。加之1949年前的中共，根基位於鄉村，鄉村是生存發展的命脈，「不僅是我們活動的戰略基本單位，而且是一切物質供給的主要淵源。」⁵⁸因此，和蘇聯相比，中共介入鄉村，將黨的機器和意志植根鄉村社會的動力更為充足。根據地第一次在縣以下建立下探到村的行政系統，這套「縣—區—村」三級行政體制把村莊變成最基礎的權力原子，村的權力機構是村公所，「村公所按照財政，生產，教育，調解，及監察委員會，實行具體分工，由村長副負責總的領導」。⁵⁹和蘇聯一樣，這套體制在根據地剛剛建立時，強調民眾參與和民主權力的行使，建立完整的村級權力行使和監督體系，包括村民大會、村民代表會、村務會議及政民聯席會議等，形成龐大的村政結構。村民直接選出的村公所由村長、村副、各委員會主任、自衛隊隊長、秘書等組成，最多可達37人。確立公民的個體地位，「廢除以戶口為單位的封建的行政制度」，「除財力，物力徵發仍依戶口進行外，村中一切行政，一律通過上述之代表系統，以公民個人為單位進行」。⁶⁰

中共這套鄉村制度設計要真正落實，並不容易。中國鄉村廣大，基礎薄弱，加之又處於戰爭時期，即便像中共這樣高效的政治力量，短時期內要實現權力的全面覆蓋，也力所難能。1943年，蕭軍來到延安郊區的鄉村，看到：「離延安僅只十幾里路的村莊，竟像隔了千百里，這裏的人民除開送糧草的義務以外，似乎什麼政治上、文化上的宣傳

57 楊秀峰：〈冀南行政擴大會議總結〉（1939年8月），《冀南歷史文獻選編》，第102頁。

58 〈冀魯豫邊區抗聯關於村級工作的指示〉（1943年5月11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586頁。

59 冀中區行署：〈冀中區五年來民眾工作總結〉（1943年4月22日），《冀中抗日政權工作七項五年總結（1937.7-1942.5）》，第28頁。

60 彭真：〈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1941年9月），第36頁。

也接不到，看不出他們和這革命政府有什麼思想、感情等聯繫。沒有報紙，沒有經常的宣傳，一句話，看不到政府的工作，黨的工作在哪裏。」⁶¹ 時任延屬地委組織部部長的李景膺則提供了一個數據：到抗戰後期，延屬地委下轄6,006個自然村中，仍有1,815個自然村沒有黨員。⁶² 也就是說，地處陝甘寧邊區中心的延屬區域，無黨員的自然村佔到30%。即便建立了管理系統，應付權力的現象也不在少數：

村農教會的名冊，張王李趙應有盡有，再一注意會員年齡，發現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一律是五十以上十五以下的老年和青年，沒有一個壯年。工作同志到莊長那裏一問，莊長很自然的說：把年齡隨便改一改好了，沒有多大關係。仔細一調查，不只年齡是假的，大部分姓名也是編纂〔造〕的，他們害怕上了名單，第二步就抽兵，於是想出這樣巧妙的應付方法。⁶³

最大的問題還是村政權，許多地區「沒有成立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新村長『選』出之後，大家就不再管了，沒有人去監督他，幫助他，村長事務過於繁重。」⁶⁴ 巨大的戰爭動員責任讓當村長成為畏途，冀魯豫很多地區的村長在中共進入後仍然「大多數是輪流」，「有的一天一換，有的按地、按人、按牛輪流」。⁶⁵ 晉冀豫的狀況也大同小異，作為

61 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下，1943年11月27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頁。

62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李景膺發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乙，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1994年版，第160頁。

63 〈戰鬥中的山東人民——一九四〇年八月五日李竹如在聯合大會上的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5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頁。

64 〈徹底改造村政權〉（1940年6月19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政權建設》，第95頁。

65 〈湖西工作彙報〉（1943年10月11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695頁。

政權的領導者，「支部同志知道掌握村政權重要，不能讓人，同時又感到作村長太苦，工作太忙，太費時間，不能照顧家庭生產，生活太苦，因此大家互推諉都不願幹村長。」⁶⁶ 內黃的調查說得更具體：

當村長不但吃苦，並且有性命死傷的危險。地主、富農都不願當，而另找中農和貧農來當村長，並給以薪金。從此便開始了僱傭的制度，……現在的村政機構有點出奇，它不是新的委員制，也不是舊的保甲制，它是半封建半民主的複合狀態。村政權是2個保長，1個自衛隊長，3人組織成的。村長以下，不是鄰閭制，也不是甲長制。當甲長的也不是固定的家長或族長，而是家族輪流擔任。⁶⁷

這樣的村政權，雖然根基已經扎下，但並不能滿足期望，中共檢討：「我們領導的村公所打板子比過去政權還厲害，因為動員任務多，支差多，群眾積極性不高，村長動不動就打，個別地方有三天打了四十多個人的」；「黨員當了幹部，村公所連村警都成了我們的『清一色』，因此，支差少些，負擔少些，群眾認我們這一夥是特殊人物，是他們的統治者。」⁶⁸

當年中共的文件中，這些問題都會一一擺上桌面，只有面對問題，才有可能解決問題。這就是毛澤東講的：「問題是解決了又發生，發生了又解決，我們就是這樣地前進。」⁶⁹ 解決的辦法，包括調整村政權組織結構、強化村政權職能等，具體措施有：縮小行政區域，「使政府接

66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組織工作報告〉(1941年8月1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4卷，第559-560頁。

67 鞏之展：〈內黃李七吉村的調查〉(1943年1月13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483頁。

68 〈武鄉黨的簡史〉，《太行黨史料輯存》第2編，第12頁。

69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45頁。

近下層，適應戰爭環境和減少浪費人力財力」；⁷⁰ 組織工作團等深入基層和鄉村，協助鄉村政權的改造和運作；規定「各地委幹部工作單位在縣，工作中心在村」，⁷¹ 保證中高層幹部和村基層的直接連結。

為政在人，確保遴選符合要求的村長，給予村長脫離生產的權利，是中共在鄉村實現權力落地的最重要一環。如果說傳統中國鄉村基本處於自治狀態，政權和鄉村精英間形成妥協分利的運作模式，中共進入後的最大變化就是培養了一批直接授權、管理的鄉村幹部，打下權力滲透的管道，也為日後更大規模的控制和改造奠定基石。當時文件說得很清楚：「幹部不妨多些，不一定只限於幾個人，一街一巷都可有個小幹部。這樣由小而大逐漸培養。」⁷²

中共進入鄉村後，組織上展開的第一步常常是改選村長。經過村選程序產生的村長，「絕大多數是黨員」。⁷³ 這樣的結果既有村民的選擇，也不乏組織的意志。比如山東有報告說：「膠東黃縣×村選舉時群眾四散逃避，區級幹部把人硬趕回來選舉；濱海某縣選舉村長，幹部佈置選一工人，結果選了個老頭子，幹部竟異想天開，宣佈有鬍子的不要，推翻了大家的意見。」⁷⁴

雖然中共盡力推出自己人擔任村長，但可供挑選的幹部人才實在有限，加之戰爭時期，多種利益博弈，要盡如所願也不容易。河南長垣一

70 〈冀太聯辦楊主任秀峰向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的工作報告〉，《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政權建設》，第155頁。

71 〈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邊區黨的任務——信錫華在冀魯豫邊區黨委成立大會上的報告〉（1940年4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288頁。

72 〈磁縣根據地工作研究〉，《太行黨史料輯存》第2編，第56頁。

73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組織工作報告〉（1941年8月1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4卷，第559頁。

74 〈山東抗日民主政權工作三年來的總結與今後施政之中心方案——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黎玉主任委員在省臨參會一屆二次大會上的施政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0輯，第293頁。

個村的狀況是：「村長自抗戰後，已更換三次。第一次係敵人於舉寨建立據點後，村長害怕敵人，不幹了，又覓一人代替村長應付，此人忠實於敵人，企圖充任全鄉鄉長，不久被人暗殺。□□□村長對敵人不敢應付，又怕敵人，加之後來游擊隊活躍，常與出擾之敵偽作戰，該村長恐被敵人抓去，嚇死了。遂又換現在村長，經過選舉仍是此人，現年五十餘歲，表面對我甚好，實係應付。」⁷⁵

村選中，如果基層組織不能有效掌握局面，村霸型的人物可能在選舉中脫穎而出，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村長40多歲，貧農，家4口，有地4垧，現租20多垧地。過去不務農，幹「坐寶」的營生，買賣土地時當「地牙子」，說媒當「人牙子」。100元交易能掙三五十，七八十。每年收入頂四五個長工。掙了錢不貼補家用，包了三四個大姑娘。……這個人不識字，冒失鬼、無計劃，能幹工作。喜歡戴「高帽子」，一表揚工作就積極。個性強，村裏的人和幹部把握不住他，甚也得依著他。對這人要一打一拉。在打了他後會承認錯誤。由於他幹那些買賣上的事，交結了不少人的友誼，村選時婦女選他者將佔一半。老百姓如不順從他，就報復，咬別人。⁷⁶

基層幹部擁有權力後的作為有時讓人觸目驚心。山陰縣的報告寫道，這一時期「幹部們執行政策上有些過左。當時幹部有這樣一個觀點，幹部不敢殺人的不是好幹部，群眾叫代縣營黃肉鋪，共計只黃營長殺的不下百人以下。」⁷⁷ 極而言之，甚至有「報兵人員二個合起來架票，人家民眾娶了老婆，第一天晚要拿50元錢買第一夜」。⁷⁸

75 〈冀魯豫區黨委的工作總結〉（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153頁。

76 《高魯日記》，1943年4月1日，第381-382頁。

77 山陰縣委：《黨的工作檢查報告》（1943年6月4日），A134-1-2-3。此件檔案承鄒鉞先生提供，謹此致謝。

78 〈五個月的工作報告〉（1940年3月1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167頁。

中共革命歷史上，左常常不期而至。戰爭年代的殘酷環境，更讓左趁虛而入。中共報告反映：「靈壽縣敵佔區一個村子的群眾把政府一個工作人員報給敵人被敵殺害，後來政府即派武裝到那個村，一次就殺了二十多個村民，自此敵佔區群眾對政府要什麼給什麼，不敢不服從了。但是我們政府就認為這是他們工作做得好，於是處處用高壓手段對待群眾。」⁷⁹ 這種壓服手段並不牢靠，一旦形式逆轉，就有可能遭遇反噬。這就是中共總結的：「湖西工作的垮台，魯西冀魯豫邊會鬥的蜂起，許多地區地主對我黨員的屠殺（冀魯豫邊黨員被活埋二千餘），敵人在若干地區能夠利用地主甚至群眾來反對我們，都與我們錯誤的鋤奸肅反政策有關。」⁸⁰ 中共一直很注意防止左，可是左又很難避免，常常看到的狀況是：「幹部已把『左』的一套凝固化，形成習慣與意識，嚴重地脫離群眾。」⁸¹ 實際運作中，左往往意味著強制、脅迫、超越具體條件和環境的高要求，這是強調能動性及效率優先時很難避免的副產品。

吊詭的是，左固然屢屢帶來問題，需要打開局面時，往往又成為難以抑制的衝動。抗戰時期，由於實行統一戰線，對地主、富農等農村財富階層政策相對緩和，此時，損傷財富階層，將利益向多數民眾傾斜，儘管政策上需要面對左的風險，卻有可能贏得更多民眾的支持。比如當時民眾喜歡的幹部即為：「堅決體現群眾利益，抓住了減租減息，『左』些適合群眾口味。」⁸² 不過，如果過度強調迎合民眾心理，又可能動搖統一戰線的基礎，因此，具體政策常搖擺於左和糾左之間。這種搖擺因為關聯著強大的追責機制，又會伴隨幹部的升降沉浮，其間，固然不乏因政策不穩定而無辜受屈的幹部；但總的看，這

79 〈1939年底晉東巡視報告〉，《太行黨史資料輯存》第1編，第106頁。

80 〈中央對魯西和冀魯豫邊區工作的指示〉（1941年7月），《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7輯，第206頁。

81 〈武鄉實驗縣工作的檢討與轉變方向——小活莊會議的總結〉（1941年1月7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4卷，第9頁。

82 〈邢台工作簡史〉，《太行黨史資料輯存》第2編，第75頁。

種不斷的錯與糾錯倒意外實現了對幹部群體的錘煉，讓他們更強烈地體會到中共的政策彈性，摸索到在這套來回搖擺的機制下生存、運作的辦法。中共數次大規模洗刷、整頓幹部，許多幹部被淘汰，雖然免不了誤傷，但對這樣一支高度強調執行力的政治力量言，向前推進的需要會遠遠超越個體命運的考量。

儘管有種種問題，但通過在問題中克服問題，中共逐漸實現政治力對鄉村的介入，翻轉了鄉村的權力結構，形成以幹部為主體，勞模、普通黨員、積極分子、民兵為輔助的新權威群體。舊有權威群體中，地主富農、村長副村長沒落，只有小學教員仍然擁有一席之地。⁸³ 兩相比較，中共樹立的新鄉村權力群體，將更多普通人納入權力體系中，覆蓋面遠遠高於之前，尤其通過村選讓群眾體會到權利的意義，並由此完成權力的落地。

經過中共改造的村政權承擔了支持戰爭和社會政治改造的基礎性任務。根據當時的調查，村政權的工作主要有：戰爭動員、改善民生、民主建設、生產建設、文化建設。不過真正落實下來，還是以完成上面佈置的任務為主：「這些工作中實際上哪一種工作做的最多？事實是開會、調查登記最多。其次是公糧、村攤款多。減租減息、解決群眾問題，都是配合上邊做的，上邊不來，就不做。寧武一個月內，公糧、村攤款、招待佔整個時間的43%，開會、調查登記佔45%，解決各種問題

83 作為抗戰時期鄉村中唯一保持自身地位的群體，小學教員承擔知識文化傳播的功能，國共兩黨都意識到他們的重要性。楊尚昆談到：「國民黨對小學教員的方針政策，值得我們研究。華北各地我們爭取小學教員是很差的，大部分並沒有爭取過來，而國民黨在敵後方的活動主要依靠他們。」（〈楊尚昆同志在黎城會議上的報告——目前政治形勢與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4月16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二輯文獻部分（上），第215頁）為此中共要求：「吸收質量好的小學教員入黨，經常注意教育和培養小學教員、並提高他們，……反對任何輕視和不敢接近小學教員的有害觀點。」（〈中共山東分局關於改進黨內黨外教育工作的指示〉，《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9輯，第323頁）

只佔4.6%。」⁸⁴ 隨著控制力的增強，政權中脫產人員也水漲船高，山東東阿一縣，「黨政民脫離生產者一千零二十三人，地方武裝脫離生產者七百九十二人，足證黨政民機關之龐大」。⁸⁵ 這是強化控制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副產品。

對這個政權，陝西固臨的一個老秀才傅振科評判：

在政府方面，他覺得比舊政府的確好，「還和老百姓商商議議」。但是「辦公家的事也難呀！一人難稱百人意，人人一致也很困難，人們終有一些偏心，每個人總有點為自己打算。說馱鹽吧，誰也不高興，他推你，你推他，結果誰都推不過去的。」

對於駐軍，他說：「終還是老百姓的隊伍，不欺壓老百姓，不串門戶，不糟蹋女人。借些東西也沒關係，就是有些亂，有些隊伍不經過村長，自己到老百姓家裏去借，借走很久也不還，要老百姓親自找也沒法去找。」

……

在教育方面，他感到「不如過去了，大概是人很忙，娃娃們也懶的去念了。唉！念書還是好事，有人催緊一些，娃娃們念書的還會有一些的。有高小學堂時（過去臨鎮有個高小）還好，而今教員比不住過去。……念不下什麼。」⁸⁶

這種有肯定、也指出不足的評判，很符合老秀才的身份。歷史常常就是這樣，過於絕對的褒貶常常讓人生疑，倒是這種喜中有憂的話，讓人更能觸摸到歷史流動的脈絡。

84 〈村政權及其他〉（1942年8月30日），《張聞天晉陝調查文集》，第310頁。

85 〈中央對魯西和冀魯豫邊區工作的指示〉（1941年7月），《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7輯，第206頁。

86 李卓然：〈固臨調查〉，《李卓然文集》上，第270頁。

4. 中共的章法

如前所述，戰時中共非常強調領導藝術的培養，要求革命陣營放大眼光，這些落實到具體革命實踐，就是注意處事的條理性和系統性，權力運用講究章法。毛澤東說：「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並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⁸⁷ 這裏講的，實際就是章法。

特別能體現中共做事章法的是劉少奇1942年的一段講話。是年，劉少奇從華中返回延安，經過山東、晉察冀、晉西北等根據地。這段講話即為在晉西北根據地幹部會議上報告的一部分。報告後來收入《劉少奇選集》上卷，但將《選集》和原始文本對照，可以發現《選集》有大量的刪改，一些具體的、生動的論述被刪節，包括這一段：

中心區、村在發動群眾運動之前，由區政府負責人與工作團負責人訪問地主，說明群眾運動要來，不要緊，不要怕，即由區政府召開幾天士紳、地主座談會（請請酒，唱唱戲），這樣調虎離山，以便工作團挨家挨戶去訪問農民，和農民談話，進行情況的瞭解並注意發現積極分子。幹部每天將調查研究所得，加以總結，對自己的工作方式、態度加以檢討，使每天的工作有進步（頂多和農民談三四天）。個別談話完了之後，即召集農民中積極分子開會，商討減租減息辦法。由工作團最負責的人和他們談話，使他們徹底瞭解，並給他們以任務，去找更多的農民來開會。開好了，第二天就召集全村農民大會，決定幾個問題，並在大會上選舉農會籌備會。減租不能馬上就做，應找出當時當地農民最迫切的問題來下手，先經過些鬥爭，提高農民的熱忱和信心，再進行減租減息。這些鬥爭，以各個農村農民具體要求為口號，比如借糧為口號。另一邊，區政府召開的座談會，也暗地配合，和一些較開明

87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01頁。

的地主說好了的，用些方法使他不好不答應借。農民發動去借糧時，就先借那些已說好了的，由農民出面（一定要農民自己出面，決不可幹部代替），一借成功，農民的情緒提高起來了。而別的地主見那些地主都借了，自己也不好不借。農民的積極性這樣提高了之後，就不會降低，接著就可進行減租減息，具體討論減租減息改善僱工生活的辦法。

這時，就加緊教育那幾個積極分子，開一個臨時的比較深入的二三天訓練班。馬上成立農會。成立農會時要懸榜，要懸榜，農民對於懸榜，非常重視。成立農會時，要準備旗子、標語、遊行示威，縣長、軍隊首長都要去出席農會，以示對農會的重視，並講話鼓勵，送東西。這影響一傳開去，非中心區也自動起來了，也要求組織農會。這就是非中心區被中心區所推動。

中心區村幹部在工作做成時，即留下一部分幹部做鞏固工作，其他幹部轉移陣地，到非中心區去做。這時到非中心區，群眾就會自己找來了。這樣，群眾運動形成一股潮流，一個月到兩個月，就可發動千百萬群眾。⁸⁸

這段話談到了展開群眾運動時，針對不同時段、不同人群、不同地點應該採取的不同方法，可謂發動群眾的運動指南，這其間，各個環節、各種場景環環相扣，從內到外無縫銜接，說它是中共領導者指導革命運動的範本，應不為過。而這樣的範本，又通過劉少奇的不斷宣講在各個根據地傳播，成為一個普遍的經驗。

有計劃、有層次、有步驟地開展工作，對強調系統運作的中共，似乎是家常便飯。中共淮安縣委書記鄒屏1945年記下的一次鄉村改選，也顯示中共循序漸進開展運動的章法。

88 〈劉少奇同志關於群眾運動及其他問題的報告〉（1942年12月9日-10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8卷，第186-187頁。

淮安嘉樹區鄭楊村是當時中共所稱民主運動（也就是改選村政權）的試點村，4月1日，運動展開。按照中共的工作慣例，該村先開會，公佈落後和破壞分子名單，要求他們在會上坦白錯誤。這可以視為政治層面的動員。接著召開幹部會議，討論分配鬥爭果實，「群眾要求平均發放，幹部認為發糧不普遍不行，不優待積極分子也不行」。4月2日下午，召開群眾大會，發放鬥爭得來的糧食，進行經濟層面的動員，是為政治、經濟兩條腿走路。這也是群眾享受到權利的階段。

4月3日起，權力露出頭角。運動多頭並進，從普通、落後、先進三個層面分別展開：一是繼續開村民大會，開展坦白運動；二是個別談話，發動落後群眾；三是集中黨員上黨課，教育黨員，討論「共產黨為什麼人辦事？為什麼要保守黨的秘密？為什麼要過組織生活？」有普遍的要求，也有具針對性的重點施策，既面面俱到，又不是平均用力。

4月4日下午，召開村民大會，進入運動的核心環節，開展村選動員：「講解為何進行村選？對村長候選人的條件進行討論：和共產黨一條心、聯繫群眾、辦事公正、有能力、負責任。嚴防壞人、二流子混進來。」會後，陸續召開小組會討論村選意義，醞釀村長及村委候選人名單。

8日下午起，村黨支部積極介入村選的具體操作，「黨員鄭××為村長候選人到各組活動，支部也為之活動」。9日上午開黨支部會，討論競選大會準備工作。一切就緒後，10日全村公民大會開幕，「用丟豆子在所有競選人的碗裏的辦法，選舉了村長和村行政委員」。經過周密安排，權力順利落地。這些都完成後，中共照例組織群眾性娛樂活動：「會後群眾玩花船」。群眾性娛樂既是對群眾權利的肯定，又是對權力落地的慶祝。

村選舉程序完成後，運動本身目標就已達到。不過，在中共看來，選出村政權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接下來保證村政權符合黨的期待才是更重要、更持久的任務。因此，從選出村政權開始，中共就在村莊裏展開整黨工作，具體包括：「①發展新黨員，審查舊黨員；②總結各人在運

動中的表現，表揚與評論幹部、黨員；③建立新的制度，制訂新的工作計劃。」⁸⁹這是中共的未雨綢繆，著人先鞭。

中共這一套章法，水銀瀉地。從當年材料看，通過會議、培訓、經驗推廣、工作團等方式，幾年時間，這一套做法和觀念已經在根據地推廣和彌散。儘管，其間不乏依樣畫葫蘆的形式主義，但即便是形式，細密的形式裏，也可以看到組織權力的運作和滲透，何況形式一旦圓熟，也可以登堂入室成為內容。當時還缺乏政治運動經驗的普通民眾在這一章法面前，被晃得眼花繚亂：「共產黨做事神出鬼沒，一會這個，一會那個，花樣多。隔沒幾天就給你一個本事看看，事情做起來還真是好。我們的老腦筋，現在真該換一下啦。」⁹⁰

或有人會懷疑對中共章法的上述解讀過於合目的性，是根據結果反推得出的邏輯，這樣的質疑自有必要。任何事物都不是一馬平川、天造地設，總有種種曲折、回流，以及巧合、意外。當年中共幹部以文會友時，相互之間的批評中就有「純正話多，複雜事物的分析少」，⁹¹這樣的批評放到歷史研究中同樣有效。歷史現場中事與願違者不會罕見，比如秋收時節，抗大組織學員幫助農民，「對此，富農和中農十分高興，因為他們地多，秋收時人手不夠要僱打短工者，現在不用花錢僱了，他們當然高興。貧農地不多，有抗大幫忙，一下子收回來了，他們也高興。僱農的心情則不然。因為富農中農的地也收割了，僱農和貧農受僱的機會便沒有了。」⁹²窮苦人需要幫助，中共也以幫助窮苦人為職志，然而有時候行動的結果，窮苦人利益反而受到損害，這就是社會生活的複雜。

89 〈黨支部工作總結——1945年1月在縣區幹部會上的報告〉，《鄒屏工作筆記》，中共淮安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1993年版，第61頁。

90 〈民主運動總結〉，《鄒屏工作筆記》，第81頁。

91 辛程：《思想改造——我的自傳》，吉林省政協機關印刷廠2003年印行，第55頁。黨人之間以「複雜的事物分析少」相互批評，亦正體現了他們對複雜性認知的追求。

92 《高魯日記》，1942年10月17日，第341頁。

不過，具體到中共思考和做事的章法，確實又不是研究者的想像；實際上，現實生活中的當今中國，這樣的章法處處可見，而這些在根據地時期就已經成形。追根溯源，中共章法的形成，或許還早於根據地時期，1924年，國民黨改組進入關鍵階段時，鮑羅廷和中共新生代領導者瞿秋白關於中共方面為改組所做工作的一段對話，就很能看出蘇俄顧問如何給年輕的共產黨人示範革命運動的章法：

鮑：我不在時出版了黨的什麼期刊了嗎？

瞿：昨天出版了第48期週報，那裏既有國民黨的綱領，又有國民黨的宣言，還有社論，只是我還沒有看。

鮑：不管怎麼說，有關於改組的社論吧？

瞿：我只看了標題。

鮑：你不知道社論的內容嗎？

瞿：不知道，不過現在可以去買一張報紙。

鮑：你們的報紙在這裏公開出售嗎？

瞿：是的，半公開。

鮑：關於國民黨改組問題，中央向上海以外各黨組織發出了什麼指示，或什麼通知、通告沒有？在北京，什麼也沒有收到，甚至連宣言和綱領他們都沒有。應該提出這個問題。對於國民黨的改組，黨在做什麼工作，省裏什麼都不知道。國民黨在改組，這個情況知道，但黨在做什麼工作，他們不知道。關於國民黨改組問題，需要起草一個通告，散發給各級組織。⁹³

93 〈鮑羅廷同瞿秋白的談話記錄〉（1923年12月16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1920-1925），第378-379頁。

鮑羅廷提出的這些問題涉及宣傳、組織、人事及具體貫徹等各方面，鮑羅廷不斷的追問正是督查具體落實的必要環節。這對年輕的中共領導人的刺激可以想像。可以說，蘇俄方面的指導成為早期中共黨人提高革命技術的最大推手，而國民革命的展開又給了指導者和學習者以充分的實踐舞台。當然，國民黨也獲得了同樣的機會，但正像許多共產國際代表及中共黨人注意到的那樣，「國民黨依他的社會成份（階級分子）及歷史上的關係看來，客觀上不能有嚴格的集中主義及明顯的組織形式」，⁹⁴ 蘇俄的指導無法深入到國民黨的內核，國民黨和蘇俄之間總是隔了一層，這是一個常態政治力量和特異政治力量的區別。相比之下，和布爾什維克同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同樣擁有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的中共，就完全沒有這樣的距離。中共的章法正是這樣一步步形成的。

抗戰時期，中共的權力下探立竿見影，讓一個自晚清以來日漸敗壞、重組又缺乏有效手段的社會體，迅速建立起高效的運作機制，一個政治主導型社會由此降生。中共的新社會之所以為新，關鍵在於政治力量以空前強勢的姿態進入社會，承擔起社會改造的責任，並逐漸取代社會本身的職能。面對社會難題，中共崇尚的不是適應而是改造社會，通常的思維是：「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機械唯物論，單純的只看到外在的客觀的原因。……我們不是只要瞭解認識客觀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⁹⁵ 這一點，可以說是戰時中共政治的關鍵，事實上也影響了1949年後長時間內的中國社會政治構建。不過，拉長眼光看，這種特殊時期充分有效的運作機制，也不是沒有局限性，政治取代社會後，抑制了社會本身的活力，而社會的弱化，又催迫或誘使政治力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功能，使之不斷突破政治和社會間的界限，造成整個社會不斷政治化，社會活力嚴重衰減。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治和

94 〈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1924年5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61-62頁。

95 〈關於部隊組織工作的幾個問題〉（1941年8月），《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7卷，第171頁。

社會間的關係大概可作如是觀。當然，這一點在抗戰時期並不明顯，其中既有統一戰線的功勞，也和以群眾路線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建立相關。組織上垂直下探，政治文化上水平擴展，垂直和扁平結合，大大軟化了革命政治的剛性一面，使之具有更貼近民眾及現實的柔軟特質。

五、群眾組織及群眾路線

抗戰時期，中共提出群眾路線，並寫入七大通過的黨章。劉少奇在中共七大做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時解釋說：「黨的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¹ 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提法意味著群眾路線不以完整的組織形態出現，更多是一種政治的倡導和鼓勵，是一種政治文化建構。

黨和群眾的關係是中共革命念茲在茲的問題。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革命的領導者，黨應該領導群眾，而共產主義運動貼近民眾的性質又使之不能自居於民眾之上。無論是共產主義運動要求的推翻資產階級官僚機器，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實際政治運作中觀察到的官僚主義危險，都使他們強烈意識到克服官僚主義的緊迫性。正因此，抗戰時期，在硬的政治構建起垂直的嚴密權力體系同時，軟的政治文化也卓然成形，這就是以群眾路線為核心的政治文化。群眾路線把黨和群眾擺在水平位置，通過向群眾釋放權利，以同心圓式的不斷推展和融合拉近黨和群眾之間的聯繫。和硬的制度不同，這是一種倡導和要求，卻又由於中共強烈意識形態政黨的特色及系統化的運作方式，使之成為融入血脈的經驗和文化。由此形成垂直和水平互為補充的兩套系統，豐富了中共政治的內涵，中共政治的彈性很大程度即由此而來。

1 劉少奇：〈論黨〉，《劉少奇選集》上，第342頁。

有意思的是，當群眾路線的闡釋不斷強化時，群眾組織的地位卻遭遇尷尬。這既體現中共面向群眾的主要方式確實不在於組織而更在於文化，也和群眾路線及黨的領導之間的張力相關。動員群眾、向群眾釋放權利理論上應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屬性要求，群眾觀點始終是中共革命一個基礎性的理念。同時，中共是一個高度強調政策和策略的政黨，群眾組織和群眾動員又具有組織群眾，服務於權力落地的目標。正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群眾組織的具體目標不斷變更，從幫助創建、發展根據地到穩固、擴大根據地再到轉入生產，總體看，隨著黨的垂直組織體系和水平政治文化的推進，群眾組織的作用呈遞減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群眾組織，成為討論的話題；1944年，延安甚至曾發生是否保留群眾組織的討論，這實際是抗戰以來根據地群眾組織功能逐漸演變的結果，也是群眾權利和組織權力重心逐漸傾斜的結果。

1. 黨與群眾

抗戰初期中共的群眾運動，直接目標是建立抗戰根據地，群眾運動和擴軍、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緊密聯結。深入並依靠群眾，既是中共理論和原則的基本要求，也是日軍侵略直接威脅下謀求生存發展的現實道路。當年的中共報告明確指出：「必須把群眾工作作為建立根據地的最基本工作。」² 根據地建設初期，中共群眾運動的方向是建立群眾組織，幫助群眾爭取權利，以之團結和領導群眾。

抗戰一開始，毛澤東等設想的中共自主主導的群眾組織發展模式應該是：「以人民自衛軍為主要的群眾組織形式，可能時，再組織農會及青年團體。」³ 這樣的路徑符合中共武裝推進的設想，的確也是抗戰初期

2 〈中共冀豫晉省委關於新形勢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務的決定〉（1938年6月）
《太行抗日根據地》一，第20頁。

3 〈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大量發展游擊戰爭〉（1938年4月2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18頁。

許多地區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開展的典型方式。正如陳雲所說的：「有了軍隊，就可以把政權建立起來，把地方黨擴大起來，接著把群眾團體也組織起來。所以說，有了軍隊便什麼都有了。」⁴ 根據地群眾被納入各種群眾組織，儘管「群眾組織生活大部分都沒健全起來，只是工會的小組有十幾縣可以開小組會，農會沒有一縣能做到」，但「各群眾組織區級以上的則能經常地開會、討論工作、執行工作」。⁵

對發動群眾的困難，黃敬有很坦率的發言：

要把群眾從和平的、散漫的、蒙昧的情況中轉變過來，要他拿起槍來打仗，不怕流血不怕死人，而且還要各地大家都齊心一致，真不是容易的事情。……（任何被欺負的人敢於拿起槍來玩真的，不到了急紅了眼的程度是辦不到的）群眾在思想上情緒上的複雜，人心不齊，舊勢力統治的阻礙，文化低落，見聞狹小，傳統成見的束縛與顧慮之多（保守、認命、自私、多疑、懦弱、家庭生活之牽累），這些事都成為發動群眾的障礙，決不是抽象的想像所能知道。

黃敬道出了群眾的自利自保本能，這是面對群眾時不能不正視的現實。要真正讓群眾起來，必須讓他們「瞭解到解決切身的事要和大家聯合的必要。要使他們在大家為切身（利益）鬥爭中把眼界放寬了」。⁶ 這裏面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發動群眾要照顧群眾切身利益，啟發群眾的自覺自主意識，讓他們體會到自身利益和黨的利益一致；二是在切身利益的鬥爭中放寬群眾的眼界，使之不再完全陷於個人利益。正因此，抗戰初期，為充分發動群眾，群眾組織的自主性得到高度重視，中共強調要糾正「只為自己的便利而作群眾工作，及從上而下強迫

4 〈陝甘寧邊區的群眾工作〉，《陳雲文選》，第104頁。

5 〈晉冀豫區委群眾工作總結報告〉（1939年3月16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群眾運動》，第118-119頁。

6 〈邊區的形勢與任務——黃敬同志在區黨委高幹會上的報告〉（1942年12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376頁。

的統治的組織及發動民眾的方式」。⁷ 下面這則批評，很能代表中共的態度：

我們完全忽略了深入群眾，依靠群眾的黨的指示，還自足自誇於現況，說什麼我們行政開展了，有辦法了，敵區都望〔往〕我們這裏送糧送款，僅僅拿送糧送款來衡量我們的政權，不考慮送糧送款的基本動機，是怕我們抓他殺他。而且我們對敵區工作，完全依靠在鄉村長身上，……黨指示我們說：「這樣做下去是危險的，應該把依靠漢奸鄉村長轉變成依靠敵區民眾。」我們的同志就皺一皺眉頭說：「那怎麼能行呢？敵區民眾非常滑頭，我們的隊伍，又不能經常地去，不依靠鄉村長，糧款幾時能拿上來。」⁸

抗戰初中期，為了實現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在基礎和影響不夠深入的地區，中共常以群眾組織面目出現，比如晉冀豫區黨委公開要求：「支部同志應須都到群眾組織與群眾武裝裏去，一般同志到農會與自衛隊游擊小組中去，青年同志到青救去，婦女同志到婦救去，在裏邊遵守群眾組織的紀律，積極活動，以自己的模範去影響與領導別人，同時還必須特別注意掌握村政權。」⁹ 中共中央頒發的相關文件中也要求保持群眾組織的獨立性，防止出現包辦代替：

民眾團體是民眾自己的自願組織的團體，黨、政府、軍隊不應直接干涉民眾團體內部的生活。黨對民眾團體的領導，經過自己的黨員及黨團。但黨民不分、包辦、清一色的現象，必須糾正。民眾團體的各級委員會委員須盡可能有半數以上的非黨員。民眾團

7 〈中共冀豫晉省委關於新形勢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務的決定〉（1938年6月），《太行抗日根據地》一，第20頁。

8 〈蓬萊縣委政（府）工（作）部關於敵區工作的指示〉（1940年10月28日），《艾園山抗日根據地》，中共蓬萊縣黨史徵集委員會1991年版，第14-15頁。

9 〈整黨與建黨是目前的嚴重任務——徐子榮同志在中共晉冀豫區黨委第二次組聯會上的總結〉（1940年4月15日），《太行抗日根據地》一，第96頁。

體中的黨團問題與政府中黨團同。政府應尊重民眾團體的獨立性，給民眾團體以必要的幫助，……一律不干涉民眾團體的生活與工作。¹⁰

保證群眾組織的獨立性，給予群眾組織充分的施展空間，是有效開展群眾工作的必要前提，這樣的要求和保證黨的領導理論上並不衝突。

不過，在中共的運作體系中，黨組織向來具有壓倒性的地位，儘管對展開自覺的群眾運動以真正彰顯群眾力量抱有期待，但具體運行過程中，黨組織包辦群眾運動的案例仍屢見不鮮：「在沒有發動群眾之前，即建立了官辦式的群眾組織，在群眾初步發動時，即建立了龐大的黨，把所有積極分子（不是階級覺悟的分子），都吸收進了黨，根本忽視群眾組織。這樣就使得黨降低了自己的水平，成為群眾團體。群眾團體則由官辦到黨辦，根本無獨立性。」¹¹黨的絕對主導地位，如當時人說到的：「如果你決定殺個人，開大會徵求意見，誰敢不舉手同意呢，因為群眾自己怕你說他是漢奸，所以只要我們一說，他就連應是是是。」¹²

應該說，在黨和群眾的關係上出現一些糾葛，有跡可循。能不能動員群眾投身革命，是中共判斷自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誌，群眾路線就是這一革命理念下的產物。中共革命同時又強調堅持黨的領導，黨是革命力量的先鋒隊。黨依靠群眾，黨又要領導群眾，在唯物辯證法的語境裏，這樣的思路沒有問題，但是實際運行中，黨和群眾的關係不可能像邏輯表述的那樣清楚。由於群眾數量上的龐大及實際行動中常常呈

10 〈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2-433頁。

11 彭濤：〈群眾運動的發展與階級關係的變化〉（1943年2月），《太行抗日根據地》一，第241頁。

12 〈陳付參謀長在武工隊長會議上的總結〉，《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7卷，第421頁。

現的非理性特徵，掌握群眾並不容易，黨、群包括黨組織與群眾組織的關係常呈現內在的緊張。

群眾由不同個體組成，不可避免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利益多歧本為常態。群眾與黨的關係中，搭便車是常見的現象，中共對此也不完全排斥，有時甚至大開綠燈；搭便車的人多了，可以增加政治力量的聲勢，儘管同時也會大大增加政治運作的成本。以1942年減租減息時的武鄉為例，大致可看出群眾和黨之間的複雜關係。減除租息，大部分群眾可以獲利，積極參與，「鬥爭形成一個大浪潮，落後村莊也動起來了，……租典地普遍的訂了年限，群眾中，積壓的問題大量的提出解決了。鬥爭激烈時半月解決的問題，比縣政府一年解決的還多。群眾情緒高漲了，在鬥爭中踴躍的發言講道理，鬥爭會不少從下午開到第二天天明的，還有連開三天的。」與此同時，過激現象開始出現：「一開頭下寨與馬堡就打了人，消息很快的傳開『老麻在還打了，一定是上頭叫的！』喚起了黨員與先進群眾的過左情緒，打人的現象就這樣發生了。這是與群眾鬥爭經驗有關係的，他們說：『鬥嘴惹人幹甚，不如打痛快。』」¹³ 群眾一旦發動起來，即會揣摩黨的意圖，按自己的喜好有意無意塑造運動的方向，使黨從引導者變成羈勒者。

當中共以規模擴張為首要追求時，發揮各種力量的積極性通常會佔據思考的首要位置，其他顧慮暫時被放到一邊。不過，保持黨的領導更是念茲在茲的話題，既要發動群眾，又要約束群眾，是中共掌握群眾運動的基本原則，如下的反映中共始終十分在意：「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混淆，群眾團體的帽子戴在黨的頭上」，「馬虎了黨的面目，減弱黨在群眾中的影響」。¹⁴

作為一個緊繃控制和效率之弦的政黨，中共的話語包含著十分豐富的張力，可從多個角度理解；關於黨的影響被削弱的批評，起碼可有如

13 〈武鄉黨的簡史〉，《太行黨史料輯存》第2編，第25頁。

14 〈晉豫邊區黨過去三個月工作的總檢討與目前的具體工作〉（1938年4月19日），《太岳抗日根據地》，第9頁。

下幾個層面的解讀：一是中共對黨的領導的高度重視，任何有可能影響黨的領導的苗頭，都會引起高度警惕，所謂群眾組織減弱黨的影響，不一定就是確定不移的事實，更多是一個自省意識及行動力極強的政黨的防微杜漸。二是中共政策上的靈活性和原則性的內在一致。有時候黨的暫時隱身，本身只是政策需要，當之前政策退場，黨要重新回歸時，與其為這樣的變化找一個合理的解釋，不如直接批評執行者沒有貫徹黨的意圖，這樣做既避免了解釋的困難（很多時候黨的意圖不宜過早展現），又容易達到震撼的效果，使新政策可以順利落地。三是黨和群眾組織的關係的確十分複雜，黨需要通過群眾組織掌握群眾，但是群眾組織一旦被賦予一定的獨立性，就會呈現自身的生長慣性和利益訴求，有些地方群眾團體自以為「政府是老大，我們是老二」。¹⁵這雖不一定和黨的領導發生衝突，卻難免不在黨的意旨的貫徹上產生若干滯礙，形成所謂弱化現象。

深一層看，中共對群眾組織定義的不明確，本身也是革命體制不斷摸索的產物。在黨的領導大框架下，如何建立集中而有效的組織架構，有一個實踐中左右搖擺、不斷探索的過程，鄧小平批評：

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於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隨便改變上級政府法令；不經過行政手續，隨便調動在政權中工作的幹部；有些地方沒有黨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權系統中的混亂現象。甚有把「黨權高於一切」發展成為「黨員高於一切」者，黨員可以為非作歹，黨員犯法可以寬恕。其結果怎樣呢？結果非黨幹部稱黨為「最高當局」（這是最嚴酷的諷刺，不幸竟有人聞之沾沾自喜！）……於是要錢的是共產黨，要糧的是共產黨，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產黨的法令，政府一切錯誤都是共產黨的錯誤，政府沒有威信，黨也脫離了群眾。這實在是最大的蠢笨！¹⁶

15 〈冀魯豫邊區各救總會關於政民配合的指示〉（1941年10月5日），《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上，第276頁。

16 鄧小平：〈黨與抗日民主政權〉（1941年4月15日），《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頁。

鄧小平批評的是黨包辦一切的做法。但是，在中共體系中，黨的領導需要得到保證也是實實在在的要求，下面的說法也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在選舉參議員時，應先在黨內作討論，堅決貫徹三三制；對黨外人士，應先互相約好，實行聯盟，使他們當選後也知道是我們的幫助。不要把黨的政治影響隱蔽起來，免得有些黨外人士被我們把他扶持起來了之後，他覺得自己真是在群眾內而有什麼了不起的威信，於是作威作福，有的甚至挑(調)皮。這都是應當注意的。但黨員投黨外人士的票，或我們保證投黨外人士的票時，必須經過黨的討論批准。……每個共產黨員的參議員，必須站穩黨的立場，為黨說話，擴大黨的政治影響，保證徹底實現黨的決議，服從黨團的領導，否則，必須依照黨的紀律，受嚴格的處罰。¹⁷

看來，黨究竟應如何領導，分寸把握不是容易的事。中共話語中，黨的領導本身就不應和群眾分開，西北局幹部討論劉少奇在七大做的修改黨章的報告時主張：「人民群眾有權利批評黨與黨的負責人，若批評合乎事實，黨應接(受)批評並改正，若批評不合事實，共產黨員也不能說老百姓落後，而是自己工作有缺點應加以解釋，這樣才能不脫離群眾。黨員在群眾大會上，當群眾批評黨負責人或黨的錯誤是事實，黨員以老百姓的資格亦可批評，否則使群眾感到包庇現象。」¹⁸這裏講的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群眾權利和黨的權力完全融為一體。只是這樣的想法邏輯上沒有問題，實際執行中卻不那麼簡單，黨的威信、黨的主張總是會放在優先的位置，而一旦分出先後，黨和群眾的利益一體事實上也就出現了波折。

17 黎玉：〈六年來群眾工作概括總結〉（1943年10月），《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1輯，第158-159頁。

18 〈西北局兩個小組討論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報告的記錄摘要〉（1945年5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5年，第234頁。

除群眾組織和黨及政權的關係需要磨合外，群眾組織自身定位也不明確。冀魯豫的報告批評：「認為群眾團體只是軍隊與政府的御用機關。這是一部分幹部尤其在民國29年動委會時代前後厲害的一種錯誤認識。因此，突擊屯糧、募捐、擴兵等成了主要工作任務，行政命令，威嚇壓制群眾便成了□□□□工作方式。由於他們認為自己是『便衣八路軍』或『七路』，便產生處處談政民配合，與軍政比地位，比享受待遇，甚至相互垮台。」¹⁹ 群眾組織黨化，造成幹部缺乏主動性，成為附庸，當時的報告談到了這種趨向的副作用：「不管是會議的形式及發文件、通告、宣言，都帶著幾分黨的意味，甚而大多數的群眾幹部說話都以黨的口吻講，……各級黨委對群眾組織系統獨立性及統一的領導不尊重，隨便的調動群眾團體中的幹部，把持幹部。」²⁰

無論要不要群眾組織的獨立性，「黨的群眾幹部」的定位不會改變，群眾組織應該也必須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曾經從批評國民黨的一黨政治出發，強調民主政治的意義，把群眾路線和民主政治聯結：

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於它能夠及時反映各階級各方面的意見，使我們能夠正確地細心地去考慮問題決定問題；它能夠使我們從群眾的表現中去測驗我黨的政策是否正確，是否為群眾所瞭解所擁護；它能夠使我們對事物感覺靈敏，隨時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夠使我們黨得到群眾的監督，克服黨員墮落腐化的危險，及時發現投機分子以及破壞分子而清洗出黨；它能在民主政治鬥爭中提高黨員的鬥爭能力，使黨更加接近群眾，鍛煉黨使黨成為群眾的黨。²¹

19 楊澤江：〈談談群眾團體幹部的立場問題〉（1943年1月1日），《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上，第357-359頁。

20 〈晉冀豫區委群眾工作總結報告〉（1939年3月16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群眾運動》，第140頁。

21 鄧小平：〈黨與抗日民主政權〉（1941年4月15日），《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2頁。

不過這終究沒有成為主流的聲音。更多時候，群眾組織的獨立性只是表現為黨領導下，為避免陷於官僚化，可以擁有多大的獨立決策和活動的空間，這種獨立是技術上的，而不是制度上的。問題還在於，不同的歷史情境中，由於關注重心的不同，這種制度和技術上的獨立並不那麼容易區分；隨著黨和政權控制力的不斷增強，對一些幹部來說，與其艱難地區分這種獨立性，不如乾脆取消這種獨立性，1944年中共西北局的討論，某種程度代表的就是這樣的思路。

2. 群眾組織何去何從？

抗戰時期中共根據地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前方根據地和後方根據地政策執行有較大差異，這主要是由於兩者所處環境不同所致。前方長期處於國共日偽拉鋸之中，環境惡劣，需要最大限度動員各種力量共同奮鬥，統一戰線的內涵和實踐更為寬泛。後方包括陝甘寧根據地環境穩定，黨和政權力量不斷伸展，黨的領導得到更多重視。同樣是群眾組織問題，陝甘寧和前方根據地之間存有較大差別，政策變化也主要產生於後方的陝甘寧根據地，這是中共相對可以放手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把握政策導向的地區。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44年延安發生圍繞著群眾組織何去何從的討論，涉及的關鍵問題是群眾組織應如何定位，與黨的關係如何。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一開始就明確表示：「關於群眾團體，在鄉區到底要不要？不要。在縣裏可以擺一個真正同群眾有聯繫的人。」²²持同樣看法的胡喬木進一步解釋：

22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高崗關於建立模範支部的意見〉(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第138頁。

根據地的群眾工作同非根據地群眾工作根本不同，老百姓掌權之前和掌權之後那個階段有根本不同。在群眾未掌權之先，我們是用種種方法把要造反的老百姓團結起來，工、農、青、婦按照他們的要求和適應他們的方式去團結他們。……老百姓起來掌握政權之後就起了變化了，工、青、婦團體發生恐慌，就沒有事情做了。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造反的任務已完成，現在是要建設，在我們根據地有個問題，我們建設要靠大家都參加一份，群眾團體不能成為顯著的單位。在邊區，無論什麼群眾運動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無論合作社，紡織都是如此。這種單位我們應鞏固它，做什麼都是家庭。

弱化群眾團體，強調家庭作為群眾運動的原子單位，這是對群眾組織意義認知的重要變化。之所以如此，胡喬木進一步的邏輯是：「今天民主政府已建立起來了，工農已得到領導權了，以後是工農共同建設根據地，是否按照工、農、青、婦本身各個特殊要求把他們分別組織起來呢？這按形式邏輯看很好，但事實上這不是個好方法，在根據裏（地）要單獨成立一個團體不適當。照以前那樣組織是不適當的，不適宜於根據地的情況。根據地的任務就是建設，他的中心任務就是生產、文化，還有戰爭，後方當然還有自衛軍等等工作，但主要還是生產與文化。」²³

從強調群眾團體到強調家庭，這裏面的變化邏輯胡喬木講得很明白，就是環境的不同，革命時期需要發動群眾，調動群眾的力量；建設時期需要穩定，家庭是最現成的天然穩定單位。以家庭為基礎貫徹政策，無須在黨和普通民眾之間多一個群眾團體，造成疊床架屋。實際上，群眾組織在根據地早已處境尷尬，僅從晉西北1942年精簡結果中，就可發現一些端倪：這次精簡，政府區級以上脫產人員原有10,025人，減去5,925人；學校原有1,775人，減去605人；民眾團體原有1,265人，

23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群眾、衛生等工作座談會的紀錄——胡喬木關於群眾工作與文化工作的發言〉（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第197-198頁。

減去816人；黨的機關原有2,021人，減去374人。²⁴可以看出，相比黨的機關18.5%的精簡率，民眾團體精簡比例高達64.5%，遠高於51%的平均水平，群眾團體的可有可無決定了精簡首先會向他們開刀。

對胡喬木等的看法，也不是沒有不同意見，老資格的工人運動活動家鄧發指出：「我們的黨是群眾的黨，黨員是階級的一部分，但他不就是階級，何況群眾不是一個階級呢！還有農民呢，黨不能代替一切，正因這樣，一切有〔由〕黨代替那樣不好，我們黨員還是少數，大多數還是非黨群眾，黨領導群眾，還要經過群眾組〔織〕，比如工會，你不能說有支部就不要工會了。」在鄧發看來，群眾組織不僅僅是個名義，群眾自身的權利應該得到保障，「還有領導各方面的，群眾應該經過群眾團體」。²⁵

不過，鄧發的意見明顯是少數，1944年這場討論中，多數參與者都從各方面闡述取消至少是精簡群眾組織的合理性。中共安塞縣委書記李旺淮認為，群眾組織「現在想不出具體工作。如果說群眾團體搞生產、組織變工、紮工、婦紡這許多事的話，那今天黨政領導要做的就是這些工作，並且根據我們的經驗，婦紡不一定要有組織，特別是在開始的時候，如果你搞一個組織，老百姓不瞭解她還害怕，她說你搞起一個組織，大概又要給我分配任務，增加我的負擔吧，所以她害怕。」²⁶另有人提出：「婦女、青年、工會，到底搞什麼工作？我的意見就是幫助搞黨的工作、政府工作。如果你用群眾的形式、群眾的面目搞工作，強調特殊性、獨立性，根本吃不開，你就是搞生產自給，搞教育，這些搞

24 〈晉綏北黨政軍民各組織精簡前後脫產人數及編制報告〉（1942年12月11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4卷，第44-45頁。

25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鄧發發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第169-170頁。

26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李旺淮發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第182頁。

好了，群眾工作也做了。」²⁷ 即便說保留群眾組織的也只是強調其邊緣效用：「一方面是便於收集材料研究材料，一方面是對外的關係的問題。對外號召把群眾團體取消了也不好。」²⁸

無論是討論的議題，還是討論的進程，劉少奇對這次討論都起到主導作用。劉少奇在討論會上有一個很長的講話，代表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劉少奇認為：

在我們陝北這樣的根據地裏頭，群眾運動應該採取不同的方式來進行，我想這是不成問題。我們這裏完全是新環境，政權是群眾自己的，有的地區分過土地，有的地區進行過減租減息，今天的任務就是建設，建設什麼東西呢？主要的是經濟與文化兩方面，因此在我們這個根據[地]的群眾運動，和在國民黨區域及其他地區的群眾運動，我們採取的方式是應該不同。

劉少奇不否認群眾組織存在的必要性，但認為任務應有改變，他說：「區、縣、鄉群眾組織形式是不是要？我看小學校、醫務所、合作社，有這三個就可以。」學校和醫務所，與其說是群眾組織，不如說是服務單位。當群眾組織的功能限縮到這樣的範圍時，群眾組織的意義和功能不能不受到很大影響。組織和權力通常都聯繫在一起，群眾組織的生成、發展，和革命鬥爭及爭取權利並轍而行，劉少奇之所以認為應該淡化群眾組織，關鍵在於他覺得群眾組織的任務不應再是爭取權利：「在我們根據地裏這樣的任務馬克思、列寧也沒有講過，我們老早講了一些也不對頭。我們在理論上翻，也找不出來辦法，所以我們要自己想辦法，我們想了很多年還沒有想完備。……在陝甘寧邊區分配過土地以後，減租以後，在這裏又不打仗，群眾團體的分工和他的任務是應該

27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高朗山發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第166頁。

28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楊清關於群眾團體組織問題的發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第144-145頁。

有些不同，應該有改變，他的任務就是經濟、文化。」劉少奇的思路和胡喬木大同小異：既然根據地的權力已經掌握在黨的手裏，群眾組織就不應再充當群眾利益的代表，而應該成為服務群眾的組織，成為群眾生產運動的組織者：「群眾團體要搞經濟，搞文化，還要調節人民中間的糾紛，反映下層的情況，反對官僚主義，要做這幾件事。」²⁹

這場關於群眾組織的討論，毛澤東一直沒有正面發聲。不過，1944年8月，毛澤東給時任解放日報社社長秦邦憲的一封信，實際可代表他對這場爭論的真實態度。毛澤東的信是針對《解放日報》關於家庭改造的文章而發。1944年8月9日，《解放日報》推出〈襄垣李來成的新式家庭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報道襄垣縣李來成家實行家庭改造，家庭內部民主化，選舉家長，召開家庭會議，並精細分工，努力節約，建立分紅獎勵制度。關於新式家庭的報道可視為對胡喬木等提出的以家庭為原子單位的呼應。8月25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呼籲建立根據地新式家庭，視之為「農村社會健全的細胞」。³⁰隨後，解放日報社又撰寫〈把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建立在家庭裏〉的社論草稿，送交毛澤東審核，毛澤東給秦邦憲的信，正是對這一社論草稿的回應。

毛澤東在信中一開始就明確表態：

問題的重點，恰是使家庭改造與群眾運動聯繫起來。這種群眾運動，有當地的不脫離家庭的群眾運動——變工隊及合作社，自衛軍及民兵，鄉議會，小學、識字組及秧歌隊，以及各種群眾的臨時集會；有脫離家庭、遠離農村的群眾運動——進軍隊（才有革命軍），進工廠（才有勞動力市場），進學校（才有知識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³¹

29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群眾、衛生等工作座談會的記錄——劉少奇的講話〉（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第219-220、227、220、239頁。

30 〈發揚根據地新式家庭〉，《解放日報》，1944年8月25日。

31 〈給秦邦憲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06-207頁。

如果不知道之前的爭論，大概很難理解毛澤東為什麼要強調家庭改造與群眾運動的聯繫。顯然，毛澤東不能完全同意過於強調以家庭作為社會原子細胞的這一面，因為在他看來：「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鞏固家庭』的口號，只有和上述種種革命運動聯繫起來，才是革命的口號。」儘管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也是個注重現實的革命領袖，但是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的革命目標，不能因為與現實妥協而放棄。革命要站在現實的基礎上，但並不意味著放棄理想的追求。這就是他強調的：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

毛澤東在這裏提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很長一段時間革命的基地在農村，這實際是多數國家的可能道路。即便像法、德這樣的國家，恩格斯尚且認為：「為了奪取政權，這個政黨應當首先從城市走向農村，應當成為農村中的一股力量。」³² 何況中國？不過，和恩格斯一樣，毛澤東知道農村並不是革命的目標，到農村開展革命，目標仍然是城市、是大工業、是機器，在他看來，這實際是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區別所在。這是講得很重的一句話，談論中國革命的道路，講農村革命時，千萬不可忘記毛澤東的這一句提醒。

32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10頁。

家庭這個話題，在毛澤東這裏也有著特殊的意義。毛澤東成長的五四新文化時代，家庭革命蔚為風氣，被傳統中國塑造的以幾世同堂為理想的舊家庭，由於空間和人際的過於密集，帶來尊卑、等級、虛飾和勾心鬥角種種腐敗因子，為接觸新事物的中國人難以容忍，時人說：「稍為有些新思想的人，常常感觸舊家庭的痛苦」，³³ 不是誇大其辭，而是生活在傳統大家庭中的青年人的普遍感受。毛澤東對傳統家庭中的不平等深有感觸，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西洋，一個人的父母，和他子女的意志自由是不生影響的。西洋的家庭組織，父母承認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國則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並立。……這結論是在中國家庭制度(父權母權)婚姻制度(父母代辦[辦]政策)的底下應該發生的。」³⁴ 這樣的經歷，讓毛澤東在二十來年後的信中仍然強調：「根本否定『五四』口號，根本反對走出家庭，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的。」

家庭革命的內核實際是個人自由，五四時期的家庭革命針對的是傳統中國的家長制，也就是後來中共表述的個性不得伸張的封建家庭制度。毛澤東在信的末尾特意加了一句：「有人說我們忽視或壓制個性，這是不對的。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爭取平等權利畢竟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底色，這一點，作為革命者的毛澤東絕對不會忽略。正因此，他強調：「農村家庭從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員從什麼書上或報上看了好意見而獲得，只能經過群眾運動。」³⁵ 在毛澤東看來，群眾運動不僅僅是幫助中共推動革命的助力，更是中共革命的內在要求，群眾運動是群眾行使權力並實現自己權利的必由之路。顯然，毛澤東對以家庭作為新社會的原子單位投了反對票，他要求群眾走出家庭，還看到了未來社會走出鄉村的需

33 張厚載：〈獨立生活〉，《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第663頁。

34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20頁。

35 〈給秦邦憲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07-208頁。

要，在毛澤東這裏，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既是革命實踐的需要，也是革命實踐的目標。這一點，可謂理解中共群眾路線的關鍵。

儘管毛澤東在給秦邦憲的信中強烈表達了對群眾運動的支持和群眾組織的維護，對五四家庭革命要求及個性解放的堅持，和胡喬木等的態度拉開距離，但是，又不能說胡喬木等提出的家庭原子論就是自作主張。在中共的群眾組織功能認知體系下，當黨已經掌握根據地實際權力時，群眾組織的功用如何發揮，的確是個不能不面對的問題。1944年7月，毛澤東致電幾大根據地，詢問十項問題，其中包括：「對於將民眾團體的工作在減租減息後轉到領導各界人民發展生產、文化、衛生方面，你們意見如何？據你們看，是否只在作了這種轉變後，民眾團體（各救）的工作人員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這種轉變？」³⁶從毛澤東的問詢邏輯看，他對群眾組織此時應有的功能和劉少奇等的思路是相通的，同樣贊成群眾組織完成鬥爭功能後，將重心轉向生產和服務。只是他終究不能同意僅僅把群眾組織當作革命技術的一部分，在他看來，群眾組織是落實群眾路線不可或缺的環節，群眾路線既有深入群眾的一面，也有發揮群眾自覺性的一面，任何一面被忽略，另一面難免有落空的風險。只是這樣的原則如何落實，毛澤東也沒有完整的預案，也在摸索之中。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事後的敘述中通常都環環相扣，現實的革命道路卻並不那麼容易把控，常常會在理念和策略間張力盡顯。這也正是中共革命系統彈性之所在。

3. 扁平導向的政治文化

實際上，無論毛澤東還是劉少奇、高崗、胡喬木，對於群眾路線的態度並無實質區別。如果說有區別，只在於群眾路線的貫徹是否需要組

36 〈請各地調查和答覆十項問題〉（1944年7月28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99頁。

織的介入。也就是說，當群眾組織幫助完成發展和鞏固根據地的任務後，是否還需要作為政治性的組織存在。劉少奇等人更純粹地把群眾路線視為一種政治文化，應該倡導、堅持，但不一定需要依託組織存在；而毛澤東則保留了群眾路線依託政治組織存在的可能性。這一點點區別，抗戰時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很難想到的是，日後的歷史發展中，因緣際會，卻可能激起軒然大波，這是後話。

群眾路線的提出，有著深遠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淵源。從蘇俄革命開始，革命就不僅僅限於政治領域，更是思想文化的全面翻覆。1929年9月，中共中央致紅軍第四軍前委指示信，首次提到「群眾路線」，要求紅軍工作「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幹」。³⁷ 抗戰中中共的論述是：「要教育群眾、啟發群眾的智慧，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這與依靠群眾並不矛盾，但兩者又不能混淆，要讓群眾知道我們的任務，我們才能和群眾一道工作。」³⁸ 也就是說，中共不應該只是自上而下的統治者，而應該領導群眾爭取權利，成為民眾利益的代表，一旦可以代表民眾，群眾權利和組織權力也就自然打通。正因此，抗戰時期中共既建立了直接下探到基層的垂直權力運作體系，又涵育了一套扁平型的政治文化。

扁平化是一個社會科學概念，起初主要應用於企業管理領域，出現的背景在於：「支撐科層制的經濟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導致其有效性的基礎不斷流失，扁平化作為突破科層制的結構模式，在企業管理領域取得廣泛成功。」³⁹ 對於企業扁平化組織的核心原則，有研究者概括為：「圍繞交叉職能核心流程而不是圍繞任務或者職能進行組織」；「使團隊而不是個體成為組織設計和實施的基石」；「與客戶和供應商融為一體」；「建立一種開放、合作、協調的企業文化，一種既聚焦持續性發展

37 〈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周恩來選集》上，第39頁。

38 《高魯日記》，1943年5月7日，第417頁。

39 沈廣和：《扁平化：當代中國政府過度分化的有效整合》，南京農業大學2011年博士論文，第13頁。

又重視對員工的授權、責任感和生活的企業文化」。⁴⁰ 團隊、溝通、教育、合作取代自上而下的控制，成為扁平化結構的核心概念。由於美國學者安東尼·唐斯、蓋伊·彼得斯及澳大利亞學者歐文·休斯等的努力，扁平化理念也應用於公共管理及官僚制度的考察。

有趣的是，抗戰期間中共的政治構造中，可以看到和這個後來出現的概念相似的理念，只是抗戰時期中共對扁平化結構的運用，更多體現於和組織相輔助的政治文化當中。關於中共扁平型政治文化的建立，既有研究闡述較少，學者祝靈君較早注意到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共領導人在革命戰爭年代大都在某種程度上反對黨組織中的官僚制，希望軍隊和政黨組織扁平化，這樣可以使政黨對社會事務快速反應，另一方面也與中共所追求的平等精神保持一致。」⁴¹ 引進扁平化概念觀察中共政治的特徵，很具啟發意義。

扁平化和抗戰時期中共倡導的群眾路線若相契合。1943年，毛澤東集中闡述群眾路線，做出規定性的概括：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⁴²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提法，很清楚地顯示了毛澤東對群眾路線的定位，群眾路線體現著黨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和政治情感，概括而言，

40 弗蘭克·奧斯特羅夫著，陶宇辰譯：《水平組織》，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頁。

41 祝靈君：《一致與衝突——政黨與群眾關係的再思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頁。

42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7-900頁。

即劉少奇所闡明的：「一切為了人民群众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众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众學習的觀點，這一切，就是我們的群眾觀點。」⁴³ 後來扁平化理念倡導的團隊、合作、教育、情感溝通都可在群眾路線中找到脈絡。群眾路線要求打破幹部和群眾間的界限，減少溝通的層級，讓幹部和群眾間形成同心圓而不是階梯式的關係，這都和扁平化理念接近，團隊、集體更是共產主義運動天然的理念，也是群眾路線的基石。

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是抗戰時期中共政治文化的關鍵。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提出的頗能代表中共政治文化的三大作風為例，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緊密聯繫群眾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都源於群眾路線的認知基礎。群眾路線的落實，最重要的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眼睛向下看，與群眾打成一片。不關心他們就不能代表他們。」⁴⁴ 抗戰時期的權力下探解決了控制力的問題，卻帶來了官僚主義的擔心。黃敬有一段話，講到絕對權力潛藏的問題：

人家不敢說，怕你的權利，怕關、怕罰、怕槍斃，大家都笑臉相迎，等到笑臉變為憤怒時，那就是暴動了。不要□□□案，要自我批評。有權在手，聽見人家的批評就難得很。所以越有權越要謙虛，謙虛正是使人家心悅誠服，鞏固你的優勢。在執政情況下，群眾未看到政權是他的，有不滿是不敢說的，但他到批評時就是對我的武裝批評，只要是帶群眾性的暴動就是對我政府的批評。而我的優點好表現，缺點就隱蔽，助長了我們對官僚主義作風的自信心，因而目中無人，不注意群眾的呼聲，驕傲自大，命令萬能，單純行政方法，全□了生殺予奪大權。宣傳鼓動等等都不要了。⁴⁵

43 劉少奇：〈論黨〉，《劉少奇選集》上，第354頁。

44 《高魯日記》，1943年5月7日，第417頁。

45 黃敬：〈總結報告〉（1944年1月13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242頁。

群眾路線政治文化的樹立，輔之以政治化的群眾運動，就是面對著這樣的問題，打破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努力塑造破除等級的同志式情感，保持和群眾的水平關係：「每個黨員對待群眾的態度，不是站在群眾之上，而是站在群眾之中。」⁴⁶

站在群眾之中，注意發揮群眾的自覺性，聽起來比較空泛，蔡邁輪⁴⁷日記的一則材料或可加深人們的理解。這則材料雖出自1949年，仍可顯示中共很長一段時間內做事的思路：「昨晚俘虜沒人看管，想了一個怪辦法：把他們十人編為一個班，自選正副班長，自己管自己，和大家一樣生活走路。結果，一個也沒跑，情緒也好得多了。」⁴⁸蔡邁輪說這是怪辦法，屬於非常之舉，但這樣的怪辦法基本不可能出自國民黨人，他們大概率會採用容易想到的捆綁手段，怪辦法出自中共，還是有背後的政治文化的潛因。

應該指出的是，戰時根據地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和水平式的群眾路線的政治文化，看似兩個路向，其實相輔相成。正是有了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有了深入到民眾之中的幹部體系，群眾路線的推進才有了更為有力的載體。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固然有可能造成等級森嚴的控制體系，卻也可能形成政治權力水平擴展的基礎，在基層尤其如此。當中共強調群眾路線時，通過權力下探形成的龐大基層幹部體系，迅速擔負起構建同心圓的責任，這或許是權力下探時並未預想到的另一重功能，卻是群眾路線能夠落實的最重要的人力條件。群眾路線需要巨量的人力投入，權力下探正準備了這樣的人力。在這裏，組織權力又幫助了群眾權利的釋放。如果注意到中共的運作系統通常都環環相扣，這樣的預料之外或也在情理之中，這是系統運作「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又一實例。

46 任弼時：〈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1943年6月），《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頁。

47 蔡邁輪（1915-1983），河南陝縣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任中共第一任陝縣縣委書記。

48 《蔡邁輪日記》，1949年1月6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頁。

群眾路線，水平融合，落實的關鍵在幹部。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的幹部考核和評價體系，促進民眾和幹部的結合。模範幹部的標準是：「能完成任務，不行政命令；真正與群眾打成一片，事事領頭幹；不貪污，不浪費，不流氓習氣與浪漫習氣。」這一標準不是擺設，而是落實到具體的數據當中：「村幹部有100個群眾真正擁護，縣幹部有1000個群眾真正擁護。」⁴⁹ 這個標準既體現中共數字化管理的要求，也符合幹部要得到群眾授權的思路。劉少奇有個想法：「派幹部作縣長，先不派縣府，而派去做群眾工作。在群眾中工作做好了，有了信仰，由群眾選他出來當縣長，那就成為和群眾有密切聯繫的領袖。」⁵⁰

按照共產主義運動的定位，共產黨是先鋒隊的組織，負有領導和教育群眾的責任，先鋒隊和群眾路線其實不無內在衝突。一旦站到領導和教育者的地位而不加自省，黨和群眾的水平關係很可能岌岌可危，群眾路線將成無源之水。共產黨人設想的破解這一難題的辦法是：教育和領導群眾不在群眾之外，而在群眾之中。教育和領導群眾之前，首先是向群眾學習。1926年，斯大林就有論述：「黨應該仔細諦聽群眾的意見；它應該極力注意群眾的革命本能，它應該研究群眾鬥爭的實際；根據這種實際來檢查自己政策的正確性。因此，黨不僅應該教育群眾，而且應該從群眾那裏學習。」⁵¹ 對中國共產黨發生重大影響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說得更清楚：「工人階級黨不與群眾發生廣泛的聯繫，不經常鞏固這種聯繫，不善於傾聽群眾的呼聲和瞭解他們的迫切需要，沒有不僅教導群眾，而且向群眾學習的決心，那它就不能成為真正群眾的黨。」⁵² 中共後來的論述中，進一步把這種領導和學習描繪為一個循環

49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第二次民運幹部會議記錄摘要〉(1940年4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178頁。

50 〈劉少奇同志關於群眾運動及其他問題的報告〉(1942年12月9日-10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8卷，第185頁。

51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的問題〉，《斯大林選集》第2卷，東北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34-35頁。

52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480頁。

往復的系統，以始終不斷的動態循環，保持活躍的信息交流和反饋，消解先鋒隊和群眾間的張力。

中共的上述努力，的確在理論上解決了群眾和黨之間潛在的不對等關係。不過，實際運作中，先鋒隊和群眾之間，組織權力和群眾權利之間，固然有雙向奔赴的時刻，但更多時候，兩者畢竟還是存在落差，這是群眾路線實施始終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從過往的歷史看，精緻的理想讓人心動，然而越是精緻的理想，落實的困難也越大，幹群關係、軍民關係如果一馬平川，群眾路線實施也就太過輕而易舉。李卓然在調查中發現：

張日福，一個63歲的老農，土地革命後到現在一共被綁了5次。第一次因兒子開會不到被綁，第二次因兒子躲避兵役跑到宜川被綁，第三次因與農民會長吵嘴被綁，第四次與部隊吵嘴被綁，最近一次因運鹽路費少出5元，被區上綁了一天，結果罰了50元。

我們和區鄉的幹部談過這個問題，他們說不綁不行。我們提出施政綱領來和他們討論，支部書記說照施政綱領來什麼也辦不通。⁵³

王林日記也講到：石友三的軍隊拿病騾子強換老百姓的好馬，還要老百姓給軍隊錢，換完沒幾天，馬死了，軍隊又找上門要回換的騾子，「此事嚷動全村，所有老幼皆議論紛紛，最後最普遍的結論是：『上哪裏說理去呀，他又不是八路！』……百姓談話常有這口頭語：『八路軍也有壞的，國軍也有好的。』」⁵⁴ 這一段特別具有生活的氣息，石友三軍隊強換騾子招致的議論以及村民自然而然將之與八路軍對比，都體現了當年軍民關係的實態，而「八路軍也有壞的，國軍也有好的」和另外材料說到的，民眾「覺得並且常常說出來：『八路軍好一點』」，⁵⁵ 其中的褒貶大體也是當時真實狀況的體現。

53 李卓然：〈固臨調查〉，《李卓然文集》上，第138頁。

54 王林：《抗戰日記》，1939年11月14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45頁。

55 黎玉：〈在第三區委民運幹部會議上關於膠東民運工作討論的總結〉（1940年1月8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4輯，第111頁。

中共對民眾帶有限制條件的褒揚或許不能完全滿意，黃敬就批評一些人和國民黨比，滿足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強調：「絕不能以比專員好一些為滿足，忘了自己是幹什麼的。」⁵⁶不過，從另一面說，當年的歷史運動中，「好一點」透出的選擇對歷史進程可能產生的影響確也不可小覷。戰爭時期，很多事無法盡善盡美，高魯記載一個管理部隊後勤的司務長的故事：

他和管理員押運十幾大袋小米由白文到寨上，黃昏牛車回去了，這時他沒動員著牲口，第二天隊伍就要出發了，他可著急壞了，對管理員說：「糧食怎麼搞得動，大車昨天放回去了，今天牲口也搞不出。」……不一會從上面下來一輛大車，管理員就大聲叫：「喂，老鄉，喂老鄉。」老鄉一聽就知道不對，趕快走，他就跑過去把大車硬拉來才算了事。

對這種違反紀律的行為，高魯追問：「到戰鬥時是不餓肚子要緊還是不犯紀律要緊呢？」⁵⁷這本身就是共產黨人才會有的追問。當年民眾對政治力量未必有十全十美的期望，長期缺乏民權意識、一直被漠視的普通民眾，權利意識薄弱，更無法理解民主的真實含義，傳統中國塑造的青天形象是他們現實的追求。政治力量能夠體恤民情，已足以讓他們印象深刻。劉榮寫道：「下午推碾子。老鄉說：『從前當官的人都見不到，現在你們八路軍當官的又說又笑，還推碾子拉磨，真是少見呀。』」⁵⁸一個向來缺乏平等和公正基礎的社會，群眾路線帶來的觀感上更為平等的幹群關係，就足以讓民眾感動，這是已經擁有權利意識的後人難以想像的。

56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水東工作討論記錄〉（1942年12月27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357頁。

57 《高魯日記》，1942年3月29日，第208-209頁。

58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9月14日，第208頁。

當然，隨著獲得權力的增長，根據地群眾的權利意識也在不斷提升。幹部們抱怨：「現在的社會不同了，要在過去國民黨下面，要什麼老百姓還敢說個『不』字？現在就不行，下農村說得不對，老百姓還敢罵人。」⁵⁹ 中共用權力下探強化了管控力，又用群眾路線保持政權和民眾間的權力博弈，一旦權力博弈開始，進進退退就成常態，權利意識滋長帶來的講價錢、搭便車、佔便宜等問題，讓基層工作者面臨更多的困難。有人會利用政治力量釋放的空間鑽空子：「我們開始下去花了十幾萬幫助老百姓開荒、買工具、買豬雞等東西，但以後有人提出過份的要求，比如有一個商人他生活還不錯，他要我們幫助他開荒，他好坐享福利。」滿懷善意接近群眾或許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為了和老百姓關係搞好，就拜乾媽乾姐。結果把關係弄亂了，長輩搞成晚輩。同時拜乾媽其他老百姓吃醋。搞好了一個，搞壞了十個，不能普遍的把關係搞好。」⁶⁰

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群眾路線時，盲目的群眾崇拜傾向也有滋長。畫家吳聯膺剛到中共根據地時，就遇到一件事：

在一家大門後篷子下避雨，正在沒好氣，發著牢騷，可那家老太婆卻又叫人生奇怪的氣，她干涉著，說著影射的冷話，意思是叫人家走，不要在她那停留，……鄭營長，夢雷等四五個都同她爭辯，「淹了大水，你這一塊小地方也幹不了！」……一個剛整了風來的女同志卻說：群眾是我們的母親，她們說每句話，我們都該靜聽——這些大道理當然懂，但是不是該看場合呢？自私到可笑可氣不是該「鬥爭」一下麼？⁶¹

59 李卓然：〈固臨調查〉，《李卓然文集》上，第150頁。

60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群眾、衛生等工作座談會的記錄〉（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第195-196頁。

61 吳聯膺：《烏扎拉日記六十年》，1945年7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52頁。

吳聯膺此時剛到根據地，還沒有掌握經過整風的幹部的話語，所以會本能地抵抗。當熟悉了根據地的話語後，他又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問題，從之後的歷史看，可能更多是向群眾妥協。事實上，後來的群眾運動，就可以看到這種群眾崇拜邏輯的不斷放大。無論是官僚主義的無視群眾，還是群眾運動的群眾崇拜，群眾其實都是被動的存在，都缺乏制度化的定位，這或許是群眾路線作為一種政治文化難以真正觸碰的關竅。

總的看，戰時中共在根據地既完成了空前嚴密的垂直權力體系，又構建了群眾路線的政治文化。如果說垂直下探的權力體系代表硬的組織一面，群眾路線則代表軟的文化一面。黨垂直的超然領導和水平的情感互動，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抗戰時期的群眾路線既出自共產黨人立足群眾原則，也是整個的黨賴以生存的利益要求，起碼在敵後根據地，後來存有張力的群眾路線到底是深入群眾還是鼓勵群眾自覺，尚不會成為問題。應該說，由於統一戰線的範導及嚴峻的生存要求，抗戰時期的群眾路線貫徹可謂順利，成為中共政治的一個神來之筆，也因此沉澱為中共革命的重要政治和歷史資源之一。日本人承認：「對於在民眾裏長下深根，且能巧妙掌握民心之共產黨軍，想把他和一般民眾分離判別，實是困難事情。」⁶²這可以說是對扁平化群眾路線實際成效的解讀。當然，由於在黨的領導和發揮群眾自覺性間把握綦難，群眾路線的理解和執行也不是沒有難題，理論闡述和實際運作不完全是一碼事，悖論及對悖論的克服，恐怕會伴隨群眾路線之始終。

62 〈敵人對付我軍的戰術指示〉，《情報彙刊》第2期，太行軍區司令部1945年4月版，第42頁。

六、政策落實

中共的政治系統，不僅要建立上下通聯的管理體系，還要打造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落實機制，兩者相輔相成。關於中共政策落實機制的成效，對手方的體認至為深切。1949年初，失敗陰影下的蔣介石檢討發現，中共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為理論和實踐打成一片：「政策確立之後，有戰略指導，有戰術上工作之分配，每一幹部思想上搞通，始可自覺的去做。此所謂思想上搞通即為政治教育。共黨之結合黨員，吸引青年，控制群眾，幾乎全恃其政策及戰略戰術，而戰略戰術實為青年興趣與熱情之所寄。」蔣進一步把中共踐行層面的特點歸結為七條：

一、組織嚴密；二、紀律嚴厲；三、精神緊張；四、爭鬥徹底；五、軍政公開方式：甲、檢討；乙、研究；丙、批評；丁、學習；戊、坦白；己、計察；庚、偵探。六、辦事方法：甲、調查；乙、立案；丙、報告；丁、審查；戊、批准；己、執行；庚、工作檢討。七、組織內容：甲、幹部領導；乙、由下而上；丙、縱橫聯繫；丁、互相監督(節制)；戊、監查徹底(情報)；己、審判(迅速)(紀律執行)；庚、主義第一(革命利益與思想錯誤為定罪標準)。¹

1 蔣介石日記，1949年春節課程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和中共往復爭鬥二十餘年，蔣介石臨失敗時的總結可謂窺到了要害，中共是一個有主義、有理想的政黨，同時還是一個具有高度執行力和貫徹力的政黨，將理念和執行、戰略和戰術、軍事和政治、中央和地方等等因素融為一體。單純看中共革命系統中的任何一點，都未必驚人，一當形成整體，卻能發揮「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效能。應該說，到抗戰時期，中共仍然是一個年輕的政黨，不僅建黨時間短，黨員也普遍年輕；李雪峰記載，1939年，晉冀豫區第一次黨代會129名代表，基本狀況是：

大部分代表是在創建根據地後入黨的。從文化程度看，中小學程度21名，中學以上程度56名，大學3名，其餘49名為文盲或初小以下文化程度。從職業上看，73名是脫產幹部，53名為不脫產黨員。從年齡看，20歲以下的19名，21至25歲的68名，26至30歲的16名，31至40歲的16名，40歲以上的僅有3名，絕大多數是青年人。²

這麼一個普遍年輕、經驗有限的政黨，卻能條理分明，運行自如，擁有順暢的貫徹機制，其中的奧妙值得深究。

1. 支部：通向基層

如前所說，整風強化黨的思想威信，造就自覺服從黨的透明人。透明人不僅接通思想，也讓組織可以無障礙落地。李雪峰曾經論述：「黨不但有思想威信，還要有權力威信，也即有組織的物質基礎。小資產階級同情分子可承認思想威信而不肯承認權力威信，這是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爭論之基本分歧點。」³這裏講的權力，實際就是組織力。也

2 《李雪峰回憶錄》上(太行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頁。

3 《太行區黨委黨校第二期整風的思想與思想領導的總結》(1944年1月)，《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1943-1945)，第682頁。

就是說，中共要求自己的黨員既要在思想上服膺黨，又要在組織上聽從黨。抗戰時期，中共一方面迅速實現黨組織的生根落地、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努力鞏固黨的組織，強化黨的控制，保持黨組織在運作系統中的樞紐作用。

系統思維下，中共革命的各個環節相互聯繫：「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鬥爭要互相結合，同時並用，以一種力量為主，以其他力量配合，靈活運用，按照情況變動。」⁴ 這樣的思維，可從晉察冀的工作反省中窺察到：

成為我們工作的中心環的開展民主運動，全民動員，鞏固村政權，鞏固人民武裝，開展社會教育，提高民眾政治文化水準，肅清漢奸賣國分子，制裁壞紳壞人，這些工作都沒有到達應有的收穫，與這一中心環緊緊地套起來的第二環是：生產建設（農業生產、合作事業、手工業等），貨幣金融財政稅收，貿易與糧食布匹這一複雜的聯繫，這些工作我們也沒有全面的到達必要的收穫。與第二環緊緊套起來的第三環是：合理負擔、減租減息、優待抗屬、救濟災難；解決停滯的勞力與浪費的勞力，這些我們一般做得更差。⁵

上面這段引文，雖然是對工作的自我批評，卻顯示了中共把工作的各個環節相互聯繫、層層遞進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貫穿各個方面，組織建設也不例外：「組織建設是黨的整個工作的一部分，它必須與黨的整個工作相聯結，才能夠有真正的建設。建黨不是技術工作，如果建黨脫離了黨的整個工作，而孤立起來去進行建設，那就要把它降低到技術工作的地位，就談不到經常與系統，也就沒有真正的建設。」⁶ 這種系

4 〈對敵鬥爭與練兵運動〉（1944年12月17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7卷，第391頁。

5 〈邊區政權工作檢討總結〉（1939年7月17日），《新長城》第2期，1939年8月31日，第5頁。

6 子榮：〈論組織建設〉（1940年8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518頁。

統化的方法不斷發酵，1949年推向全國後，一度讓剛剛接觸中共的人不太適應，潘光旦寫道：「同學代表提『社會之家』之組織系統，頗覺小題大做，亦近頃風氣之一種，學習組織方法，提高組織能力，是極好事，但紙上之級層名目，紅黑線條，繽紛滿目，與全系同學不足五十人相較，總若不稱。」⁷ 姑不論潘光旦的觀感是否準確，系統方法的推廣程度卻可見一斑。

和權力下探一樣，中共組織力伸展的特點也是向下植根，組織向下滲透看起來只是組織層級的伸展，背後卻是巨大的人力動員。組織的金字塔結構決定其向下延伸一層，會使覆蓋面巨量增長，相應地也會極大加重運行體系的負擔，對組織效能提出更大挑戰。例如，根據地建立初期，為在各地迅速扎下腳跟，經歷了一個大發展階段。突擊發展不可避免帶來許多問題，中共報告寫道：

我們到葉縣去巡視工作，縣委就介紹我們到一個五十多人最好的區委去，區委會不但從未開過，而且區委書記也不知道誰是區委委員。下面雖有五十多個同志，但連一個支部也沒有建立，於是區委書記就親自去召集了三十多個同志來開一個大會，區委書記做主席，說：「各同志，你們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今天老實對你說，我們就是幹共產黨的啦！你們贊成不贊成？」一致的回答說：「你是不會錯的，我們大家跟著你一塊幹好了。」⁸

1939年突擊發展黨員，內黃出現罰入黨的荒唐事：「支部開會，群眾偷聽，被捉住提出罰打一百棍，或罰你入黨，叫群眾選一。」甚至販賣入黨志願書，「賣多者一百元少者四十元」。⁹ 這樣的環境下，黨員的入黨動機也是五花八門：

7 《潘光旦日記》，1949年10月13日，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頁。

8 〈張唯尊關於豫中地委工作報告〉（1940年5月），《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315頁。

9 〈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略〉（1944年），《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74頁。

1940年5月，柳葉村富農牛明堂是迫於牛愛堂的情面入黨的，當時他只一念之別，那時他姑舅舅勸他入突擊團，他覺得「什也一樣，反正是受訓」，是被牛照堂拉夫進來的。……

1940年12月，西坪人、家花園溝的破產中農敗家子白買郎是被強迫開會被宣佈為共產黨的，當時本人心裏異常害怕：「怕加入了以後吼去當兵，以為牛照堂要捉人當兵咧！」¹⁰

中共組織下探初期，知識分子起了關鍵作用。西北局的調查顯示：「農村支部建立的人，根據十四個支部的統計，其中由小學教師（大半都是高小班業的）建立的有五個支部，佔百分之三十六；由高小畢業學生建立的有三個支部，佔百分之二十二；由小學教師與高小畢業學生共同建立的有三個支部，佔百分之二十二；由旅外學生建立的有一個支部，佔百分之七點五；由僱農及貧農建立的有二個支部，佔百分之十五（這二個農民仍是由知識分子發展的）。這就是說農村支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由農村知識分子建立起來的，其中絕大多是高小畢業學生。」知識分子發展的黨員一般步驟比較嚴密：「a. 交朋友；b. 談農民本身痛苦的生活；c. 談邊區、談蘇聯，指出農民出路；d. 談共產黨好，並指出加入共產黨才有辦法；e. 最後告訴他找到共產黨的關係，並介紹他入黨。」相比之下，農民黨員發展入黨對象則多用感情拉攏，「很少經過政治宣傳教育，有些農民黨員甚至像『支應衙門差役』一樣，上面指定一定時間要發展幾個黨員，他就隨便拉幾個他所『親近』的人來以『完成計劃』」。¹¹

要真正讓組織在基層扎下腳跟，支部作為最基礎的組織原子，責無旁貸。支部「是鄉村政權機關的領導者，地方武裝（如自衛軍）的領導者，民眾團體的領導者。黨、政、軍、民、學的工作都是支部所必須管

10 《「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第593頁。

11 〈西北農村保甲機構及黨的支部工作問題〉（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2年，第316-318頁。

理的工作。」¹² 形象的說法：「支部是黨組織的基礎，是具體執行黨的政策者，像人的腳一樣，腳板連結著人體的各種器官，腳走動了，人就活起來了。」¹³ 完善支部建設一直是中共嚴密組織的重心。冀魯豫區黨委的報告談道：「現在組織生活是比較嚴格的，5天一次小組會，在小組會上向支部幹部彙報，黨員3天向小組長彙報一次。……由支部幹部講課（內容是支部工作，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小組的同志經常互助幫助，識字（幫助）不識字的。」¹⁴ 支部工作多要通過開會落實，開會成為家常便飯，「支幹平均一月至少有半月開會，多至每日在開會」，以致造成「某些同志的『開會愁』」。¹⁵

當然，這一套制度設計不可能完全落實，「黨員數月不開會，無小組生活」¹⁶ 的現象不是個案。李卓然記下和一個支部宣傳委員的談話，大致可以見出支部幹部的水準：

日本打在哪兒了？不知道。施政綱領聽見過嗎？沒有。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沒田沒地的工人。共產黨鬧革命鬧到底，共同受苦，共同享福。鬧革命不是為死，是為活，叫我參加八路軍，不行，太老了（才32歲）；叫我離開家，也不能，走了娃娃大小都要吃飯，怎辦？今年邊區實行三三制，這是孫中山先生叫作的。「三三制」就是共產黨佔一個「制」，國民黨佔一個「制」，還有是什麼佔一個「制」，人家說的都忘了。共產黨領袖從前聽說是毛主席，現在不知換了誰，我想還是毛主席。¹⁷

12 陳雲：〈黨的支部〉，《陳雲文選》（1926—1949），第86頁。

13 〈黨支部工作總結——1945年1月在縣區幹部會上的報告〉，《鄒屏工作筆記》，中共淮安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1993年版，第63頁。

14 〈冀魯豫區黨委的工作總結〉（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144頁。

15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組織工作報告〉（1941年8月1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4卷，第561頁。

16 〈黨支部工作總結——1945年1月在縣區幹部會上的報告〉，《鄒屏工作筆記》，第56頁。

17 李卓然：〈固臨調查〉，《李卓然文集》上，第154頁。

張聞天在神府的調查發現：「所有小組，均不能自動開會，必須支部書記親身去，或專門委託該村支部委員召集才開……在小組會上，照例『上面』的參加人報告，並主持會議，大家聽聽表示同意（或者根本不聽），就算完事，很少能展開討論的！關於本村的事情，往往對黨員有興趣，願意多談，參加人卻不喜歡聽，參加人所談的『政治』，黨員往往又不喜歡聽，或者『解不下』，或者『記不清』！」¹⁸還有特別惡劣的支部，山東文登縣第六區的席子成村，「300多戶幾全都走私，黨員57人，成了走私的領導者，組織走私大隊，下分三班，村長（黨員）任走私大隊長，只有一個較好黨員把他們的罪惡事實透露給我們，他們要在半路上把這同志打死。……許多黨員為了走私，為了搞女人要求退黨。」¹⁹

評判一個政治力量的控制力，應將之置於一定的時間和環境之中與前後左右相互比較。比如說中共支部及其幹部，儘管多有不健全之處，但起碼都在運作，試想一下，和政治組織長期隔膜的鄉村，出現這樣一個經過訓練和挑選、有垂直指導的政治力量，對鄉村既有秩序和結構有可能形成多大衝擊。即便按照悲觀的估計，支部數月才開一次會，這個組織在中國鄉村也是空前的，何況還集聚了鄉村中最具活動能力的一批人。這一點，早在黃埔軍校時期，蔣介石談到蘇共時就意識到：「普通社會裏一般的人，既無統屬，又無團結，好像散沙一般，……所以一遇到他有組織有統屬的黨員，就在不知不覺之中都受了他們的感化。」²⁰正因此，支部組織成立後，立即成為鄉村一股大勢力，有人入黨是「為了私人『報仇』，找黨做『幫手』」，²¹甚至有人「把黨認為是『幫口』，在了

18 〈陝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鄉八個自然村的調查〉（1942年4月12日），《張聞天晉陝調查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頁。

19 〈文登第六區工作情況〉（1942年），山東省檔案館G031-01-0029-005。

20 〈校長第十四次訓詞〉，《黃埔叢書·精神教育》，黃埔陸軍軍官學校1925年版，第86頁。

21 〈西北農村保甲機構及黨的支部工作問題〉（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2年，第319頁。

可以仗勢欺人」。²² 中共控制嚴密地區，支部一言九鼎，完成徵收任務時，「支部決定誰出多少，舉拳頭表決，甚至通知一下就完事」，²³ 以致中共擔心：「村支委若壞，封鎖上級甚容易，村黨員政治弱，民主權利運用不多，怕惹是非的心太大。如村中有違法行為，村支委若再一佈置蒙上級，上級即使下小組研究，也不易研究出，很多大問題，都是非正規地反映上去的。」²⁴

為了強化組織，中共還會不斷給出辦法和要求，既要讓支部「特別注意掌握村政權，只有掌握與堅強地領導著村政權從公開方面推動與配合各方面的工作，才能掌握一村全局」，²⁵ 還要讓支部成員成為鄉村社會網絡的聯結者：「黨的支部，必須具體規定每一個黨員團結三個到五個、三家或五家黨外的積極分子。」²⁶ 至於怎樣具體實現領導，也有規定的辦法：

對群眾團體的領導。由群眾團體直屬系統佈置工作後，支部再佈置給群眾團體的黨員幹部，叫他起黨的保證作用，完成工作任務。

對政權的領導。村長是統戰委員，在支部幹部（會上）佈置工作後再到村委員會討論佈置工作，決議具體分工執行。

對武裝的領導。自衛隊長是黨內的支部的武裝幹事，在支部佈置工作後，自己再去執行。²⁷

22 〈武鄉實驗縣首次活動分子動員大會總結〉（1940年4月25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265頁。

23 〈武鄉黨的簡史〉，《太行黨史料輯存》第2編，第13頁。

24 王林：《抗戰日記》，1944年5月5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69頁。

25 〈整黨與建黨是目前的嚴重任務〉（1940年4月15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193頁。

26 〈彭德懷在太行區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42年12月18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5卷，第958頁。

27 〈冀魯豫區黨委的工作總結〉（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145頁。

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武裝的領導。根據地鄉村普遍建立民兵自衛組織，自衛隊長是支部的當然成員，許多支部書記直接兼自衛隊長：「支幹過去有十三個、九個、七個的不統一，去年高幹會以後五個七個都有，組織、宣傳、自衛軍連長，主要起作用的還是支書、鄉長和連長，……小核心會就是這三個人比較便當。」²⁸ 黨經由支部領導政權、掌握武裝、引導群眾，成為鄉村從未有過的超級權力來源。

理論上，基層黨的支部書記不應該是鄉村的直接領導者，但實際操作中，經常可以看到支書一把抓，既管黨務，又管行政。李卓然的《固臨調查》跟蹤了一個支書28天的工作，得出結論：「支書作的全是鄉政府工作，沒有支部本身的工作。」鄉級幹部會議上，「檢查羊稅、公債、借糧，佈置借鹽工作，會議是支書主持，鄉長只負責算賬，及分配數目字，會議上鄉長沒有講話」。²⁹ 這裏的鄉長更像是支書的助手。不過，如果鄉長能力強，相反的案例也不鮮見：「鄉支部委員會的工作，一方面同鄉政府委員會的工作無甚區別，它主要的也是做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在組織上也同鄉政府委員會混淆不清。更因為鄉長能力比支書要強些，所以支部書記實際上不過是鄉長以下的助手。名曰副鄉長，實在『名副其實』」。³⁰ 由於中共這套體系還有對上負責的要求，不管是支書還是鄉長負責，實際都是黨的權力結構延伸的具體承擔者。基層黨政體制模糊化的雙首長模式，在兩者間可能帶來合作，也可能形成競爭；即便是競爭，有能力者脫穎而出，也未必不是可以期待的結果。

除了從組織上強化黨的領導權外，中共還在不斷探索加強基層組織的辦法，改進組織結構，比如初期行政村設立幾個支部，實踐中發現：「一個行政村，只能有一個支部，以便於統一領導政權、群眾團體。現在有些地方，一個村有兩個支部，由於村的大小、土籍客籍等等之分，

28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高峰的發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第158頁。

29 李卓然：〈固臨調查〉，《李卓然文集》上，第165-166頁。

30 〈陝甘寧邊區神府縣直屬鄉八個自然村的調查〉（1942年4月12日），《張聞天晉陝調查文集》，第88頁。

往往形成支部間的對立，這是不好的。」³¹這是從實踐中獲取經驗教訓。同時，更重視推廣成功經驗，以模範影響全體。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

責成每個分區搞一個模範支部，看他去年給老百姓作了什麼事，今年給老百姓做了什麼事，上月給老百姓做了什麼事，這個月又給老百姓做了什麼事，共做了幾件事。……從實踐中創造出模範支部後，其他的支部就都向他看齊，這就是具體的領導，提高了幹部，也提高了自己。³²

加強黨員，尤其是支部教育，是中共強化支部的重要一環。類似於你是誰、你從哪裏來、你到哪裏去的「靈魂三問」，黨員教育中通常也有三問：為什麼參加黨？共產黨員是幹什麼的？怎樣做一個好黨員？魯西根據地的一次測驗顯示，對為什麼入黨，「大部分黨員能正確解答。在泰西，泰安、肥城、平陰3縣70個黨員的測驗情形是：正確者38人，佔54%；不正確者25人，佔35.7%；不瞭解者7人，佔10%。其不正確答案是：為了抗日者2人；為了八路受苦咱幫助1人；為了受優待1人；看著八路軍好參加有好處，因為沒飯吃的佔多數。」對共產黨員是幹什麼的，多數能回答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雖然「再進一步問什麼是無產階級就鬧不清楚了」。對怎樣做一個好黨員，瞭解最差：「66個黨員中測驗：正確者3人，佔4.5%；不深刻的22人，佔33.3%；不瞭解的22人，佔33.3%；不正確的19人，佔29%。其不深刻的答案是：保守秘密，不和富的一心是好黨員；開會不用叫快去，學習宣傳用心就是好黨員；納黨費的是好黨員。」

31 〈彭德懷在太行區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42年12月18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5卷，第957頁。

32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高崗關於建立模範支部的意見〉(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第137頁。

除這三個核心問題外，對支部幹部還有關於支部的組織及任務問題的測驗，44個支幹中測驗結果：

正確的13人，佔31%；錯誤的14人，佔33.5%；不瞭解的5人，佔12%；沒問的12人，佔28%。其中瞭解不夠者的答案是：支部是領導群眾的，組織辦事的；支部是領導黨員的；支部是檢查小組會報告的；支部是管開會宣傳的；支部中書記是召集人，組織開會宣傳也管開會。

當提問國民黨、共產黨有什麼區別時，有人回答：共產黨是無馬的，國民黨是有馬的；共產黨是民閥派，國民黨是軍閥派。³³

儘管中共對這樣的結果不很滿意，但客觀看，這些題目放到多年後的中共黨組織中測驗，也未必就一定得到好得多的成績，讓文化水準有限、入黨時間不長、且長期缺乏基本政治生活訓練的黨員幹部瞭解中共的這些原則，確實太不容易，出現一些稀奇古怪的答案實屬正常。教育、訓練更重要的還要看實際工作中的效果。山西榆社反「掃蕩」時，黨支部能夠有序組織群眾，「事先選好幾個退卻地點，估計敵人從哪個方向來，群眾從哪個方向逃，在敵人搜山時向哪個方向轉移，並有嚴格的分工。以四個中心人物組織四個游擊小組，規定打游擊與護送群眾、情報聯絡等工作，又有專門負責宣傳解釋工作的，村中還留有支應軍隊的。」³⁴ 這種有條不紊的佈置，很難想像竟是基層支部所為。

黨在當年鄉村中的領導地位，下面一組調查數據比較有說服力：

在一九四三年時，安塞全縣有黨員2122人（機關學校一百多黨員在內），佔全縣人口的4%，黨員佔總勞動力的18.5%。在同年的開荒中，平均起來每個黨員開荒8.1畝，每個群眾開5.1畝，黨員超過

33 〈魯西區黨委關於從思想上政治上鞏固黨的系統教育的初步總結〉（1941年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616-618頁。

34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關於鞏固黨的工作的總結〉（1941年10月8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4卷，第837頁。

群眾3畝。去年發動農村黨員幾乎百分之百的參加了變、札工，並且由黨員直接參加領導的變、札工就佔全縣變札工總數的45.7%。不足勞動力總數五分之一的黨員，在安置移難民並給解決物質困難(窯洞、土地、糧食、工具、畜力等)上佔全縣總數的二分之一。全縣勞動英雄81人，其中黨員28人，佔總數的32.2%。³⁵

在陝甘寧這樣的穩固地區，多數時候，黨組織已經成為鄉村社會事實上的領導者。

2. 檢查與會議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中共革命的具體落實，都特別強調踐行，特別重視把計劃落實為行動，羅瑞卿說：「任何美麗動人的決定，如果不實現起來，不變成活生生的成績，即一個銅板也不值得。」³⁶要把計劃變成現實，不是容易的事，黃敬曾指出上傳下達中的走樣現象：「一次提出鞏固黨是中心任務，附帶提出打狗、殺鴿子；到支部中一問就剩下了打狗、殺鴿子。」³⁷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謝覺哉寫下自己的苦惱：「悶在工作上的兩個問題：一是上級領導，傳下去總在打折扣，甚至走樣；一是新的積極分子不易產生，舊的幹部又日在減少或蛻化。」³⁸這大概是所有政治力量都無法避免的問題。即便有強調實踐的理論和效率優先的追求作為鋪墊，仍然需要領導者持之以恆地貫徹、教

35 〈西北局組織部關於整頓農村支部工作問題材料〉(194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5年，第207頁。

36 〈羅瑞卿同志在北方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的政治工作報告〉(續完)，《前線月刊》第7期，1941年1月。

37 〈黃敬同志關於領導問題的報告〉(1943年6月2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636頁。

38 《謝覺哉日記》上，1943年6月9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6頁。

育、督促，建立制度化的行為機制，逐漸形成重視實踐的政治性格，才能盡力促進各項方針政策落到實處。

在一份中共下發的開展檢查運動的文件中，可以讀到這樣的表述：「A·『檢查決定一切』，檢查鞏固組織，檢查深入工作，檢查提高幹部。B·檢查的動員與領導，組織檢查運動，檢查檢查運動。」³⁹最後一句繞口令式的「檢查檢查運動」，十分傳神地體現中共層層遞進的工作方法：一切工作都要檢查，檢查成為制度；為防止制度流於形式，輔之於集中突擊的運動，在一個時間段內大張旗鼓推展；最重要的，在制度和運動的雙重機制後面，再加上一重監督措施，即對檢查工作本身的檢查。這樣不斷的強調、督促、推動，儘管成績未必總是盡如人意，但做和不做、做得多和做得少，結果肯定會不一樣。不僅如此，中共的檢查不單純是外在的督促，檢查者本身也參與問題的解決，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內，這種看似逾越常規的做法，背後支撐的是中共理念一致下的黨的團結。比如有關春耕檢查隊的報告中，明確強調：「檢查隊下去工作時即確定了不僅檢查而且要具體地幫助與推動，同時到每縣的工作檢〔查〕隊都又和各縣的工作同志混合編制，故每一工作問題，檢查隊都能參加解決與規定，的確實現了深入具體的領導。」⁴⁰

中共檢查工作的主要職能包括：「一、在檢查工作中認識幹部；二、在檢查工作中搜集經驗教訓；三、從檢查工作中瞭解自己決定的正確與否。」⁴¹其中，檢查幹部又是重中之重，此所謂「要相信幹部，也要檢查幹部」。⁴²關於檢查、巡視的具體條規，此處不擬贅述，僅以張南生日記所載巡視過程為例，展示巡視、檢查的具體方法和實踐。

39 〈李雪峰在中共晉冀豫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閉幕詞〉（1939年3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2卷，第606-607頁。

40 薛迅：〈春耕檢查隊的工作總結〉（1940年），《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301頁。

41 〈楊尚昆在中共晉冀豫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39年9月11日至13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2卷，第483頁。

42 〈磁縣根據地工作研究〉，《太行黨史料輯存》第2編，第56頁。

1938年10月，剛剛到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後方司令部政治部的張南生，通過師政治部的巡視工作總結發現游擊梯隊存在軍閥土匪主義、貪污腐化等現象，決定帶隊去游擊梯隊巡視。24日，張南生到達游擊梯隊，馬上啟動巡視工作：「上午參加游梯一、三營幹部會，檢查數次戰鬥優缺點。午飯畢，到四連去檢查工作，該連工作比較差，尤其組織上的馬虎」。⁴³ 25日到27日，張南生一直在部隊談話、檢查，先後到數個連隊和小組長、巡視員等談話，召開青年晚會，參加總分支委會，收集各方面意見。這是巡視中的調查和發現問題階段。

28日，檢查有了初步結論，進入處理和解決問題階段。先是指出問題：「下午四時開總結巡視各營工作會；晚上開特別小組會。準備明天活動分子會，這次會要得出反國黨路線遺毒的結果。」接下來展開思想鬥爭：29日，「今晚小組一般鬥爭批評在游梯是第一次，個別同志比較進步，還有頑固不改。」30日，「早飯後繼續大會討論，發言二十餘人，一般還好，特別是下午發動了鬥爭，……晚上開特別小組會，檢查游梯過去的領導工作，準備明天會議。」31日，在鬥爭基礎上，做出組織和紀律處理：「繼續開大會，討論給予最嚴重者以處罰。我下午做黨的工作報告，下午做緊急動員指示選舉出……等七人為黨委員。晚飯後，公審強姦婦女的王書堂，執行槍決。」

通過大小會議的檢查、總結、鬥爭，乃至震懾性的槍決，糾正問題、教育幹部的工作基本完成，巡視進入鑒定和健全制度階段。11月1日「上午即開黨委會，分支書記參加，討論計劃和經濟制度，決定經濟委員三人。……晚上開特別小組擴大會。……由我報告鑒定排以上幹部問題，特別二、四、九、十一連，特務三個連問題更多。」做出組織鑒定後，檢查工作即告一段落。接下來就是對檢查自身的檢查，2日巡視團召集會議自我檢查，得出的結論是：「一般還好，主要本身學習差，在二營巡視差一些。」

43 《張南生日記》，1938年10月23日至11月2日，第93-95頁。以下引文不一一注明。

張南生日記只是對自己工作的記載，在他本人，或許就是本流水賬，放到後人眼中，卻可從中看到中共當年檢查、巡視的工作流程。儘管可以相信，不是所有的巡視工作都能做到這個程度，但在中共政治文化和追責機制下，巡視者面對自己擔負的重大責任，的確不敢大意處之。

張南生在巡視總結階段講到的鬥爭，不僅體現於檢查工作中，也是中共革命中的日常。鬥爭一般而言，是非常態的政治運作方式，戰爭年代，中共卻在強烈的危機意識及效率優先導向下，把鬥爭變成常態。中共成長於幽暗環境中，一向保持極強的危機意識，用百倍的警惕面對百分之一的危險，已成常態。正因此，鬥爭遍及當年中共政治生活的各個角落。對外要鬥爭，對內要鬥爭，個體自身甚至也要展開鬥爭，比如：「鞏固黨不是閉戶幽居，和平鞏固。鞏固黨必須從領導群眾鬥爭去鍛煉黨、鞏固黨。」⁴⁴冀魯豫區黨委的報告寫道：

滑縣區委書記私自罰款自己用，讓富農的兒子做乾兒，……因此要在分區委會和支書聯席會並到地委機關中鬥爭他。其他區委幹部來後知道此事，有的說：「我不參加這會了，為什麼得罪人呢？我不幹！」有的說：「鬥爭他可不行，他要用槍打人哩！」。……經鬥爭說理揭穿後，這個區委書記表現很好，把錯誤認識了，轉變得相當好。從此以後大家才知道思想鬥爭是可以用的，是不可怕的。⁴⁵

僅僅通過鬥爭發現問題遠遠不夠，還要有配套的懲戒制度。中共懲戒違規行為極其嚴厲。陳賡日記載：「七七二團十連指導員貪污公款，其手法為多報人數，領取津貼，假造發票，報銷領款。當今逮捕，首先在黨內開展鬥爭，作組織上的結論，然後在全旅舉行公審，廣泛地

44 〈冀魯豫邊區全面工作報告〉（1941年7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47頁。

45 〈冀魯豫區黨委的工作總結〉（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97頁。

開展反貪污鬥爭，並送師軍事裁判所治罪。」⁴⁶ 這樣的檢查發現並解決問題的機制，不一定能杜絕所有問題，怠惰、同謀總會或多或少存在，但對防範權力運用的大面積失控，當有效用。

黨內政治和思想鬥爭的方式多種多樣，會議是最常用的一種。中共會多，這一點人們耳熟能詳。1939年7月12日到1940年1月12日半年時間裏，高魯在華北聯合大學學習，其間參加各種會議近60次，平均差不多3天一次。⁴⁷ 會議形式包括時事討論會、專題討論會、總結會、生活會、思想鬥爭會、批評大會、工作會、小組會、組織生活會、政治學習會等。戰時曾任昆張支隊連長的郜晉武日記記載了一天內開會的密度：部隊夜裏行軍，天亮時到達宿營地，十二時後起床，稍待片刻，即開始集體活動：

召集黨員上課。群眾有文幹張魯上自然課。我參加了黨課，講了個人主義之危害。吃過晚飯，我們連幹分工參加了普通小組會。我到機槍班小組，批評了李金幫同志。開完會，召開了幹部黨小組會，每個人都作了自我批評，並相互提了意見。開完會，講了今日總行動要注意的問題，以及路線、目的地。⁴⁸

這樣的會議密度在根據地內屬常態。李公樸寫道：「在晉察冀就是一位老鄉，當他遇到困難問題的時候，他就這樣的講：『開個會討論討論。』」⁴⁹

開會是人類久遠的傳統，恩格斯曾經描寫母系氏族階段的北美易洛魁人開會的情形：「議事會公開開會，四周圍著其餘的部落成員，這些成員有權加入討論和發表自己的意見；決議則由議事會作出。」⁵⁰ 近代社會的集群化、細密化更讓會議變得不可或缺，孫中山十分重視發揮會

46 《陳賡日記》，1938年6月5日，第103頁。

47 《高魯日記》，1939年7月12日至1940年1月12日，第11-62頁。

48 《郜晉武日記》，1943年6月19日，《昆張支隊資料專輯》，第205頁。

49 李公樸：《華北敵後——晉察冀》，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96頁。

5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04頁。

議的功能，1917年專門出版《會議通則》(即《民權初步》)一書，對中國人做會議啟蒙。共產黨人重視組織、追求效率，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有個貫徹渠道，會議能夠上傳下達，是崇尚集體主義的中共樂於接受的快速下達命令、動員和組織起來的便捷辦法。中共對會議制度有高度的期許，強調會議制度「是一切制度的中心，是一切『制度之母』。會議有些缺點，但並不能因此而輕視會議。沒有會議就沒有集體和分工。」⁵¹ 將會議和巡視列為「保證各級行政機構(其實其他組織也是如此)執行正確政策，完成工作任務的兩大機動紐帶」。⁵²

會議有經常性的，定期召開，比如黨代會及各級組織的經常性會議，太行區晉冀地委要求：「地委在『五卅』前三個月內分別舉行縣書會議、組聯會議、宣聯會議、軍聯會議、群眾工作會議各兩次。」⁵³ 也有臨時性的，針對某項具體工作展開佈置。這種會議應該像李雪峰所說：「討論一兩個問題，有頭有尾，源源本本，弄清楚，有辦法，切合實際；不是無所不議，樣樣都談，而又樣樣談不清楚。」⁵⁴ 晉冀豫區黨委甚至對各種會議召開的大致時間也有規定，每月初旬開下級會議，「下級(地、縣)來開會或區委下去」；每月下旬召開同級會議，區黨委之外，「吸收軍區、政權、群眾工作主任委員參加，檢討總的計劃及配合問題、下邊意見等」；每週六區黨委開一次「自身例會」。⁵⁵ 從一般的工作規律看，這個時間規定應該不是隨意為之，月底的同級會議旨在研究、總結該月工作，計劃下月工作；月初的下級會議則為佈置本月工作

51 〈黃敬同志關於領導問題的報告〉(1943年6月2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639頁。

52 李杰庸：〈怎樣做檢查巡視工作〉(1939年7月10日)，張起厚編：《中共邊區根據地的歷史文件選輯》上，出版者不詳，1985年，第331頁。

53 〈中共晉冀地委三個月內的工作要求與工作日曆〉(1939年3月1日至5月30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2卷，第121頁。

54 〈略論點滴作風與具體領導〉，《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106頁。

55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一九四一年工作計劃〉(1941年2月23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4卷，第162頁。

並聽取意見；每週的例會用於隨時研究、發現、解決問題。幾個會議周而復始，形成時間上的循環鏈條，至於空間上，則有一層層往上開的情況彙報會和一層層往下開的落實會，形成上下的通聯。

張聞天主持的興縣調查記錄了一個村莊女自衛隊員開會的情況：「下午飯剛吃完，自衛隊男幹部就召集開會，婦女們扭扭捏捏不肯到會，男人們有在格楞上吼的，有到地裏路上去勸說的，勉勉強強到了10人以上的數目，這個會是開始了。」區武委會劉主任提出組織民兵的任務後問道：

「你們聽了麼？不要耳朵不聽，讓我白說，不對！」劉強硬的說。

「你們說話，咱們散會……」劉又說。

「做飯……不記，餓！」有一婦女說（「記」是指用腦子把事情記住）。

「不記，要叫敵人殺，活不成！」劉說。

「記著了，記著了！」又一婦女嚷著。⁵⁶

儘管調查團對這個會有很多批評，認為不善於發揮民主，檢查工作不認真，滿口政治術語，黨八股的味道濃厚，會議的確也頗為混亂，但在當年的鄉村，面對一群不識字的婦女，幹部們確實可以說盡力了。

抗戰中後期，「縣委與地委興開了一種會議形式——座談會」，「多是由下邊的好壞典型的彙報開始，然後座談，交流經驗並提出問題大家討論，大家決定」。時任冀魯豫分局第八地委書記的萬里認為：

這種方式的好處是：1、民主，大家有言就發，無顧慮（因為沒有總結在那裏限制著大家）。2、表揚與批評聯繫密切，而且是到會的大多數的批評與表揚，容易公認優點與糾正弱點。如一個同志在未開會前幾次個別說話，均不以為自己的決定有毛病，而在座談會上，經大家發言後，就深刻認識了自己的毛病，這種力量是

56 《「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第525頁。

相當大的。3、經驗交流具體深刻。4、思想便於統一。其弱點是：1、開會時間長；2、掌握不好，容易失掉中心。⁵⁷

座談會不拘一格，形式靈活多樣，1930年代前後興起。從《申報》和「晚清、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的檢索結果看，「座談會」一詞，1920年代可以零星檢索到，1930年後頻繁出現。李卓然回憶，中央蘇區時，毛澤東曾建議他多用座談會的形式和人交流：「做報告江西老俵聽不懂，開座談會的方法很好，一問一答。」⁵⁸後來，毛澤東和延安文藝界交流即用了座談會的形式，大大促進這一形式在中共區域內的推廣。

從當年的總結中，還可以看到中共對會議的佈置和期許，中共晉冀豫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楊尚昆總結的大會成功之處包括：

一、總結了兩年來的工作。在本區，就是在華北，恐怕都是第一次。二、大會上討論了目前形勢，國際新形勢，中日戰爭新階段，華北戰況與山西統戰新形勢。三、在發言中把各地區工作的優點發揚了些，並用事實證明瞭大會報告的正確。四、在發言討論中，也揭露了晉冀豫黨的一些弱點，並指出了克服弱點的辦法。

弱點則為：「對大會報告討論得不夠，特別是對政治問題的展開討論不夠，……自我批評，特別是自下而上的，很少，這是大會很大的缺點。」⁵⁹可以看出，像黨代會這樣的常規性會議，預定的任務大致包括總結工作、評估形勢、討論問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對促進黨員群體政策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以及黨的力量成長，大有裨益。

會議符合中共集體主義的政治文化，又推動著集體主義政治文化的進一步深入。中共清河區委書記景曉村參加山東縱隊總結會議後的感想

57 萬里：〈繼續貫徹大膽放手的領導方法〉（1944年12月2日），《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494頁。

58 李卓然：〈我的回憶〉，《李卓然文集》上，第34頁。

59 〈楊尚昆在中共晉冀豫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總結〉（1939年9月28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582-583頁。

是：會上肖華傳達北方局及太行分局財政經濟工作經驗，「其中包括材料之豐富，調查研究的周密與透徹，給每個同志很大的感動」。⁶⁰此即跨區域的經驗傳遞。集體會議的形式使這樣的經驗傳遞可以大面積迅速覆蓋，達到效率最大化。中共自己總結：「工作最好的縣份是哪些呢？是那些會議制度最健全的縣份；工作最壞的縣份是哪些呢？是那些會議制度最不健全的縣份。」⁶¹這條材料當然也可倒過來解釋，正因為這個縣工作好，會議才開得好，兩者間互為因果。

大事小事都要開會，會議成為經常的工作方式。景曉村出任渤海區黨委書記後，考慮召開高級幹部會議，設想的會議程序是先學習文件，打通思想；然後各區報告，總結幾年來各方面工作；再進行工作檢討，發現問題；最後全面總結。從中可以看到，學習—報告—檢討—總結，已經形成一套會議模式。時任山東冠縣區委書記的宋洪勛詳細記下區委會議召開經過：

4月8日 各區的同志都到齊了，我們有組織地開會，按次序進行，主要的是政治問題的討論。先舉行測驗，這是新知識，不比學校的考卷，同志們毫不遲疑地寫了起來，非常嚴肅。這是我感到最有意義的一點。可見同志們對政治問題的關心。傍晚做了遊戲。晚上更進一步地把那些政治問題討論了一遍，誰能說沒有意義。生活也算得上緊張、活潑。

9日 上午把過去三個月來在工作上、領導上、作風上、政策上的優缺點，都徹底做了檢討。下午把四月份的工作佈置了一下。

10日 清早逐個地解決與指示了各區的工作問題，忙活得很。上午又談了兩點鐘，才算結束了這個有重要意義的區委會議。⁶²

60 《景曉村日記》，1943年6月19日，第123頁。

61 〈反對工作上的自流傾向〉，張起厚編：《中共邊區根據地的歷史文件選輯》上，第328頁。

62 〈工作日記（1941年3月至12月）〉，《昔墨今史——宋洪勛同志工作手記（1941-1948）》，第6-7頁。

這個會議的程序大致是測驗、討論、總結，比較有意思的是多了遊戲環節。另外作為區委書記，宋洪勛的日程還有個別談話，這也是中共各級主要幹部具體指導的一個重要方面。會議形式不斷推廣，連婦女都能熟練運用：「太谷南莊村有一婦女，整日在村上亂搞，挑撥得很多夫婦不和睦，婦救會便召開婦救會及老婆會，將她叫來批評。她不承認，並且繼續與人亂搞。婦救會又與她個別談話，並召開了全村婦女大會，誠懇地向她提出很多意見……這樣一來她才接受改過。」⁶³

會議效果顯著，卻也容易形成依賴。後來說的文山會海，抗戰時期已見端倪。1941年12月遼縣下莊村因為開會，「幹部誤工佔全月時間50%，群眾誤工佔全月時間13%」，農民議論：「政策樣樣都好，就是開會太多。」⁶⁴開會太多，讓人不勝其煩，極端的例子，「有一個支部用請吃酒名義騙一個黨員來開會，這個黨員到會場一看，說道：『這回我算來開了，下回誰還受騙呢？』」⁶⁵李新回憶強迫命令的會議場面：「群眾每晚一聽見敲鋼軌的聲音，便跑步趕往會場。就連小腳老太太也都提著馬扎，一歪一扭地趕著去開會。會場上鴉雀無聲，秩序井然，就像我們的正規部隊集合時那樣的嚴肅。我一看到這種現象就懷疑，經瞭解，果然是強迫命令的結果。」⁶⁶

作為領導者，張聞天對文山會海中的空談更有感觸：

我參加過很多的會議，聽過很多這樣的報告，報告人可以說到他們如何開會，如何傳達，如何佈置，到會人數，發言人數，以及「經驗教訓」等許許多多的話，然而實際材料卻是很少，實際問題究竟在哪裏卻是無法知道。這類報告再經過許多次的傳達、討

63 〈一年來婦女工作總結報告〉（1942年7月15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5卷，第417頁。

64 〈太行區經濟結構與抗戰開始後社會經濟變化〉（1944年12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7卷，第272-273頁。

65 〈黨支部工作總結——1945年1月在縣區幹部會上的報告〉，《鄒屏工作筆記》，第56頁。

66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第204頁。

論、總結，就變成什麼也沒有的空話了。但人力、精力、物力的浪費，卻是不可計算的。⁶⁷

毛澤東對過度的會議依賴也不無反感：「不但文章裏演說裏有黨八股，開會也有的。『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處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黨八股嗎？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⁶⁸「不講好像對人不起」這句話，放在當今中國仍然鮮活。為此，他一度設想用報紙取代會議的部分功能：「現在我們邊區，開會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報紙發出去就可以省得開許多會。」⁶⁹另外，建立發達的通訊制度也可以幫助實現信息的快速傳遞，比如冀中根據地「各縣都可通訊，非常迅速便利。八專區的通訊網，1天即可到專區。因此專門能夠直接瞭解村裏的具體情況，領導也自能具體深入。」⁷⁰

不過，無論報紙還是通訊制度，都有局限性，難以和現場互動相提並論，開會的現場感、會上的討論、會下的溝通，口語化、面對面、儀式感，以及情感的表達和傳遞，都是文字傳遞方式替代不了的。涂爾幹描述開會演講有可能產生的神奇效果：「講話激發的感情返回到他身上，但擴大了，增強了，也同樣加強了他自己的感情。他激起的感情力量在他身上引起了反應，提高了他的基調。這不再是一個惟一的人在演講了，而是一個具體化與人格化了的群體在講話。」⁷¹這簡直就是中共會議的預見版。中共的貫徹之所以不流於走過場，和開會這樣的現場形

67 張聞天：〈出發歸來記〉（1943年3月27日），《張聞天文集》第3卷，第134-135頁。

68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41頁。

69 毛澤東：〈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1944年3月22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12頁。

70 徐達本：〈關於統一累進稅工作中的幾個問題〉（1941年5月），《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483頁。

71 涂爾幹著，杜守錦、彭守義譯：《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第230頁。

式關係極大，因此，開會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高魯記載了一個例子，可見中共幹部對會議的癡迷：交城七區不顧危險，在中日交叉控制地區召開青年幹部會，結果開會時「敵人路過村公所，聽到了掌聲，便包圍了村公所」，⁷² 幾名幹部慘遭殺害。

後來，中共在實踐中不斷摸索，提出會議、通訊、巡視相互串聯，以上通下達、相互溝通的辦法，指示：

必須充分利用無線電、有線電、電話、郵遞、專人送信等項通訊方法，小型會議（例如四五個人的），區域會議（例如幾個縣的），和個別談話等項會談方法，小型巡視團（例如三至五個人的）和個別有威信的委員的巡視方法，同時充分利用通訊社和報紙，密切地互相聯繫起來，以便掌握運動的動態，隨時互通情報，交流經驗，及時糾正錯誤，發揚成績。不要等候幾個月，或半年，甚至更長時間，下面才向上面作總結性的報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這種報告和指示，往往過時，失去作用，或者減少了作用。犯錯誤的已經犯過，來不及糾正，損失太大。全黨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時機的生動的具體的報告和指示。⁷³

這種多管齊下的方式，特別符合中共系統運作的邏輯，控制力的不斷推進，就是以這樣的往復檢討、總結提高為基礎的。

3. 中心突擊與勞動競賽

革命向來強調能動性的發揮，共產主義革命中，能動性可謂自帶的底色，滲透到革命的每一環節，馬克思說：「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

72 《高魯日記》，1941年10月15日，第158頁。

73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32—1333頁。

生產整個自然界；……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⁷⁴ 中共革命深受能動性思維的影響，突擊運動，作為效能導向政治運作模式的一種，即為革命能動性發揮十分獨特的一環，通過突擊造成的縱深推進，可以強化政策落地生根的效能，實現跳躍式發展。

和中共革命中的大多數新鮮事物都能追溯到蘇聯一樣，塑造積極分子以及由此為基礎展開的突擊、勞模運動，基本模型也源自蘇聯。共產黨人強調效率優先和能動性，區分先進、落後並努力以此塑造爭先恐後的進步氛圍，本為這支政治力量的題中應有之義。正因此，蘇維埃革命剛剛成功，列寧給出的蘇維埃政權當前任務就包括組織競賽：

社會主義不僅不窒息競賽，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廣泛地、真正大規模地運用競賽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數勞動者吸引到這樣一個工作舞台上來，在這個舞台上，他們能夠大顯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領，發現有才能的人。⁷⁵

斯大林對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競賽也心領神會，1920年代末期，經由蘇共的號召，群眾競賽在蘇聯廣泛展開，如斯大林所言：「目前廣泛展開的千百萬工人群眾的競賽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實，也是最重要的事實之一。」⁷⁶ 1935年蘇聯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勞動競賽進入高潮。

蘇聯世界革命樣板的地位，使勞動競賽迅速在中共黨內激起迴響。1931年，中共中央發出在蘇區展開宣傳鼓動工作的決議，號召「開始革

74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頁。

75 列寧：〈怎樣組織競賽〉，《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頁。

76 斯大林：〈群眾的競賽和勞動熱情的高漲〉，《斯大林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3頁。

命競賽，模範隊，輕騎隊，共產黨禮拜六等的運動」。⁷⁷ 輕騎隊、共產黨禮拜六、革命競賽這幾個概念都直接來自蘇聯。蘇區時期的革命競賽基本也限於生產和練兵，和蘇聯別無二致。同時，各種各樣的衝鋒運動在蘇維埃時期廣泛存在，衝鋒季、衝鋒月，都代表著通過衝鋒、突擊，以超常的動員獲取額外能量的思路。這樣的思路滲透到中共陣營的日常用語中，學習討論時，有人率先發言，就會說：「我打衝鋒，先說幾句。」⁷⁸

勞動競賽的關鍵是通過相互促動，造成爭先恐後的局面，抓重點、樹典型是落實勞動競賽的必由之路。抗戰時期，此前的競賽思路進一步拓展，擴展到工作的各個環節和領域。和中國傳統政治講平衡、守中庸的思路相異，中共把「行政命令及平均主義的領導方式」視為「深入工作的兩大死敵」，⁷⁹ 要求掌握中心、厲行突擊，反對平均用力，黃敬曾經引用斯大林關於直接領導的論述：「找出問題的中心，形成具體的工作計劃，接著組織這一計劃的執行；然後考察執行的程度。」⁸⁰ 從中不難看到蘇聯闡釋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抓主要矛盾的影子。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講課提綱——〈辯證法唯物論〉中闡述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後來正式發表的〈矛盾論〉延續了這一提法，指出：「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⁸¹ 由於中共政治文化覆蓋深廣，抓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路，逐漸浸潤整個幹部陣營，時任冀魯豫區黨委宣傳部長的張璽在日記中說：

77 〈中共中央關於蘇區宣傳鼓動工作的決議〉（1931年4月2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8冊，第340頁。

78 李卓然：〈固臨調查〉，《李卓然文集》上，第177頁。

79 〈遼縣實驗縣具體領導的幾點經驗〉（1940年4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281頁。

80 黃敬：〈地方黨五個月工作總結與今後工作方針〉（1938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北岳抗日根據地》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81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2頁。

「考慮問題一定要把特殊性放在頭裏，將共性放在次要地位。這是一個原則。」⁸² 1944年，鄒屏也談到減租減息運動抓典型的數種方法：

①實行了骨幹與群眾相結合：先開積極分子會議進行動員，打通了思想，然後由積極分子團結群眾，帶動群眾，群眾思想也通了。②突破一點，推動坦白：先突破了重點減租對象潘××，讓潘在三個鄉主佃大會上坦白，帶動了別的減租對象。③一般號召與個別突破相結合：開大會號召後，親自動手搞一個汴塘，突破了汴塘的主佃雙方。

這種利用骨幹、重點突破、帶動一般即所謂以點帶面的辦法，在中共的工作總結中經常可以看到。甚至民兵訓練也運用典型示範的方法，「從群眾中抽出一個典型人物，叫他作給大家看，關於步法、臥倒、跑步、齊步、利用地形地物、射擊等等，然後大家評議、領導指導。這樣進行比較生動，引起大家興趣，收效較大。」典型的意義，不僅在於推動工作，還是各級組織體現自己領導方式和能力的一部分：「涇口區生產代表大會上，拿一個最好的互助組的典型來教育大家，實現區的領導。並讓大會各組討論這個典型，批評與完善這個典型，推廣這個典型。」⁸³ 找到並推出好的典型，本身就考驗著各級組織的政治領導力。

突擊運動的關鍵是要拉動革命力量中的積極因素，使之成為推進工作的先導。中共進入鄉村社會、動員群眾時就十分注意這一點。青年、兒童、婦女被列為重點突擊對象，基本判斷是：「青年、兒童是農村中最易活躍的部分，一個突擊力量，經過他〔們〕可以活躍全村。婦女是一個雄厚的後備力量，也是一個落後的、難以動員的力量，這一工作如果作得好，它可以起『動』〔的〕作用，如果作得不好，它即起『拖』

82 《張璽日記》，1943年4月4日，《張璽紀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頁。

83 〈整風帶來的變化〉，《鄒屏工作筆記》，第49-50頁。

的作用。」⁸⁴ 突擊運動固然要獎勤罰懶，但又注意尊重落後分子的人格，不主張單純用懲罰措施對待落後分子：「以落後分子為教育部隊的典型，並企圖以此使落後分子知道恥辱，激發其自動性，結果常是相反。他更加落後，使他惱羞成怒，『一貫的落後』。」正確做法應為：「對他們多鼓勵，只要他們有一點好處，就講他們一點好，少批評，但不是不批評。」⁸⁵

一個群體，先進、落後都是少數，中間總是大頭；樹立先進，不僅可以激勵落後，更重要的還在於帶動中間：

凡是一個運動在開始的時候都是兩頭小中間大的。……對好的就拉他一把。對落後的就擠，一頭拉一頭擠，把中間的就擠小了。假定不擠中間的，還可以說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比二流子總好的多。二流子被我們擠的轉變了，那我們說你還不如二流子呢？這樣就使中間的分子起了分化，這不僅是簡單的改造二流子的問題，而是使中間都不能向下看，都向上看，中間的就沒有了。⁸⁶

社會和群體中，中間地帶總是一個舒適區，所謂「隨大流」。中共的突擊，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攪動這樣的舒適區，讓多數人在擠壓下不得不動起來。通過攪動中間層，達到影響大多數的目標，是突擊運動的關鍵。

突擊運動既針對人群，也針對地區：「所謂突擊，不僅是指時間，而且是按地區。」⁸⁷ 根據抓中心、以先進帶動一般的原則，通常會在地區上重點突破，即選擇和創造基點，通過此一基點實現力量的擴散和覆蓋。

84 薛迅：〈春耕檢查隊的工作總結〉（1940年），《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295頁。

85 〈三五八旅冬訓總結〉（1944年7月），《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7卷，第291-292頁。

86 〈西北局辦公廳關於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鄧發發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第174-175頁。

87 〈遼縣實驗縣具體領導的幾點經驗〉（1940年4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280頁。

一般來說，「選擇基點時必須選大村鎮，因為大村鎮是農村政治、經濟及文化的自然首領，它對小村有著傳統的自然影響」。基點的選擇要盡可能順其自然，先把中心村的工作做好，再以這個中心為基礎，向四周按照「經濟的聯繫（商業、合作社、集場等）」⁸⁸ 自然發散，四兩撥千斤。

突擊運動具體展開不可能一帆風順，起碼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突擊運動和日常工作的結合。中共自己反省：「突擊是推動工作中起嗎啡作用的一種方式，絕不是經常工作的方式。如經常地採用，不是變為不突擊，就是會忽略了經常的基本工作，終於使工作陷於麻痺。」⁸⁹ 突擊要抓重點，不能用突擊代替日常，過多依賴突擊，則失去突擊效果，所謂「樣樣競賽，樣樣都不競賽」。⁹⁰ 突擊不是單兵突進，而是有主有次，隨時注意在系統中的轉化：

一個時期搞一個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就不能不放鬆一些。但又不是把其他工作拋開不管，抓住主要，也要照顧次要，比如大家回去，集中力量搞練兵，整頓官兵關係，也是幫助把練兵搞好。抓住現在，也要照顧將來，比如在練兵中，擁政愛民和生產運動也要準備，現在不準備，到時候就動不起來。怎樣使每個運動互相聯繫，滲透和轉化，抓住一個照顧另一個，是很重要的領導藝術。⁹¹

二是要防止樹先進帶來的副作用。常人都會有虛榮心、嫉妒心，樹先進沒有處理好，有時會使之成為出頭的椽子，造成相互攀比：「對

88 〈遼縣實驗縣工作總結〉（1940年10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725頁。

89 薛迅：〈春耕檢查隊的工作總結〉（1940年），《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295頁。

90 〈遼縣實驗縣具體領導的幾點經驗〉（1940年4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276頁。

91 〈張主任在政治工作會議上的總結〉，《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7卷，第408頁。

同級則嫉妒，誰好就看不起誰，缺乏虛心誠懇互相學習的態度。戰士中諷刺積極分子，多數連隊都成了嚴重的風氣。」⁹²更進一步，有可能形成為評比而評比的形式主義。克服這些問題的辦法，還是中共一直強調的群眾路線，突擊要深入群眾，積極分子也要從群眾中產生，「只有群眾公認的積極分子，在群眾中才有作用，有力量」。⁹³

抗戰時期，在突擊開展某項工作時，會採用組織工作隊下鄉指導的方式。比如開展合作社整頓時，就採用兩種方法，一是「坐窩」法，「在一個地區裏，選出問題最多，最不易整理的幾個中心村，這樣村莊，不怕住上個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定要把它弄得一清如水」。二是連村法，「到這村看看，到那村看看，一天也許走個三五個村」。「坐窩」法也即後來的所謂「蹲點」，這是戰時中共突擊辦法的創造，按照材料所說：「用坐窩的辦法村裏沒有退股的而且有新入社入股的，連村法倒是快，可是許多社員不知道有整社的這回事呢。」⁹⁴紮下來的蹲點，效果顯然非連村可比，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裏，蹲點都是中共習用的做法。

4. 數目字管理

抓中心、定方向，是中共革命重視原則、講求效能的一極，與之相對的一極則是精細化管理。在辯證思維下，這樣看起來各執一端的兩極其實是對立統一的，經典的表述就是後來流傳甚廣的「抓革命，促生產」。

相較於中國傳統政治的粗放管理方式，抗戰時期的中共，精細管理成為趨向。早在1938年初，黃敬在晉察冀邊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

92 〈李處長在練兵團排以上幹部和模範者會議上的練兵總結報告〉，《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7卷，第348頁。

93 〈三五八旅冬訓總結〉（1944年7月），《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7卷，第286-287頁。

94 牛川：〈整社點滴〉，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邊政導報編委會：《邊政往來》第2卷第6期，1942年8月13日，第6頁。

告中就談道：「今後工作必須有計劃性，不要一、二人包辦，手工業工作方式，而要把黨的機構現代化。」⁹⁵ 要求建設現代政黨，不獨黃敬為然，時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舒同也提出：「把手工業方式，包辦主義轉變到集體的分工與現代化產業的工作方式。」⁹⁶

當年中共的自我要求中，不約而同都提到數目字管理。山西平順的一份材料對如何取得、使用數目字有詳細的剖析：

區鄉在檢查工作的時候，對於數目字抓的特別緊。但是對於檢查工作方法思想作風上就注意不夠，甚至把大家召集起來檢查生產只統計數目字就散會。……當你們看到一個數目字的時候，應該向下級追問這個數目字怎樣來的。你見到表上有□個變工組，你就應該抓緊的問下去怎樣組織的，□的有多少，形式的多少，怎樣統計來的。一直問個清楚，縣上和區上的同志到農村裏去檢查工作的時候，應該作一個榜樣，給下級看，應該用最大的時間去檢查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風。只有把這些檢查出來了，得到的數目字才是可靠，才有用。⁹⁷

數目字管理思想的源頭，相信和蘇聯五年計劃的影響不能分開。宋紹文的講話裏透露了這樣的源流：「我們以後一切工作都要用數目字表現出來，如蘇聯五年計劃裏邊的數目字。」⁹⁸ 對於數目字的重視，宋紹文表達得很清楚：「適當的分工，積極的負責，一切找原則、找體系、找數目字。一切工作都用統計表表現出來。……『一切要有數目

95 黃敬：〈地方黨五個月工作總結與今後工作方針〉（1938年4月），《北岳抗日根據地》上，第55-56頁。

96 舒同：〈幾個月來部隊工作的總結與今後工作方針〉（1938年4月），《北岳抗日根據地》上，第89頁。

97 《怎樣統計數目字》，1946年，山西省平順縣檔案館藏。該檔案由李瑞峰先生提供，特此致謝。

98 宋紹文：〈工作作風與工作方式〉（1939年3月10日），張起厚編：《中共邊區根據地的歷史文件選輯》上，第327頁。

字』、『一切要具體』，這是我們今年提出來的兩個口號。」具體而言，各級政權應該詳盡掌握區域內的各種數字，包括「村裏邊的人口數目，人的好壞，耕地面積，土地分配情形，產糧數量種類，村中副業，消費與運銷，參加部隊的人數，抗屬人數，負擔數目，文盲數目，學生數目」等等。⁹⁹村款等支出嚴格管理，建立村財政月報和預算制度，冀中規定：「100元以上的開支，須先呈准區公所」。¹⁰⁰

晉察冀對數字的注重，被更高一級領導者所注意，楊尚昆在北方局召開的黎城會議上提到來自晉察冀的「一切要有數目字」，¹⁰¹促進數目字理念的推廣。注重數字在中共黨內成為風氣，晉察冀軍區的王紫峰日記自省：「今天赴軍區政治部開會，八點到達，飯後就開會了。會上，首先由一分區政委羅元發作工作報告，他的報告準備充分，數字具體。這使我感到，我在工作中有時確實有些主觀主義，不注意搜集數字和材料。」¹⁰²蘇聯五年計劃的影響直接反映在根據地的年度生產計劃中，1941年晉冀豫邊區確定的農業生產計劃為：「增加糧食10%，副產20%至30%」，「種棉花50萬斤到60萬斤」，其中更具體規定「平均要做到1人養1雞，3人至5人養1豬」。¹⁰³

對數目字的重視，和支持戰爭的財政要求也不無關係。戰時徵發空前巨大，要保證徵發的效率和公平，準確掌握徵發對象的收入狀況是基礎條件。當年報紙刊登對工商業的調查辦法：

99 〈邊區政權工作檢討總結〉（1939年7月17日），《新長城》第2期，1939年8月31日，第6頁。

100 〈冀中區政治主任公署關於整理財政令〉（1940年3月1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89頁。

101 〈楊尚昆在中央北方局黎城會議上的報告〉（1940年4月16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229頁。

102 王紫峰：《戰爭年代的日記》，1942年5月26日，第86頁。

103 〈彭德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九月高幹會議上報告的摘錄〉（1940年9月25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663頁。

飯館、油房、雜貨鋪、布店、磨房、染房、腳戶等各種商業都找出一個典型戶，先具體調查他們的生意的情況，不要一下子就先問他們賺多少錢。譬如問飯館時，就問他：去年各月份的麵粉價如何？燒餅、麵條價格如何？一斤麵能打幾個饅餅？每月份各能賣多少麵？一個集市上能賣多少麵？一面問一面登記一面和商店裏的行情對賬，再問他去年一年賣多少麵，賺了多少錢？……把數字寫出後，和幹部們的預先估計，和商人的零碎報告和填報表的數字如果相差不遠，那就證實較真實的，如果相差太遠，就要重新調查，準確後就開各商業戶主會議，把各典型戶的收支數字公佈，那他們填報就不會有太大出入了。¹⁰⁴

精細化分工要求到日常事務。擁政愛民運動中，隊伍的自我檢討甚至也可以看到統計數據：「膠東部隊如十六團打群眾四五八次，罵七二〇次；特務連六十人打群眾一百二十次，某參謀、營副各打二十餘次；某馬夫打群眾三十餘次。」¹⁰⁵ 同事之間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能不能按計劃展開工作成為討論的重要內容。《戰鬥報》記者鐵沖在日記中自我檢討道：「對工作多是熱情，缺乏計劃，……對自己的許多樣的工作有計劃的逐步的去完成還作的不夠。」¹⁰⁶ 延安柳林的尹登高區長堪稱數字化管理的典型：

區委存有各種精確的記錄冊，如報告，決定，指示等留底，下鄉收集的材料，一切數字統計，各種會議記錄冊，黨員登記冊，彙報記錄，學習記錄等，細緻整齊，有條不紊。此外，尹登高同志

104 倉夷：〈調查工作報告——城南莊區剪影之四〉，《晉察冀日報》，1943年6月26日。

105 〈中共山東分局、山東軍區一九四三年擁政愛民總結簡報〉（1943年11月26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1輯，第185頁。

106 〈八路軍一二〇師〈戰鬥報〉社記者鐵沖日記〉，1944年2月28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藏珍稀抗戰文獻彙刊》第2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第410頁。

還作日記。他特別熟悉上述記錄冊，需要查用哪種材料時舉手即得。上級檢查工作時，他可以不加思索地講出一切情況和細節。¹⁰⁷

這樣精於數字的幹部，在日後中共黨內常常可以看到。

重視數字可以推進有效管理，但數字畢竟是紙面上的東西，適應了數字管理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當時的調查說道：「那些統計表格怎樣來的呢？請你想想罷！很多農民還沒有犁田，而去種棉數量的調查表上就填好多少多少『垧』了。」¹⁰⁸這是說的造數字。還有單純追求數字：「只要數目字完成，這些事就再不檢查了。」¹⁰⁹因此，數字化管理如果不和有效監督及深入調查相結合，還是難以落到實處。這就是時人進一步要求的：「一切工作要有數目字，一切工作要經過統計調查。」¹¹⁰

毛澤東在推進數目字管理和調查研究結合上，發揮了重要作用。1944年，毛澤東表態：「現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計算數字，實事求是，聯繫群眾。」¹¹¹將這三者結合的辦法就是調查研究。中共是個強調系統運作的政黨，數目字管理本身即為系統運作的一部分，系統運作需要高質量和高數量的信息反饋、回流，以保證系統不出偏差。調查正是完善這一環節的不二法門：「當遇到一個問題時，善於進行系統思考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尋找數據，瞭解系統的歷史情況以及行為隨時間變化的趨勢。」¹¹²

調查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近代以來在西方迅速發展，中國則興盛於二十世紀初。據統計，1912年至1937年間，全國共出現調查報告

107 〈延安柳林區委如何領導區鄉工作〉，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編：《邊區政報》第51期，1946年4月1日，第51頁。

108 《「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第150頁。

109 李卓然：〈固臨調查〉，《李卓然文集》上，第210頁。

110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太岳行署指示——關於調查統計工作〉（1941年11月15日），《太岳政報》第1卷第2期，1941年12月1日，第6頁。

111 毛澤東：〈關於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1944年3月5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97頁。

112 德內拉·梅多斯著，丘昭良譯：《系統之美——決策者的系統思考》，第124頁。

6,507篇，¹¹³可見調查研究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熱度。調查研究旨在瞭解實際狀況，取得第一手材料和數據，即中共要求的：「團以上的幹部必須詳細研究駐地一個縣一個區域的社會狀況、階級關係及其政治態度，從實際中學習掌握政策及策略。」¹¹⁴在另一段話中，可以看到更具體的佈置：「無論專署、縣、區，凡在某村住半天以上者，要召開群眾大會或村幹部會；住3天以上者檢查本村之工作；住10天以上者要保證本村之公平負擔徹底完成，並建立民眾夜校。」¹¹⁵

為保證調查研究落到實處，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下設中央調查研究局，擔負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種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¹¹⁶各根據地政府也成立相應組織，晉冀魯豫邊區政府規定「行署在民政處設統調科，專署與縣級民政科應責成專人負責統調，區級由行政助理員負責」。¹¹⁷不同級別調查機構職司不同任務，縣級以上主要負責研究統計，區級以下則主要負責調查，提供材料。各部門都要編製系列統計資料，形成完整的數據鏈條。只有掌握充足的材料和數據，政策的制定和落實才有扎實依據。北岳區黨委要求調查材料必須言之有物：「實際材料應佔90%（但須有一番整理工作），分析結論10%。如有不符此種類規定，空洞無物的抽象的長篇大論的東西，一律退回原地。」¹¹⁸

113 參見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第43頁。

114 〈反對「左」右傾向鞏固部隊建設晉西北〉（1940年10月18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7卷，第148頁。

115 〈安專員在各縣縣長聯席會及宣教聯席會議上的政治報告〉（1940年12月25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392頁。

116 〈中共中央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年8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534頁。

117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太岳行署指示——關於調查統計工作〉（1941年11月15日），《太岳政報》第1卷第2期，1941年12月1日，第6-7頁。

118 〈中共晉察冀北岳區黨委關於調查研究工作的決定〉（1941年9月28日），《北岳抗日根據地》上，第333頁。

調查要有一套落到實處的辦法，中共中央決定中講到調查的七種辦法，包括收集報刊資料、開調查會，寫名人列傳、口頭詢問、收集志書加以研究等。¹¹⁹ 關於名人列傳，中央統一戰線部指示：「對各黨派、各階層、各友軍、各政權、各界團體的每一個具體代表人物作多方面的深刻仔細的研究，對這些人的姓名，年齡、籍貫、財產、生活、歷史、思想變遷、政治傾向、生活嗜好、個性特點、社會關係、親族關係等詳加研究，分別寫成傳記。」¹²⁰ 口頭詢問是調查研究最常用的方式，高魯記載口頭詢問的過程：「利用小孩，最好選擇一些既懂事又不懂事的小孩，送他們一些東西，打聽他家裏的錢糧情況，……不懂事的孩子不會知道家裏的錢糧放在何處，而太懂事的孩子又不會告訴家裏的情形。」¹²¹ 從中多少可以看到一些誘導式的技巧。或許正是針對這樣的技巧，毛澤東專門提醒：

怎樣使對方說真話？各個人特點不同，因此，要採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討厭。群眾不講真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來意究竟是否於他們有利。要在談話過程中和做朋友的過程中，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你的心，逐漸地讓他們能夠瞭解你的真意，把你當做好朋友看，然後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¹²²

調查、研究、組織、動員，缺一不可。以戰時非常重要的糧食調度為例，當年的報道呈現了各個環節協調展開的案例。由於各地區乃至

119 〈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1941年8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531-532頁。

120 〈中央統戰部關於統一戰線部的組織和工作問題的指示〉，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90頁。

121 《高魯日記》，1940年8月1日，第107頁。

122 毛澤東：〈關於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83頁。

地區之間駐兵和糧食產出情況不一，根據中共統籌管理政策，需要展開糧食調度。糧食調度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如何節省民力，避免浪費，事先的調查非常重要：「調查了各地駐軍的性質及其數字，各地糧種及其數字，各地人力與馱口力，決定了糧食流的方向——大方向、小方向，小米流的方向與豆子流的方向，以及運輸的路線。」這樣做到心中有數。調查之後，再組織運輸，「一級一級算賬，一級一級具體」。組織運輸需要精心設計，報道特別強調有效的組織中，「『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謂「想」，就是計劃、動腦筋，「有時多捉摸了一下，一個區或一個村一個人就要少運一次，……省下不少人力」。「想」又不是空想，「是根據實際的材料，根據了具體的數字一點一滴來算，根據了農民的特點來想辦法」。比如想到實行包幹的辦法，「規定了一村運多少就完了，他就起了勁，爭著先運完了事」。計劃、辦法都有了，最後當然還是要貫徹，「動員與組織幹部」予以落實。從調查到算賬到計劃再到落實，一系列組合拳下來，結果就是「為調度糧食所花的勞役，比去年減少三分之二——每一勞力一般在四次至六次之間，各村負擔並很平衡」。¹²³

5. 動員

討論中共的政策落實，動員是很難忽視的環節。動員在中共歷史的敘述中一直被高度推崇，十分引人注目。不過，中共革命的特點是環環相扣，單純講動員機制，並不一定能夠抓住中共革命的關鍵，有時可能還會形成簡單化、概念化的認知傾向，這是瞭解中共貫徹機制需要注意的問題。

興縣調查中講到的一個事例頗為意味深長：

123 向純：〈從四專區調糧工作裏看到的〉，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邊政導報編委會：《邊政往來》第2卷第8期，第24-26頁。

在自然村公民小組會上由區選工作團普遍的發動「田家會勝利慰勞運動」，在高家村3個公民小組會議上都提出來，結果一致碰著了老百姓的冷淡回答。最初我們還以為是老百姓不關心與吝嗇，事後在村代表自己召開的會議上面，他們不但踴躍募捐，其互相督促程度、對軍隊打勝仗後的心情都表現很好。¹²⁴

中共號召慰勞軍隊，開會動員時老百姓表現冷淡，可是真正到老百姓自己開會募捐時，卻相當熱情、踴躍，這裏面的反差值得注意。固然，不能由此簡單說，中共的動員沒有效果，事實上，老百姓自己開會時的熱烈態度既可能是出於對軍隊的信任，也是不斷展開政治灌輸和動員的結果。不過，不同會上老百姓態度的反差起碼顯示，如果不照顧民眾的情緒和感受，單純、過度的動員有可能適得其反。很多材料都顯示，中共的政治動員，只有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聯繫，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為動員區政權選舉召開的會，花了大半天時間，參會代表三三兩兩聚齊後：

由工作團石主任講話一個多鐘頭，其他馬區長、陳萍同志都趕來講了話。

馬區長說敵人來的消息還不要緊，要大家注意空舍清野(大家此時注意力集中)，不讓敵人來拿走一點東西，解釋了區選的目的。……

第二天，我們問一個趙家川口村幹部昨晚開什麼會？他第一個答覆是：「要空舍清野。」¹²⁵

此時，正值日軍「掃蕩」，根據地面臨危險，代表們關心如何在日軍「掃蕩」之下保存基本生活資料。儘管會議主題是區選，記得最牢的卻是順帶提到的空舍清野。當時「一般群眾對空舍清野都很注意，尤其

124 《「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第362頁。

125 《「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第360頁。

是1940年冬季掃蕩之後敵人燒殺的影響之下更加積極了，……群眾為了自己保衛他的財產不受損失大部分都有山洞窯洞，敵人未到之前都搬到山溝內去了。」¹²⁶

空舍清野的動員和群眾利益結合在一起，容易開展，但具體實施時，仍然會遇到問題。日本人離開後，有人趁亂先回村裏弄走藏好的資財，引起群眾很大不滿：

群眾是要迫切要求村政權能保護他們財產的，他們對被本村人拿走的部分感到異常憤懣，但他們仍不敢出頭來報政府處理。因為按行署規定破壞空舍清野是要槍斃的，他們不願為此來「拖命債」。……破壞空舍清野執行槍決這樣嚴刑是可以起保障戰爭中人民的財物作用，但因為過嚴了，一報就得殺人，老百姓誰都寧肯忍痛犧牲，不願沾下命債。這樣看來有了嚴刑沒有深入工作，也起不了更深入作用的。¹²⁷

上文傳遞了多元的歷史信息：空舍清野可以防止日本人搶走物資，但也有人趁機偷摸，佔取便宜，使百姓遭受損失。政府發現後嚴厲鎮壓，卻因過於嚴厲，民眾寧願自己吃虧也不願報告政府，怕沾命案。其實，這正是歷史的常態：政策再嚴密，也總會有意想不到的漏洞；雷霆萬鈞的鎮壓，固然有足夠的震懾力，卻也可能讓問題被強行壓住，形成隱患；空舍清野中的破壞，和日常中的偷摸行為類似，處以槍決顯然過於嚴厲，民眾寧願自己吃虧也不報告，就是對這種嚴刑的消極抵制。所以，中共說嚴刑必須和深入工作結合，也就是動員和威懾並用，只用其中一手顯然不是中共處理問題的典型方式。

具體到歷史情境中，可以發現動員和強制間常常構成相互牽制的多角關係。動員要盡可能和民眾利益結合，民眾的利益要求又是多面向的，中共追求的高效率想要實現，一定程度的強制無法避免。而由於中

126 《「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第215頁。

127 《「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第364頁。

共長期在幽暗的環境下成長，這種強制一旦在基層實施，就容易流於過激，損耗動員的效能。以此，糾正過度的強制，強化動員又會成為解決問題的途徑。強制和動員間的偏來擺去幾乎會貫串整個工作之始終。而且由於強制總是比動員更有效率，具體貫徹時常常會凌駕於動員之上，甚至有時動員成為強制的代名詞，比如中共批評：「工作上只忙於抗戰動員，而忽視了農民生活的改善，只向群眾要而不能滿足群眾要求，一味地動員兵動員錢動員糧……甚至有些地方則以動員物資多寡來測驗工作成績，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都成為空喊的口號。」¹²⁸這裏的動員基本上就可以理解為要求和命令，而不是中共動員話語中本來應有的深入工作、說服和勸導。

更多時候，中共的動員話語常常介於說服、勸導和要求、命令之間。這裏面既有理解上的問題，也有動員這個概念的多重性帶來的曖昧。動員本身就有多重理解，可以是以汲取資源為主的戰爭動員，也可以是調動並重組社會的社會動員，還可以是宣傳說服為主的政治動員。這幾種動員常常被混用，抗戰時期尤其如此。當時，談到動員時經常會理解成把國家機器轉入戰爭狀態、汲取資源的戰爭動員。比如1940年晉西北開展的擴兵、做軍鞋、獻金、獻糧的「四大動員」，主要就是戰爭動員。高魯日記記下動員的方式：

最初步的工作是調查，很重要。調查擴兵的對象，調查老財家白洋、紙幣、糧食各有多少。……

選擇好對象後馬上進行談話。根據其家有白洋糧食之多少而適當定出獻金獻糧的數目，說服他們自願地獻金獻糧。如果宣傳無效，就把所有的老財請到村公所，或請到縣裏吃飯，讓自願獻金獻糧的富戶當場表態，別的老財就不好意思不拿出來了。對於頑固不化的老財，最後的辦法就是在群眾大會上開展鬥爭。事先要

128 〈晉冀豫區農救總會二年來工作材料〉（1941年6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4卷，第406頁。

佈置好群眾大會。利用群眾的力量迫使他們獻出一定數目的錢糧。¹²⁹

既然是戰爭動員，必然具有相當的強制性，晉西北動員中的強制和鬥爭就是出於戰爭邏輯。

不過，如果只是講戰爭動員，只注意動員的強制一面，中共動員邏輯的特點就無由顯現。中共講動員時，特別重視的還是政治動員，動員是發動群眾和聯繫群眾的一種方式，周恩來說：「領導群眾的基本方法是說服，決不是命令。」¹³⁰毛澤東具體解釋道：

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其次，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佈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要聯繫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繫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¹³¹

毛澤東這裏講的動員是針對全國而言，是政治動員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具體落實時，還會與根據地的實際相結合。根據地的政治動員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動員宣傳內容一般說來：第一要防止宣傳的簡單化，在宣傳開大會演講中光講新四軍光榮，覺得討厭；第二要防止宣傳的一般化，講了上面的一套，沒有聯繫農村，沒有聯繫群眾具體生活；

129 《高魯日記》，1940年8月1日，第107頁。

130 周恩來：〈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周恩來選集》上，第131頁。

131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81頁。

第三防止政治化，強調政治原則，不聯繫群眾的具體生活。」¹³²這裏的動員既有原則，又特別強調要和老百姓的具體生活聯繫在一起，核心則是群眾參與。這是中共動員的理想狀態。成功的動員，可以收到這樣的效果：「在中央大軍雲集陽城之時，糧食卻發生很大問題，中央軍每天餓肚子，有時每天吃一次飯。而我們則用條子，則地方黨很快就動員下了。」¹³³

胡一川到地方實地參與工作時記下的一段日記，傳遞出中共貫徹自己意旨時的動員和命令交相影響的狀態，特別傳神：

我回到卅里鋪後幫忙組織科長在三叉〔岔〕路口攔沒有帶路條私自進城賣柴的老鄉，因為這種行動是妨礙開荒的。我也變為個檢查人員了，有路條的我就放他過去，沒有路條的就毫不客氣地攔下，有的我還認得他，前天參加過會，現在又私自違反紀律進城賣柴，這是明知故犯啊！沒有罰他已經很好了。有許多老鄉因沒有法子進城，那只好把柴賣在卅里鋪了，有些老鄉當被我們攔下時心裏非常不高興，有的說：「嘴裏說是為老百姓，其實是害老百姓。」我們都用一種為什麼要攔柴不讓進城的道理講給他們聽，在表面上雖然接受了，但心裏是不容易服氣的，這也是私人與集體問題的具體表現。有些老鄉把東西放下來以後坐在路旁，確實看到我們毫無私心地把所有無路條的人都攔下了，心裏漸漸服了。……有位老鄉……板著面空〔孔〕偷偷地罵一句，我問他罵誰，他說罵區長沒有通知。我問他：「你叫什麼名子〔字〕？哪一個村子的？」他的面色變了，連聲說：「我說錯了，以後不罵了。」¹³⁴

132 彭雪楓：〈淮北蘇皖邊區擴軍的經驗〉（1943年12月15日），《彭雪楓軍事文選》，第610頁。

133 高宗智：〈戰爭中的晉豫〉（1939年9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2卷，第577頁。

134 《紅色藝術現場——胡一川日記（1937-1949）》，1943年4月23日，第338-339頁。

這裏面既有命令，為了開荒不准進城賣柴，特許進城的需要拿出路條，這樣嚴格干預民眾的日常經濟生活，民眾難以理解可以想像。但是，當民眾發現這是對所有人的禁令時，他們卻也能接受。這是那個缺乏權利意識時代會有的現象，民眾更多要求的是一視同仁，至於這樣的一視同仁是不是合理，他們還講不出大道理。當有人抱怨時，一句報上名字，就足以形成震懾，這背後的強大控制力，又是民眾只能把期望值定在一視同仁上不可忽視的原因。另外，當掌握權力的是當地幹部而不是像胡一川這樣的外來幹部時，路條發放還極易衍生腐敗問題，通過控制路條發放，可控制村民的活動範圍，形成對村民的絕對管控，這種絕對性的權力難免導致權力尋租，「發路單受禮極多」¹³⁵ 幾乎難以避免。

中共展開政治動員，還有一套逐漸摸索出來的技巧。比如對群眾展開宣傳時，應該採取循序漸進的誘導方式：「1·深入群眾瞭解群眾，掌握了群眾脈搏的跳動。如第一組突擊那兩個農民代表的時候，說到自己的身世和他們的家境苦況，直感動得他們感激涕零。2·用了討論與啟發的方法，減少了冗長乾燥的宣傳，誘惑的帶問號，引起動機的娓娓談話，給了群眾以很大刺激。3·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由團體發現對象，由對象調出深談，得到了組織的收穫。」¹³⁶ 一般人遭受切身之痛時才會深切體會到不公，此時的宣傳最能打動人心，當時報告寫道：「講到群眾痛癢時，要予以深究回味的時間，使群眾討論。刺到群眾之痛楚，群眾一定會交頭接耳，一加討論就能激發其憤恨與情感。在宣傳中為使上下呼應，接〔結〕合雙方情感，在講到群眾之痛楚時，下面要先佈置積極分子，激發群眾的情感，使我宣傳鼓動者的情緒與下層密切結合。……喊口號時可以用引導辦法，利用催眠方式。」¹³⁷

135 〈蛇峰鄉黨與群眾運動的發展與消沉變化剖析〉，《鄒屏工作筆記》，第92頁。

136 齊玉：〈和順農代大會突擊工作的檢討〉（1937年11月），《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群眾運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頁。

137 張霖之：〈一年來的黨與群眾工作〉（1943年12月12日），《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上，第410頁。

站在被宣傳者的位置上，考慮他們的切身感受，這樣的宣傳最能達到目的。高魯記載了一個事例：

一個僱工秋天攬工回來，掙了10個月的辛苦錢。回家後就病倒了，直到把掙的錢全花光了，病才好了。他說：「掙來這些錢就掙來這些病，原因是窮人命苦。」一天，他將這事告訴了我們的同志。這同志不同意他的思想。「你病的原因與命沒有關係。你平常從地裏回來受了熱，吃的是冷飯，覺也睡不足，當然要生病。地主穿好吃飽，又不甚動彈，你說你們會不會生病呢？」這個僱工對我們同志的話雖然半信半疑，但他聽了這些話流淚了。¹³⁸

青年動員尤其受到中共重視，黃敬說得很形象：

農村中，真正支持民主的力量是青年和婦女。因為封建社會是以家長制為基礎的，青年和婦女在家長制中最無地位，故青年和婦女的走出家庭是農村中解放的可靠標誌。……青年唱幾個歌子，他們笑起來就走向共產主義，農民則非要吃幾布袋糧食不可。他們的興趣希望是不相同的，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要求、希望、看法不完全相同，各人有各人的道路。¹³⁹

戰時動員最困難的是徵兵，中共的徵兵動員頗可見出中共動員的特質。由於戰爭的殘酷環境，不願當兵是普遍心理，不同時段的材料都有關於部隊逃亡的記載。1938年，王恩茂講到嚴重的逃亡問題：「逃亡現象嚴重，兩個月減員2000人以上。」¹⁴⁰舒同的報告提到「整連整排整班逃跑，一支隊廣靈游擊隊一排叛變，靈丘九個隊叛變，十一大隊曾一部

138 《高魯日記》，1943年3月15日，第378-379頁。

139 〈黃敬同志關於領導問題的報告〉（1943年6月2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641-642頁。

140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1938年4月3日，第142頁。

叛變」。¹⁴¹ 1943年，景曉村日記記有：「部隊減員逃亡很嚴重。如某地兩個大連逃亡的一個連幾十個人，武裝削弱五分之二。」¹⁴² 這時正是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逃亡也最難控制。戰爭時期，很多問題都相互糾纏，景曉村提到：「部隊的生活的水平應與中農的生活水準（相當），高於中農便會腐化，便削弱戰鬥力，低於中農便難於鞏固部隊。」¹⁴³

逃兵多，需要招募兵員補充，招募時的問題，又會引發士兵逃亡，成為一個連環結。當年文件寫道：「動員往往是這樣，在幾個村聯合的，是大村捉小村，主村捉山莊，大家捉無能為的老實人。……在一個參軍大會上，報名參軍的一般都是我們動員佈置好的人，很少能有群眾跟隨。領導上用各種鼓勵方法，開大會歡送、送禮、披紅掛綠，以造成一種運動和一種參軍光榮，但實際上在廣大村級幹部與群眾思想上，並不認為是光榮，而認為是一種可怕荷重。」¹⁴⁴ 冀魯豫講到強迫徵兵的問題：「××縣擴軍先與地方支部同志配合，將支部同志的名字都寫上，後來便說這是我擴的新戰士，不然我怎樣知道你的名字呢？同志們不去便開始抓起逃兵來了，罰款，逃跑的逃跑。」¹⁴⁵ 這樣的狀況很難不影響隊伍的穩定。高魯日記記載了比較極端的徵兵案例：

秦福來，流氓地痞，性兇狠。曾參加犧盟會，在打頑固分子時趁機發財。下鄉騎著馬十分威風，對百姓說：「我是秦營長，來此動員新兵」，亂拿百姓的東西，晚上不睡覺讓百姓找來酒肉，找不到就綁起來。在動員新兵時誰不巴結他或不對他的勁，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綁起來。若是他看順眼的，巴結了他，家裏有幾個

141 舒同：〈幾個月來部隊工作的總結與今後工作方針〉（1938年4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1冊文獻選編（上），第147頁。

142 《景曉村日記》，1943年12月25日，第429頁。

143 《景曉村日記》，1944年1月，第629頁。

144 〈太行區九年來參軍的經過情況及其主要經驗教訓〉，《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7卷，第789頁。

145 〈五個月的工作報告〉（1940年3月1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二輯文獻部分（上），第165頁。

兒子也可不去當兵。秦在村裏亂攤派百姓，百姓害怕不得安生。平時在村口放哨，聽說秦來了青年人就逃跑。過年時百姓也不敢在家，跑到山溝裏躲藏。¹⁴⁶

隨著中共對鄉村控制力的不斷加強，根據地徵兵越來越強調群眾參與，盡力展開動員，宣傳為什麼要當兵。更重要的，群眾被直接納入決策過程：

過去習慣了用「抓字」「抽籤」派人當兵，現在組織游擊隊時各村長都企圖採用這個辦法，我們則堅持了群眾自願加入游擊隊的原則，同時根據此地群眾的覺悟程度，採取首先爭取個別自願的加入游擊隊，然而自動加入的不多，並且不是一天兩天可以使他自動加入的。但是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組織很多游擊隊，所以採取了群眾選舉的辦法來當游擊隊員。首先召集村一級負責人員會議，決定能夠當游擊隊員的人參加游擊隊，然後工作團去一個一個地解釋說服，召集群眾大會通過。¹⁴⁷

用群眾選舉代替抽籤，雖離自願仍有很大距離，但群眾的參與起碼讓更多人表示了態度，而不再是純然的旁觀者。按照中共自己的說法就是：「根據各區村人口，由縣區經過民主討論，合理的分配到村中。在行政村自然村中，經過人民代表會與自然村村國民大會民主的決定該誰去，這是否是強迫命令的？但實質是最民主最公道最合理的。誰逃跑了，還得由此二百人的代表中重新補去一人。這樣既可發揚人民的民主，又可避免村幹部與人民的對立。」¹⁴⁸ 徵兵時更多融入群眾意志，群眾擁有投票權的同時，事實上成為責任者，群眾和政權之間結成特殊的同盟，應徵者面對的將是一個隱然成形的鄉村共同體。

146 《高魯日記》，1940年3月10日，第89頁。

147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1938年7月20日，第222頁。

148 〈區黨委軍區關於擴大民兵游擊隊的指示〉（1942年6月27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8卷，第148頁。

中共希望的政治動員的主旨是說服，選舉應徵人員儘管有群眾參與的這一面，但對應徵者而言，卻又有不尊重個人意願的一面，和政治動員的本意多少有所抵牾。比如，上面提到的選舉兵員，在別的地方有可能作為不深入動員的案例受到批評：「各地擴兵工作中又發生許多公開的或變相的強迫命令，脫離群眾的問題。如四分區在村民中選舉當兵者，在三分區有在敵佔區捉人當兵者，有的向村攤數，或向其家屬鬥爭者，還有某些地方用小僱傭者。」¹⁴⁹這裏把選舉當兵和捉人當兵都當作強迫命令予以批評。細究起來，這樣的批評有充分的依據，選舉兵員本質上違背個人意志，只是將強迫命令以群眾意志的方式合理化了。不過，民眾在選舉兵員時，最有感觸的一是他們可以參與其中行使權力，二是在參與中體現公平。事實上，如果從中共的政治文化出發觀察選舉兵員這樣令人略感奇特的方式，可以看到其背後的邏輯：集體主義、效率優先、群眾路線，這三者的結合，才會出現選舉兵員，缺少了任何一點，都難以想像。所以，選舉兵員不簡單是個是非問題，而是中共政治文化和行為方式邏輯推演的結果，儘管中共對這樣的結果仍然不會滿意。

關於中共的政策貫徹，還有許多的面相，這裏只是攫取了可以形成長效機制的幾個方面展開討論，難免掛一漏萬。諸如一元化領導、三三制這樣具體的組織措施，即未涉及，事實上，針對這個話題，列舉再多方面也未必能夠窮盡，現在所做的，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而已。

149 〈擴兵應注意事項〉（1941年3月7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7卷，第156-157頁。

七、統一戰線的地方形態

陳賡日記中有一個故事，說的是部隊出征時的場景：

正當烏雲越壓越低，人們都預感著頃刻間將身無乾紗的時候，又發來一陣一陣的狂風，捲起的沙土觸面如刺，大家的眼睛都縮得僅留一線之光，我的眼鏡上時常受著沙石的襲擊刺刺有聲。陣陣狂風，雖使我們的呼吸更加短促緊張，但是卻驅走了壓頂的烏雲。這樣，兩次臨頭的大雨，兩次都藉著風力驅散。有些人說，今晚是馬克思在天有靈；又有些人說，是中山先生在天有靈，倒誘起了一場小小的辯論。¹

這一段最後的爭論很有意思。中共是共產主義政黨，祖師爺是馬克思，可是國共合作時期，起碼在理論上，承認中華民國的正當性，孫中山作為國父的地位也不可動搖。這就是抗戰時期統一戰線的張力。生活日常中統一戰線這樣的滲透所在多有，比如不甚起眼的河南密縣，就呈現戰時統一戰線地方因應的複雜狀態。

密縣，即今河南新密，抗戰前期，和鄭州、滎陽、新鄭等同屬河南第一行政區。1938年，中共在第一行政區設立地委，地委所在地不在這一地區的中心城市鄭州，而是設在密縣，密縣一時間成為中共河

1 《陳賡日記》，1938年7月21日，第121頁。

南黨的中心之一。這樣的局面，到1939年8月戛然而止，中共密縣地委遭破壞。

密縣地委被破獲，形勢陡然逆轉，抗戰前期一直在河南居於發展前列的中共密縣黨由此一蹶不振。密縣黨的起落，既是當時國共關係演變的產物，又有時、地、人多種因素的機緣。所謂時，密縣黨的成長，離不開統一戰線這樣一個大環境，遭遇挫折，也源於國民黨對中共政策的轉向，是統一戰線下中國政治所現張力的具體體現。所謂地，密縣地處河南，這裏國民黨中央的控制始終若即若離，地方力量有較為充分的運作空間；戰爭爆發後，又處於對日抵抗的前線，為中共運用抗日統一戰線求取發展提供了條件和可能，這實際也是河南多地共產黨發展的共同道路。所謂人，密縣中共組織的發展，和當地的國民黨黨部主事者有著直接關係，縣黨部書記長樊百全尤為重要，而這又是觀察國民黨特別是具體的國民黨員的理念與實際運作的一個切入點。

一般人都接受中國存在人情社會的說法：帝制中國，由於皇帝效忠和儒學修身兩個坐標的存在，人情這種次一級的忠誠還能被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民國時代，前述兩個坐標同時失效，人情成為失範狀態下政治、社會活動最重要的潤滑劑，放射到社會政治的各個角落。中共在密縣的活動，不難看到人情政治的影子，事實上，正是人情政治的普遍存在，給了中共在地方推動統一戰線的巨大空間。

1. 樊百全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密縣，樊百全可以說家喻戶曉，講述抗戰前後的密縣，不能不從樊百全講起。

民國時代，自治運動不絕如縷。自治運動既是近代以來民主憲政潮流的衍生品，又是中央和地方關係演變的產物。作為中央板塊和地方板塊交錯的地區，民國時期的河南既不像中央板塊那樣形成相對穩固的控制，也不像地方板塊那樣游離於中央權威之外，黃敬曾描述冀魯豫地

區為「中央勢力與地方勢力的結合部」，²這一描述用於整個河南同樣準確。和中央若即若離的關係，使這裏成為自治運動的高發地，別廷芳的宛西自治延續時間之長、影響之大、地域之廣均獨佔鰲頭。河南獨特的地緣關係，造就了像別廷芳這樣一批具有全國影響的地方強人，也使樊百全這樣的小地域強人可以在不那麼引人注目的環境中游刃有餘。

樊百全(1897-1960)，地主家庭出身，幼時家中「約有旱地二百八十畝」，縣立師範畢業。1927年4月加入國民黨，1928年春任密縣新農村指導員。此時，國民黨已經在南京、武漢相繼分共，民眾運動受到抑制，但是，時任國民黨密縣黨部書記長的張書印和樊百全卻在這裏展開社會運動，放足、剪辮子、扒神像，「樊鐵面無私，親戚家有人纏足，同樣處理，罰款加倍。」³時人回憶：「那幾年三天兩頭，總有一起到兩起，成千上萬人的隊伍，由全縣各區、鄉農協幹部領著，給土豪劣紳戴上高帽，繩捆索綁，打著旗幟，敲鑼打鼓，押著土劣，高呼口號，聲勢浩大地進到城來，不是遊行示眾，就是送縣法辦。」⁴這樣的場面，顯現1927年前國共開展國民革命時民眾運動的影子，這在南京政權牢固控制下的江南地區多少有些難以想像。

1927年後，河南屬馮玉祥的勢力範圍，馮在國共破裂的大背景下，雖然響應國民黨中央的分共政策，但手段明顯緩和，時任國民黨河南省黨部指導委員的鄧飛黃自稱「在省黨部也沒有危害過共產黨員」，⁵大致符合事實。馮對地方民眾運動的控制也不像南京中央那樣嚴緊，他強

2 〈邊區的形勢與任務——黃敬同志在區黨委高幹會上的報告〉(1942年12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368頁。

3 尹光明：〈回憶樊百全先生〉，《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中共密縣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1992年版，第164-165頁。

4 王東旭：〈我所知道的樊百全先生〉，《密縣文史資料》第1輯(紀念樊百全專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密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年版，第50頁。

5 《鄧飛黃自傳》，岳麓書社2012年版，第33頁。

調：「以黨治國，非以黨員治國，乃以黨義治國。」⁶ 儘管這樣的說法在當時國民黨內屬共識，但馮的堅持仍然意味深長，道出不欲南京方面假借中央一統天下的願望。

密縣的社會、經濟環境也為樊百全等展開農民運動提供一定助力。密縣處於鄭州為中心的經濟帶，京漢鐵路和隴海鐵路開通後，這一帶成為得風氣之先者，「貿易頗盛，為河南之冠」。社會風氣也迅速嬗變，年輕人「講愛情，住旅館，開房間」，「不難與上海並駕矣」。⁷ 然而，在鄭州經濟帶中，密縣的狀況卻不屬優良，清嘉慶年間的縣志稱：「密縣地瘠民貧。」⁸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調查材料也提到：「該縣遍地皆山，而南北尤甚，致可耕之田少，不毛之地多。」⁹ 相對貧瘠的自然條件，導致密縣無法做到自給自足，「豐收之年，糧食亦僅足供全縣人口八成之需」。¹⁰

和密縣農業生產很難滿足生活需要相對應，這裏的手工業和礦業較為發展。密縣的煤礦雖然不是富產區，但可以為當地民眾提供一定的出路，「農忙之餘，多兼苦力工作，如挖煤，駝〔馱〕煤、駝〔馱〕灰，每日至多賺一毛二毛」。¹¹ 另外，密縣的手工業在河南有相當地位，1935年的調查，密縣絲綢織造達到1,500匹，價值15,000元。¹² 手工業總值在

6 《馮玉祥日記》第2冊，1928年7月5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6頁。

7 〈日趨繁榮之鄭縣——本省社會調查之三〉，《河南政治月刊》第2卷第5期，1932年5月，調查第7-8頁。

8 《密縣志》，清嘉慶二十二年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58頁。

9 王子芳：〈視察密縣教育總報告〉，《河南教育月刊》第4卷第8期，1934年6月15日，第67頁。

10 常志箴：〈視察密縣等二十二縣災賑報告〉，《河南政治月刊》第7卷第8期，1937年8月，第3頁。

11 〈河南工委會關於城鄉群眾鬥爭及黨組織領導問題的報告〉（1933年10月28日），《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3年，第291頁。

12 〈河南省各縣手工業概況統計〉，河南省政府秘書處統計室編：《河南統計月報》第3卷第5期，1937年5月，第84頁。

當時河南110個縣中排名20。¹³ 正因此，1939年，河南省政府根據《縣各級組織綱要》將全省諸縣分為五等，密縣被劃為三等，在河南大體屬中等狀態。地處平漢線周邊帶來的相對便捷的交通和對外經濟聯繫的活躍，打開了密縣知識人乃至普通民眾的視野，比較的背景下形成的對自身與外部世界落差的認知，有利於改變現狀的呼籲落地生根，當樊百全等開展農民運動時，這些都成為現實和心理的基礎。

密縣農會的組織者張書印、樊百全均為富家子弟，這為他們在家鄉組織農民提供不少助力。從二十世紀中國農民發動的起源看，發動者的身份意義非同一般。無論是彭湃、沈定一之於海陸豐、蕭山衙前，還是方志敏、傅柏翠之於弋陽橫峰、閩西上杭，出身富家而又仗義疏財的革命者極易獲得民眾的衷心擁戴；貧窮的環境下，不滿和改變的期待自是革命的內在動力，富家子弟的聲望、號召力及仗義疏財的正當性又使革命被賦予了原始的合法性。樊百全走了和彭湃、沈定一等相似的路徑，¹⁴ 這是他能夠在當地形成號召力，享有農民信賴的重要原因。

1930年中原大戰後，河南政治形勢丕變。隨著馮玉祥戰敗，西北軍被迫退出河南，劉峙出任河南省主席，河南成為南京中央向北方地區伸展力量的橋頭堡。不過，有意思的是，儘管南京中央力圖加強對河南的控制，但河南的固有權力格局還是頑強地發揮作用。不像中共從組織到人事都一插到底，國民政府的地方控制既要面對縣自治這樣的地方治理原則，又無意也無力汲取充足資源包養龐大人員以緊密控制基層。作為外來力量，劉峙在河南的統治需要保持外省統治者與地方權力生態的平衡，承認政府對地方社會控制的有限性，藉助地方精英實現統治。正因此，無論是馮玉祥還是劉峙時代，河南地方社會均存有相當大的活動空間，別廷芳控制地區「在政治方面，是完全的封建獨裁。司令有無上

13 〈河南省各業手工業統計〉，河南省政府秘書處統計室編：《河南統計月報》第3卷第5期，1937年5月，第72-74頁。

14 樊百全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回憶，幼時家中有土地280畝，「但於三十年前賣掉僅剩二十九畝多」。其女認為，被地被賣掉的原因為「土匪訛詐以及我父親工作需要」。（〈樊百全自傳〉，《河南文史資料》第17輯，第62、73頁）

的威權，可以隨便槍殺人民。省府雖放有縣長，但除收稅而外，再沒有別的事情」。¹⁵ 在這樣的地區，能否有效利用政治社會的縫隙，往往就是地方勢力成敗的關鍵。當時，樊百全既參加改組派，又是劉峙暗中扶持的忠義會成員，他自己說得很直白：「中國的事情很複雜，國民黨復興社也好，CC也好，我們都要和他們搞關係。不然，他們就會直接在這裏發展他們的勢力。」¹⁶ 樊百全和中共也若即若離：「辦農民夜校，暗殺豪紳，幫助農民打官司，到處召集農民大會，時常找農民到農會或黨部去談話，故意裝出關心和優待農民的樣子，說他不反對紅軍，但一定等到紅軍來了後才可幹。」¹⁷ 中共作為不合法的反抗力量挑戰既有控制體系，這是本身也與政府權威展開博弈的樊百全樂意看到的，中共後來分析：「對樊百全來說，農會和共產黨的支持，是他成為最強有力的人物的根本，有了農會和共產黨的支持，土豪劣紳才望而生畏，不敢和他較量。」¹⁸

樊百全等的活動，某種程度上，既是傳統鄉紳這一地方力量的延續，同時，當樊百全等以國民黨黨部的面目出現時，又有黨作為政治正確的招牌。中共方面報告：「他的宣言中，農會的歌言中都是講到打倒貪官污吏，不繳捐款，他的領袖又是黃埔學生，小冊子印刷品上滿印有他們總理的遺囑。」¹⁹ 這很能顯示樊百全等從事活動的張力。國民黨的黨義治國，黨擁有名義上的最高權力，卻並不能在實際事務中落實，黨在縣一級這樣的行政梯級上地位就頗為尷尬，黨政互不統屬，黨又不擁

15 〈馮鼎三關於豫西南國民黨地方部隊情況的報告〉（1939年11月22日），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纂委員會編：《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223頁。

16 田建勳：〈樊百全傳〉，《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2集，第326頁。

17 〈河南（省委關於密縣工作的）總報告〉（1934年7月3日），《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45-46頁。

18 胡山：〈憶抗戰初期密縣黨組織〉，《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255頁。

19 〈中央巡視員抱一巡視河南報告第四號〉（1932年5月6日），《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1-1932年，第502-503頁。

有行政管理體系，實際處於超然的邊緣地位。不過，正因為不下廚房，長期受到改組派影響的河南國民黨，卻具有更多的理想主義色彩。當張書印、樊百全堅持打倒土豪劣紳的理念時，不至於和河南地方黨的整體氣氛相距太遠。

更進一步看，在河南乃至整個中國，樊百全等揭櫫的反對土豪劣紳話語並不僅僅是處於相對超然地位的黨的講述，也是實際執政的各級政權需要應對的問題。1933年，中共方面報告：

密縣目前有幾千人的農會組織，每區每鄉都有，口號是「二五減租」、「進稅」、「平均地權」。在組織上有每區之區幹事會，每鄉之鄉幹事會，時常開大會，區派人參加鄉幹事會，在鄉開會的討論某某豪紳不好，農會幹事即上縣報告，縣長即來提豪紳過堂，農會並不去參加，因此判罪的有很多豪紳。²⁰

可見，縣級政權並不一定充當豪紳的維護者。從當年的材料看，毋寧說，豪紳常常成為縣長的對手，河南一名縣長在從政感想中寫道：「土劣所憑藉者，即在藉民眾以挾制長官，若能注重宣傳，普遍講演保甲自衛之利益，使民眾與壯丁認為切己之事，自動辦理保甲，並加入編練，成為民眾武力，以土劣為對象，則政令更易推行矣。」²¹ 縣長把辦理保甲視為對付土劣的手段，之所以如此，和國民政府的基層治理大有關聯。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強化基層控制，但是沒有直接打通政權與民眾的聯繫，中間的聯結仍然需要依靠鄉村領袖完成。以此，地方精英獲得更多的權力和利益，如樊百全所說：

20 〈河南工委會報告第四十六號——關於密縣農會組織與群眾鬥爭〉（1933年7月22日），《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3年，第227-228頁。

21 〈各縣縣長函報從政感想摘要〉，《河南政治月刊》第4卷第7期，1934年7月，第7-8頁。

密縣過去和現在，有一種公認的習慣法，就是：「掌櫃的送地戶，（掌櫃的即地主，地戶即佃戶，送者，呈送於官署之謂也。）好比老子送兒」，如一呈送，「鴨子吃魚，屁股就要撅起來。王八打官司，場場輸」。（這是說，佃戶的屁股必挨打，每逢官司必定輸。）這種情形演至今日，更其顯明和嚴重。²²

不過，權利和義務通常都是相對應的，隨著國家需索的增加，地方精英也不得不承擔越來越繁重的資源攫取責任。鄉村領袖常常成為政權的出氣筒和責任的轉嫁方，徵收不理想時，地方精英會被懷疑和指責為截留中飽，而一旦政權遭遇橫徵暴斂的指責，地方精英也會被推出來承擔肆意加碼的責任。政權和地方精英相互利用又互為衝突的曖昧關係，研究者曾有精當的剖析：「地方精英有能力利用政府法律制度對抗地方官員，威脅官員的職位和利益。因此，像『土豪』和『劣紳』這樣的術語，不僅反映了公眾對其中一些有權勢的地方精英的看法，而且它亦揭示了地方精英與地方官員之間日益加深的緊張局勢。」²³ 正因為政權和地方精英間存在緊張的博弈，當樊百全等以反對土豪劣紳為號召時，這樣的話語倒是可以得到當權者相當程度的諒解。順著此一思路，或許不難理解，民國時期鋪天蓋地的對鄉保長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指責，後面的政府與民眾、事實與需要的共振。

1935年，河南政治形勢再變。日本策動華北自治，河南省政亦受到日本壓迫，劉峙作為南京中央力量代表被迫去職，出身地方實力派的商震接任河南省主席，河南省政脫出南京直接控制之外。商震在河南的控制力有限，不得不比劉峙予以地方力量以更大讓步，河南控制出現更大縫隙。在這一背景下，密縣發生樊百全領導的借糧事件。

1920、1930年代，河南中部接連大旱，這對地勢較高、灌溉不便的密縣影響尤大。1936、1937年大旱，密縣從1936年3月到1937年2

22 樊百全：〈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我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密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密縣文史資料》第1輯（紀念樊百全專輯），第34頁。

23 張信著，岳謙厚、張瑋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之演變——國家與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51頁。

月(缺6月數據)，降雨量只有126毫米，²⁴不及常年的五分之一。災民「初吃蕎麥花，花盡而吃樹葉，吃麥稈，吃肝子石」。²⁵到1937年春荒時，情形更加惡化：

樹葉樹皮已剝食淨盡，野草或將絕種，糠糜為地主之專糧，石頭為平民之食品。其因不堪饑餓，而自縊、投水、路斃者隨處可見。至於鬻妻賣女，公然論價，年少而略姣美者二三十元，其次十餘元、乃至四五元。……城廂人民之食糧，為稍摻麵粉之石餅，每餅一個需一百文。但食此餅者，其壽命最長可活三日。²⁶

面對嗷嗷待哺的饑民，1937年樊百全藉助農會，「在全縣範圍內發動震動全國的借糧事件，這個事件得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支持，僅岳村一帶即發動群眾五六千人，3天向地主借糧15萬公斤。」²⁷在民眾普遍食不果腹時，這樣的號召一呼百應，而且確也不乏正當性。密縣地主的狀況也使之成為可能。密縣不是地主勢力強盛地區，當年的調查顯示不僅是密縣，整個豫中地區都「多中小地主，大地主絕少」。²⁸李大釗的文章即提到密縣趙莊的地權狀況，該村65戶人家，按照李大釗的分類：富農無；中農共3戶，90畝2戶，61畝1戶；自耕農35戶；佃農17戶。²⁹自耕農佔多數的狀況不僅是趙莊，也是整個密縣的縮影。1930年代的調查顯示：密縣「無大地主，不過較有土地者佔百分之五，自耕農佔百

24 據《河南統計月報》第2卷第6期至第3卷第4期〈河南省各縣雨量統計表〉統計，1936年3月至5月降雨量分別為：1、22、27毫米，7月至1937年2月分別為：13、21、19、0、0、10、1、12毫米。

25 常志箴：〈視察密縣等二十二縣災賑報告〉，《河南政治月刊》第7卷第8期，第3頁。

26 〈陸伯鴻報告密縣災重〉，《申報》，1937年5月25日，第10版。

27 鄭州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鄭州市志》第8分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頁。

28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河南農村調查》，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4頁。

29 李大釗：〈土地與農民〉（1925年12月30日至1926年2月3日），《李大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0頁。原文所列戶數相加為55戶，文中富農、中農、自耕農對應後來中共的階級劃分應為地主、富農和貧農中農。

分之四十五，半自耕農佔百分之二十，佃農佔百分之七，僱農佔百分之二十三。」³⁰ 最關鍵的，和河南許多地區民間擁有大批槍支不同，密縣民間藏槍很少，中共方面談到：「此地的豪紳完全是地主他們的土地，有三四頃或一二頃，有的也自己耕種。武裝除了依靠軍閥城防大部隊外，沒有民團，只有少數槍支。……這樣的豪紳在全縣不過十餘家。」³¹ 密縣較為分散、弱小的地主和富戶結構及其武裝狀況，使有組織的饑民在借糧時，面對的是不那麼強大的對手。在當年縫隙四起、飄移不定的中國，對手方常常也是千差萬別，許多事業的成敗都源於此。

密縣的借糧不僅讓饑民得以維持最基本的生存，也讓樊百全獲得更高聲譽，強化了農民投身政治活動的信心。到抗戰爆發時，樊百全已經成為密縣民眾精神和事實上的領袖，而國民黨黨部書記長的職位更給了這種地位法理上的保障。樊百全的存在，讓中共在這裏開展統一戰線有了可以借力的抓手。

2. 戰時統一戰線的開展

抗戰開始後，全國政治形勢巨變，國共結成統一戰線。統一戰線讓中共實際上合法化，儘管這種合法仍未獲得法律意義上的授權，但在民國這樣一個政治規則經常曖昧、模糊，更多依賴政策操作的時代，就已經釋出了空間。³² 這就是毛澤東講的：

30 〈河南各縣社會調查(十四)密縣〉，《河南統計月報》第1卷第4期，第126頁。

31 〈河南省委關於密縣工作的報告〉(1934年7月3日)，《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4年，第263頁。

32 抗戰初期，劉少奇給冀豫晉省委寫信時說：「你們在山西已經不是完全的在野黨，軍事、政治、民眾運動以及各種政策法令等，你們都要過問，而且都應該負責；然而，你們在形式上和法律上都還是一個完全的在野黨，在法律上正式的、公開的政治地位，你們還沒有取得(這種情形，古今中外都沒有前例的)。」(〈劉少奇給朱瑞並冀豫晉省委的指示信〉(1938年8月18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334頁)河南的狀況和山西雖不盡相同，但劉提到的法律上沒有正式的公開、合法地位的判斷，是一致的。

中國雖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國家，人民沒有政治自由，……但是政府的法律、社會的習慣，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間隙、漏洞是可以被我們利用的。必須採取合法的能夠公開的各種各色的鬥爭形式，才有人來，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與解散，才能保全力量與積蓄力量。³³

中共文件談到抗戰初期的景況：「那時的客觀環境是很好的，市面上有很多公開的報章雜誌是可以隨便閱覽的，如《新華日報》、《群眾》、《解放》、《毛澤東自傳》、《朱德自傳》等。當然教育了很多的群眾和同志，宣傳教育工作上所以有些成績，主要是有這方面的影響。」³⁴ 合法化使中共的公開活動成為可能，在一個政治不透明、傳播能力有限、社會普遍存在正統心理的國家，這一空間的獲得意義非同尋常。當然，由於一黨治國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仍然是根本大法，中共合法空間的釋出沒有法令條規的明確支持，而是來自政策的彈性，不同時段、不同地區、不同環境中這種合法性的獲得可能截然不同，這一點，周恩來曾在共產國際發言時予以概括：「國民黨最重形式，同時亦常承認已成之事實，故於統一戰線寧願遷就許多事實，而不願假以名義。所以情況好時，統一戰線可以因事實的存在而發展；情況壞時，又可因不合法受到許多打擊。這正是中國的軍人政治官僚政治的特色，統一戰線也不能不受其影響。」³⁵ 在此背景下，中國傳統的人情關係常常可以發揮超出想像的作用。林彪在共產國際發言時介紹：在中國的環境下，個人關係具有很大的意義，「我們的財政工作者林祖涵，他同時又負責我軍武器裝備的供給工作，由於他曾是國民黨員，有一些熟人，現在他在自己的工作

33 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40頁。

34 〈張翼關於仁字地委的工作報告〉（1940年5月30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292-293頁。

35 〈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所作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1939年12月29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303頁。

中就獲得許多優待」。這些優待包括應發50萬子彈，可以領到100萬發，八路軍常常首先領到軍裝等。³⁶ 彭雪楓則發現，統戰的開展，「各級軍政首長親身與人往返聯絡、拜訪最為有效，給對方之良好印象更深」。³⁷ 具體到密縣，中共的發展和該縣出現的統一戰線機會也無法分開。

密縣的機會首先緣於整個河南省獨特的形勢。從商震主政河南到抗戰初期，河南多種政治力量共存局面一直持續：「復興社以開封綏靖公署主任劉峙為代表，CC派以國民黨省黨部特派員李宗黃為代表，隴海路上還有一套所謂特別黨部。」³⁸ 1938年初，商震卸任河南省主席，程潛繼任。和商震一樣，程潛也是地方實力派出身，與南京中央保持距離。程潛主持河南省政及第一戰區時，中共對第一戰區政治處「在政治上已可領導」，甚至不得不「竭力糾正政訓處工作同志與群眾中一種『左』的危險傾向，如空喊要用政訓處來統一全省民運，把黨的工作與政訓處工作相混淆等」。³⁹ 1939年，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兼河南省政府主席，衛與中共關係頗為密切，抗戰爆發後不久與朱德的會晤中，提到「想加入我們黨」，並暗示「以後形勢變化他希望通過中共得到蘇聯的支持」。⁴⁰ 中共從衛這裏「得到了3000枚手榴彈和30萬發子彈」。⁴¹ 1940年5月，朱德又赴洛陽與衛見面，朱致電毛澤東報告：「我們只有同衛弄

36 〈林彪在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1939年7月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184–185頁。

37 彭雪楓：〈豫皖蘇邊三年統戰工作之經驗教訓〉（1940年12月3日），《彭雪楓軍事文選》，第308頁。

38 吳平：〈河南省委的婦女工作和上層統戰工作〉，《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第331頁。

39 〈李遜關於武裝鬥爭、地方黨及統戰工作給長江局的報告〉（1938年4月26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63頁。

40 〈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0年11月26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9卷，第105–106頁。

41 〈林彪在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1939年7月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185頁。

好關係，注意實際配合，加強爭取，同時忠告衛，我們決不與他爭。」⁴² 國民黨情報部門向蔣介石報告雙方會談情形：「在過分的親密下，於垣曲會晤時，相談數日，衛長官表現對委員長信心動搖。」⁴³ 衛的傾向性一目瞭然。不僅是程潛、衛立煌，中共和蔣介石核心圈內的劉峙身邊人也有聯繫：「和劉峙的乾女兒石青（開封一個小學的校長）建立了關係，同她一起開展了發動婦女參加訓練班，慰問前方將士、醫院傷兵等工作，由於石青的參加，減少了特務對我們開展這些工作的阻力。」⁴⁴

像河南這樣中共軍事力量不強，而國民政府內部又存在著巨大縫隙的地區，統一戰線尤其偏於上層的統一戰線自然而然成為工作的重心。中共河南黨提出：「根據在河南的客觀情況，我們覺得要想收到實際的效益，利用各種掩蔽物是需要的，這就是經過他們的組織而執行我們的工作，亦即所謂迂迴路線問題。」⁴⁵ 經由合法的發展路徑，利用、參加各種群眾組織，宣傳、動員抗戰，取得社會乃至政權方面同情，可為自身爭取到保護傘。對於統一戰線中的人情政治，中共說得很直白：

統一戰線是互相幫隊互相發展，互相得到益處（嚴格站在抗戰、團結、進步的立場上），不是「只吃不屌」，有時，須要使對象先得益處，而自己得到的晚一點。……如果對象出了錢或者費了心（如講情，仲裁，領導開會，允許成立團體等），我們應該對他們以精神、名譽上以安慰（如登報、掛匾等），叫他們感覺到沒有白出力。⁴⁶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新編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962頁。

43 袁曉軒呈蔣中正縷陳過去衛立煌與奸偽接洽經過暨袁曉軒同衛立煌關係詳情，1942年3月5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104-00006-005，台北國史館藏。

44 吳平：〈河南省委的婦女工作和上層統戰工作〉，《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第331頁。

45 〈河南省委致豫西特委的指示信〉（1938年7月10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118頁。

46 〈張翼關於仁字地委的工作報告〉（1940年5月30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282頁。

中共河南黨對統一戰線的重視，下面一段話中體現得至為明顯：「省委向豫西黨建議，要求全黨更大的注意上層統戰工作，學習上層統戰的藝術。把統戰的教育作為黨的第一等重要教育，應當把王明等同志關於統戰的文章，自上而下的傳達到每個支部，提高統戰的紀律。」⁴⁷ 如果不是僅從人事或政治路線角度理解河南黨的這一立場，或可從中看到抗戰初期中共各地黨組織八仙過海的神通。上層統戰的確在河南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到1938年年中，河南黨黨員人數已經達到6,000多人，較之抗戰爆發前夕增加了5倍。⁴⁸ 這些組織初期「多半是通過了統一戰線的關係發展起來」。⁴⁹ 統戰對象相當廣泛：「第一戰區政訓處，洛陽、淮陽、鄭州三個專員區的專員，以及好些縣長，統一戰線已建立好，並有一些同志和群眾做縣長與區長。對於河南省政府及省黨部部分的統一戰線亦是有了一路。」⁵⁰ 中共在實踐中總結出一套爭取同情力量的具體步驟：「1、估計對方進步程度。對我方關係的深淺和缺點。2、找出每時期對方要求，幫助他解決困難。3、對畏縮的進步分子，從側面加深其困難，擠他靠近左邊，再從正面去解決他的困難。」

中共報告中，曾經談到爭取信陽縣長的過程，可以窺見統戰工作具體操作之一斑。信陽淪陷時，縣長李德純被認為「富於民族意識，充滿

47 〈河南省委致豫西特委的指示信〉（1938年7月10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93頁。這一時期的中共文件中，對統一戰線的堅持態度多很堅決，毛澤東在致朱德電中就表示：「部隊擴大甚快，槍、餉兩缺，與閻發生嚴重矛盾，亟應停止擴大，收回部隊駐在以外之八路工作人員，一切在統一與各部範圍內工作，一切須取得閻之同意。」（〈毛澤東關於必須堅持統一戰線政策的補充意見致朱德等電〉（1937年12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120頁）

48 朱理治：〈一年來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紀念朱理治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頁。

49 〈劉子久關於河南工作報告〉（1940年5月28日），《劉子久紀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頁。

50 〈河南省委致長江局綜合報告〉（1938年5月），《抗戰時期的竹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頁。

英雄欲望的人，不甘心落荒而逃」，⁵¹ 這正符合中共選擇統戰對象的目標：「不要管對方抗日的目的如何，我們可以利用升官主義及英雄主義來和他建立統一戰線，使他向抗日的道路前進。」⁵² 中共在抗戰的旗幟下和李接近，李接受中共方面的建議，共同開展信陽之游擊戰爭，中共地方武裝與李的部隊會合，統一實施改編。隨後，中共的強大組織力迅速顯現，整個部隊逐漸引向中共既定的軌道：「利用合法名義，創造實質的新四軍。這一計劃迅速實現，我們幹部取得縣府第一科長、挺進隊副司令、參謀長、政治部主任，李縣長是名義司令，一切工作均由我們主持，幹部配備妥當，按計劃進入戰區。」對李及其下的幹部，嚴格執行統戰工作的方式，盡力扶持並加以影響、轉變：

對李縣長方面，第一，解決他的困難，特別是在經濟上，開始打漢奸收集來的資財，交他統一分配；第二，一切意見得到他的同意，然後執行，或者作後的事情也報告他；第三，在行動中，群眾中擁護他；第四，不放鬆的設法教育他，給他各書籍看，從各方面表現我們誠意、有辦法。……對待中下層武裝小領袖，主要採取友好態度，為了達到歸服我們，壓制一下也可以。⁵³

這種經由「利害—思想—組織」爭取上層的統戰模式，在中共歷史上常常可以看到。

中共在密縣所處的第一行政區走的同樣是利用人情關係進行上層統戰的路子。戰前，第一行政區是河南經濟社會較為發展的地區，戰爭爆發後，隨著日軍迅速南下進到黃河北岸，這一帶又成為對日的前方，「不少縣長、區長都臨陣脫逃了！統制(治)力量薄弱得無法統制，如新鄭、洧川、長葛、尉氏、中牟等縣，廣大無組織無領導的群眾，由於三

51 危拱之：〈關於豫南武裝工作補充報告〉(1940年6月17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第95、113頁。

52 朱理治：〈一年來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紀念朱理治文集》，第137頁。

53 危拱之：〈關於豫南武裝工作補充報告〉(1940年6月17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第113-114頁。

面受敵嚴重的威脅，他們非常恐慌與不安，激憤的心情，急切要求領導和組織，地主豪紳、資本家們也暫時同意抗戰，甚而幫助抗戰了」。第一行政區專員羅震面對難局，不得不開放政治，努力尋求奧援。此時，中共挺身而出，得到包括羅震在內的許多地方官員的好感，「羅震專員在當時曾表示了相當的進步。各縣因為敵人的嚴重威脅，也開始吸收大批有為的青年，到行政機關中去，大的群眾性的宣傳鼓動工作、組織工作，在各地開始了。」⁵⁴

羅震，1923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後投入馬鴻逵部。1934年投奔保定軍校的學長劉峙，任南陽縣長。羅震之前，從1927年開始，南陽縣長任期從未超過1年，任期最短的僅有兩個月，⁵⁵而羅震在南陽縣長任內一任3年。抗戰爆發後，羅震調任第一行政區督察專員。羅震雖然和劉峙關係密切，但同情中共，1938年8月，中共一份報告明確定位他為同情派，鑒定曰：「是個復興社的人，但可用。」⁵⁶羅震對中共的同情態度，到1944年發展為與中共地下黨接觸，並於1948年策動河南省主席張軫起義，這是他比一般人走得更遠的一面。不過，抗戰初期，他對中共的開放立場，秉持的可以說是當時為政者的普遍做法：「抗戰爆發至一九三八年冬天以前，不論CC也好，不論是老法（指復興社——引者注）也好，不論是地方上其他的小派別也好，他們贊成抗戰，並且贊助抗戰。他們不但不妨礙我們的活動，他們還和我們在一起作救亡工作。」⁵⁷傳統中國政治通常表現就是處處留情，人情重於原則，在王朝崩潰、效忠對象缺失，而國民黨又很難提供中心信仰時，

54 紀西：〈密縣地委工作報告〉（1940年），《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55-56、48頁。

55 南陽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南陽縣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122頁。

56 〈陳冰岩關於河南政治形勢及幹部、群眾武裝情況的報告〉（1938年8月25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114頁。

57 〈邵文杰關於洛寧地委工作的綜合報告〉（1940年5月），《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336頁。

人情的衡量成為許多國民黨人的行為準則，何況此時國共雙方的確還有共同抗戰的基礎。

羅震的開放態度給了中共在鄭州地區發展的機會：「允許我們到各縣組織訓練民眾，在政治上經濟上援助我們」。⁵⁸而有一定的黨的基礎，統一戰線也有良好條件的密縣又成為中共在鄭州地區重新發展的首選。1938年初，中共陸續派遣黨員到密縣活動。9月，成立密縣中心縣委，負責領導鄭州周邊10個縣。12月，中心縣委改為地委。密縣這一地位的獲得，既緣於其地理條件：「密縣是鄭州地區的山區，我們準備在那裏開展游擊戰爭，地理條件比較理想」；更重要的，還在於其政治和社會環境：

作為地委，密縣群眾基礎比較好。自大革命以來，密縣的農民協會組織斷斷續續存在，只要革命形勢一到，就進行革命活動，同地主豪紳、國民黨政府作鬥爭，抗糧抗捐。密縣大部分貧下中農參加了農會，會員約萬人，密縣國民黨政府中滲透有不少共產黨員，權力基本被我們控制。⁵⁹

文件說到的群眾基礎，指的是戰前中共密縣黨的堅持運作。1934年初的報告說，中共密縣黨員共有81人。⁶⁰1934年10月，關於河南黨的報告談到，河南黨有黨員約1,250人，群眾約3,000人，其中密縣黨員約100人，群眾組織擁有300人。⁶¹從中可以看出戰前密縣黨在河南所具的舉足輕重地位。有這樣的基礎，一當環境變好，中共投入力量，密縣

58 紀西：〈密縣地委工作報告〉（1940年），《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55-56頁。

59 席國光：〈回憶一九三九年密縣地委〉，《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227頁。

60 〈河南省委某同志巡視新鄭縣、密縣的報告〉（1934年1月24日），《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4年，第41頁。

61 〈亞英關於河南黨組織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10月21日），《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1934年，第360-361頁。

黨迅速再起應在意料之中：「當時我們的工作中心不在鄭州，而在密縣。到三九年夏，密縣有三百多黨員，一萬多農會會員，主要在一，二，四區，三區的樊寨也有。」⁶²

無論是戰前還是戰時密縣黨的生存、發展，時任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的樊百全都是重要助力。戰前，中共對樊百全的態度頗為複雜，密縣實地工作的「很多同志以為他確是我們的人」，河南省委則從階級分析立場出發，認為樊百全是改組派，是革命兇惡的敵人，要「在政治上和日常生活中揭穿樊百全的欺騙與罪惡」。不過，落實到具體層面，密縣黨事實上不可能與樊百全這樣一個心存善意、且常施以援手的幫助力量決裂，上級指導機關也很難強令密縣地方黨組織執行他們的主張，只能表態：「對於樊百全的問題，給他們以很好的說服，具體的來佈置他們的日常工作，經常派人去巡視。」⁶³可見，即便被認為在階級關係上存在教條判斷的戰前中共黨內，政治中的人情因素仍會發揮微妙的影響，密縣黨和樊百全的合作關係始終或明或暗存在。

樊百全之外，密縣新任縣長陸建唐成為中共密縣黨發展新的推手。陸建唐1938年年中到任，和羅震一樣，他亟思有所作為，包容中共黨人並與之合作。按照中共的分析，陸建唐和羅震都屬劉峙系統，劉峙前方兵敗後，對河南的影響力進一步喪失，黨務系統被CC系滲透，羅震也離開第一行政區，陸建唐卻還留在這裏。中共方面觀察到：「羅震調職後，復興社在整個一行政區，幾乎全部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CC專政。……密縣縣長是一個復興社的根子（和我軍有聯繫），是一個進步縣長。」⁶⁴

62 席國光：〈回憶一九三九年密縣地委〉，《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228頁。

63 〈河南（省委關於密縣工作的）總報告〉（1934年7月3日），《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45—46頁。

64 紀西：〈密縣地委工作報告〉（1940年），《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49頁。

比之羅震，陸建唐和中共的關係更非同一般。陸是黃埔軍校七期畢業生，和國民革命時期投身革命陣營的許多青年人一樣，雖然他後來廁身南京政權，但青年時期接受的革命理想一直沒有喪失，與中共黨人思想上可以溝通。當年的密縣中共幹部回憶，陸建唐的妻子鄔勵賢和秘書南醒民都是共產黨員，「陸受共產黨的影響較大，思想比較進步」。陸建唐到密縣後，迅速「調整了基層行政人員。密縣當時有四個區，陸換了三個區長，十個高小校長換了九個。共產黨員受到重用。」不過，陸建唐這樣做，並不意味著他已經倒向中共，起碼在公開場合，可以看到的陸建唐是這樣的形象：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傳承於黃埔軍校)第七期畢業生，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他經常談三民主義，說，打日本鬼子是解決民族主義，保衛中華民族、不受外國侵略，打日本，老百姓一定要參加，一定要有權利，這是民權主義，有飯吃才能打仗，抗日才能救國，即解決民生主義問題。⁶⁵

國民黨不像中共那樣具有強烈的原則性和信仰排他傾向，國民黨人的觀念常常是兼容並蓄、不無含混，體現出來的就是人情重於理念、原則。

陸建唐出身黃埔，戰前任河南大學軍訓處長，在軍隊和政界有廣泛的人脈，離開密縣後，一度進入湯恩伯門下，成為「湯幕中有名的能員」。⁶⁶這和樊百全既參加過改組派，又在劉峙任河南省主席時，參加有劉峙烙印的「忠義會」異曲同工。1920年代以來，河南秘密會社興起，社會活動中，秘密會社幾乎成為不可或缺的角色。根據中共對平漢

65 司樹森：〈憶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黨在密縣的革命活動〉，《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237頁。

66 趙光潛：〈回憶大捷日報〉，《老城文史資料》第五輯，政協洛陽市老城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4年版，第30頁。1949年陸建唐作為中共地下黨奉命去台灣，做策反工作，於1950年在台灣東勢鎮友人家中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犧牲，友人被株連判刑五年。

路鄭州站的調查，這裏的工人有60%加入青幫。⁶⁷ 陸建唐處身河南，和幫會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是青紅幫在西安的西華山一脈的總管。⁶⁸ 陸的這種出身，使之和上下層都保持通聯，關係是人情政治下為官和任事的重要潤滑劑。

陸建唐的關係網的確使之可以放手做事，出任密縣縣長後起用中共黨員就是他敢於任事的一部分，中共黨員的獻身精神和辦事能力及態度可以滿足他的要求。同時，陸的作風和行動還與樊百全一拍即合，使之得到密縣最具實力的地方力量的支持，而和他起用共產黨人一樣，與樊百全結合也是施展縣政的一部分。作為對樊百全的支持，陸建唐十分「支持農運工作，他與妻子鄔勵賢在城南新莊辦過農訓班，甚至與農訓班一起操練」。⁶⁹

陸建唐的做法，鞏固了樊百全的地位，也大大拓展了中共的活動空間。中共很清楚，爭取縣長的支持，是統一戰線針對行政機關運作極為關鍵的一環，當時中共文件指出：

縣長是地方上的獨立單位，在抗戰中的作用也最大，如我們再得到幾個縣長，那根基更形鞏固了。有了縣長的行政上的權力，再配合民眾組織、訓練，武裝工作的積極推進，則未來的成就庶可期待。所以我們最近積極擴大此工作。⁷⁰

抗戰初期的河南，中共和不少縣份的縣級領導者建立了聯繫：「清豐縣書記長岳圖南、濮陽縣書記長王兆林，當時表示同情並參加抗日工作，都是事先經我們同意才去幹的，以後關於一些主要問題也與我們商

67 〈平漢路鄭州站鐵路調查表〉（1934年7月3日），《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種本）1927-1934年，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1984年版，第426頁。

68 李茹玲：〈青紅幫在鄭州的發展〉，《鄭州文史資料》第13輯，鄭州市文史資料委員會1993年版，第148頁。

69 司樹森：〈憶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黨在密縣的革命活動〉，《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237頁。

70 〈河南省委致豫西特委的指示信〉（1938年7月10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116頁。

議，再去執行。」⁷¹ 西華縣的縣長楚博，是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秘書長張漫萍妻子的堂弟，河南省委派張漫萍到西華擔任縣政府秘書，⁷² 一度使中共成為西華縣實際上的執政者：

在那裏看不見國民黨的活動，並且因為國民黨縣黨部委員王際平的貪污，我們曾發動群眾給以揭發與控告，押解到天水行營，再沒人敢在敵人威脅下到西華辦國民黨，國民黨部從此撤銷。財政機關也從此時轉入我們掌握。只有教育機關還保留在一部分國民黨〔員〕的手中。其所以如此，由於地方同志缺乏教育人才，且在敵情緊張下忽略了教育在抗戰中的作用使然也。⁷³

在密縣，通過和陸建唐、樊百全達成有效的聯盟，中共的統一戰線從上到下建構起圓滿的鏈條。統一戰線滲透全縣，樊百全的力量有些也化為中共掌握之下：「密縣農會原來多在樊百全控制之下，後來骨幹領導成員大部分成了我們的黨員，連他的警衛員司樹森也成了我們的縣委組織部長。一、二、四區的權力基本上被我們控制。縣政府一科長王東旭、一區區員尚寅賓、聯保主任李宗華，都是黨派進去的。」⁷⁴

3. 轉折

密縣中共組織大發展的局面發生轉折，始於陸建唐調離，而這又是抗戰開始後國共關係持續演變的結果。儘管允許中共公開活動，但國民

71 〈直南豫北工作報告(節錄)〉(1941年1月23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478頁。

72 參見于忠懷：〈抗戰初期西華縣的統戰工作〉，《張漫萍紀念文集》，蚌埠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等2007年版，第153頁。

73 〈劉道生關於豫東武裝工作的報告〉(1940年5月29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261頁。

74 席國光：〈回憶一九三九年密縣地委〉，《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229頁。

黨方面總有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心理，早在1938年7月，蔣介石就致電林蔚，要求查清中共豫西黨組織的詳情：「或用秘密、或用公開方式，由各該官長派得力人員作為慰問聯絡形式亦可。總須極其自然，勿使稍加懷疑為要。」⁷⁵ 蔣對中共的忌憚，昭然若揭。

1939年1月，國民黨中央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收緊對共政策，此後，各地對中共活動限制明顯加強。陳誠甚至認為，中共必須取消組織，「因凡有組織者，無不有磨擦衝突」。⁷⁶ 5月，蔣介石親下手令，指示：「豫西以北各地多有冀魯與東北青年及臨時學校，應注意招收訓練。又第一、第二、第八、第十各戰區，最好在西安設一政治部，派定所指揮考核以上各戰區之政治工作及代行政治職務。」⁷⁷ 河南成為國共爭奪青年的焦點之一。由於中共「密縣委工作的特別突出，其他地方非常落後」，⁷⁸ 單兵突進的形勢，自然引起國民黨方面對密縣的高度警覺。形勢的變化，樊百全顯然有所瞭解，中共幹部回憶：

一九三九年農曆正月初四，樊梢信叫我到他家去，他的兒子樊浩在家。他對我說：「我伯曾告訴我，『共產黨就是幹革命，你們要幹，最好到外縣去幹』。」我說：「我們什麼也不幹。」樊浩接著又說：「共產黨除死了不幹，只要不死就要幹。我伯說，你們還叫他在密縣吃這碗飯吧！」⁷⁹

75 蔣中正電林蔚令豫西等區軍事長官查報該區共黨主持人姓名地點實情，1938年7月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 002-010300-00014-005，台北國史館藏。

76 《陳誠先生日記》（一），1939年4月17日，台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228頁。

77 〈手諭招收訓練冀魯等省青年並囑胡宗南主持政治考核工作〉（1939年5月6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台北國史館2007年版，第383頁。

78 〈紀西關於密縣地委工作的綜合報告〉（1940年），《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468頁。

79 司樹森：〈憶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黨在密縣的革命活動〉，《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237頁。樊浩稱樊百全為「我伯」，緣於河南部分地區的風俗，家族中長子的兒女稱父親為「伯」。

1939年4月，密縣縣長陸建唐迫於壓力，提出辭職，很快得到批准。中共對陸建唐的辭職做出明確反應，希望挽留陸建唐，並拒絕新任命的縣長孟祥霖。中共地方黨很清楚，密縣統一戰線的局面和陸建唐的態度關係極大，這種通過人際關係運作的社會政治網絡，成敗往往繫於一身。

儘管中共的事後總結認為，面對全國形勢的變化，這時候恰當的應對方式應該是隱蔽力量，而不是繼續主動出擊，但是歷史現場中的人不可能像事後總結那樣洞察秋毫。有先前一系列成功經驗做基礎，中共地方黨決定以群眾運動的方式挽留陸建唐也在情理之中。相較共產黨積極挽留陸建唐的態度，樊百全的態度略顯消極。中共方面報告：「國民黨的一些進步分子東西搖擺，參加也不踴躍，因而形成鬥爭中力量的單薄與突出。」⁸⁰

樊百全態度曖昧，當然是基於自身的利益和判斷。和中共視陸建唐為統一戰線的重要依靠不同，樊更多將陸視為掌控縣政的同盟者，樊樂意在行政體系內和陸建唐保持合作，但當陸的調令已下時，並不熱心去對抗行政命令。合作者固然重要，但樊更願意在體制內活動，正如瞿同祖論述清代地方官和士紳關係時談到的，士紳和地方官的衝突，「應該解釋為同一權力集團或社會階級的內部的衝突，而不是兩個不同集團或階級間的衝突」。⁸¹ 樊百全一身數任，當他代表民眾反對行政機關及地方土劣時，擔負著追求正義的使命，正義化身的角色亦始終是他政治活動的訴求；然而隨著他逐漸躋身主流階層，從反對地方土劣一躍成為地方勢力代表，並掌握著縣黨部的法定權威，此時和縣長的合作抑或衝突，某種程度代表的則是地方黨部與行政官僚的折衝。他與行政權力間漸漸演變為博弈關係，此時，樊百全顯然更願意在程序內運作而不願冒挑戰程序的風險。

80 紀西：〈密縣地委工作報告〉（1940年），《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73頁。

81 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譯：《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頁。

有既往與無法合作的縣長交手的經驗，樊百全對縣長的更換的確不那麼敏感。從1927年設立縣長(原為縣知事)到陸建唐任縣長時，12年間，密縣經歷的縣長達12人之多，⁸²平均任期只有一年，換縣長對樊百全已經司空見慣。這些縣長中，樊百全和幾人都有交手，「告倒、告跑了反動縣長劉元、張國威、陳天煦等人」。⁸³從當年的記載看，告倒縣長陳天煦，樊百全並沒有直接出面，而是通過民眾告狀的方式把陳扳倒。先是1933年侯春生控告陳天煦「貪圖罰款非法濫押」，⁸⁴接著王仲玉、張青選等控告陳天煦「違法害民」、「玩法舞弊」，縣保安大隊附謝楚藩等則聯名呈報陳天煦「勾結把持」；⁸⁵1934年初，樊新民等再訴陳天煦「假名派款擅加苛捐」。⁸⁶劉峙在巡視河南時對陳曾有一個考語：「勤慎幹練，悃悃無華，廉節自持。事必躬親，惟顧慮太多，紳權滋重。」⁸⁷其中紳權滋重一句，點出陳天煦在密縣的力不從心。連續的告發，讓省政府在1934年決定調走陳天煦。

樊百全等與代表國家權力的縣長的爭鬥，之所以屢屢佔據上風，和戰前國民政府在河南的控制力有限有關，地方勢力是行政權力貫徹的依靠。儘管和傳統中國的知縣相比，縣長可以動用的組織、人力和物質資源都大大增加，但地方勢力仍是政府必須整合的力量。妥協和博弈是民國政治運行的重要特徵，面對行政權力和地方力量的衝突，政府更多選

82 〈民國時期歷任知事、縣長一覽表〉，密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密縣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頁。密縣這種更動狀況並非特例，1930至1934年間，江西更動縣長265人，平均任期328日；福建更動縣長289人，平均任期284日。（〈縣政調查統計·江西省〉，《內政調查統計表》第22期，1935年6月；〈縣政調查統計·福建省〉，《內政調查統計表》第21期，1935年5月）

83 田建勛：〈樊百全傳〉，《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2集，第321頁。

84 〈重要訴願事項〉，《河南民政月刊》第5期，1933年5月，統計第23頁。

85 〈函第一區專員公署，第704號〉（1933年10月12日），《河南民政月刊》第10期，1933年11月，重要公牘第12頁。

86 〈重要訴願事項〉，《河南民政月刊》第15期，1934年4月，統計第15頁。

87 〈河南三年來之吏治〉，《河南政治月刊》第4卷第7期，第6頁。

擇犧牲縣長，而不是向地方勢力下手。民國年間，縣長更替十分頻繁，告發縣長的案例屢見不鮮，僅1933年5月《河南民政月刊》登出的被控縣長就達到31人，⁸⁸而這份按月出版的刊物每期都有縣長被控的消息。河南省政府秘書處承認，他們「每月收到人民呈訴案件，約六百餘起，內有各縣長被控案約數十起」。⁸⁹縣長的位置可謂如履薄冰。

民國時期以實現縣自治作為訓政重要目標。在實踐層面，地方自治推行過程中，國家將為民眾謀利的建設內容擠壓到最小限度，物質資源的攫取成為國家政權建設的主要目標，當時代表官方言論的內政部指出：

自治之推行，端賴辦理自治人員之指導與扶助，故辦理自治人員必須與人民發生密切關係，以謀人民公共之福利為前提。但近年以來，辦理自治人員不明此意，為縣長者，不謀自治事業之發展，惟責成自治機關以募公債，徵捐稅，辦兵差，查人口等事務。⁹⁰

有意思的是，內政部批評的現象，正是劉峙在河南公開倡導的，他在全省行政會議上提出縣長的三個努力方向：地方自治、剿匪清鄉、籌款，⁹¹這三項任務實際落實下來，常態性的事務就是籌款。在河南，「區長們並不在那裏辦自治，主要的職務是派款，村長亦然」。⁹²地方政權空前嚴重的財政需索，造成政權和民眾關係愈益緊張，而一當發生事端，上級政權又無意為身處第一線的地方長官承擔責任，縣長的頻繁更替就發生於這樣的背景之中。

88 〈重要訴願事項〉，《河南民政月刊》第5期，1933年5月，統計第23-26頁。

89 劉燧昌：〈河南省政府秘書處最近工作概況〉，《河南政治月刊》第6卷第7期，第4頁。

90 〈內政部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報告書〉，趙如珩：《怎樣實施地方自治》，上海華通書局1934年版，第25-26頁。

91 劉峙：〈縣長的責任〉，《河南政治月刊》第2卷第8期，1932年8月，演詞第2-3頁。

92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河南省農村調查——調查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87頁。

利益考量也是民國時期縣長頻繁更換的另一誘因。按《縣組織法》，縣長任期3年，可連任，但這樣的案例鮮見。縣長選任大體沿襲傳統中國知縣的選任辦法，將備選人員列入名冊，「依次提請任用」。縣長作為稀缺資源，自然成為奔競之門。劉峙掌豫後，又把豫省各縣分為特別縣份、臨時特別縣份和普通縣份，特別縣份為殷繁之地，即所謂肥缺，臨時特別縣份是中共活動地區，這兩種地區縣長選任不依名冊，而是由「民政廳長秉承省政府主席察核該地情形，酌提相當人員委用」。⁹³ 這種做法擴大了省政府任用的機動權，壓縮了縣長正常任用的空間，造成資源的進一步緊缺。因此，加快縣長的輪換成為解決一大批縣長候選人等著任用的唯一辦法。

正因為有戰前縣長頻繁更替及施政軟弱的經驗，樊百全對陸建唐的離去並不是十分在意，何況，對中共主導的這樣一場挽留陸建唐的運動，樊百全也不想完全隨風起舞。畢竟，樊百全和中共之間，有共同利益，但目標並不完全一致，這就是他會規勸親近的共產黨人說：「鴻儀，我想不通，像世民、鳳樓，你們都是好孩子呀！我見到你們比見到我親兒子還高興，可為什麼你們要幹共產黨，難道我樊百全還不革命嗎？誰要是不革命，罵死他親娘。」⁹⁴

樊百全沒有想到的是，抗戰開始後，國民黨中央在河南的控制已經不同於戰前，「戰爭往往造就民族」，⁹⁵ 抗戰是中國民族國家獲得強化的機遇期，同時也讓國民黨最大限度強化控制的一面，成為中央權威藉此獲得伸展的關鍵期。如果說戰前國民黨的以黨治國是以黨義治國，戰爭開始後，國民黨更加注意強化黨的實質控制。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案》，確定調整黨政關係的三項原則：「一，中央採取以黨統政的形態；二，省及特別市採取黨政聯繫的形

93 《五年來河南政治總報告》，河南省政府秘書處1935年版，《民政》第2頁。

94 郭德華：〈進城探信和離密去洛〉，《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246頁。

95 方德萬著，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429頁。

態；三，縣採取黨政融化，即融黨與政的形態。」⁹⁶ 縣黨部書記長可以出席行政部門會議，並指導地方自治。1939年7月，蔣介石通令各地「縣科長以上之文官，必須以黨員充任。其未入黨者必須令其入黨宣誓」。⁹⁷ 黨對政權的滲透不斷加強。儘管國民黨強化政黨控制的措施由於與行政權力不無齟齬，深入勢頭受到限制，但發展方向還是指示著戰時國民黨的目標。

作為戰時戰略核心區，河南是這種權威伸展的主要著力點之一。戰爭爆發後，日本掣肘因素消除，河南戰略地位凸顯，所謂「得到了河南，北可控制冀、晉，南可制長江通巴蜀，東去皖、蘇，以通外洋。且有隴海、平漢兩鐵路橫縱貫通」。⁹⁸ 河南逐漸成為國軍駐紮的中心區之一。軍隊駐紮，加上戰時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的緊密結合，使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加強。隨著戰爭的深入推進，中日兩軍在前方形形成對峙，國民政府藉民族戰爭的正當性強化中央權力有了更好的環境，表現就是「加強了政權組織，打擊了士紳力量」。⁹⁹ 這一努力集中體現為1939年新縣制推出，這是戰時強化基層控制最重要的一項措施，代表之前的央地關係勢將重構。密縣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就是這種權力重組的一部分。

挽陸行動虎頭蛇尾，看到大勢已去，陸建唐選擇不辭而別，中共發動的挽陸運動無疾而終。新縣長孟祥霖微服上任後，開始強化控制。省裏派人協助：「省黨部專員公署為加強密縣統制，派省黨部特務王壽山常住密縣，並監視國民黨左派領袖樊百全先生的活動，有時和反動劣

96 榮孟源、孫彩霞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477頁。

97 蔣中正電示蔣鼎文朱紹良黃紹竑等各省縣科長以上文官須以黨員充任，1939年7月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10-300-025-004，台北國史館藏。

98 〈陳冰岩關於河南政治形勢及幹部、群眾武裝情況的報告〉（1938年8月25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110頁。

99 〈王國華關於豫南特委工作的談話記錄〉（1940年4月），《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227頁。

紳（國民黨縣黨部幹事之一）赴鄉視察農會工作（作特務去）。」孟祥霖本人也積極活動，「三番五次召集聯保主任與保長進行個別談話。許多平時貪污腐化為其收買利用了，還有一部分動搖的亦為其利用了，這一現象主要在四區和三區，四區區長成了新縣長主要的幫兇」。

孟祥霖一開始把爭奪的焦點對準樊百全，在政權、黨權、紳權的博弈中，以樊百全為主要對手是一個容易想到的選擇，正如孟祥霖在和聯保主任談話中瞭解到的，「贊成擁護樊派的聯保主任佔80%」，¹⁰⁰ 這些聯保主任很多就是由樊百全推薦擔任，這是樊百全能在密縣呼風喚雨的關鍵，也是孟祥霖控制密縣縣政的最大障礙。因此，起初「鬥爭的中心是縣長和樊百全。他們相互在群眾公開會議毀謗，並在暗地準備著」。¹⁰¹

中共在孟祥霖與樊百全的爭鬥中有限度地支持了樊百全。中共方面報告，在全縣聯保主任和保長訓練班上，樊百全主動出擊：

在課堂上加緊暴露新縣長的弱點。新縣長亦在課堂上公開的反對樊百全。當時樊百全由於政治文化水準的不高和講話技術的較差，使新縣長的反動言論相當在群眾中發生了一些影響。假使不是黨在下層不斷的揭穿和暴露新縣長的真面目，在公開場合的鬥爭中，樊百全的威信可能在群眾中受到損失。

中共這樣做，當然是出於雙方利益一致的判斷：「當時頑固派主要的進攻目標是縣黨部特派員兼河南省參議員樊百全。他們認為共產黨的主要人物就是樊百全，他們認為打擊了樊百全就可以控制密縣三十萬民眾不滿與激憤的情緒。」¹⁰²

100 紀西：〈密縣地委工作報告〉（1940年），《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76、79頁。

101 紀西：〈密縣地委工作報告〉（1940年），《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76頁。

102 〈紀西關於密縣地委工作的綜合報告〉（1940年），《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二），第484、481頁。

雙方僵持不下之際，密縣中共黨被破獲成為轉折點。1939年8月2日，密縣地委一個交通員被捕，交通員供出縣委組織部長，縣委組織部長在嚴刑之下叛變，破壞蔓延到全縣，總計被捕二十餘人。¹⁰³ 沒有確鑿資料可以證明這是孟祥霖有預謀的行動，但孟的確抓住機會把這一事件變成控制密縣縣政的突破口。隨著中共組織被破獲，孟祥霖及背後的國民黨政權進一步以「通共」罪名把矛頭指向樊百全。孟祥霖以「在縣黨部特派員樊百全室內檢出與異黨往來函件六種及樊百全親擬推〔摧〕毀各級政府計劃並進行路線」為由，將「樊在鄭州扣押」，「嗣由鄭將樊轉第一戰區軍法執行擬監部訊辦」。¹⁰⁴

民國歷史就是這樣，整個社會和政治關係總是運轉於人情政治和多種力量的博弈之中，森嚴的威權常常顯出曖昧的神態。戲劇性的反轉發生在第一戰區，包括樊百全在內送往第一戰區的被捕者不久均被釋放。當事人回憶：

十月二十九日，敵人將我們十一位同志押送洛陽……當晚住在登封，我對同志們說，在法庭上，我們的說法要一致，都說是為抗日救國而遭逮捕的。連審三次，我們都這樣說了，敵人無奈，只好讓我們寫下保結表示：「仍願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做救亡之工作，實行三民主義和抗日救國綱領。若有犯者，願受法律制裁」。這樣，敵人才釋放了我們。¹⁰⁵

這個回憶說到具結釋放，這是當時很多人會做出的選擇。1941年中共陝西黨的報告顯示，1939至1940年，陝西中共黨員被捕84人，被捕後情況不明者45人；有瞭解的39人中，政治立場堅定4人，變節動

103 紀西：〈密縣地委工作報告〉（1940年），《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80-81頁。

104 孟祥霖：〈報告〉（1940年4月9日），《密縣文史資料》第1輯，第137-138頁。

105 司樹森：〈憶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黨在密縣的革命活動〉，《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239頁。

搖35人，變節動搖者多數有自首行為。¹⁰⁶應該說，文件提到的變節動搖判斷稍過嚴厲。統一戰線大方向下，國民黨對捕捉的中共黨員不像十年內戰時期那樣嚴酷，密縣四區負責統戰工作的李培華被捕後「沒有受刑」，「沒有承認自己的關係，在監獄中生活上還好」，遭受刑訊逼供者主要是被強迫灌水。這樣的環境的確容易讓一些黨員在被捕後想到：「假使頑固分子叫我們寫自首書或悔過書，我們被逼不過，也可以寫，出去後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亦有益於革命。」¹⁰⁷不過，具體到密縣案，這些被捕的中共黨員包括樊百全之所以放出，自首又只是一個程序，更關鍵的還是後面的運作。時任密縣地委書記的席國光回憶：「三九年秋末冬初，劉少奇和徐海東同志從延安到竹溝去，路經洛陽，徐海東同衛立煌交涉把這些人要出來，一部分送新四軍，極少數回家。」¹⁰⁸第一戰區司令官衛立煌親自出面干預，才是此案得以順利解決的決定因素，這又是民國人情政治的體現。

樊百全獲釋後，回到密縣，旋即再遭逮捕。關於此，密縣縣政府的報告寫道：「中央黨部執行委員會秘書處來電，飭即勒送青年勞動營受訓。」¹⁰⁹可見這次逮捕行動是由中央黨部下令。此時，孟祥霖正在重慶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受訓，中央黨部的命令或和他的活動不無關係。隨後，孟祥霖又個人呈文，聲稱：「樊百全身為國民黨黨員，在全縣居於黨的領導地位。無論其是否參加共黨組織、或係庇護共黨分子。即擬摧毀各級政府計劃及進行路線，並予奉命傳送受訓，公然槍傷政府命官。似此叛黨叛國之行為，殊屬不法。」他要求「電飭第一戰區衛長官將該樊百全予以最嚴厲之處分」。¹¹⁰

106 〈共產黨在陝西〉(1941年)，《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41-1942，第312頁。

107 紀西：〈密縣地委工作報告〉(1940年)，《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82-83頁。

108 席國光：〈一九三九年密縣地委〉，《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集，第230頁。

109 〈密縣縣政府破獲反動案件經過〉(1940年3月3日)，《密縣文史資料》第1輯，第136頁。

110 孟祥霖：〈報告〉(1940年4月9日)，《密縣文史資料》第1輯，第137-138頁。

中共黨組織被破壞，樊百全被捕，中央政權對密縣的掌控終於可以落實。次年，密縣的賦稅報解即走在河南前列，核定成績80分以上，孟祥霖記大功一次。¹¹¹ 樊百全被捕後轉押西安，不久又逃脫回到河南。鄭州解放後，到市公安總局工作。1949年春隨軍南下。1958年8月被判刑入獄，1960年9月在蘆山縣苗溪病逝。樊百全和密縣的交集，隨著這裏中共黨組織的被破獲，基本已經結束。

民國時代，無論國民政府還是國民黨，都充斥著內部的諸多衝突。統一與分裂、民主與威權、傳統與現代，諸如此類的對立概念，常常集政治力量乃至政治人一身。訓政的事實和憲政的目標最能顯現觀念和現實的分裂，而這樣的分裂背後又是國家整合能力薄弱、整個社會價值觀游移的現實。密縣樊百全的生存，和這樣的現實就不無關係。樊百全既藉助主流話語，同時實際又顯示出價值觀的疏離；代表地方力量與行政權力博弈，但又和象徵傳統地方權力的土豪劣紳決裂；和中共相互借力，相當程度認同中共的理念，又以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捍衛者自命。樊百全可以說是集新舊兩個時代於一身。在一個政治暗弱、社會失範、價值混亂的漂移時代，曖昧的生存是主基調，秉持國民革命理念的樊百全，亦不脫時代烙上的印跡。

樊百全藉助民國時代的社會政治裂縫生存，1949年前，中共整個的發展史，同樣是在裂縫中尋求生存發展的歷史。密縣的故事再次證實了這一點。中共長期在裂縫中生存的經驗，使他們具有在幽暗中尋找光亮的銳敏，抗戰時期，無論是統一戰線的執行，還是人情政治的運用，中共都可謂爐火純青，在許多地區獲得了超常規的發展。統一戰線不僅帶來了影響的擴大，而且由於統一戰線是在穩定、公開的環境下展開，群眾基礎往往超過地下活動乃至戰爭環境下的根據地，統一戰線讓中共

111 〈河南省各縣縣長獎懲一覽表(二十九年度)〉，《河南省政府二十九年度行政總報告》，河南省政府秘書處1941年版，第18頁。

「脫離了過去窄狹的環境而與廣大的社會階層見面了」，¹¹²這是統一戰線的社會政治意義。密縣故事的前半段，可謂統一戰線輝煌的歷史。

然而，也不能不看到，統一戰線造就的成果畢竟有其策略和脆弱的一面，中共強調：

我們是單獨掌握部隊。我們雖然以統一戰線來衡量一切工作，但從未把隊伍看成統一戰線的組織，統戰只是形式，實際上是階級的隊伍。

共同領導的形式以麻痹資產階級推動抗戰是必要的，但從未看成是平分領導，從來反對非驢非馬的機會主義的辦法。

形式上是統一戰線的，實際上是階級的，這一點是不易進行了，但我們卻很策略地進行了工作。如對外進行統一戰線的宣傳工作，而對下層則進行階級教育，組織教育，沒有把形式立即改變（也從未計劃改變）。¹¹³

統一戰線的當事各方都有權宜的考慮，基礎並不牢固。比如，當國民黨改變政策，開始限制共產黨活動時，統一戰線的基礎迅速瓦解，先前獲得的活動空間和成果很快被掏空。這樣的事實證明，統一戰線的確給了中共發展的機會，但如果這樣的發展沒有和武力結合，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仍然不具有可持續性，這也是中共後來強調不能單純依靠統一戰線的背景之一。密縣故事的後半段，展示的正是統一戰線成果迅速消失的無奈。

不過，無論輝煌，還是無奈，很多時候，中共的選擇有其不得已之處；抗戰之初，像河南這樣中共力量不強的地區，依靠統一戰線實現迅速發展是中共能夠找到的現實路徑。實際上，相對國共兩黨高層的統一

112 〈羅瑞卿同志在北方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的政治工作報告〉（續完），《前線月刊》第7期，1941年1月。

113 〈決死隊的生長壯大與黨的領導〉，《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9卷，第255頁。

戰線，統一戰線的地方運作更有可操作性，也確實獲得了很多看得見的成果，儘管這些成果未必牢靠。中共總是循著效率優先的原則尋找各種可能的途徑，至於這些努力是不是盡如所願，則不是處身歷史現場的人們可以完全計及的，畢竟，革命需要精準的計算，也不可能沒有不計成敗的努力；不計成敗的努力，有時候正是中共這支政治力量能為人所不能為的關鍵。中共奪取政權的成長史，時時可以看到統一戰線或明或暗的影子，考慮到統一戰線對應著的是一個始終在追求統一的中國，這樣的堅持尤其意味深長：統一戰線希望實現多種力量的整合，而力量多歧，正是統一戰線可以大展宏圖的背景。這就是統一戰線的內在張力。

拋開個案成敗看，抗戰時期，統一戰線成為中共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提升了中共的適應力和滲透力。系統運作追求效率，常常呈現單一化傾向，失去糾錯功能；異質性的引入，對於系統運作實現信息反饋和回流非常重要。這或許是統一戰線對於中共革命系統的又一層意義。抗戰時期，中共的權力下探和群眾路線結合，權力運作更為柔軟；調查研究及數目字管理的興起，讓政策制定和貫徹更加切實；加之統一戰線帶來的彈性，政治系統空前多元，這可以說是中共最具活力的時代之一。多樣性和彈性的引入，形成無聲的滲透，讓戰時中共看起來更像流動的鐵水，柔軟不事聲張，卻陷堅挫銳、一往無前。

III

戰時中共的生存和抵抗

抗戰時期中共的幹部訓練和貫徹系統，是中共不斷發展壯大的基礎。沒有這樣的基礎，戰前處境艱難的中共不可能在戰時取得那樣巨大的發展。不過，抗戰畢竟是一場對外戰爭，中共的戰爭表現更決定著這個黨的未來。應該說，抗戰是全民族共同的事業，當年國民黨是執政黨，而中共則是擁有獨立武裝的政治力量，在抗戰的旗幟下，雙方成立統一戰線，共同抵禦外侮。在這場民族戰爭中，國共兩黨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43年，冀魯豫行署發佈的指示信中強調：「蔣委員長堅毅地領導了將近6年抗戰」，¹顯示時人乃至敵後根據地人們一段時間內的認知。

由於正面戰場的突出地位及影響，以及相對規範的作戰形式，正面戰場的作用較易於為人們認知。敵後戰場則由於非常規性、複雜性，講述比較困難。一些關於敵後戰場的研究刻意在戰爭規模、斃傷人數等問題上和正面戰場爭短長，反倒無法凸顯敵後戰場的獨特意義。中共敵後戰場之所以可貴，在於其獨特的戰爭形式，這是中共大膽的創造，套用普通的戰場形式講述敵後戰場，既無法講出這一個戰場的獨特性及其意義，而且常常畫虎不成反類犬，適得其反。

抗戰期間，以游擊戰、根據地為主要戰爭形式的敵後戰場，最重要的關鍵詞就是生存，生存是理解中共敵後戰場的鑰匙。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各國共產黨一樣，中共是一個自我期許極高、進取心極強的政黨，抗戰時期卻放下身段，無論政治、軍事還是社會政策都以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為目標。踏踏實實，不務虛名，堅持持久戰方針，不斷強

1 〈冀魯豫行署關於對敵開展四月政治攻勢的指示信〉（1943年4月2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553頁。

化根據地。通過黨政軍民的總體戰，形成有效的抵抗系統，從而打破日軍完全佔領的夢想，奠定自身在敵後的頑強生存。

生存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戰爭常常以毀滅對方為目標，在此背景下的生存更直接影響著戰爭的成敗。中共從生存到壯大，儘管最後不一定能夠獨力和日軍決一雌雄，但這一事實本身，已足以昭示其努力和頑強。

八、出師華北

1937年大規模戰爭爆發後，中共接受改編，迅速向華北出動。出兵後，堅持游擊戰方針，開闢、發展敵後根據地，撒豆為兵，力量擴散至整個華北。中共的這一決策，為日後在華北站穩腳跟、獲得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抗戰初期中共向華北廣大地區的積極出動，是改變此前局處西北一隅，資源、地域、影響力均受限制，生存、發展陷於困境的關鍵一步。

中共向華北出動後獲得的快速發展，和華北地區戰前的特殊局面，戰爭初期戰場形勢，中共成功的統一戰線及群眾政策密切相關，也和華北戰前及戰爭中的社會政治生態不無關聯。由於陝甘寧邊區和山西僅一河之隔，中共出動後，首先到達的地區是山西，而山西多山地的特點又和中共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若相契合。因此，中共向華北的發展，第一站就是山西。正是在山西，八路軍開始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初步實踐，力量向山西四面八方播撒，晉察冀、晉綏、晉冀豫這幾個抗戰時期中共最主要的根據地，或是主體即在山西，或是依託山西建立，不僅成為抗戰中中共的堡壘，也為戰後奪取政權儲備了人才和物質資源。

1. 戰前華北地區的國共兩黨

1937年前，國民政府名義上擁有對華北的行政權，實際控制力相當有限。中央直轄力量，除劉峙曾經於中原大戰後至1935年底出任河南省主席外，其他各省基本都在地方勢力手中。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牢牢控制轄區，國民政府難以措手。1935年華北事變後，日本逼迫南京中央力量出華北，河南省主席易為商震（1935年12月至1938年1月），商的力量開始壯大，河南形成中央和地方多種力量並存的狀態。河北自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長期處於馮系、晉系、奉系爭奪之下，政治生態異常複雜。國民黨的這種複雜性，中共中央有明確的解析：

國民黨的三個字，表面上似乎是代表全國的國民黨，存在著差異，就是南京內部各派別如馮玉祥派，藍衣社，少壯派，親日派，歐美派等等，亦存在著很大的分歧，至於國民黨的嫡系，與以加入國民黨為妥協條件的各部隊各機關，用名冊加入掛名的國民黨，和滿洲的以至華北的國民黨，與暫時在南京政府統治下的國民黨，更存在著實質上的不同。……這些差別與不同，正是我們決定策略的出發點。¹

閻錫山是民國史上的不倒翁，從辛亥革命後據有山西到1949年國民黨政權崩潰，一直掌握著對山西的控制權。中原大戰，閻錫山和馮玉祥、李宗仁聯合反蔣，閻任反蔣聯軍總司令，戰敗後馮玉祥西北軍土崩瓦解，閻錫山則潛往日本控制下的大連規避風頭，遙控山西政局。1931年8月，由日本人用飛機送回山西，隱居在故鄉五台河邊村（今屬定襄）。九一八事變後，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繼續名正言順統制山西。

北方的兩大實力派馮玉祥、閻錫山，相對而言，蔣介石對閻的戒備心理要小一些。閻基本以保住山西為目標，和馮玉祥逐鹿中原的雄心不

1 〈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北方局工作給劉少奇等的指示信〉（1936年8月5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第216-217頁。

可同日而語，蔣對閻錫山控制山西更容易取默認態度。1935年日本製造華北事變，驅逐南京中央勢力出華北，並引誘華北地方實力派為之所用，此時，閻錫山作為華北地方舉足輕重的人物，態度攸關全局。1935年10月，蔣介石專程飛赴太原爭取閻錫山，邀閻南下參加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與五全大會，得到閻的首肯。這一結果，有助穩住華北政局。蔣介石高度評價閻錫山南下出席國民黨五大：「百川到京表示共赴國難之決心，其晚節自勵，殊為可慰。」²

紅軍主力長征到達陝北後，由於陝北緊靠華北的地理位置，令華北局面再起波瀾。1936年春，紅軍渡過黃河東征山西，閻錫山晉軍難以抵擋，岌岌可危，中央軍大舉入晉援助山西。中央軍入晉，雖然解了閻錫山的燃眉之急，卻也開南京中央武裝力量直接進入山西之先河。不過，南京中央軍隊雖然滲透入山西，但山西政治和經濟大權仍牢牢控制在閻錫山手中，南京軍隊基本和當地社會隔絕，無法插手山西省政，山西與南京中央間若即若離。日本人觀察：

以閻錫山為中心上下級團結一致，為建設事業竭盡全力的認真勁頭，著實讓人欽佩。以往山西省堅持閻的門羅主義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被評為全國模範省，這種幹勁得到首肯。不難想像，如果沒有閻錫山，山西人如此拼命地努力恐怕不會有此碩果。但仔細觀察其實質和內容也會發現十年計劃並不是完美無缺的。……同蒲鐵路一類採用狹軌鋪設，導致省內運輸線路沒有交匯點，也無法連通省外各鐵路及平綏線。因此，不管是貨物運出還是輸入都需高額運費，……對於這種錯誤的指導建設設施的做法，我等實難諒解。³

2 蔣介石日記，1935年10月26日。

3 〈晉、綏、察三省視察報告書〉，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黑龍江省檔案館聯合編譯：《滿鐵調查》（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81頁。

河北自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長期處於馮系、晉系、奉系爭奪之下，政治生態異常複雜。1928年二次北伐後，閻錫山晉系控制平津和河北，第一任河北省主席商震雖生於河北保定，卻長期追隨閻錫山，是閻放在河北的一顆棋子。1929年，鑒於商震在河北省主席任上逐漸表現出獨立發展的意圖，閻錫山將商震調回山西，任命親信徐永昌為河北省主席。中原大戰後，東北軍入關，河北、平津成為東北軍的勢力範圍。王樹常、于學忠先後任河北省主席。華北事變期間，日本一方面壓迫南京中央力量出河北，同時逼迫原東北軍舊部于學忠離冀，1935年6月9日，日方向何應欽提出要求：1、河北省內一切黨部完全取消；2、撤退五十一軍；3、中央軍必須離開河北省境。⁴五十一軍即于學忠部。于學忠離開河北後，商震接任省主席。6月底，原駐察哈爾的宋哲元二十九軍得到日軍默許，開進平津地區，二十九軍成為平津地區最重要的軍事力量。

1935年，日軍策動宋哲元謀劃「華北自治」，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12月，國民政府任命宋哲元為河北省主席，商震調任河南省主席，張自忠為察哈爾省主席，蕭振瀛為天津市市長。加上先期任命秦德純為北平市市長，冀察平津二省二市皆為宋哲元二十九軍勢力範圍。由此河北形成以宋哲元西北軍老系統為主，加上原晉系殘餘，原東北軍舊部，以及小實力派如石友三等多種力量共存的局面。冀東則由日軍藉助偽自治政府間接控制。南京中央力量包括國民黨各級黨部均被逐出河北。此後，河北各地國民黨組織以秘密形式存在，比如滿城縣「縣黨部公開解散，但組織仍秘設於縣立簡易師範內，以各機關學校為掩護，進行黨務活動」，⁵在日本乃至地方勢力的擠壓下，苟延殘喘。

4 何應欽致蔣介石電，1935年6月9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680頁。

5 滿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滿城縣志》，中國建材出版社1997年版，第573頁。

實際上，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即便沒有日本的壓迫，國民黨在河北的活動也一直徘徊不前。二次北伐剛剛完成時，國民黨河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分14區調查全省139縣5市的黨務情況，調查結果，「共登記黨員二萬四千三百十一人，經省指委會複審合格者，二萬二千六百六十一人」。⁶到1932年11月，黨員人數為12,073人，不增反減。⁷

北伐勝利後，河南是馮玉祥的勢力範圍，馮部大將韓復榘任省主席。中原大戰後，劉峙出任河南省主席。河南成為戰前南京中央政府行政力量可以直接到達的地區。1935年12月，商震出任河南省主席，河南政治勢力重新洗牌，各種力量競相角逐：

在軍隊方面有所謂中央系，如部子舉的一六六師，楊渠統的一六七師，鞏、洛警備司令祝紹周的警備旅，上官雲相的一部（在豫南者不明），以及河南的保安團（人數約在兩萬以上，名義上總是地方部隊，實際上因為其首長多半是屬所謂老法的黃埔系，所以也應歸屬到中央系方面）；有所謂老西北系，如龐炳勳之一部，商震的一部及孫連仲之一部，以及最近開去的所謂東北系，內中更有所謂歸化了中央的東北系，如檀自新、沈克……以及所謂正牌的東北系如劉多荃、繆激流、吳克仁等部。在以上各系之間都有矛盾衝突，而最近厲害的恐怕還是東北軍與中央軍之間。⁸

河南形成以南京中央力量為主，各種地方力量佔地為王的局面。

山東在二次北伐後，一度被納入馮玉祥西北軍勢力範圍。前兩任山東省主席孫良誠和石敬亭都來自西北軍。1929年蔣馮戰爭後，南京中央控制山東，任命陳調元為山東省主席。1930年中原大戰行將結束時，韓復榘出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出身西北軍，但1929年蔣馮戰爭

6 〈全國辦理總登記概況〉，《申報》，1928年12月16日。

7 〈戰前國民黨黨員的地域分佈〉，轉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頁。

8 〈趙振聲關於河南形勢與黨的中心任務的意見〉（1937年5月11日），《劉子久紀念文集》，第122頁。

時叛馮。韓任山東省主席後，與南京保持半獨立狀態，圍繞著山東的控制權，與南京中央不斷明爭暗鬥，中共的調查發現：「曾有一時期，復興社的文件上，把韓復榘當作一個主要的反對對象，把我黨放在次要地位，所以韓形式上雖然敷衍中央的統一，但骨頭裏對國民黨仍是極端痛恨並百般限制的。」為此，「抗戰前一年韓復榘竟公然取消其縣黨部，以經費困難為名，把他們的經費也停發了。」⁹景曉村也注意到：「山東國民黨在戰前，也同樣的是在地方軍閥限制下的黨。因此，山東國民黨的鬥爭首先在於推翻韓復榘的政權，使山東中央化。而韓復榘也是多方對國民黨壓迫，直至後來把國民黨黨部解散。……國民黨在山東，不管戰前戰後，並未真正在山東佔到完全的統治地位，所以他的發展上就受了限制。」¹⁰

戰前華北數省和南京中央的相對獨立狀態，大大限制了國民黨中央力量在華北的發展，南京國民政府從未完成對華北地區的控制，國民黨中央在華北無論政權、黨還是軍隊的力量都很弱小。這一點，對理解華北地區的政治和社會生態關係重大。

南京中央力量的弱小，相對而言，給了中共更加有利的發展空間；戰前的華北，中共地下黨的發展呈現和東南地區並不完全一樣的軌跡。

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後，中共開始在各地組織武裝暴動，華北地區先後有中共組織的河北玉田暴動，山東陽谷暴動、高唐暴動，河南豫東暴動等。1931年後，由於南京政府統治的加強及對蘇區的「圍剿」，中共在東南地區的生存遇到嚴重危機，城市組織被大面積破壞，農村蘇維埃區域也相繼被佔領，與此同時，北方中共黨組織雖不斷遭到破壞，但處境相對要好一些。

1931年前後，當江浙滬地區地下黨遭到毀滅性打擊時，山東地下黨卻仍有發展。中共山東省委領導的各地黨組織有青島、煙台市委，濰

9 〈中共山東分局：對山東國民黨的調查研究〉（1943年12月1日），山東省檔案館 G001-01-0080-015。

10 〈景曉村日記〉，1943年6月17日，第109頁。

縣、益都特委，壽光、廣饒縣委等，1931年2月，黨員人數達到390人。此後，省委組織及地方組織迭遭破壞，但各地黨組織仍頑強生存。1933年初，黨員人數發展到五六百人。¹¹

1933年底，中共山東臨時省委和全省多數地方黨組織遭到大破壞，此後一段時間內，省委未再重建，但各地黨組織仍堅持活動。發展最好的是青島及膠東地區，1934年8月的報告，僅膠東地區黨員數就達千人左右，¹²為戰前山東地下黨最為鼎盛的時期。此後，又經歷大破壞，1935年底，全省有組織聯繫的黨團員尚存500餘人。除青島、膠東外，魯東、魯西、魯北、魯南、蘇魯邊及濟南地區都有中共黨組織的活動。特別是膠東，1935年11月29日，中共甚至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武裝暴動，雖遭鎮壓，仍然顯示了中共在山東不俗的動員能力。1935年底，經過趙健民的努力，山東黨組織與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聯繫。隨後北方局決定重建中共山東省委，中共山東黨進入重新發展時期。抗戰爆發時，全省黨員發展到2,000餘人。¹³

戰前中共在河南只有黨員百名左右，是冀魯豫三省中黨員人數最少的。1935年春，中共河南黨組織遭破壞。1936年7月，中共北方局派遣的幹部沈東平在許昌主持成立中共河南省臨時工作委員會，著手恢復河南黨組織。省臨時工委成立後，派郭曉棠到開封、鄭州建立中共開封黨支部及鄭屬工委。8月下旬，郭曉棠和陳秀琴到洛陽恢復和開展豫西工作，成立中共洛陽支部。10月，在洛陽支部基礎上，成立中共豫西臨時工委。同月，省臨時工委在西華縣建立中共豫東特委。1937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決定成立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員會，由劉子久、沈東平、吳芝圃三人組成，書記劉子久。

11 參見權恩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山東地方黨組織〉（續完），《理論學刊》1984年第4期。

12 膠東特委：〈關於膠東的報告〉（1934年8月21日），《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第7集，中央檔案館、山東省檔案館1995年版，第271-287頁。

13 申春生：《山東抗日根據地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頁。

1937年上半年，中共河南黨的大致狀況是：「①數量。最近連恢復舊的組織關係及新介紹的共有95個同志；②單位。按縣說，共有15縣。按機關說有12個中學，有7個完全小學（即高初兩級小學），工廠沒有，農村不詳，③成份。知識分子佔80%，農民20%，工人無；④性別。男90%，女10%。⑤幹部。能夠擔任一縣及一部分工作者有15人。」¹⁴河南的這種狀況，和這裏是南京中央相對穩固控制地區，對中共打擊力度較大相關。

河北是北方地區戰前中共相對較為發展的地區。1932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定特委領導發動高蠡暴動，暴動後組建了第一游擊大隊，雖然只堅持四天即告失敗，但在北方地區形成很大震動。1934年5月，經過多次破壞後，河北省黨員人數仍然達到1,600人，省委及各地黨組織堅持活動。省委書記高文華、賈璉夫婦甚至賣掉他們唯一的男孩，換取活動經費。

包括直南在內的冀魯豫地區黨一直頑強堅持，路徑大致如下：

一九三三年領導有災民（水災）分糧運動，即有名之「小丘暴動」，當時有支部九十九個，黨員兩千餘人。……

一九三四年乘會門暴動，又發動了大名的游擊戰爭。到一九三五年在濮陽、滑縣、內黃發動了四縣邊區的游擊戰爭。這時黨的主張及口號分糧吃大戶、抗捐抗稅、發動游擊戰爭，組織了數百人數十支槍的游擊隊，終被統治階級摧殘鎮壓而失敗了。

……一九三六年初，直南、豫北黨員發展到兩千餘人，於一九三六年直南特委領導機關被破壞，負責同志多數被捕，黨的工作陷入消沉和停滯狀態，許多黨員不做工作了，黨員人數也大大減少，在七七事變開始，黨員減至四百餘人。¹⁵

14 〈趙振聲關於組織、宣傳和群眾鬥爭情況的報告〉（1937年5月3日），《劉子久紀念文集》，第114頁。

15 〈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略〉（1944年），《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一，第68頁。

和直南在1936年陷入消沉不同，河北省委下屬的京東特委、津南特委、保屬特委、直中特委在這一時期或充實力量，或重新組建，呈現較好的發展勢頭。據不完全的統計，到盧溝橋事變前，冀中地區有黨團員800餘人，京東地區有黨員460餘人，衡水地區有黨員1,300人，邢台、邯鄲地區有黨員300餘人。¹⁶ 戰前山東黨和河北黨的頑強生存，是抗戰爆發後中共能夠迅速在這些地區崛起的重要前因。

1936年紅軍東征回撤後，山西的閻錫山和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一樣，選擇與中共來往，試圖通過共產黨力量的引入，抵消南京中央的影響，同時向他認為的中共背後的蘇聯暗送秋波。1936年5月和8月，閻錫山兩度與有中共背景的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華北辦事處主任朱蘊山見面，同意與中共合作，「成立一個以抗日為宗旨的山西自己的獨立的群眾團體」。¹⁷ 9月，薄一波等中共黨人由北平監獄釋放後，參加由閻錫山任會長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實際主持會務，有效實現對山西政治、社會、地方民眾的影響。¹⁸ 由於有來自閻錫山省政方面的支持，加上中共黨人的大力推動，犧盟會迅速覆蓋整個山西，成為山西最大的一個群眾團體，如報告所言：「犧盟是二戰區群眾運動的組織者與領導者，……全山西所有的民眾救亡團體——農救、工救、婦救、青救、

16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91頁。

17 田酉如：〈中國共產黨在山西創建根據地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第29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頁。

18 薄一波等根據中共指示，刊登反共聲明、履行出獄手續對閻錫山可謂天賜良機，他可以由此找到「不以共產黨員的面貌出現，而是以山西抗敵救亡活動家、組織家的面貌出現，採取共產黨的進步措施和主張，但在提法上要換成『山西話』，組織上戴閻錫山的『帽子』即官辦團體的『帽子』；藉助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做法，但又打著山西的旗號」的幹部幫他擴充實力，應付危機，渡過難關，這樣「既可頂住蔣介石吞併他的企圖，又可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實力；既可同共產黨搞好關係，又可在合作中交一些共產黨朋友，藉以提高自己的身價」。（薄一波：《七十年的奮鬥與思考》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頁）

文教——統統是在犧盟的支持之下，犧盟的活動，像一根紅線似的貫穿在各個救亡團體中間。」¹⁹ 犧盟會橫的發展可以牽起山西各團體和組織，縱向則直接扎進縣鄉基層：「全山西每個縣犧盟的民運幹部至少有30至50人，從犧盟的特派員以至各種群眾組織的幹部。」²⁰

與薄一波等參加犧盟會幾乎同時，1936年秋，彭雪楓去太原，代表中共與閻錫山直接聯絡。雙方聯絡的收穫，根據1937年初彭雪楓給中央的報告：

閻近來的言論，對於「守太抗戰」「打倒漢奸」「訓練民眾」等都在努力做著。對於「防共」「反共」的宣傳，似乎較昔斂跡一些了。今年山西的「新年對聯」在「防共」方面就絕對的少了。在談話中知閻對於蘇聯近年的政策和設施非常欽佩，尤其讚嘆的是出賣中東路及加入國聯，說是斯大林及第三國際的敏銳遠大眼光之證明。又據梁談，有一知者絕少之故事，即閻於寧漢分家後與武漢政府曾有密切之來往及軍事計劃云。²¹

透露當年寧漢分裂時站在蔣介石對立面的故事，折射出閻錫山內心對南京中央的提防，這樣的思路，也是抗戰爆發後閻和中共合作的重要基礎。

2. 華北的社會組織和中共的應對

華北作為一個整體逐漸被認知，始於近代中西接觸之後。據考

19 薄一波：〈犧盟究竟是怎樣一個組織〉（1938年），《論犧盟會和決死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頁。

20 薄一波：〈論犧牲救國同盟會〉（1939年9月），《論犧盟會和決死隊》，第281頁。

21 〈太原統戰工作情況〉（1937年2月23日），《彭雪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

證，「華北」一詞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末。²²此時所說的華北更接近於英文中的North China，即北中國，範圍包括整個中國北方地區。此後，由於西北等概念的出現，華北逐漸演化為黃河以東、以北地區的專稱。比如1924年第三屆全國運動會的文件中這樣表述獎項的區域分配：「一，滿洲；二，華北(直、魯、晉、豫)；三，華西(陝、鄂、湘、川)；四，華東(蘇、浙、贛、皖)；五，華南(閩、桂、粵、貴、滇、香港)。」²³這樣的劃分，已經形成後來認知的雛形。1928年綏遠、察哈爾設省後，通常也歸入華北範圍。故當年講的華北，大體是指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及綏遠、察哈爾等地。1937年出版的《我們的華北》說：

我們習慣所稱的華北，是指黃河流域的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省而言。有時候亦將綏遠、察哈爾、寧夏、甘肅歸入華北。總之並沒有確定的什麼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區分。

這五年來，華北這個名詞所包含的省份，漸漸確定了。這正和五年前確定東北有哪幾個省份一樣。這是我們國家的幸呢？還是不幸呢？

九一八奪到了東北三省兼熱河，東北的名稱不再在「友邦」口中出現了。而現在是華北。

華北是哪幾省呢？按日本所要求的「華北自治」而言，是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

……

我們若升上同溫層來俯瞰這五省，先會看到「東至海，西至流沙」的斜傾大平原。平原上有陰山及黃河包圍橫貫著。這北山南水的

22 張利民：〈「華北」考〉，《史學月刊》2006年第4期；姚焱超：〈近代「華北」概念的傳承演變與時代認知——以報刊資料為中心的考察〉，《福建論壇》2020年第4期。

23 〈全國運動會新訊〉，《申報》，1924年3月2日，第14版。這條材料為姚焱超〈近代「華北」概念的傳承演變與時代認知——以報刊資料為中心的考察〉（《福建論壇》2020年第4期）首先引用。

一幅斜傾地，正據在克里塞氏 (Cressay) 定名的華北平原區、黃土高原區及魯熱遼東山地區的中心。²⁴

華北地區地域廣大、資源豐富，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華北在中國的地位，當年楊尚昆有過論述：「華北五省是很富庶的區域，各種資源寶藏極多，五省面積共約258萬方里，佔全國20% (原文如此——引者注)。人口共約9000萬，約佔全國五分之一。」²⁵ 東北淪陷後，華北地當日軍進一步入侵中國的要衝，北平又是六朝古都，政治地位十分重要。

中國歷史上，華北地區長期佔據著中心地位。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華北地位發生重大改變，1931年公佈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明定首都為南京。首都的遷移，使已經成為經濟中心的南方地區，又佔據政治中心，加大了中國南北不平衡的局面。

當時的人們大概很難想像這次首都南移的決策，會對之後的歷史進程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蔣介石合力馮玉祥、閻錫山完成「二次北伐」，北方的軍政大權實際掌握在馮、閻及其他地方實力派手裏，蔣介石定都南京，有其不得不然之理。然而，就國防言，這或許是致命的隱患。歷史上，中國的外患多來自北方，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這樣的局面也未改變。日本的崛起及殖民朝鮮，覬覦中國東北、華北，尤其加劇了北方地區的危險。北方形勢如此，新政權卻把首都放在南京，整個國防頓有失卻重心之感。

定都南京以及北方國防問題，看起來是出於國民政府的決策，根子則在當年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直到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前，北方地區其實都不在南京國民政府真正控制之下。即便中原大戰結束，馮閻下野，南京國民政府也未能完全控制華北。山東、山西還在地方實力派手中，北平則交給了宣佈入關的張學良。這樣的局勢，的確很難讓國民政府下決心定都北方。當北方的許多普通人為失去首都地位而失落時、

24 金曼輝：《我們的華北》，上海雜誌無限公司1937年版，第71-72頁。

25 楊尚昆：〈鞏固抗日根據地及其各種基本政策〉(1940年8月)，《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頁。

可能沒有意識到，如果國民政府定都北方，在諸多實力派看來，即意味著南京要向他們攤牌；所以，阻礙定都北京的，起碼部分緣自他們那些有勢力的北方鄉親。

張學良入關，是中原大戰期間南京方面竭力爭取的結果，加速了馮閻的失敗，作為酬庸，張學良獲得合法擁有北平、插足華北政治的權力。「二次北伐」讓張作霖被迫退回關外，中原大戰卻讓張學良兵不血刃重回關內，歷史似乎在這裏又走了一個輪迴。更巧合的是，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入關，恰好一年後，日本在東北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兩個九一八，相隔一年，結局如此不同，讓人唏噓。

兩個九一八間，不僅僅是數字相同，其間確實存在或明或暗的聯繫。張學良擁兵入關，最重要的後果是造成了蔣、張的勢力分配，張學良取代馮玉祥、閻錫山獲得對華北廣大地區的控制權，這使張在面對日本時，政治判斷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東北不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政治基地，日本發動事變後，在張學良看來，與其把華北精兵強將投入毫無希望的東北對日作戰，不如保守華北的既得利益。正因此，1931年12月30日，錦州被放棄次日，張學良致函吳稚暉說：「國家之情勢如此，國家之實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國之故而重其誤。」²⁶所謂「重其誤」，基於張學良的如下判斷：入關助蔣造成東北實力空虛，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這是一誤；守錦州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轍，使日本人在華北生事，就是「重其誤」。這當然是張學良的說辭，實際上，不抵抗可能才是真正的「誤」。

當然，東北失陷責任不能僅由張學良來扛，國民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張學良有了華北，對東北就可以相對放手，遠在南方的國民政府，對東北的失陷更少切身之痛。中國歷史上，江南向被視作苟安之地，此時，歷史似乎又在繼續重演。都城的變化，對當政者心理的微妙影響，的確不能小看，而這又影響到整個國家乃至中日關係的格局。

華北作為國防重心的地位，注定這裏長期處於戰亂的漩渦，也相當程度塑造了這裏的民風。一般關於華北的描述，都會提到民風強悍，好

26 張學良1931年12月30日致吳稚暉函，天津《大公報》，1932年1月1日。

狠鬥勇。常年的戰亂，使眾多槍支散落民間，時人描述：「冀中農村存留著大量武器，有地主、富農的自衛武裝，有土匪潰兵拋棄的武裝，一般100餘戶的村莊，新式武器（即大槍、手槍等）一般的最少10戶平均1支，有的較大地主並有自潰兵買到的輕重機槍，這是發展冀中武裝的主要基礎。」²⁷ 山東的材料數據更為誇張：「民氣素來強悍，地方武裝又多（魯南滕縣有十萬支，荷澤有一萬二千，臨沂有一萬八千），都是開展游擊戰爭之有利條件。」²⁸ 曾任河南省主席的劉峙回憶河南的狀況：「河南省民個性強悍，愛藏槍支，據調查估計，約達八十萬支左右。」²⁹ 劉的回憶和中共河南省委談到的非常相似：

河南武裝很多，統計數目很難得到，就各縣已編起之常備武裝與後備武裝計算：南陽之宛屬十三縣，（素稱）有十三萬支槍，拿常、後備隊數目，把各縣武裝列舉如下：南召五千，南陽一萬五千，唐河一萬，葉縣九千，鎮平五千，淅川五千，泌陽八千，新野七千，鄧縣八千。其他武裝最多縣，如信陽、汝南、襄城等均在一萬條槍以上，武裝最少的縣也有三千到五千條槍。所以說河南槍枝是普遍而深入民間。抗戰以來政府統治武裝，但是民間各階級均還保存部分私槍，這一部分是很難統計的。

華北地區槍支來源多樣，以河南為例，大致有如下幾種：「本地自造槍：手工業造槍方式幾乎各縣都有。縣政當局辦的，地主紳士的私廠，或作槍出賣。個人私槍廠多半隱藏於鄉村」；「內戰遺留下來的槍枝」；「土匪、道門活動轉運到民間的槍支」；「富農以上的階層從各方買

27 冀中區行署：〈冀中區五年來民眾工作總結〉（1943年2月22日），《冀中抗日政權工作七項五年總結》，第6頁。

28 〈張金吾關於山東情形向中央的報告〉（1937年11月26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4輯，第10頁。

29 劉峙：《我的回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87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頁。

保家槍」。³⁰ 民間槍支眾多，才會出現彭雪楓說到的狀況：「豫西各縣民眾每天總有三五十人，由遠方來，連人帶槍參加我軍，盡量收容。經費無著，棄之不忍，且太可惜，世界上帶著槍自動來當兵的事是很少的。」³¹

民風強悍，又擁有大量槍支，造成華北地區地方自衛力量發達。八路軍幹部記載和某村長打交道的情景：

吃過早飯，我帶一班學員和兩班游擊隊員，走了三十里，到達王莊。我派人和村長接頭，他不見我們，我寫了封信給他，他派一代表來見我。我為了達到收槍的目的，也暫不驚動他們。這村的地主厲害得很，他一面讓人說不在家，回來可以交，同時又讓人到處放槍，威脅我們。這個村有四百多戶，二百多支槍，我們只有三班人，人生地不熟，為了安全，離開村子在半山露營。如果我們向村中進攻，只會弄一個互相殘殺。³²

地方武裝的對手是一切可能威脅到他們生存的人。白崇禧曾報告蔣介石：「豫省紅槍、聯莊等會，向有組織，力量甚大，曩昔軍閥部隊，軍紀廢弛，信陽附近，曾被該會繳械無遺。」³³ 不僅軍閥部隊被繳槍，抗日戰場退卻下來的軍隊也有被繳槍的事例：「索井幾個壞分子假會門之力欺騙群眾，當中國軍隊退出平漢線時，中央軍零星部隊經過該村，曾整連的被他們繳槍，29A別動隊之一部亦被解決於此。」³⁴

30 危拱之：〈關於豫南武裝工作補充報告〉（1940年6月17日），《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第88-89頁。

31 〈應以豫西陝南作我軍後方〉（1938年3月1日），《彭雪楓軍事文選》，第62頁。

32 王紫峰：《戰爭年代的日記》，1937年10月28日，第13頁。

33 白崇禧呈蔣中正報告六霍方面敵情及擬發動豫省紅槍連莊等會擾敵後方意見等文電日報表，1938年9月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200-00502-076，台北國史館藏。

34 《陳廣日記》，1938年6月8日，第104頁。

華北的地方武裝多依村莊組織，典型的即為槍會和聯莊會等。槍會成形於1920年代前後。民國初年政治控制力式微，戰爭頻仍、盜匪蜂起，地方由實力人士領頭，組成村或村落間的防衛組織。³⁵ 槍會目標在於自保，並無抗禦官府的主觀意圖，但出於維護本村利益需要，一旦壯大，必將抵制官府苛剝，甚至拒絕正常的稅賦要求。總體上言，槍會或聯莊會沒有明顯的政治屬性，「大抵皆土著有業之人，十九皆農民，且多有田者，其自衛也，首為保財產而已」。³⁶ 對此，劉少奇的論述相當到位：「他們（紅槍會、聯莊會）的主要目的是反對苛捐雜稅及土匪軍隊的騷擾，是單純的武裝自衛組織。日軍、潰兵、土匪不到他們那裏騷擾他們，他們也不積極出來反日、打土匪、打游擊。他們的領袖大多數是豪紳，但他們特別能夠迎合農民落後的狹小的本身利益。」³⁷

作為農民的自保組織，由於領導者出身、來源、稟賦及所處環境的不同，不同村莊的槍會組織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特性。時人觀察：

紅槍會的成分究竟是怎樣的呢？那裏有無土地的貧民，有破產了的中農，這就是它的廣大群眾基礎。此外還有富農作它的領導，大地主作它的後台（現在紅槍會變成保護富農與地主階級利益的工具了）。紅槍會的維繫，就是怪誕的迷信。記者在西戰場時，曾親眼看到他們在夜深人靜時從事吃符念咒的訓練，他們不惜遍體鱗傷，來用刀槍打他們自己。³⁸

35 王天獎認為：「槍會在組織和活動上便表現出明顯的村落主義。不管何色槍會，多以其所在村落為單位，一村自成一『學』，（大村亦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學』者），各學據守望相助、聯莊自衛的原則，互相聯絡而不相統屬。」（王天獎：〈也談本世紀20年代的槍會運動〉，《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

36 〈紅槍會之將來〉，天津《大公報》，1927年6月12日。

37 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解放》第43、44期，1938年7月1日。

38 張慶泰：〈戰區的紅槍會問題〉，《范築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頁。

南京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華北後，會門不再有顯著發展，但許多地區仍或明或暗存在。七七事變後，日本大舉入侵華北，中國軍隊潰敗，政治混亂和真空局面重現，槍會又現大發展之勢，村莊之間聯合形成的聯莊會也迅速崛起，成為戰爭初期華北鄉村的特殊景象：「若干地方的舊政權逃跑，新政權尚未成立，敵軍還沒有來，漢奸組織也未出現，在這青黃不接，半抗日半土匪的軍隊應運產生，乘機騷擾，因而激起民間的不安。地主在維持生命財產的號召下，發動了這種帶有自衛性質的組織。」³⁹

中共進入華北後，這些地方武裝對中共的發展有利有弊。有利一面是，會門武裝可提供大量的人力和武器資源，是潛在的發展目標。中共對會門也採取聯絡態度，強調會門「不但包括著最大多數的農民，而且擁有極大數量的新式武裝，這是一支極雄大的群眾抗日武裝力量」。⁴⁰不利的一面是，會門擁有強大的組織和信仰系統，與中共的組織發展天然存有衝突，對中共發展根據地、實現鄉村滲透形成較大阻礙，中共報告：「在我開始活動時，每到一村，他們堅決不讓前進。」⁴¹

中共進入華北初期，對會門武裝採取求同存異、利用爭取的方針，要求：「一切在會門中工作的同志，對於他們迷信的儀式和習慣，必須嚴格審慎的遵守，須知今天我們在會門中工作的中心問題，是紅槍會能否抗日和能否爭取他們進入抗日戰爭統一戰線。應把迷信的問題放在次要地位。」⁴²中共的求同存異不是無所作為，而是鳴子划水，潛行致遠，比如：「我們曾經爭取一部分紅槍會，編成部隊後，在作息時間表中，每天規定時間燒香拜神，同時也規定有政治教育時間，一方面是大

39 黃敬：〈地方黨五個月工作總結與今後工作方針（節選）〉（1938年4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1冊文獻選編（上），第143-144頁。

40 彭真：〈論冀魯豫紅槍會工作〉，《群眾》第1卷第22期，第377-378頁。

41 〈豫北工作委員會關於豫北情況的報告〉（1943年5月21日），《太行抗日根據地》一，第257頁。

42 彭真：〈論冀魯豫紅槍會工作〉，《群眾》第1卷第22期，第377-378頁。

師兄，一方面是政治工作者。最後還是政治工作者戰勝大師兄，連大師兄也放棄燒香了。」⁴³ 這就是不動聲色的成功案例。

當然，中共不會僅僅滿足於讓會門成為同路人，轉化會門為可以直接領導和信任的力量，才是最終目標。冀中報告：

對聯莊的爭取，我們非常耐心。例如在我們部隊襲擊保定時，一個連中途被聯莊會打了一下，傷連長一，死戰士二。事後，聯莊會很害怕我們去打他，但我們卻進行了很好的統一戰線工作，沒有打他們，和聯莊下層接近，而以自己的優良紀律感動他們，逐漸爭取他們走上抗日道路。最初編為聯莊游擊隊，他們表現了很高度的政治積極性，後改編為分區游擊隊，而成為今天主力團的組成部分。⁴⁴

1941年，朱瑞的報告談到轉化會門的方式方法，頗可看出基本思路。首先要把握一個底限，即「不幫助其組織的發展，不給它組織的合法權利，不給它以公開活動的地位」，為轉化會門留下伏筆。轉化的關鍵「是改變它的性質，爭取它的下層，分解與取消其封建的結合」。具體辦法很多，最主要的是區別對待，有打有拉：「對其反動的首領，在會門群眾對我瞭解和同情底下，可以交政府機關依法處理，直至槍決。但對其他不重要的或次要的領袖，應一律釋放，或長期優待。釋放以後，如再反我，可再捉、再放。」⁴⁵

相較於其他力量，中共轉化會門不是那麼順利。會門擁有緊密的地緣、血緣關係，形成一套自身的信仰和解釋體系，自組織色彩濃厚，

43 〈冀中區爭取改造聯莊會門問題的材料〉（1940年9月5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180頁。

44 呂正操：〈冀中平原游擊戰爭〉（1940年3月4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105頁。

45 〈抗戰的山東，統戰的山東——一九四一年九月朱瑞在山東統戰會議上的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7輯，第350頁。

在鄉村中很有勢力，中共幹部觀察到：「做地方行政工作的人員，若沒有哥老會的關係，工作很難開展。」⁴⁶ 這讓善於見縫插針的中共也常常有無從下手之感。會門本為政府權威軟弱的產物，中共這樣一個高度追求效率和一體化的政治力量出現，直接威脅會門生存，雙方很難不起利益衝突，不僅轉化不易，且易遭反噬。

中共和地方會門武裝關係惡化的過程，可以從中共報告裏看得很清楚：

天仙、妙道、反共救國、仁義社原來是群眾為自衛而成立起來的槍會，初還站在抗日立場傾向我們。因為犧盟分子在內，由其口號「朱家天下滿地紅，只有八路軍是真龍」可以看出，其真象雖雜，封建意味是那樣濃，但其同情我們願意抗日的方向還是不能一概抹煞。繼之就為特務分子所利用，口號一變而言為：「東府（敵人）也不行，西府（指我抗日政府）也不行，八月十五要革命」了。事實上也開始與我對立，並捕殺我幹部。⁴⁷

兩者關係惡化的直接導火索是負擔問題：「東明的會門，自從××被我們打擊一下消沉了以後，可是在不久的時間當中，又在頑固分子的代理人吳縣長的唆使下又組織起來了，其重要原因：①我們放了許多招兵處，胡鬧一氣；②群眾負擔的大。」⁴⁸ 對這一點，中共內部也有檢討：「財政部門十分薄弱，既缺幹部又無經驗，毫無積蓄，開支浩大，當即形成不可維持狀況。因此，決定了借款的方案（佔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六點五），這一方案的實行，缺乏深入動員與細密組織工作，帶

46 林以行：《一個八路軍女戰士的日記》，1940年10月24日，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73頁。

47 〈豫晉區工作檢查總結〉（1943年），《太岳抗日根據地》，第163頁。「天仙、妙道、反共救國、仁義社」的斷句原文如此。

48 〈五個月的工作報告〉（1940年3月1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186頁。

來了強迫命令，使人民認為是變相籌款，成為敵叛組織會門號召群眾口號之一（反對活埋、拆樓、打狗、借款）。」⁴⁹

負擔問題的背後實際還是控制權之爭，會門希望維持自己地區保護人的角色，和中共管理一體化的要求必相衝突。同時，日方乃至國民黨方面又推波助瀾。中共方面注意到：「敵人則利用他們掌握與擴大敵佔區封建會門（最顯著的是天仙、妙道、反共救國、仁義社），從我們建立根據地之始就在他們掌握中，利用之向我活動。」⁵⁰

多種制約之下，中共要順利實現轉化會門的目標，不太容易，對付會門，常常是拿出革命的另一手，即武裝鎮壓。陳賡日記載，在邢台路羅鎮：

紅槍會公然成立總團部，暗中勾結日本，這次日本進攻，公然打出太陽旗歡迎「大日本軍」。本月十七日，正當我武鄉戰鬥緊張之際，公然殺害我一一五師偵察員六人，收繳槍支，又聚眾搶劫我儲蓄軍糧，並擅自扣留我前運糧食，私立苛捐雜稅，剝削村民。因此師決定解除其武裝，並逮捕其首領。晚二十四時，我以突然手段將其解除武裝，並逮捕其首領，約共六七人，當即槍決。⁵¹

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在中共大軍所到或穩固控制地區，的確更易收效。只是這樣的條件並不總能具備，力量弱小時尤其如此。因此，根據地發展初期，中共的爭取和轉化政策，儘管成效未必盡如人意，對利用和吸納會門武裝多少能起到一定效果，起碼在一段時間內可以穩住會門，減輕開闢、發展根據地的阻力。歷史中的常態往往就是這樣：做了未必立竿見影，不做則肯定毫無希望。努力中的點點滴滴，有時可能無關大局，有時可能就累積為扭轉局面的關鍵。

49 〈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略〉（1944年），《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一，第83頁。

50 〈豫晉區工作檢查總結〉（1943年），《太岳抗日根據地》，第158頁。文中標點出自原編者。

51 《陳賡日記》，1938年4月28日，第87-88頁。

3. 八路軍出動山西

抗戰時期，中共最具戰略意義、影響最為深遠的舉措是向華北的出動，而這又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初期，出動的主要目標是山西，正因此，抗戰初期，山西在中共革命中佔有獨特的地位。

1936年，中央軍藉紅軍東征之機進入山西。東征紅軍回撤黃河以西後，中央軍仍然留駐晉南，而晉南「歷來是反閻派的中心，有反閻的傳統，閻錫山的銀行發行的票子就過不了韓信嶺」。⁵² 中央軍和晉南反閻力量眉來眼去，使閻深感戒懼。閻錫山或明或暗與中共接觸，希望以此向他認為的中共後面的蘇聯示好，並藉助薄一波等人成立犧盟會。薄一波後來回憶，1939年夏，犧盟會在山西發展達到鼎盛時期時，「犧盟會的全體會員總數已經發展到300萬人左右」。⁵³ 儘管這一數據或不無誇大，但犧盟會組織群眾的能力毋庸置疑。地方犧盟會顯示力量的方式甚至遭到薄一波的批評，他舉出幾個被認為是過於急躁的例子，側面證明犧盟會一言九鼎的威勢：

某縣的群眾運動，亦算十分開展，革命勢力抬頭，該縣縣長、區長及其他公務員，有些不合該縣群眾運動領導者的口味，據云並不算壞，但還不如他們革命。在武漢失守後的一個緊急大會上，對動員工作沒有十分討論，也有些急躁，沉不住氣，暴跳如雷的樣子，要壓迫縣長及一切公務員減薪……過不了幾天，縣長、區長辭職，專員公署照准⁵⁴

52 張稼夫：〈庚申憶逝（之一）〉，《中共黨史資料》第6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頁。

53 薄一波：〈犧盟會、新軍歷史回顧〉（1986年10月14日），《薄一波論新軍》，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頁。

54 薄一波：〈克服錯誤，樹立統一戰線的新工作方式〉，《薄一波論新軍》，第93-94頁。

不過，當薄一波批評下屬的時候，他自己行為也頗大膽，楊尚昆報告：「在決死一縱隊隨東路軍恢復的縣份內，雖然不屬薄之行政範圍，據說薄都已委了縣長……在我看來這似乎還太過一些，可以增加衝突，但聽說閻、梁反頗讚薄能幹，似乎很滿意的。薄一波仍不失為閻、梁之第一個幹部！」⁵⁵

犧盟會以群眾團體面目出現，但強烈的政權推動性質，使之由群眾組織直接指向政權建設：「犧盟是軍政民化合的偉大力量。犧盟不單純是一個民運的團體，它已在民運工作深入開展的基礎上，改造政權，創造革命武裝，形成戰勝敵人、復興中國的一部分力量的雛形，這就是軍政民的化合力量。」⁵⁶ 犧盟會扎下腳跟後，適應抗戰爆發的形勢，又順勢建立自己的武裝，即山西新軍。新軍包括4個縱隊，各縱隊政治委員薄一波、張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均為中共黨員。1939年夏，全部山西新軍共計50個團，主力部隊約5萬多人。至此，中共在閻錫山的旗號下，通過犧盟會和新軍，實現對山西的全面滲透。1939年，山西全省105個縣，有70個縣的縣長由犧盟會特派員或新軍幹部擔任，而這些人「實際上都是共產黨員」。⁵⁷ 在中共主導的區域內，已經形成這樣的輿論：「群眾認為閻錫山投降了共產黨，薄一波是個大共產黨，年月快變了。」⁵⁸ 薄一波後來總結：「這個階段，我們的工作所以做得好，一個得力的原因就是因為決死隊中，有一大批具有大中學生程度的黨員，他們在發動群眾的過程中注意建設黨，黨的骨幹分子返回來又推動群眾運動更加轟轟烈烈地開展。」⁵⁹

55 〈楊尚昆關於晉西南黨的工作及山西一般情況向劉少奇的報告〉（193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第108頁。

56 〈論犧牲救國同盟會〉（1939年9月），《論犧盟會和決死隊》，第259-260頁。

57 薄一波：〈犧盟會、新軍歷史回顧〉（1986年10月14日），《薄一波論新軍》，第399頁。

58 〈武鄉黨的簡史〉，《太行黨史資料輯存》第2編，第6頁。

59 薄一波：〈抗戰初期沁縣的鬥爭〉，《太行抗日親歷記》，政協長治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版，第145頁。

和中共合作同時，閻對國民黨中央力量介入山西一直高度警惕，中央軍入晉，被嚴格限制不得插手山西省政。統率山西地區中央軍的衛立煌曾在山西省政府召開的會議上提出「中央軍亦參加各縣總動員實施委員會，以統一戰線，加強救亡工作」的要求。對此，「當時各專員各縣長均未置可否。迨閉會後，各專員即紛紛電閻錫山請示……閻覆電謂：不可任中央軍參加各縣總動員實施委員會，並飭各縣迅速加緊動員工作，勿貽口實，乘機加入。」⁶⁰ 抵制國民黨中央在政治上滲透山西，是閻的重中之重，通過對中共力量的借重，犧盟會幫助閻更好實現了對地方的控制，消除南京中央插手山西地方的藉口。

吊詭的是，閻錫山借重中共人員發展犧盟會，還可以理解為他借力打力、抵禦中共的一個辦法：「八路軍之開入晉省，山西首當其衝。初時，閻氏應付辦法一變過去作風，提出新的做法，組訓民眾，創辦民大，建立新軍，目的在加強統制力量，不留有機會為共黨活動餘地。」⁶¹ 閻錫山和中共兩方面都不無借雞下蛋之意。中共希望通過支持閻錫山抗戰維持華北抵抗局面，在山西生根並經由此向外伸展，獲得生存發展的更大空間；而閻錫山則預估到在日軍和國民黨中央擠壓下，繼續獨霸山西殆無可能，希望借重中共既幫助抵抗日本，又以組織和宣傳鞏固自己對山西的控制。對這一合作的走向，任弼時曾在共產國際談到，閻錫山有一個隱秘的判斷：

「共產黨的八路軍在山西像點燃了十支蠟燭，晉綏軍只點燃了一支蠟燭。中央政府軍只是像點了一盞油燈。但共產黨有一個弱點，它沒有故鄉，因此1932年德國共產黨雖然有強大的力量，但還

60 賀耀組等電蔣中正日軍由上海增援安徽與閻錫山拒絕中央軍參加各縣總動員實施委員會，1938年9月24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200-00512-020，台北國史館藏。

61 黃樹芬呈蔣中正共黨在山西之活動及其勢力閻錫山態度及其應付方法，1939年12月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20300-00049-048，台北國史館藏。

是被希特勒鎮壓下去了」。接著他說，「山西省的政權掌握在我手裏，還可以做點事」。⁶²

閻錫山清楚中共的力量，卻認為外來的和尚很難真正念好中國的經，企望中共和德共一樣，最後被鎮壓、消融。這樣，他既借了力，又不至於被反客為主。只是他的如意算盤中忽略了關鍵的一點，即中共不是德共，中共武裝是實實在在的力量。

抗戰爆發後，作為陝甘寧邊區鄰省，加之閻錫山又向中共靠攏，山西理所當然成為八路軍出動的首要目的地。1937年9月，周恩來與閻錫山面商，達成多項諒解，周報告，雙方同意「成立綏察及晉北戰地各級動員委員會，爭取民主集中制，在戰區、行營直接指揮下，給人民權力與利益，以實施戰爭全部動員及組織游擊戰爭，各級政府不得干涉。我們擬出工作綱領，閻同意後，即由八路軍出面與晉綏合作」。⁶³隨後，八路軍陸續開入山西。

八路軍出動，不是作為正面戰場的補充，而是以執行自己的戰略方針為目標。在正面戰場連遭敗績，華北乃至山西的局面日益嚴峻時，毛澤東估計：「各軍殘部將大量潰散，即游擊戰爭亦恐不能好好支持。閻將無力再過分干涉八路軍之地方工作，故八路軍將成為全山西游擊戰爭之主體。」他要求：「一二九師全部在晉東南，一二〇師在晉西北，準備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非至有被截斷歸路之危險時，其主力不應退出山西。」⁶⁴表現出積極準備在山西持久抵抗的姿態。按照這一部署，中共武裝力量持續挺進到山西東南西北的各個角落，佔取交

62 〈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所作的報告《中國的抗戰形勢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務》〉(1938年5月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8卷，第58頁。

63 〈與閻錫山談判情形和作戰建議〉(1937年9月13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頁。

64 〈太原失守後華北將以八路軍為主體開展抗日游擊戰爭〉(1937年11月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11-112頁。

通線，進駐要點，逐步建立根據地的雛形。11月1日，劉少奇和周恩來聯名打電報給毛澤東、張聞天，報告成立晉察邊、晉綏邊、晉東、晉西、晉東南、直南鎮等軍區，並計劃成立各軍區軍政委員會，由聶榮臻、關向應、徐向前、鄧小平等分任主席。這一計劃初步構成晉察冀、晉綏、晉冀豫根據地的雛形，並成為日後中共背靠陝甘寧地區、進出華北平原的重要根據。

1938年前後，由於日軍進展迅速，很快越過河北、山東，進逼徐州，華北平原戰事漸告平息，山西由於晉綏軍、中央軍、八路軍的堅持，中日兩軍作戰一直持續，但戰爭級別已有所下降，初期大規模會戰罕有重現。此時華北形勢，如劉伯承指出的：

日本軍隊因恐兵力耗散，只把佔領的廣大區域內軍事之要點派兵據守，空出廣大地域，則想發展漢奸偽政權，組織以華制華。拿山西來說，共有一百零五個縣，只有二十個縣才有日本軍隊。除晉南不計外，也空出不少的地面。這已成為發展游擊戰，組織民眾，遂行運動戰的好場所。⁶⁵

正是由此開始，八路軍的游擊戰逐漸展現威力。

1937年底，日軍為維護正太路運行，對直接威脅正太路的晉察冀和晉冀豫區展開「六路圍攻」，八路軍和日軍在游擊戰場上具有戰略意義的真正交手由此開端。日軍進攻重點放在正太線南路，壓向晉冀豫區。晉冀豫八路軍針對日軍進攻，連續展開反「圍攻」作戰。1938年1月，閻錫山致電蔣介石報告：「連日，朱德部進襲太原南郊及正太沿線各據點之敵，頗有斬獲。」⁶⁶月底，閻又報告：「敵分向下社進犯，經我

65 劉伯承：〈論游擊戰與運動戰〉（1938年3月），《劉伯承軍事文選》上，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頁。

66 閻錫山電蔣中正等我朱德部游擊頗有進展，1938年1月9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0-057。

朱德部迎頭痛擊，狼狽南竄。」⁶⁷日軍試探性的「圍攻」遭到抵抗，很快即告收束。受此鼓舞，26日，朱德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甚至提出：「為著吸引敵人，取得一些新的勝利，並配合其他戰線，增敵將來南進困難，興奮全國軍民，已決定我各部以較集結之兵力，積極求得在運動中打擊和消滅敵伸出襲擾之支隊，並積極破壞敵之主幹交通線。」⁶⁸

1938年2月，東線戰場日軍策劃南北對進打通徐州，作為輔助戰場，西線日軍調集重兵對山西發起新的進攻。2至4月，山西戰場中日兩軍激烈交戰。3月3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嚴厲指示：「山西得失，關係全戰局至重，且全境皆山，隨地可守。希嚴令所部在晉境，雖一兵一卒不准渡河。違者即希以軍令從事。」⁶⁹蔣介石嚴令死守，閻錫山軍政基礎全在山西，也把保衛山西作為生存根基，所謂：「閻表示他決定留在山西打游擊。他說：『寧願抗戰死在山西，不願流亡他省』。他說不能離開山西，意思大概是說：如他離開山西，山西就不會再是他的了。」⁷⁰中共則從保衛華北、屏障西北戰略目標出發，投入山西抗戰。中央政府、閻錫山和中共在山西戰場形成良性合力。陳賡寫道：「以蔣的堅決嚴格的命令，在晉各部迫於法令，當必有一番積極動作。」⁷¹道出了當時的實況。

吸取初期抗戰及八路軍作戰的經驗，游擊戰在此一階段作戰中受到各方面的重視，閻錫山致電蔣介石對游擊戰不吝讚譽：「自變更戰略以

67 閻錫山電蔣中正等進犯下社之敵經朱德部痛擊南竄，1938年1月25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0-073。

68 〈朱德、任弼時關於衛立煌抽六個團歸八路軍指揮等問題致毛澤東等電〉（1938年1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頁。

69 武昌蔣委員長0220令一元電1938年3月3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2-018。

70 〈劉少奇、楊尚昆關於山西工作情況向張聞天的報告〉（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第83頁。

71 《陳賡日記》，1938年3月8日，第67頁。

來，作戰方面頗覺自動，反能有多數地方轉移攻勢，使敵人小股部隊遭我撲滅。此種方略確能抗戰困敵。」⁷² 蔣介石告訴在山西作戰的中央軍將領李默庵：「整個游擊計劃，先須化整為零，再行分進合擊，對敵之輜重與交通通信機關，應特別設法搜索襲擊，不忘各自為戰與前方補充之原則。」⁷³ 更有意思的是，山西各地國軍對游擊戰也多傾心，蔣鼎文報告：

第一六九師在二三月間於武鄉子洪口南關鎮等曾請朱德講話數次。其內容大意謂游擊戰為今日所必須之戰術，不善於游擊之軍閥式隊伍必歸於消滅等語。自講話以後，該師初級軍官已有三分之一傾向八路軍，關係特別密切。⁷⁴

的確，閻錫山說的抗戰困敵的游擊戰術，八路軍使用得心應手。日軍的攻擊開始不久，各地就紛紛送上八路軍襲擊日軍的報告。3月26日，衛立煌報告：「蒲縣西北敵千餘連日被我林彪師陳旅截擊，斃五百餘，死騾馬三百餘匹，俘兵四名。」⁷⁵ 林彪的報告更為具體：「本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午城鎮、井溝線戰鬥，殲滅敵由蒲縣兩次之增援隊，計斃敵千餘，毀汽車六十餘輛……我傷亡官兵五百餘。」⁷⁶ 八路軍的傷亡，115師政治部主任兼343旅政委肖華在日記中有更詳細的記載：「我們六

72 致武昌蔣委員長電，3月6日發，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2-050。

73 蔣中正電李默庵速定整個游擊計劃化整為零再分進合擊，1938年3月9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20300-00005-007，台北國史館藏。

74 蔣鼎文電蔣中正第一六九師曾請朱德講話數次該軍官兵已有三分之一傾向第八路軍，1938年8月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90300-00205-082，台北國史館藏。

75 衛立煌電閻錫山蒲縣西北敵千餘被林彪師截擊斃五百餘繳獲槍支百餘，1938年3月26日，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3-073。

76 〈林彪關於向衛立煌上報午城、井溝戰況及要求補充彈藥事致朱德、彭德懷電〉（1938年3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157頁。

八六團的兩個營長負了重傷，副營長羅志堅、黨的書記肖志堅及營連幹部大部都傷亡了。」⁷⁷

4月初，日軍「九路圍攻」晉冀豫根據地，作戰重點指向晉東南地區。八路軍總部要求：「各兵團以機動、堅決、勇敢，乘敵分進之際集結優勢兵力，從敵側背給敵以各個打擊與殲滅。」⁷⁸ 據此，八路軍主力主動離開根據地核心區域，轉到外線涉縣以北地區，蔭蔽待機。4月16日，八路軍抓住日軍回撤之機，在武鄉以東長樂村與日軍一股展開激戰。實地指揮戰鬥的陳賡寫道：

敵由遼縣、蟠龍增來步兵一聯隊，配合在戰部隊，共約步兵三個聯隊，炮兵一大隊，騎兵數百，復向我七七二團主陣地實行反突擊。此時炮轟如雨，戰鬥之激烈實為抗戰來所罕見。敵向七七二團數次反復衝鋒，均遭我有組織之火力射殺，傷亡甚重，僅目睹即達二百餘人。我為避免過大犧牲，尋求敵之弱點再擊起見，自動向鞏家壩撤退。是役我傷亡約達四百餘。⁷⁹

這一戰鬥，閻錫山給蔣介石的報告中有詳細反映：「武鄉城西之敵為苔米地旅團之主力步騎三千餘，炮廿門。剛晨復竄進縣城，銑晨被我一二九師及徐旅一部圍搏十餘次，敵我傷亡均重。」⁸⁰ 長樂村戰鬥堪稱八路軍打的一場硬仗，772團團長葉成煥傷重身死。

長樂村戰鬥最初的作戰目標實際是日軍的輜重部隊，這一階段八路軍展開的其他兩次重要戰鬥——神頭村和響堂鋪戰鬥打擊的也是日軍輜重部隊。抓住對方輜重部隊實施打擊，本身即為游擊戰術的一種

77 肖華：〈午城殲敵日記〉，《山西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政協山西文史資料委員會1986年版，第5頁。

78 〈粉碎日軍向晉東南圍攻之部署〉（1938年4月8日），《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331頁。

79 《陳賡日記》，1938年4月16日，第83頁。

80 致武昌蔣委員長電，4月21日發，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4-069。

體現，既破壞對手的供應體系，又可獲得物資補給，響堂鋪戰鬥繳獲達到「重機槍二挺，輕機槍十挺，迫擊炮四門，步槍三百二十支，衝鋒機槍十二支」，⁸¹ 八路軍付出的代價為「傷亡營長以下三百一十七人」。⁸² 對這種戰法，朱德在抗大的演講中談諧地談到：「敵人從長治一千多人出發，在神頭我們把他一打，剩了沒有多少。據他們說，我們是專欺侮他的輸送隊。」⁸³ 其實，包括平型關戰鬥也是對日軍輜重部隊的打擊。

客觀而言，八路軍雖然連連取得戰果，尚不足以扭轉戰局，日軍的「掃蕩」，進退基本按計劃進行，不過，中國軍隊持續的打擊的確挫傷日軍的自信，加之此時中國在東線戰場取得台兒莊會戰勝利，日軍開始將兵力更多投向津浦方面。4月28日，蔣介石注意到：「日來各戰區之敵，紛以大部向津浦線轉用，餘部改變方略，僅守有重要城市及交通線。」⁸⁴ 山西戰場暫時轉入平靜期。

這一段時期兩軍交戰的結果，日本方面的戰史寫道：

在第一軍地區，有力的中國軍退入山西省內的山地，會同原來盤踞該地的共軍，擾亂我佔領地區，其威勢已不容輕視。第一軍從3月中旬至4月下旬之間，在佔領地區內進行肅正討伐，雖予敵以一定的打擊，但未能達到預期目的，特別是對五台山及潞安北方的共軍，未能進行討伐。因此，為確立治安，將來必須進行積極的掃蕩討伐。⁸⁵

81 〈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關於響堂鋪戰鬥情況致八路軍總部等電〉（1938年4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165頁。

82 楊國宇：《劉鄧麾下十三年》，第51頁。

83 朱德：〈一年餘來的華北抗戰〉，《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資料叢書·文獻選編》抗日戰爭時期（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頁。

84 武昌蔣委員長儉電，4月28日到，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要電錄存116-010101-0124-125。

85 《華北治安戰》上，第73頁。

這應該是日方留下的如實記錄。燕京大學教授喬治·但勒的報告則談到，山西五台山地區「從最後結果觀之，日人未見成功。惟軍事狀態，略有變更，蓋日人已佔領平漢路西之若干縣城。邊區政府已退阜平，士氣仍振，與民間之感情亦佳。物價高漲，而食物尚不感缺乏。其游擊戰術成功之原因，在於曾經政治訓練，而與人民感情融洽之故。」⁸⁶ 八路軍在晉察冀地區的發展，使這一帶迅速成為中共的堡壘，日軍戰史承認：「五台山及其東部山岳地帶，東西約150公里，南北約100公里。這一地區，日軍從未駐兵，……中共勢力日益擴大，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⁸⁷ 晉察冀根據地的建立及中共武裝在山西的廣泛展開，為中共進一步在華北擴展打下了根基。

4. 戰爭初期的財政

大規模戰爭爆發後，中共財政困難有了很大紓解。當時，中共收入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國民政府的撥款。這筆款項早在抗戰開始前即已確定，1937年6月，何應欽呈報蔣介石：「第三者經費每月三十萬元，二十六年度軍務費總預算並未列入，除造送追加預算外，擬懇電飭財政部，以後按月如數照撥，以憑轉匯。」蔣介石批示：「如擬。」⁸⁸ 盧溝橋事變後，經費不定期有所增加，根據國民政府1940年的報告，前幾年發給八路軍、新四軍經費經常部分為：八路軍1937年月發經常費30萬元，戰務費20萬元，補助費5萬元，醫藥補加費1萬元，米津及兵站補助費

86 董顯光呈蔣中正燕京大學教授喬治但勒對華北情狀華北游擊隊漸被日軍肅清等原因之報告書，1939年5月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200-00515-152，台北國史館藏。

87 《華北治安戰》上，第129頁。

88 軍政部長何應欽呈蔣介石為第三者經費每月三十萬元，1937年6月29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中共活動真相（一），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5年版，第306頁。

7萬元，合計月發63萬元。1939年8月份起加發兵站臨時補助費2.5萬元，合計月發65.5萬元。新四軍1938年1月核定四個支隊月各發經費1.5萬元，軍部6,000元，共6.6萬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發經費2萬元，共8.6萬元。6月份重新核定該軍經費每月11萬元。1939年加發戰臨費每月2.2萬元，每月為13.2萬元。⁸⁹此外，兩軍還有些臨時經費，如1938年發遣散老弱10萬元。1939年「撥發職路醫治負傷將士款十萬元」。⁹⁰

對國民政府發放經費的數量，政府方面和中共財政部門的數據不完全一樣。中共統計的1937至1939年國民政府核發經費（法幣）具體數據為：1937年7月至12月共撥發1,527,672.84元，1938年為4,480,157.16元；1939年為5,000,436.10元；1940年1至10月為4,997,074.11元。⁹¹國民政府宣稱發給的數據幾乎倍於中共財政部門的統計。之所以如此，或和中共對經費的處理有關。抗戰初期任邊區銀行行長的曹菊如回憶：「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國民黨政府按月撥付一定數額的軍餉，此款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領取，一半送交延安，一半買成商品，作為光華商店進貨，由光華商店供應給機關、部隊和群眾。」⁹²也就是說，這筆經費中的一半很可能沒有進入財政賬目。中共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側面可以證實這一推斷。1938年2月，張聞天談道：「我們每月從蔣介石那裏總共得到50萬墨西哥元。這些錢是這樣使用的：25萬元用於前線需要，其餘25萬元用於後方需要、黨務工作、報紙和雜誌的經費，等等。」⁹³考

89 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編制經費情形報告表，1941年3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中共活動真相（一），第315-316頁。

90 朱德、彭德懷呈蔣介石請撥發子彈，1939年1月28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中共活動真相（一），第310頁。

91 〈陝甘寧邊區九年來財政收支報告〉（1946年），《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摘編》，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頁。

92 曹菊如：〈陝甘寧邊區銀行，1937-1945年9月〉，《曹菊如文稿》，中國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頁。

93 〈安德里阿諾夫同中共中央書記張聞天談話的簡要記錄〉（1938年2月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8卷，第26頁。

慮到墨西哥元的價值要略高於中國銀元，50萬墨西哥元和前述國民政府提供的經費發放數字顯然更為接近。另外，彭德懷在1939年初給蔣介石的報告中也提到，八路軍「以核發之五十萬元，暫供八萬五千人之用，旋蒙委座體念艱困，加發米津十萬元」。⁹⁴ 這一數字和前述國民政府報告中的數據基本吻合。

除國民政府發放的薪餉外，另一經費來源即為徵發。抗戰初期，中共實行合理負擔政策，按照「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原則，錢糧徵發對象主要為富裕階層。陳賡記下部隊到一地後籌集給養的情況：「為防止平均攤派，令七七二團民運股要村公所提出名單，結果甚好，僅抽派出名的富有者，得糧約二十擔。此間糧食甚困難，一般連小康之家均採樹葉及糠殼為食，生活甚苦。」⁹⁵ 相對而言，常態化的徵收體制尚未確立，徵收能力有限，以陝甘寧邊區為例，1939年的稅收收入只有658,213元，僅佔財政收入8,847,427元的7.4%。⁹⁶ 徵收還不構成根據地財政的重要來源。

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資金支持是中共抗戰之初解決財政問題的重要期待。1938年初，康生與蘇聯代表談話時強調：「共產國際執委會答應撥給我們150萬美元，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也答應我們撥款3萬美元用於治療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同志。」他同時表示：「我們需要資金用來擴充我們的軍隊，購買武器裝備，建設我們的國防工業，支付政府和中央的開支以及辦報的經費。」康生特別提到：「在八路軍活動的地區和日本人半佔領的地區，老百姓擁有足夠數量的武器，他們很願意把這些武器以不太貴的價格出售。無論如何，我們確實已經知道並經過驗證，我們所

94 朱德、彭德懷呈蔣介石報告困難情形，1939年4月4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中共活動真相（一），第311頁。

95 《陳賡日記》，1938年5月4日，第90頁。

96 邊區財政廳：〈財政工作報告〉（1941年10月26日），《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摘編》6（財政），第41頁。

需要的武器只要有錢就能夠迅速買到。」⁹⁷ 康生向蘇聯要求的這筆資助，在季米特洛夫日記中可以找到線索，他在1938年2月17日寫道：「援助中國共產黨50萬美元。」⁹⁸ 這應該是蘇聯和共產國際兌現諾言的一部分。另外，曹菊如曾報告經手中共中央特別經費的經過：「我經手管理特費收支賬目，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開始。在這以前，曾經從外面來了大約幾十萬元。」⁹⁹ 如此巨大的款額，和蘇聯的經費支持或有關係。

1939年初，中共給共產國際的報告繼續提出財政援助的要求：「你們為我們募集的錢都用光了。兌換時沒有遇到困難，也沒有引起懷疑。……在中國各地開展了大量工作，需要大量開支……上述困難的一部分我們將自己解決。請您提供資金上的援助。」¹⁰⁰ 7月，中共中央將這一援助要求的數額具體化：「請你們盡快在財政方面幫助我們。我們希望能夠得到不止一次的大數額——50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¹⁰¹ 當然，這樣的數字似乎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季米特洛夫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提到：「1940年度向中國共產黨提供35萬美元的援助是適宜

97 〈安德里阿諾夫同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代表康生談話的簡要記錄〉（1938年2月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8卷，第29-30頁。

98 〈季米特洛夫日記，1938年2月1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7-1943）》第20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當時中國法幣與英鎊掛鈎，1938年，1英鎊約合法幣16.6元，英鎊和美元的比值在1比4至5左右，以此計算，1美元約相當於法幣4元。

99 曹菊如：〈兩年來經管中央特費收支的報告〉（1940年11月1日），《曹菊如文稿》，第50頁。

100 〈鄧發和斯克沃爾佐夫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轉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1939年3月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8卷，第123頁。

101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的電報〉（1939年7月1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8卷，第242頁。

的]。¹⁰² 稍後，中共中央在一份關於收到款項的報告中稱：「我們應從你們那裏得到規定給我黨的300000美元」。¹⁰³ 由於資料零碎不全，很難給出每年援助額的準確數字，但從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關於援助款的一系列電文看，中共每年都從共產國際得到援助，1938年初得到的那50萬美元，以當時比值計算，約合法幣200萬元。除此之外，蘇聯方面還間歇性地予中共以物資援助。

蘇聯的財政援助，當中共還處於發展的起步階段，地域和武裝力量有限時，可謂雪中送炭。以陝甘寧邊區為例，1937年，財政收入526,302.45元，財政支出497,882.74元；1938年，財政收入907,943.31元，財政支出814,563.49元；兩年相加，收入、支出分別為1,434,245.76和1,312,446.23元。¹⁰⁴ 與之相較，蘇聯數百萬元的資金援助超出整個邊區財政支出，援助的分量可見一斑。

抗戰時期各方面的援助，是支持中共財政的主要力量，這一點，由中共中央付給陝甘寧邊區的外援收入中，可直觀見出。1937至1940年，中共中央從外援資金中撥付陝甘寧邊區的數額分別為：1937年10至12月為406,391.01元，1938年為468,500元，1939年為5,666,667.34元，1940年為7,550,855.04元。外援收入佔邊區財政收入比重分別是：1937年佔77.2%，1938年佔51.6%，1939年佔85.8%，1940年佔74.7%。外援成為抗戰初期邊區財政的主要依靠對象。當時中共文件明確寫道：「中央及邊區黨盡量爭取外援，減輕民負，外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¹⁰⁵

102 〈季米特洛夫關於向中共提供財政援助給斯大林的信〉（1940年2月2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9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頁。

103 〈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0年8月1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9卷，第80-81頁。

104 〈陝甘寧邊區歷年財政歲入分類統計表〉、〈陝甘寧邊區歷年財政歲出分類統計表〉，《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西北財經辦事處1948年2月鉛印本，第一部分第21頁附表。

105 〈1937年至1940年邊區財政收入分類百分數比較表〉，《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第一部分第3-4頁。外援包括海外來款、國內捐助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撥款。

外援使中共有了休養生息的機會，邊區公糧負擔顯示，1938年邊區共徵公糧14,197石，佔收穫量的1.32%；1939年15,955石，佔2.98%；到1940年由於通貨膨脹，外援收入貶值，徵收量才有明顯的上升態勢，佔6.37%。1941年後繼續上升到10%左右。¹⁰⁶ 抗戰初期的數年間，糧食不足部分由財政撥款對外購糧，購糧款高達整個財政支出的10%左右。¹⁰⁷

堪稱豐厚的軍餉¹⁰⁸及蘇聯援助、海內外捐款，使抗戰初期中共的財政來源充足，財政負擔不重，陝甘寧邊區在戰爭之初的幾年裏，財政一直節餘。不過好景不長，1940年後，國共關係緊張，國民政府停止發放薪餉。加之蘇聯在衛國戰爭爆發後，自顧不暇，無法再給中共提供財政支持，根據地財政陡然變得困難。中共事後總結，1941年，出現嚴重的財政混亂局面：

部隊武裝走私，嚴重破壞了政府的威信，機關自收自用否定了預決算制度，生活苦樂不均，有辦法的賺了錢，沒辦法的縣份，每個幹部只發二斤棉花代替單衣。機關、部隊砍公樹、拆廟宇、毀鐘、挖墓，在各縣成為一時的浪潮。至於燒酒販特貨等違法行為，更是司空見慣。¹⁰⁹

106 〈歷年糧食產量與徵收公糧比較表〉，《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第二部分第13頁。與此對應，1947年內戰爆發後，公糧徵收量達到收穫量的30.75%。

107 〈1937年至1940年邊區財政收入分類百分數比較表〉，《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第一部分第5頁。

108 1939年初，閻錫山在致蔣介石函中報告，國民政府每月補充山西部隊的經費共為1,600,700元。山西部隊包括已整編88團，正整編12團，保安隊30團，游擊隊191中隊及第二司令長官部，數量為改編後的中共部隊的五六倍，經費則為一倍多，由此看，發給中共部隊的經費的確不能算少。（閻錫山函蔣中正目前惟經濟問題最感困難，1939年4月16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200-00515-145，台北國史館藏）

109 《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第一部分第7頁。

為維持基本生存，中共採取發展生產、統籌統支、精簡節約等辦法，增收節支。各個根據地之間相互幫助，渡過困境。中共報告寫道，1943年，晉綏邊區給以陝甘寧邊區很大的幫助，「送陝特貨七十萬兩，並由陝甘寧代銷晉綏特貨抽百分之二十的貿易稅，……這樣建立了雄厚的家務」。¹¹⁰同時，強化汲取資源能力，對一個具有高度控制力且講求效率的政黨而言，這樣做也是駕輕就熟。以此，根據地民眾的負擔「感覺不輕，亦無可諱言」。¹¹¹平西根據地民眾負擔「在極大部分地區，超過國民經濟總收入百分之十，甚至個別村莊達到百分之三十」。¹¹²1941、1942年，太行根據地國民負擔佔收入比分別為17.29%、16.96%，屬於較高水平。¹¹³

日常負擔之外，戰爭時期，戰勤負擔較多，1941年對甘泉臨鎮區覺德村的調查顯示，全村合計的負擔包括：優待抗工屬（代耕）費人工畜工123天，修路人工245天，挖戰壕人工83天，放哨3天，擔架7天，慰勞部隊鞋27雙，給軍隊送信64天。該村共137人，15歲至45歲的青壯年男子29人。¹¹⁴上述負擔多數要由村民承擔，均攤下來，也不是個小的數目。有的村莊專門產生一個招待員，「負責零星過往人員糧草支付工作」。¹¹⁵招待員的生活由村民共同負擔。

中共武裝游擊作戰，常常大幅度遊動，河北寧晉有民謠說：「八路神，八路仙，一天不見走一千。」¹¹⁶不斷的長途行軍，鞋子消耗極大，

110 《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第一部分第8頁。

111 〈1943年太行區的財政金融工作〉（1943年9月），《戎子和文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頁。

112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平西工作向北方局的報告〉（1941年6月19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76頁。

113 〈1943年太行區的財政金融工作〉（1943年9月），《戎子和文選》，第83頁。

114 李卓然：〈固臨調查〉，《李卓然文集》上，第195、205頁。

115 《「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第350頁。

116 王林：《抗戰日記》，1939年11月4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37頁。

「行動部隊草鞋每雙穿不到十天，布鞋穿不到一月」。¹¹⁷而北方寒冷的環境又無法長期光腳。八路軍幹部鐵沖寫下行軍時鞋子壞了的處境：「我的鞋子好容易走到了南莊，一支鞋底破了三瓣，一支開線斷了兩截。晚上睡都睡不著，如何處理鞋子問題？又想開口向別人要，又怕對方沒有時難為情，後來沒有辦法不想它吧，可是說馬上出發就得打赤腳。」¹¹⁸為保證軍鞋供應，地方上付出很多努力，「富人出材料，窮人出人力。有的人家很窮沒有布，便撕下自己的褲子來做鞋」。¹¹⁹根據地處處可以看到民眾趕製軍鞋的場景。簡單的一雙軍鞋，一針一線裏，也有民眾的心血。

財政和負擔問題都和戰爭的驚人消耗相關。山東根據地各區1942年的總支出為1,007,093萬元，其中黨務支出49,770萬元，佔4.96%；政務支出210,573萬元，佔20.89%；軍務支出746,750萬元，佔74.15%。軍務費幾乎佔到四分之三。¹²⁰晉察冀邊區的比例更為驚人，1942年軍費佔總支出比例達到88.06%。¹²¹下面一則報告具體顯示日常開支：

平均部隊戰士每人每月4.16元，黨政機關人員每人每月4.5元，學校(抗大)每人每月6.25元。今年單衣兩色每套6元(帽子、綁帶、子彈帶均在內)，冬衣每人約需38元，棉衣每人一套，大衣排級以上幹部每人一件，棉被戰士兩人一床。平均戰士每半年打子彈20

117 〈晉冀豫區武裝每人每年各種費用平均指數表說明〉(1941年7月26日)，《楊立三文集》上，金盾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頁。

118 〈八路軍一二〇師《戰鬥報》社記者鐵沖日記〉(1944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藏珍稀抗戰文獻匯刊》第2冊，第439頁。

119 《高魯日記》，1940年4月26日，第98頁。

120 〈山東省各區一九四二年支出統計表〉(1942年12月27日)，《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第5輯，山東省財政科學研究所、山東省檔案館1985年版，第412頁。

121 宋劭文：《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工作報告1938-1942》，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1943年版，第90頁。

粒，價洋15元；手榴彈平均戰士每半年打8個，價洋12元，其他每人半年臨時費洋1元，每年每個戰士開支約129元左右。¹²²

從這則材料可以看出，一個戰士每半年如果打子彈20粒、手榴彈8個，花費27元，正好相當於一個黨政機關人員半年的開支。而20粒子彈、8個手榴彈的戰鬥消耗，幾乎是最低限度。戰爭打的是錢，從這則材料中可以得到深切的感受。

122 〈山東工作報告〉（1940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372頁。

九、持久戰的「三駕馬車」

抗戰時期，中國展開持久抵抗。持久抵抗是面對強大的日軍迫不得已的選擇，在這一點上，沒有太大的爭議。中共和毛澤東的突出貢獻是論述了如何持久的問題，既在理論上闡釋了持久戰的方針，還以開闢敵後戰場的方式具體實踐了在敵後如何持久，打破祈望速勝的僥倖心理。抗戰時期中共以游擊戰為基礎的持久抵抗戰略，是一個辯證思維下的系統工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思維，離不開聯繫的、系統的觀點。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構成中共持久抗戰互為作用的「三駕馬車」，而這些又和總體戰的思路息息相關，持久抵抗的鏈條在多種要素的相互咬合中形成、運轉。

無論從哪方面看，中共的持久戰略都具有相當的超前性，之所以如此，馬克思主義的寬廣視野、共產主義革命理念中包含的群眾路線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兼具抗戰老兵和哲學家雙重身份的馮契回憶讀〈論持久戰〉的感受：「記得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完全被吸引住，一口氣就讀完了，後來又反復地讀。〈論持久戰〉特別使我感受到理論的威力，它以理論的徹底性和嚴密性來說服人，完整地體現了辯證思維的邏輯進程。」¹ 共產黨人的理論高度，與毛澤東政治上的老練和軍事上的天才結合，使之能夠在紛繁複雜的局面中迅速準確找到生存發展的方向，這相

1 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頁。

當程度上決定了中共抗戰乃至後來國共內戰的結果，平原游擊戰的開關又可以說是中共對日持久抵抗全面展開的關鍵一步。

1. 平原游擊戰的決策

中共在山西展開的游擊戰，是山地游擊戰，這可以說是國內外一般游擊戰的經典打法。蘇維埃時期，中共在各地展開的針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即以山地游擊戰為主。抗戰時期，中共的一個重大突破是，游擊戰不再限於山地，而是擴展到平原地區，可以說，從山地游擊戰到平原游擊戰，是中共抗戰時期軍事戰略的一個革命性變化，對整個抗日戰爭的戰局、進程乃至戰後國共兩黨的命運，都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而這一決策的完成，又和毛澤東抗戰持久戰略的提出不無關聯。

大規模戰爭爆發伊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提出並竭力強調游擊戰的方針。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給北方局的指示要求：「立即在平綏平津以東地區開始著手組織抗日義勇軍，準備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爭。」²平津相繼陷落後，中日間一場大戰已不可免，8月1日，洛甫、毛澤東致電在南京的周恩來等，要求向國民黨方面提出紅軍的作戰原則如下：「(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³8月10日，毛澤東致彭雪楓的電報中告誡彭與各方接洽時，「不可隱瞞紅軍若干不應該隱瞞的缺點。例如只會打游

2 〈中央關於盧溝橋事變後華北工作方針問題給北方局的指示〉(1937年7月8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學習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3 〈張聞天、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原則致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電〉(1937年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10頁。

擊戰，不會打陣地戰，只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只宜於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於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以致失去其長處。」⁴ 這些看法，毛在洛川會議時做了集中表述：紅軍的基本方針是持久戰，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創造根據地則是基本任務之一。⁵

游擊戰是中共持久戰的核心內容，儘管毛澤東一開始就強調中共作戰必須是游擊戰，但游擊戰的內涵卻不斷變化、豐富。中共最初提出游擊戰時，華北戰場還有大批中國正規軍存在，此時強調游擊戰，更多在於突出中共武裝的獨立性，將中共武裝的戰場功能定位於側翼配合。8月18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周恩來，要求其與國民黨談判時堅持如下原則：「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發揮紅軍特長」。⁶ 稍後，毛澤東致彭德懷電中又一再強調中共部隊行動的自由：「（一）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干涉。如不弄清這一點，必將發生無窮糾葛，而紅軍之偉大作用決不能發揮。（三）南京只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四）堅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則。」⁷

隨著戰爭的進行，毛澤東很快意識到華北戰場正面抵抗勢難持久，游擊戰將有可能成為中共在華北持久抵抗的不二法門，對游擊戰的判斷已經逐漸向著戰略方向提升：

4 〈毛澤東關於與各方接洽中應注意事項及紅軍改編等問題致彭雪楓電〉（1937年8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17頁。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第15—16頁。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修訂本）中，第14頁。

7 〈毛澤東關於向國民黨解釋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基本原則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1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28頁。

甲、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於游擊戰爭。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應令河北黨注全力於游擊戰爭，藉著紅軍抗戰的聲威，發動全華北黨（包括山東在內）動員群眾，收編散兵散槍，普遍地但是有計劃地組成游擊隊。……丙、為此目的，應著重於高級幹部之分配及獨立領導的黨政軍集體機關之組織。要設想在敵整個佔領華北後，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要告訴全黨（要發動黨內黨外），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游擊戰爭。⁸

從上述指令可以看到，就毛澤東的思考方向言，游擊戰不是零散的局部的戰鬥行動，而是整個的黨、整個的軍的中心任務；游擊戰不僅僅是群眾性的戰鬥行動，更需要正規軍的投入；游擊戰不僅僅限於軍事意義，還具有政略意義。

雖然毛澤東要求把游擊戰的範圍擴大到整個華北，但對於把八路軍主力投入到華北前方，多少還存在一些擔憂。洛川會議時，毛澤東強調要在有利條件下發展平原游擊戰爭，但重點是山地，具體而言，即「小游擊隊去發達平原」。⁹ 楊奎松注意到，1937年12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一些與會者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提法提出批評，作為妥協，毛澤東同意加上「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但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應為對日作戰的基本軍事戰略方針。¹⁰ 而且，1938年初毛澤東一直擔憂日軍會對西北有大動作，判斷

8 〈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1937年9月2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57頁。

9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2日），轉見金沖及：〈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抗戰初期中共黨內的一場風波〉，《黨的文獻》2014年第4期。

10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第42頁；楊奎松：〈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日軍事戰略方針的演變〉，《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

「敵之企圖在一面攻陝北，一面攻潼關」，¹¹ 高度警戒西北，相應地對華北也無法放手。山西山地縱橫，符合毛澤東實施山地游擊戰的要求；背靠陝甘，進可攻退可守的地理態勢，也讓中共部隊在局面全面惡化時，可有退路，這是此時毛澤東選擇山西作為戰略展開地區的重要考量。

不過，儘管毛澤東對主力部隊的使用心存謹慎，卻並不排斥部隊向華北平原發展，而且一直在查探時機，這是老練的戰略指揮者不可能想不到的一步大棋。對中共武裝出動後的行動方向，毛澤東提出：「根據山地戰與游擊戰的理由，紅軍要求位於冀察晉綏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區，向著沿平綏路西進及沿平漢路南進之敵作側面的襲擊戰，配合正面友軍戰略上的行動。」¹² 對「冀察晉綏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區」的注意，明顯可以看到蘇維埃時期裂縫中成長經驗的餘緒。另一封電報中，毛還特別強調「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四角地區，不是三角地區）」，¹³ 可見他對這種四省交界地區所具有的裂縫中的機會的極端重視。尤其八路軍在晉察冀站穩腳跟，獲得戰略支點後，毛澤東對河北平原的態度更加開放。1938年2月，毛澤東甚至提出在華北大兵團作戰的設想，估計：「當敵集力攻隴海路時，河北全境及山東境內乃至江蘇北部必甚空虛，同時晉察綏三省之敵一時尚無力南進。」以此為背景，毛設想115師全部向東出動，進至滄州、石家莊、彰德間活動，如證明大兵團在平原地域作暫時活動是有利的，則展開下一步，「分數路突然渡河，轉入山東境內，在津浦路東山東全境作戰，並以魯南山地為指揮根據地，並發展至徐海南北」。然後轉入安徽，以鄂豫皖邊為指揮根據地，為保衛武漢而作戰。這是一個強戰略行動，只是這個計劃更像大規模的掃蕩出擊，而不是堅持長期游擊戰，毛自己也清醒認識到：「這一戰略行動在國內國際

11 〈毛澤東關於保衛邊區鞏固河防部署致朱德等電〉（1938年3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148頁。

12 毛澤東：〈同各方接洽要有謙遜的態度〉（1937年8月10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8頁。

13 毛澤東：〈紅軍的作戰任務與兵力使用原則〉（1937年8月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5頁。

之政治作用很明顯不必說，從抗日軍事戰略說來，也是必要與有利的。問題是比較帶冒險性。」¹⁴ 計劃一提出，事實上即被束之高閣。

比起上述大兵團作戰的想法，1938年4月前，毛的謹慎態度更引人注目。與發出上封電報幾乎同時，毛提出：「長期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有山西區、鄂豫皖區、蘇浙皖贛邊區、陝甘區、鄂豫陝邊區、湘鄂贛邊區等六處。」可以看出，毛設想中的這六個戰略支點不包括華北平原地區。根據這一判斷，他計劃，八路軍「三個主力師位置，大體上應預擬一個位於鄂豫皖區，一個位於鄂豫陝區，一個位於陝甘區，即兩個在內線，一個在外線」。¹⁵ 這一計劃以陝甘為中心，兩個觸角分別向東北和東南方向伸展，主力若遠若近瞰制華北平原，顯然不是大膽出擊的部署。2月23日，毛又循著上述思路提出：「假設潼關、武勝關均危險，則應抽出兩個師南下，一個位於平漢以東，一個位於平漢以西，配合友軍作戰。仍留一個師，活動於山西、河北，非至某種必要時期，不撤回來。」¹⁶ 1938年3月前後，毛澤東仍然不斷致電前方，反復提醒保持八路軍前後方的紐帶關係，還沒有下定決心投入主力越過太行山，向華北平原出擊。3月3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強調：「八路主力留晉擊敵，後路必須在黃河、汾河不被隔斷之條件下，否則對於整個抗戰及國共關係是非常不利的。」¹⁷ 9日，毛澤東進一步明確：「如果八路全部被限制於華北敵之包圍圈中，根本不能轉移至陝甘豫地區，則對整個抗戰及全國政治關係都是不利的。……無論如何也不要說全部長期在華北

14 〈關於一一五師分三步向河北山東等地進軍的意見〉（1938年2月1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58頁。

15 〈力爭建立長期抗戰的主要戰略支點〉（1938年2月2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60頁。

16 〈關於戰略計劃和將來行動的意見〉（1938年2月23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97頁。

17 〈我後路不被隔斷的條件下主力可留晉擊敵〉（1938年3月3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77頁。

的話。」¹⁸毛擔心的關鍵問題，稍後在電文中說得更清楚：「在敵人後方創設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可能的，是十分必要的。國共兩黨均須用極大努力去幹，對此不應有任何猜疑。但不要把此事看得很容易，不要以為數十萬正規軍能在華北一隅長期作戰。」¹⁹

不得已時將紅軍主力撤回黃河以西的想法，在3月底仍然沒有改變。24日，毛澤東提出：「戰爭形勢的發展，八路軍主力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有轉移地區作戰的必要。為了在八路軍主力轉移至其他地區後，我黨仍能在統一戰線中有力地堅持與領導華北抗戰」，²⁰必須立即組織以八路軍名義出現的游擊兵團。29日，在給朱德、彭德懷的電報中，更明確指示：「依此時敵我情況，河南、安徽、潼關、西安乃至武漢有很快發生嚴重變化的可能，同時敵確有進攻陝北在政治上打擊共產黨之計劃。因此，劉師徐旅兩部宜位於同蒲東側，依太岳山脈為根據，發動民眾，襲擊同蒲路，配合林賀兩師，打擊晉西之敵，並便於向西轉移為合宜。」²¹顯然，這是一個收縮防禦的計劃。

然而，正是在毛澤東不斷提醒要保住後路、準備西撤時，中共試探性進入華北平原的小股武裝力量卻出現出人意料的大發展局面，如火如荼的華北平原大發展，給了中共空前的機會。此時，毛澤東對後路的擔憂固然不無道理，卻也有失去戰略機遇的可能。形勢比人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面臨著把握戰略機遇的關鍵抉擇。

蘇維埃時期，中共根據地的建立主要依靠國民黨統治的縫隙，利用國民黨內部爭戰在省際交界的邊緣地帶迅猛發展。抗戰初期，儘管方式

18 〈八路軍應準備轉戰陝甘豫地區〉（1938年3月9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93頁。

19 〈與國民黨談華北軍事時注意分兩個階段〉（1938年3月17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97-198頁。

20 〈立即組織以八路軍名義出現的游擊兵團〉（1938年3月24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07頁。

21 〈劉伯承師徐海東旅宜位於同蒲路東側〉（1938年3月29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12頁。

和對象不一樣，這樣的良機卻再次出現。中日全面開戰後，華北各種政治軍事力量經歷劇烈洗牌。二十九軍迅速潰敗，河北宋哲元基本失去原有地位；山東的韓復榘1938年初被槍決後，群龍無首；河南省政基本是南京中央和地方實力派共治，其下又有各種力量犬牙交錯。面對華北軍政的混亂局面，國民政府對華北防禦明顯缺乏信心；早在戰前，國民政府擬定的防禦計劃中就寫道：「若就全盤論之，則防禦河北北部，可專由現駐北方之部隊擔任。」²² 戰爭爆發後，中國軍隊重心投入上海，華北抵抗主要依賴地方軍政力量，中共判斷：冀察晉綏四省軍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脫離民眾，挫敗之後失去勝心，整個華北戰線醞釀著極大危機」。²³ 正由於此，華北日軍推進迅速，兵鋒直越華北平原，整個華北北部出現短暫的控制真空。1938年3月，日軍在華的兵力（不含關東軍、台灣軍）共有14個師團，其中華北方面軍8個師團，華中方面軍6個師團。²⁴ 此後，日軍兵力部署持續向華中傾斜，到1938年9月，中國方面的情報顯示，日軍在華兵力部署狀況是：華北、華中總計28個師團中，用於華中的達到18個師團，華北10個師團，其中部署在平漢北段的僅兩個師團。²⁵ 華北地區這種轉瞬即逝的機會，毛澤東也有談及：「由於日本佔領軍人數很少，日本人不能掌握所佔領的土地。他們的部隊通常只部署在鐵路沿線的居民點和城市。而農村幾乎全部掌握在我們的手中。」²⁶

22 與日本發生戰爭時中國北方防禦方案並附圖，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102-00007-001，台北國史館藏。

23 毛澤東致彭雪楓轉周恩來電，1937年9月4日，《毛澤東年譜》中，第18頁。

24 參見耿成寬、韋顯文：《抗日戰爭時期的侵華日軍》，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9頁。

25 軍令部第二廳呈蔣中正敵軍在華作戰兵力配置判斷表，1938年9月20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20300-00002-027，台北國史館藏。

26 〈安德里阿諾夫同毛澤東同志談話的談話〉（1938年2月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8卷，第32頁。

正如中共所看到的，華北的危急局面對於和其僅有一河之隔的中共黨人，既構成威脅，也提供了機遇。許多地區的權力真空局面為中共的進入及迅速生根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共產國際判斷：「八路軍的這種迅速發展也是由下面的情況促成的：日本將其主力集中於對付中國大城市的主要戰場，而國民黨又沒有能力將其主要注意力放在敵人後方。與此同時，八路軍執行了正確的政策，在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這大大推動了它的發展。」²⁷

華北的微妙形勢，中共當然有所窺察。1938年前後，八路軍派出小股部隊向冀中、冀東、冀南、豫北等地挺進，既窺探形勢，也給主戰略區山西建立環形的前出防護基地，做鄧小平所謂「偵察式的活動」。²⁸讓人大為振奮的是，這樣的試探行動取得極大成功。八路軍東進縱隊是成功的典型案例。1938年1月，陳再道率八路軍129師東進縱隊進入冀南時，只有500多人，正是這500多人，憑藉正規軍的武裝、素質、威懾力，加上嚴密的組織宣傳，在冀南幾乎沒有其他正規武裝背景下，迅速獨樹一幟，對其他民間武裝形成威懾和虹吸效應。陳再道形象描述其懾服巨鹿保安團的經過：「騎兵連拉長距離，繞城半圈向東南奔馳而去。這裏是一片沙土地，又值冬季乾旱季節，只見塵土飛揚，萬馬奔騰。」²⁹這樣的力量展示，足以讓民軍戰戰兢兢，屈膝而就。東進縱隊很快吸收、改編大股民團、會匪武裝，短短幾個月裏，「由原來六個老連，發展至三個團及若干個支隊，共兩萬餘人，並組建了五個軍分區」。³⁰當時對手空虛狀態，聶榮臻有具體描述：

27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的電報〉（1939年7月1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第18卷，第239頁。

28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43年1月26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6卷，第23頁。

29 《陳再道回憶錄》上，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頁。

30 陳再道：〈東進冀南〉，《冀南黨史資料》第2輯，冀南革命根據地史編審委員會1986年版，第235頁。

一、平漢線日軍九日被我襲擊後，極為恐慌。被我破壞之鐵軌與電線至今未敢動修。昨派往望都之偵察彙報：該城時起謠風，一日數驚，日兵守在工事裏不敢出。二、我主力集結於機動位置外，仍有小部在鐵路附近游擊，繼續不斷破壞鐵路。三、此次戰鬥經驗，我感覺敵各處守兵都較薄弱，正因為薄弱，所以敵不重守城市，只守城內幾個支點，甚至棄城而固守工事……同時敵警戒亦甚疏忽。³¹

東進縱隊這一時期的發展可謂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

初期取得巨大發展的還有冀中。1937年10月，53軍691團團長、抗戰前剛剛被吸收為中共地下黨員的呂正操率部脫離退卻中的原部隊，留在冀中當地堅持抗日，所部改稱人民自衛軍。呂正操和已經在這裏活動的中共黨員孟慶山等結合，部隊很快發展到5,000多人。³² 1937年底，自衛軍主力開到平漢路西整訓，1938年春節前後返回。此時，日軍南攻，國軍潰敗，「群眾悲觀失望，潰兵土匪到處公開行劫，賣燒餅的小販不敢出村，30里地的行程，有時要遇到20多起路劫；貼票詐財成為常事。人民看不到政府，也看不到軍隊，而成了極度混亂的無政府狀態」。³³ 自衛軍大舉編並各類武裝，包括地方游擊隊、聯莊和會道門武裝，呂正操回憶：「截至一九三八年底，我軍在冀中爭取改造了大部分聯莊武裝，編入我軍的共約兩萬餘人。」³⁴ 到1938年底，整個冀中根據地人口達到800萬，部隊「號稱十萬人」。³⁵

31 《聶榮臻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頁。

32 王林後來記下當事人侯玉田對這段歷史的談話：「蕭弟從石門出來，傳達省委開展游擊戰爭的指示，孟正在開游擊訓練班，發展游擊隊，王鳳齋、劉二、史孟、吳健民等是起了作用了。呂正操當時是個號召，大發委任狀，孟領導不起來。」（《王林日記》〔1949-1953〕，1949年2月7日，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2023年版，第15頁）

33 冀中區行署：〈冀中區五年來民眾工作總結〉（1943年2月22日），《冀中抗日政權工作七項五年總結》，第1頁。

34 《呂正操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頁。

35 《呂正操回憶錄》，第122頁。

更讓中共中央振奮的還有山東。抗戰爆發後，韓復榘為保住自己的地位，與中共建立統戰關係，中共代表張經武、張友漁先後與韓會面，據張經武報告，韓「對於抗戰前途估計，怕南京對日妥協，因此得出結論，將來蔣必消滅紅軍之內戰要發生，故每囑鞏固陝北蘇區問題。若南京徹底聯俄，則我們力量勢必強大，故將合作問題推諸將來」。³⁶雖然韓對中共「不即不離」，但中共在山東的活動已基本不受限制，中共在各地抓住時機迅速發展。1937年8月底，中共黨員用公開的抗日自衛團名義在新泰幾個區「發展抗日自衛團4000餘人，擁有各種槍3400餘支」。³⁷在泰安六區，利用上層的包容和地方社會網絡，黨的發展「幾乎用半公開的方式進行。因為六區區長兼民團隊程子源是程照軒的堂兄，經過程照軒他們做爭取工作，已經是傾向於我們了。」³⁸

1937年10月，日軍進攻山東，中共山東省委預估山東形勢可能發生變化，積極準備武裝力量，適時打出自己的旗幟：「武裝起義的時機選擇在韓復榘部潰逃，日軍尚未全面佔領山東及其立足未穩的時候，全省行動，揭竿而起。」³⁹1938年1月1日，中共山東省委在徂徠山建立武裝，是為中共在山東發起的一系列軍事行動的中心一環。在此前後，中共在沂蒙山、魯西北、膠東地區相繼起事，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逐漸興起。由於中共山東黨抓住時機拉起武裝，加之韓復榘被處決後山東政治的群龍無首，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從無到有，迅速發展到約4萬人，統編為7個支隊和兩個人民抗日義勇軍總隊。山東的發展局面，後來中共曾有總結：

36 〈張金吾關於山東情形向中央的報告〉（1937年11月26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4輯，第9頁。

37 單洪：〈對抗戰時期泰山區泰南區黨史有關情況的回憶〉，《泰安黨史資料》第21期，中共泰安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1995年版，第36頁。

38 《黎玉回憶錄》，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頁。

39 《黎玉回憶錄》，第144頁。

韓復榘不戰而退，日寇深入山東，政治系統混亂，社會秩序不安，因而國共兩黨同志領導了山東人民的反日鬥爭，組織了廣大的游擊隊伍。這一特點和華北其他地區不同，那裏兩黨都有正規軍的；和湘鄂川不同，那裏只有友黨的軍隊，而無八路軍的。因此山東雖無八路的正規軍（現在有一部分），但是發展了一部分游擊隊。這一點使得兩黨必須互相學習競賽、互相激勵，求得進步。⁴⁰

如果說東進縱隊偏師入冀的快速發展令人鼓舞，山東完全靠地方黨自身就發展成軍的事實，更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感覺到在平原地區堅持和發展游擊戰的可能。1938年4月，華北中共部隊發展到「實有人數十二萬以上」，⁴¹ 這讓一直堅持山地游擊戰的毛澤東，大大增強了在平原地區發展游擊戰、建立根據地的信心。中共文件曾談到，歷史發展常常有一些不多見的歷史先機，「當著歷史先機已經出現，或許是很短的（一月甚至一週），但它能給予我們的，往往能使我們完成多年所不能完成的事業。」⁴² 用這個判斷觀察抗戰初期中共在華北平原獲得的機遇，異常貼切。短短幾個月內，用極少的人力、物力，在河北、山東獲得了難以想像的發展，這樣的機會空前絕後。

不過，中共獲得的這些成果，來得太快、太輕鬆，基礎並不十分扎實。可以預估到，日軍正面戰場進攻告一段落後，必然會返身鞏固後方，這對中共將形成巨大壓力。同時，國民黨方面經歷初期的潰退後，受中共方面刺激，也準備重返河北等地，不可避免對中共繼續發展構成挑戰。要保持既有果實，讓初期獲得的機遇真正轉化為繼續發展的基礎，亟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因時制宜，對既有政策做出重大調整。

40 郭洪濤：〈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及山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幾個問題〉，《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4輯，第73頁。

41 〈朱德、彭德懷關於解決財經困難問題致毛澤東等電〉（1938年4月2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177頁。

42 〈抗戰四年山東我黨工作總結與今後任務〉，《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9輯，第64頁。

1938年4月上中旬，八路軍出動以來一直和前方保持聯繫，不斷發出指令的毛澤東出現罕見的長時間沉默。⁴³ 期間，中國軍隊在台兒莊阻擊日軍成功，這場戰役振奮士氣民心，也相當程度上消解了中共對國民黨中央走向投降的擔憂。敵後戰場和正面戰場的關係，正如彭德懷坦率指出的：「華北戰爭不是孤立的，有全國抗戰的配合，特別是有全國二百幾十萬友軍的配合，使敵人不能集中兵力專對華北。」⁴⁴ 正面戰場的頑強堅持，對中共在敵後戰場的持久和投入影響至巨，就全局而言，「共產黨在全國算來還是少數，統一戰線裏是小股東」，⁴⁵ 中央政府堅持作戰，敵後戰場的空間才有可能打開；就華北局部看，華東的抵抗使日本「將華北兵力集中於徐州，華北佔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游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⁴⁶ 對此，毛澤東和劉少奇都說得很清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國民黨有它光榮的歷史，……今天又在領導著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忠忱愛國的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⁴⁷

43 從《毛澤東軍事文集》和《毛澤東年譜》可以看出，自從八路軍出發到前線後，毛不斷向前方發出指令，1938年5月前，只有1938年1月和4月相對大幅減少。1月是農曆春節，前線平穩，比較容易理解。4月，毛澤東開始寫作並經常到各學校講課，這也恰恰是他醞釀重大戰略轉型的日子。

44 彭德懷：〈財政經濟政策——摘自在北方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提綱〉（1940年9月25日），《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河南部分）》一，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頁。

45 毛澤東：〈關於目前戰爭局面和政治形勢〉（1939年1月28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48頁。

46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05-506頁。

47 〈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1938年10月12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頁。

抗戰的主要戰爭形式是正規戰，也只有正規戰才能最後戰勝敵人與驅逐敵人出境。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也當採取正規戰的方式和敵人作戰，而且也要用一切方法造成將來能夠和敵人進行正規戰的一切條件，這些都是無需說明的。⁴⁸

宣俠父也說：「游擊戰的重要性的存在，並不是用以來否認正規戰的重要意義的，恰恰相反，要使游擊戰能夠發揚其最大的戰果，必須有堅銳強大的正規軍與之配合作戰，才能充分實現。……如果全中國的正規軍都成為游擊隊，這就說明了，敵人已經得到完全勝利，而我們已經真的亡了國。」⁴⁹

4月21日，默察形勢半個多月的毛澤東終於下定決心，打破沉默，與張聞天、劉少奇一起，發出〈關於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宣佈：「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與正在深入的群眾工作兩個條件之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廣大地發展抗日游擊戰爭是可能的，而且堅持平原地區的游擊戰爭也是可能的」；指示號召全黨和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採取盡量廣泛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⁵⁰也正是從此時起，中共和毛澤東下定了破釜沉舟的決心，不再像之前那樣戚戚於前方到陝甘寧邊區的後路問題，將主力推向華北大平原的決策本身，某種程度已經是斷絕後路之舉，根據地的後路就是根據地自身。⁵¹

48 劉少奇：〈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劉少奇選集》上，第271頁。

49 宣俠父：〈關於游擊戰爭問題的兩種傾向及其真實意義〉，《論游擊戰》，漢口獨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49頁。

50 〈關於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中共中央文集選集》第11冊，第505頁。

51 應該指出的是，從軍事戰略角度考慮，中共軍隊向敵後的拓展，當然還是會盡可能保持與後方的聯繫，建立與後方的聯絡通道。晉冀地區的山地和平原事實上也形成相互應援的關係。不過，和初期以山西為中心的根據地相比，此時的後方聯絡已經難以完全保障，尤其是山東根據地，相當長時間實際處於無後方狀態。後方此時是充分條件，但不是必要條件。

22日，根據毛澤東等的電文，八路軍總部做出具體部署，調派一二九、一一五、一二〇師各部東進，兵鋒直指日本控制的冀南、冀東、冀魯邊地區。⁵² 4月下旬，一二九師三八六旅主力進到平漢路西側的冀豫邊地區，6月進入豫北；5月初，徐向前率一二九師七六九團、一一五師六八九團、一一五師第五支隊到達冀南；5、6月間，一二〇師宋時翰支隊挺進平西，與在平西活動的鄧華支隊合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三八六旅政委王新亭率七七一團進至平漢路東；6月，一二〇師七一五團主力組成的大青山支隊進入雁北，向綏遠發展。稍後，八路軍又調一二〇師到冀中，並組成東進部隊進入山東。中共武裝開始向敵後全面挺進。

由於中共適時做出向華北平原挺進的決策，正規武裝大規模進入，棋先一著，在華北平原迅速站穩腳跟，壯大根據地，國民黨重回河北部署力量時，即倍感掣肘，所謂：「迨本黨北上恢復組織，而各項工作已為他人先鞭早著，工作無進展，時受牽制與摧殘。」⁵³ 1938年底，國民黨方面控制的河北省政府報告：「目前冀省八十五縣，實際遵奉政令者，不過省府委放縣長故城、衡水、冀縣、新河四縣，而衡、新兩縣，實有彼黨組織之戰委會作梗。」⁵⁴ 省主席鹿鐘麟哀嘆：「冀省軍政實權旁落，第以孑然一身，真有進退維谷之感」。⁵⁵ 中共方面獲得的戰略主動灼然可見。1939年初，第二戰區的閻錫山聲稱：「兩個月前朱總司令來告，面交該部人馬槍彈表，人數共有二十三萬餘。查其現在陝北及在晉

52 〈朱德、彭德懷關於解決財經困難問題致毛澤東等電〉（1938年4月2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177-178頁。

53 〈國民黨河北省黨部1938年1939年兩年黨務工作總結，第二十六督導區所屬清豐縣黨務工作計劃向省黨部的報告〉（1938年1月-1943年2月），河北省檔案館611-1-3卷，第16頁；轉見王英維：《1935-1945年的河北省國民黨》，河北師範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第8頁。

54 程潛電蔣中正鹿鐘麟克復南宮經過及八路軍在冀部隊曲造事實，1938年12月10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20300-00005-026，台北國史館藏。

55 鹿鐘麟電賀耀組目前冀省軍政實權旁落實有進退維谷之感，1938年10月1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90300-00204-153，台北國史館藏。

緩境內者，不過三萬人，其餘分佈各省。」閻的報告，道出了八路軍實力激增的實情。⁵⁶

八路軍向華北平原挺進，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即日軍的行動。八路軍全面向華北平原挺進時，日軍主力已越過華北平原，出現在配合進攻武漢的黃河一線。直到1938年10月，日軍攻佔武漢，前方的軍事行動基本達到目標，才開始返身鞏固後方。以此，從八路軍大規模向華北平原出動，到日軍返身後方，這中間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差。可以設想，如果等到日軍返身鞏固後方時，再向華北平原進軍，地形不利、武裝力量又不如對手，遭遇的困難將十分巨大，形勢將會完全不一樣。1938年年中這段時間，可以說是歷史留給中共的寶貴空窗期，中共抓住機會，建立廣大的根據地，進行深入的群眾工作，發展強大的武裝，打下黨和軍隊力量的基礎，實現了在華北平原的大發展。對這段歷史，中共後來曾總結道：

我們可以把敵後抗戰基本上分為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敵軍向我正面猛烈進攻，我軍乘敵立足未穩，以堅決果敢的行動，長驅直入，縱橫於晉、冀、魯、豫、蘇、皖的廣大地區，領導敵後人民，創造了許多大塊根據地和生長壯大了主力部隊。這一整個時期，敵人正面進攻，敵後兵力分散，統治不穩。這一整個時期，我軍處於主動有利地位，是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猛烈發展的階段。⁵⁷

挺進華北平原的意義當然不局限於這半年的發展，平原游擊戰的思路，可謂戰略方向上的革命性變化，將中共的戰略重心由山西一隅推向整個華北，使得持久抵抗的活動空間大為增加。山西雖然是中共出兵最早的落腳地，但處於多種力量競爭之下，地域、人口、資源有限，制約中共進一步的發展。以發展武裝離不開的槍支為例，中共注意到：「山

56 程潛呈蔣中正擬具糾正第八路軍行動辦法三案，1939年1月25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20300-00049-032，台北國史館藏。

57 〈敵後形勢和建設民兵問題〉（1941年11月），《朱德軍事文選》，第437頁。

西特點是群眾中槍支甚少，甚至沒有，過去山西不准民間有槍。而山東擴大來的戰士即帶有武器。河北許多富人有槍，豫北也是，都可打條子借。」⁵⁸ 中共武裝向華北平原展開，空前擴展獲得巨大人力、物力資源的機會，大大推動游擊戰的展開和根據地的建立，後來中共在華北之所以能夠扎住腳跟，成大氣候，這一決策是決定性的。毛澤東評判，日軍「將華北兵力集中於徐州，華北佔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游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⁵⁹ 是為的論。1939年，共產國際也說：

華北省份人口超過1億，這個地區有充足的糧食，老百姓都很愛國，並且極其仇恨日軍的暴行。這就意味著，這裏具有進行長期游擊戰所需要的一切條件。只要與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就能得到他們長期的支持。八路軍不能向西部運動，在那裏它沒有什麼可做的。八路軍也不能在陝北邊區建立根據地，那個地方太窮了。⁶⁰

可以不誇張地說，1938年後中共不斷向勝利挺進的勢頭（儘管這中間還會有曲折），就是從平原游擊戰的決策開始的。

2. 游擊戰和根據地

中共在做出平原游擊戰的決策時很清楚，和日本人的真正較量，在日軍返身鞏固後方時才會開始。如何在日軍回防時保證自己的生存，是中共決定向平原地區大規模出動時就需要應對的問題；事實上，毛澤東的相關著述中的確也給予足夠關注。稍後於開展平原游擊戰決策，醞釀已久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及〈論持久戰〉兩個文本即告出爐。

58 〈楊尚昆在中共晉冀豫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39年9月11日—13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2卷，第477頁。

59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05—506頁。

60 〈中國小組會議第1號記錄〉（1939年7月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212頁。

兩個文本中，毛澤東站在總體戰的高度，從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幾個角度對此作了富有辯證色彩的回答。儘管這兩個文本論述範圍遠遠不止於平原游擊戰，但這一問題的解決，無論在1938年的當下還是整個抗日游擊戰爭中，都牽一髮而動全身。平原游擊戰的決策和上述兩個文本的發表，在時間上連貫、集中，當非偶然。

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強調：「戰爭的長期性，隨之也是殘酷性，規定了游擊戰爭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於是根據地的問題、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等等也發生了。於是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⁶¹所謂「異乎尋常」，所謂「向戰略敲門」，平原游擊戰都是關鍵中的關鍵。平原游擊戰拓展了游擊戰的思路，打開全面向敵後尋求生存發展之門；從此，中共必須絕境求生，在持久抵抗日軍的較量中，爭取自身的生存發展。5月4日，做出平原游擊戰決策後的半個月，毛澤東致電項英，縱論新四軍的敵後生存問題，其實也是闡述中共整個武裝的敵後生存發展之道：「在敵後進行游擊戰爭雖有困難，但比在敵前同友軍一道並受其指揮反會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敵情方面雖較嚴重，但只要有廣大群眾，活動地區充分，注意指揮的機動靈活，也會能夠克服這種困難。這是河北及山東方面的游擊戰爭已經證明了的。……在一定條件下，平原也是能發展游擊戰爭的，條件與內戰時候很大不同。」⁶²這最後一句，特別值得重視。十年內戰時期，國民黨追求的是對全國的全面統治，中共不得不在政治、軍事力量的夾縫中求生存，山區、邊緣地區是最好的選擇。抗戰時期，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出於多種因素，日本在中國更多是有限佔領，主要以攫取資源而不是實現全面佔領為目標；中共生存地域有了更多的選擇，包括平原地區，如果不在日軍的交通線或者資源攫取地域，通過努力獲得生存並非沒有可能。

61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05頁。

62 〈放手開展敵後游擊戰爭〉（1938年5月4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27頁。

這一點，中共後來在敵後生存實踐中深有體會。比如冀魯豫邊區，「農產以小麥為主，其次是高粱、玉米、穀子、棉花、工業生產量小。在糧食方面能自給有餘，村莊相距有二三里，村村有溝道，便於開展游擊戰爭。」⁶³ 羅榮桓談道：

過去我們總以為平原和山地比，平原鬥爭一定尖銳，實際上今天山東的情形，還是鐵道線最嚴重（包括平原地區和山地）。這裏就可看出地理條件並不是主要的。從這裏更看到下面幾種地區不同的情況。因之我之政治攻勢也就不能機械。

（一）我對敵威脅較小，分散隱蔽、政治攻勢方法，一般使用得對，就一般可以麻痹敵人。（二）在各方面——特別是四周尖銳鬥爭之下，敵力量不能即時集中或機動的地區，如×××，就會緩和一點。（三）處在兩三省間之結合部，敵雖注意改善，但其偽化治安統制是薄弱的，我有很大空隙可乘。（四）敵「掃蕩」友軍與友軍的繼續堅持抗戰，也減輕了敵對我之壓力，我之對敵鬥爭形勢取得有利條件。⁶⁴

在國際戰爭的背景下，國共日連環鬥中的敵後生存，既是戰略，更是政略，只有從這一層面予以全面理解，才能對敵後游擊戰做出更準確的把握。

應該承認，面對日軍，戰場上的敵強我弱是一個難以迴避的事實，老百姓說：「日本人機槍大炮，八路軍步槍漢陽造；日本槍聲是『不怕、不怕』，八路軍槍聲『怕、怕』。」⁶⁵ 這種從連發和獨發中聽出的「不怕」和「怕」，形象顯示了二者在裝備上的真實差距。不過，「日本帝國主義有

63 〈冀魯豫邊區的概況〉（1940年4月），《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二，第1頁。

64 〈分散性游擊戰爭與對敵政治攻勢問題——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羅榮桓在山東軍政會議上的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9輯，第317-318頁。

65 《武鄉黨的簡史》，山西省檔案館藏，B3-50，第18頁；轉見趙永強：《抗戰時期武鄉農村社會變動》，山西大學歷史系2006年碩士論文，第6頁。

兩個基本的弱點，即是兵力不足和異國作戰。」⁶⁶ 日本土地狹小，人口有限，能夠投入中國戰場的兵力持續維持在百萬上下，佔總兵力的四分之一左右。⁶⁷ 具體到戰場上，像冀魯豫，「每縣敵偽合計不過一二百人，偽軍少的，日寇就多；偽軍多的，日寇有時不過一二十人」。⁶⁸ 中共判斷：「兵力不足是敵先天性的弱點，這一矛盾，不僅現在即是將來敵人亦絕對無辦法解決。」⁶⁹

兵力不足造成後方的廣大活動空間，保有交通線完成資源攫取成為日軍最低限度的戰略目標，游擊戰和根據地針對的正是日軍這一特點，在日軍控制中尋找縫隙，通過游擊戰消耗對手、保存自身。對此，彭德懷有具體分析：

敵兵力不夠分配，只能對我分區圍攻清剿，不能在全華北向我各個抗日根據地同時進攻，即對我某一戰略區掃蕩，其清剿亦須再分區進行。這是因為敵在華北的軍事實力與我比較並非絕對優勢……敵雖對一定地區可以進行極瘋狂的掃蕩，卻在另一區，兵力又感不足，顧此失彼，成為敵人長期苦惱的事。我應靈活的掌握敵人這一缺點，相互密切配合，成為堅持華北，堅持平原游擊根據地的重要條件之一。⁷⁰

66 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10頁。

67 美國外交官1943年報告：「中國同時牽制了二百五十萬日軍中的六十萬部隊」（〈遠東司司長韓密爾頓備忘錄〉〔1943年2月11日〕，《中美關係外交文件——一九四三年》，台北聯合報社1962年版，第3頁），這應該是僅指關內日軍兵力而言，其所言比例則大體符合事實。

68 李聚奎：〈先遣、築先兩縱隊的生長與戰鬥〉（1940年7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329頁。

69 〈彭德懷關於平原抗日游擊戰爭的幾個具體問題對魏巍同志的答覆〉（1942年7月15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685頁。

70 彭德懷：〈關於平原抗日游擊戰爭的幾個具體問題對魏巍同志的答覆〉（1942年7月15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384頁。

兵力不足，異族入侵，帶來控制的困難，使中國有了迴旋餘地。中共和毛澤東的戰略指導，又讓日軍軟肋充分暴露，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三駕馬車，就是中共克敵持久的抵抗鏈條。

作為「向戰略敲門」的游擊戰，毛澤東的規劃有許多獨創性，游擊戰和根據地的聯結堪稱巧妙。蘇維埃時期的根據地常常就和游擊戰聯繫在一起，此時的根據地實際即為中共的割據區域，是中共生存的命脈，要進行武裝革命，除此一途別無選擇。而且蘇維埃時期根據地幾乎都位於山區，多處數省交界之地，統治力量薄弱，又利用著國民黨內部衝突的弱點，游擊戰的進行和根據地的發展相對簡單得多。即便如此，根據地生存還是相當困難，如中共自己總結的：「過去在蘇維埃運動時代，我們學會了創造根據地，但那時重大缺點是沒有長期打算的明確觀念，因此根據地的人力，物力，財力就不免迅速枯竭了。」⁷¹ 最終南部地區的蘇維埃根據地無一例外遭到挫敗。

蘇維埃時期根據地的建立儘管遭到挫敗，但對中共發展壯大仍然起了無法低估的作用。鑒於此，抗戰伊始，和游擊戰提出幾乎同時，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即被強調。此時，和蘇維埃時期不完全一樣，中共已經擁有陝甘寧邊區這一總後方，全國也處於民族統一戰線的大背景下，中共根據地的創建不是為了自身的單純存活，而有抵抗和生存發展的雙重功能。這樣的生存發展不是建立在單純的地域佔據原則上，否則就有可能形成對日的陣地戰，這是中共武裝不可能也無力進行的。此時的抗戰根據地尤其是平原根據地前出到對手後方，既是中共武裝的前進陣地，又是游擊戰爭的後方，還是貫徹中共黨政軍民總體戰的基地，一身而擔數任，具有十分複雜的內容。毛澤東都需要對這些拿出有說服力的解釋。

一般的理解中，游擊戰和根據地兩個概念多少有點衝突，游擊戰強調「游」，不以佔取地域為原則，戰鬥目標往往通過游動實現；根據地

71 〈集總關於魯西軍隊工作的指示〉（1940年7月24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321頁。

則重在「據」，所謂「依靠一地區之人力物力以支持抗戰者」，⁷² 需要通過對某一地區的佔領、管理和控制予以落實，要求具有相對的固定性。兩者一動一靜，各具特點。這樣表面的衝突對已經鑽研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並對矛盾的鬥爭統一頗有心得的毛澤東不是難題。抗戰時期，鑒於敵強我弱的戰爭態勢和中日兩國多種因素較量下形成的戰爭持久性質，戰爭形態犬牙交錯，此即毛澤東所言：「抗日戰爭是整個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的；但是主力軍和游擊隊的關係，則是主力軍在內線，游擊隊在外線，形成夾攻敵人的奇觀。各游擊區的關係亦然。各個游擊區都以自己為內線，而以其他各區為外線，又形成了很多夾攻敵人的火線。」⁷³ 在這裏，整個的敵後戰場以廣大的大後方區域為內線，中共的根據地以陝甘寧後方為內線，各個根據地又互為內線。在這種背景下看待游擊戰和根據地，就有了不一般的意義。游擊戰和根據地都是對日抵抗系統中的一環，根據地是游擊戰的內線，但游擊戰依靠的根據地並不是靜止、孤立的，而是和其他根據地以及更廣大的對日抵抗後方相互支撐。從戰略層面言，根據地本身就是游擊戰略的一環。朱德曾經談道：「發動群眾游擊戰爭與在敵人後方建立小塊小塊的根據地，來分散敵人力量，削弱和疲憊敵人，這是戰略上著眼爭取主動，造成戰役上各個擊破敵人，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⁷⁴ 建設多點開花的根據地、戰略區，使之成為撒播在敵後廣大地區可以相互支持、相互應援的大網，每一塊根據地的存在都是其他根據地的支持，此起彼伏，此落彼起，這樣，根據地某種程度又是游擊戰略區。

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甚至提出根據地也是可以游動的：

72 聶榮臻：〈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39年1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1冊文獻選編（上），第229頁。

73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71頁。

74 〈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問題〉（1938年1月），《朱德軍事文選》，第306頁。

大抵當敵人結束了他的戰略進攻，轉到了保守佔領地的階段時，對於一切游擊戰爭根據地的殘酷進攻的到來，是沒有疑義的，平原的游擊根據地自將首當其衝。那時，在平原地帶活動的大的游擊兵團將不能在原地長期支持作戰，而須按照情況，逐漸地轉移到山地裏去，例如從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轉移，從山東平原向泰山和膠東半島轉移。但是保持許多小的游擊部隊，分處於廣大平原的各縣，採取流動作戰，即根據地搬家，一時在此一時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不能說沒有這種可能。至於利用夏季的青紗帳和冬季的河川結冰之季候性的游擊戰爭，那是斷然可能的。

也就是說，由於敵強我弱的總態勢，根據地不應一成不變，必須隨著力量的轉換而轉換，無論是強調「游」的游擊戰和強調「據」的根據地都不主張正面攔日軍之鋒，而是因勢利導，靈活機動，是戰略和政略的結合。當然，由於條件的限制，毛澤東說的整塊的根據地游動有一定困難，但是根據地內的游動及相鄰根據地間的相互支持，確實成為根據地存活的重要方式。同時，根據地的性質隨著敵我力量的變化也相應發生改變，可以分為穩固的根據地、游擊根據地、隱蔽根據地等多種，目的是在尊重現實力量的前提下，盡可能保住根據地的火種。

游擊戰爭根據地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既是後方，又沒有後方。毛澤東指出：

游擊戰爭的根據地是什麼呢？它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爭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託。無後方作戰，本來是敵後游擊戰爭的特點，因為它是同國家的總後方脫離的。然而，沒有根據地，游擊戰爭是不能夠長期地生存和發展的，這種根據地也就是游擊戰爭的後方。⁷⁵

75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20、418頁。

當中共決心把主力投入敵後方游擊戰時，即需面對華北游擊戰場同陝甘寧邊區乃至整個國家的總後方脫離、進行無後方作戰這一可能，在這種總體上無後方的狀態下，根據地可以幫助中共獲得局部後方。楊尚昆曾細數根據地的作用：「（一）堅持長期戰爭，驅逐敵人消滅敵人的依託；（二）生息與壯大革命武裝的源泉；（三）發揚與培植民力，進行各種有利戰爭的建設保證最後勝利的基地；（四）與敵偽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鬥爭的堡壘；（五）維繫敵後民心，提高全國人民的自尊心與自信的燈塔。」⁷⁶有了根據地，游擊隊才能在物資、人力上獲得源源不斷的支持，才有持久的條件；開闢、堅持和發展根據地，中共的政策才能得到施展，控制才能發揮效力，黨、軍隊和民眾的結合才有基礎。

根據地從戰略上說，是插入對手後方的楔子，既滋養、鞏固自身，又破壞、擾亂對手，根據地的存在，不僅是中共力量伸展的觸角，還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對其形成威脅。當時的文件說得很清楚：

民眾失去了政府，在敵人的壓迫之下，就像喪失了父母的孤兒，只好隨人擺佈。焚燒打殺，姦淫搶掠，任敵人硬來軟去，隨心所欲。但是，有游擊隊活躍的時候，民眾不但有了行動的方向，而且增加了勝利的信心。在這種情形之下，敵人即使佔領一片地方，但它想要建立這一個地方的政權卻是非常困難的。⁷⁷

根據地既是點，又是面，既固定，又移動，關鍵在於與政權、民眾結合在一起。黃敬說：「游擊戰爭不是隨便搞的，非有其一定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社會基礎是不行的。」⁷⁸說的就是中共游擊戰爭各個環節形成鏈條的系統性。相比之下，國民黨敵後游擊更局限於單純的軍事行動，

76 楊尚昆：〈鞏固抗日根據地及其各種基本政策（節選）〉（1940年8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383-384頁。

77 朱德：〈論抗日游擊戰爭〉，《朱德軍事文選》，第372頁。

78 黃敬：〈對敵鬥爭報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9頁。

缺乏黨政軍民的配合，缺乏堅固的根據地的建設，持久生存的效能要差很多。中共判斷：「友黨友軍最大與很難克服之困難，即政治之繼續落後，與群眾脫離，堅持敵後抗戰一般辦法不多，尤其不善建設根據地。」⁷⁹ 點出了國共兩黨敵後生存處境相異的要害。

3. 游擊戰和正規軍

中共的游擊戰，理論上應該是群眾性的，中共也一直向這一方向努力，但是，發動和武裝民眾，讓民眾具有游擊的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李雪峰回憶，抗戰初期，「習慣於在城市發動工人搞革命的黨員，轉到面向農村，面向農民，確實是一個戰略上的大轉變，思想上的大轉變，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大轉變。這種轉變在1937年秋冬季還處在被動的過程中。因此，我們雖然盡了很大努力發動組織民眾，但效果並不突出」。⁸⁰ 戰爭中，機會常常轉瞬即逝，八路軍出動後，要迅速在敵後建立根據地，指望剛剛著手建設的群眾性游擊隊並不現實，以正規軍分散投入發動游擊戰爭、創建根據地幾乎不可避免。正規軍的加入是作為戰略的游擊戰能夠成立不可或缺的一環，此正如關向應給李井泉的信中所說：「支持游擊戰爭的力量，是以八路軍的正規軍作基幹的。」⁸¹ 就實際展開和運作狀況看，抗戰時期所有重要根據地的建立，都離不開正規軍的幫助，大部分根據地更是由正規軍直接締造。

正規軍打游擊戰，是基於抗戰的持久性質，基於開拓和堅持敵後根據地的需要。強大正規武裝的進入，可以迅速實現區域的佔領和控制，

79 〈五年來工作總結及今後任務〉(1943年8月19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0輯，第25頁。

80 李雪峰：《李雪峰回憶錄(上)——太行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

81 〈關向應同志給李井泉同志的一封信〉，《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8卷，第19頁。

所謂「紅軍任務在於發揮進一步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華北游擊戰爭，同日寇力爭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游擊根據地。」⁸² 根據地初步形成後，正規軍仍然是中流砥柱，需要承擔保衛根據地的重任，幫助建立、發展地方武裝，開展群眾運動，此即毛澤東所言：「一切游擊戰爭的根據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裝部隊、戰勝了敵人、發動了民眾這三個基本的條件逐漸地具備之後，才能真正地建立起來。」⁸³

游擊戰以動補拙，以巧擊強，戰術的靈活相對可以彌補部隊的弱點，但游擊軍本身的素質仍然是游擊戰成功的要素，不少中共將領都對游擊部隊提出要求，彭雪楓總結為：「(一)指揮員機動性強，果敢決斷，富有大無畏精神。(二)部隊行軍力強。(三)能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困苦饑寒。(四)能冒一般人所不能冒的危險艱難。(五)迅速、堅決、秘密。」⁸⁴ 戰爭史上，很多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的部隊，恰為優中選優的精兵強將，無論從身體還是精神言，這樣的任務都是超常的考驗。以下兩則記載，可以窺出游擊戰的艱苦程度：

一連多天的夜行軍，為了迎接「紅五月」，打完靈石車站，緊接著在黎明之前，我們又轉移直到離平川四五十里的山裏才休息。第二天黃昏又走，到天亮才駐紮下來，過了兩天，又轉移。不要說敵人不知道我們的行動，就連我們戰士，也是事後才知道我們的具體行動的。⁸⁵

天將拂曉，我們正向呂梁山之巔關帝山前進。冷凍和疲勞侵襲著我們，一種浸透在冰窖似的冷從兩旁的高山、叢林壓下來，穿過衣服，皮膚，直刺心骨，人們臉上、衣領都披了層白霜。我的皮帽的

82 〈毛澤東關於八路軍的任務及部署致朱德等電〉(1937年11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101頁。

83 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24頁。

84 〈游擊戰術的幾個基本作戰原則〉(1938年7月7日)，《彭雪楓軍事文選》，第81-82頁。

85 《高魯日記》，1939年8月2日，第17頁。

兩耳和大衣領子凍結在一塊，鼻涕不斷的從發痛的鼻孔裏流著，人們都像弓字形似的慢慢的前進。只要一不注意，踏在一塊小石子上，身子就會晃蕩起來，甚至倒下去，好像腿不是自己的。⁸⁶

長距離、高強度的游擊行動，對戰鬥員提出很高要求，戰術層面上的游擊戰的開展，離開了正規軍的堅強支持，很難想像。即便到抗戰中期，地方武裝的素質仍然不容樂觀：「區縣武裝政治認識模糊，不但沒有為黨為革命為群眾利益而犧牲的奮鬥目標，就是對日寇的仇視民族觀念也很差。……違犯政策破壞群眾紀律，如架票、劫路、打罵村長等現象，群眾中間有『老八路好，新八路不好』的說法。」⁸⁷所謂「老八路」、「新八路」，實際分別指的就是正規軍和地方部隊。

正由於此，抗戰開始後，中共和毛澤東的戰爭指導就把八路軍出動的任務規定為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1937年9月3日，毛澤東電告周恩來：「令知三省省政府轉令各縣縣政府，同時令知各縣及其附近之駐軍，說明紅軍之佈防及創造游擊根據地之任務。因為如不明白規定紅軍之區域及任務，並用通令下達友軍及地方，勢必因區域不明、任務不定而發生許多糾紛。」⁸⁸對八路軍為什麼要把重心放在游擊戰和創造根據地上，毛澤東有自己的解釋：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

86 山西新軍歷史資料叢書六卷《工人武裝自衛旅》（附錄）〈王慶生日記〉，1941年12月3日，工衛旅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1989年版，第108頁。

87 〈冀魯豫軍區1942年工作初步總結〉，《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頁。

88 〈毛澤東關於與閩錫山交涉八路軍活動地區問題致周恩來等電〉（1937年9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26-27頁。

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⁸⁹

1938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大規模開展平原游擊戰的決策後，八路軍調派徐向前往冀南、一一五師一部往山東、一二〇師往冀中，大規模出動正規軍開闢和擴大平原根據地，可以說是不惜血本將正規軍投入游擊戰和根據地建設的大膽決策。即便是獨立發展起來的山東根據地，中共武裝也迅速整編為山東縱隊，向正規化方向發展。正規軍在游擊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得很清楚：「在全國的數百萬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數十萬人，分散於所有一切敵佔地區，發動和配合民眾武裝，從事游擊戰爭，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軍隊，要自覺地負擔這種神聖任務，不要以為少打大仗，一時顯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資格，這種想法是錯誤的。」⁹⁰

客觀看，毛澤東的解釋有戰略上的前瞻性。由於改編為八路軍的紅軍人數有限，僅三個師，這些有限的兵力如投入正面戰場進行陣地抵抗，很可能尚未充分發揮作用，就已被消耗。況且，中共參戰還牽涉到對國民黨的信任問題，包括能力和誠意的信任，而游擊戰和發動群眾是中共素來的強項，八路軍在這方面發揮作用比投入正面戰場效能遠為充分。政策實施的實際效果的確也是這樣，由於八路軍挺進敵後，在華北廣泛開闢根據地，堅持了華北抗戰，對中共的生存發展、相應地也對中國整體的抗戰持久產生了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對此，毛澤東有自己的體會：

我們的戰略轉變，是在這些特殊情況之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成為游擊軍（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游

89 〈關於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1937年9月21日），《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資料叢書·文獻選編》抗日戰爭時期（一），第4頁。

90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99頁。

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雖然曾經在中央和一部分軍事幹部之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這一轉變關係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⁹¹

其實，不僅僅是整個的黨，毛澤東個人的威望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上升。抗戰初期，毛澤東頂著黨內、軍內的壓力，堅持游擊戰的方針，堅持開闢根據地，使中共把握住機會，奠定在華北的戰略地位。到1939年前後，這一決策的成果不斷顯現，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自然水漲船高。

游擊戰的發動和堅持都離不開正規軍，毛澤東說：「全國組成若干個大的野戰兵團，其兵力針對著敵人每個野戰兵團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採用上述方針，與敵周旋於廣大戰場之上。這種方針，不但是正規戰爭用得著，游擊戰爭也得著，而且必須要用它。」⁹² 抗戰之初，中共部隊經過了「由正規軍分散成許多游擊軍」⁹³ 的階段；隨著戰爭的進行，游擊軍也要逐漸轉化為正規軍，「這是游擊隊最光榮的前途」。⁹⁴ 不過，正規軍的加入並不是要打大仗。初期，正規軍主要任務是開闢根據地，為持久抗戰培植基礎，三五九旅政治幹部王恩茂日記載，他率部到廣靈、渾源開闢根據地時，具體任務有：(1) 打擊偽軍，肅清漢奸，消滅土匪；(2) 爭取群眾、宣傳和教育群眾；(3) 擴大部隊；(4) 收集資財、籌款；(5) 發展黨的組織，恢復政權；(6) 破壞敵人交通。⁹⁵ 壯大部隊和籌集資財是核心任務。抗戰持久階段，正規軍進可襲擾和威懾日軍，退可使根據地的黨和政權、群眾有武力依恃，有效支持

91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51頁。

92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86頁。

93 〈彭德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九月高幹會議上報告的摘錄〉（1940年9月25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668頁。

94 〈鄧小平在太行軍區第二次武裝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41年2月1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4卷，第103頁。

95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1938年7月5日，第202頁。

根據地的控制。另外，正規軍可以培植武裝力量，充當游擊部隊的基幹隊伍，按照劉伯承的解釋：「野戰軍和軍分區兵團，原為軍區和軍分區的幹隊，現分在下層，係去幫助組成和強化游擊集團者，是因地方武裝太弱不得已而採用的辦法，在游擊集團組成和有力時，則仍收回作本級幹隊機動或整訓」；「在軍事上，分隊起偵察、防諜、箝制、疲敵、耗敵作用，幹隊起襲弱、機動、突擊作用，實行合量的游擊運動戰。」⁹⁶ 終整個抗戰，正規軍都是敵後游擊戰的核心力量，只是在不同的時段發揮著不同的功能。

應該指出，劉伯承提到的游擊運動戰，不見於毛澤東的文本。游擊戰和運動戰兩者，既互補又衝突，把握極其不易，一般而言，毛澤東強調的是游擊戰，前方將領則常從實戰出發，不排斥運動戰。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抗戰初中期，毛澤東和前方間思路不無差異，其間是非很難簡單判定，如果放在一個動態的環境中考察，或許理解起來會更容易一些。

公開的文本中，毛澤東一直主張游擊戰應與運動戰結合，甚至公開闢謠道：

有人說，我們只主張游擊戰，這是亂說的，我們從來就主張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運動戰為主，以其他二者為輔，在將來要使陣地戰能夠有力地配合運動戰。而游擊戰，在他對於戰鬥方式說來，則始終是輔助的，但游擊戰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戰爭中，特別在地域廣大的國家，無疑在戰略上佔著重大的地位。⁹⁷

不過，在內部掌握的致前方電文中，毛澤東確實更加強調游擊戰的重要性，甚至常常遏制前方的運動戰衝動。1941年2月5日，在蘇聯療

96 劉伯承：〈關於游擊集團的訓令〉（1941年6月30日），《劉伯承軍事文選》第1卷，第377頁。

97 毛澤東：〈同合眾社記者王公達的談話〉（1938年2月），《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00頁。

傷的林彪致信季米特洛夫說：「當日軍和國民黨軍隊之間戰鬥開始時，我不止一次地請求中央允許組織對日本人的有力打擊，但我沒有得到任何答覆，只好自己主動在平型關進行作戰……為了追求擴大地盤和加強自己在群眾中的影響，一些人放棄了迫切的任務，放棄了對日組織大的戰鬥的必要性，而這種戰鬥，無論對於贏得蔣介石的抗日立場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還是贏得八路軍作為中國抗日軍隊之一的榮譽，都是有必要進行的。」⁹⁸ 林彪暗示高層有人對作戰不夠積極。不過，作為後方的指揮者，毛或許有其盱衡全局，把握軍事上有利和不利的考量。更重要的是，對毛澤東而言，游擊戰既是戰略，還是政略；游擊戰不僅僅是戰，還是開闢和保護根據地的方式、對日堅持的手段、對外宣傳的陣地、應付國民黨批評的箭垛。由於對日戰爭不可避免陷入持久，堅持、發展是中共的首要任務，游擊戰進可攻，退可隱，隱是常態，攻是變態，最適合這樣的要求。

當游擊戰上升到戰略和政略高度時，身處戰場第一線的前方將領思考的則可能是另一方向。由於正規軍成為游擊戰爭的一員，尤其根據地成為游擊戰爭的後方基地，游擊戰不再只是騷擾和小規模的襲擊，在一定時間、一定條件下集中兵力打擊敵人不但可能，而且必要。這一點，親身指揮作戰或根據地建設的前線指揮者體會尤為深刻：

游擊戰與運動戰之間並無一條鴻溝，而是相互連貫著的。就游擊戰向正規的運動戰發展的過程及其連貫性來看，各縣區游擊集團中的幹隊，就是游擊隊向正規軍發展的雛形，軍分區的基幹支隊，也就是游擊隊壯大的正規軍。在戰術上說，這些基幹支隊和縣區幹隊輾轉會合其周圍較小的游擊隊進行突擊，就等於正規戰的突擊隊，而其周圍較小的游擊隊則等於它的箝制隊，游擊隊襲擊駐止之敵，是向正規戰的進攻戰鬥發展的；伏擊運動中之敵，

98 〈林彪給季米特洛夫的信〉（1941年2月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9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143頁。

是向預期遭遇戰鬥發展的；敵我都在運動之中，而我急襲敵人，這又是向非預期遭遇戰鬥發展的。⁹⁹

正因此，戰爭初期，即便像聶榮臻這樣堅定執行毛澤東戰略方針的前方指揮者，也曾經強調要開展運動戰：「今天我們的部隊已經不是小的游擊隊，因此指揮的方法也已經不是小規模的游擊戰爭。今天需要提高戰術，進行正規戰的運動戰。不僅要在游擊戰中破壞、騷擾敵人，而且還要有決戰的意義。」¹⁰⁰ 在他們看來，既然游擊戰成為戰略，那麼運動戰作為幫助游擊的必要手段，也可納入游擊戰的戰略原則內，百團大戰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不過，前方將領的認知中較少會考慮游擊戰不僅是戰略，還是政略。隨著時間的推移，敵後生存環境日漸艱苦，加之毛澤東的堅持，無論前後方，都越來越強調堅定執行游擊戰的方針，百團大戰後尤其如此。1942年，蕭克曾經談道：

要認識今天在敵後主要的戰爭形式是分散的廣泛的游擊戰爭，運動戰的可能已大大的減少了；游擊戰是廣泛的分散的，既不能取得轟轟烈烈的大勝利，故必須爭取多數的小勝利，由於敵人高度的分散配備，打小仗的機會是很多的（但不是否認在敵人不分散的情況下也有打小仗的機會）。過去我們有些同志只想打大仗，總是想把部隊集中訓練，以便一有機會，就大幹一場；這種想法是不適合於今天的鬥爭環境的。¹⁰¹

這大體代表了此時全黨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正規軍的作戰衝動，應該服務於游擊戰的戰略和政略需要，這是中日對峙環境下，毛澤東計劃的正規軍和游擊戰關係發展的邏輯結果。

99 劉伯承：〈對目前戰術的考察〉（1939年4月20日），《劉伯承軍事文選》第1卷，第208頁。

100 聶榮臻：〈幾個月來支持華北抗戰的總結與我們今後的任務〉（1938年4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1冊文獻選編（上），第115頁。

101 蕭克：〈在晉察冀邊區黨政軍高幹會上的軍事報告〉（1942年9月12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236頁。

4. 游擊戰和總體戰

抗戰紛繁複雜的形勢下，毛澤東堅持生存發展原則，賦予游擊戰以戰略和政略的雙重意義，主要不以戰爭，而以我之頑強生存，破壞、抑制對手的控制，達到對敵持久、削弱對手的目標。生存追求看起來不那麼積極，但要在深入敵後的背景下做到，絕非易事。面對日軍優勢兵力包圍，如不具備正確的戰略戰術和超常的生存能力，很可能就是以羊飼虎，尤其在平原地區開展游擊，建立和堅持根據地，更是如此。真正讓毛澤東放手一搏，將正規軍投入華北平原開展敵後游擊戰的，除了擁有幫助持久的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這「三駕馬車」外，還在於他對中共軍隊的自信，中共武裝具有將游擊戰打成政治經濟社會總體戰的能力，離開了這種能力，所有的戰略戰術思考都不免紙上談兵。

游擊戰應為總體戰，有這樣的認識不足為奇，當時一般輿論人士就談道：「游擊戰術，不只有其軍事的性質，而且有其社會的性質，不只是一種奇兵戰，而且是一種社會戰。簡單的說，游擊戰術是一種以奇襲制勝敵人的一種全民的社會戰。」¹⁰² 1936年，毛澤東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對戰爭的複雜性、多因素特徵如數家珍，總體戰對他而言不是太大的理論難題。總體戰的概念最早為德國人魯登道夫撰寫的《總體戰》一書提出。1937年1月，張君勱將《總體戰》譯成中文出版。核心含義為：「全體性戰爭中，為達到民族之最高效率計，其所謂政治，務求以民族生存為唯一目的，而對於國民應責以各方面之任務，亦以民族生存為唯一目的。此各方面之中，當然不可忽視精神力。」¹⁰³ 總體戰對應的是現代戰爭巨大的覆蓋性，舉凡政治、軍事、經濟、社會乃至精神文化都可納入對戰雙方較量的範圍，這和中共游擊戰的思路若相契合。《總體戰》出版後，立即引起毛澤東的注意，1937年12月，毛致函郭化若，要他閱讀一批軍事戰略著

102 丁三：《民眾怎樣參加游擊戰》，廣州戰時出版社1938年版，第26頁。

103 魯登道夫著，張君勱譯：《總體戰》，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

作，包括：「日本人的論內外線作戰，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蔣百里的《國防論》，蘇聯的野戰條令等。」¹⁰⁴ 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即《總體戰》。

當然，問題的關鍵常常不在是不是知，而在能不能行。中共自信：「我黨已是華北最大的政黨，八路軍具有游擊戰爭的特長，華北抗日游擊戰爭的領導責任，就自然落在我黨身上。」¹⁰⁵ 這樣的自信背後，是中共一整套政治、軍事和社會運作機制。

堅強的政治工作是游擊戰能夠充分發揮效能的基礎。彭雪楓談道：

常遇到一些敵後抗戰的朋友們說：「我們的隊伍化整為零倒容易，要是化零為整就不可能了。」那原故就在於不懂或者不願進行政治工作。有一次某地方部隊派出一個連，向敵人游擊偵察時，全部一哄而散，不知所終了。這還不足以證明游擊部隊沒有政治工作必會土崩瓦解的血的教訓嗎？¹⁰⁶

彭雪楓恰切道出了中共部隊和其他武裝力量的關鍵區別。抗戰之初，為適應國共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中共曾調整部隊結構，但政治委員制度很快恢復，¹⁰⁷ 政治教育和政治訓練從未放鬆，王恩茂日記記有在部隊中開展學習動員的程序：首先是會議動員，經過黨支部大會、小組

104 《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頁。

105 劉少奇：〈獨立自主地領導華北抗日游擊戰爭〉，《劉少奇選集》上，第94頁。

106 〈平原游擊戰的實際經驗〉（1939年5月31日），《彭雪楓軍事文選》，第142頁。

107 八路軍出動後不久，朱德等即致電張聞天提出：「部隊改編，政治工作人員的公開地位降低職權，因而影響到政治工作人員積極性降低，政治工作已開始受到若干損失。而在各級指揮方面，仍有個別同志因改單一領導不大接受他人意見，多數單一首長感到自己能力不夠，致使軍隊建設上也受到某些損失。對此現象，我們認為除教育幹部反對地位觀念及輕視政治工作外，還需積極地從組織上得到適當地解決。」（〈關於恢復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原有制度的意見〉（1937年10月19日），《朱德軍事文選》，第290頁）朱提議設立黨代表制，全面恢復軍隊政治工作原有制度。22日，張聞天、毛澤東覆電：「完全同意」，「惟黨代表名義不妥，仍應為政治委員」。（〈張

會、支委會、軍人大會，傳達到每一個人。接著發起競賽運動，提出一個半月的競賽條約，大家比著學，其間黨員要領導、幫助學習，做學習模範。再是開展反對不願學習的鬥爭，鼓勵和鬥爭並進。為檢驗學習效果，還要有經常性的個別談話和鑒定、測驗。¹⁰⁸對於分散的部隊，中共尤其強調加強黨的建設，規定：「堅決保證每個戰鬥班排經常有1/3的黨員」；¹⁰⁹「小部隊黨的數量比一般的部隊應該增加，最少要達到30%，最好能達到50%至80%。」¹¹⁰

中共不僅重視政治工作的實踐，還力圖強化政治工作的理論，形成系統論說，羅瑞卿就明確要求：「我們必須把這些寶貴的經驗加以研究，加以整理，使之系統化，使之變成理論的東西，來指導我們政治工作今後的實踐。」¹¹¹持續的黨的建設和政治訓練，風行草偃，的確使中共部隊明顯區別於一般的軍事力量，毛澤東談道：

現在我們的有些戰士，他們識字比營長識得多，他們從前一個字也不認識，現在能認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寫短短的文章，登在牆報上。我們的營長、連長，在指導員上課的時候，不去聽課，他們以為這課是戰鬥員聽的，他們去聽，未免要「失格」

閔天、毛澤東關於恢復軍隊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制度致朱德等電（1937年10月2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78頁）24日，朱德、彭德懷轉發中共中央命令，決定軍隊中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團以上及獨立營設立政治委員」，「師政訓處立即改為政治部」。（〈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轉發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在軍隊中領導的決定的命令〉〔1937年10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80頁）

108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1938年6月27日，第196頁。

109 〈中共晉冀豫區委軍事部關於武裝工作的決定與指示〉（1938年9月4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377頁。

110 〈冀魯豫區小部隊建設問題〉（1942年12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415頁。

111 〈羅瑞卿同志在北方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的政治工作報告〉（續完），《前線月刊》第7期，1941年1月。

了！為了要維持「格」，結果，他們不但文章不會做，許多東西都不知道，戰士反而比他們高明。¹¹²

毛的這一說法，在王恩茂日記中得到驗證。1939年1月部隊開展的一次測驗中，戰士平均得分92.5分，炊事員57分，黨員90.6分，黨的幹部90分，測驗結果，戰士成績最好。¹¹³ 戰士水準的大幅度提高，彌補了一般軍隊的所謂短板，有助於部隊整體政治水平的提升，而部隊政治教育的核心，又在於造成共產黨內部的凝聚力。毛澤東說得很明確：「在政治課課程內容上，必須教列寧主義，這是政治上武裝他們頭腦的很基本的問題。此外，民眾運動，共產黨問題，八路軍問題，亦應當作專門課程教，而統一戰線倒可放到中國革命運動史以內教。」¹¹⁴ 通過政治教育，中共部隊多了軍人服從天性之外的自覺追隨，儘管不是說每個個體都能達到所期望的政治覺悟，但團體意識、紀律觀念、信仰追求在潛移默化中得到灌輸、提升，是中共武裝常可在困境中生存的關鍵，也是八路軍分而不散的關鍵。

下面一段關於游擊隊組織的總結很能反映中共建軍、治軍的模式，這些步驟分開看也許沒有過於特殊之處，合在一起卻能造就特殊的力量，它們相互聯結，構成有機整體，比較能夠反映辯證思維下中共系統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方式：

首先，要從抗日保家來啟發階級覺悟；建立黨支部，加強對共產黨的認識教育。以工農紅軍的優良傳統、鬥爭歷史說明革命的過程和前途，使部隊瞭解游擊隊有走向正規軍的必要。其次，在部隊發展到相當數量時，應加以整理，進行鞏固工作。經過洗刷整

112 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78頁。

113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上），1939年3月2日，第426頁。當然，這樣的成績未必是普遍現象，但這個案例起碼可以證明中共戰士教育的深入程度。

114 〈毛澤東等關於抗大分校的教育問題致朱德等電〉（1939年3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312頁。

理後，再求得發展。再次，要慎重處理原有幹部，切忌由外面派幹部去替換，應培養提拔原有幹部中的積極分子。……領導幹部應不隱瞞缺點，充分發揚自我批評精神，檢討和承認錯誤。如違反紀律，應請公眾給予制裁。¹¹⁵

引文最後說到的請公眾制裁，不是空口虛言。冀魯豫軍區的文件寫道：「發現壞分子的方法，必須在當地群眾中去考查，從戰士中去考查很不容易。要經過地方黨，群眾團體、地方機關，在地方武裝中適當地提出口號，發動其內部鬥爭。」¹¹⁶ 也就是說，軍隊治理要面向社會展開，引入群眾監督。八路軍徵兵時，地方承擔連帶責任和保障：「每一個戰士參軍時要村閭長及兩家保人。」¹¹⁷ 冀魯豫區黨委的一份會議記錄顯示，部隊編組時也會有意加進地方紐帶：「地區隊的編制最好是本地人，至少是很熟悉當地情況的人。連以縣編制，班以區編制。(方向)——這樣才能撒得開，收得攏。」¹¹⁸ 中共這種做法和日軍編組時以地方為紐帶十分相似。努力的結果，楊思一的一條日記很有說服力：村莊裏駐有軍隊，敵我不明，但老百姓判斷是中共的部隊，原因在於，「部隊進村後，沒有老百姓逃出來」。¹¹⁹ 緊張的戰爭環境下，楊思一不經意留下的這條記錄，傳達了認知當年歷史的密碼。

黨是軍隊的靈魂，軍隊是黨的支持力量。毛澤東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¹²⁰ 軍隊造出了黨，軍隊又要聽

115 〈關於第九旅的工作〉(1942年1月27日)，《張愛萍軍事文選》，長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73-74頁。

116 〈冀魯豫軍區1942年工作初步總結〉，《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二，第64頁。

117 《高魯日記》，1940年2月20日，第82頁。

118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泰西、運東工作討論記錄〉(1943年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506頁。

119 《楊思一日記》上冊，1944年2月20日，第72頁。

120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2頁。

黨指揮，這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具體操作也肯定有博弈、妥協，但黨指揮槍的原則卻幾乎成了鐵律，這特別能夠顯示觀念有可能造成的力量。事實上，八路軍進軍華北，不僅造就了根據地，造就了武裝，還壯大了黨的力量，這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武裝和根據地的發展。所謂游擊戰爭的政略，所謂總體戰，和這一點都密切相關。

除了需要堅強的黨和軍隊外，要和軍事實力佔據絕對優勢的日軍展開游擊戰，民眾的支持不可或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¹²¹ 由於抗戰的民族自衛戰爭性質，抗戰的群眾基礎空前良好，朱德分析：「過去的國內游擊戰爭，我國的人民不是全體都同情的，那時游擊隊的隊員，也只包括工人、農民的成分。現在的抗日游擊隊，則得到我國無論哪一個階級的同情與擁護，它的成分包含著各階層不願當亡國奴的分子。」¹²² 抗戰爆發後，面對異族入侵，民族情緒雖然不一定可以過高估計，卻是不容忽視的存在。時人記載：

天津租界上的電影院裏，每當電影放映之前，必有蔣委員長影片出演，並有人報告蔣委員長領導抗日的情形，電影院全體觀眾，都一致地肅然起立，那種熱烈沉痛的表示，是可以看出，華北民眾是怎樣敬仰與期待著我抗日領袖去收復華北，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¹²³

這種情緒，很長時間都可以看到。身在山西陽曲鄉村的孫壽珊1940年觀察：「崇拜領袖之熱忱，幾同世俗之於諸葛孔明，……何以無間城鄉，不論後方敵區，俱能有此一致堅確之認識耶？是不得不大堪奇詫驚慰者也。諺云：『小兒謠言天說話。』況乎普遍廣大之言論哉？」¹²⁴ 所謂

121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11頁。

122 朱德：〈論抗日游擊戰爭〉，《朱德軍事文選》，第343頁。

123 劉清揚：〈華北陷落與游擊戰的發動〉，《游擊戰在河北》，漢口全民出版社1938年版，第24頁。

124 《平民眼中的抗戰歲月——孫壽珊日記》，1940年11月30日，陽曲縣史志辦公室2017年版，第136頁。

「天說話」，實際即千千萬萬普通民眾的心聲。將蔣介石神化為諸葛孔明，傳達的是民眾驅除日軍的渴望。

一般認為，中國農民知識文化水準普遍低下，民族意識較為淡薄，不過也不可一概而論。作家沙汀在日記中記下親身經歷的兩個案例，可以看出民眾反應的複雜性：「一個十七歲的男孩竟然不知道漢奸是什麼東西。房主人有四十多歲，老羊皮褂，到過忻縣等敵佔區，他說日本人和咱們一樣，就是聽不懂話。」這個案例顯示了普通農民對侵略者的麻木。然而，第二天，沙汀在另一個村莊的問答卻是這樣：

我們的屋主人是自耕農，人很老實，一妻一女。我們問他去過太原沒有，他回答道：

「沒敢出門一步。」

「是怕日本兵吧？他們是隨便打罵中國人的。」

「打都不要緊，怕喪命；他們又不懂咱的話。」¹²⁵

總體看，無論城鄉，民族情緒的確存在。不過，民族情緒要轉化為抵抗行為，並不容易。很多時候，民族情緒和個人生存需要並行不悖。日軍壓境時，孫壽珊率全村老小祈求神明「保佑下民，憫此黎庶，俾得安然無恙」。第二天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吾鄉已歸日軍佔領，不復再睹中國之政治設施及軍隊部署矣，亡國奴之頭銜於今日得到，亡國奴之苦楚於今日開始嘗試。消息傳來，寸心如割，究竟有何面目以圖苟活耶？」¹²⁶ 求生的欲望和亡國奴的痛楚幾乎同時顯現，這是當年的常態。

民族情緒的激發和維持，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游擊戰爭的抵抗成效：

民眾唯一的要求是積極的打擊敵人，反對敵之野蠻的侵略來保衛自己，才能成群結隊的去參加游擊隊。如果領導游擊戰爭者忽視

125 沙汀：《敵後七十五天》，1938年12月23日、24日，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136頁。

126 《平民眼中的抗戰歲月——孫壽珊日記》，1937年11月4-5日，第19-20頁。

了這個要求，便失掉了游擊戰爭的意義，便喪失了自己在民眾中的信仰。我們記得發動的最初幾天還沒有打上敵人的時候，一般的民眾終是採取疑心〔信〕參半、敬而遠之的神情。一旦壯烈的戰鬥明朗了，民眾不但變疑懼而親近，且自動的攜帶武器蜂擁的來參加。¹²⁷

游擊戰中民眾的作用，平原地區尤為明顯。平原地區沒有地形的估恃，實力相對弱小的一方，生存困難大大增加。八路軍要在平原建立根據地，堅持生存，必須爭取民眾的支持，獲得另外一種依靠，此即前方將領歸納、總結的「人山」。徐向前到河北不久即發現：「河北是人口較稠密的區域，假如我們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廣大的人民推動到抗日戰線上來，把廣大的人民造成游擊隊的『人山』，我想不管什麼樣的山，也沒有這樣的山好。」¹²⁸正是有了民眾的掩護，中共才獲得活動的廣大空間，115師總結：「冀魯邊的部隊因為土生土養，與群眾有血肉聯繫，所以對敵情況一般是很靈通的，除建立普通的偵察站外，群眾均能自動報告情況，這是我們能夠在那種嚴重情況下堅持的主要因素之一。有時我們部隊一天連轉移三個地方，連遭三次合擊，但均能勝利的突出來。」¹²⁹日本人自己也承認：

共軍的情報搜集、傳遞，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軍的討伐行動，往往在事前便被偵悉。到處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連日本方面的僱傭人員，對他們也必須提高警惕，以防他們通敵。與此相反，居民則害怕以後受害，幾乎無人提供關於共軍的可靠情報。……共軍的行動輕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為無法捕獲。相

127 黎玉：〈抗戰兩年的山東縱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4輯，第201-202頁。

128 〈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1938年5月21日），《徐向前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頁。

129 〈一一五師關於開展冀魯邊平原游擊戰爭的經驗總結〉（1942年10月），《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9輯，第111頁。

反，日軍卻多次遭到共軍的伏擊。另外，共軍在白晝不進行集體活動，混在群眾之中，不露形跡。¹³⁰

當然，不是所有時候，抵抗力量都能得到老百姓的無條件支持。山東一個報告提到：「有一工作同志遇到敵人出動，即跑到老百姓家去隱蔽，那大嫂子不肯，不一會鬼子進來了，即把那同志逮走，臨走時那大嫂子還說：『你不是該死，要老百姓掩護你，老百姓是不會的。』結果那同志被敵人「點天燈」（在兩肩上點火）點死了。」¹³¹ 這個案例呈現了一個不那麼樂觀的狀態，掩護抵抗者很可能要付出代價，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做這樣的犧牲。不過從這個文本中，仍然可以看到歷史的另外一面，工作人員尋求民眾掩護，和既往的經驗及對民眾的信賴或又不無關係。

當年材料中，還可以看到群眾對中共部隊不滿的記載：「群眾不相信我們廿六日下午的轉移是不知道敵情的，態度上隱約的透露出：你們怕敵人，只管你們，不管我們的死活！這使我們感到非常不安。給他們耐心的講當時的情況，舉出了事實證明我們並不知道敵人要來，他們稍好了一些。」¹³² 部隊按計劃轉移後，村子遭到日軍破壞，村民認為八路軍不願群眾安危躲避日軍，因而憤憤不平。這種憤憤不平固然是出於誤會，卻可以看到村民對八路軍的期待，只有綁在一起的人，才會為對方的脫離傷心。

歷史就是這樣，是非之間總是有很多的灰色地帶。孫壽珊曾對過度徵發民眾的現象提出批評：「夜間有軍隊逼令民眾砍電杆，斷汽車及鐵道，日間迫令民眾照樣修復，如此循環不已，人民疲於奔命，究與反

130 〈日軍第一一〇師團作戰主任參謀中村三郎在一九四〇年初對八路軍情況的記述〉，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參考資料2），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頁。

131 〈山東婦女運動的新任務——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陳若克在聯合大會上的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5輯，第220頁。

132 山西新軍歷史資料叢書六卷《工人武裝自衛旅》（附錄）〈王慶生日記〉，1943年1月6日，第164頁。

日軍之戰事似無大關係。」同時，他又長期與八路軍暗中接觸，衷心欽佩中共：

去歲金縣長已令人備馬，邀予赴邊區參加參議會，因敵軍襲擾未成。迨以餘正統思想為主，仍寄希望於中央，但對金、趙、田等才幹識見，極為敬服。對八路軍襲擾牽制日敵日趨突出，成為復國驅敵之重要力量，亦甚企望。如前歲我村東坪之役，縣大隊即擊斃黃水出援之日軍三人，我方亦犧牲頗大，北村之張五子殉國於黃崖坡下，殊為可惜亦復可敬焉。但此役幾致引敵報復，全村幾被敵焚燒滅絕，幸賴本村南甲銀換女，不惜獻身敵之小隊長，始得免去燒殺大禍，村人莫不念此女之功也。可以想見，全國似此游擊戰多不可勝數耳！¹³³

這簡單的一段話，有多處轉折，從中可以看到中共幹部的才幹識見，一般知識分子的正統觀念，八路軍的奮戰，日軍的報復，民眾的犧牲和無奈，以及對游擊戰的期待。相信孫壽珊寫這些時並沒有刻意設計，只是複雜歷史場景的自然記錄。當年的歷史現場實在太過波詭雲譎，不加修飾的記錄，已足以懾人心魄。

抗戰時期，中共以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為基礎，通過黨政軍民的總體戰，努力完成持久作戰的目標。正如時論指出的：「黨政軍民的團結是鞏固根據地最重要的一環，沒有這種團結，就休想持久堅持根據地。固然沒有軍隊則根據地不能存在，但如沒有地方黨政民的領導與配合，則根據地也無法存在。」¹³⁴ 沒有軍隊就沒有根據地，沒有根據地又難以有游擊戰的堅持，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看起來不無扞格，經過中共系統運作，卻能互動互補，黨政軍民的一體化則是基礎中的基礎。

133 《平民眼中的抗戰歲月——孫壽珊日記》，1941年1月12日、1945年2月13日，第149、199頁。

134 〈集總關於魯西軍隊工作的指示〉（1940年7月24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322頁。

中共的這條道路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不斷摸索的過程，其間機遇的出現、把握及運用、創造，在在顯現歷史的生動和複雜。

十、弱平衡下的根據地生存

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敵後根據地遭遇強大日軍的擠迫，生存困難。不過，由於中共的堅持，持久階段的最初幾年，力量還在發展。1942年，毛澤東說：「今年二月統計黨員數目為八十萬，去年九月統計軍隊數目為五十七萬（包括游擊隊），對外守秘。」¹「對外守秘」四個字，頗具意味，似乎預示了此後歷史的起伏。「守秘」既是對日本人，也是對國民黨，可以說是戰時的韜光養晦。毛澤東的極端審慎，源於他對國共日三方競逐形勢的把握，也源於他對根據地發展邏輯的判斷。形勢發展證明毛的審慎不是沒有道理，1941年後，日軍加緊對根據地的「掃蕩」，根據地生存環境日趨惡劣。1943年，景曉村記下山東的狀況：

從去年夏季大「掃蕩」以後，形勢急轉直下。三、一分區，我軍均以排為單位活動；二分區間或可以二、三個連隊集中活動。今年一月，對二分區二次大拉網，繼之是一、三分區，加之我策略轉變不夠，損失很大。共部隊損失2000多人，22個連，28個區隊。……經過這些損失，得到一些教訓，策略上逐漸轉變。從今年6月以後，我工作又漸上升，展開對敵之各方面鬥爭。²

1 毛澤東：〈目前應以整頓內部訓練幹部為工作中心〉，《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93頁。

2 景曉村：〈日記摘抄，1943年12月25日〉，《景曉村文集》，第126-127頁。

從景曉村的描述可以看出，當年中共在日軍眼皮底下的堅持，十分不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到1943年，根據地有不同程度的萎縮，一些地區的根據地甚至被日軍蠶食、侵吞，中共在敵後的生存危如累卵，但仍頑強堅持，最終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迎來敵後生存的曙光。

中共和日軍的對峙，一強一弱。作為弱者，中共的生存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對手的弱點，發揮自己的生存智慧。經過艱苦努力，中共將和日軍的對抗，變成有類於貓捉老鼠的遊戲，看起來佔有主動的日本人，面對出沒不定的中共武裝，卻常有力不從心之感；看起來處於弱勢的中共敵後武裝，卻常常化被動為主動，在敵後扎下腳跟。華北平原上形成一種弱平衡局面：強勢的一方似乎足以打破平衡，卻又沒有足夠決心打破平衡，不得不無奈接受，雙方間的平衡搖搖欲墜，卻總能維持不倒，這種狀態，即為弱平衡。如果只是從戰爭和武力本身看敵後戰場，弱平衡的存在難以想像，而當把敵後抗戰視為對日抵抗系統中的一環，弱平衡就獲得了成立的堅實基礎。

1. 弱平衡

如前所說，中日對壘，單純就軍事實力言，不在一個級別上。按照黃克誠抗戰中期的說法，中共軍隊「要消滅一百個敵人（日軍），必須準備二百名左右的傷亡」。³ 這一判斷出自向來強調能動性的中共將領之口，道出了兩軍可能存在的最低限度的差距。不過，日軍也有一個明顯的軟肋，1939年7月，林彪在共產國際發言時說：「1937年7月7日製造挑釁事件時，日本並沒有預見到，他們會遇到中國人民如此頑強和如此廣泛的軍事抵抗。因為中國擁有如此廣闊的地域、如此豐富的（物資）資源和人力資源，致使日本感到自己軍隊力量的不足。日本拼命地增加

3 黃克誠：〈三種現象三件工作三個問題〉（1943年6月），《黃克誠軍事文選》，第220頁。

兵力，但仍然感到不足。」⁴這就造成日本人自己所言的：「我警備部隊在其軍、政、民一體的敵性地區中，僅能保持著點與線的狀態。」⁵以此，中共可以通過靈活機動的游擊戰，在面上活動、生存，只是由於強弱懸殊，這樣的生存始終在日本人的壓迫之下，中共冀魯豫黨委組織部部長信錫華談到生存的艱難：「南宮縣政府縣游擊隊天未亮進一個村的東口，敵人進西口，兩方在村道口相遇打起來了。威縣縣政府被敵人連續追了半個月，白天我們進這個村，敵人第二天天不明也就到了這個村。軍隊的作戰是善於盤旋、迷惑敵人，抓住時機打擊敵人。這樣作戰，當然是非常艱苦的。」⁶

中共的生存，即毛澤東所謂的畫「豆腐塊」，日本佔據豆腐塊的邊緣，中共在豆腐塊裏面活動。對壘的結果，「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決戰，也就得到了鄉村、小路的相持戰」。⁷根據地和敵佔區犬牙交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根據地幹部民眾和日軍間，有時會呈現奇特的場景。時任冀南行政區公安總局副局長的覃應機，回憶開完會後與日本人超近距離接觸的場景：

人們剛要走，恰遇駐南宮的日軍出動到馬君寨方向對根據地進行「掃蕩」，從我們開會的村邊經過。這樣，我們白天就走不成了。太陽快落的時候，敵人「掃蕩」回來了，當地幹部對我說：「可以去看看。」我們混在群眾中，蹲在路邊看敵人走過。沒有偽軍，日本

4 〈林彪在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1939年7月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179頁。

5 《華北治安戰》上，第139頁。

6 〈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邊區黨的任務——信錫華在冀魯豫邊區黨委成立大會上的報告〉（1940年4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249頁。

7 毛澤東：〈對陝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臨別贈言〉（1938年3月3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07頁。

人分不清誰是八路軍，誰是老百姓。群眾知道我們是八路軍，但是個個都很鎮靜，顯得若無其事。⁸

這種蹲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行為，恰和根據地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生存一樣，都是游擊戰特殊環境的產物。

作為軍事實力佔據優勢的一方，日軍當然不會滿足於佔據點線，而是依靠軍事實力以及由這種實力衍生的資源控制和調配能力，追求面的完全控制。根據八路軍115師的報告，日軍強化控制依靠的是密集的碉堡修築和比較完善的交通網絡，行動路線圖大致是：「點的修築變成面的控制。現在全魯〔北〕已有據點三百餘個，平均每八里路有一個，另外在公路線上平均每三里路一個崗樓，已有部分地區（基本汽路附近）形成面的控制」；「以線的修築變〔成〕了車輪式的網形，貫通各據點間，……沿各縣界、各區界、各分〔鄉〕界構築所謂『惠民溝』、『阻絕壕』，實行對我重重包圍封鎖。」⁹ 日軍以碉堡和公路網限制中共擅長的小規模游擊運動，封殺中共軍隊的行動空間，最密集的地區，幾乎形成碉堡相連、火力交叉的局面：「自高平至博愛公路沿途每二三百里有碉堡一座，各碉堡間均埋有地雷。」¹⁰ 同時，不斷出動部隊實施「清剿」，動搖中共軍隊在廣大鄉村扎下的基礎。

中日戰爭初期，日軍在和中國軍隊的對壘中佔據絕對優勢，被日軍強迫帶路的青年人觀察：

日軍行進很從容，但一經溝壑坳道卻非常迅速並且散開。到通化村外，先放一陣機槍，見無人接應，就分兵幾路繞村周圍探進。當這一支軍馬正進了村，從暢村轉過的那一支軍馬恰巧開到，假如村中有敵對抵抗，正好剿著後路，取包圍勢。……日軍的步槍

8 覃應機：《硝煙歲月》，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頁。

9 〈第一一五師關於冀魯邊平原游擊戰爭經驗的報告〉（1942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857-861頁。

10 徐永昌呈蔣中正據豫北晉東南敵情及敵在晉東南增兵建立封鎖線概況，1941年4月2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200-00294-082，台北國史館藏。

響聲亮、射擊遠，機槍也格外犀利。日軍給養充足，食品豐美，到處不吃民食，自帶魚肉白米，燃火自造，雖來到豆麥為主食的華北，依然不更其食物原素。日軍皆呢服革履，裝飾整齊，於陣容助威不少。試想：人家武器精良，戰略高妙，兼以士兵物質生活美滿，無怪那些東北朝鮮的人民，捨身拼命的努力疆場！¹¹

不能不承認，日軍具有很強的組織力、執行力、資源調配及學習能力，這一點，直接和他們對壘的中共將領深有感觸。朱德說得很坦率：「我深深感覺我們在體力上是遜於日本很多的。回到後方，看見機關、學校辦事人員文弱多病，動作遲緩，精神不振的樣子，這種感覺更為強烈。用這種體力去和敵人競爭，不論在戰場上，在工作中，或在學習中，我們都要吃虧一著的。」¹² 羅瑞卿評判：

敵人擁有現代的科學與技術，它的人員的教養程度也是比較高的，因此，在各種鬥爭技術的掌握上，常佔著某些優勢。例如能及時地反映問題，感覺敏銳；經驗的總結與普遍也異常迅速；對於所謂「治安肅正」有一整套的辦法；其某個機關的聯繫也是異常機動與密切。每一部門或機構的活動，都與其他部門或機構的工作相聯繫、相輔助，都從著眼於所謂「總力戰」的勝利出發的。¹³

初期作戰時，由於身處異國，地形不熟，且習慣於大兵團作戰，日軍行動方式常常顯得機械、刻板，規定嚴格的作戰線，不越雷池一步，導致不同部隊中間露出空隙：「一般均按晉閩過去之五萬分之一地圖，故我軍只要找到在該圖上沒有的村莊住，雖離敵極近亦能安

11 岳謙厚、侯采萍整理：《郝星久日記》，1938年5月6日，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67頁。

12 朱德：〈祝九月運動大會〉（1942年9月2日），《朱德軍事文選》，第445頁。

13 羅瑞卿：〈在建立對敵鬥爭對策上的幾個原則問題〉（1941年8月10日），《羅瑞卿軍事文選》，第288-289頁。

全。」¹⁴ 隨著作戰時間的拉長，日軍迅速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找出對付中共游擊戰的辦法，行動不斷細密化，機動性大為增加：「到達一地區，是持久的反復『掃蕩』，並組成許多縱隊作寬正面的橫的『掃蕩』，偏僻村落小路尤為注意，單獨行軍部隊機動性大，不如過去部隊那樣機械。」¹⁵ 日軍的不斷進步，讓中共早期利用地形熟悉獲得的一些優勢逐漸喪失。

從1938年底到1945年，歷經長期周旋，中共面對強大的日軍，頑強堅持下來並最終發展壯大。其間，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共和日軍形成所謂弱平衡狀態：由於中共軍事實力的不足，要想「拿大兵力把敵人打垮打開局面，是不可能的」，¹⁶ 維持相持的平衡局面，是中共這一階段的目標；作為相對強勢的一方，日軍要想徹底消滅自身控制區域的中共武裝，改變這種平衡關係，也無法實現。日軍的「掃蕩」如時人所言為「割肉補瘡」，每當日軍展開「掃蕩」時，「據點無人守備，封鎖溝、牆也無人巡查」，不得不「以少數日軍甚至以其移民擔任外圍主要據點的防務，而以特務機關的督導官、間諜控制偽軍、自衛團，敷衍門面」。¹⁷ 「掃蕩」期間，像長治這樣的後方重鎮，守軍「只有500人，並且大部都是輜重部隊」，空虛的後方和薄弱的運輸線，讓日軍投鼠忌器，「不能在『掃蕩』區停留兩月之久」。¹⁸ 這給堅持抵抗的敵後武裝以珍貴的維持平衡的空間。這樣的平衡，看起來是強弱分明的不對等均衡，現實中卻又意外地

14 〈晉綏周圍敵作戰特性〉（1944年12月10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4卷，第239-240頁。

15 〈第一二〇師關於一九四二年春季反「掃蕩」的總結（節錄）〉（1942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802頁。

16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泰西、運東工作討論記錄〉（1943年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500頁。

17 劉伯承：〈太行軍區二月反「掃蕩」的軍事經驗教訓〉（1942年3月），《劉伯承軍事文選》上，第438頁。

18 劉伯承：〈太行區夏季反「掃蕩」軍事總結〉（1942年8月），《劉伯承軍事文選》上，第472頁。

堅韌，是一個搖搖欲墜但能維持不倒的弱平衡。之所以如此，有多種多樣的因素。就國際言，中日戰爭是當時國際局勢激烈動蕩的一部分，日軍在外部受到多種牽制，無法集中全部力量於中國戰場，中共文件分析：「美國軍備及生產空前強大，使日寇寢食難安。美國戰力愈是加強，日美決戰時機愈是迫近，日寇便愈感中國抗戰力量成為他的後顧之憂。」¹⁹就國內言，構成平衡的力量來源的多重性和多方向也是重要因素，廣泛的大後方的存在為敵後的堅持提供堅強助力；至於中共本身，自然是形成敵後弱平衡狀態的最重要力量。

和日軍對比，按照中共自己的說法，大致狀況是：「質量上雖然我軍政治素質強於敵偽軍，但軍事素養則大弱於敵軍。敵軍官是經過長期學校訓練及實戰鍛煉的，而我們的幹部或者是剛剛放下筆杆的學生，或者是剛剛放下鐮斧的農民。裝備上敵強我弱更是顯著的事實。」²⁰日軍也判斷：「共軍本身的戰鬥力，依然異常低劣，而今後也不易很快提高。」²¹這樣的差距在戰場上有直接的體現，比較極端的案例是魯西的一個材料，可以見出兩軍能力和經驗上的距離：「在這次戰鬥中，最後解決敵人炮兵時，我一個班向敵衝鋒，竟被一個日本持劍炮兵砍倒6個；而退回後以一個排再沖，將敵僅餘之一個炮兵擊斃後方將炮搶到。」²²

不過，正如黃敬曾經說到的：

革命的武裝和反革命武裝進行鬥爭中必須記住：我們是長期的處在劣勢的狀況下，假如革命與反革命的武裝平衡，革命就勝利

-
- 19 〈冀魯豫行署關於對敵開展四月政治攻勢的指示信〉（1943年4月2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551頁。
- 20 羅貴波：〈堅持與開展八分區山地游擊戰爭反對敵人蠶食政策〉（1942年7月7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9卷，第313頁。
- 21 〈日本華北方面軍對共軍戰鬥力的觀察〉，《八路軍》（參考資料2），第617-618頁。
- 22 王秉璋：〈潘溪渡完滿的平原殲滅戰的總結〉（1941年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610頁。

了，任何國家無從例外，無論在裝備上、數量上、素養上、經濟上等等。故武裝鬥爭始終是以弱制強的。單靠軍事不行，革命未勝利前我不能取得優勢。²³

黃敬的意思是，革命的武裝由於是弱勢中成長的一方，大部分時候都會處於劣勢，一旦成長到和對方等量齊觀，勝利即指日可待了。就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及中共革命此後的走向看，這種說法的確不無見地。既然革命的力量大多數時候都會處於劣勢，「單靠軍事不行」，那靠的是什麼？靠的就是政治，也就是羅榮桓曾經在文章中說到的，要把戰爭打得「戰爭愈不像戰爭，愈像政治」。²⁴ 做到這一點，中共也就找到了通向成功的道路。

和日軍展開政治上的較量，中共有充足的自信，共產主義政黨的組織和動員能力為人們熟知，中共根據地政治上的努力，如一個外國人所言：「中國其他地區，比不上這地區軍民合作和地方政權工作和部隊保持那樣密切關係的，雖然在別的地區曾經努力施行過民主政治。這裏可以見到：一個新社會的型態從這次戰爭中浮現出來了，那最好叫做一個軍事農業的國家。」²⁵ 這一點，現有研究多有揭示。除此之外，中國進行的民族生存戰爭的先天正義也為中共提供了政治爭奪戰的充足資源。政治的爭奪，落到實處在於爭取民心，早在相持階段到來前，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²⁶ 中共的持久戰和根據地都把民眾置於十分重要的位置，而民眾的爭奪又體現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通過全民的全面的戰爭，「一面以自強之點補充自己的弱點，

23 黃敬：〈對敵鬥爭報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15頁。

24 羅榮桓：〈堅持我們的邊緣游擊區〉（1942年8月1日），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山東抗日根據地》，第102頁。

25 梅森著，鄧拓譯：〈今日的華北〉，《新長城》創刊號，1939年7月31日，第39頁。

26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09頁。

一面從長期鬥爭中補足克服自己弱點，即總力戰」。²⁷ 中共的政治工作無孔不入，包括日常生活也有體現：

善於抓住敵軍的某些弱點，用各種投其所好的辦法，去接近日軍。如通過經常接近他們的商人、小販去接近他們。贈送他們一些日用品和他們所喜歡的東西，與之進行其所喜歡的遊戲，以至利用女人、小孩等等，都是與日軍接近，並因此而與之交友的辦法。²⁸

作為異族征服者，日軍在爭取民心上有更大的難度，尤其面對擅長政治戰的中共，劣勢更為明顯，他們發現，估計中共軍隊的軍事實力，「必須將共軍及其潛在民眾之中廣泛的武裝力量考慮在內」，「不論是由於共軍的壓力或是思想上的影響，群眾有機的組織活動與黨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強共軍實力、協助其戰鬥的作用。」²⁹

不過，政治戰中中共可以捷足先登，日軍也不是無所作為。華北戰場上，中共和日本兩方面都是十分強悍的力量，而且在相互學習，如中共總結的：「敵我雙方都有強的指導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銳敏性。我們善於總結經驗，研究敵人，提出對策。敵人也善於研究我們，接受經驗，不斷改進其方針政策。所以敵我鬥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競賽，而且是全副本領的鬥爭；不僅鬥力，更主要是鬥智。」³⁰ 日本人意識到：「對共作戰的最終目標，可以歸納為：第一是摧毀革命核心勢力；第二是爭取構成社會成員的民眾。……必須使廣大民眾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一

27 黃敬：〈對敵鬥爭報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16頁。

28 羅瑞卿：〈把日軍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1942年12月），《羅瑞卿軍事文選》，第396頁。

29 〈日本華北方面軍對共軍戰鬥力的觀察〉，《八路軍》（參考資料2），第617-618頁。

30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43年1月26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6卷，第29頁。

員，組織起來使社會與革命核心相脫離才行。」³¹ 要達到這一目標，需要爭取民心，讓民眾看到「哪一方面能保護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³² 因此，日軍在相持階段到來後盡力改變初期的掠奪者形象，以平和面目示人，「不再燒殺姦淫，對農民深為慈祥，對游擊隊則取嚴酷手段」。³³ 日軍和民眾的關係的確呈現複雜的狀態，日軍澤昌利的日記記有，當他離開宿營地時，「當地的中國小女孩已經和我混熟了，很可愛，我給了他一點點心」。³⁴ 中共方面的報告更提到：「榆次兒童很多都能說漂亮的日語。」³⁵ 語言背後體現的常常是觀念和權力，日本人用恩威兼施的方式，實現了語言權力在兒童身上的覆蓋。

即便在中共擅長的宣傳戰上，日軍也不讓中共獨擅勝場。膠東敵「蠶食」大澤山時，「苗店一帶由於我過去勞役過重，人民不滿，部隊在反頑戰役時，所借器材亦未歸還，軍隊有打地方黨員的。有打狗隊，越牆入士紳家中，強迫實行合理負擔，結果敵人即大肆宣傳『不能老刮北風，該刮南風了』，民眾也說：『換換口味也好』」。³⁶ 共產國際會議上甚至有人提到，日軍散發傳單，宣傳「如果游擊隊中有誰自願放下武器，

31 〈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井門滿明對華北特別警備隊作戰的憶述〉，《八路軍》（參考資料2），第549頁。

32 〈島貫武治談制定「肅正建設三年計劃」的意圖〉，《八路軍》（參考資料2），第374頁。

33 董顯光呈蔣中正燕京大學教授喬治但勒對華北游擊隊漸被日軍肅清等原因之報告書，1939年5月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200-00515-152，台北國史館藏。

34 澤昌利著，鞠佟生、田酉如譯：〈太行惡夢——一個侵華日軍的日記和回憶〉，《山西文史資料》第119輯，《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年版，第159頁。

35 〈1939年底晉東巡視報告〉，《太行黨史資料輯存》第1編，第74頁。

36 〈關於對敵鬥爭問題——肖華同志在全山東政治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2輯，第56頁。

那就不再追究他的抗日活動，還會發給他從事和平勞動的補助或給他安排工作」，「一些場合還真出現過游擊隊投降的情況」。³⁷

面對這樣一支具備現代組織和技能、高度精密化的戰爭機器，中共要努力與之周旋，只能把自己做得更好。1943年底，處身根據地的八路軍幹部日記中寫下親身觀感：

鬼子費盡心機研究出奔襲合擊戰術，在我游擊戰術下也無效，鬼子無奈何！一、因為今年地方民兵和軍隊配合得特別好，軍隊到哪裏，民兵幫助警戒，繞開了敵人，領我們道，掩護群眾轉移，消滅漢奸活動。二、公糧制度特別好，不論到大小村莊都給軍隊準備好糧食、柴和菜，軍隊能夠自由輕裝轉移打游擊，可以不帶糧食，哪裏都可以吃到飯，哪裏都有群眾，哪裏有困難都能解決。……三、地方幹部深入群眾中進行宣傳組織動員工作。戰鬥開始，從邊府一直深入到行政村進行工作。³⁸

材料中說到的公糧制度，是中共為避免過度徵發採取的對策，軍隊糧食由供給機關統籌，不得隨意向百姓索取。王慶生³⁹的日記記下了具體的保障設施：「油、鹽由供給處統籌發，糧食由連統發，發下什麼吃什麼。除個別人員須吃麵，可由連調劑外，一概不准換麵或換菜。如老鄉給壞米時，可由連向村幹部交涉，不得爭吵。沒菜吃時，不得各班動員或勉強老鄉賣。」王清楚這樣做的難度，特別強調：「統籌是對的，但有困難。如發生困難，接濟不上時，要瞭解、適當的認識困難，不要不滿與發牢騷。」⁴⁰

37 〈中國小組會議第1號記錄〉(1939年7月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205頁。

38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年11月29日，第83頁。

39 王慶生(1914-1997)，山西平遙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新軍工衛旅團政治委員、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職。

40 山西新軍歷史資料叢書六卷《工人武裝自衛旅》(附錄)〈王慶生日記〉，1942年12月6日，第112頁。

無論實際貫徹如何，這種主動約束自己的自覺，日軍難以望其項背。另外，日軍佔領軍的本性很難完全掩飾，中共注意到，日軍在山西昔陽一帶採取殘酷的燒殺手段，因為這一帶「為比較貧苦之地，敵人似無甚留戀，完全取摧毀的辦法，使全縣廬舍為墟」。⁴¹ 侵略本能的暴露往往使精心營造的形象毀於一旦。因此，儘管日軍做了很多努力，但如他們自己意識到的，在政治戰中還是處於被動地位。日軍第六十三師團師團長野副昌德說得很形象：「日軍雖佔有點與線，但處處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況十分嚴重。……敵人陰謀恐怖活動活躍，而我警備隊則孤立無援。」⁴² 應該說，政治上中日兩軍的頑強競爭及中共努力取得的優勢，保證了在軍事上居於劣勢的條件下，中共可以和日軍在敵後形成弱平衡的局面，這種競爭不僅在當時，甚至在日後，也對中共的力量發揮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同時，日、共兩軍政治上的競爭還遠遠不止於此，中共的策略運用，在當年敵後的激烈對壘中，更顯精彩。

2. 不可不打，不可太打

相持階段，中共如何對付日軍，十分複雜，遠非簡單的幾句道義判斷即可了事。軍事實力不足時，打不打，怎麼打，打到什麼程度，何時要打、何時不打，都要慎重掂量。弱平衡下，中共的生存常常危如累卵，保住敵後力量，堪比蜀道之難。

如果以為既然是弱平衡，就要以生存為唯一原則，小心翼翼，避免與日軍直接接觸，不去觸動平衡以保持安定，那就大錯特錯了。弱平衡的格局並不是日軍的目標，作為強勢而又需要完成控制的一方，打破日

41 〈昔西對敵鬥爭的兩個材料〉（1941年10月15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九《公安保衛工作》，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頁。

42 〈日軍第六十三師團師團長野副昌德關於日佔區「治安」狀況及其對策的筆記〉，《八路軍》（參考資料2），第516頁。

軍和中共之間的平衡，驅趕中共離開根據地，實現對後方的完全控制是日軍的第一選擇。中日戰爭的相持階段，日軍不得不在打破和接受平衡中來回擺動，關鍵在於它也無力真正打破這種平衡。之所以如此，和日軍的總體戰略格局有關，中共韌性的武裝抵抗也是關鍵。

關於中共在敵後存在應該如何使用武力，黃敬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

我們在敵後存在，這就是對敵的一個刺激，絕對不刺激敵人是不可可能的。這種瞭解必然取消對敵鬥爭，在敵區變為埋頭不幹，遷就偽軍偽組織，在敵「蠶食」時，不敢伸向敵後，也就造成了敵進我退的一個原因。敵進我退的結果就是最大地刺激敵人，形成最大的目標。同時這樣對敵示弱，也要引起敵之注意，也是對敵的刺〔激〕，太剛太柔都不行，必須剛柔相濟，取消鬥爭也成為對敵的刺激，太柔了到處不刺激敵人，敵人也可以從容選擇搞我們的目標，揀選我們的要害，故刺激與否並非是無條件的、機械的。

力量平衡是雙方相互制約的結果，一方無抵抗的退卻即意味著另一方無阻力的伸展，必然造成力量平衡被打破，所以，即便是弱平衡，平衡達成的關鍵仍然是力量間的相對均衡，無原則的示弱絕對不被允許。這就是黃敬分析的：「武裝鬥爭退出了，一切鬥爭就很難開展了，即是有也極小了，敵人則可以順利地展開了。黨無武裝鬥爭掩護，與群眾的聯繫就很困難了，偽軍投降派就抬頭，敵之社會基礎擴大。無武裝鬥爭則其他一切鬥爭就無有機會了，黨也難於存在了。……敵人即可以少數敵人守備，抽出最大的力量來向我進攻，軍事上的機動即由此取得。」政治上的努力和軍事上的抵抗絕不是分開的兩張皮，而是相輔相成，沒有有效的軍事上的抵抗，政治鬥爭也就成了無源之水。敵後相互制約的局面本身就已很好回答了所謂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說法，純粹游而不擊在敵後根本沒有可能長久生存。

對日不僅不能單純退縮，必要時還要主動出擊，時時處處形成襲擾，只有這樣，游擊戰的威力才能充分發揮：「各正規軍派出之游擊隊

及地方武裝，須圍繞著進攻之敵，不斷擾擊，使敵不易燒房、燒糧、燒草、殺人、劫物，並使敵到處被擊，住行不安、迷惑、疲勞、引誘敵人，並派一部在敵後斷絕破壞交通，另以一部保持與敵接觸，反對游而不擊。」⁴³ 1939年，鄧小平更是強調：「應下決心不怕死人，不怕打垮。過去最大的毛病是不打仗。破壞紀律、群眾最憎恨的游擊隊，寧肯解散、繳械甚至殺一儆百，以回答民眾。」⁴⁴ 躲避並不是隱藏自己的最佳辦法，恰恰相反，躲避反而會愈加暴露自己，如黃敬所說：「我們的圈子越小，越不到敵後去，目標就越大了。敵人則完全補救了兵力不足的弱點，民族矛盾因我武裝鬥爭不展開而未暴露，從而敵人便可以爭取許多直接和間接的後備軍。」⁴⁵ 黃敬這裏分析的是大的對敵框架，具體到實戰中，單純躲避的惡果也會很快暴露，彭德懷發現：

敵一個大隊為單位在我根據地內敢於夜間毫無顧慮的行動，我都還不斷的遭受此種流竄之敵襲擊（南委泉新一旅之一個營，西井北嶺頭村十四團之一個連），中心區域之公路（遼和及潞黎）〔敵〕汽車來往安全如常，各地區兵團與指揮者視若無睹，或只作消極的迴避。若不及早警惕，將來可能遭到不應有的損失與增加自己的困難。

因此，他強調：「認真的進行積極的游擊戰，尋找和創造敵之弱點，求得打擊與消滅敵之小部隊，只有如此才能停止敵之頑皮〔固〕性與經常襲擊，達到保持自己與輪番休息。」⁴⁶ 抑制敵之力量，我之力量才能充

43 〈賀、關、續、林、牛致各分區、各地委、各專署反掃蕩戰役部署〉（1940年12月14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6卷，第172頁。

44 〈鄧小平的太北軍政委員會擴大會上的報告〉（1939年11月3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694頁。

45 黃敬；〈對敵鬥爭報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8-12頁。

46 〈彭德懷關於反「掃蕩」的意見〉（1941年1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722頁。

分展現，只有展示我之力量，敵方才會有所忌憚。更有意思的是，我之力量適當展現後甚至可能讓敵方有意無意地選擇性失明。彭德懷察覺，由於中共主力部隊展現出的戰鬥力，日軍在「掃蕩」時也會有意避開中共主力，他們「不一定尋找我主力作戰，發現我正規軍時採取慎重行動或繞路避開，對地方部隊沒有機槍與炮者則欺壓」。⁴⁷ 彭德懷說到的這種日軍欺軟怕硬行為，堅持在山東的八路軍幹部馮毅之也有記載，他記下日本兵的抱怨：「我們的太君怕死大大的，哪裏馬虎子沒有，就去溜達喝酒的好，哪裏馬虎子大大的，不敢出門的有。」⁴⁸ 因此，對於敵人的「掃蕩」，雖然按照游擊戰的方針不能硬頂，但也不能單純後撤和躲避，當敵洶洶而來時，可以選擇撤出、轉移；當敵結束「掃蕩」，收束兵力時，則要進行適當的報復作戰：「我要有報復性的刺激，當敵要向我大『掃蕩』時，我要報復，使敵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你長期來找，我就根據地搬家，到你處再開關。」⁴⁹ 同時，日軍進攻一個根據地，相鄰的根據地要騷擾、打擊、牽制日軍，使之不能全力以赴。

軍事鬥爭又要掌握度，不是打得越大、越激烈越好，在敵強我弱、客觀上形成相持時，短時期通過軍事鬥爭改變全局的可能不存在，這也就是當時人說到的：「據點越打越會多，越打越強。拔除了偽據點，增加了敵據點，所謂打死三隻狼換來一隻虎。」⁵⁰ 黃敬曾明確指出：「在游擊區拔掉據點，只有在十分必要與可能時才進行。這裏要注意『十分必

47 〈彭德懷、左權關於太行區反「掃蕩」經驗總結致聶榮臻、唐延杰並報中共中央軍委電〉（1942年3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778頁。

48 馮毅之：《抗戰日記》，1942年5月27日，中共淄博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1984年版，第164頁。

49 黃敬：〈對敵鬥爭報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12-13頁。

50 〈第一一五師關於冀魯邊平原游擊戰爭經驗的報告〉（1942年10月），《八路軍》（文獻），第859頁。

要』每個字的意義，如因這個據點使我相持局面不能保持時，才是十分必要。』⁵¹ 敵後持久生存是此時最高的目標：

積蓄保持力量，進行熬時間的堅持，為反攻及戰後作準備，為我今天堅持敵後的方針。不過分刺激敵人，為達上述方針手段之一。因敵人戰場很多，敵後不必吸引過多的敵人來，國民黨即以自己觀戰，來使敵轉向敵後，借刀殺人。從根據地本身說，我越刺激，敵之警覺越高。敵人在保持優勢時，是想把決戰提早到反攻前對我決戰，想消滅我之主力，消滅我生存條件。我是熬時間，等時機，使敵優勢喪失時再與之決戰。盡量使敵麻痹，一面在對敵鬥爭中把力量拿出來，一面要隱蔽一部力量，讓敵人瞧不起我們。

要著眼長久鬥爭，盡全力發展自己，適當的隱蔽、不過分刺激敵人，以爭取一個更好的生存發展環境，十分必要。所謂過分的刺激，指的是：

有些雖然打了，但不能有把握制勝；不應該在這裏刺激敵人，偏要搞，這就是過分地刺激。今後我邊區要警惕這一偏〔向〕，鋪張地宣傳戰果（有些是勝而不宣），給虛報成績的偽軍人員敵人留點面子。不過分地刺激的標準，就是不使敵再增加力量到這裏來，而我們又可以自由地開展鬥爭和各種工作，使敵我完全都滿意（敵是阿Q式的滿意）。⁵²

需要注意的是，當強調不過分刺激敵人時，必須防止另一種傾向，就是迴避、放棄對日鬥爭。陳賡在講「不過分刺激敵人，避免得不償失的攻堅」時，又提醒要警惕「藉口傷亡，不作積極活動，任敵猖

51 〈邊區的形勢與任務——黃敬同志在區黨委高幹會上的報告〉（1942年12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390頁。

52 黃敬：〈對敵鬥爭報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11-12頁。

狂；或是游而不擊，或是作假報告，敷衍塞責。」⁵³ 保存自身，不是單純避戰，不是游而不擊，既要謹慎將事，又要針鋒相對。必須承認，游擊戰常常體現為小部隊的出擊，部隊分散，指揮員的決心十分重要，不是所有指揮員都能達到同樣的水準，各地報告提到：「自衛大隊及獨立大隊成立以來，雖然有幾次的同敵人戰鬥，但積極行動上是特別不夠的。有的人便說，友軍打仗，我們只游不擊」；⁵⁴「怕與敵人作武裝鬥爭，避免與敵作武裝鬥爭，不加強注意武裝之發展與掌握，苟安滿足現狀的現象很嚴重」。⁵⁵ 要真正發揮游擊戰爭的作用，在持久消耗中不至流於苟安避戰，必須「反對逃跑主義。游是走路，擊是打仗，游而且擊，擊而且游，才是游擊隊的正當動作」。⁵⁶ 最佳的狀態應如晉察冀軍區提出的：「在鬥爭上，應是積極進攻的，但以不過分刺激敵人，不過分消耗自己力量（武裝、地方為原則）。既要善於使用自己力量，積極打擊敵人，又要積蓄與隱蔽自己力量。軍事上不可過於突出，也不應單純躲避。」⁵⁷

無論與日軍爭奪要點還是避免刺激日軍，都以最大限度保持己方有利地位為原則，這是生存原則在戰時的實際詮釋。當年八路軍幹部日記中記載了八路軍大隊長做的戰鬥動員，比較清楚地顯示打與不打之間的度：

鬼子從去年八月來蠶食我們邊區，日盛一日，自從南店被蠶食後，現在又要蠶食我們的郭蘇啦，昨天三四百人隨隨便便跑到郭

53 陳賡：〈在隊務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提綱〉（1943年3月19日），《陳賡軍事文選》，第119頁。

54 〈五個月的工作報告〉（1940年3月10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165頁。

55 《景曉村日記》，1943年12月16日，第411頁。

56 〈游擊隊政治工作概論〉（1937年10月16日），《彭雪楓軍事文選》，第48頁。

57 〈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關於冀中部隊各種情況下政治工作的指示〉（1944年1月1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第173頁。

蘇，燒幾間房子，抓幾個老百姓，太輕視我們了，我們不能忍受，要給以迎頭痛擊。⁵⁸

「隨隨便便」、「輕視」及其有可能引致的後果，是八路軍不能忍受、必須要打的關鍵。幾句簡單的戰鬥動員口號，細究起來，竟大有歷史的深意在。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水東地區如何生存發展的討論，詮釋了維持弱平衡的各種技術。水東地區是指黃河改道後的河道以東、隴海路以南的三角地帶，大致包括河南的開封、商丘及安徽宿縣等地，這裏是日、偽、國、共多方勢力交錯爭奪的地區。這樣的地區，最能體現策略的重要，而這恰是中共最為拿手的。中共的分析是，在國共日之間，「三個不強，誰也當不了大哥，但敵之不強，如我予以刺激，則可變為強。但須〔知〕，在今天雖不以為必爭之地，如我大吹大擂予以刺激，也可能增加軍力。我如偷偷地強起來，在基本形勢未變前，是可以堅持而且可以發展的——隱蔽發展的方針。」因為這塊地區不屬重要的戰略區域，日本人和國民黨都沒有投入大的精力，這是中共尋求發展的機會，但又不可冒進，一旦過於迅速發展起來，就有可能引起各方重視，使這裏成為下一個爭奪區域。力量大有可能因對方重視而被趕走，力量小則會被對方輕易趕走，大也不行，小也不行，必須發展，又不能讓人感覺到發展，所謂「不過分刺激敵、頑，保持平衡。（這裏好比眼睛下不去拳頭）我力量大存在不住，無力量也存在不住。」⁵⁹ 這樣的情景，當然不僅僅是冀魯豫水東地區的獨特現象，而是整個抗戰根據地的習見狀態，中共中央軍委講到敵後最常見的對敵鬥爭形式——破路問題時就說道：

(1) 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與〔於〕我太有害而於敵非必爭者（如插入我根據地內之公路）必須徹底破壞之；凡在敵為必爭，在

58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年4月7日，第34頁。

59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水東工作討論記錄〉（1942年12月27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354-355頁。

我無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漢路北)不可因破襲而引起敵之守備加嚴。⁶⁰

不可不破、不可太破和不可不打、不可太打異曲同工，如此吊詭的鬥爭形式，不是當事者真是難以想像，當年中共給出的隱蔽發展定性，可謂這種狀態的最好概括。

中共隱蔽發展的路徑和實質，對手方的觀察意外地一針見血，當年日軍報告寫道：「共軍由於受到我多次討伐以及國共相爭等原因，其軍事行動曾一度似趨消極。但實際上，一方面是要竭力避免因全面武裝鬥爭而造成實力消耗，以期保存和擴大自己的兵力；另一方面則是企圖以軍、政、黨一體的有機活動，在軍事以外的政治、經濟、思想等各部門積極開展工作，以擴大發展黨的勢力」；⁶¹「我如不主動進行討伐、掃蕩和剔抉，則中共方面也不對我進犯。乍看起來，相安無事，宛如締結了互不侵犯的條約。但在此敵、我共存期間，中共卻在民眾中秘密進行工作，以充實其力量，一旦時機成熟，即可一舉轉向進攻。」⁶² 隱蔽發展之所以隱蔽，不僅僅是形式上的低調與和緩，以扎根而不是鋪陳力量為主訴求；關鍵其發展內容也不是追求顯性的軍事力量發展，而是著眼於全方位的政治、經濟、社會的滲透，著眼於力量向民眾的深植：「我們的隱蔽是隱蔽在群眾中，我們只有更靈活的指導群眾與敵人鬥爭，幫助

60 〈中共中央軍委關於交通戰的指示〉(1941年1月)，《八路軍》(文獻)，第614頁。

61 〈日本華北方面軍關於「敵情和治安狀況」的觀察〉，《八路軍》(參考資料2)，第614頁。

62 〈島貫武治談制定「肅正建設三年計劃」的意圖〉，《八路軍》(參考資料2)，第374頁。日軍提到的這種狀態，林邁可也有記錄；他寫道，在根據地周邊，「許多碉堡由於是由偽軍把守的，因此也就遠遠沒有起到作用。八路軍能夠同許多偽軍部隊達成彼此『互不侵犯』的協議。晉察冀的冀晉第三軍分區黃永勝將軍告訴我，他的部隊需要襲擊某個偽軍據點時，要經司令部批准。」(林邁可著，楊重光、郝平等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頁)

群眾解決困難，我們才能更隱蔽。否則你無論如何躲藏，也是隱蔽不住的。」⁶³

當然，中共的這一套策略方法也並不就是空前絕後的創發。戰前國軍擬定的國防計劃提到：「除爭奪或保守要點無法避免真面目戰鬥外，一般應採不規則之游擊戰術，使敵疲於奔命，相機擊破之。」⁶⁴相持階段剛剛到來時，蔣介石給前方的電報中屢屢提醒：「對於敵人真面目之圍攻，應避免決戰，避實擊虛、保存戰力，牽制敵人。」⁶⁵而且，蔣也沒有忽視組織民眾的重要性，指示前方：「對於民眾之幹部，應到處組織與宣傳，務使冀魯全體民眾皆為我軍之耳目。」⁶⁶可見，就大面上看，這一套策略方法蔣介石也不是不能想到，國共兩黨區別的關鍵在於中共不斷摸索，形成經驗，執行中大大細化了具體的策略方法，幾乎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同時，中共具有國民黨方面所不具備的強大的貫徹、執行力以及理論思考力，養成了一批可以和地方打成一片並善於運用策略的老練執行者，正如蘇振華說到的：「條件是存在的，但又是變化的，是可大可小的，必須以主觀努力使有利條件擴大鞏固起來。」機會能否抓住、策略是否到位，需要有一批具有豐富鬥爭經驗又能落地生根的幹部，即便中共幹部本身也不是人人可以勝任的：「如換上馬列學院的一批幹部，則不能堅持」；「如果換教三旅、南進支隊去是吃不開的」。⁶⁷

63 《景曉村日記》，1943年6月7日，第85頁。

64 國軍軍事訓練及國防諸準備實施方案，1936年，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102-00004-004，台北國史館藏。

65 蔣中正裁決對於敵人企圖掃蕩我游擊隊對策會報記錄，1938年11月2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20300-00005-023，台北國史館藏。

66 蔣中正電鹿鐘麟沈鴻烈我冀魯各軍保持兵力相機發展不可與日軍決戰，1938年11月2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20300-00005-022，台北國史館藏。

67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泰西、運東工作討論記錄〉（1943年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501頁。

有意思的是，面對多重力量博弈的局面，日本人也在相機行事，對沒有威脅的中國武裝力量，允許存在：「勢力暫時不能控制的地區，應默許那些不主動求戰的雜牌軍的存在」，必要時「甚至可以引導他們佔據真空地帶，以防止共軍侵入」。⁶⁸ 湯恩伯與胡宗南密談時也提到：「日寇在魯西打擊共黨，共黨未增加，日寇希望我們游擊隊存在，所以在無形中掩護我們，所以目前我在魯西可以存在。」⁶⁹ 不過日軍特別強調：

有關這類決定，必須由高級司令部作出，不能由下級司令部擅自決定。高級司令部根據當時當地情況作出正確判斷後，指示部隊採取相應行動。作為下級部隊，只應進行積極果敢的討伐，發揚旺盛的士氣，必須實行嚴格的監督，斷然不許下級部隊根據自己的判斷決定是否進行討伐。⁷⁰

一旦直接接敵的下級司令部掌握了打與不打的決策權，很可能就會偏向不惹事的消極選擇，這是居於強勢的日軍特別要予以防範的。同理，中共前方指揮員便宜行事時也難免存在自利動機，比如劉伯承批評的「激戰終夜，雙方並無傷亡」。⁷¹ 太行襄垣某獨立營政委，甚至「不經政治部同意擅自與日本人往來信函，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對方掩護我過路，我不攻碉堡」。⁷² 對此，中共堅決予以制止，指示：「地方武裝要經常動，開始力量弱可以是游而不擊，但必須撐開手足，在行動與戰鬥中鍛煉武裝，反對保守主義。」⁷³

68 《華北治安戰》上，第227頁。

69 《胡宗南日記》上，1944年2月20日，第308頁。

70 《華北治安戰》上，第236-237頁。

71 〈劉伯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會議上的報告〉（1940年4月21日），《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3卷，第243頁。

72 〈第一二九師政治部關於太行區「七七」政治攻勢基本總結報告〉（1942年12月13日），《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2卷（1941-1942），第217頁。

73 黃克誠：〈淮海區地方武裝工作情況和發展方針的報告〉（1941年6月），《黃克誠軍事文選》，第137頁。

戰爭狀態下，形勢之複雜常常出乎當事者的意料，歷史的呈現也必定千姿百態。游擊戰，游是常態，打是變態；小打是常態，大打是變態，具體落實又更為複雜。在「游」的常態和「擊」的變態之間，在不可不打和不可太打之間，由於前方與後方、上級與下級、戰略與戰術、軍事與政治之間的複雜糾葛，存在難以完全消弭的種種緊張關係。對此既不必大驚小怪，也不應諱莫如深，釐清歷史的源流，分出事實的本末，許多問題或可迎刃而解。

3. 兩面政權

即便採取了極其靈活的策略，敵強我弱，要在敵後持續生存，維持弱平衡局面，仍遠遠不是那樣輕鬆。羅榮桓曾描繪冀魯邊日軍嚴密控制的場景，可見敵後生存的艱難：

提起冀魯邊，恐怕在全世界的戰史上也找不出這樣一塊地方和這樣一頁戰史。全區真是公路如網，據點碉堡林立，吹號、點燈互相均可聽見、看見，一有動作各據點均可聯合出動；不僅縣有封鎖溝、封鎖哨，即區亦有，重要村莊均被遮斷，冀魯邊至今沒一塊沒有被改變的地形，所有土地均被分割為網格子形了。

八路軍要在這種形勢下堅持下來，真可謂如履薄冰，「一年來，曾經和敵人進行過四百次以上的戰鬥，幾乎每次都要與敵人進行肉搏，而且在戰鬥完結之後，又必須立即轉移，否則即可能遭遇到第二次，所以部隊經常在轉移中，沒有一個村能駐過兩天的，晚上去，第二天晚上必須走，有時，被迫白天也得一面戰鬥，一面走。」⁷⁴ 羅的描述不是過甚之詞。當年在敵後活動的幹部，艱難程度甚至超過文學作品的想像：

74 羅榮桓：〈我們能堅持，我們也能勝利〉（1943年7月23日），《羅榮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頁。

幹部一律穿便衣，武器也盡量隱蔽起來，在某些工作基礎薄弱的地方，常走小路，或穿過地裏走。走路時要常看前面有無敵情，後方是否有人追蹤，走一段路就要臥在地上聽聽，四面張望張望，到村附近時先停止片刻，靜聽村裏有無動靜，然後入村。從僻靜地方神不知鬼不覺的從牆上爬入可靠的幹部或私人親友家裏。把事前規定暗號先告訴房東，盡可能的屋裏不點燈，必要時，先把門窗擋好再點。家裏的小孩也都仔細教育，出去一句話不露。白天大小便都在屋裏，為了省去大小便的麻煩早飯往往不吃飽。⁷⁵

這樣的場面，大體出現在敵後最艱苦的1941到1943年，這時，許多根據地遭日軍蠶食，中共不得不以游擊根據地、隱蔽根據地等方式堅持。中共的堅持，有賴於抗戰初期在敵後相對真空的形勢下根據地建設打下的基礎，中共在鄉村形成強大的控制力，民眾對中共有相當的信任；同時，也和靈活的生存策略相關。這一時期，出現了中共文件談到的所謂「怪現象」：「工作較好的現在大都不能進出了，而工作較差甚至於沒有工作地區，則成了本區的中心地區」。⁷⁶其實，這種怪現象正是弱平衡下中共的不得已，也是韌性堅持的反映，作為弱勢的一方，無法自主選擇生存區域，只能在不斷的游走中獲取空隙，盡可能抓住一切生存機會。這種「怪現象」在1949年前整個中共發展史上，甚至具有一般性的意義。適宜發展的地區，未必就能發展；生存下來的地區，未必工作開展就好；取得成功的地區，也未必就是事先選定。這樣的結果，緣於弱小力量生存發展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在裂縫中尋求空間。力量的變化，比其他因素更為關鍵地決定著革命的起落。這就是列寧講的：

75 孟昭基：〈××游擊縣工作的轉變〉，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邊政導報編委會：《邊政往來》第2卷第7期，第7-8頁。

76 〈冀魯豫邊區環境形勢及村政建設現況報告〉（1942年8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259頁。

要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就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個集團或各種類別之間利益上的一切對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儘管這些同盟者可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不可靠的、有條件。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現代的科學社會主義。⁷⁷

正因此，一般談論抗戰根據地多會提到的中共政治上的三三制原則，經濟上的減租減息、合理負擔、累進稅等措施，此時多已難以實施，爭取民眾的辦法必須在實踐中不斷發現、創造、修正，具體的策略運用遠遠比簡單的原則規定來得複雜，也更為生動。

比較典型反映中共這一時期靈活爭奪民眾策略的是兩面政策。所謂兩面政策，通俗地說就是：由於日軍已經實現對某一地區的控制，公開的抵抗不再可能，只能選擇和日軍做表面上的妥協，抵抗轉入地下，不再是直接的武裝抵抗，而是非暴力的不合作。按照黃敬的說法：「我之武裝不能控制與經常控制，而敵可經常控制。敵人秩序之建立與存在存在不可避免時，我之公開鬥爭已不能完全進行時，兩面政策開始產生了。」⁷⁸ 兩面政策與妥協投降最重要區別就是保持繼續抵抗的意願和能力。中共文件寫道：「我們必須深刻認識，農村之封建關係，在一村裏人民關係之密切，同宗同族，多彼此有民族關係，再加上我以力量壓服之，與敵人有深刻仇恨，大家聯合欺騙敵人，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⁷⁹

77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頁。

78 黃敬：〈對敵鬥爭報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23頁。

79 〈昔西對敵鬥爭的兩個材料〉（1941年10月15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九《公安保衛工作》，第95頁。

兩面政策不是投降，但不能不承認存在形式上的妥協，這種妥協出於迫不得已，也有各方面保存力量的生存需要，對幹部、民眾都是如此。自身無力保衛民眾時，陳義過高，單方面指責民眾一定程度的妥協行為為附敵，甚至以暴力手段制止，並不利於爭取民眾，也無法遏止事態的惡化。中共冀南地區的文件從民眾利益的角度談到承認兩面政權的必要性，比較清楚地體現照顧民眾利益的思路：

我黨我軍在此種三角地帶，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善於隱蔽自己，保存實力，處處為民眾著想，以保護民眾，使民眾不致吃虧（也就是保存自己），對於民眾中某些被迫應付敵人的行為，不僅不應尖銳的反對（這不是右傾退縮），反而應該因勢利導，成為帶有計劃性的應付敵人的辦法，甚至成為策略，我黨我軍應幫助民眾想出這些辦法應付敵人，只有如此，才不至使群眾脫離我們，打破敵人分離我軍民團結的毒計。⁸⁰

進而言之，為減少損失，「卸卻群眾的責任，避免敵人的燒殺，我們還應該同群眾商量一些應付敵人的辦法。某些不必要的戰區，如群眾要求我們不打，免致敵人遷怒於當地人民與實際〔行〕摧殘，則我們亦應商量採納群眾的要求。」⁸¹ 所以，打不打不僅是一個軍事問題，有時還是一個政治問題：「我之軍事行動的積極程度，也應該照顧到群眾的利益，打碉堡、割電線、破路等均必須慎重考慮，不能輕易亂舉。」⁸² 王林寫道：「隊伍前邊扒了電線，敵人到村裏，一根電線杆子一條人命，隊伍打了仗走了，剩下老百姓可等著遭殃吧。」⁸³ 這應該不是危言聳聽。

80 〈中共中央關於冀南工作的指示〉（1941年6月9日），《冀南歷史文獻選編》，第205頁。

81 〈八路軍野戰政治部關於敵佔區工作的指示〉（1940年11月25日），《八路軍》（文獻），第586頁。

82 羅瑞卿：〈敵偽軍工作方針和基本政策〉（1943年3月15日），《羅瑞卿軍事文選》，第427-428頁。

83 王林：《抗戰日記》，1944年1月26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41頁。

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八路軍第115師的規定。為「顧及群眾的苦楚」，避免日軍報復，該師規定當八路軍到村裏活動時，「距據點五里路的村莊可以報告，內容要經過我民主政權檢查，違犯時實行處罰」。⁸⁴ 儘管附加了要經過檢查的條件，但允許向日軍報告自身行蹤勢必加大部隊活動的困難，為顧及民眾，部隊主動承擔更大的危險，即便很難說這樣的規定一定會不折不扣執行，但戰爭狀態下，一舉一動都可能攸關生死存亡時，能夠如此主動出讓利益和機會，不能不說是中共群眾路線熏陶的產物。這就是王林在日記中說的：「敵人逼得我一天脫離群眾，即會一天活不成。同時，自己的命運和人民的天天一樣，也自然改造了我的感情。」⁸⁵

當年真實的歷史運行，挑戰後人的想像力。有日記記載：「西盤威村發現遍街標語之後，復以慰問袋內裝雞蛋白酒之品，附有日文函件致達駐軍，經彼默然收受，亦未前往該村，人民稱幸。其事遂寢，而於游擊軍之滑稽善謔，不得不謂為攻心瓦解敵士氣之舉矣！」⁸⁶ 游擊隊張貼了標語，卻又給日軍準備了慰問袋，還寫下函件，這樣，得到一點面子的日軍也就默認了游擊隊的活動。這一舉措出人意料，又入情入理，日軍得到面子，游擊隊則得到裏子，既顯示了自己的存在，展開政治宣傳，又避免民眾遭到報復，可謂一舉多得。

兩面應付的方式在各地、各個時段並不完全一樣。其間也有遭遇挫折，從而逐漸面對現實的過程。根據地遭遇困難初期，對形勢嚴重性估計不足，不承認甚至以強力手段制止兩面行為是很容易想到的應對方式。山東黃縣一度要求：「村裏有壞分子鼓動給敵人拿捐或已暗中當上偽村長，則堅決的鎮壓之。」⁸⁷ 蓬萊甚至規定：「參與『新民會』『保甲』

84 〈第一一五師關於冀魯邊平原游擊戰爭經驗的報告〉（1942年10月），《八路軍》（文獻），第859頁。

85 王林：《抗戰日記》，1944年5月7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71頁。

86 《平民眼中的抗戰歲月——孫壽珊日記》，1945年4月21日，第231頁。

87 〈黃縣敵游區工作報告〉（1944年2月），山東省檔案館G024-01-0206-004。

等漢奸組織，或其他背叛祖國之行為者殺無赦。」⁸⁸ 因此，各地都曾出現過激行為，「反頑」鬥爭時，「各縣都決定了名單，由政府負責，但用暗殺方式。在衛河柳塔、兩門為最厲害，即7、8、9月內殺埋敵探、叛軍、逃兵不下200餘人，如清豐八區公安隊長把兩個老幹部當皇協軍活埋了，韓村自衛隊一夜埋了19個。」⁸⁹ 晉西北為阻止村民附敵，採取如下辦法：「有我脫離武裝的工作人員發明一『開收條』辦法，如去四個人，留下三個人工作，即令偽村公所開收條，三個人如有損害，即由該村負責。」⁹⁰ 這裏面傳遞歷史的多重信息，輕描淡寫的文字後面，隱含的既有以身相押的勇毅，也有對不合作者雷霆萬鈞的決絕；這種視生命危險為常態的表述，背後有著難以為外人道的驚心動魄。

對敵鬥爭當然必要，但不顧條件可能適得其反。王林寫道：「後來一變而為左，瘋狂地復仇。弄得百姓更是無所適從，不支應日本漢奸不能活，支應吧，八路這方面不依。……老百姓苦於無法應付，只好偷偷進了據點。」⁹¹ 羅瑞卿則提到魯西一個村子的教訓：「魯西有一村仇視敵人的民團，曾經與敵偽開過火，打死了很多敵人，我們不顧情況為之擴大宣傳、登報、送旗，結果引起敵人進一步的對之壓迫，以前這村與我關係很好，這之後就投到敵人方面去了。」基於此，羅想到：

我工作幹部被敵人捉去，應當用靈活的辦法欺騙敵人。過去有些地方，敵人故意問我同志是否抗日，說抗日就殺，說不抗日就放，我們因此犧牲了不少的幹部。但是對付如此殘暴的敵人，為什麼不能用一些應付敵人的手段呢？在不危害黨的利益與損害黨

88 〈蓬萊縣政府佈告〉(1940年10月)，《艾崗山抗日根據地》，中共蓬萊縣黨史徵集委員會1991年版，第22-23頁。

89 〈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略〉(1944年)，《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頁。

90 〈晉西北1942年反蠶食鬥爭總結報告〉，《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6卷，第308-319頁。

91 王林：《抗戰日記》，1943年12月6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25頁。

的政治影響的原則下，欺騙敵人應當是允許的。在這裏一切死守舊章，都會處於極不利的地位。⁹²

兩面政策的關鍵是資敵問題，處身日軍直接控制之下，承擔日軍攤派的負擔也即所謂支應日軍難以避免，在中共無法掌控的地區，許多關係如羅瑞卿所說：「只是一般的兩面派，而不是革命兩面派，這種一般的兩面派當然比死心漢奸好些，客觀上也有其一定程度的革命作用，但本質上是為了自己生存，不是革命的。」⁹³ 八路軍幹部王興讓描述自己1942年從太行到冀魯豫時路經一個相對獨立的村莊，見到村莊首領王自全，他既聽從日本人指揮，又跟中央軍來往，還跟八路軍接觸，雙方見面時，王自全解釋：

他能控制的地方有若干個村子，有一千幾百條槍、有修械廠能修槍，還能造些簡單的機器，有麵粉廠，有商店，他很感謝我們能賣給他小米等。老百姓說他能買來小米實在謝謝他。臨近村民也說他好，不過，當著日本人的面，不敢說是他王自全弄來的。有了小米，把鐵路東我黨控制的沙區一帶的物資也能往西運到我們邊區了。王自全說：「我從這裏看出來八路軍是夠朋友，也得民心的，我以前只是兩面派，不信八路，這一年多時間，我體會到，我必須是三面派才能站得住腳。我看日本人長不了。他後勁沒多少了。中央軍、八路軍將來爭天下，不知誰勝誰負，走著瞧吧。」⁹⁴

這個村莊的首領顯然是遵循生存法則，跟日、國、共都保持平衡，這應該是比較普遍的現象：「膠東、渤海、魯中三地區不完全統計，計

92 羅瑞卿：〈在建立對敵鬥爭對策上的幾個原則問題〉（1941年8月10日），《羅瑞卿軍事文選》，第292-294頁。

93 羅瑞卿：〈敵偽軍工作方針和基本政策〉（1943年3月15日），《羅瑞卿軍事文選》，第437-438頁。

94 王興讓：〈一條特殊的秘密交通線——由太行山區經安陽日偽敵佔區到冀魯豫邊區〉，《冀魯豫邊區工商工作史料選編》，377頁。

革命兩面派的村政一五七九，合百分之十七；自發兩面派五四一七，合百分之六十，反動兩面派二〇五〇，合百分之二十三。」⁹⁵ 大部分兩面政權出於自身利益應付中共和日本兩方，甚至還有國民黨第三方。即便如此，事在人為，中共仍然設法在支應問題上做文章，盡力把一般的兩面派變為革命的兩面派，而又不影響其生存。由於中共比之日軍可以更深入接近民眾，這些兩面派在風險相對較小時，的確也樂意配合。對如何利用和支持兩面派抵制日軍攤派，中共有許多創造，黃敬總結了冀魯豫邊區的很多經驗：「①合法的，如裝窮、壘門裝逃荒，整欠零交，吃糠菜，住村公所交被子，給得快去得勤，吃十天嘴跑快腿，吃飯取消花生攤，牛鋪滿地，交桌椅，掌握有勢的人。②非法的配合主要是武裝的配合，搗爛敵人的徵收機構；以八路的擾亂作藉口，禁止聯絡員進城。③再如賄賂辦法。④利用其本身的矛盾，如敵、偽的矛盾，偽、敵上下級的矛盾，據點之間的矛盾。」⁹⁶

承認兩面，不意味著放任自流，對兩面政權，中共也有拉和打的兩面手段。拉之後，必須打，即「軍事上政治上都應同時予以痛懲，一個壞，打一個，一部分壞，打一部分」。⁹⁷ 中共武裝進入一個地區，通常都要鎮壓揚威，相關報告寫道：「7月×日捕殺了西龐的漢奸，立使憲兵隊特務隊驚懼不敢下鄉。」民眾也紛紛「勸一些壞人說：『你可不要惹事，大家擔不起！』」⁹⁸ 打之後，再展開民族主義的教育和宣傳，「向廣大人民指明我們某些處置是暫〔時〕的應付敵人，是表面向敵人而內心

95 〈山東省第二次行政會議民主組村政總結〉，《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3輯，第349頁。

96 黃敬：〈對敵鬥爭報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25頁。

97 羅瑞卿：〈敵偽軍工作方針和基本政策〉（1943年3月15日），《羅瑞卿軍事文選》，第443頁。

98 〈太行一分區內丘縣聯合保家民團工作初步總結〉（1942年10月），《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1943-1945），第644頁。

向祖國的，中華民族的兒女，永遠不能忘掉自己的祖國。」⁹⁹ 利益誘導、強力警示、思想教育多管齊下，這正是中共開展工作的一貫做法。

無論堅持對敵直接抵抗，還是以兩面政策展開合法抵抗，都是對日鬥爭的一部分，目的都在千方百計削弱日軍的控制力。堅持鬥爭的結果，會有事先可能都預料不到的成效。黃敬發現：「敵區在剛成時兵力正強，敵區越久兵力就越小，這即是此起彼落，否則他就不能向我『蠶食』。」這樣的此起彼落就很有意思。由於日軍在華兵力有限，廣泛的根據地的存在又不斷強化著日軍這一弱點，日軍總是處於一種割肉補瘡的狀態。剛剛佔領一個地區時，兵力較強，隨著佔領的加固，就需逐漸撤出兵力，蠶食其他地區，這時候日軍控制區開始出現縫隙，中共的堅持就有可能發揮威力。日軍實現佔領後，出於攫取資源的需要，佔領前或佔領初期的各種小恩小惠無法繼續，統治的真面目日漸暴露，民眾離心趨向明顯，這又給中共活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這時候，「對敵的幻想打破了；群眾知道究竟是誰好了，生活上不比以前了，這又予建立統一戰線以更廣泛的基礎。偽軍也發生變化了，敵人要整他們了，在對付我們時他們放肆偽軍，現在偽軍的發洋財、鬧獨立都吃不開了。會鬥與敵人的矛盾也上升了。」¹⁰⁰ 特別是1943年後，隨著日軍不得不抽調兵力增援東南亞戰場，華北地區活動空間增大，此前堅持直接對敵的地區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原來採用兩面政策的地區也隨著形勢變化變合法鬥爭為直接對敵，「群眾普遍都說八路軍真不錯，不同過去，鬼子真不行了，快垮台了，對敵我力量的認識有了轉變，抗戰的信心提高了」。¹⁰¹ 由此看，所謂合法、非法，其實都是根據條件變化開展的全方位堅持的一部分。

99 〈八路軍野戰政治部關於敵佔區工作的指示〉（1940年11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第586頁。

100 黃敬：〈對敵鬥爭報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9頁。

101 〈抗戰第六周年戰術經驗總結〉（1943年），《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6卷，第334頁。

中共全方位的堅持，仍然是日本人有最切身的感受。日軍的報告中，可以經常看到他們的嘆息：「中共方面的地下組織扎根於行政機關、學校及居民之中，形成了所謂『剝開表皮露出紅瓤』的情況。」¹⁰² 雖然軍事力量居於優勢，他們仍常常不得不接受兩面政權的事實：

要過陽曆年了，敵佔區（離根據地四十里）的一個村長（保長）與鬼子小頭領商量：「現在陽曆年了，慰勞你們皇軍一部分慰勞品，慰勞八路軍一部分慰勞品，你看如何？太君。」這鬼子皺著眉考慮了一下回答：「慰勞皇軍大大的，慰勞八路軍小小的！」隨即便請鬼子開了條子。趕上溝到根據地來。¹⁰³

日偽軍不僅無法阻止民眾慰勞八路軍，甚至尋找機會和中共武裝停戰。馮毅之的日記提到，偽軍受日軍逼迫，要到一個八路軍活動的村莊築炮樓，又擔心被八路軍襲擊，遂事先跟八路軍聯繫，答應炮樓偽軍「無事不進村，進村不帶槍」。¹⁰⁴ 這樣的現象不是個例，當時日記記載：「日軍六十餘名開至本村，由南而北在三村繞經一周。行至北洛陰村西，鳴炮二發示威，即行西返車站，對於有紅軍之各村，迄無相當表

102 〈日軍北部防衛地區隊長鈴木啟久關於冀東地區「剔抉戰」情況的憶述〉，《八路軍》（參考資料2），第436頁。

103 《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年1月5日，第96頁。

104 馮毅之：《抗戰日記》，1943年1月30日，第242頁。周佛海日記也提到其與中共代表的接觸：「六時，彼月帶馮龍來見。……渠言來滬系奉毛之命令，僅其最上層三、四人知之，晤餘甚快，即當返延安報告等語。談一小時辭去。其用（意）何在？殊難揣測。當一面與之周旋，一面監視其發展也。」（《周佛海日記》，1943年3月8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頁）周提到的馮龍是馮少白的化名，時為新四軍軍部參謀處科長，有文章認為他當時是「奉命由蘇北往日偽佔領的上海，對汪偽漢奸政權的上層人物周佛海、陳公博等進行策反工作」。（施岩：〈關於馮少白同志策反周佛海的經過及其結果〉，《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3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頁）

示，雙方互不敢侵犯，概可想見。」¹⁰⁵ 日軍作為強勢一方，已不再能夠居高臨下。

4. 相生相殺：與國軍的關係

中共在敵後的生存，除了和日軍鬥智鬥勇外，與國內其他政治力量間的複雜互動，也充滿變數，波瀾叢生。

抗戰是民族生存戰爭，國共兩黨為抵抗日本侵略結成統一戰線，這是抗戰得以展開的重要基礎。無論中共在敵後的存在，還是國軍在敵後的游擊隊，都離不開廣大的大後方區域的堅持，這一點，毛澤東曾有明確闡述：「如果大部分中國土地被日本佔領了（可能有此情況），我們還是有辦法，因為我們有兩個致敵人於死命的區域——內線與外線，這是兩個作戰的區域。內線便是雲、貴、川、湘，大體上就是中央政府管轄的地方，外線便是日本所佔領的大塊土地的前方。」¹⁰⁶ 處身國共激烈爭奪的山東地區的羅榮桓更具體指出：「敵『掃蕩』友軍與友軍的繼續堅持抗戰，也減輕了敵對我之壓力，我之對敵鬥爭形勢，取得有利條件」；正因此，「敵打擊友軍時，雖減輕對我之壓力，但我必須抓緊此時機與友軍展開統戰，誠懇幫助友軍。」¹⁰⁷ 中共在敵後採取的許多措施，都和這樣的抗戰格局息息相關。

國共合作對日關乎民族生存，彭德懷說：「我黨是有廣大群眾性的政黨，它的言行必須一致，它的對內對外政策也必須一致。以為黨的對外政策只是騙人的宣傳，這是把黨降低為陰謀的政黨，是一種最錯誤的

105 《平民眼中的抗戰歲月——孫壽珊日記》，1940年12月14日，第143頁。

106 毛澤東：〈對陝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臨別贈言〉（1938年3月3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06頁。

107 羅榮桓：〈分散性游擊戰爭與對敵政治攻勢〉（1943年3月13日），《羅榮桓軍事文選》，第179–180頁。

想法。」¹⁰⁸ 中共希望合作的態度從毛澤東武漢會戰期間一則電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許多軍隊的戰鬥力遠不如前，若再損失過大，將增加各將領對蔣之不滿，投降派與割據派起而乘之，有影響蔣的地位及繼續抗戰之虞。在抗戰過程中鞏固蔣之地位，堅持抗戰，堅決打擊投降派，應是我們的總方針。而軍隊力量之保存，是執行此方針之基礎。」¹⁰⁹

不過，由於目標和使命不同，抗戰時期兩黨的合作又是有限的，著眼抗戰同時，都不可避免地會想到戰後。正如抗戰爆發後斯大林同季米特洛夫談話時說到的：「中國人應當用什麼方法與外部敵人進行戰鬥，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當這場戰鬥結束時，就會出現他們應該用什麼方法進行內戰的問題。」¹¹⁰ 所以，兩黨總體上合作對日，各自在敵後的抵抗力量，則有時相互合作，有時卻相互防範、競爭甚至衝突。眾多研究者都會提到蔣介石在西北地區部署的大量部隊，這些部隊固有防範日軍侵略西北以及西北三馬聯絡日軍的作用，¹¹¹ 但防範中共力量無疑是重要任務，蔣介石在給胡宗南等的電報中指示：「應密令各部隊就地時時嚴防共黨對我軍之襲擊與進攻……但勿作聲張。」¹¹² 這種暗地裏的競爭乃至衝突隨著中共的壯大更趨激烈，林彪在共產國際說得很坦率：

108 彭德懷：〈在北方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提綱（節選）〉（1940年9月25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10頁。

109 〈我們在抗戰過程中的總方針〉（1938年8月6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359頁。

110 〈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談話的簡要記錄〉（1937年11月11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14頁。

111 共產國際中國問題研究小組認為這些軍隊目的有三：一是休整和補充兵員；二是保護運輸線，不讓西北三馬反對國民政府；三是順利從蘇聯得到武器裝備。參見〈中國問題研究小組會議第二號記錄〉（1939年7月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171頁。

112 蔣中正電朱紹良蔣鼎文胡宗南密令各部隊嚴防共黨襲擊惟勿聲張，1940年8月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10300-00037-013，台北國史館藏。

我們能徹底根除摩擦和衝突嗎？不能，因為加入民族統一戰線的是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政黨。說實在的，這種摩擦來自哪裏呢？這種摩擦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們的影響在擴大，我們的力量在加強，我們的邊區也在擴大。¹¹³

1940年，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中說：「去年，我們和國民黨之間的武裝鬥爭，大大小小的有幾百次，我們取得了徹底勝利。結果從反攻的中國軍隊繳獲了三萬支步槍。現在國民黨已下令其部隊停止相互之間的武裝鬥爭。」¹¹⁴ 在中共看來，有效應對國共間摩擦的做法應該是：「要爭取使國民黨不敢對我們採取行動，並爭取出現這種狀況，使他們無法對我們採取行動。」¹¹⁵

中共之所以會這樣想，緣於國內各種力量間的複雜糾葛。以河北為例，八路軍成為河北敵後抗戰的主力後，即不樂見其他政治勢力進入。王林曾在日記中寫下朱德對摩擦的態度，朱德「問冀中摩擦如何？我說好一些。他慢慢說：『摩擦，算了吧！弄得沒有工夫工作哇！』對於摩擦感到無窮的厭煩般的。」¹¹⁶ 朱德不願意搞摩擦，但是面對鹿鍾麟等地方勢力重返河北的舉動，仍態度鮮明，和劉伯承明確表示：「以河北為生命，謂在敵手所取得。」¹¹⁷ 這種用鮮血換取根據地後必欲保守的心態，亦屬人之常情。黃敬談到冀魯豫區的地位時也說：「邊區好出頑軍，為頑軍出入之門戶，我要當華北的門神爺，因抗日民主秩序經常受

113 〈林彪在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1939年7月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183頁。

114 〈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0年8月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9卷，第79頁。

115 〈林彪在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1939年7月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184頁。

116 王林：《抗戰日記》，1940年1月27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56頁。

117 程潛電蔣中正與朱德劉英（伯承，原標注有誤）商談以華北為禁區謂我抗戰二年所得以河北為生命謂在敵手所取得，1939年12月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90300-00205-124，台北國史館藏。

其威脅，其要窺時收失地。」¹¹⁸所謂華北的門神爺，就是要當仁不讓負起華北抗戰的責任，不欲其他政治力量滲入。在這一問題上中共的思路，羅榮桓說得很明白：

打擊敵人，破壞敵人「掃蕩」，是我們勝利發展的先聲，是開闢新地區的先決條件；反對磨擦，予最主要頑固反共、反八路勢力以致命打擊，也是我們深入普遍發展的重要條件。在打擊敵人，破壞敵人「掃蕩」時，我們不放過採取適當軍事政治部署，抓住頑固派反共、反八路勢力的弱點，而扼住津要，往往造成我們局面最大的開展。¹¹⁹

國共兩黨間雖然存在衝突，但直接的較量在華北地區並不十分常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軍和中共軍隊之間衝突更不常見。1939年，林彪曾在共產國際談到他的觀察：「在蔣介石的軍隊中有不少是黃埔軍校學員，在我們的部隊裏也有不少黃埔軍校學員，這樣一來，他們彼此間就相互交往。他們這樣做是公開的。……他們並不像他們的政工人員那樣反共。那些所謂的國民黨軍隊的政治指導員特別反共，但他們不掌握實際的兵力。」¹²⁰毛澤東1940年也注意到：「這次蘇北事件中，稅警團未參加反共戰爭，而該團幹部大半都是黃埔生。過去華北與朱懷冰衝突時，其中一個師也未參加反共戰爭，而該師幹部同樣也有些黃埔生。」他強調：「我黨我軍中過去把黃埔生看作一個籠統的反共集團的傳統觀念是錯誤的、有害的。」¹²¹抗戰時期，毋寧說，國民黨內「進

118 黃敬：〈對敵鬥爭報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14頁。

119 羅榮桓：〈在魯南吳家溝團以上幹部政治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1940年4月21日），《羅榮桓軍事文選》，第58頁。

120 〈林彪在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1939年7月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185頁。

121 毛澤東：〈利用一切機會對黃埔系軍人進行統戰工作〉（1940年11月16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18頁。

步的軍事將領差不多起了上層的領導作用，因此在中央抗戰的將領也就常常形成與政府中官僚買辦及黨部的對立，以影響蔣介石，而推動著抗戰前進。¹²² 軍方的態度，造成了這樣一種態勢：「中央軍中級（團營級）幹部對摩擦感到苦悶和消極，他們是：『打跑了日本再摩吧，那時候我們把槍一拋回家啦！』所以，他們不敢公然以打八路軍作政治宣傳。」¹²³ 儘管抗戰中後期，在蔣介石嚴令下，華中地區國共兩軍正規部隊有過大規模正面衝突，但在華北、西北國共正規部隊間的直接大規模衝突確實罕見。中共軍隊和中央軍間即便偶有衝突，也很快得到解決，肖勁光部和新一軍在陝西定邊小規模衝突後，雙方都積極尋求緩和，很快「和好如初」。¹²⁴ 之所以如此，有多重因素，中共對中央軍非常克制自是重要原因，而中央軍官兵的態度也是影響因素之一。

事實上，在華北地區，中共武裝和只是得到國民政府授權的地方勢力的衝突更為經常。通常說的國民黨這頂大帽子下，可以細分為諸多來源和利益取向不盡相同的政治力量。日軍入侵後，華北平原存留的多為各種地方勢力，這些人無論與國民黨中央還是中共，都若即若離，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從大的框架看，相持階段無疑以中日整體對立為主線；這之下，又存在著國共日的連環鬥；進一步細分，國共的鬥爭中實際上又包括國民黨中央、中共和地方勢力之間的三角鬥。活動於華北平原的鹿鐘麟、丁樹本、石友三、孫殿英、龐炳勛、沈鴻烈、張里元、吳化文、孫良誠、于學忠乃至有著國民黨中央背景的朱懷冰等，都是地方實力派出身，維持自身的地盤，在國共日的縫隙中生存，防範中共發展同樣是他們的生存之道。孫殿英對部下說得很明白：「沒有八路軍、日本，哪有我們新五軍？早把我們消滅了。」孫的策略即在幾方的「矛盾

122 〈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所作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1939年12月29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306頁。

123 王林：《抗戰日記》，1940年4月15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71頁。

124 程潛1939年12月9日致蔣介石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中共活動真相（二），第358頁。

中求發展]。¹²⁵ 同理，對這些地方實力派，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態度也相當曖昧。抗戰初期，蔣介石不會想到中共後來在華北會獲得如許發展，對中共和華北地方實力派間的衝突，更願意以超然的態度作壁上觀，鹿鐘麟抱怨，他防範中共的呼聲，總是「力竭聲嘶，呼籲少效」。¹²⁶ 為維持自身生存，這些「人多錢少」、「有人無餉」¹²⁷ 的地方實力派不能不與中共傾力爭奪，這是中共和地方武裝衝突激烈的重要誘因之一，相對而言，依靠中央財政支持的中央軍爭奪地盤的衝動就小得多。

對國民黨武裝的差異，中共非常清楚，也有不同的對付辦法。皖南事變後彭雪楓命令：「對騎兵何柱國、馬彪部原則上不與之武裝衝突」；「對反共軍（對湯恩伯、李品仙部）主力則按當時情況，戰術原則採取游擊戰或運動戰的方式對付之」；「對各軍分區之反共武裝，則不論其為縣隊、區隊或接受其委任之地方惡霸武裝，必須迅速的徹底的完全的加以殲滅，不惜以鄉鄉搜索村村清剿之手段鏟除之。」¹²⁸ 雖然這是特殊狀況下的應急處置，但對不同國民黨武裝分別應對的思路卻是一貫的。一般而言，對地方保安隊等武裝嚴厲處置，對擁有武裝的地方實力派則採取打擊但不打死的态度，林彪曾談到山東根據地的情況：

一支由省政府主席領導的游擊隊（實際上是地主的武裝民團）不與日本人作戰，而專門找我們打仗。一開始我們避免發生衝突，但他們卻更加猛烈地進攻我們。後來我們決定消滅他們，結果由三個團組成的這支隊伍變成了三個連。此後他們老實了。¹²⁹

125 王林：《抗戰日記》，1940年5月6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76頁。

126 鹿鐘麟1940年3月4日致蔣介石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中共活動真相（二），第290頁。

127 鹿鐘麟1940年2月29日致蔣介石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中共活動真相（二），第289頁。

128 〈目前對頑行動方針〉（1941年1月29日），《彭雪楓軍事文選》，第337頁。

129 〈林彪在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1939年7月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第18卷，第183頁。

這些打著國民黨旗號的地方武裝逐漸式微，更多還是由於日軍打擊所致。中共山東方面報告寫道：「四二年是友軍形勢最大變化的一年，如根據地縮小，軍事力量削弱極為嚴重。」1942年也是中共根據地生存最為艱難的時期，武裝和地域均有減少，但較之國民黨敵後力量減少幅度要小得多。中共判斷：「友黨友軍最大與很難克服之困難，即政治之繼續落後，與群眾脫離，堅持敵後抗戰一般辦法不多，尤其不善建設根據地（主要亦為政治的原因），且與大後方隔絕，經濟接濟很難，部隊士氣日益下降，生活日益惡化，紀律敗壞，戰鬥力更見低落。」¹³⁰這一點，國民黨本身也有反省：「現在國軍戰鬥力之日趨低落，事實上已無可諱言，舉凡部隊之教育，紀律與精神，殆均呈江河日下之頹勢。」¹³¹國共兩軍在日軍壓力下實力此消彼長的狀況在山東可見一斑，1942年前後，山東國軍由於日軍的頻繁「掃蕩」，「一年之間銳減一半」，¹³²從17萬減到9萬，國共兩軍強弱分野由此顯現：「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頑與我同處於敵人緊張壓迫之下，我與頑的鬥爭有些緩和，這就更考驗誰能在嚴重壓迫下能站得住腳。……這時我之力量已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而頑軍在一九四三年初，其數目已不到八萬人，與我之對比，已不能保持平衡狀態，造成了我爭取優勢的條件。」¹³³

無論衝突還是合作，國共雙方對於這個臥榻之側似敵似友又非敵非友的力量，都列為自己生存策略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中共談到他們對國民黨的觀感：「因敵人戰場很多，敵後不必吸引過多的敵人來，

130 〈五年來工作總結及今後任務〉（1943年8月19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0輯，第24-25頁。

131 對當前政治軍事共黨等重大問題之意見，1941年，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80101-00023-003，台北國史館藏。

132 〈關於山東情形的報告〉（1943年1月28日），《山東抗日根據地》，第128頁。

133 羅榮桓：〈對敵對頑鬥爭形勢的初步總結〉（1944年底），《羅榮桓軍事文選》，第311-312頁。

國民黨即以自己觀戰，來使敵轉向敵後，借刀殺人。」¹³⁴ 中共的觀察不是無的放矢，蔣介石致電前方要求：「對於敵人真面目之圍攻，應避免決戰，避實擊虛、保存戰力，牽制敵人」。¹³⁵ 胡宗南與劉斐、戴笠談話時，也表現出以中共為假想敵、對日保存實力的強烈傾向：「表面上敵人第一，共黨第二，然在實際為國家著想，共黨實為國家最大危害」；¹³⁶ 「我如打共，國際失其同情，大錯特錯，應將主力集結，而亦不打日本」。¹³⁷ 作為生存策略，中共在敵後的一些策略比如隱蔽發展，應該說也或多或少因於國共日三方的連環關係，當討論湖西地區生存應取策略時，黃敬明確講：

讓頑軍與我們分擔堅持湖西的任務，甚至讓頑多幹一些（這點不對下講，只分區級幹部知之即可）。如不掌握這一點，我將腹背受敵，讓頑從中坐視取利。……對好的頑在其受敵打擊萬分困難以致動搖時，要援之打敵，同時有時還可代頑虛張聲勢，以吸引敵注意力到頑身上。

這段話信息含量十分豐富，表面看前後兩段似乎有所脫節，其實卻有著緊密的邏輯關係：國方如果支撐不下去，中共應予援助；援助的目的是幫助其繼續堅持，幫助他們堅持的目標當然在於有利於自己堅持，因此引敵注意到國方而不是自己，是援助行動應予考慮的目標。這一點，黃敬接下來講得更明白：「敵頑打起來，如頑與我關係好，應援助他，但不代為受敵」；「我們應使敵頑矛盾擴大，這是為了民族利益。」¹³⁸

134 黃敬：〈對敵鬥爭報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下），第11頁。

135 蔣中正裁決對於敵人企圖掃蕩我游擊隊對策會報記錄，1938年11月2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002-020300-00005-023，台北國史館藏。

136 《胡宗南日記》上，1943年9月28日，第266頁。

137 《胡宗南日記》上，1944年2月14日，第304頁。

138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湖西工作討論記錄〉（1943年2月26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518-522頁。

從這樣的角度看中共對國軍的一打一拉政策，也就變得更好理解：「中央在屢次之指示中，曾特別指出，在與反共軍進行武裝鬥爭中，應採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之策略，雖在戰爭對峙之中，尤應進行艱苦的統戰工作以瓦解之、爭取之。」¹³⁹這裏面提到的「一打一拉，又打又拉」，乃至「瓦解之、爭取之」，表面看相互衝突，似乎難以執行，但放在上面所述的分析框架中理解，就變得順理成章，可謂活學活用辯證法的體現。

中共堅持敵後抗戰，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歷經艱難。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共的堅持獲得回報。1943年下半年，日軍從敵後戰場逐漸抽調兵力，敵後局面開始好轉，中共迅速抓住機會，根據地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1944年，毛澤東致電前方，指示：「我軍戰報多年沿用加倍數目發表的辦法，用以擴大影響。但此種辦法，對群眾為不忠實，對黨內造成虛假作風，對敵人則引起輕視，對外界則引起懷疑。嗣後我軍公佈戰績的數字一律不准擴大，均發表實數。」¹⁴⁰這一電文顯示了抗戰局面全面好轉的形勢下，中共自信心的提高。這樣的形勢，中共本身不是沒有估計到，1943年1月，黃敬在冀魯豫區黨委的一次會議上發言說：「堅持到後來，好的形勢一來，就會有飛躍的百倍的發展。」¹⁴¹指的應該就是這樣的局面。敵後武裝千錘百煉，頑強存活，一旦形勢許可，生存能力就會迅速轉化成超常的發展能力。1945年1月，到延安受訓的幹部完成學業返回各根據地時，薄一波對他們強調：「要擴大部隊，百分之百的發展自己的力量。」¹⁴²要的就是之前努力的回報。這樣的擴大和發展，既是中共此前堅持的結果，也是日軍在中國佔領的喪鐘。由於中國持久的抵抗尤其是中共在敵後的努力，讓在中國的日本佔領軍始終

139 彭雪楓：〈反頑鬥爭應取打拉兼施的策略〉（1941年3月23日），《彭雪楓軍事文選》，第345頁。

140 〈今後戰績應實數公佈〉（1944年3月21日），《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4卷，第184頁。

141 〈冀魯豫區黨委關於泰西、運東工作討論記錄〉（1943年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中），第505頁。

142 張子珍：《生活日記》，第107頁。

如履薄冰，不得不痛苦面對佔據優勢局面卻無法打破弱平衡的事實。在中國陷入泥沼的日軍，越來越龜縮到據點之中：「八角敵官，每日站在城上用望遠鏡看，並說『八路軍大大的有，沒法子！』」¹⁴³

「沒法子」，八角敵官面對中共的這句感慨，相信在許多人心中，都會激起五味雜陳的迴響。

143 〈晉西北1942年反蠶食鬥爭總結報告〉，《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6卷，第310頁。



十一、抵抗系統的隱喻：地道和地道鬥爭

「八路軍大大的有」，八角如是，冀中也如是。

抗戰後期，中共根據地展開大規模的地道鬥爭，尤以冀中地區最為突出。作為中共主導的對敵鬥爭系列鏈條中的一環，地道鬥爭具有強烈的中共軍政特質。挖地道、全村挖、村村挖，在技術條件落後、人力物力資源有限且面對著強勢日軍壓迫的背景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共的有效引導、堅韌的武裝抵抗和一個對日充滿敵意的氛圍，是地道鬥爭開展的必要條件，這些源自中國面對侵略的民族主義激發，持續發酵則應歸功於中共的不懈努力。經由民族精神營造起的敵意，不僅是開展地道鬥爭的利器，也是抗戰時期堅持敵後抗戰的重要助力。同時，像地道這樣一種本質上偏於被動的抵抗形式所以能夠存在，與對手方露出的空隙不無關聯，日本當年在華北地區的統治方式與統治實態，是幫助觀察地道和地道鬥爭不可或缺的一環。

1. 地道的起源

地道鬥爭最早發源於冀中地區。呂正操回憶：「地道的形成是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的。開始地方幹部和人民群眾為了防敵抓擄，在不得已時就藏入菜窖、山藥窖內。繼而挖掘了隱蔽洞，也只是挖在家中或院落

裏，叫『地窰子』，也叫『口袋洞』、『蛤蟆蹲』。在這種洞裏不能活動，不能作戰，只能消極隱蔽，敵人一旦發現，很難逃脫。……初級的地道，最早出現在蠡縣。蠡縣離保定很近，環境又殘酷，所以地道先從那裏發展起來。」¹ 曾任中共蠡縣縣委書記的王夫也說，地道「最初的形式，僅在村外的一個洞而已」。²

單個地洞無法轉移，隱蔽效能有限，慢慢發展為地洞之間的聯通，形成所謂地道：「當敵人進行搜索時，『死窟窿』裏的人是逃不出敵人的手掌的……於是長距離的地道開始挖掘了，不但每家的地道都通著，而且地道從這個村莊通到了那個村莊，通到四周圍的村莊去。」³ 冀中平原坦蕩，日軍機動優勢可以充分發揮，幹部、民兵、婦女和日軍周旋的難度較之山地要大得多，向地下發展是一個容易想到的選擇。歷史上華北地區就有挖掘地道的記載，河北永清、霸縣等地多次發現地下古戰道：

古戰道結構十分複雜，既有寬大的藏兵室，又有窄小的「迷魂洞」，還有掩體、夾壁牆、閉門和迷惑人的「翻眼」等軍事專用設施。戰道與水井相通，內有通氣孔、放燈檯、蓄水缸、土炕等生活設施。古戰道在土中的埋深，淺的頂部距地表1米左右，深的有五米多。⁴

明人王士性描述山西的地道：「其窖地非但藏粟，亦以避虜，虜人遇窖不敢入，惟積草熏之。然其多歧竇，即熏煙，有他竅出不為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長里餘，嘗與他家穿處相遇。」⁵ 可見古地道規模已很可觀，躲藏功能也得到充分發揮。抗戰時冀中地道作用更為

1 《呂正操回憶錄》，第210-211頁。

2 王夫：〈抗日戰爭時期地道鬥爭的回憶〉，《蠡縣黨史資料·紀念抗日戰爭爆發五十周年專輯》，中共蠡縣黨史資料徵編辦公室1987年版，第9頁。

3 〈地道戰在冀中〉（1942年9月11日），《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頁。

4 〈京南永清縣境內發現宋遼時期地下古戰道〉，《晉察冀軍區民兵鬥爭史叢書之三·地道戰》，長征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頁。

5 〔明〕王士性：《廣志繹》，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1頁。

重大，時人說：「有了一個好洞，比保有一處華麗的莊院還要高興痛快（與工作人員的生命血肉相連）。」⁶

地道在冀中得到發育，關聯著自然、歷史、社會和現實條件等諸多因素。自然地理條件是地道產生的基礎。冀中位於華北平原，地表土壤由黃河、海河沖積而成，土層厚，地表下2至6米區域為輕亞黏—亞黏土。輕亞黏—亞黏土塑性指數適中，常作為建築物地基或堤壩、路堤的填土材料，有助於地道穩固，且輕亞黏—亞黏土相對易於挖掘，便利地道形成。楊成武總結挖掘地道條件時，首先即提到：「要有一定厚度的土質，最少亦要有四五尺厚的土皮（即地道面上之積土），否則不僅無用，而還有倒塌之房屋危險，同時敵人容易掘開。」⁷冀中的地質條件完全可以滿足這一要求。地下水位是影響地道挖掘的另一重要自然條件，冀中大部分地區地下水位較深，淺表地底作業不會受到地下水影響，安新縣因為「大部縣境是水地」，民眾對挖地道就不以為然，抱怨：「上邊叫挖就挖吧，有什麼辦法，還不是為了他們軍隊嗎？」⁸

單從地質條件言，冀東、冀南及豫北、豫中、豫東、魯西北地區均可滿足挖掘地道的要求，地道之所以在冀中最高為流行，主要緣於獨特的歷史和現實環境。冀中是華北平原上中共武裝力量的發祥地，中共中央高度肯定冀中：「創立了很大的黨和軍隊，發展了民運，建立了政權，使冀中平原成為抗戰根據地之一，這都是冀中區領導同志堅持執行中央路線與冀中全體同志艱苦奮鬥的結果。」⁹正因此，作家高敏夫1938年底到冀中高陽時，可以到「設置完備的浴池洗澡，看到用美麗花紋的玻

6 張達：〈「五一」變質後的冀中是怎樣堅持下來的〉，《河北黨史資料》第5輯，中共河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6年版，第48頁。

7 楊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鬥爭〉（1945年5月），《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109頁。

8 王夫：〈抗日戰爭時期地道鬥爭的回憶〉，《蠡縣黨史資料·紀念抗日戰爭爆發五十周年專輯》，第30頁。

9 〈彭真在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結論〉（1939年11月），《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58頁。

璃磚鑲的牆壁和地板，光亮的電燈」，「在有白淨台布的長方桌四周，坐在最舒適的西式椅子上」，侃侃而談。¹⁰

作為中共在華北發展最為迅速的根據地之一，冀中直逼日軍控制的平津地區，距河北重鎮保定更是咫尺之遙，可謂日軍的肘腋之患。當日軍開始回身鞏固控制區域時，冀中首當其衝受到日軍連續攻擊。面對日軍軍事上的絕對優勢，中共儘管盡力周旋，持續保有根據地還是力所難能，有關報告顯示：「及至1942年『五一』前，冀中抗日根據地所剩的已不及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二以上為敵佔區和游擊區）。」¹¹到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冀中形成日軍和中共力量犬牙交錯的狀態：「敵人不斷的採取著不同方式對我實行進攻，我之根據地常有部分的變為敵佔區。由於我之不斷的進攻，又使敵佔區變為我之根據地。」¹²

中共和日軍激烈爭奪的特殊態勢，催生了冀中地區挖掘地道的動能。中共和日軍交叉拉鋸，互有進退，總的趨勢則是根據地逐漸被蠶食，武裝也處於游擊運動的相對被動狀態。要承受日軍一波波治安強化運動的持續壓力，尋找游擊和躲避的空間至為關鍵。在冀中這樣的平原地區，地理環境對游擊和躲避並不有利，地道的出現適逢其會。如果缺少了拉鋸這一背景，條件太好或者太壞，地道鬥爭都很難產生。當時幹部分析地道產生背景時說：

如果說只是因為敵人掃蕩、清剿頻繁，才逼使群眾這樣幹的，即所謂「壓力大，反抗也越大」，從當時的事實看也說明不是全面的，如當時在冀中東部沿津浦鐵路附近和冀中北部（大清河北）某些黨和群眾基礎還差的地區，對敵人頻繁掃蕩清剿寧願應付順從，從而忍耐下去也不肯搞地道鬥爭。反過來說，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的冀中中部處在滹沱河和潞龍兩河之間的安平地區，整

10 高敏夫：《戰地日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頁。

11 張達：〈「五一」變質後的冀中是怎樣堅持下來的〉，《河北黨史資料》第5輯，第6頁。

12 〈敵我鬥爭——程子華在冀中三縱隊第四次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41年11月），《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535頁。

個縣只有縣城內有敵人，而且從1938年至1942年大掃蕩一直是長期處在我優勢兵力包圍下，敵人根本不敢出來掃蕩。雖然安平縣的黨和群眾基礎也很好，但缺乏敵人壓力，單靠我們發動或用什麼強迫辦法硬要搞出地道鬥爭也是困難的。¹³

地道是不穩定環境的產物，如果對手方完全控制局面，地道和地道鬥爭失去存在的基礎。自身如果處於安定環境中，花費巨大人力物力挖掘地道不免畫蛇添足。

拉鋸是催生地道的外在環境，地道和地道鬥爭的產生及發揮功能，更重要的還在於人的因素即民眾的態度。地道挖掘必須依靠民眾，民眾是否保守地道秘密，是否利用地道幫助掩護中共幹部和武裝人員，是地道能否有效的關鍵。地道基本依村而建，挖掘地道不僅要付出人力、物力，相應的村莊還要承擔被日軍發現地道後展開報復的風險，沒有政治上的支持和信任是難以想像的，地道和地道鬥爭開展這一事實本身，足可顯示中共在冀中扎根的事實。冀中地區中共與民眾的關係，對手方留下不少記載，日本人關於冀中的調查承認：「由於血緣和地緣的關係，民眾與中共黨軍的關係非常堅固，不可輕視。」¹⁴在「掃蕩」中，日軍處處感到中共武裝和民眾結合的威力：

沙河、木道溝河沿岸一帶地區，素有中共平原根據地模範區之稱，交通壕、地道建築非常普遍，幾乎所有的村莊都有地下設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個村莊用地道連接起來。而且農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識很強，形成了半農半兵狀態，就連老幼婦女也組織了抗日團體。因此，各部隊在推行肅正工作時極為困難。¹⁵

13 王夫：〈抗日戰爭時期地道鬥爭的回憶〉，《蠡縣黨史資料·紀念抗日戰爭爆發五十周年專輯》，第30頁。

14 〈冀中區中部地方に於ける中央の民眾獲得工作實情調査の件(1)〉，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04122568300，昭和15年，陸支密大日記第40號3/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5 《華北治安戰》下，第155頁。

中共在冀中表現出的非同一般的力量，¹⁶除本身有效的政治、組織和群眾動員工作外，冀中獨特的內外條件也提供不少助力。冀中是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最早佔領的地區，為顯示威力，日軍在初期佔領地區，燒殺特別嚴重，就華北總體言，呈現北重南輕的態勢：「敵人在北面的屠殺人民的政策執行得很兇，但在平津路方面欺騙政策就比較的多。」¹⁷冀中作為日軍燒殺政策首當其衝的被難地區，也因而成為對日抵抗的堅定支持者，這反過來招致日軍進一步的屠殺。五一大「掃蕩」後，由於中共的堅持以及彌漫在民眾中潛在的反抗和敵意，日軍統治相當困難，屠殺成為強化統治的重要手段：「以鎮壓辦法檢查反共誓約，背不過即殺，每村一定殺一兩個（高陽三區），為背反共誓約殺了62個人。有的是漢奸家屬，有的是地主，背不過的殺，背過了的說是八路軍也殺。」¹⁸屠殺固然可以嚇阻於一時，卻也激起民眾更為強烈的敵意。

冀中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日軍的屠殺有關，同時還緣於這裏民眾的相對高素質。民族情緒在日常生活的口耳相傳中浸潤，從知識和文化教育中提升；當年，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態度時，一般和知識水準正相關。冀中是河北乃至全國經濟文化發展領先地區，民族主義情緒相對旺盛，呂正操曾指出：「冀中靠近北平、天津、保定各大都市，北平為往昔文化中心，保定學校也很多，所以冀中人民文化水準一般較高。定縣有平民教育促進會，一個村有幾個大學生，並且在抗戰前受北平學生救亡運動

16 1940年前後，冀中在各根據地中得到廣泛尊重，被譽為「模範中的模範」（左權：〈論晉察冀邊區反「掃蕩」戰的偉大勝利〉，《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2頁）。1941年9月，劉伯承、鄧小平在給毛澤東、朱德等的電報中將冀南和冀中比較：「冀中的據點比冀南多三分之一，敵人的兵力也比冀南多一半以上，但由於黨政及群眾協同工作一致，地方武裝的基礎堅強，因此能夠堅持，能夠完成每個任務。」（〈對冀南危機估計的指示〉，《劉伯承軍事文選》第1卷，第400頁）

17 〈劉少奇、楊尚昆關於山西工作情況向張聞天的報告〉（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第88頁。

18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中工委關於冀中反「清剿」鬥爭的指示〉（1943年12月），《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第161頁。

的影響也甚大。」¹⁹ 平教會在定縣所作調查顯示，1928年，定縣62村「找得出中學畢業及中學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有44村，找不出中學畢業的人有48村」。²⁰ 當年這一數據本身已經較高，經過戰前十年教育的較大發展，尤其是平教會的促動，抗戰前這一比例還會有進一步提高。另外，由於靠近幾大都市，地理環境又較優越，冀中明顯相較其他地區富裕，卡爾遜到達冀中後發現：

土壤肥沃了，莊稼品種更多、房子也更繁茂了。大房子多了起來，結構好了一些，穿長袍的商人、知識分子和地主人數明顯增多。第二天準備去安國時，我還驚訝地發現運輸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了。不是用牲口馱運我們的東西，而是把行裝交給一個走得很慢、沒有彈簧的大車——一般被通稱為北京大車。²¹

相對富裕的經濟狀況及良好的地理條件，造就相對發達的商品經濟，戰前這裏的商業和手工業已相當程度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華北最著名的布產區即在高陽（產區包括蠡縣、清苑等地），縣志記載：「軋軋之聲，比戶相接，集期一至，鞞擊肩摩，商賈雲屯。」²² 陳翰笙1934年撰文提到：「江南、河北和嶺南是中國工商業比較發達而農村經濟變化得最快的地方。」²³ 陳翰笙對河北的調查，即選在他認為較能代表這一發展趨勢的冀中清苑縣。日軍入侵，嚴重打擊這裏的外向型經濟，以饒陽為例，「以前饒陽人到外蒙做生意，年可收入220萬，到關東者可收入百餘萬。『七七事變』後生意完全停頓，300萬收入化為烏有，地方損

19 呂正操：〈冀中平原游擊戰爭〉（1940年3月4日），《論平原游擊戰爭》，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0頁。

20 李景漢編著：《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頁。

21 卡爾遜：《中國的雙星》，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頁。

22 李大本修撰：《高陽縣志》卷2，1933年鉛印本，第6頁。

23 陳翰笙：〈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汪熙、楊小佛主編：《陳翰笙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頁。

失很大。」²⁴ 高陽的織布業更是在日軍侵佔東北後遭到沉重打擊，東北市場失去，日本又傾銷棉紗，使國內布業難以為繼。²⁵ 冀中民眾在日軍侵略中體驗到的現實傷害，和民族情緒結合，加劇民眾的憤怒。日方在冀中經濟最為發達的縣份高陽所做調查就發現：「高陽是革命的（因高陽是工業區，織洋布，對外貿反對）、愛國心高的地區。」²⁶

二十世紀前期，中國內戰頻仍。無論是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時期的內戰，華北平原多屬戰爭中心，冀中緊鄰平、津，更成為慘烈的修羅場。中共文件寫道：

冀中區，周圍平鋪著三條筆直的北寧、津浦、平漢三大鐵路，擺在華北政治經濟中心的北平、天津、保定三大都市，還是軍閥戰爭最高的誘物。二十年來北方軍閥的混戰，總是在這些都市和鐵路的周圍滾來滾去，很少把這些地方例外的饒恕過去。而且戰爭打到這裏，很多時候是最後決戰，雙方都是咬牙切齒拼命狠鬥，除非打到狗血噴頭你死我活的程度，是不肯善罷甘休的。因此冀中民眾戰爭經驗之多，感受戰爭痛苦之深，別的地方民眾是望塵莫及的。²⁷

長期的內戰使冀中民眾瞭解戰爭、熟悉戰爭，當戰爭到來時，相對更具應付的經驗和信心，所謂「冀中平原是非常富庶的地方，人力、物力、財力都很富庶，民心強悍」，²⁸ 這也是民眾可以幫助八路軍挖掘地道、應付日本人的重要歷史背景。

24 高敏夫：《戰地日記》，第89頁。

25 參見從翰香主編：《近代冀魯豫鄉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384頁。

26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中工委關於冀中反「清剿」鬥爭的指示〉（1943年12月），《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第160頁。

27 〈冀中區爭取改造聯莊會鬥爭問題的材料〉（1940年9月5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165頁。

28 〈冀中戰爭形勢和幾個政策問題——關向應同志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幹部會上的講話〉（1939年6月28日），《一二〇師戰鬥在冀中》，第36頁。

地道挖掘乃至地道鬥爭必須依託村落進行，「村落在平原地是主要的地物，戰術上價值很大。不論敵我軍，不論進攻防禦，都離不開村落」。²⁹ 華北的村落，有一定的防禦設施，「在華北的大平原上，一個大而繁盛的村莊往往建有完整的或分段的圍牆，環繞著整個的村。圍牆的建築，其基本或主要用處是防禦盜劫，保護村民」。³⁰ 這為利用地道展開村莊防禦提供了基礎。同時，村莊規模對於地道功能的發揮也有重要影響。如果村莊過小、村莊之間相距過遠，迴旋餘地不足，地道的隱蔽及戰鬥功能會受很大限制，村與村之間的地道聯絡更難以實現。研究顯示，河北村落規模較大，多數研究者均承認「河北多百戶大村的事實」。³¹ 冀中村落規模更是超過全國乃至河北省的平均水平：「村落稠密，而且大村落多，村落間的距離由一里至數里，十里以上無村落的很少。村落多是數百家、千餘家，十數家的小村莊很少。」³² 日本人長野朗統計，唐縣5個區266個村，戶數過百村共168個，佔總數266村的63.2%。³³ 平教會對定縣東亭鄉的調查更為詳盡，該鄉62村，村落本身面積達到600畝以上的有2個，最大的達到640畝，相當於0.43平方公里；300畝以上的有18個，平均222.5畝，相當於0.15平方公里。也就是說，該地村宅的平均大小可達長500米、寬300米。就戶數言，1930年定縣最大村達到1,200戶，全縣平均每村146戶，一個村二三百戶屬

29 周士第：〈冀中區平原游擊戰爭的經驗教訓〉，《一二〇師戰鬥在冀中》，第62頁。

30 楊懋春：《近代中國農村社會之演變》，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0年版，第26頁。

31 黃忠懷：《整合與分化——明永樂以後華北平原的村落形態及其演變》，復旦大學2003年博士論文，第49頁。

32 周士第：〈冀中區平原游擊戰爭的經驗教訓〉，《一二〇師戰鬥在冀中》，第62頁。

33 長野朗著，朱家清譯：《中國社會組織》，上海光明書局1931年版，第51-52頁。書中另外列出14個鄉鎮，平均戶數超過百戶，如果將其統計在內，百戶村比例會進一步提高。

常態。³⁴大村落予地道鬥爭以天然支持，當時分析寫道：「一個據點平均只有五、六十到百、八十個敵偽軍。沒有其他據點敵偽配合，要獨自包圍整個村莊是很困難的。當敵人包圍東街一個角落時，便由地道跑到西街出村，或到另一個地道、地洞隱蔽起來，或順地道跑到村外。」³⁵

2. 地道鬥爭的起落

地道作為一種自發的鬥爭形式出現後，起初中共內部看法不盡一致。地道主要用於隱蔽，曾一度被批評為右傾、退卻。隨著冀中困難局面的不斷加深，冀中領導層開始改變看法。中共冀中區黨委書記程子華帶隊考察地道後，決定予以推廣。1942年3月，中共冀中行署、冀中軍區等發出關於開展地道鬥爭的指示信，強調：「在敵後平原殘酷的戰鬥環境裏，一方面群眾的生命財產要求安全，抗戰的物質資財要求保全，另一方面分散的群眾性的游擊戰爭，不僅需要堅持，並且要求猛烈廣泛開展，這就需要創造新的鬥爭方法。作為以上要求的有效依託，地道鬥爭就是適合於以上要求的一件新的創造。」³⁶隨後，地道迅速在冀中發展，五一「掃蕩」前，呈現由單純隱蔽轉向戰鬥和隱蔽功能兼具的趨勢。日軍報告稱：

部隊最初進駐無極縣時，共方工作隊、游擊隊四處潛伏，居民毫不合作，氣氛令人可怕。對此，各隊首先由所在地開始進行肅正。逐步向四周擴大。但終歸抓不住真正的敵人。部隊在行動中經常受到來自住房的窗口，牆上，丘陵樹林中的突然射擊。偶而

34 李景漢編著：《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第19-22、139-140頁。

35 王夫：〈抗日戰爭時期地道鬥爭的回憶〉，《蠡縣黨史資料·紀念抗日戰爭爆發五十周年專輯》，第14頁。

36 〈冀中行署、冀中軍區司令部、冀中武委會關於開展地道鬥爭的指示信〉（1942年3月20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613頁。

發現敵人，緊追過去，卻無影無蹤。以後得知他們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設在倉庫、枯井、小丘的洞穴等處，地道四通八達，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場所。……日軍總像是在和鼯鼠作戰一樣，曠費時日，真想舉手服輸。³⁷

1942年五一大「掃蕩」後，冀中根據地變質，日軍基本實現對冀中的控制，地道鬥爭的集中發展戛然而止。如中共強調的，地道鬥爭必須和村落麻雀戰、爆破戰、地雷戰、伏擊戰、外圍的反包圍戰等結合才能真正開展，根據地變質，中共活動空間大大壓縮，上述戰鬥失去順利展開的環境，地道鬥爭相應受到很大限制。雖然冀中軍區要求：「普遍開展地洞的鬥爭，使之成為積極的戰鬥的武器，而不是消極躲藏與單純堅壁的保險洞。」³⁸但日軍環伺、根據地喪失，地道作為戰鬥武器畢竟已不現實，絕大多數時候只能維持隱蔽功能，冀中區委提出的對敵應付方針中，地道被作為堅持生存的重要方法提出：「利用地道和地洞配合爆炸反對敵人抓捕。在目前應抓緊一切空隙將地道挖成，地區可發展地洞。」³⁹

戰鬥功能難以為繼，繼續大規模挖掘也不可能，既有的地道仍為中共和根據地居民渡過五一「掃蕩」後的難關提供幫助。時人分析：「『五一』變質後，幹部的犧牲量是很大的。如藁無縣兩年來黨政軍民、經濟部門犧牲被捕的縣區幹部近百人（游擊隊隊員不在內），假如沒有地道作掩護的話，幹部及游擊隊員之犧牲、被捕更不知達到何種驚人的程度。」⁴⁰地道不僅幫助幹部、民兵隱蔽，還充當地下電台、兵工廠、醫

37 《華北治安戰》上，第469頁。

38 〈八路軍冀中軍區反「清剿」鬥爭的指示〉（1943年4月13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第73頁。

39 〈中共冀中區黨委、冀中軍區關於反敵「清剿」的指示〉（1942年5月25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648頁。

40 張達：〈「五一」變質後的冀中是怎樣堅持下來的〉，《河北黨史資料》第5輯，第47頁。

院乃至辦公地，甚至幫助隱藏財物：「地道鬥爭要與堅壁清野聯繫起來，所有物資、合作社、小工廠等都可安堅壁所內，牲畜都要藏起來，不被敵人搶去。」⁴¹ 1942年秋，冀中十分區為保障分區與晉察軍區的密切聯繫，「電台便轉入地下，成了地道裏的電台，每天從地道裏發出和接收電報。開始只是挖了個地洞，後來發展成地下室」。⁴²

地道安危繫於民眾，地道的隱蔽功能，離不開民眾的支持：「地道行之有效，完全是依靠了群眾的條件，幹部戰士與群眾取得了緊密的聯繫。不然那怕地道是鐵打的，也必遭敵之破壞。」⁴³ 五一「掃蕩」後，根據敵我力量對比的差異，冀中分為游擊根據地、游擊區、隱蔽根據地及敵佔區等四類不同性質地區，前三類地區，由於中共之前的努力和民眾對日的敵意，可以利用地道程度不同地隱蔽：

在我抗日游擊根據地，我有深厚的工作基礎，為了避免敵人的抓捕蹂躪，基於過去地道鬥爭的經驗，能自發的挖掘秘密洞以隱蔽自己，在我組織領導下（聯繫群眾切身利益進行動員），一般的說，是容易開展的。在游擊區內，由於敵我鬥爭頻繁，群眾生活不安定和政治認識上的不足，廣泛的開展地道鬥爭則較困難，但部分的小型秘密洞（藉以隱蔽我之工作人員及精幹小型武裝）的開展還是可能的。在隱蔽根據地內，由於群眾認識差，合法觀念重，則只能在一定條件下，開展少數的絕對秘密洞（敵特活躍，群眾一般不敢挖），以掩護我之個別的工作人員，也是能夠做到的。⁴⁴

41 〈冀中行署、冀中軍區司令部、冀中武委會關於開展地道鬥爭的指示信〉（1942年3月20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618頁。

42 閻鈞：〈地道裏的電波〉，《晉察冀軍區民兵鬥爭史叢書之三·地道戰》，第228頁。

43 張達：〈「五一」變質後的冀中是怎樣堅持下來的〉，《河北黨史資料》第5輯，第47頁。

44 〈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關於冀中部隊各種情況下政治工作的指示〉（1944年1月1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第200頁。

相對而言，日軍控制嚴密地區，地道的作用已經有限，尤其敵佔區「幹部活動是相當困難的，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境地（如七分區黨無一個時期是這樣的）」。⁴⁵

不過，困難局面並沒有延續太長時間。日軍通過五一「掃蕩」雖然暫時控制冀中，但由於中共打下的扎實基礎，日軍有限的兵力面對中共不斷游動的游擊武裝、堅持活動的黨組織及充滿敵意的民眾，明顯不敷分配。整個冀中仍然有相當一部分地區掌握在中共手中。五一大「掃蕩」後，日方的統計顯示，中共控制下的村莊，「在獻縣為45%，在衡水為9%，在東鹿為50%，在深澤為66%，在晉縣為10%，在武強為50%，在安平為87%，在交河為38%」。⁴⁶面對持久抵抗的敵後武裝，日軍兵力捉襟見肘，不得不依賴密集的碉堡和據點維持控制。

日軍的碉堡戰術據信有模仿蔣介石「剿共」戰法的成分，但兩者又不盡一致。國軍「圍剿」紅軍時以碉堡作為防禦和前進障地，碉堡被用於壓迫式的進攻中，限制中共反擊並在進攻中起壓制作用。碉堡的修築，基本意味著對該地的完全佔領。之所以如此，緣於人數上的絕對優勢，中共又缺乏攻堅能力，這是國軍當年可以利用碉堡戰術取得主動的關鍵。同時，國軍不像日軍那樣需要面對充滿敵意的民眾，這是內戰和侵略戰爭的巨大區別。日軍的碉堡主要用於駐防，碉堡是一把雙刃劍，強化了火力控制，卻也分散了機動兵力，使之面對游動著的中共武裝顯得力不從心，這就是中共分析的：

在新的情況下，敵人兵力更加分散了，每個據點或碉堡，平均不過二十八點三人，大據點不過上百人，小碉堡僅十數人；其中大部分又為偽軍，敵軍超不過四分之一，戰鬥力與突擊力都降低

45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中工委關於冀中反「清剿」鬥爭的指示〉（1943年12月），《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第159頁。

46 〈一九四二年八、九、十月份冀中情況〉（1942年11月30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752頁。

了。一般的小碉堡，缺乏獨立作戰的能力；偽軍增加了，其中很多是被迫抓去的農民，更增加了其內部動搖的成分。⁴⁷

日軍戰鬥和控制力的下降，不僅表現在人數上，人員結構和素質也出現不利變化。據清豐松本大隊一份陣中日記和一個日本俘虜言：「松本大隊每個小隊有180人，……1937年-1938年的老兵，原有50個，今年夏天3月間完全調走了。」⁴⁸山東也報告日軍素質下降，非「典型軍人」的士官大幅度增加：

三十二師團第三大隊共有軍官七十八名，而所謂「典型軍人」，陸軍士官學校出身者僅八名，而幹部候補生出身者就六十一名。今秋第五混成旅團第一大隊四個中隊長，均係幹部候補生出身者。此種幹部候補生均係從一年或二年兵中之大學生、中學生中強制提拔，受一年速成訓練而成的。他們軍事素養較差，缺乏實戰經驗；因非志願以行伍為職業，對家庭顧慮大，有人道主義思想，致對士兵管束不嚴，雖善於團結下層，但戰鬥頑強性差，喜歡接近中國人，易接受我之宣傳。⁴⁹

新兵戰鬥經驗、軍事訓練均不如老兵，射擊技術減弱，戰鬥頑強性大大降低，後勤供應也出現問題：「吃十分七八的麥仁，十分二、三的大米，吃不飽，不斷有在街上要窩頭的。」⁵⁰日軍的實際狀況，決定他們針對中共的行動往往是有限的，「掃蕩」時如彭雪楓所言：「知我部隊在甲地，及其前往甲地進擊而撲空時，彼通常焚燒房子而去，很少

47 呂正操：〈冀中平原游擊戰爭〉（1940年3月4日），《論平原游擊戰爭》，第168頁。

48 〈冀魯豫軍區1942年工作初步總結〉，《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二，第56頁。

49 〈關於對敵鬥爭問題——肖華同志在全山東政治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2輯，第33頁。

50 〈敵偽瞭解〉（1942年3月），《昔墨今史——宋洪勛同志工作手記（1941-1948）》，第179頁。

尋蹤追擊。」⁵¹ 日去我來，日來我去，「掃蕩」常常成為貓捉老鼠的應景遊戲。

理論上言，日軍完成對華北的佔領後，大量發展偽軍，可以彌補日軍人數上的不足。不過，正如劉伯承所說：「敵人對偽軍的難以組成，以及組成之偽軍不能有多大作用，這是日本強盜在自己兵力不敷分配中感覺到最大的恨事。死心塌地當漢奸的還是佔少數。」⁵² 無論素質、訓練還是作戰精神偽軍都無法和日軍看齊，加之冀中地區很多偽軍有民族認知的基礎，又接受過中共民族精神教育，更不願意為日軍賣命。搜索地道時，日偽常常遭受地道內民兵的阻擊，吃過虧後，日軍即「命令偽軍鑽洞。但偽軍更怕死，偽軍此後便不注意搜索洞口，即便見了洞口也不告訴敵人，甚至有的替我們掩蓋洞口」。⁵³ 日偽不同心、不同命，日軍想利用偽軍彌補自身不足實乃緣木求魚。

1943年年中以後，華北乃至冀中的中日對峙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日軍開始準備打通大陸交通線，冀中兵力不得不進一步壓縮。中共注意到，從1943年5、6月起，日軍「即開始改變其碉堡密佈的程度，撤退點碉，集中兵力」，⁵⁴ 9月至12月，日方在冀中「撤去點碉400餘(七分區百餘，八分區21，九分區180，十分區98)」。⁵⁵ 1944年後，隨著豫湘桂戰役的展開，日軍兵力抽調更加急迫：「自今年春起，敵在冀中大撤點碉，去夏原有1753個，現只有495個，比1940年10月時還少。……中

51 〈豫皖蘇邊區兩年來平原游擊戰總結〉(1940年8月25日)，《彭雪楓軍事文選》，第261頁。

52 劉伯承：〈對目前戰術的考察〉(1939年4月20日)，《劉伯承軍事文選》第1卷，第198-199頁。

53 張達：〈「五一」變質後的冀中是怎樣堅持下來的〉，《河北黨史資料》第5輯，第49頁。

54 〈程子華在冀中各地委討論冀中形勢問題時的結論〉(1944年7月10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第277頁。

55 〈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關於1943年9月至12月冀中敵我情況的通報〉(1944年1月)，《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第240頁。

原大戰爆發後又抽調一批，可能是增援中原。一部分縣城已無日軍，一部縣城日軍很少。」⁵⁶ 根據日方統計，1944年秋，華北方面軍佔領地區，有139個縣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佔總數的31.5%。⁵⁷

日軍兵力大批抽調，給一直蓄積能量的中共趁勢反擊的機會，地道鬥爭重新活躍並進入高峰期。

3. 地道鬥爭中的民眾動員

1944年後，冀中出現地道挖掘高潮。如果說1942年前的地道挖掘主要來自各地自發，這時則更多緣於中共的組織動員。1944年後，中共和日軍在冀中開始新一輪拉鋸，和五一大「掃蕩」前中共在拉鋸中不斷被削弱不同，這一次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日薄西山，拉鋸的結果日漸向中共方面傾斜。此時，日軍威脅依然存在，掠奪有增無已，民眾躲避負擔的心理迫切；而中共力量壯大，日軍下鄉徵發倉促，挖掘地道躲避日本掠奪乃至利用地道打擊、警告日偽有了更大可能。以此，中共組織開展了大規模的地道挖掘運動。據不完全統計，僅1944年，冀中平原挖掘地道即達2萬里以上。河北易縣1945年的報告系統闡述了地道的發展過程：「從1942年冬本縣號召開展地道，由黨政軍民各部門主要幹部成立縣區村地道委員會，以人民武裝系統為主，推動這一工作。但從成立到1943年底，這一階段領導機構多成有名無實，作用甚小」；「自1944年初才走上健全，內部有了正副主任，組織、宣傳、研究、警戒、總務等明確分工，並發揮了作用。」這應該是各地大體一致的路徑。報告進一步說到地道發展的幾個階段：

56 〈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關於敵調兵中原與我之方針的指示〉（1944年5月16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第260頁。

57 《華北治安戰》下，第440頁。

第一階段，是從1942年冬至1943年底，為地道萌芽時期。那時只有二、三、四、五區少數村莊開始挖單個洞，只有入口沒有出口，兩三個口的洞還是很少，六、七、八區則一個地洞也沒有。第二階段，是從1944年初至現在，為地道全面開展時期……全縣除了有據點堡壘及完全是大山大石根本不能挖掘沒有開展地道外，其餘均普遍開展了地道。挖的成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村莊能容全村男女，一般的村有百分之十五戶與戶通了。⁵⁸

易縣不屬成績十分突出的地區，從報告看已相當可觀。日方發現，此時冀中地區地道幾乎無處不在：「(一)地下室的入門，在屋內者，多在雞籠、便壺、灶台及柴薪亂草的下面。在屋外者，多在馬、牛、羊、豬等廄房的底下，及餵豬餵馬的槽底下。(二)地下室內，不但可隱匿兵器、糧秣等，又可收容人員及醫院的設施，或兵器修理工廠、印刷廠等。(三)於破土房子，或空地下面，掘成地下室，上面堆積農作物或煤炭、馬糞等來隱蔽。」⁵⁹負責平津保地區警備的野副昌德中將感嘆：「剿共戰已變成地道戰」。⁶⁰

挖掘如此之多的地道，付出巨大，1946年，三年內戰爆發後，冀中地區重挖地道，經過此地的胡一川記錄挖地道的場景：「他們都穿著短褲，打著赤膊，六個人一組在菜園裏，在牆角邊(在)挖地道。……他們除了用繩子來吊土外，大多數的老鄉都用打水的轆轤來吊土塊。」⁶¹如此艱難的工程，普遍動員民眾投入其中實非易事：「老百姓大多是不相信，寧跑不鑽，也不願挖。原因是：一則他們不相信地道的用處。

58 〈中共易縣縣委關於易縣地道工作初步總結〉(1944年6月)，《保定抗日地道鬥爭》，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386頁。

59 〈敵人對付我軍的戰術指示〉，《情報彙刊》第2期，八路軍太行軍區司令部1945年4月版，第37頁。

60 《華北治安戰》下，第441頁。

61 《紅色藝術現場——胡一川日記(1937-1949)》，1946年9月4日，第410頁。

二則成天老跑集合不起人來。三則農忙有點可能時間需要作莊稼。」⁶² 楊成武具體分析了地道挖掘的代價：「冀中去冬完成後之地道，可能已達二萬五千里，其勞力之大從此可見。此外挖地(道)時還要很多的家具，如筐子、鋤、鎬，特別是點燈油，每村均在數萬元款的開支。」⁶³

要克服這些困難，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其次則要依靠中共的組織動員，這兩方面，當時的冀中都可予以相當的滿足。冀中地道鬥爭的歷史，可以說是區域社會面對戰爭動蕩不斷回應、裂變的歷史。

冀中資源豐富、生態穩定，和冀東、魯西北、冀西南等平原地區具有不完全一樣的自然和社會生態，日軍稱「冀中地區富產農產品和手工業品」。⁶⁴ 這為地道挖掘提供了物質上的可能。另外，李懷印關於冀中南地區的專題研究特別強調這一地區官府和鄉民的共同治理傳統，指出：「這裏大多數村落是自耕農佔優勢的、凝聚力很強的社群。由於生態環境穩定，沒有頻仍的自然災害，背井離鄉的很少。鄉民們在長時間中形成了緊密的血緣網絡和強烈的社群認同感。在村規和共同準則的支撐之下，村民們的惠及所有成員的村社事務中互相合作。」⁶⁵ 儘管不一定可以證明地道的大規模挖掘和這一傳統有直接聯繫，但面對一項需要村民合作完成、維護的任務，合作和自我管理傳統的存在，或多或少應會釋放一些助力。

作為一個龐大的集體工程，挖掘地道需要全村家家戶戶的配合，組織、動員乃至適當的物質刺激不可或缺，權衡事物利弊時，利益的考量

62 〈冀中冀無縣地道爆炸武裝三位一體的鬥爭〉(1942年7月15日)，《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9頁。

63 楊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鬥爭〉(1945年5月)，《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108頁。

64 〈第11、物資取得作戰の狀況及其の效果影響〉，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3070309500，北支那方面軍經濟封鎖月報，第1卷，昭和17年8月3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5 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士皓譯：《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4頁。

從來不會在中共的全盤思慮中缺位，這是立足現實的實事求是態度。中共饒陽縣委發佈的一個村莊挖掘地道的介紹顯示：出夫標準按照人力和富力兩種條件制定，人力和富力各佔一半，財富多者除承擔人力負擔外，還要出富力負擔，富力可以折算為人力，貧窮者完成本身夫力後繼續支差，可獲得富戶所出的那部分富力，得到一定收入。⁶⁶

確定出夫原則、保證夫役相對公平後，有力的領導是地道挖掘能否順利進行的前提。獎勵和懲罰等精神、物質刺激也是挖掘地道動員中的重要方式。完成較好者予以獎勵，完不成任務者則予以處罰。不過，根據中共的謹慎處理方式，處罰措施一般都相當慎重：「根據每組每日彙報，在大會上指出落後者的不當處，但不輕易指出其姓名，促其進步。另外村訂立了罰約，規定罰約以十斤、二十斤、三十斤米，看其情節而定。但告訴了區幹不到不得已時不准使用罰約。所以在這一縣中目前只××莊××營各罰一戶。」⁶⁷ 只要不是階級問題，中共一般都盡力減少打擊對象、避免過多傷害。即便如此，重面子的村民們還是十分在意，報告顯示：「獎懲辦法的公佈，不但只把全村青壯年、老、少年動員起來，而全村的婦女也積極的為此工作服務。同時誰也不願意讓自己家中的男子落於人後，除早晨作飯外，並代替男子管理家務，替男子作活。」⁶⁸

日本人可能不會意識到，除中共本身的努力外，躲避日軍掠奪也是挖掘地道的重要動因。當時材料記載了挖掘地道、開展地道鬥爭後對民眾物質上的影響：「雖說在才一挖掘的時候費一部分人力、木頭、秫秸，但假如地道開展好了以後，就可以利用地道武裝保衛村莊，保衛自

66 〈中共饒陽縣委關於在開展地道鬥爭中實行人力夫和分數夫的參考——饒陽五區遷民莊示範的初步意見〉（1944年），《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53-54頁。

67 〈冀東十六專署關於地道工作點滴經驗的介紹〉（1945年4月），《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87頁。

68 〈新樂縣地道示範村報告〉（1945年4月4日），《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79頁。

己的財產和生命，不給敵人派聯絡員，不資敵。……假如把一個村莊資敵的消耗和挖地道所費的錢財、人力比較起來，那挖地道所用的人力財力，不過是九牛的一毛。」⁶⁹ 冀無聯合縣正是通過有無地道的鮮明對比，提高了民眾挖地道的積極性：

冀無同志們勝利的堅持了一個多月，擊退了××大隊的多次突擊，遲滯了他的企圖，同時又熬過了大「掃蕩」，而沒有離開過這幾個村子。眼看著周圍的村莊都被敵人每天去蹂躪、勒索、威脅。××的據點附近的村子，幾天的工夫就各出了幾千塊錢，此外送肉、麵、木柴、磚、乾草，其數量也是沒有限制的。還有所謂「進門伙」，每村一百二百不等，幾乎是每天都去。⁷⁰

程子華專門算了一筆賬：「每村修築地道，如果大部有勞動力的人民都參加，需要1個月的時間，而一部頂棚所用的木料，需要1000元至2000元。像這樣大的耗費，為什麼人民樂於負擔呢？顯然的這絕非理論上的說服問題，而必須是實際上的鬥爭過程。修築地道誠然需要大批勞動力，需要大批的資財，但較之敵人一次的搶掠，卻已便宜多了。」⁷¹

作為異族，日本侵華不得不面對敵對的人群。統治敵對的人群往往採用強力的手段，而這種手段反過來又增加被統治者的敵意，成為無法解開的死結。以冀中為例，1941年到1945年日軍僅在七分區即設有大小據點96處，修築碉堡310座，築公路總長1,225公里，挖封鎖溝總長1,140公里，而七分區總面積為4,860平方公里，村莊1,566個，人口120多萬，⁷² 幾乎每隔兩公里左右就有一個碉堡，5公里左右一個據點。

69 〈冀中行署、冀中軍區、冀中武委會關於開展地道鬥爭的指示信〉（1942年3月20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614頁。

70 〈冀中冀無縣地道爆炸武裝三位一體的鬥爭〉（1942年7月15日），《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7頁。

71 程子華：〈冀中平原上的民兵鬥爭〉（1942年11月），《冀中地道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頁。

72 〈抗日戰爭期間冀中七分區敵點碉溝路分佈圖〉，《冀中七分區人民抗日鬥爭史資料選編·滄沱河畔的戰火》，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628頁附圖。

根據呂正操1940年的估計：「敵人兵力，在此區域為18300人，每年需在此消耗2萬萬元。」⁷³ 呂正操作此判斷時，日軍在整個冀中尚只有181個據點。⁷⁴ 到1942年，日軍在冀中「共計建築了1753個據點與碉堡，平均每四個半村莊或62.8平方里就有一個據點或碉堡，並將各點中間妨礙瞭望與射擊的樹木、房屋及丘陵一律削平；原有和增修的鐵路為1539里，公路15166里，共計鐵、公路為26705里，平均每6.5平方里即有一里鐵路或公路；挖掘了8773里封鎖溝，平均每1.2平方里即有一里封鎖溝。」⁷⁵ 如此之大的消耗是異族征服者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大量的據點、碉堡構築時要付出高昂的人力、物力，根據日軍「現地自給自足的自營主義」⁷⁶ 的供應方針，這些負擔必然轉嫁給當地民眾；為維持據點對周邊地區的控制力，又要在據點和碉堡內投放兵力，1939年，薄一波曾經計算道：

截至現在為止，敵佔我鐵道線約1萬里以上，主要大城市在25座以上，估計敵人保持後方聯絡交通辦法，每里需要一個碉堡，每一碉堡至少需一班人（以14人計）輪流守衛，即需14萬人在鐵道線上站崗。每一大城市亦至少需要5000人守衛，即需12萬人。再加上警戒礦山、工廠及汽車路線，總計亦需三四十萬人，這是膠著在站崗放哨守衛的工作上，如再深入，這樣站崗的警察，將需更多的人來充當。⁷⁷

73 呂正操：〈冀中平原游擊戰爭〉（1940年3月4日），《論平原游擊戰爭》，第81頁。

74 〈冀中平原游擊戰爭——呂正操在十八集團軍總直屬隊幹部會上的報告〉（1940年3月4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第101頁。

75 呂正操：〈冀中平原游擊戰爭〉（1940年3月4日），《論平原游擊戰爭》，第167-168頁。

76 〈敵桑木師團長的自供——對其官兵訓話〉，《新長城》創刊號，1939年7月31日，第44頁。

77 薄一波：〈在第三行政區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39年6月7日），《論犧盟會和決死隊》，第210頁。

這些兵力的糧食與物品補給主要取之於當地。根據河北新樂一個村莊的調查，該村在平漢路東，靠近長壽據點，全村212戶，負擔著看鐵道的苦力、帶班的苦力頭、自衛團團長、情報員、修築牆的苦力、隨軍民夫，以及給據點日偽軍送飯等，每日需要負擔295元6角6分。⁷⁸這樣常年的供給對當地民眾的壓力可想而知，而這還只是日常負擔之外的額外攤派。當時調查發現：「一般說來，……更多的修建碉堡，是負擔輕重懸殊的主要原因。」⁷⁹控制需要高額的成本，這種成本加之民眾頭上激起的敵意，又刺激著成本的增加，形成惡性循環。中共總結道：「地道工作完成的特點：哪個區裏的游擊區多，敵人對哪個區搶掠抓捕頻繁，哪個區裏的地道便開展的普遍，成績便比環境鞏固的地區大。群眾開展地道堡壘的情緒，便比環境較好的地區高漲。」⁸⁰可謂一針見血。

4. 地道鬥爭的高潮

不誇張地說，抗戰結束前，冀中已成為一座地下長城。不過，客觀看，除局部地區、個別地道曾經發揮作戰功能外，地道更多還是限於隱蔽。地道要具有作戰功能，按照中共自己的說法：「戰鬥地道須具備有物質條件與政治條件。如土質深厚，基本群眾發動起來或佔優勢，這些村莊才能佈置戰鬥地道。」⁸¹具體而言，「戰鬥地道在游根地先有重點

78 〈晉察冀敵「治安強化」下敵佔區人民負擔繁重〉（1941年12月6日），《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華北治安強化運動》，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48-249頁。

79 〈太行區經濟結構與抗戰開始後社會經濟變化〉（1944年12月），《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7卷，第307頁。

80 〈中共定南縣委關於開展地道修理道溝工作的報告〉（1945年5月1日），《冀中地道戰》，第49頁。

81 〈中共冀中區黨委關於加強目前地道鬥爭的指示〉（1945年1月22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第340頁。

的開展，逐漸普及游擊區。有重點的開展地道逐期普及隱根地，要開展秘密堡壘。在開展戰鬥地道的村莊要適合以下條件：①政治條件好，基本群眾佔優勢，②便於打，能轉、能走、能藏。」⁸²

1944年後，形勢明顯向著有利於中共方向變化，地道的戰鬥功能被特別強調，戰鬥地道逐漸得到推廣。中共文件要求「把地道、溝道、村落工事的使用結合聯繫起來進行戰鬥，更有力的殺傷敵人」。⁸³地道要發揮戰鬥作用，必須和村落戰、爆炸戰等戰鬥方式結合：「單純地道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必須以武裝鬥爭、爆炸運動來掩護。只有廣泛的游擊戰很好開展起來，地道運動才能廣泛開展。」⁸⁴

1945年，隨著日軍進一步收縮，力量對比繼續向有利中共方向轉化。此時，各據點的日偽軍給養受到威脅，所謂「清剿」行動更多限於維持生存，出動人員、行動方式均有限，這使中共運用地道進行小規模狙擊有了更大可能，地道戰發揮威力主要在這一時期。

從檔案文獻材料看，現有的一些戰例集中出現在1945年，茲選取發生於時屬冀中行政區⁸⁵的南莊戰鬥、謙場戰鬥、小蘆咎戰鬥等戰例子以剖析，從中窺察地道戰的一些特徵。

南莊戰鬥發生地南莊屬獻縣五區，離臧家橋日偽據點十二里路，「是一個與敵人聯絡著的村子。……當時這個村已經開展了地道，但堵街堵門高房堡壘等村落改造工作都還沒有做。」由此看，南莊應該屬兩

82 〈冀中臨時武委會關於一九四五年春季反「掃蕩」準備工作的指示〉（1945年初），《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65頁。

83 〈冀晉區人民武裝委員會關於一九四五年人民武裝的鬥爭方針與任務〉（1945年4月1日），《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75頁。

84 〈冀中藁無縣地道爆炸武裝三位一體的鬥爭〉（1942年7月15日），《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8頁。

85 根據1943年初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冀中行政區轄5個專區，39縣，下文中的獻縣（獻交）、寧晉、雄縣（第二聯合縣）全部或一部屬之。（宋劭文：《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工作報告 1938-1942》，第22-24頁）

面政權村莊，日軍名義控制該村，但中共在該村有強大的影響力，可以實際控制並領導地道挖掘。

1945年1月，日軍「掃蕩」途中路經南莊。南莊民兵分成三個班，分頭利用院落、地雷、地道打擊日偽軍，戰鬥進行得非常順利，日偽軍本來把這個和自己保持聯絡的村莊當成休息和補給地，驟然遭受打擊，明顯驚慌失措，「原來的計劃是在這村吃飯。……地雷響了之後，敵人害怕了，動搖了，沒敢吃飯就撤走了。沒有搶東西，也沒有燒別人的房子」。

南莊戰鬥相當順利，直接結果就是結束了該村對日軍的支應：

南莊村分兩頭，仗是在大村打的。大村的老百姓說：「民兵真保護咱們，敵人也沒有搶，也沒有燒房，還是打好！」小村被敵人搶去了一些東西。小村的老百姓說：「再來了咱們也打！」馬上動員起來，改造村落。……這村從這個戰鬥以後就和敵人斷絕聯繫了，不再資敵了。⁸⁶

謙場戰鬥發生於1945年5月。謙場村位於寧晉縣城東北25里，「東南五里有大陸村據點（住偽軍大隊部偽警察所共一百五十人）。西六里有唐丘據點（住偽一中隊偽警察所共七十人）。村西五里有寧晉至大陸村的汽車路」；「全村約二百多戶，一千三百多口人，中農佔多數，群眾生活富裕。」無論從人口、經濟和地道挖掘狀況看，謙場都是一個很有分量的村莊，「是圍繞唐丘和大陸村據點鬥爭最尖銳的一個村，依靠武裝鬥爭，已經斷絕資敵」。⁸⁷ 全村有青壯年240人，其中民兵14人。

謙場戰鬥是中共武裝圍攻大陸村偽軍據點戰鬥的一部分，此時，中共開始對一些突出於根據地的日偽據點發起反攻，圍攻大陸村偽軍崗樓

86 范一修：〈南莊戰鬥〉（1945年7月1日），《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150—153頁。

87 〈謙場村落戰〉（1945年7月1日），《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164—165頁。

三晝夜，崗樓下埋好地雷，臨爆破時，「兩次都拉斷了弦」，⁸⁸ 未能成功炸毀。日偽 500 多人為掩護據點偽軍撤退，向大陸村進發，5 月 17 日⁸⁹ 途徑謙場。謙場地道「全長約三千二百丈」，「洞口一百多個」，雖然存在著「戰鬥地道與群眾地道混淆不清，防毒防水的設備都不夠」等缺點，但長達萬米以上的地道，使該村獲得與日偽周旋的後盾。日偽軍從東西南三個方向企圖進入村內，均遭堵截，中共武裝「堅持了七小時，擊退敵人兩次衝鋒，始終沒放敵人進村，傷亡敵偽六名。我只消耗地雷一個、手榴彈二個、子彈二十粒、自傷二名。」⁹⁰

日偽軍行動重點在於撤出遭受圍攻的大陸村據點偽軍，進攻謙場只是進兵途中的順手牽羊，遭受阻擊後即選擇知難而退。由於日軍沒有繼續攻擊村莊，戰鬥中沒有直接利用地道，但龐大的地道網絡的存在，是少量的武裝敢於在村裏展開阻擊戰的重要支撐。地道起到心理上和實際上的支持作用。無論南莊還是謙場戰鬥，日偽都是路過式的騷擾，以地道為後盾的村落伏擊戰，針對這樣的敵手相對具有迷惑和震懾作用，容易獲得成功。

隨著地道戰的開展，日軍遭遇打擊後，也在不斷調整策略，研究破壞地道和地道戰。中共注意到，日軍摸索出一套「掃蕩」與剔抉破壞的方法：

- (1) 集中兵力迅速行動突擊一點，直撲都是剔抉村莊，做駐屯性的「清剿」。
- (2) 以日本軍與偽治安軍為主力，一部分地方性偽軍特務配合。
- (3) 不進街，從村邊，掏牆穿院，進到街中，上房。
- (4) 白天剔抉地道，挖掘糧食財物。晚上則加強警戒，圍村建築工事。警戒崗伸出一、二里地，並在村邊、溝野地，遍撒鹿寨，防好突圍與襲擊，已改變了過去的一套。

88 《徐光耀日記》第 1 卷，1945 年 5 月 17 日，第 83 頁。

89 檔案記載時間是 5 月 27 日，對照實地參加大陸村圍攻戰鬥的徐光耀日記可知，這次戰鬥發生於 5 月 14 日至 17 日，檔案中的 27 日應為 17 日之誤。

90 〈謙場村落戰〉(1945 年 7 月 1 日)，《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 164—166 頁。

如果日軍有意識地針對某一村落地道實施打擊，作為一種相對被動的抵抗形式，地道還是有局限性，小蘆咎村戰鬥是日軍採取駐點進攻時有可能對地道形成巨大壓力的案例。雄縣小蘆咎是中共武裝的一個基點村，十分區「分區武委會和地分〔委〕城工部都在小蘆咎住著」。5月下旬，日軍開始「掃蕩」這一地區，中共方面多少有點低估日軍的行動目標：「由於過去幾次村落戰的勝利，認為敵人一打即跑，不敢住，見到鬼子還誤認為偽滿軍裝假鬼子。」然而，日軍這次有備而來，目的就是打擊中共的地區領導核心，進村時遭受地雷、爆炸、伏擊等打擊後，不但沒有撤退，反而加緊攻勢，並在村裏駐紮過夜，這使藏身地道的中共武裝、城工部工作人員及民眾陷入被動。

第二天，日偽軍開始剔抉地道，「作戰地道被切成數十段，五米到十米就有一處掘開了。有一個堡壘院的地道被切成幾段」；「大部幹部和群眾已經被捉上去了」。⁹¹ 日軍這一行動針對的正是地道鬥爭的軟肋，當地面支持被切斷後，地道單獨作為一個戰鬥體，應付不易。按照當時的一般要求，地道挖掘「高一米至一米二，寬八十生的即足」，⁹² 在地道內只能依次彎腰行進。作家柳杞記載其經歷的地道戰實況是：「發現敵情，鑽入地道。地道潮濕而黑暗，低矮，只能躬身前進。」⁹³ 戰鬥人員在地道內活動、轉移並不容易，也不瞭解地面情形，一旦隱身之所暴露，難免被動挨打。

入夜，日偽軍依然沒有撤走，地道內剩餘的幹部和武裝人員決定突圍。此時，地道縱長的優勢再次顯現，百餘個出口讓地道內的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中共幹部和武裝人員突出地道後，雖被發現，但分散的敵軍不敢過於迫近，他們且戰且走，艱難突出包圍。

91 〈冀中十分區武委會關於小蘆咎村落戰的報告〉（1945年7月1日），《冀中地道戰》，第99-108頁。

92 〈中共冀中區黨委關於加強目前地道鬥爭的指示〉（1945年1月22日），《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第338頁。「生」應為英文centimetre的中文簡讀，一「生」即一厘米。

93 〈柳杞同志的戰地日記〉（1944年4月27日），《保定抗日地道鬥爭》，第275頁。

小蘆管村戰鬥，不能算是十分成功。雖打死日偽軍數十人，中共幹部和民眾的損失也不小：「城工部幹部(受訓的在內)除少數同志出外，四十來人有的被俘，一部光榮犧牲。」這次戰鬥凸顯日軍採取駐點剔抉的辦法時，地道鬥爭有可能遇到的困境。⁹⁴

地道鬥爭之所以能夠進行，和民眾的支持及日軍被牽制的現實關係至大。在普遍的敵意和有領導的武裝反抗下，日軍有限的兵力通常是掌握交通要道和核心地區，這給中共各種形式的抵抗提供了空間，地道鬥爭是富有效能的一種。不過地道鬥爭畢竟有被動挨打的一面，和各種形式的鬥爭結合至關重要，對環境和條件的要求也相當嚴格，否則，就難免遭遇挫折。中共規定：「地道戰以民兵為主，配之以區小隊或縣大隊支隊分散之班(一般的限於雙的兵力)為輔助，密切結合擔負之。主力部隊數量多，不適於進行地道戰。」⁹⁵ 地道戰一般投入的都是小兵力，如果遇到對手大兵力、持久性的襲擊，無法順利轉移，周邊村莊也不具備協助打擊敵軍的實力，將可能遭遇困難。和中共所有的敵後抵抗措施都環環相扣一樣，地道鬥爭必須放在抵抗系統中作為其中一環使用，小蘆管村的經驗側面提示了這一事實。

小蘆管村的經驗提示了地道戰的局限，而整個地道鬥爭的展開，則告訴我們中共在敵後之所以能夠持久抵抗，關鍵在於有一整套造成持久的辦法，保存實力、盡可能避免與日軍正面衝突，不僅是地道鬥爭產生的理由，也是整個敵後戰場對敵的基本思路。當然，避免正面衝突，絕不是放棄抵抗。如地道鬥爭顯示的，中共的抵抗綿裏藏針，以各種方式、不放過一切機會持續進行，即便像地道這樣一種偏於被動的鬥爭形式，也被賦予抵抗功能。儘管到抗戰結束，這種功能還在持續改造、發

94 有意思的是，胡一川日記記載，抗戰時期親身經歷地道戰的八路軍幹部，回憶在河間大行羊村展開的地道戰鬥，和小蘆管村的經過驚人地相似，顯示這一案例或許有一定的代表性。參見《紅色藝術現場——胡一川日記(1937-1949)》，1946年9月29日，第430-431頁。

95 楊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鬥爭〉(1945年5月)，《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第129頁。

展、升級中，還有相當局限，有時甚至會像小蘆咎村這樣遭受損失，但正是這種全方位的系統抵抗不斷消耗著日軍的實力，保證自身在艱難的環境下生存下來。以日軍有限的兵力，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面對中共韌性的抵抗，南莊、謙場的驚魂更像是敗局已定的日本人的輓歌。

縱橫於冀中地下的地道，某種程度就是戰時中共抵抗系統的隱喻。地道串連起廣大的範圍，隱藏著多種抵抗因子，關乎著士氣和人心，是一個地底下的不合作的宣示。征服一個地道不難，要征服成百上千的地道就難上加難。日本人過大的戰爭企圖使他們很難腳踏實地，以有限的兵力，從事一場沒有邊界的戰爭，捉襟見肘幾乎不可避免。中國強有力的抵抗，以及敵後多種形式的抵抗系統，進一步加劇了日本人的困難。地道的存在，提示了日本人在中國的最終結局。而地道顯示的中共深入地底下的努力，也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指示著之後歷史的趨向。

結語

大約2010年左右，我決定研究抗戰中的中共。十餘年的梳理，就是呈現在書裏的這些，很難說，離逼近這段歷史的目標做到了多少。認知歷史真的太難太難。不管是否可能，盡力回到現場是必須要做的基礎性工作。回到現場包括瞭解現場、整理現場、解釋現場，這些都充滿挑戰性。即便這些都做了、做到了，呈現現場還是非常困難；資料搜集、準確講述、問題把捉、書面呈現，都有很多難以逾越的障礙。

不管能做到多少，可以確信的是，和進入這段歷史前相比，自己感知這段歷史的可能畢竟還是提高了，對期望認知的主角——抗戰中的中共的瞭解也有加深。如果可以說感觸，最大的感觸就是中共黨人的服從和皈依、運作系統的圓融有序、理論規範力和策略彈性的辯證統一，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的效率優先、政治統合和組織凝聚。這些形成為思維和運作系統，造成強大的慣性，使黨的意志幾乎無堅不摧。應該提醒的是，這常常也是一把雙刃劍，強大的意志加上強大的貫徹系統，有時會造成巨大的慣性，無論對錯都將被放大。研究者常會批評歷史研究中的過度闡釋，把條理化的歷史敘述當作歷史本身，這樣的批評放到中共研究中同樣有效。然而，面對中共，更不應該忽視的是，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常常呈現的強烈的目的性。人們常常關注，或者說歷史本身更容易被看到的，是中共策略性的這一面，這確實也是中共政治的重要特徵，而一以貫之的目標、原則、方向（雖然不同時期有顯有隱），卻

可能是這個政黨更持久、更深層的內在規定。正是有著邁向未來的堅定目標，中共黨人才有可能穿透短時期的時代波動，駕馭時局、人心、社會而不是被時局、人心、社會所左右。這些歸根結底都來自中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特質，這樣的特質，對於理解這個黨，瞭解這個政治力量，有著無可替代的意義。離開了這些，用所謂民族黨、農民黨、組織黨去理解中國共產黨，難免南轅北轍，管中窺豹。

研究歷史，首先要回到歷史，哪怕真的只是文本的歷史，也要盡可能多地佔有文本。我們現在，離這段歷史還是太近，這段歷史的餘脈事實上仍然存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又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很多評判現在做還為時過早，既缺乏足夠的條件，又很難形成成熟的思考。所以，本書實際上做的更多是事實講述，即盡可能在不預設立場的前提下，面對原初的過程。一些涉及價值評判的問題，先行擱置，這樣做，有客觀的因素，也有筆者本人的不自信，即便現在看起來的天經地義，也未必不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這次席捲世界的新冠疫情，就很值得人類反思，雖然它並不一定會動搖我們的信念，但起碼告訴我們，人類需要面對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不斷反思以求改進，或許是面對這個世界更應該有的態度。

回到歷史，並不就是歷史認知的終結。回到歷史是為了更好地瞭解歷史，瞭解歷史不意味著照搬歷史。抗戰距現在已有七八十年，這七八十年，緣於科技的進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思維方式的更新，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極其巨大的變化。如果說在時間相對靜止的古代或近代社會，歷史經驗還可以直接對應現實，在如此劇烈變化著的當今社會，重複這樣的做法就不免刻舟求劍之嫌。但是，這不意味著歷史經驗就沒有了意義，作為人類走過的一部分，起碼可以從中看到一些趨勢性的理路，給我們或多或少的借鑒和啟示。

由於中國共產黨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中共的歷史對於當今中國有著更多的特殊意義，抗戰時期尤其如此。中共是一個剛性政黨，效率優先，意識形態色彩強烈，鬥爭性強，這一點，在蘇維埃時期特別明顯。國共破裂後，中共能夠在國民黨的追殺中迅速崛起，和這個黨強烈的鬥

爭性無法分開，當然，不斷困擾這個黨的盲動和左傾傾向也與黨的剛性特質相關。抗戰時期，中共實行統一戰線，意識形態色彩和鬥爭性明顯緩和，黨的領袖也在經歷一個重新釀就和成長的時期，加之各根據地具有相對的發展上的獨立性，因此，這一時期政治和社會行為都更具博弈和妥協色彩，而這又恰恰是中共發展最為迅猛的時期之一。聯繫到中共發展另外兩個特別成功的時期——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改革開放時期都具有這樣的色彩，這樣的結果就不能簡單視為偶然。從這些時期中，我們看到了鋼鐵般的意志和流水般的柔韌。中國有句老話：剛柔相濟，說的大概就是這樣的現象。剛性政黨、柔性運用，或許正是這個政治力量的良性狀態。中共具有強大的控制力，很多時候，人們會認為這樣的控制力發揮得越充分越好，然而，世界上的事不是那麼簡單，物極必反，禍福相依，控制的另一面可能就是活力的扼殺。控制固然可以解決問題，卻也會製造問題，何況，一個看起來沒有問題的社會，未必比一個看起來問題叢生的社會更健康、更有活力。

承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中共崇尚集體主義，集中既是意識形態，也構成系統運作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正如抗戰時期用統一戰線中和了政黨的剛性特質一樣，改革開放對社會力量的開放同樣開啟了一扇大門，即如何在一個越來越強調政治的統攬意義、經濟越來越趨於集中的體制下，逐漸重建、激活社會的能量，開放社會的自由度，引進市場競爭機制，尊重並提升社會中每個個體的價值。這樣的嘗試取得了巨大成功，這種成功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成功，還有社會力量逐漸崛起，政治和社會、集體和個人、效率和自由之間嘗試尋找一個更好平衡點的成功，後者的意義長遠看，並不一定遜於前者。通過改革開放，中共已經獲得民眾足夠多的信任，和之前封閉環境下信息缺失的信任不完全一樣，這是一種經過信息選擇和過濾的信任，事實上更為牢固。面對當今中國，無論哪方力量，如果可以充分考量這一事實，或許可以做出更符合中國現實的選擇。

改革開放的實踐到現在只有四十多年，這四十多年，有許多不變的東西，寫在憲法、法律裏面，無需我們多言；還有很多變的東西，體現

於我們的生活日常，時刻可以感知、把捉。在這裏，我們看到歷史的延續，看到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繼續延伸的脈絡，更看到一個政治力量面對現實的不斷調整、變化。中共是一個高度原則性的政黨，卻也是一個善於將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政黨，抗戰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都特別充分地證明著這一點。抗戰是中共成長一個特別重要的階段，中共很多的自我識別都完成於這一時期。事後的歷史或許會把這一時期描繪為平滑的、線性的，但歷史的當時則更多是飽滿的、衝突的。無論是走向集中、紀律之下個體的低音，還是多方力量博弈下的微妙戰略平衡，都能看到強大流向中的陣陣漣漪。當然，從方向上看，抗戰時的漣漪在改革開放時期卻可能成了流向，這就是歷史賦予這個政治力量的變化，也顯示不斷成長的中國共產黨的彈性。正由於這樣的彈性，有理由期盼，在政治和社會、集體和個人、效率和自由之間，假以時日，也有可能繼續探索，給出更好的答案。這不僅是全體中國人面對的課題，也是整個世界的課題。

從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和現實的進程看，歷史沒有終結，人類永遠在路上。兩難選擇通常都會以犧牲為代價，沒有犧牲的選擇似乎只能是烏托邦，既有的歷史和現實確實如此，但是未來呢？人類可不可以有更好的方案，更好的問題，乃至更好的問問題的方式，這些，都不必放棄希望和努力。中共歷史告訴我們，努力才會有希望，努力就可能有希望，畢竟人類既有的努力、成果和經驗已經和正在給我們許多的養分。

懷有希望的最重要的一個理由還在於，如果把時間放到宇宙當中，現在看到的人類歷史只是瞬間。驕傲、自卑、成功、失敗，在時間面前，都微不足道。而在這彈指一揮的時間裏，人類已經走到了今天。先賢們的謙卑和自省不斷搖撼著人們的心靈：「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蘇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蘇醒。」

希望在高崗上，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遠在天邊。

主要參考資料

1. 書目

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Van Slyke, Lyman P.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一二〇師戰鬥在冀中》，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

《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戰史編輯室1962年版。

一凡藏書館文獻編委會編：《古代鄉約及鄉治法律文獻十種》第2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丁三：《民眾怎樣參加游擊戰》，廣州戰時出版社1938年版。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論批評與自我批評》，人民出版社1950年增訂版。

于光遠：《我的編年故事（1939-1945）》，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于敏文集》，中國電影出版社2015年版。

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1994年版。

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

《山東革命根據地財政史料選編》，山東省財政科學研究所、山東省檔案館1985年版。

《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中央檔案館、山東省檔案館1995年版。

《工人武裝自衛旅》，工衛旅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1989年版。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紅星》，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

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山東黨史資料文庫》，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山東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新編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乙，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1994年版。

《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遼東省委檔案文件彙集（1946-1947年）》，遼寧省檔案館1986年版。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1、4分冊，人民出版社1957、1964年版。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室編：《蘇聯共產黨章程彙編》，求實出版社1982年版。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北岳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南歷史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太岳抗日根據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一）、（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1988年版。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劉子久紀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纂委員會編：《太行抗日根據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密縣黨史資料》第1、2集，中共密縣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1992年版。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編：《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黨史資料》第6、11、29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1989年版。

《中美關係外交文件——一九四三年》，台北聯合報社1962年版。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藏珍稀抗戰文獻匯刊》第2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

《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資料叢書·文獻選編》抗日戰爭時期（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學習出版社1996年版。

- 《五年來河南政治總報告》，河南省政府秘書處1935年版。
- 《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1990年版。
- 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編：《黨的建設》，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太行黨史料輯存》第1、2編，山西省武鄉縣檔案館藏。
- 《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方德萬著，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三聯書店2007年版。
-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華北治安強化運動》，中華書局1997年版。
- 毛澤東：《黨的政策選集》，晉察冀日報社1946年版。
- 《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
- 《毛澤東軍事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 毛澤東著，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蒼蒼社1983年版。
-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明〕王士性：《廣志繹》，中華書局1981年版。
- 王巨才主編：《延安文藝檔案·延安文學》第33冊，太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
-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
- 王林：《抗戰日記》，《王林文集》第5卷，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
- 《王林日記》(1949-1953)，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2023年版。
- 王英維：《1935-1945年的河北省國民黨》，河北師範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
- 《王恩茂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
- 王紫峰：《戰爭年代的日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 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淮北分會等編：《鄧子恢淮北文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卡爾遜：《中國的雙星》，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
- 古雷加著，沈真等譯：《德國古典哲學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 《平民眼中的抗戰歲月——孫壽珊日記》，陽曲縣史志辦公室2017年版。
- 弗蘭克·奧斯特羅夫著，陶宇辰譯：《水平組織》，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 申春生：《山東抗日根據地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 任文主編：《我所親歷的延安整風》，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4年版。
- 《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7-1943)》，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
- 《列寧全集》第6、8、21、33卷，人民出版社1985-1990年版。
- 《列寧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 《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安東尼·唐斯著，郭小聰等譯：《官僚制的內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 安東尼奧·葛蘭西著，曹雷雨等譯：《獄中札記》，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 安格魯·帕尼比昂科著，周建勇譯：《政黨：組織與權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 《戎子和文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
- 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 托克維爾著，邢曉宇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3年版。
- 朱瑞：《論婦女解放與婦女幹部的修養》，膠東新華書店1946年版。
- 《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

米歇爾·福柯著，汪民安譯：《福柯文選》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修訂譯本），2012年第4版。

《艾崗山抗日根據地》，中共蓬萊縣黨史徵集委員會1991年版。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河南省農村調查——調查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何方自述》，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年版。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8年版。

吳今培、李學偉：《系統科學發展概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吳聯膺：《烏扎拉日記六十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呂正操：《論平原游擊戰爭》，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呂正操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版。

宋劭文：《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工作報告1938-1942》，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1943年版。

《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摘編》，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西北財經辦事處1948年2月鉛印本。

《抗戰時期的竹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李大本修撰：《高陽縣志》卷2，1933年鉛印本。

《李大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鄉村社會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李公樸：《華北敵後——晉察冀》，三聯書店1979年版。

李立三：《李立三百年誕辰紀念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

李里峰：《革命政黨與鄉村社會——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李卓然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1938-1949)——李銳、范元甄通信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

《李雪峰回憶錄(上)——太行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

李景漢編著：《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士皓譯：《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中華書局2008年版。

《杜深如烈士日記》，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版。

沈廣和：《扁平化：當代中國政府過度分化的有效整合》，南京農業大學2011年博士論文。

沈霞：《延安四年》，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沙汀：《敵後七十五天》，三聯書店1983年版。

沙里可夫著，俊莊譯：《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蘇維埃社會發展的動力》，時代出版社1955年版。

辛程：《思想改造——我的自傳》，吉林省政協機關印刷廠2003年印行。

周佛海：《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周恩來軍事文選》，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周恩來選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周錫瑞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

岳謙厚、侯采萍整理：《郝星久日記》，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

岳謙厚、張瑋輯注：《「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2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版。

《昆張支隊資料專輯》，中共梁山縣委黨史委1988年版。

《昔墨今史——宋洪勛同志工作手記(1941-1948)》，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

林以行：《一個八路軍女戰士的日記》，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

林邁可著，楊重光、郝平等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河北省檔案館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河北婦女運動史資料選輯》，河北省婦聯1983年版。

《河南省政府二十九年度行政總報告》，河南省政府秘書處1941年版。

《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1934年，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1984年版。

波諾馬遼夫主編(譯者不詳)：《蘇聯共產黨歷史》，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60年版。

《竺可楨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金曼輝：《我們的華北》，上海雜誌無限公司1937年版。

侯東明編：《第二期抗戰中的華北游擊戰》，新光出版社1938年版。

《保定抗日地道鬥爭》，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

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

南陽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南陽縣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紀念朱理治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紅色藝術現場——胡一川日記(1937-1949)》，湖南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

《胡宗南日記》，國史館2015年版。

- 《范築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 《風——凌子風自述》，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5年版。
- 倪明勝、喬貴平：《新政治學之維》，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 《徐光耀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 《徐向前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
- 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1971年版。
-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1冊·文獻選編，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
- 《晉察冀軍區民兵鬥爭史叢書之三·地道戰》，長征出版社1997年版。
- 《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河南部分）》，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
- 涂爾幹著，杜守錦、彭守義譯：《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 祝靈君：《一致與衝突——政黨與群眾關係的再思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
- 秦基偉：《本色——秦基偉戰爭日記》，新華出版社2013年版。
- 《秦基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
- 耿成寬、韋顯文：《抗日戰爭時期的侵華日軍》，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 《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42年，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1993年版。
- 《馬可選集》七《日記卷》，人民音樂出版社2017年版。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3、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高敏夫：《戰地日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 《高魯日記》，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第35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
- 密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密縣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密縣志》，清嘉慶二十二年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張子珍：《生活日記》，中共雁北地委黨史辦公室、應縣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1984年版。
- 張信著，岳謙厚、張瑋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之演變——國家與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中華書局2004年版。
- 《張南生日記》，出版者不詳，2007年。
- 張研：《清代縣級政權控制鄉村的具體考察——以同治年間廣寧知縣杜鳳治日記為中心》，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 張起厚編：《中共邊區根據地的歷史文件選輯》，出版者不詳，1985年。
- 張寅生：《自述》，河南新鄉嗣紅印刷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印行。
- 《張愛萍軍事文選》，長征出版社1994年版。
- 《張漫萍紀念文集》，蚌埠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等2007年版。
- 張瑋、李俊寶：《閱讀革命——中共在晉西北鄉村社會的經歷》，山西出版傳媒集團2011年版。
- 《張聞天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修訂版。
- 《張聞天晉陝調查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
- 《張璽紀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從延安出發——開國少將張學思夫人謝雪萍口述歷史》，北方聯合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
- 從翰香主編：《近代冀魯豫鄉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 曹菊如：《曹菊如文稿》，中國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
-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 《烽火歲月中的記憶：浙江抗日戰爭口述訪談》，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
- 《淮北抗日根據地史料選輯》，豫皖蘇魯邊區黨史辦公室、安徽省檔案館1985年版。
- 《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史編寫辦公室1994年版。
- 《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 郭本敏、袁玉峰主編：《回望硝煙》，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 《郭峰工作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陳再道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
- 《陳伯鈞日記·文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
- 陳南南、陳田田整理：《陸地文集》第6卷《日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 《陳修良工作筆記1945-1951年》，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
- 《陳雲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 《陳雲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陳誠先生日記》，台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
- 《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台北國史館2007年版。
- 《陳賡日記》，戰士出版社1982年版。
- 《陳賡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
- 陳學昭：《天涯歸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陳翰笙著，汪熙、楊小佛主編：《陳翰笙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 彭柏山：《戰火中的書簡》，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

彭真：〈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1941年9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

《彭雪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

《彭雪楓書信日記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斯大林選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斯大林選集》第2卷，東北新華書店1949年版。

《景曉村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

《景曉村日記》，北京八路軍山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渤海分會2012年版。

渠桂萍：《華北鄉村民眾視野中的社會分層及其變動（1901-194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游擊戰在河北》，漢口全民出版社1938年版。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黑龍江省檔案館聯合編譯：《滿鐵調查》（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

覃應機：《硝煙歲月》，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

費孝通：《鄉土重建》，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賀昌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

馮·貝塔朗菲著，林康義、魏宏森譯：《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馮玉祥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馮毅之：《抗戰日記》，中共淄博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1984年版。

黃克誠：《黃克誠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

黃宗智：《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中國歷史的回顧與前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黃埔叢書·精神教育》，黃埔陸軍軍官學校1925年版。

楊弘、盧雲山編：《周士第將軍陣中日記》，石家莊機械化步兵學院2005年版。

《楊立三文集》，金盾出版社2004年版。

- 《楊思一日記》，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金滿分會1997年版。
-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楊國宇：《劉鄧麾下十三年》，重慶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 睢杞太黨史編寫組編：《睢杞太地區史料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鄒屏工作筆記》，中共淮安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1993年版。
- 榮孟源、孫彩霞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
- 滿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滿城縣志》，中國建材出版社1997年版。
- 維辛斯基編著，張子美譯：《蘇聯地方機構》，商務印書館1950年版。
- 趙永強：《抗戰時期武鄉農村社會變動》，山西大學歷史系2006年碩士論文。
- 趙如珩：《怎樣實施地方自治》，上海華通書局1934年版。
- 趙超構：《延安一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年版。
- 《劉子久紀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劉少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劉伯承：《劉伯承軍事文選》，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
- 劉峙：《我的回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87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
-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 劉贊平：《九十自述——劉贊平回憶錄》，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
- 德內拉·梅多斯著，丘昭良譯：《系統之美——決策者的系統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潘光旦：《潘光旦日記》，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
- 《蔡邁輪日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蔣介石：《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
- 《論游擊戰》，漢口獨立出版社1938年版。

- 《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鄧飛黃自傳》，岳麓書社2012年版。
- 鄭州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鄭州市志》第8分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 魯登道夫著，張君勳譯：《總體戰》，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 《黎玉回憶錄》，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2年版。
- 《冀中七分區人民抗日鬥爭史資料選編·滹沱河畔的戰火》，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
- 《冀中地道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
- 《冀中抗日政權工作七項五年總結(1937.7-1942.5)》，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
- 《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
- 《冀南黨史資料》第2、3輯，冀南革命根據地史編審委員會1986、1988年版。
- 《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一、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1993年版。
- 《冀魯豫邊區工商工作史料選編》，《冀魯豫邊區工商工作史料選編》編輯委員會1995年版。
- 《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宣教工作資料選編》增訂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整風學習資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縣政調查統計·江西省〉，《內政調查統計表》第22期，1935年6月。
- 〈縣政調查統計·福建省〉，《內政調查統計表》第21期，1935年5月。
- 蕭公權著，張皓、張升譯：《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 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
- 薄一波：《七十年的奮鬥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

- 薄一波：《太行抗日親歷記》，政協長治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版。
- 薄一波：《論犧盟會和決死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
- 《薄一波論新軍》，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
- 《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譯：《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 《聶榮臻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
- 《羅瑞卿軍事文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
- 羅榮桓：《羅榮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
- 龐元正、李建華編：《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經典文獻選編》，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
-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 《蠡縣黨史資料·紀念抗日戰爭爆發五十周年專輯》，中共蠡縣黨史資料徵編辦公室1987年版。

2. 期刊、報刊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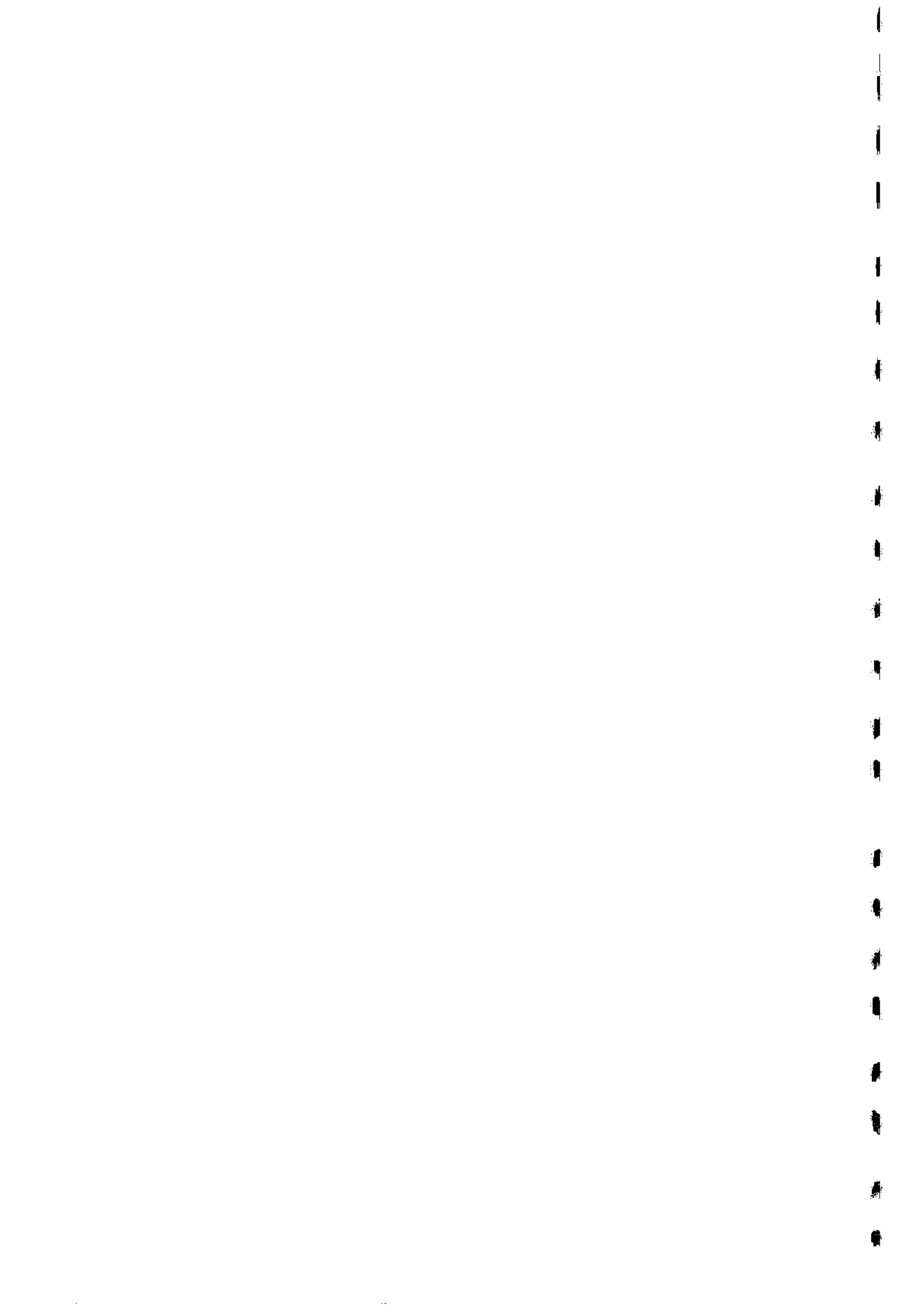
- 《大公報》(天津)
- 《山西文史資料》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 《太岳政報》
- 《文獻和研究》
- 《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 《史學月刊》
- 《申報》
- 《百年潮》
- 《老城文史資料》

- 《系統科學學報》
《河北黨史資料》
《河南文史資料》
《河南民政月刊》
《河南政治月刊》
《河南教育月刊》
《河南統計月報》
《社會科學雜誌》(北平社會調查所)
《近代史研究》
《前線月刊》
《軍政公報》
《晉綏學訊》
《晉察冀日報》
《泰安黨史資料》
《鬥爭生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
《國民政府公報》
《國際觀察》
《密縣文史資料》
《情報彙刊》(八路軍太行軍區司令部)
《理論學刊》
《復旦學報》
《黃埔》(重慶)
《新文學史料》
《新長城》
《新潮》
《群眾》
《解放》

- 《解放日報》
- 《福建論壇》
- 《鄭州文史資料》
- 《學術論壇》
- 《戰士》(湖南戰士編輯社)
- 《整風通訊》(中共晉察冀分局整風委員會)
- 《歷史研究》
- 《贊皇黨史資料》
- 《邊政往來》
- 《邊區政報》(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編)
- 《黨史資料叢刊》
- 《黨的文獻》

3. 檔案

- 山西省山陰縣檔案館
- 山西省平順縣檔案館
- 山西省檔案館
- 山東省檔案館
- 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 台北國史館
- 甘肅省慶陽市檔案館
- 安徽省檔案館
- 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資料平台
- 河北省檔案館
-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相關書目

《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著 · 石岩 譯 ·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譯校

《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增訂版)

石川禎浩 著 · 袁廣泉、瞿艷丹 譯

《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

石川禎浩 著 · 袁廣泉 譯

《尋路：近代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00-1929》

劉統 著

《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著 · 閻宇 譯

《歷史的覆轍：中俄革命之比較》

畢仰高 (Lucien Bianco) 著 · 夏沛然 譯

《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

王笛 著

《近代中國史綱》

郭廷以 著

學術專著：中國歷史

黃道炫是以社會與心理研究著稱的頂尖黨史學家。自關於江西蘇區的出色研究之後，他的《鐵水流》轉向了抗戰時期。這一內容詳實、引證嚴密的卓越研究，幫助我們理解了中國共產黨如何從革命黨崛起為執政黨。通過引述形形色色的幹部日記呈現出的個人思想轉變，黃道炫細緻地解釋了參加抗戰的愛國知識分子如何轉而服務於黨更宏遠的目標——國家、社會與個人的革命。要了解中共崛起，這是必讀之書。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歷史系榮休教授

黃道炫教授展現了非常難得的特質——別開生面、激動人心的歷史之聲。在《鐵水流》中，通過廣泛運用包括時人日記在內的多種新史料，黃教授提供了在檔案開放之前所能實現的最詳密的中共內部近距離特寫。這是一部超越前人的一流作品。

——**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

劍橋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

《鐵水流》聚焦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歷程，將作為整體的中共黨組織之摸索與作為個體的底層黨員之心路歷程相結合，探討黨的重生與特性。不僅闡明了共產黨在戰時的組織力與凝聚力的形成機制，還以一種大膽的、盡可能逼近研究對象的內在研究方法，呈現了當時黨內生活的風貌，塑造了具有真實感的歷史敘述，令人讀至緊張處不覺屏氣凝神，猶如身臨其境。這是一部一流的學術佳作。

——**石川禎浩**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黃道炫教授對史料獨具眼光，運用起來得心應手，同時他有機結合政治史、軍事史、心靈史等進路與多種社會科學的方法，考察抗戰時期中共政治文化的成長，為中國現代史和革命史提供了具有突破性的總體理解，令人耳目一新。

——**應星**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政治學系雙聘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cup.cuhk.edu.hk | HONG KONG, CHINA

